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巴金传

 **eBOOK**  
内网资料 非卖品

## 巴金传

上卷

## 第一章四川老家

## 第一节书香门第

历史是很迷人的。如果你有兴趣研究每个家庭的盛衰，你就会觉得它总是和它所处的时代发生着十分微妙的关系。不管这个主人的心态，是顺应历史老人的步伐前进；还是根本不理睬时代的潮流，一意孤行，最终它们仍然还是要与历史携起手来，发生使人无可奈何的变化。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外有侵略，内有战乱，清代王室摇摇欲坠，无疑是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在川西平原，人们至今还不曾忘记九十多年前曾有一个端午节，在成都的东较场上，发生过一起震惊中外的“成都教案”，有几千群众把四圣祠街的外国教堂捣毁了；接着而来的，则是红灯教和义和团的暴民们，相继围聚在成都城外，多次向城内作令人胆颤心惊的攻打；然后就在商业繁荣的成都市中心，有一些读书人，组织起一个由立宪党人控制的“蜀学会”，企图用“通经致用”、“托古改制”的办法，来迎接新世纪的曙光。尽管这些都象征了时代已不能再是死水一潭的局面，而在成都城的北门，有个座落在正通顺街上的李家，它的主人李镛，却还是按用祖宗世代传下来的规矩，在安排着他自己的家业，虽然他到最后才知道那原来不过是春梦一场。

这条正通顺街是一条石板路，虽有几家店铺，多半却是做官人家的住宅。李家在这条街上，占地面积最广，名声也很响亮。它的西邻是清末驻藏钦差大臣凤荃的住宅，后来租给英国作为领事馆；东面是赵姓公馆，再过去则是一个大仙祠，平时静悄悄，一到逢年过节，举行庙会，香火却很鼎盛，这条街也就热闹起来，甚至行人如织了。西面转弯街角，则有一家茶馆，是三教九流人物逗留的一个热闹场所，公馆里的人是很少在这里出现的，只有隔壁轿行中的那些贩夫走卒，才经常站在茶客旁边，听那些见多识广的人讲来自城内城外的新闻。

李公馆门前平时则是肃静无声，巍巍的高墙把深院大宅内的声音都围起来了。门前一对石狮子，也长年保持着沉默，好像它们也与这家的主人一样，无闻于世界的各种声响。门前还有两只很大的太平缸，经常盛满水，准备附近发生火警时救灾用的，由于多年这里保持着“太平”，这两只太平缸并不曾发挥过作用，倒是附近的那口双眼井，成了这个地段的标志，有时人们就把“双眼井”三个字来代替“正通顺街”这条街名了。

写在李家大门上红底黑字的门联“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八个大字，确实反映了主人李镛对国事家务的看法与愿望。在他心目中，这是个皇恩浩荡、国泰民安的时代，即使社会有些小的动荡，也不过少数盗匪一时作乱，不久总会由官府派出大兵把他们平定的。他从来不曾想到过皇帝有一天也会垮台，连他自己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家庭也会发生变迁。说实在，从李家的祖基来讲，李镛不但不是游手好闲的败家子，而且应该算个光采的接班人。他的祖父李介庵先随伯祖李秋门离原籍浙江嘉兴到北京，得交当时名士吴穀人、张船山；后又应聘山西马氏教馆，做了十余年的家庭教师，使马氏子弟都得以应试及第。这样，李介庵才有机会因马氏的保荐，捐官入川，在当地定居。到了李镛的父亲李璠，他不但做了一任县官，还购置了一些田产；但数量不多，留给后代的，主要还是他那本有些书卷气的《醉墨山房仅存稿》。只有到了李镛，辞官后才广置田产，还在戊戌政变前，买下正通顺街这座五进三重堂的深院大宅。

李镛觉得他的家业兴旺，是由于皇恩浩荡，只有按照皇帝定下来的规矩

办事，才能这样无愧于祖宗在天之灵。他盼望他的所有后代都按着他的规范兴家立业。他一向认为自己为官清明，深通礼教，特别还能写诗做文，这很使他有点自负；六十岁那年还曾印了一本《秋棠山馆诗钞》送给亲朋。他的原配夫人汤氏，是个知书识礼的大家闺秀，她的外祖母更是当年“兰陵三秀”之一，既能绘画又能作诗，还曾一度以诗画维持生活，自称“澹影阁老人”。所以这位汤夫人，真称得家学渊源，可惜天不假年，较早亡故，只在死后留下一些诗句和画稿。李镛的第二个夫人姓濮，也是江苏人，门第虽不及汤氏，却也不是一般妇女。她同样能吟诗，并留有诗稿，在李镛的“诗钞”里也不难发现她与丈夫相互吟和及寄托哀思之作。两位夫人为李镛生下了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其中一子二女早年夭亡。李镛在前两个夫人谢世后，又讨了两个姨太太，为他带来一个足以做他的孙子的第六个儿子。

由于“书香门第”的传统，李镛夫妇给他们的大儿子李道河，也娶了一个知书识字的闺秀做李公馆的大房媳妇。这个媳妇虽从十岁起就跟着做官的父亲来四川定居，却出生在山明水秀的浙江省的一个县城里，她曾伴着她兄弟进私塾读了几年书，学名陈淑芬。她凭着聪明的天资和良好的素质，居然很早就与诗词结下了不解缘，熟读了不少唐诗宋词，让这些诗词艺术陶冶了自己的性情。她为人谦和，品性善良，同情下人，而又豁达大方，深得翁姑亲朋的好评。当她嫁到李家时，公馆曾为这位大房媳妇进门演了三天戏，使整个正通顺街都知道了李家这件喜事，非同一般。果然，她进门第二年，就给她的丈夫李道河生了个面目清秀的男孩，也就是说，给李镛带来了一个足以为他家传宗接代的长房长孙。这就是巴金的大哥，奶名叫果麇的李尧枚。使人感到遗憾的是李道河的官运并不亨通，快近而立之年，还一直在成都邻近的几个小县城里担任着知县下属的小吏，这使李镛常引以为憾。就在这时，陈淑芬却又为李家接连生了三个女儿。封建家庭重男轻女。女儿太多不免成为伯叔婶娘们讽刺嘲笑的话柄。恰好那一年，李道河被派去当大足县的典史，专管监狱和捕捉盗贼的事情，每晚都要出去巡查，半夜才能回家，虽工作辛苦异常，却讨不了上司的欢心。因为他不善于见风使舵，鉴貌辨色，不久就被别人接替了自己的职位，最后只好回成都老家。这就更使长房在公馆里颜面无光。第二年，李镛花了一笔巨款，给儿子捐了一个过班知县。按照那时的规矩，捐官需送京城去，让朝廷点派的大臣验看他的风度、相貌和履历，才能确定他是不是能担任这个官职。哪知李道河虽然性情豪爽，平时很受朋友们器重，却并不为上司赏识。大臣才问了他几句话，就把他的申请“驳回”了。他在京城进退两难，处境尴尬，一封家信寄到成都，陈淑芬在李公馆更成了众矢之的。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长房媳妇进门，许多双眼睛就瞧着她有没有“帮夫运”。李道河在京城申请“过班知县”被驳回，罪名不在上司的用人唯亲，也不怪李道河自己，而是在他的夫人缺乏好运帮夫。至少公婆、叔婶、妯娌是这样看待的。她由此受到挪揄，日子很不好过，只有对着她的儿子和三个女儿暗暗掉泪。不久，火上添油，她那还不到四岁的大女儿，竟在她心神不宁的烦忧生活中夭折了。

李道河的第二个儿子尧林，和第三个儿子尧棠来到人间，真是及时。他们不仅给在大家庭中受困的母亲解了围，而且那时新世纪的曙光已在中华土地上出现：清朝皇帝想用“新政”来挽回王朝即将崩溃的危局，而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

尧棠出生的那天是1904年11月25日，即农历甲辰年十月十九日，正是

他母亲陈淑芬自己的生日。这一天天气晴朗，像每个有阳光的冬日那样，叫人感到温暖又愉快。早晨，陈淑芬躺在床上，在朦胧中，想起黎明前那个奇怪的梦，禁不住嘴角挂上微笑。她记得醒来之前，有个观音模样的“送子娘娘”踏着轻盈的脚步，来到她的面前，微笑着将个婴儿交到她的手中，对她说：“这孩子本来给你弟妇的，怕她不会好好待他，所以如今送给你。”她把孩子揣在怀里，抬起头向娘娘道了声谢谢，然后低下头去看那婴儿，自己却醒来了……她像往常一样起了身，吃过早饭，从女仆袁嫂手里抱过来才断奶不久的一周岁多的尧林（奶名安麇），看她是不是把他喂饱了；然后来到三个大孩子尧枚、尧桢、尧彩身边，让他们围着她说笑。就在这个时候，她发觉自己的腹部出现阵痛，多次的经验告诉她：可能临产了。于是像所有当年做官人家一样，家里出现了忙乱：她被搀扶着重新睡到床上去，李道河赶紧派轿子去请医生，李镛则按着旧规点燃起香烛，求祖宗在冥冥中保佑全家安宁；接着是整个公馆里的人都在关心：长房里添丁还是弄瓦？

暖暖的阳光照在上房的窗前，它的脚步虽然缓慢，却并不停顿。时间已经过午了，好不容易，房间里终于响起一阵婴儿的响亮啼声，啊，一个男孩出生了，像他那两个哥哥一样，面貌清秀，五官端正，滚圆的脸，宽阔的头额，这就是乳名升麇的李尧棠，后来成为作家的巴金。他从混沌中来到人间，此刻，在床帐里，他在想些什么呢？只见他睁开明亮的大眼睛，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第一个景象，那就是他那温和善良的母亲的形象：她那胖胖圆圆的脸，永远微笑着的慈祥的面容，和她用刨花水梳得光滑的头发。她把他紧紧搂在温柔的怀抱里。虽然是冬天，人间的母亲的爱，却是这样暖和。

## 第二节在慈母的抚爱下

显然，母亲并没有辜负“送子娘娘”对她的托付，她本来对这个世界就倾注了热烈的爱，对她自己亲生的几个孩子的爱更是无法形容；而对于尧棠，则就更加爱逾珍宝。李家的长房住在公馆里的右上房，祖父李镛住的是左上房。尧棠就在这里经常被长辈和下人们怀抱着，从一个人手里传递到另一个人手里，被爱抚着，因为他当时最小，最受宠爱。他的大哥尧枚比他大七岁，他的另一个哥哥尧林比他大一岁，但他称这个哥哥为三哥，因为那时他的二叔也生了个男孩，比他大两岁，李家是大家庭，按着大排行的规矩，这样，尧林就是老三了。当尧棠自己会走路，虽然总还有大人带领着，但他就再也受不住大人过分的约束，欢喜跟着哥哥、姐姐们去各个屋子串门，特别欢喜穿过大厅和花厅，来到公馆右边的花园里，看重重叠叠的假山，看红红绿绿的花草，看飞来飞去的空中小鸟，和使池塘水面上出现明亮珠子的太阳。可惜的是在他四岁那一年，他不小心跌进了水池里，这事被祖父知道了，立即命人把水池填平。从此，这个花园就再也没有池塘了。

1909年，清朝宣统皇帝接位，尧棠的父亲李道河好不容易获得官府通知，可以到广元当知县。广元在嘉陵江上游，四川省的北边，靠近陕西省，离成都有四百多里路程，是个偏僻的山区，土地贫瘠，人民生活困苦，对做官的人来说，并不是个肥缺。但李道河正在青壮年，血气方刚，觉得有个知县位置，总比闲在大家庭中强，这就鼓起劲头，带着自己家七口人，加上一直服侍妻子的袁嫂，和日常带领尧棠、尧林玩的杨嫂，以及小丫头香儿，老书僮贾福等一行，浩浩荡荡上路。当时从成都到广元，既无铁路，又无公路，只有靠乘船和坐轿。尧棠的母亲生过六个孩子，身体原不很好，这时偏巧又有身孕，沿途照料丈夫和孩子，辛劳是很难用三言两语形容的。五岁的尧棠，对这次旅途生活，却感觉到又新鲜又快活，他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高的山，那么宽阔的河面，那么多的树木。大概经过二十多天的路程，全家才到达了广元县城。

他们一家住进衙门里。那地方比成都老家还大。进去便是一块很大的空地，两面是监牢，零零落落关着一些犯人。接着便是尧棠父亲审判犯人的大堂，然后是二堂、三堂、四堂，还有草地和桑林，以及养鸡放鸭的地方，算起来总共有六、七进。他们住在三堂，和在成都时一样，尧棠和母亲仍睡在一张床上。虽然不久他的第一个妹妹乳名广麀的李琼如出生了，这个妹妹就是至今健在的九姑，巴金同志家里和善可亲的“九姑”。但母亲还是和他睡在一起。每天一早醒来，他就看到母亲圆圆胖胖的脸，总是带着微笑，爱抚着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跟着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到二堂旁边的书房上学，教书的是一位三十多岁年纪的刘先生，人很和善，从不责备他。他先教尧林、尧棠识方块字，后让他们读《三字经》，然后再读《百家姓》和《千字文》。刘先生还能按照书本画出各种人物、山水、花草和房屋。他在孩子们心中是个本领很大的人。他给大哥、二姐、三姐都规定了放学的时间，唯有尧林、尧棠例外，可以早些回家。下午放了学，尧棠总和三哥尧林由丫头香儿带着到四堂后面的草地上去玩。有时他们在桑树上采桑果吃，更多的时候是给公鸡和母鸡起名字，替鸡群排队，做各种游戏。有时看鸡斗，他恨凶狠的霸者，同情受欺压的弱者。有一天，他发现他心爱的大花鸡没有了，香儿说：“该是太太叫厨房里的何师傅抓去杀了！”尧棠就奔到母亲那边，恳求她不要杀



那只鸡，母亲微笑说：“那就叫他们换一只吧。”尧棠说：“这些鸡全是我欢喜的，你就不要杀它们吧。”母亲说：“那不行，是你爹爹吩咐了的。你快到厨房去看一下吧，迟了，那大花鸡便完了。”他又急忙跑到厨房里，果然，何师傅已在揩沾满了鲜血的刀，那只大花鸡已暈倒在血地里，扑着翅膀咽气了。他大哭着，回到母亲的怀抱里，母亲虽然笑着，喊他“痴儿”，但她并没有责备他，只抚摩着他的头发，给他安慰。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饭桌上端来了一盘鸡肴，别人吃得津津有味，而他却无法下筷。他痴痴地想着：“为什么做了鸡，就得被人杀着吃呢？”

那时节，一到晚上，母亲还给孩子们各人一本用白纸订成的小本子，她每天在这些小本子上，用娟秀的笔迹，端正地抄上一首词，那是按着《白香词谱》的顺序抄录下来的。她柔声地读着这些词句，并为孩子们讲解，让孩子们从幼小的年龄起，就接触到文学和音乐，引导他们的心灵走向艺术的殿堂。尧棠顺应着母亲的吩咐，按日背熟一首词，他当然未必能完全理解这些词的意义，和作者的心情，但他从来不曾因为母亲这样的引导感到痛苦，他总是觉得在母亲身边读诗背词，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来到广元的第二年，尧棠的第二个妹妹出世了。这是母亲生的第八个孩子，她的乳名叫元麇。这时尧棠早由杨嫂带领着，到另一个房间和三哥尧林同睡在一起。那房间里还有一张床，是杨嫂搬来陪伴他们兄弟两人的。

杨嫂是个二十多岁的寡妇，在成都时就来李家做佣人。她很爱清洁，总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把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不许孩子们把它们随便弄乱弄脏。她经常半夜起来，为他们两兄弟盖被子；她还会讲故事，虽然内容荒诞离奇，有些不能叫人相信的地方，但还是经常吸引着兄弟俩，听了一个又听一个，成为他们每晚从母亲房间读词回来的余兴节目。过了冬天，春天来了，有个晚上，母亲忽然对尧林、尧棠兄弟俩说：“以后还是让你们的二姐陪伴你们睡吧，杨嫂病了。”说着，母亲和二姐就牵着他们兄弟两人的手来到他们的房间，把他们的床铺安顿好，然后二姐又把杨嫂的床铺换成自己的被褥，伴陪着他们躺了下来。二姐尧桢比大哥尧枚只小一岁，比尧棠大六岁，这时已经十二岁，对尧林尧棠说来，是个大姐姐了。她一直很体贴母亲的辛苦，经常帮助母亲料理家务，但她身体很单薄，性情也比较忧郁，经常有点咳嗽，这时母亲也吩咐她早些睡，兄弟俩却要求二姐代替杨嫂讲故事，二姐一口答应着，于是她把白天从《烈女传》中看到的故事讲给他们听，尧棠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他觉得这些故事并不好听。

隔了好久，还看不到杨嫂来陪伴他们，兄弟两人对她非常想念。有一天下午，放了学，尧林对尧棠说：“我们去看杨嫂好吗？”尧棠立刻赞同，两人就悄悄地蹑到三堂右边女佣住的一个房间门口，轻手轻脚地把门推开，只见房间很乱，很暗也很脏，还闻到一股臭气。杨嫂躺在床上睡着，头发蓬松，脸色像一张白纸，桌上放着一碗药还不曾喝掉。尧林轻轻叫道：“杨嫂，杨嫂，我们来看你了！”杨嫂闻声，睁开眼来，见了他们，不觉拉住他们的手，不知是兴奋，还是乏力，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后来她慢慢地问道：“你们好吗？我病倒后，谁来照料你们？”尧林答道：“二姐陪我们睡，还有妈妈……”杨嫂又说：“这就好。我一直惦记你们，怕少了我，你们会吃苦。”她颤着声说完，伸出手去摸尧林的头，却把眼睛望着尧棠。尧棠哭了，他的热泪滴在杨嫂冰冷的手上，却讲不出一句话来。这时尧林把桌上的那碗药端了起来，说道：“药冷了，我给你拿到厨房去热一下。”杨嫂连忙说：“冷了不要紧，

千万不要拿去，给人家增加麻烦。”她把药碗从尧林手上抢了过去，咕噜咕噜地一下就把冰冷的药汤喝了下去。然后把空碗还给尧林，让他放回桌上，自己就一头倒在枕上，好像做了一件非常吃力的事，疲劳得闭起双眼，发出微弱的呻吟。然后又轻声说道：“你们走罢，让别人见到，会说闲话的。”兄弟俩就走了出来。他们一出房门便见到香儿正在到处找他们。香儿说：“谁让你们来看杨嫂的？她有病，太太知道了要骂你们的……”她果然把这事告诉了尧棠的母亲，但母亲并没有责备他们，只是认真地叮嘱兄弟俩：“今后可再不能去看她了，怕杨嫂的病会传染给你们。”从此，他俩再也不曾看到杨嫂，只听说杨嫂的病愈来愈重了，说她精神有点错乱，嘴里经常念念有词，也不知在说些什么，有时还发出一阵怪声叫喊。有一天，大家正在母亲房间里说着话，香儿忽然进来告诉说：“杨嫂在吃自己身上的虱子呢！她完全疯了！”听到这话，尧棠倒在母亲怀里哭了起来，母亲也叹息道：“杨嫂怎么会生这样的病呢？真可怜，她年纪很轻，就成了寡妇，她的心这样好，她对待你们，和我对待你们差不多，她是从心底里欢喜你们的。她怎么会生这样的病呢？她才二十八岁啊！听人说，杨嫂原有个三岁的孩子，杨嫂每月贴人家一点钱，寄养在乡下，后来不幸掉在河里死了，她连孩子尸首也不曾见到。”过了几天，母亲又说：“看来杨嫂的病不会好了，她连饭都不肯吃，怎么活得长呢？”她征得尧棠父亲的同意，把话吩咐下去：要准备一口棺材，木料要上等的。果然，没有几天，杨嫂就死了，消息传来，全家正在吃饭，父亲不觉放下筷子，母亲流下了眼泪，大哥、三哥、二姐、三姐也都心情黯然，尧棠更推开饭碗，伏在桌上大哭起来。

这是李尧棠第一次感到死的恐怖和悲哀。当然那时他还不曾体会到杨嫂的死，是有社会原因的；等到十年以后，他才逐渐理解到那是有一种几千年来就存在着的可怕的封建权势，无形中把这个青年妇女逼疯逼死了。

幼年时代的尧棠在广元县所看到的封建社会，还有一种更为可怕的景象，不仅使他感到恐惧，还使他的母亲感到不安。这就是他的父亲坐在二堂上，拍着惊堂木，审判犯人。说实在，尧棠的父亲李道河平时并不像戏曲舞台上那种鼻子上涂了白粉的奸官，当然他也不是旧小说中专替人家伸冤鸣不平的理想人物包公。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普通人，对待子女和蔼可亲，但为什么一穿上官服，坐到公案前，脸就沉了下来，俨然变成一个“青天大老爷”，别人都得向他磕头下跪呢！有时父亲命令差役把犯人的屁股打得皮开肉绽，最后犯人还得向他三跪九叩，高呼“谢恩”。尧棠站在公案边，常常看得目瞪口呆，在他的脑子里浮现着许多问号，却长期解答不出。但是他父亲还是按着这个规矩，每隔二、三天升一次堂，升堂时总是先问这问那，问到后来，没有办法了，就拍一下惊堂木，厉声高喊：“给我拉下去打！”于是差役们拿起板子，按照他的吩咐，打到犯人身。有时还用一种“跪台盒”的刑罚，把犯人的手、脚、腿都捆在杠杆上，然后使劲抽紧，让犯人感到锥心似的痛，比打板子更可怕。有个晚上，犯人的惨叫让睡在三堂里的尧棠的母亲听见了，她对尧棠的父亲哀求说：“算了吧，人都是父母养的，哪经得起这样折磨？”父亲笑着说：“我何尝欢喜用刑，不过不用刑，他们不肯招，这些犯人很狡猾。”母亲说：“你这样做，不会发生屈打成招的事情吗？”父亲似乎很自信，但又疑虑了一下说：“不会的吧，今后不用死刑就是了。”在他任期内，确实不曾使用过死刑，后来连“跪台盒”的刑罚也不用了，但是还是经常打人板子。有一天，忽然打到管监狱的刘升和厨房何师傅身上。那是在过年的

时候，尧棠在门房里看到许多人在轮流做庄推牌九，参加的都是一些下人。尧棠看了一会，跑到母亲房里，母亲问他到哪里去了，他说：“到门房里看热闹。”母亲说：“有什么热闹可看的？”尧棠回答说：“他们可玩得痛快呢！一堆人摸着牌，又说又笑，还把银元推来推去。”正说着，父亲走进房来，就问香儿：“是哪些人？”香儿不敢多嘴，就说：“我去问一下。”当晚，父亲就派人去捉赌，结果不但把骨牌丢到厕所里，还把为头的刘升和何师傅几个人捉了起来。父亲这次非常恼火，说：“哪里料到赌场就在衙门内！那还了得！”就向差役下令，要他们把跪在地上求饶的刘升和老何各打五十板子。那些差役却迟迟不肯动手，因为都是自己人。父亲更加生气，拍着坐案，又厉声喊打，差役们这才不得不动手，结果每个人挨了二十下小板子，才总算勉强了结此案。

尧棠不了解他父亲在家里十分和善，从不骂人；为什么一升堂就对犯人动辄打板子。特别是这次，刘升与厨房何师傅都是尧棠平时接近的人，他们和他都很好，而由于他向母亲讲话时把赌博的事泄漏了，才使这两人挨了打，他心里不安，就跑去用好话安慰他们。他们却不计较，仍像往常一样，什么话都对他讲，这使他更加不理解。他逐渐感到一个人坐在公案上拍台子打人训人，和一个人跪在地上叩头求饶谢恩，是不能理解也很不光彩的事情。他把自己对父亲的两种不同面貌的怀疑，向母亲讲了。母亲说：“坐堂是件大事，你人小不懂，今后不要再去你父亲审案了。”虽然母亲这样说，尧棠还是经常去大堂看热闹，并继续到下人所在的地方去玩耍。好在母亲虽然只是叫袁嫂、香儿把他带领好，但是对尧棠和下人们在一起，甚至参加一部分轻微劳作，她是从来不管的。

尧棠觉得这些下人直来直去的谈话很有趣，也很亲切，倒是和父亲来往的那些长辈们，他们打躬作揖的礼节有些使人讨厌。那天，祖父生日，虽然祖父在成都，不在广元，但父亲还是摆起香烛，请安敬神。他们朝一只空的座位下拜，父母拜了不算，大哥、三哥、二姐、三姐也都下跪叩头；轮到尧棠了，尧棠躲在厨房里不肯出来。母亲派香儿来叫他，他出来也不肯下跪，说祖父人都不见，还行什么礼？母亲一向非常欢喜他，这次可被他激怒了。旁人也说这孩子越来越倔强了。母亲在众人面前放不下面子，就扬起鞭子吓他，他还是不肯服从。母亲只好把鞭子抽到他的身上，他穿着棉衣，其实并不很痛；真正感到痛的，倒是他的母亲。最后，他哭了，母亲也哭了。……

当然，母亲在平时是很温和的。即使他们兄弟有些过错，她也总是进行十分耐心的劝告，很少声色俱厉地责备他们。有一次，她听说尧林为了一件小事，把香儿骂了，还打了几下。母亲便找来尧林，对他说：“你怎么能搭主人架子？主人是人，丫头、佣人也是人，大家都是一样的。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谁也不能随便打人。”母亲见他低头不响，感到羞惭，就把语气转得温和继续说道：“现在你们兄弟俩都快七八岁了，不比小时候什么都不懂。刚才我讲的道理，你要记住，你说说，你懂吗？”尧林想了一下，点头回答说：“我懂了，也记住了。”尧棠站在一旁，见三哥认错，他也很高兴。于是，兄弟俩就又让香儿牵着手到别处玩了。……

这样过了两年，尧棠的父亲李道河任期满了，在宣统三年，也就是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最后一年，他不再担任广元的知县官职，回到了成都。

那时尧棠已经七岁，经过在广元的二三年童年生活，重回老家，老家在他的心目中，现在又是一番景象了。

### 第三节经历了一场风波

尧棠回到成都老家，和他一起玩的人顿时多了起来。除了三哥，还有几个堂表兄弟，和年龄与他差不多的六叔。使尧棠特别感到有趣的是，家塾里十分热闹，读书的人比在广元时的书房多得多，有时父亲、二叔、三叔和五叔也来与教书的龙先生闲聊，还常常可以听到各种新鲜的消息。

那正是宣统三年的春夏之交，清王朝就要垮台。在四川，老百姓为了要求自办铁路，正在与清政府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这一天早晨，龙先生又像往常一样，向在场的大人发问：

“听到消息吗？”

“还不曾呢！——出了什么事啦？”大家不免好奇地问。

龙先生大概三十多岁，虽然当时他的脑后还拖着辫子，但比刚从日本留学回来已经剪了辫子而又在脑后装了假辫的二叔、三叔，还注意着时局的发展。清政府为了换取外国人的贷款，来维持他们的罪恶统治和挥霍无度的享乐生活，一方面宣布实行“铁路国有政策”，另一方面又同英、法、美、德四国银行集团签订了借款合同，把川汉铁路卖给了帝国主义，因此遭到老百姓的竭力反对。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发表宣言，号召四川人起来“破约保路”。龙先生非常支持这个行动，但他听到的是个不好的消息。他问大家：

“你们不知道吗？政府把王大人革职了！”

“王大人”就是当时的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他因在成都亲临民办的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议，看到会上群情激昂，认为“民心不可违”，曾上奏劝请清政府悬崖勒马，不料反被清政府认为“软弱无能”，竟被撤了职。

“我看这事情只会愈来愈僵，”龙先生说道：“不信，你们等着瞧吧，难道老百姓好欺侮的吗？”

果然，隔了一个多月，龙先生又传来消息，说因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强行接收了川汉铁路宜昌分公司，保路运动在革命党人的推动下，发展成了罢课罢市和抗粮抗捐的群众斗争，还宣布不承认清政府的一切外债。赵尔丰已经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十个代表，并搜查了川汉铁路公司，激起了成都市民的愤怒，他们高举着光绪皇帝的牌位游行赴督署请愿，赵尔丰竟下令开枪射击请愿群众，当场打死了二十多个人。李公馆里的人还隐约听到一些枪声……

一连几天，赵尔丰发布了戒严令，城门都闭了起来，局势好像安定了。但龙先生却告诉人说：“你们哪里知道，有人发现：同盟会里的革命党人深夜越城，在成都城外的农事试验场，用数百片木板，写了字，把它投入锦江，让下游的各州县都知道成都发生的事，现在各州县都在响应，看来要出大事了！”

龙先生的预料没有错，1911年9月25日，锦江下游的荣县宣布独立，由吴玉章、王天杰等人建立了辛亥革命前夕由同盟会领导的第一个县政权。它比武昌起义还早半个月。

政治局势的急转直下，对当时只有七岁的尧棠来说，当然理解不深，但对暴力要反抗，对丑恶要鄙弃，这时他已开始有所意识。他分明记得当时学馆里的龙先生天天用激动的声音向大家叙说川汉铁路的情景。在另一方面，使尧棠感到遗憾的是当时他自己的脑后还垂着一根小小的硬辫子，用红头绳缠着，每天要母亲或女佣来帮他梳洗，他觉得是一件很讨厌的事情。

尧棠记得这年旧历十月十八日，是他那已故祖母汤夫人的冥寿，祖父和父亲他们正在堂屋里为祭祀的事情忙碌着。黄昏的时候，父亲正准备带领全家人到祖母像前磕头，一个仆人忽然进来，说是外面发生了兵变，街上发生了抢劫，银行也被占领，据传附近的二伯父家也有士兵进去骚扰。（二伯父是父亲的堂兄，李家按大排行称呼，所以也有人称尧棠的父亲为“三老爷”）原来四川各州县纷纷宣布独立，四川总督赵尔丰见大势已去，为保存实力，就将政权交给立宪党人，在成都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以抵制同盟会领导的革命军。但是他这一行动为四川人民所竭力反对，军队内部又争权夺利，自相残杀，不久，这个“大汉四川军政府”内部就发生了这场兵变，成都的社会秩序一时大乱。

一听到这兵变消息，李公馆空气紧张起来。为了保证全家安全，尧棠父亲把祖父安顿到一个亲戚家里，并疏散了各房大人和孩子；然后又叫母亲把尧棠兄弟姐妹带到外婆家，留下他自己与大哥尧枚守在家里。到了深夜，果有一批变兵来敲门。父亲吩咐十几个堂勇和三叔的两个镖客，身佩长枪，在二门外的天井里守卫着，所有马夫、轿夫、男仆、厨司都作后备，分守大厅、堂屋、厢房、后园等处。大门终于被变兵撬开了，进来了十几个人，起初声势汹汹，后来发现二门外列队站着十几个身强力壮的汉子，又都荷枪实弹，就立刻改变口气，说没有什么别的意图，只不过想回家乡去，借些路费。尧棠的父亲拿出一叠银元，用纸封好的，恰好一百元，对他们说：“弟兄们有困难，这点小意思，你们拿去用吧，还谈什么借不借呢？”这些丘八爷就这样被打发掉了。

尧棠他们跟着母亲住在外婆家，同样受了一整夜的惊吓。他们熄了灯挤在外婆的卧室里，屏息静气，等候动静。忽然听到一阵枪声，外面天都变红了。接着又听见一阵吆喝和哭闹的声音，舅舅进来说是邻近的公馆遭到抢劫。外婆一边念佛，一边劝母亲赶快躲避，母亲则要求外婆先走，外婆坚决不肯，却让舅舅搬了梯子，帮助尧棠一家爬过墙去，到一个管菜园的老婆子家去坐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局势看来平静，母亲带了尧棠先回到公馆，看到父亲和大哥，虽然只过了一个晚上，却像隔了几年一样，且喜大家平安无恙，总算把这个难关度过了。原来成都这场兵变，最后由同盟会员带领革命军把它平定，并成立了新的“四川军政府”。直到这时，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才终于宣告结束，辛亥革命在四川得到胜利了。

“你们听到消息吗？”不久，龙先生又在李公馆的书房讲新闻。这次他比任何一次都兴奋，而且高兴得几乎要掉下泪来：“革命军冲进了督署，把赵尔丰当场擒住，还游了街，杀了头，头挂在城门口！”

尧棠听了这个消息，好像亲自看到那个专门与人民作对的赵尔丰被捉，被反绑着游行，最后被斩首示众。他感到非常新鲜，也非常兴奋。最使他高兴的是，男仆姜福得到父亲和母亲的同意，把他和三哥尧林的小辫子都剪了，他们和二叔三叔一样，脑后都不再有那个讨厌的东西了。隔了不久，全家的男人、男孩也都把辫子剪掉，最后，连一家之主的爷爷，也不得不把辫子剪了。。

二叔原是个秀才，在日本留过学，学的是法律，回国后，戴过红顶子的官帽，还曾由皇帝“特命”，担任过有“道台”称号的四品官，在家里比谁的“身价”都高，所以换了朝代，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幸而他古文根基很好，学的法律知识虽称不上怎样精深，但究竟是我国第一批法科留学生，请

教他的人还是不少，他便在公馆里设了个律师事务所。三叔也去日本留过学，回来曾在南充当过知县。他的为人不像二叔那样持重，那样循规蹈矩，清朝皇帝垮台，他曾替自己起了个“亡国大夫”的称号，吟诗抒怀；后来大概发觉这个称呼太不合时宜了，就换了个“息影蠹主”的笔名，一边在二叔的律师事务所做帮办，一边还在当地一个法政学堂挂了个名义，把自己从国外学校带回来的讲义译成中文，“批发”给国内学法政的学生。他的性情急躁，稍有不遂心，就暴跳如雷，碰上三婶和他的脾气差不多，因而有时闹得家里天翻地覆，寝食不安。

至于尧棠的父亲，他弃官回家，本来已无意于仕途；现在却反而忙碌起来。大家庭的事，原由祖父作主，具体却要他总管。他交游广，外面商业场各行各业凡是他们家有份的，董事、股东名义统由祖父挂着，事情却都得由他出面去做。他待人和气，不搭架子，又有做过知县的身份，人家都尊重他。他一听到“逊清让位”的消息，就在家摊开一块洋布，带头取剪刀，拿针线，做起新的国旗，准备把它挂到公馆大门口去……

最兴奋的还是尧棠他们这一代，特别是大哥尧枚，他希望有一天能进新式的学堂去念书。果然，不久他得到爷爷的开恩，终于进中学读书去了。

民国成立，热闹了一阵，风波过后，世道却并不曾有什么大的变化。不说别的，单是李公馆，有客人来，大门打开，看门人迎客仍要半跪伸手，向坐在轿子里的客人索取名帖；每个晨晚，不管刮风下雨，儿孙们仍要到上房去向祖父请安，只要祖父咳一声嗽，下人仍要心跳几下，似乎一切都不曾改变，李公馆的老爷、少爷、太太、少奶奶们出门去，一个人坐轿，还得几个人抬他们；尽管也有像尧棠的母亲那样体恤下人，主张不要动辄打骂下人的主子，李公馆里还是有被赶出去当乞丐的佣人；还是有被放在石板上、盖一条破席而病死的老仆；还是有被诬陷为窃贼吊死在门梁上的轿夫。

#### 第四节第二个“先生”

尧棠八、九岁以后，在家里有了较多的自由。从那时起，再也没有大人跟在他的后面看管他了。当初在广元经常带领他们玩的那个小丫头香儿，这时已经生病去世。现在，他每天从学馆龙先生那边放学出来，就可以到各处走走；有时跟年龄相差不远的一些堂表兄弟一起；有时则连尧林也不在一块，他可以独个儿到各处看热闹，有时到门房，到天井；有时到大厅，到花厅；有时到后面的厨房里去聊天，甚至还可以到公馆前面最西边角落的那几间用篱笆隔成的小屋里，去看看在那里吸大烟的轿夫。那几间狭窄的破屋子，原来是养马的马房，后来改为轿夫驻足的地方。屋子很暗，因为没有窗子，全靠篱笆外面透露进一些阳光，把屋子照亮，一到阴天，就更加阴暗，晚上，则常常是在烟灯旁，才能相互见到各人的脸。尧棠正是在这种情景中，经常听轿夫们的谈话。

轿夫在李公馆里，恐怕是属于最低层的下人。他们流动性也比较大，有的是从附近轿行里招进来的，本来就不属于李家雇用的佣仆，晚上大都回自己家去住，有的原是公馆里的马夫，现在主子不骑马了，就随着主子代步改用轿子而变成了轿夫。每顶轿子的轿夫，基本上是固定的，哪一房的轿子，就有那一房的轿夫，很少互相顶替。而每一房的轿子也不只有一顶，因此，李公馆的轿夫，多的时候就有三、四十个。轿夫人多，就更不值钱，看住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他们在公馆里的地位。他们的住房暗无天日，这还不算，就是厨房也与其他人分隔两处。他们的厨房在马房对面，跨过天井，便是他们的灶间兼饭厅，也是又暗又湿。轿夫们白天累得像一群卸了鞍的牛马，精疲力尽；一到晚上，许多人为了提精神，只好躺在烟灯边抽大烟。那时吸大烟成风，有一些原先年轻力壮的轿夫，吸烟成瘾，最后也成为骨瘦如柴的鸦片鬼。他们有的是在李家几十年的老脚夫，有的则是闯江湖多年，社会阅历丰富的流浪者……各色各样的人都有。尧棠对他们非常熟悉，经常听这些人倾诉社会对他们的不平，当然也包括这个大家庭对他们的不公平待遇。这些人也不把尧棠当作外人，从不顾虑他会把话传到老爷、老太爷耳里去。

就在这样环境里，尧棠在母亲之外，又有了他的第二“先生”。这就是轿夫老周，他脸孔黝黑，身体瘦弱，抬起轿子来却还双腿劲健，不输青年同行。他本来是四川平原一个小村庄里的农民，生活困难，在外面流浪，二十多年中，他走过许多地方，干过许多行当，那些最低微、最被人瞧不起的活，他都做过；最后狼狈不堪地回到成都，到李公馆来充当轿夫。每晚他躺在那间马房里，让一些年轻的同行围在他的烟灯旁，听他谈东说西，讲不完的各地风俗、各色人物，以及朝代盛衰，人间沧桑，……

尧棠看这个躺在破床上的轿夫，觉得他与别的轿夫不一样，讲的故事有头有尾，而且很新奇，以后就与他亲近起来。老周常常让尧棠站在他床边，把自己过去的所见所闻讲给尧棠听。尧棠觉得老周讲的故事，不但新鲜动听，还有不少是值得动脑筋细细想想的。

“虽然世道艰难，但我们做人，总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老周在讲了一些往事，又诚恳地说道：“人要真实，不能骗人，也不能亏负人，更不要占人便宜。”他还对尧棠说：“我不光是抬轿子，为人代步，其它事情也一样，只要对人有好处，让人家踏着我的身子走过去，我也愿意。”

这个年老瘦弱的轿夫，他受到社会多少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仍还坚持着

自己的信仰：牺牲自己，成全别人，忠实地生活。他在尧棠的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他在尧棠的童年时代，成为尧棠的一个自觉的又是不自觉的教师。他使尧棠在这个年龄，就感觉到了越富足的人越吝啬，越不宽裕的人越慷慨。

有时老周在灶间烧饭，尧棠就穿过天井来到灶头边观看。有一次，尧棠竟然也坐到灶门前，拿起火钳帮他把柴草不断地向灶洞里塞进去，结果火反而被他弄熄了。

“不能这样！”老周笑着走过来把火钳从尧棠的手里接了过去，然后在灶洞里通了几下，和蔼地对他说：“记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尧棠一边听着，一边向灶洞里瞧，果然发现火又旺盛起来了。



## 第五节 母亲和二姐的死

1913年,即民国二年,尧棠的母亲陈淑芬生了她最小的一个孩子尧椽(开麀)以后,健康情况就逐渐变坏。她嫁到李公馆,前后不过十七、八年,却生了九孩子,平均每两年为李家增添一个人口。这当然非常符合李氏上代祖宗“多子多孙”愿望的。但她自己的青春,却为多子女而作出了牺牲。她性情温和,举止文雅,既追求“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这类带有伤感成份的诗词的美感意境,也很自然地承受了诸如《烈女传》之类封建故事的影响。她的善良,使她体恤下人,关怀他们的冷暖,丫环出嫁,给她们添衣送被;佣仆患病,给他们请医抓药。她对子女慈爱而作出自我牺牲更是不用说的了。她来到李家,几乎有一半的年月是在怀孕期中;而所有的年月都倾注在对子女的抚爱与教育上。

民国三年七月,那是一串使人难忘的闷热不堪的日子。尧棠的母亲病倒已经二十多天,她白白胖胖的圆脸变成又瘦又黄,显得十分憔悴。尧棠并没有意识到抚爱他哺育他的母亲就要离开他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不时的跑到房间里去看母亲,回答母亲的各种问话:“饭吃过了吗?添一碗没有?”“到什么地方去玩了?他们在做什么?”“功课做好了吧?书背熟了吗?”“澡洗了没有?衣服太脏了,该换一件吧!”……他站在床边听着,随时回答母亲的这些提问,仰着头看看母亲的脸色。他觉得母亲瘦了。隔了几天,他又看见母亲还在为着大哥的亲事操心,为大哥订婚时准备聘礼,吩咐大哥到亲戚家去借金镯。又过了二、三天,母亲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了,只能简单地吐出几个“嗯”字。后来,她连摸他的头的力气都没有了,整个身子不能动弹,脸部显露着痛苦的表情,两眼含着泪水望着他。十岁的尧棠还没有意识到,他的母亲将永远不再能温柔地摸着他的头,向他微笑着轻轻地讲话了!他和尧林睡在母亲的隔壁房里,这一夜,他还像往常一样,和尧林一起从母亲房里出来,由袁嫂带他们回到自己房间去睡。尧棠只知道母亲病着,病得不轻,他心里有些黯然。兄弟俩睡在一张床上,悄悄地不多讲话,唯恐惊动母亲,但还是以为明天早上可以去看母亲,向她请安,问她好些没有。母亲是永远在的,他们出生以后就有母亲,母亲是不会抛弃他们的,在他们的小脑袋里从来不曾把母亲和死联系过。

然而,第二天,即七月二十一日早上,当他们从梦中醒来时,就听见一种不寻常的动乱的声音传进来。先是父亲与大哥的唏嘘,后是二姐、三姐的哀哭,接着是几个大汉抬重物的声音。原来安放母亲遗体的棺材都已经被人抬进来了。啊,母亲竟在昨天深夜撒手离开人间了!尧棠跟着三哥尧林急忙起床,含着热泪看到这些景象,一时还来不及完全意识到在他眼前发生的这场巨大的变化。他好像觉得母亲还在他的身边,他还在她的怀抱里。他看见她梳着光滑的头发,穿着淡青色湖绉滚宽边的大袖短袄,慈蔼的圆脸上洋溢着微笑,对着他轻柔地讲话;他又好像看见她正坐在方桌旁,在孩子们的一本本小簿子上,用娟秀的笔迹抄写《白香词谱》,然后用她动人的声音讲解给他们听;他又似乎看见他们在他们睡觉时,轻手轻脚地走过他的房间,到养蚕房里给蚕子添桑叶;他又听到她用忏悔的声音,向他讲她不该打一个贪嘴的奶妈,虽然这是她生平仅有一次的打下人。他听母亲说:“人都是一样的,不能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要爱一切人。”

母亲去世了,但母亲并没有在他的面前消失。他一到母亲房间里,就情

不自禁地喊起“妈妈”来。啊，妈妈是不能失去的，但妈妈到底在他的眼前不见了。大殓的时候，他见到棺材被放在西厢房斜对面的签押房里，母亲静静地躺着，苍白的脸失去了青春和微笑。许多人在她的周围哭喊，还有人正在把准备好的红绫盖上去。这时，屋内一片哭声，谁也不知什么时候，棺材被盖上，并且钉牢了。

尧棠擦了擦泪，抬起眼，只见二姐和三姐还伏在棺盖上大哭着，她们把头撞在棺木上，抗议家里人把母亲隔离在棺材中。她们比尧棠大五、六岁，已经完全知道失去母亲将是怎么一回事了。一到晚上，尧棠还听见两个姐姐在灵堂里哀哭，他不禁也在房间里抱着三哥尧林的头哭了起来。他非常同情两个姐姐，他知道她们的生活是和母亲的生活紧紧联在一起的，她们同样也不能离开母亲，母亲的死，对她们是个多么大的打击。特别是二姐，在大姐死后，她是母亲的长女，母亲对她，有比对儿子和其他几个女儿更殷切的要求，这就是希望她能更像母亲那样做人，做一个既懂诗书又谙家务，必要时还能勇于牺牲的人。她从小跟着母亲读诗背词，还能做针线活，又最能体贴母亲在大家庭中做长房媳妇的苦处。她似乎很早就成熟，在广元县，当杨嫂患病，不能再带领尧棠和尧林时，她就接替了杨嫂，把自己的床搬到他们的房间里，伴着他们睡，代替杨嫂给他们讲故事。她和三姐差一岁，回成都后，她们两个人睡在一起，房间里有一本《烈女传》，那是爷爷指令她们读的，也是学馆里给她们读的课本。从这本书里，她们学到了许多封建的“妇道”，作为妇女，她们要忍受一切，顺从一切。那本书里有许多可怕的人物，尧棠听姐姐们说过，那是她们的榜样。有个寡妇因为陌生的男子拉了她的手，她便把自己的手砍掉；有个王妃，宫里起火，甘愿烧死，也不出来，因为怕失体面；有个女子，明知父亲在河里淹死，她自己不会游泳，仍投水去找他父亲尸体。两个姐姐性情温和，很像母亲；但熟读了这样的书后，显得与她们的年龄不大相符的沉默寡言，有时甚至十分忧郁。特别是二姐，她的身体，本来在广元就已经十分单薄，一回到成都，到了秋凉季节，就不断咳嗽，有时还发现潮热，人逐渐消瘦，中医一直治不好。有一次高热不退，几天下来，神志都昏迷了，多亏母亲请了四圣祠医院的英国女医师来，给打了针，服了药片，才把她救了过来。医师说，二姐患的是肺结核，中国人叫它作“女儿痨”，这要很好的调养，还应注意心境愉快。祖父和父亲却不相信西医，他们很怕洋鬼子，但又轻看洋鬼子，认为对外国人还是敬而远之的好。母亲却悄悄地与那几个英国女教士结交，经常来往，还带着尧棠到医院玩，使尧棠有机会第一次认识外国朋友，对她们送给母亲的《新旧约全书》中文译本很感兴趣，虽然他当时并未读它，只觉得这本书的皮面精装，与中国的线装书完全是两种不同装帧，因此印象根深。

二姐服了西药，病有些好转，不幸的是母亲的死给了她一个很大刺激，悲伤加重了她的病情，她的身体更加消瘦了，有时连饭也吃不下，咳嗽却不停。一个月的丧事过去，她已经不得不经常躺在床上。可是母亲已经去世，再也没有人去请四圣祠医院的西医来为二姐诊病。父亲只相信中医，而中医那时对肺结核的治疗是没有办法的。二姐十六岁的生命，像一盏少油的灯，渐渐地黝黯，就要熄灭了。

虽然封建大家庭的变化十分无情，但一切仍要按照它的旧规矩、旧礼制办事。这个家庭以太爷为主子，当然什么都得听他的，一切活动都得围着他转动。母亲在七月里去世，全家悲痛之情未已，而当年十一月里祖父的生

日却又来到，为了应付这一桩大事，公馆里上上下下忙了近一个月，照样请了戏班子进来，热热闹闹地演出了三天大戏。戏台搭在大厅上，正是在停柩的签押房隔壁。天井里摆了几十桌酒，主人殷勤招待，客人又吃又看，热闹而快活；只有二姐一个人躺在厢房里，没人照料她。尧棠悄悄地跑去，只见她咳嗽，喘气，一句话也说不出。好不容易天暗了，掌上了灯，客人散去了些，而戏还在演出，父亲发觉二姐孤单得可怜，便叫人把她扶了出来，让她坐在一把藤椅上。二姐失神的眼光停在戏台上，也不知道她看到了些什么。尧棠却见到她的脸色苍白，人瘦得只剩了一张皮和一副骨头，眼球凹了进去，再也不像几年前在广元拉着他的手从母亲房间出来陪伴他睡觉的二姐了。过了半晌，二姐轻轻一声喊：“我要进去。”就颤颤巍巍地让女佣把她扶了进去。从此，人家再也不曾看见她出来过，因为两天后她那年轻的生命就结束了。她像玉兰花一样洁白的青春，一点不留痕迹地在这个大公馆里消失了。她死的时候天还不曾亮，尧棠正睡着，做梦正走到一个陵园里，在花丛中发现一个新墓，墓边的树枝上有唱着歌的小鸟，还有彩蝶在墓前飞舞。他正想朝着墓碑走去，看那碑文上写些什么，忽然听见一阵哭声，醒来才发觉那是三姐的哭声，原来二姐就在这个时候去世了！三姐哭得很悲伤，她俩一直睡在一个房里，一起读书，一起做针线，一起玩。现在二姐死了，她以后的命运将是怎样呢？生活在这个封建大家庭里，她也很可能成为悲剧中的角色吧，茫茫的未来在等待着她……

## 第六节父亲与大哥

二姐死时离母亲去世不过四个月。李公馆长房一下子失去了主持日常家务的主妇，现在又失去原主妇的好帮手大女儿，家中顿时乱成一片，虽有袁嫂、罗嫂等老佣人和翠凤等青年女婢按着旧规办事，但三军失去统帅，人再多也无济于事。何况新年即到，家里还要忙着过节。李道河是整个大家庭的“总理”，外面来找他的人多，自己房里的内务他倒反而管不了。这时候，尧棠的大哥尧枚忙于中学毕业考试，正雄心勃勃，梦想着毕业后去考大学读化工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外间就有许多人来向祖父提亲，要为尧棠的父亲找继室。最后由祖父作主，选了个姓邓的江西籍姑娘，做了尧棠他们的继母。继母邓景蘧进门后，待孩子们不错，一切都照原来公馆里的规矩行事，连过年做糕，中秋节吃月饼，也都按往年的惯例，向设在暑袜街上的协盛隆点心铺订货。协盛隆是成都出名的糕饼店，全城有数的几家大公馆，没有一家不和他们打交道的。单是正通顺街李家，每年中秋节就要预订几百斤月饼。继母照往年的办法，所有的下人都分给一、二斤，没有一个漏掉的。当然，孩子们更不必说了，并不曾因母亲的去世而无人关心他们的饥渴冷暖。虽然如此，尧棠总感到继母代替不了母亲，他到继母房间，总要想着母亲，起初还情不自禁地对着母亲的照相喊出声来。父亲看他过得寂寞，就经常带着他去看川戏和京戏，因此他开始有了接触旧戏、了解戏中情节和人物的机会。不久，父亲作了戏园的股东，经常有戏票送上门来，尧棠看戏的机会更多了。他经常和三哥尧林在晚上由老仆姜福带着，一起去看戏。他当时最感兴趣的是武打戏，看完戏回家，第二天就学着武松、林冲这些戏里的人物耍枪、使棒、翻筋斗。叔叔们却对旦角有兴趣，他们有时请了旦角来家里清唱，还让他们化装成古代女将或旗装贵妇拍照。三叔还把这样的照片挂在自己房间里，为他们写诗，那些诗其实写得并不好，甚至很肉麻。五叔后来干脆把这些旦角当作玩的对象，发生一些不光彩的事情，一天天堕落下去。其实，当时有些旦角的身世很苦，他们身为男人，而却被人当作妇女来玩，心里是很痛苦的。

尧棠对这些现象，非常厌恶，因此他对应酬中所奉行的各种礼节的虚伪性，也开始有了认识。他经常在门房、厨房或马房里躲避参与家中的各种礼仪活动，宁可蹲在灶头边或坐在轿夫的破床上，听下人聊天。有个除夕晚上，全家人在堂屋祭祖谢神，偏偏找不到尧棠，祖父、父亲和叔叔吩咐仆人在公馆里的各个角落喊他出来团拜，他却躲在黝暗潮湿的马房里，悄不出声，听老周讲外面社会的各种新闻和旧事。他觉得听轿夫讲的故事，比混在穿得衣冠楚楚的大人们中间，向鬼神叩头作揖要有意思得多。尽管外面不时响起爆竹声，但这对他说来，已引不起多大兴趣。母亲和二姐死后，他在家里已逐渐被一些人认为是个不大可以理解的人，或者说，他自己也对周围环境产生一种孤独感了。说实在，那时他的活动还是多方面的，虽然他自己平时不多说话，对陌生人更显得有些腼腆，但已经不满足于家庭里刻板的生活。起初是他和三哥以及二叔家的二哥对刚刚兴起的话剧——当时叫新剧、也就是文明戏感到兴趣。二哥、三哥发起组织了一个演新剧的剧团，虽然没有谁写剧本，但他们边排边编，各人出主意，凑成一台戏。舞台就在公馆后面的一个竹林中。六叔、三哥、二哥和一个名叫濮季云的香表哥，他们算是主要演员。尧棠对这些活动并不乐于参加，但他还是和二叔家的另一个儿子五弟作了配

角。他们把戏排好后，就拉三姐和几个堂表姐来作观众，看他们演出。父亲对别的事情兴趣不大，唯有戏剧他称得起是个“迷”，在这个时期，他差不多把整个精力都放在一个叫可园的戏园的事务上，凡是邀请戏班子，安排演员生活以及决定演出的剧目，差不多都要他出主意。奇怪的是家中孩子们演戏，他也有兴趣，不但挤在观众席上看得津津有味，还向他们提修改情节、台词的建议。后来，父亲还为大家编了一出《知事现形记》剧本，让二哥和三哥照他的本子念台词，在家庭里作公开演出。大概这个剧本很反映了当时的官场实情，他看着演出，禁不住哈哈大笑，笑得眼泪都流了下来。看来，这也反映了尧棠父亲在官场的失意，和在民国成立后，对四川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的失望心情。

父亲娶了继母后，第二年就生了尧棠的第三个妹妹，并为年仅十九岁的大哥尧枚办了婚事。大哥原是公馆里的长房长孙，兼以眉清目秀，聪明颖慧，很得祖父的欢心。父亲与母亲把继承祖业、荣宗耀祖的希望，全寄托在他身上。他还在学馆读书时，功课就非常好，并且还从三叔在南充任上带回的两个镖客身上学过武艺。每天清晨，天不曾亮，他就从西厢房出来，到大厅练拳使刀。有时则在厢房门口的天井里，撒拉撒拉地舞动双剑，动作利索，把尧林、尧棠兄弟俩看得眼花缭乱。住在上房的爷爷本来对下代的任何活动都摇头，唯独对大哥练拳、舞剑、使刀非常欣赏。他在这一点上，与尧枚的父亲有同样的期待，这就是他们都希望大哥能成为能文能武的全才。现在大哥已从成都中学毕业，成绩名列全校第一。他带回一张毕业文凭，全家见了都高兴。往常与他一起玩的堂表姐们更像庆祝节日一样，围在他房间里的一张方桌旁，说东道西。大哥告诉他们说自己准备去北京或上海考大学，去读自己所向往的化工系。尧林、尧棠还知道他更大的一个秘密，这就是大哥有一次曾悄悄告诉过他们，他希望以后能征得家中同意，到德国去留学。因为他听说德国的科学和工业在全世界最发达。他们哪里知道，父亲早已为大哥作了另外的安排。父亲想尧枚是李家第一个中学毕业生，他是得到祖父的特准，才有机会进新式学堂读书的，能中学毕业已经不错了，至于到上海或北京考大学，父亲从来不曾想到过，祖父更加不用谈了。父亲想的是必须根据尧枚的母亲临终时讲过的，早些为尧枚完婚，祖父更希望早抱重孙。母亲原来有意为尧枚娶一亲戚家的女儿，这个姑娘从小在李家走动，和尧枚很亲近，两人之间逐渐产生了一种情在不言中的感情。这是二十年代以前，少男少女之间相爱的一种带有时代特色的典型心态。在那个时期，授受不亲的男女绝缘局面已经过去了，而“五四”以后才出现的男女自由恋爱的新名词还不曾来到人间。这样男女双方只好既会面又不敢互剖心腹，感情的表白不用话来传递，只以心来交流，爱情在若即若离之中，像诗一样朦胧，在心中飘荡。尧枚的弟妹们也都希望大哥能娶这个表姐，因为她和大家相处得也很好，尧棠更觉得她十分和蔼可亲，像他的一个大姐姐。可是不知为什么，这门亲事竟没有成功。李道河在尧棠的母亲去世后，面对着如潮而来的三媒六婆，首先解决了他自己的继室问题；然后又在人们提供关于尧枚婚姻的对象中，征得祖父的同意，选出了张、毛两家，认为那才是门当户对、真正的宜室宜家。但是究竟毛姓呢，还是张姓？他觉得还是让祖宗来作主。他在祖宗的神主牌位前，点起香烛，叩头求拜，请祖宗显个灵，让他拈个吉祥的纸团。终于在写着张、毛姓氏的两个纸团中，拈了个“张”字。这样，那个张家姑娘就娶进门来。果然，祖宗积德，姑娘出身遥远的云南名门，既属官宦人家后代，

知书识礼，还能绘画，温柔美貌更不必说了。大哥原立下心愿，将来要与青梅竹马、同窗友好的表妹结婚，那里知道悠悠的心事终成虚话，满腔委屈，暗暗断肠。但他在祖父、父亲的教导下，聆惯古训，从来没有想到要违背父亲的意志，所以根本没有反抗，也不想反抗。结婚那天，他成为全家的中心，又像被人作为木偶，任人摆布，行了大礼，进入洞房，会见了他那温驯的夫人，也就认为他有了美满幸福的生活。他的新房设在原作为签押房的左厢房。父亲为了他的结婚，特地把左厢房改装为三个房间，其中两间房门通向里院的过道上，给他做新房；另外一间离拐门很近，房门开向天井的，给尧棠和尧林住。兄弟俩住在大哥隔壁，天天看到大哥与新嫂嫂读书绘画，充满欢乐，好像大哥把原来到上海、北京读大学的打算，完全忘掉了。过了二三个月，父亲忽然找尧枚谈话，说现在他成了家，开支大了，父亲一个人负担不起，要他在家挑起一部分担子，因此准备为他找个职位，可以由此自立，至少可以解决他自己每个月的零用钱。父亲的话出自肺腑，声音温和而缓慢，确实，父亲也有苦衷。整个大家庭是他当的家，他要考虑其他几房对他的意见。他不能让尧枚过闲日子。尧枚知道父亲的困难，他也知道父亲的话无法违背，他在父亲面前唯唯诺诺，一边听，一边答应着，回到自己的房里，却伏在床上痛哭了一场。过了几天，他就跟着父亲到商业场股份有限公司当职员，每月拿二十四块银元的薪水。这样，大哥上大学读他感兴趣的化工系的这个梦就此幻灭了。

这些日子，正碰上当时民众为反袁称帝而掀起的护国运动，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在一片讨袁声中死去。护国运动胜利绪束了，但在护国运动中入川的滇、黔军却占据了四川大片土地和成渝等许多重要城镇，与四川军民引起了矛盾。就在尧枚进商业场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后的第二年，即1917年4月，川军与滇军、黔军在成都先后发生了两次巷战。这些军阀争权夺利打仗，他们的胜败本来与老百姓无关，但在混战中，人民遭殃。就在第一次巷战中，川军与滇军对垒，成都街头到处都是战壕，枪声连日连夜不断，子弹还从李公馆的墙头穿过。大兵三年，疫病流行，可怕的白喉也传入了李公馆，经常和尧棠一起游玩的二哥和五弟感染上了。他们都是二叔家的孩子，曾和尧林、尧棠一起组织过新剧团，一起演过戏，现在患了喉症。这个病一经发觉，就立刻呈现出严重状态，起初是剧烈喉痛，接着一天天加重，最后便出现昏厥现象，气息奄奄。但是这时城内战火迷漫，路上不能行走，请不到医生，二叔只能看着两个孩子僵卧在床上。后来实在不行了，就叫两个轿夫冒着生命危险，各背着一个孩子，垮过战壕，送进医院去，但已经迟了！二哥与五弟都死在医院里。

接着，尧棠和三哥尧林也患了喉症，同时，九妹、十妹和父亲也病倒。幸而这时巷战停止，请了医生来诊治，才把尧棠兄弟两人治好，而只有七岁的十妹却死了。父亲的病情也加剧，他躺在床上，形容枯槁，一听说尧棠的病好了，便叫人把他喊进自己的房里，要他跪在床边的踏凳上，抚摩着他的头，露出笑容，好像母亲患病时那样。父亲问他：“你好了吧？以后自己要当心。”半晌，他的眼里出现泪光，轻轻地说：“你要乖乖的，不要尽喊着罗嫂，她忙着呢……你以后自己要注意冷暖……常常来看我……”后来他又把大哥尧枚叫到床边，对他说：“你妈妈临终时，把你们弟兄姐妹交给我，现在十妹却死了，我怎对得起你母亲？我自己的病恐怕也不会好了，现在我把继母和弟妹交给你，你要好好看顾他们。”他又把这些话写成遗嘱，交给

尧枚。第三天，父亲就去世了。父亲死的时候，尧棠和大哥、三哥、三姐都守在床边，继母和嫂嫂也在一旁。他们看着父亲喘着气，一口一口的，渐渐地停止了呼吸。从此，再也没有人带尧棠在街上散步了！再也没有人兴致勃勃地看他们演戏了！这天晚上，三个兄弟坐在黯淡的清油灯光下，禁不住抱头大哭。大哥说：“三弟、四弟，如今我们没有父亲了！”

是的，没有了父亲，家庭将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啊！这时尧棠已经十三岁，他比在母亲去世时更懂得人世百态了！

## 第七节从动乱到破灭

父亲去世的时候，尧棠的继母正怀着几个月的身孕，不久就产下尧棠的第二个弟弟尧集，即现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的李济生，他是李道河的遗腹子，在整个大家庭中被称为“十七弟”。

李公馆在仅仅几年之内，就死了七、八个人，老太爷李镛出于思念亲子之情，听说长房弄来个从日本输入的“卜南失”，和中国的“扶乩”差不多，能请到死者的亡灵归来，与生者进行笔谈，他就让黄姨太扶着，颤巍巍地来到长房房间，看尧枚他们表现“卜南失”。果然尧枚把他父亲的灵魂请来了，回话的口气，与父亲生前差不多。祖父也想与父亲对话，但他一开口，就落下泪来，结果一句话也讲不出。那“卜南失”是个用心形木板制成的玩意儿，它的尖端有个小孔，插了一支铅笔，两只脚装着小轮，人闭起双眼，用双手按着它，它就会移动起来，在纸上写出答语。实际上，这是利用人的下意识作用，属于心理学的一种玩具。玩具当然只是玩具，但由此可以看到祖父对他长子的去世，无疑是十分悲痛的。

祖父李镛更加衰老了。儿子去世使他哀伤，当然是个原因；但在此之前，五叔的堕落对他也是个严重的打击。五叔生得清秀，人也聪明，是第二个祖母濮夫人的独生子，濮夫人很早就去世，因而祖父对五叔特别宠爱，如果有谁责备五叔，谁就要受到他的责备。五叔机警伶俐，能说会道，在外面吃喝嫖赌，无所不作，而祖父长期受骗，一点也不知道。他十分相信五叔，因而没有人敢向他通风报讯。有一次，尧棠在家中的大厅上拾到一份手稿，翻开一看，却是一篇写得十分艳丽的文章，说什么“×年×月×日忤影龠与芳纹定情于××……”，写得十分肉麻。原来这正是五叔的大作。他用哄、吓、骗、偷的办法，把五婶的私房钱花尽之后，又以祖父的名义在外面借了大量的私债，偷偷娶了个绰号叫“礼拜六”的暗娼，在外面建立了个小公馆，还写下这么一篇“定情文”。文章中的“忤影龠”就是五叔，“芳纹”则是五叔替“礼拜六”起的雅号。尧棠对这份东西，一点不感兴趣，也不觉得奇怪，他把它看了一遍，就扔掉了。尽管这些长辈在他面前道貌岸然，他早把大家庭中某些长辈的真面目看清了。这一年七月，成都发生第二次巷战，这次是川军与黔军相斗，打得比四月间那一次还厉害，城年房屋几乎被烧毁了一半，连李公馆对门一家的年轻听差，也在太平缸旁边中了流弹，当场死去。尧棠听到这个消息，走出门外去看，发现尸体已被人抬走，地上还留下一摊鲜血。这时候，五叔还喊轿夫为他备轿，外面纵然枪林弹雨，他仍要去办他的“大事”。第二天，由于五婶的喧闹，“礼拜六”的秘密终于让祖父知道了，祖父这才如梦初醒，他所信任宠爱、日夜寄托希望，巴望他“光宗耀祖”的儿子，竟是这么一个给他败坏家风的浪荡子！当然他并不认为五叔的堕落，应由他负主要责任；却一味追根寻底，要找引诱他儿子变坏的外面闲人。他气得胡须抖翘，对这个“畜生”大发雷霆，责备不算，还动手打。结果，五叔又以他的特殊本领，制服了祖父：他痛哭流涕，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然后对天发誓，决不再受外面坏人的引诱，今后一定在家埋头窗下，攻读圣贤之书。祖父无可奈何，只得吩咐别的几个儿子看牢他，不让他外出。那知事情过去才几天，他就又溜出去了。

祖父为五叔所受的刺激是很大的。他没有想到自己辛苦几十年，好不容易为李家创造这个基业，却出现了这么一个败坏家声的逆子。他由此想起许



多往事，好像看到死了多年的濮夫人又来到他身边，他觉得对不起她，是他把她的独生子宠坏了。他又想起他的大儿子——尧棠的父亲，觉得他死得太早了，以致这个家现在没有适当的人可以依靠。他觉得他日夜所想望的光耀门楣的理想在逐渐破灭。他由忿怒而转为悲哀，又由悲哀变为消沉，由消沉而不免心灰意懒。只是对尧棠忽然变得温和起来。他发现这个孩子勤奋好学，但身体不好，他就自己拿出钱来，给他包月订牛奶。因为他听说牛奶这东西滋补身体。尧棠在少年时代，人很消瘦，确实不太健壮。他那时经常感冒，而且患着鼻炎。起因是那年正月初九，因放花炮伤了脚，有几个月没能穿上鞋袜，因而引起感冒，有时还发烧，喘咳不断。父亲在世，他本来有可能在三哥尧林进中学的后一年，也到中学读书。现在父亲死了，他只好继续留在家里，祖父虽然对他改变了态度，却不主张送孩子上新式学校，后来听说学习英语可以进邮局做事，而邮局待遇优厚，职位稳定，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可以不因政权变迁而受到影响，他才允许尧棠进成都青年会主办的英语补习学校去读书。不料进校才一个月，尧棠又病了，祖父又吩咐他辍学在家养病，请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念书的香表哥为他补课，祖父还亲自付月薪给香表哥，因为香表哥家境并不富裕。

香表哥是尧棠姑母的儿子，他叫濮季云，从小死了父亲，常来李公馆走动，他本来早就在为尧棠补习英语，但当初并不给他报酬，完全是尧棠主动要求，而他出于自愿，因为他两个都对英语感兴趣。香表哥为人真挚，勤奋好学，还乐于助人。他为了帮助尧棠补习功课，有时天色晚了，就留下和尧棠、尧林睡在一个床铺里，床小人挤，三个人就横躺在一张床上。尧林与香表哥同龄，又是同学，两人有时为了一个课题的看法不同而争执，尧棠则自始至终尊敬香表哥，认为他学识广，除了英语，还让他给自己讲习各科知识。应该说，香表哥在李公馆里，是第一个给尧棠带来外国文学知识的人，也是除了大哥之外，对尧棠早期的智力开发大有帮助的人。他与尧棠一起读英文本《大卫·考贝菲尔》（狄更斯作）与《金银岛》（史蒂文森作），使从小接触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尧棠，有机会在另一个知识领域里开拓了眼界。并由此启发他以后写小说运用第一人称的创作方法。

尧棠在接触英语以前，已有很好的中国文学的基础。他在广元时期还很幼小，母亲就教他背《白香词谱》。他们家族中除了小孩，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熟读《红楼梦》。他父亲、母亲和大哥都各有一部版本不同的《红楼梦》，作为枕边的日常读物。他经常听他们谈《红楼梦》里的人物和事件。到了他自己能看书时，最早接触到的是《说岳全传》，那里面的故事情节和一些很有性格的人物，如岳母、岳飞、牛皋等都使他废寝忘食；其后他又连续读了《水浒传》《施公案》《彭公案》等书，它们也都吸引过他。当然，他读这些书的同时，还得每天背诵《古文观止》，因为这是私塾老师规定的功课。由于他背熟了《古文观止》中的两百多篇文章，使他以后从事文学写作有了很好的文学基础。所以他曾说这部《古文观止》是他“真正的启蒙先生。”这些古文，当时他有一部分背得出，却立不理解；有一部分他不但懂，而且很喜欢，像《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赤壁赋》、《报刘一丈书》等。他还向他的二叔学过《春秋左传》，二叔说蒲松龄有《左传》笔法，所以他爱读《聊斋志异》，这些对尧棠也有帮助。

二叔在尧棠父亲死后，也开始关心过尧棠。但二叔思想保守，近于顽固，他最讲仁义，却对钱很有兴趣，不但在家里开了个律师事务所，整天为利奔

走，且忍心把自己的大女儿即尧棠的四姐，嫁给一个财主，此人胸无点墨，只因为他家是成都南门的首富。三叔的情况比五叔好一些，他能诗能文，通晓日语，又擅长书法，还懂得法律，在二叔的律师事务所做帮办，为人写诉状，倚马可待，看来很有些才气。起初，他与尧棠兄弟相处得也很不错。每到冬天，尧棠常和尧林以及香表哥到三叔房里，围着火炉喝茶谈天，有时还看他写字吟诗。更多的时候，尧棠到三叔的事务所找一个姓郑的书记下棋，有时也和三叔对弈。有一次，三叔想出门去找不到轿夫，正在发急，却见尧棠找郑书记下棋，而郑已回家便写了一首诗对尧棠随口吟诵：“跃马人何在，争车愿又乖，电灯光如雪，唯有四公来。”当时尧棠在家中被人称作“四公爷”。所以三叔有时也很风趣，而且出口成章，头脑相当灵敏。但他抽大烟，偶尔也背着三婶干风流韵事，与五叔一样。使人惊异的是，三叔这样的人，对待他自己的孩子，却特别看重父亲的尊严，他生过三个男孩只活下两个。尧棠经常看见三叔用鞭子抽打比他小两岁的那个堂弟，致使这个堂弟看见父亲就吓得话都讲不清了。

祖父见到他所建立的大家庭、日夜追求的“五世同堂”“长宜子孙”的幻梦已经破灭，精神处于恍惚状态，而五叔又狂赌滥嫖，经常通宵不归，更刺激祖父走向疯狂。有一天，他坐在上花厅里精神病发作，把尧棠叫到身边，递给他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在花厅冷得很，可催邵、方二公来救命”，还问尧棠“救命”的“救”字怎样写法。过了一回，他又坐到轿子里面去，叫人抬着他在天井里兜圈子。尧棠看着这样的情景，联想起叔叔他们这时正在外面寻欢作乐，觉得祖父很可怜，禁不住产生这样一个看法：人应当靠自己劳动来养活自己。祖父让子孙过寄生生活，害了子孙，也害了他自己，这是十分愚蠢的事情……这一年的大除夕，祖父终于死了，他在临死前的一个月中间，还经常把尧棠叫到他的床边，他那衰老黑瘦的脸上，露出含着眼泪的微笑。尧棠回想起祖父在他父亲死后，一直代替父亲照顾着他，其中有对他父亲的追念，也有对他自己的慈爱，他禁不住掉下眼泪。但他想到祖父做了多年的官，广置田产，修建房屋，费尽心血，造就这样一个大家庭，结果儿子们贪吃懒做，兄弟阋墙，更年轻一代有不少人死得惨，嫁得冤，作了无谓的牺牲，而祖父自己却得到孤独疯狂的结果，这又是为什么呢？大年岁暮，家家户户燃放爆竹，李公馆里却是一片哭声，在这些哭声里，有各种不同的复杂的感情。仅仅一个星期以后，就在祖父去世的房间里，叔叔们一场更激烈的争夺祖父遗产的喧闹开始了，还在放着祖父牌位的灵堂前，大吵大闹。作为新的封建卫道者的二叔，代替了祖父来主宰，当然，他企图在“五四”运动已经发生的现代中国，在成都少城公园已经召开过万人大会，热烈响应“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号召的成都城内，继续保持一个封建独立王国，已经属于痴心妄想。祖父死后，做了“承重孙”的大哥，在大家庭中成为众矢之的，他到处打躬作揖、叩头求拜的好人主义，并没有得到叔叔婶婶们的谅解，反而招致更大的损害；但尧林、尧棠并没有屈服，他们从新的书刊中开始接触了新思想，逐渐意识到发生在这个家庭里的一切，根源不在某个人身上，而是在整个不合理的制度上。他们不得不起来反抗，要求改革，并对公馆里的一些不公正不道德的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严肃的批评，这就很自然地冒犯了那些想维持旧秩序旧规范的叔叔婶婶们，与他们发生了矛盾。这些叔叔婶婶想以他们的长辈身份来压制这两位死去了父母的侄儿，而尧林、尧棠又不承认他们的权威，毫不妥协地与他们进行争论。叔叔婶婶们

心有不甘，便在大哥尧枚身上施加压力。大哥自己忍耐，却无法说服他的两个弟弟，有时反而受到他们的责备，认为他的作揖主义只能助长这些封建霸主的气焰。不巧，正在这个时候，嫂嫂怀孕，临盆在即，三叔和五叔以及婶婶们以为有机可乘，就串通黄姨太提出，不能让嫂嫂在家里生产，理由是祖父去世不久，正在服孝期间，在家里生孩子，就会冲了祖父在天之灵。作为一家之主的二叔，竟然同意他们这样的邪说，逼迫尧枚送妻子到城外一个偏僻的村落里去生产，说离开家里越远越好。大哥含着眼泪拒绝尧棠、尧林进行反抗的建议，他知道他的两个弟弟对他的同情，是出于真正的手足之情，但是他对那些叔叔婶婶长期因循、敷衍、妥协惯了，无法自拔，最后还是牺牲自己，在城外乡下租了一间房子，把自己临产的夫人安顿在那里，让孩子生了下来。

面临着这样的现实挑战，尧棠感到愤怒，他对大家庭满怀仇恨，他想离开这个家，一刻也不要在这里逗留。在祖父去世后半年，他与三哥一起考进了香表哥念书的那个学校——外国语专门学校。三哥有初中毕业文凭，是正式生；而他因为没有文凭，只能称作旁听生。但是，老师却非常欢喜他，因为他的功课完成得很好。

这时成都出版的《川报》上，连续刊登北京“五四”运动通讯和上海“六三”运动的消息，报纸发到各学校流传，也在市内各处销售。反帝反封建的新学潮，已经涌入川西盆地。大哥工作的地方附近有一家发售新书报的华阳书报流通处，是在总府街上，与商业场在同一条马路上。大哥每天回家，总带些新书报来翻阅，这给尧棠以大开眼界的机会，他立刻给吸引住

了，特别是《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刊物，使他有在迷雾中看前景豁然开朗的感觉。起初他与大哥、三哥经常在晚上坐在家里的圆桌边，一边看书一边谈论，尧棠发现大哥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与他和三哥都是一致的；即使有差异，也相差不远。他发现大哥年轻了，兄弟之间的距离更加接近。但是大哥一接触到实际，特别是在大家庭中处理人事，就又回到他那不抵抗主义的泥淖里去。他几乎成了两重性格的人。尧棠深知大哥内心的痛苦，知道他并没有真正忘记他少年时代对理想、前途和爱情的追求，只是被残酷的现实压抑着，而又没有决心反抗。尧棠同情大哥，怜悯大哥，而又不得不经常与他发生矛盾。有一次，一个婶婶自己把儿子打肿了脸，却诬陷是尧棠打了他，向大哥提出抗议。大哥要尧棠向她们道歉，尧棠把事实揭露了，大哥要他去向二叔申诉，而尧棠却不相信二叔真能评理，拒绝前往。这样，大哥又只得自己去向二叔认错赔礼，竟受了二叔训斥。大哥回到自己家，向尧棠讲了两个钟头的话，自己掉下眼泪，也使尧棠掉下了泪，但他的不抵抗主义仍没有得到尧棠的同情，相反，这更使尧棠觉察到大哥所走的道路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是一条绝路；而他决不能像大哥那样，他一定要做他自己的主人！他将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来与这些邪恶势力作斗争。他清楚地记得他的二姐熟读《烈女传》，结果忧郁地死去；他的一个堂妹没有读书的自由，却被父母逼迫着缠了脚，她那悲惨的哭声，还在他的耳边响着。而他的嫂嫂因为怀孕，被毫无理由地赶到城外荒野去生产。他不能忍受遍布在这个公馆里的各种封建道理，他要反抗。他终于站了起来，对流着泪的大哥说：

“让他们也来做一次牺牲品吧！”

## 第八节 生活道路上的微光

尧棠的性格变得忧郁起来，他经常落在沉思之中。这样的性格，显然不是先天所有，因他父母都是开朗乐观的人。但父母的死，确实影响了尧棠，他感到失去了爱。尤其在祖父去世后，看到了家庭中的倾轧与争吵，在封建礼教背后的虚伪与欺诈，更使他觉得孤独。他逐渐意识到这个家对他来说，并不是爱的天堂，而是一只囚禁小鸟的牢笼。祖父死了，他既悲哀，又感到解放，因为再也没有人管住他了，虽有二叔接替祖父企图继续统治这个封建大家庭，但没有人真正甘心屈服于他的权威。就在尧棠考进外国语专门学校不久，他从华阳书报流通处一位姓陈的朋友那里得到一本克鲁泡特金在瑞士亡命时写的《告少年》的节译本。那书的后面印有“天下第一乐事，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字样，他专心致志地看起这本书来，很快被这本文字简洁、语言生动、感情激越的小册子吸引住了！他的心顿时明亮起来，觉得自己一直想说而又不知道应该怎样说的话，全让这个作者说尽了！他在几个晚上反复地读着，又流泪，又微笑，竟不相信天下竟有这样一本好书。

《告少年》虽然不是克鲁泡特金系统地阐述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著作，但它确实灌输了克鲁泡特金关于“到民间去”的一贯思想。克鲁泡特金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受当时风靡一时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影响，曾放弃了他的亲王身份在宫廷中的锦绣前程，而到西伯利亚服役，经历了五年艰苦生活，体会到改造社会的途径只有革命，因此在同他哥哥通信时，曾发出“人民一旦起来，哪怕是只用镰刀做武器，他们也会能有作为”的壮语。在《告少年》这本书中，他对医生、科学家、律师、工程师、教员、艺术家的职责作了分析，他认为这些专家如果要把工作做得出色，对人民有所贡献，唯有“亲自到民间去”，积极参与改变私有制的社会革命。他说：“社会革命会把一切奴隶制度完全破坏，会把一切镣铐打断，会把一切旧传统完全打破，给人类全体开辟新天地，到后来就会使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博爱实现在全人类社会里。那时候，人人都有工做，人人都能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人人都能尽量发展他们的能力；大家终于能够过着合理的、人道的、幸福的生活了！”

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在俄国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解放运动中，在摧毁旧制度旧秩序过程上，是起过推进作用的；但他把农民革命看成是一场社会革命，并认为在消灭现存制度的同时，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而且认为这样的社会将是无政府状态，那是非常不切实际的，完全是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当然，在《告少年》的节译本中，并不曾阐述这些方面的理论。而它煽动性的语言，号召青年到民间去，联合“一切受苦受罪受人侮辱的人”“像大海大洋一般”去冲破那些阻碍历史前进的旧制度，要叫“一切暴君都会跪倒在我们的脚下”，却使十六岁的尧棠兴奋得几乎不想睡觉。他好像从母亲身上所受到的教育：“爱一切人，不管贫和富；要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从轿夫老周身边听到的话：“人要忠心，要真实”，从《说岳全传》、《水浒》等小说以及《古文观止》里类似《报刘一文书》等文章中所感受到的那种嫉恶如仇、爱憎分明的正义感，一下子都被唤醒了。他觉得《告少年》这本小册子与他过去从母亲他们那里所感受到的那些思想是这样相近，而《告少年》所描绘的未来，却是以前所不曾听到过，或读到过的。他把这本小书放在枕边，认为自己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

他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罪恶都会马上消灭”。他下定决心要为这种伟大的事业献身，但不知应该怎样走上第一步，于是产生了想结识一下与这本书有关的作者或译者，但是书上署名只有“真民”两个字，不知和他怎样联系，而出版单位又没有通讯地址。有人告诉他，这本书是《新青年》杂志社翻印的，而《新青年》这时刚开始成为他日常阅读的读物，他联想到这个杂志曾热烈支持过“五四”运动，还读过这家杂志主办人陈独秀写的文章，禁不住拿起笔来，把自己读《新青年》这本刊物后的激动心情向他表白出来，要求他能指引方向，走上奋斗的道路。这是尧棠出生以来写的第一封信，用的是刚时兴的白话文，当然还脱离不了有些古文字句的影响，因为他在学馆一直用文言作文的。但在信中，从他那谦卑的孩子口气，完全可以看出他是这样幼稚，这样热情，又怎样天真无邪。信寄出后，他天天盼望着从北京来的回信，但是这位一年以后就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可能因为工作忙，或者由于给他写信的人多，竟没有给尧棠答复。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一个历史的遗憾；也许有人会想，如果陈独秀写了回信，给了尧棠鼓励，尧棠也可能以后会走上另外一条道路，这样将更有利于尧棠的思想发展。这样的想法也许是正确的。一个人活着，机缘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更要紧的恐怕还是本人不间断的努力。对尧棠来说，事实证明：陈独秀有没有给他复信，并不妨碍他后来成为世界性的作家。当然，在当时，尧棠等待他生平写的第一封信的答复，心境确实是很焦急的。他未免惶惶然，或者说有点失望，但是他并不灰心。他立刻又抓住了另一个机会：在上海出版的《申报》上，他看到一则广告，说可以索取一本叫《夜未央》的新书，是波兰作家廖抗夫的作品，只要寄邮费去就可以。尧棠便按着广告上的地址寄去了邮票，书很快寄来了，原来是一个剧本。那时尧棠正在外国语专门学校与同学一起排练史蒂文生的《金银岛》，演戏的劲儿正在兴头上。《夜未央》来的正是时候，他很快把它读了一遍，才知道那是描写俄国虚无主义党人反对沙皇罪恶统治而进行的一次英勇斗争故事。剧中的女主角亲手点燃了信号，通知自己的爱人携带着炸弹冲上前去，把敌人总督炸死，爱人也随之牺牲。这样惊心动魄的斗争，紧紧吸引住尧棠。他立刻把剧本交给同学们看，并进行了排练，大家争抄着各人的台词，一字一句的背诵，尧棠置身其间，觉得找到了自己理想中的英雄，好像自己也在与沙皇进行着斗争。几年以后，他在法国巴黎得到了这出戏的法国原本，读了一遍，觉得原本比译本更加动人，并发现中译本有误译和删节的地方，就自己另译了一遍，寄到上海来，不幸的是这部译稿竟在邮途中丢失了。隔了两年，他又在上海把《夜未央》重译，改名为《前夜》出版。

当时，尧棠在读了《告少年》与《夜未央》后，他完全沉浸在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与追求之中，觉得自己有了终生献身的事业。他从未像有些少年那样，很早就考虑到自己与异性的爱恋问题。他也参与家庭与学校中间的一些活动，不过都是环绕着他对理想的追求，和对时局的研究上。他与大哥、三哥、香表哥和一个堂姐，在家里也经常一起读书，交流思想。大哥

几乎每天都要从华阳书报流通处买一些新的书报带回家来，他们每天晚上都要讨论《新青年》、《新潮》等刊物所提出来的问题，各人表述各人的想法，并介绍自己看过的文章。三叔家的六姐也订了一份《新青年》，并在家中带头剪辫子，这曾引起一些保守势力的歧视，但是她不管，经常与三哥在一起无拘无束地谈论各种问题。不幸的是，当他们正准备在家中组织一个

研究会，在新花园中开第一次会时，就被三婶知道了，她跑来把六姐拉了回去，并从此不许六姐接近三哥。接着，大哥身体不好，研究会也就烟消云散。

这些哥哥姐姐们在读书活动中，原都把尧棠当作小弟弟，不料他后来比他们更进一步，走入社会比谁都勇敢地活动起来。

写给陈独秀的信没有得到回复，尧棠又想写信给立陶宛的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因为她在北京大学实社出版的《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杂志中所发表的文章，用煽动性的笔调，描写了她对无政府的理想境界，使尧棠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只是由于当时他用英文写信还有困难，所以没有和她联系。直到三年以后到了南京读书时，才写好寄出，并收到了高德曼的回信。他虔诚地信仰了她，曾经称她是他的“精神上的母亲”。当然，高德曼的这几篇文章，也和克鲁泡特金的小册子一样，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并不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全部，它们所赖以扣动当时中国青年的心的，是因为这些都反对旧的落后的东西。这对原来就有一些人道主义、爱国主义和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人，其中特别是一些初出茅庐、热情有余而经验缺乏的青少年，很自然地形成一种强大吸引力，这是不言可喻的。但从另一方面说来，由于“五四”以后这些学识的宣传，也使尧棠懂得：地主是剥削阶级。农民养活了地主，而他们自己却过着贫苦、悲惨的生活。地主阶级是有罪的，他们的后代一定要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推翻这不合理的制度，拯救工农，也拯救自己，同时也为上辈赎罪。

这时严酷的现实又加速了他对“社会革命”献身的决心：1921年2月，旧历春节刚刚过去，严寒还不曾消退。就在这样一个时节，大哥精神失常了。他的不抵抗主义，在这个大家庭中不仅不能息事宁人，反遭受更多的攻击，他心力交瘁，强烈抑制着的内心苦闷，加上他那四岁儿子的夭亡带给他的刺激，竟使他疯了。大哥的病时发时愈。有几个晚上，他甚至到放轿子的大厅中，坐在自己的轿子里，把轿帘上的玻璃敲碎。见大哥精神失常，尧棠十分痛苦。他憎恨这个家庭，他觉得它好像又夺去了一个爱他的人。他要反抗，他要行动，他要把眼前的一切毁弃，把旧的秩序制度破坏，实现新的理想，他想起在一家刊物上看到过一份《适社的旨趣和大纲》，虽很有兴趣，但他是否参加，当时不曾作出决定，此刻便又从屋角里把那份刊物找到，把它仔细看了一下，原来那是在成都出版的一份叫《半月》的刊物，这个“大纲”登在第十四期上，文章是从什么地方转载来的。看来那个“适社”是个秘密团体，“大纲”实际是一篇宣言。这正是他眼前梦寐以求的一个组织。尧棠的心跳动得厉害，把它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禁不住把信纸摊到桌上，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写了一封十分热情的信，给那《半月》的编辑，希望他们介绍，让他参加“适社”。

隔了一天，正通顺街李公馆的大门前，来了个客人。他衣着朴素，举止文静，不像公馆里的常客。但看他的容貌，显然年龄已有二三十岁，决不会是李公馆少爷们的同学。当他被迎入二门，门房里的人才知道是来看尧棠的。经通报，尧棠立刻从内天井跑了出来，一看却是个陌生人。未及通话，这个人就从衣袋里摸出一封信，原来是《半月》杂志编辑部写给尧棠的。来的人就是这家刊物的一个姓章的编辑。尧棠有些出乎意料之外的高兴，他要把那个编辑迎到自己房里谈话，那编辑却和善地对他说：“还是你到我家里来谈吧，我们几个人一起谈。信里有我的地址，还有指定的日期和时间。”他说完话，就走了。尧棠兴奋得一夜没有睡好，第三天，就按规定的时间，到了

章编辑的住处。那是间简陋的平房，但也还宽敞，好像是单身住着。尧棠到时，房间里除了章，还有三个年龄比尧棠大几岁的青年已先在那里。其中一个戴着近视眼镜，面貌憨厚，态度和蔼可亲，他的名字叫吴先忧，原来是尧棠在外国语专门学校高年级的同学。他的名字大概是根据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那句话来的。另外两个人，一个姓张，一个姓来。尧棠先听了他们四个人的介绍，又听了他们各人毫无掩饰地表露内心感情的谈话，觉得他们的坦率、真诚，那是在李公馆中的长辈中找不到的，就是在兄弟姐妹中也很难发现这样倾心谈吐的机会。他们没有虚伪的礼节，没有互相提防的戒心，完全是赤诚相见，心与心在交流。尧棠禁不住内心的激动，也把长期郁结在自己心中的痛苦、不平、积愤和忧虑吐露出来。他觉得这些人是那样可亲，那样真诚，那样可以信赖，好像他们都是与他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亲哥哥。他从他们的嘴里，了解到适社是在重庆；而在成都，他们准备另外成立一个组织，以后要请他加入并参与工作。至于适社，他们也为他写了信，介绍他与那边的负责人通信。后来，成都的组织果然也成立了，它的名称叫“均社”，是个与成都的军阀统治相对立的秘密组织。从这个时候开始，尧棠就被人认为“安那其主义者”。

尧棠在几十年以后，回顾他在那个时期的幼稚时，也曾说他在“五四”运动以后，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我有点惊惶失措……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东西，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我的脑袋并不复杂，我又缺乏判断力。以前读的不是四书五经，就是古今中外的小说。后来我开始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但也只是从克鲁泡特金的小册子和刊物上一些文章里得来的……”

当时尧棠带着幸福的微笑从姓章的编辑家中出来，他手里拿着他们送给他的几本适社出版的小册子，如获至宝，回到李公馆，他好像觉得自己的眼界开阔了，立刻给适社负责人写了信，表达了他那一颗纯真的心。从这一年四月，尧棠在《半月》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从《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这个题目就可以发现：他是多么渴望人间的平等与自由啊！在这一期的《本社社员录》中，也有他的名字，这就是：“蒂甘”。这是他在出生后父亲给他起的名字，取自《诗经》里的《召南·甘棠》诗的第一句“蔽蒂甘棠”。

从这时开始，尧棠确实有些像他的名字一样，稚嫩的小树，得到甘露的滋润，生命有了转机，在他的生活道路上出现了微光。这就是他在《半月》杂志社开始工作，虽是业余的，是在完成每天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功课之后的工作，但这工作对他说来是多么新鲜，多么有意义！而且，在从事这些工作的过程中，他与这几个青年建立起了一种亲密无间的友谊。

## 第九节告别成都

《半月》编辑部的办公室在总府街商业场楼上。这个十几个平方米的房间里，几个人每夜在微弱的灯光下，辛勤地工作，直到十一点左右熄灯，才各自回家。在白天，他们有的在学校读书，有的在商店、工场做事，只有晚上才在这里碰面。

时间过得快，《半月》办了五个月，要出第十一期了，经费却发生困难。

“印刷所的老板说，第十期印刷费不付清，第十一期稿件就不接了。”经常联系印刷所的朋友，为难地向大家说。

“那怎么办呢？”章编辑不禁忧虑地问大家。

“一起想想办法吧。”好像是袁诗堯的声音。

“不要紧，我明天给他们送去。”说话的是吴先忧。他的语气斩钉截铁，很有把握的样子。

“上个月的困难，不也是你解决的吗？”大家耽心他负担不了，因为吴先忧为了办好这个刊物，他花的力量最大，出的钱也最多。最近他连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也放弃了，改到一家裁缝店里去当学徒，他几乎把劳动所得，全部作为办刊物的经费。

吴先忧是个热心人，他对当时中国著名的安那其主义者刘师复非常钦佩，对刘师复所订的心社十二条戒约，更为信仰。除了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作官吏等信奉不渝外，对“不食肉”和“不坐轿及人力车”，他也身体力行，一点不含糊。他放弃求学去做裁缝，也是为了实行当时很流行的“劳动神圣”“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准则，以及“人的道德为劳动与互

助：唯劳动乃能生活；唯互助乃能进化”等一些主张。他热心助人，谁有困难，就帮助谁。至于大家的事，那就更不必说了。这次又是他站出来要为刊物解决交付第十期的印刷费，其实刊物每期印一千份，倒是都销完的，因为群众很欢迎它的内容。尧棠经常来到华阳书报流通处，看到读者争买《半月》的情况，特别是登有与现实斗争有关的文章刊物，总是被抢购一空。就说最近一期吧，他们为了主持正义，刊出了一篇文章，反对军人破坏学生为了办平民学校筹款演剧。刊物印好后，竟接到省会警察厅通知，要叫他们把这篇文章删掉。他们商量了一下，接受袁诗堯出的主意，刻了个“本文奉省会警察厅命令删去”的印章，用朱红印泥盖在这篇文章的中央，送到书店去卖。这样既不妨碍读者阅读这篇文章，又似乎接受了上面的命令，可以应付公事。事情果然如此：刊物一到，很快被读者抢光。哪知刊物销路不差，但收回来的钱还是不多。这是因为他们的刊物售价较低，每本价钱实际只收回一些成本费，而且每期总有不少本刊物，作为赠书处理。同时他们还在商业场楼上设立了一个书报阅览处，免费供应贫苦读者前来借阅。一到晚上，这里可热闹了，书报阅览处人群拥挤，使他们得有机会直接接触读者群众，因而结识了不少新朋友。

第二天晚上，吴先忧果真把印刷费付了。他在裁缝店当学徒，收入很少，怎能经常这样迅速解决刊物的经济问题呢？吴先忧父母早已亡故，依赖姐姐当家，姐姐待他很好，但不肯让他随便花钱，所以吴先忧临时要用钱，得自己想办法。他唯一的窍门，就是把自己的衣物送上当铺换钱救急，等领到工资，再把衣物赎回来。这次他把姐姐替他新制的一件丝棉袍子送到当铺去了。他从家里出门时，怕挟着棉袍从姐姐面前走过不了关，因此是穿在身上出门



的。走到当铺，已经一身大汗，在柜台前把棉袍脱下来，当了一笔钱，也就感到轻松了。

面对着吴先忧这样一个言行一致，对大家的事肯作自我牺牲的人，尧棠非常感动。在那个晚上，当尧棠了解到这件事的经过以后，他情不自禁地跑过去，紧紧地握住先忧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在他晶莹的双眼中露出感激的泪光。吴先忧的言行一致和自我牺牲精神，在尧棠以后的生活中，确实起过很大的作用。尧棠曾把先忧作为他青年时代的“第三个先生”。他曾说，“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他还教给我勇气，我虽然到现在也还不能够做到他那样子，但我的行为却始终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的。”

在这些可尊敬的朋友的影响下，十七岁的尧棠每月参加他们召开的会议两三次，还印了一些小册子送到邮局去寄发。五一节到了，他还在深夜到街头去张贴传单，这些传单大都是宣传“劳动神圣”之类内容，还有一些则是针对当地军阀的罪恶统治。那时四川军阀仍在成都进行着你争我夺的拉锯战。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两个人到了四川，又互相火拼。熊克武唆使川军将领但懋辛、刘成勋等发出通电，宣布在民国南北政府未统一以前，四川实行自治；而刘存厚正是四川自治的障碍，因而与刘存厚开战，终于将其赶往川北南充一带。不久，川军混成旅一批军官又推举刘湘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因而熊克武、但懋辛与刘湘又发生对立，展开激战；结果熊克武又联合刘成勋击败刘湘，逼迫刘湘下野，退出成都、重庆……这些军阀混战的后果，是生产破坏，市场混乱，人心浮动，民不聊生。在混战中的这些军阀，仍没有忘记对言论的控制，当《半月》出版到第廿四期，刚满一年的时候，被他们注意起来。

事情是从成都市区西边的那个少城公园（即现在的人民公园）开始的。这个少城公园当时是成都市民经常集会的场所。“五四”运动前后，这里曾举行过反对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要求拒签“巴黎和约”的集会；也有过谴责北洋军阀、要求抵制日货、收回青岛的运动。在平时，则有一些群众团体举办的座谈会；也有些基层在这里举办读书会、研究会。更多的是一些教师带着学生在这里聚谈。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写文章的外国语专门学校的教师吴虞，曾被人称作“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他是这里的常客。现在正是成都城内青年群众谈论妇女解放问题最起劲的时候，有不少青年学生经常在这个公园里，站在游客坐凳上，向群众宣讲女权解放，要求实行男女平等。同时，还传出消息，说成都城里已有三个妇女剪去辫子，不少人还拿着《半月》杂志，指着里面登的文章，一字一句读给别人听，说辫子是封建意识的象征……

有一天，人们忽然发现公园墙上出现一张布告，那是省会警察厅刚刚张贴的。一群人正围在那里高声地念着：

查为政之道在于民风端正，本省治安向赖全省人民体察上情，各安本分，奈近日邪说纷纭，以提倡男女平等为名，行违背我国固有道德为实，致使民风败坏，出现妇女剪辫，男女不分之怪现象。经省军政官员多方研究，为挽救世风，以求各方安居乐业，一致决定严禁此类现象再有发生，违者一律查究，不予宽贷。切切此令。

看了这张布告，有唉声叹气的，有鼓掌拥护的，也有批评省会警察厅不是的。这样一连半个月，这张布告前面经常议论纷纷。有一日，几个青年学

生，各拿着一本新出版的《半月》，对着围观这张布告的人宣讲起来：

“你们看，《半月》杂志登出了文章，明明白白地批评了省会警察厅这个禁令，他们说这张布告，不合时宜，阻碍历史前进，它反映了今天的当权者思想的封建性！”

学生的宣讲，一传十，十传百，一时人们知道了有这么一篇反对剪辫子禁令的文章，登在《半月》上。在总府街发卖的刊物，很快就给抢买一空。再过了半个月，《半月》又登了三篇响应上一期那篇专文的小言论，其中一篇的作者还是那两个带头剪辫子的妇女中的一个。这样就轰动了全市，省会警察厅的老爷们警觉过来，派人来警告编辑部，不要在这个问题上随便发表意见，尧棠他们不接受警告，与来人进行了辩论，结果来的两个人竟不答话，把几十本未及发售的刊物带走。《半月》社的几个编辑年少气盛，不甘心屈服于他们的压迫，三天两头写信去查询，得不到回复，他们就索性跑上门去质询，结果只换得一纸禁令回来。几个人没有办法，只好准备散伙。但在散伙以前，他们又偷偷地编了一期“停刊号”，这次是袁诗尧动笔，把事情经过通过他那热情洋溢、慷慨激昂的笔调详细叙述了出来，变成了一篇对封建统治的血泪控诉书。尧棠和其他几个人读后，禁不住热血沸腾，都说写得很好，很有感情。这样，出了整整一年的《半月》就停办了。袁诗尧不久在高等师范毕业，也就在他们之间消失了。最初人们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几年之后，尧棠在上海从一个朋友嘴里才听说袁诗尧后来不再满足于空谈革命，放弃了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1928年被成都军阀逮捕，最后竟被枪决在反动军阀的刑场上。

《半月》停刊。尧棠他们又曾与另一批人合办了一本叫《警群》的月刊，但由于双方对革命的理想不同，尧棠和他的几个朋友就发表联合声明，一起退出了。半年之后，这已是1922年了，他们又办起了《平民之声》周刊，这次是尧棠担任主编，那是他生平第一次担任主编，社址就设在正通顺街的李公馆里，发行部则在另外一个朋友家中。刊物每期出版的时候，尧棠和施居甫几乎天天到印刷局去发稿，看校样，有时两个人一起去，有时去的人更多。尧棠看到自己编好的稿件，被一个字一个字排出来，版面拼成后，上架子印刷，印张一页一页地从平架机上掉了下来，经常兴奋得忘记吃饭。当然，工作过程是兴奋愉快的过程，也是十分痛苦的过程。成都的军阀统治，对言论控制愈来愈严，他们规定稿件必须送审，而且还在印刷局派了人，监督刊物编辑把稿件送到省会警察厅去审查，如果不送，他们就不给印。这样因送审而不断产生纠纷，使尧棠他们的工作经常受到挫折。第一期为了争取及时出版，稿件不得不边送审边排印，结果刊物刚印好，而警察厅派来送信的人已经来到李公馆门口。尧棠把信拆开来一看，原来是警察厅认为刊物“言论过激，对于国家安宁恐有妨害”，所以不许发行。但是他们为了不使自己的劳动成果白费，还是把刊物送到书报流通处去，让它半公开地发售。以后，几乎每期警厅检查官都要给刊物带来麻烦，使尧棠他们非常愤怒，但也更进一步认识了这些统治者的反动和他们为人的卑鄙无耻。《平民之声》出了十期，最后还是在不堪忍受的打击下宣告停刊了。

由于“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各地文学社团陆续成立，主张“提倡为人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文学研究会也早开始活动，郑振铎负责编辑的会刊《文学旬刊》（《时事新报》副刊），一边发表现实主义作品，一边与复古的“学衡派”和以文学为消遣的“鸳鸯蝴蝶派”展开斗争。十八岁的尧棠虽

然远在四川成都，但已读了鲁迅、朱自清、夏丏尊、叶圣陶等人发表在上海、北京两地报刊上的作品，他自己也开始了文学写作，新诗《被虐待者底哭声》（署名李芾甘）发表在《文学旬刊》第四十四期上，这就是他在公开的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同时，他还在《文学旬刊》的“通信”栏上写信给编者，对鸳鸯蝴蝶派文学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编者复信表示支持。

虽然尧棠已迈步走向社会，而相互倾轧和仇视的大家庭仍笼罩在一片沉闷、忧愁的气氛之中。自从尧棠的父亲死后，商业场上的工作已由二叔接管，但不少人都愿与他合作，以致与他家有关的商行纷纷倒闭；再加上场内两次大火，损失惨重。当初祖父、父亲在世时，兴旺发达的景象，早已成为明日黄花。这就不能不影响李公馆在这一方面的收入。加上连年军阀混战，捐税名目繁多，四川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农村中由于战死、饿死、冻死和逃亡的灾民多，人口急剧下降，出现大片无人耕作的荒地，农业产量锐减。农民过着“三月杂粮三月糠，三月野菜三月荒”的生活，无法向地主按期交租，声势显赫的李公馆经济来源也因此大受影响，“内囊空虚”起来。这就加剧了家庭内部的各种矛盾，公馆里几乎每天都有争吵、打骂、诅咒之声。“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一片不祥的气氛，在这个即将崩溃的大家庭中游荡着。

幸而大哥发病的时间不多，仍能去商业场股份有限公司办公。他的第一个孩子庆斯患脑膜炎死了，这使他很伤心，也使尧棠感到悲凄。尧棠欢喜这个孩子，曾经常逗着他玩，不料军阀混战时期所流行的传染病，把这个不到四足岁的小生命也夺了去。这几年中，尧棠死了母亲、父亲、二姐、十妹和侄儿庆斯，几乎平均每年有一个人去世。这是一个多么使人忧伤的世界。第二年，即1923年，4月，三姐尧彩要出嫁了。三姐由于祖父和父母死亡，连年服丧，耽搁了她的婚姻。其实那年她也不过二十三岁，但在那个年代，人们已经把她作为“老姑娘”来看待，所以只得嫁给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做继室。她出嫁那天，尧棠跟着大哥、三哥一起去参加婚礼。他看见他的三姐那张苍白的没有表情的脸，临上轿时痛哭失声，苦苦挣扎的情景；后来又在拜堂仪式时看到新郎那世故庸俗的神态，禁不住预感到三姐命运的悲惨。他想到二姐的死，以及二叔家的四姐嫁后的遭遇，他为三姐担忧，心头上罩上了一片乌云。他要离开这个家庭的心情也更迫切了。

隔了一个月，他与三哥尧林争取到继母、大哥和二叔的同意，告别了故乡成都。这件事，经过他们兄弟俩多次互剖心腹，交换意见，才下这个决定。自从祖父死后，尧棠就想冲破封建牢笼，离开这个大家庭，但他从来不曾想到自己去上海或北京读书；相反，倒是尧林，他性格开朗、乐观，很有理想，在中学毕业时就想到北京考大学，现在在外专学习又告一段落了，便决心出去。他鼓励尧棠和他一起走。尧棠希望出去，但又有点放心不下在封建牢笼受苦的大哥和其他几个亲人。幸喜大哥身体比以前好了一些，三姐出嫁了，继母身体也还健康，而且他们都同意兄弟俩出门求学的打算。首先是大哥，他觉得自己到上海考大学的志愿没有完成，现在要让两个弟弟到京沪进大学深造。尧棠虽然因为在外专是旁听生，没有中学文凭，但他功课好，以同等学历去北京或上海考大学，也还是可以的。

离家的那天早上，尧棠和尧林到二叔房里去辞行，二叔也显露出亲人离别之情，从衣箱里掏出二十块银元来，交给他们兄弟俩，再三叮嘱在外要小心谨慎，要保护好自己安全。三叔三婶那时已搬出公馆（后来又迁回），

暂住在正通顺街另一幢房子里。当他们去辞行时，要想看望平时要好、久不见面的六姐，出来接待的却是堂弟尧格，也就是现在还健在的李西舫老人。他为人老实，经常被父母打骂，性格有些忧郁，看见他们来告别，不觉有些恋恋不舍，因为他只比尧棠小一岁，童年时经常在一起游戏。至于曾与尧林他们共同参加读书会的六姐，因继母与三婶闹翻，这次却没有出来。他们没有能够与六姐话别，心里感到遗憾。虽然以后三哥尧林还曾常与六姐通讯，但一个很有勇气、力求上进的六姐，三叔、三婶竟把她关在家里，这对她有什么好处呢？几年以后，尧棠听说六姐的生活过得并不愉快，处境寂寞，曾写出过这样的诗句：“往事依稀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她后来竟终生未嫁。

尧棠和三哥尧林上码头的时候，送行的只有大哥尧枚一人。大哥看着他们登上木船，含着眼泪对他们说：“上海离成都有几千里路程，从此我和你们离开得远了，希望你们勤写信，不要忘记家。我会觉得你们仍在我身边的。生活如有困难，就写信来，家中经济虽然不比以前了，但我一定尽力帮助你们。”他讲完这话，沉吟了一下，又说：“希望你们学业完成，就回家来，帮我重振家业。”尧棠知道大哥的心愿，他是一直期望他们兄弟俩能刻苦努力，为家庭“争口气”，以求有个“出头”的日子。大哥还希望尧棠能考进大学读工程系，做个工程师，回家来参加建设。大哥以为有了工程师这样的职业，生活就比较稳定，不比他们上代人捐官买爵，到头来个个无一技之长。他把自己当初的理想，转移到他的兄弟身上来了。

## 第二章巴黎钟声

## 第一节 离国之前

1923年秋天，上海开埠还不曾到一百年，帝国主义的大班们已不满足于外滩三号的“上海总会”喝咖啡聊天。他们在江西路汉口路口筑起一座新的工部局大厦，作为他们制定有关上海重要决策的议事大厅。当时所有的工部局董事，都是黄头发的白种人，而在这个新兴的国际大都市里，公共租界的纳税人百分之九十几都是黑头发的中国居民。而且有的税金还用在“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类似外滩公园这样的事业上。这种既不合理又不公平的现象，起初并不曾为来自农村的数百万包身工、人力车夫和上海滩上的其他劳动人民们察觉到；只在最近三四年里，或者说在“五四”运动以后，才在一小部分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口中，听到他们的几声不平之鸣。这对于外国大班来说，却已经是不能容忍的事了。他们在上海习惯于坐在黄包车上，用皮鞋脚踢车夫屁股指挥行路方向，很少看到老实的中国人对西方的文明措施，露出过不满的神态。尽管如此，这些洋人还是在1923年翻造了外滩12号汇丰银行营业大楼。这座希腊式的七层花岗石大厦，门前的两头巨大的铜狮子，血盆大口，虎视眈眈，不仅为这座“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令海峡最讲究的建筑”增添了威严，而且确实象征了辛亥革命后上海汇丰银行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它既掌握了中国政府的关税与盐税的保管权，又取得了中国铁路借款的承贷权。

但是，惊雷来自无声；几人合抱的大树，起源于路边无人注意的小苗。站在滚烫的铁镬边，用细嫩的双手撩拨蚕丝的童年包身工，她们苍白的脸上，有着中国无产阶级的未来。为破产的农民后代寻找出路的上海，像命运注定似的要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1923年，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不久，它的稚嫩并不曾阻碍它在这里找到自己依靠的对象，浦东的上海卷烟厂工人首先向“五省联军司令”孙传芳的军阀统治，举起了第一面罢工反抗的旗帜；接着是汗流满面的黄包车夫，为反抗被巡捕房随便撬掉照会而云集外滩，迎着黄浦江上外国兵舰炮火的威胁，高呼要求减免捐税。

十九岁的李尧棠——这位几年后就要成为著名作家的巴金，就是在这样一个中国人民反帝运动即将爆发的前夕，跟着他的三哥尧林，从遥远的川西盆地出发来到上海的。

在由成都到宜宾的途中，木船在河面上缓缓前进。沿岸都是经济萧条的农村，虽然是春天，田野上还是疏疏落落，一片衰败景象。尧棠站在船头上，展眼前景，心绪万端，风吹拂着他的头发，长衫的衣角也在飘动，这时又忽然想起家里的许多往事来，一些在不合理制度下受难牺牲的人，他们悲苦的脸都若隐若现的闪动在他的脑海里。他禁不住又像在大哥面前那样暗暗地喊道：我要对旧礼教进行控诉！我要反抗！临别时，大哥流着眼泪送他们，他要求他们以后要回来重振家业；而尧棠离开家庭，却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

经过一天的航程，天色逐渐黯淡，船也快要靠岸，他不知道要停靠在哪个码头旁，更不知道经过漫长的路程后，他将到的城市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他感到有些迷茫，但又觉得总有一种光亮在他的面前指引他，他有信心前进。就在这个时刻，诗神降临到这位未来的文学巨匠身上。在成都时，他曾从文学研究会办的刊物上读到过不少新诗，这时他自己也不觉吟出一首很有当时流行风格的短诗，后来寄给《妇女杂志》发表了。

天暮了，  
在这渺渺的河中，  
我们的小舟，究竟归向何处？  
远远的红灯啊，请挨近一些儿吧！……

尧棠与三哥尧林，就是这样乘着木船，晓行夜宿，沿路靠站，直到宜宾，然后在宜宾改乘火轮，经泸州到重庆，再换长江上的大轮船经过宜昌、汉口到达上海十六浦码头。在将近一个月的路程上，他们经历了一次从未有过的旅途生活，兄弟两人遇事互相商议，互相帮助。尧林虽只比尧棠大一岁多，但他在处理日常事务上耐心也细心，尧棠受到他多方照料。

上海终于到了。两人上了码头，人地生疏，正在踌躇的时候，却见岸上有人跑来和他们打招呼，一问才知是一家小旅馆派来拉接客人的，尧棠兄弟便让他代雇了一辆马车，准备到旅馆住宿。谁知路上马车与一辆人力车相撞，巡捕说他们触犯交通规章，被拉到巡捕房里罚了一元六角钱。当晚，兄弟两人就由那个上码头来拉生意的人介绍到“神仙世界”（娱乐场）对面一家小旅馆里住宿。第二天，他们才到《新申报》社，去找一个远房本家李玉书，请他帮助解决住宿问题。李玉书给他们安排在离《新申报》社不远的一家申江旅馆里，那是在汉口路上，是当时上海的一个闹市中心。尧林尧棠兄弟住进旅馆后，急于找寻一个能供膳宿的学校去读书，而现在还在暑假中，无法去报名投考。

那个李玉书曾到四川成都去过，二叔、大哥和他熟悉，在尧林、尧棠离开成都临行时，二叔、大哥就安排好让他们去找他；同时还叮嘱他们有时间可以到嘉兴去一次，看看那边的祠堂是否在重新修建。李家的原籍在嘉兴，从尧棠的高祖李介庵做官在四川定居，到这一代方始五世，所以成都李家至今还与嘉兴的宗族有着一些联系，而且嘉兴塘汇镇还有一所李家祠堂。

在与老家的四伯祖取得联系后，没几天尧林、尧棠即随族叔李玉书去嘉兴塘汇，得到热情接待。四伯祖年过八十，须发皆白，还在私塾教书。一见到这两个远道来的侄孙，真是喜出望外，拉着说个不休，并准备好一间空房让他们住，以便他们专心地温习功课。兄弟俩读书之余，常在黄昏时分，出门散步，想到这个山明水秀的城市，曾经留有李家先人的足迹，对这个地方不免有些特殊的感情。浙江原与四川一样，在全国范围来说，是属于富庶的省份，而且有许多名城，在历史上出现过不少值得人们纪念的人物。尧棠从小读《说岳全传》，知道浙江杭州原是南宋建都的地方，当时抗击金人入侵的民族英雄岳飞墓，就在杭州西湖旁。他不能忘记故事中有关岳飞被奸臣陷害后，岳飞的亲友偷偷来到岳坟前祭扫的动人描写。他还从西湖，想到另一些近代与古代的爱国志士，如“风雨亭”边的女侠秋瑾；还有明代的抗清英雄张煌言，在杭州慷慨就义时，曾有“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畔有我师”的诗句。尧棠对这些英雄的事迹十分神往，目前虽身在嘉兴，但杭州离嘉兴不过一百多里路程，要是有机会去看看就好了。尧林也对西湖心向往之，只是一想到暑假一结束就要去报考高中，得用心再读一些书，做一些习题，这样两人只好把这桩心事暂且搁在一边了。

尧棠和三哥在嘉兴住了三四天，回到上海，这次由二叔在海关工作的一个朋友丁桂岑介绍，住在虹口武昌路一个叫“景林堂谈道学舍”的学生宿舍里，靠近北四川路，住的人大都是互不相识的学生，等待着暑假过去学校开学。他们在这里温习功课，相互指点，偶尔也到北四川路走走。这里当时还

不算公共租界，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虽不及苏州河南边热闹，也到处是店铺和地摊，乱糟糟的使人心烦，虽然如此，这里的房租比较便宜，不少中国人，特别是一些工人和穷学生，都在这里居住。暑假过去秋季学期开学，许多学生都去考有住读条件的学校。尧林尧棠兄弟也离开了这里，考入南洋中学去做住读生。南洋中学在法租界斜桥，是上海一家较为正规的中学，但是学费相当贵，住宿费也不低，两人被分别插入二年级和三年级的班级里，只读了半年书，一到年底，就不得不考虑转学。而且他们认为自己年龄都不小了，想到南京补习功课，以求“跳班”；还听说南京的东南大学附属高中（即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附中）学风正而收费低，这样两人就从上海来到南京。当时南京也是在军阀孙传芳统治下，人民同样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两人考入东南大学附中后，借住在北门桥鱼市街二十一号一间空阔的屋子里，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两人同睡在一张床上，早晨一起上学，下课一同回家，逢到雨天两人合用一顶伞，回家把小皮箱作凳子，对坐在一盏煤油灯下，靠着一张破桌做功课。两人人地生疏，来往的朋友很少，总是怀念着成都的家，关心着大哥的处境。他们每星期各人给大哥写一封信，大哥也几乎每星期给他们寄回一封家书。这个学期尧棠看了很多书，还在课余学习世界语，并根据英文和世界语，从事文字翻译工作。半年后，他们又迁到另一间房子里，比原来的狭窄得多，而且十分阴暗，但是为了省钱，两人不得不住下去。

有一天，他们放学回家，看到门上插着一封大哥从成都寄来的信，兄弟俩忙把它拆开，才知三姐尧彩因难产致死。大哥在信中悲忿地叙述了三姐出嫁后在陈家受公婆欺压，以及由于丈夫的不负责任，以致临产受难的情形。信最后叙述了大哥与继母在三姐临终前到医院去看她时的凄惨情景，信上这样写着：

“时已十时半，医院已闭门，母与兄不时为尧彩调药，正十一时，服药甫毕，声息即无，虚脱而死，呜呼痛哉！当即命人到陈府报信，料理衣物，又命人为尧彩净身移正，诸事略备，痛哭不已。此夜大家守至天明，泪眼相对，回视尧彩瘦不羸把，伤心惨目未有如今夜之甚者。兄当时受刺激过甚，头痛欲裂，天明即出院，兄返家时家人尚酣睡未醒，兄服药即眠，八时后至医院，则不过泪眼相对而已。2时入棺，2时半大殓，3时出院，3时半抬至东门外普慈寺暂寄。陈府事事推矮，对尧彩后事极其冷淡。兄当时气极矣！伤心极矣！……”

尧棠看完大哥的信，禁不住与三哥抱头痛哭起来。一年前三姐在出嫁上轿时苦苦挣扎的情景，又浮现在他们的脑海里。三姐比尧棠大五岁，二姐去世后，他与尧林一直把她当作大姐姐看待，她也一直爱护着这两个弟弟，她与他们为怀念着共同爱着的母亲而心始终在一起。现在她离开他们了，他们永远见不到她了，尧棠又一次的感到心痛。隔了几天，他与尧林又接到年轻的六叔来信，他对尧彩的死，心中也十分不平，说他拟了一副挽联，准备送到三姐的婆家陈府去，这副对联这样写着：“临死无言，在生可想。”后来六叔又来信告诉他们三姐死后不到一个月，三姐夫就找上新的对象，打算择吉成亲，不久果然张灯结彩，做成了第三次新郎。尧棠读了六叔先后来的两封信，不免满腔忿怒，想起他童年时代，在他的两个姐姐的房间里看到的那本《烈女传》，图画上的一些美丽的古装女人，她们为了奉行封建礼教，作无辜的牺牲，有的用刀砍断自己的手，有的在烈火中烧死，有的在河里沉溺，有的拿剪刀刺自己的咽喉。这些故事使许多妇女都心甘情愿地去做“烈



女”，落得极其悲惨的结局。尧棠联想到在辛亥革命后，他的一个表姐还抱着一个已死的未婚夫的牌位去夫家“成亲”。他禁不住又为大哥和生活在这个家庭里新一代的亲人们担心。

封建制度是这样可怕！人们是多么需要自由，青年该如何追求理想投身革命！尧棠觉得自己迫切地需要选择道路，而又时时感到迷茫、苦闷。不久，曾在苏联与高德曼见过面的同学秦抱朴介绍他给爱玛·高德曼写了一封信，叙述了他过去在《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上读到她的文章时的感想，并诉说了自己在现实中的烦恼。

出乎意料的快，高德曼的复信来了，她是这样热情，信里这样写着：

“你的美丽的信和抱朴同志的信，上星期到了我的手里，我不能够对你谈出我是怎样深受了你的感动，而且你的话又是怎样地鼓舞了我。我知道我对于一个如此青年的学生居然会给了很大的影响，我是非常快活的，你才十五岁，就读了我的文章，我常常梦想着我的著作会帮助了许多真挚的热烈的男女青年倾向着安那其主义的理想，这理想在我看来是一切理想中最美丽的一个。

“……你说你是从一个富裕的家庭里出来的，这没有什么关系。在资产阶级里面也常常产生了活动的革命家来，事实上在我们的运动里大部分的理智的领导者，都是这样的一类人，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困苦境遇，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坐视着大众的痛苦，而且你生在资产阶级家庭里，并不是你自己的错误，我们并不能够自己选择出生的地方，但是以后的生活就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处理了。我看出来你是有着每个青年叛逆者所应有的真挚和热情的，我很喜欢这种性格，如今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为了一点小小的好处，许多人就会卖掉他们的灵魂——这样的事情到处都会有。连他们对于社会理想的兴味也只是表百上的，只要遇上一点小小的困难，他们就会把它抛掉。因此我知道在你们那里你和别的青年人真挚地思索着，行动着，而且深切地爱着我们美丽的理想，我觉得十分高兴……”

年仅二十岁的尧棠激动地读着爱玛·高德曼的信，他觉得两年前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时他读她那有着丰富学识、雄辩论据和煽动性很强的文章时，他一边读一边流泪，是何等感动，而现在她对自己的鼓舞，又是这样亲切，这样毫不困难地占有着自己的心灵，她的巨大的形象出现在他的面前，呼唤着他去为理想努力。他觉得自己找到了足以为它奋斗终生的事业。以前为了念书考学校，曾对安那其主义冷淡过好一阵子，这时又开始热衷起来，并向索非（当时他在北京）编的《国风日报》副刊《学汇》投稿，用“蒂甘”名字写了不少宣传安那其主义的文章。这些文章里也有些幼稚过激的话，如关于国家问题，及对列宁个人的看法，为他后来自己的实际行动所纠正与否定。

五卅运动终于在上海爆发了，这个当时拥有八十万产业工人的大城市，用为死者报仇的旗帜，覆盖在被帝国主义杀害的工人顾正红的棺木上。学生联合会通过决议，宣称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的时候已经来到。接着是全市罢工、罢市、罢课，又接着全国范围内响应起来了。南京并没有例外，新街口的游行队伍里有东南大学附属高中毕业班的学生，学生中有精神振奋的二十一岁的青年李尧棠，他们的队伍从东南大学出发，当尧棠看到校门口肖楚女站在土墩子上向大家高声演说的时候，他的整个心灵都震动了。当时他还听了比自己低两个班级的同学胡风的演讲。这次游行为李尧棠一年后写他的第一本书《五一运动史》和后来用“巴金”笔名写中篇

小说《死去的太阳》，增添了感性认识。

当年八月，尧棠终于高中毕业了。根据他的志趣，他希望去北京大学读书，因为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校长是以民主治校的蔡元培，还有不少在反帝反封建中作过贡献的进步教授。而且《新青年》等刊物，当时还在北京出版。而三哥尧林却向往于东吴大学读英文，东吴是基督教会办的学校，在那里可以有英国教员直接指导。于是这两个在二十年中一直生活在一起的兄弟，不得不分手了。

三哥尧林在南京浦口送尧棠登上开往北京的火车，他在站台上把行李送给刚进入车厢中的尧棠，然后亲切地说：“今后一个人单独生活了，要自己当心身体，注意安全。”尧棠答应着，把行李放好，又从窗口伸出手来，握着尧林的手，想谈些什么话，心中千言万语，却一句也说不出。火车“呜呜”地叫了几声，就响着隆隆的声音启程了，它把挥动着双手的三哥丢在后面。尧棠坐在车上闭起眼睛，就看见三哥在他身边，一睁开眼，却又找不到，他禁不住淌下眼泪。他非常不习惯于个人独处，自从离成都出来后，他们俩总在一起，而现在却分开了，他感到寂寞。幸而他带着几本书，一路上读着，特别是鲁迅的《呐喊》，这本新出版的红色封面的小说集，里面有的作品如《狂人日记》，他早在《新青年》杂志上读过，但他还是一遍两遍读着，他觉得这些短篇小说，为他提供了各种人物形象，还为他提供了许多值得思索的社会问题。

到了北京，正碰上风沙迷漫的季节，使他领略了祖国北方的风光。他住的地方是北河沿同兴公寓，离故宫很近，离北海也不远，但他还是忙着先去北京大学报名，报名回来在等候体格检查和考试日期的通知时，可以有机会游览故宫和北海的。那天正想出门，却来了一个通过信没见过面的朋友沈茹秋，同兴公寓正是通过他介绍才住进来的。他是《国风日报》社的一个编辑，继索非担任《学汇》副刊主编，见面后尧棠才知道他原来还是朝鲜人。因此尧棠和他谈起四年前在成都参加《半月》杂志的编辑工作时，也曾结识过一个朝鲜人。这个人姓高，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念书，人很热情，有一天，他在《半月》上读到尧棠一篇提倡世界语的文章，就找上门来，要求与尧棠做朋友，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世界语爱好者。后来尧棠曾向他学过世界语。这次尧棠到北京，见到沈茹秋热心为他安排住宿，就很自然地得到一个粗浅的印象，认为热情待人，认真办事，大概正是朝鲜人的性格。尧棠把他的看法对沈茹秋说了，哪知第二天晚上，沈茹秋就给尧棠带来一个更为热情的朝鲜朋友柳絮，他们坐在同兴公寓院子里的一棵槐树下，给他讲有关朝鲜爱国者为了争取独立、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不屈斗争的事迹，一直讲了半夜。这个晚上的讲话，不仅使尧棠意识到一个民族如果失去自己的祖国，他们将遭到怎样的灾难，而且他们还给他提供了几年以后写小说的素材。

过了几天，尧棠接到通知去北京大学招生处检查身体。医生用听筒听了一下他的肺部，又看了看他清瘦的脸，沉吟了半晌。偏在这时尧棠咳嗽了几声，医生禁不住连连摇头，意思是觉得他的肺部有问题，然后在体检表上不知写了些什么。这好像给尧棠心头浇了盆冷水。青年时代的尧棠，性格本来就比较忧郁，而且非常过敏，医生在他的健康问题上下了这样一个摇头的“结论”，这使他对进北大读书的计划，感觉到绝望，在入学考试这一关上，他本来就有点胆怯，特别在数理化方面，觉得自己没有把握。现在体检上出了毛病，这更使他沮丧。那天傍晚，他回到住处，正碰上北海公园第一次开放，

他就到公园去散步，在漪澜堂前，静坐了两个小时，他望着静静的北海，觉得夜晚是那么宁静，而他自己的心头却是那样不安。人们知道，肺病在二十年代是个可怕的疾病，它曾夺去无数个年轻生命，在这样的时刻，尧棠不能不想起他的二姐，想起二姐在祖父寿庆演戏之夜的那张毫无表情的苍白的脸。他担心自己得肺病，决心不去参加北大的入学考试了，但他仍手不离卷地一遍二遍反复地读着鲁迅的《呐喊》，它给他慰藉，也给他很多力量。

他回到了南京。善良的三哥并不曾责备他擅自作主，不去参加北大入学考试，而是对他给以更多的同情。他把尧棠的行李接了过去，帮他安顿好，安慰他不要焦急，第二天他就陪他到一个熟悉的医师诊所去复查身体。那医生是他们的同乡，他确诊尧棠有轻度的肺结核，需要好好休息，并注意营养。然后，兄弟二人一起登山去鸡鸣寺看南京风光。那是个非常幽静，也是十分美丽的地方。回到住处，尧林就接到苏州东吴大学的通知，他入学考试成绩优良，被录取了。于是尧林给尧棠先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让他回上海休养，因为上海医疗条件好，而且尧棠在上海朋友多，他们也希望他回去一起参加办刊物，写文章。这次又是尧林在浦口车站为尧棠送行，他劝他多注意休息，少一些活动。宁可多读些书，也不要精神消耗在没有意思的活动上，这是三哥的看法。三哥自己去苏州东吴读书后就是这样生活的。但是这对那时的尧棠并不合适，他比三哥更年轻，他虽然身体不好，但仍劲头十足地办起一个《民众》半月刊，并结交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单这本刊物的发起人，就有十六个，他们是真恒、吴健民、沈仲九、李少陵、黄培心、卫惠林、李蒂甘、禅林、吕千、周索非、毛一波、沈茹秋、姜种因、卢剑波、秦抱朴、陆不如。

他当时先住在法租界贝勒路天祥里（今黄陂南路14弄），与卫惠林、毛一波同住在一幢楼房的二楼上，卢剑波夫妇住在楼下。后来又和卫惠林一同迁到康梯路（即今建国东路）康益里4号，1926年又搬到马浪路（即今马当路）住。卫惠林是山西阳城县人，年纪比他大几岁，也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而且懂得日语。尧棠与他同住在一起，和他一起编刊物，有经常向他学日语的机会。他们收入不多，生活过得很艰苦，经常以两个小面包和一壶白开水度日。当然三哥尧林在苏州还从家中寄来的钱分一些给尧棠，但数量极少，因为大哥在成都维持家庭也十分艰难。尧棠并不因为自己身体不好而放弃工作，他在这一年编写出一本《五一运动史》，同时也译完了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后改为《面包与自由》）。这本书是克鲁泡特金在1886年写的，也是尧棠的第一本译著，它的内容是阐述作者对于实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经济与政治的主张。他认为大自然留给人类的财富和人类通过集体劳动所创造出来的机器，是足以使所有人得到温饱，如果废除私有制，实行共产共有，经济平等，便可以保证人们安居乐业。但是他认为这个任务须由无政府的共产主义来完成，因而他主张消灭国家，取消政府，废除法律，由多种社团的自由联合来代替国家的统治。在这本书中，克鲁泡特金表达了他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强烈憎恶，和对理想的自由社会的热情追求。可惜这些理想不切实际，很难办到。当时尧棠接触社会实际的机会并不多，还不曾把这一理论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去进行考察，所以他对旧的封建制度的憎恶出发，曾十分同情克鲁泡特金某些方面的观点，并写了一些论文。

这一年秋天，卫惠林提出要到法国去留学，问尧棠是否也有这个愿望，尧棠当然十分向往有此一行。寒假期间，他到苏州去看他的三哥，只见尧林

一个人住在学校宿舍里，过着十分孤寂的生活。因为学校里的教师与学生都回家去度假了，而他为了节省费用，既不回成都，也不来上海，还利用寒假为学生补习功课，自己也趁此时机多看些书。现在尧棠来看他，两个人像过去一样，又睡在同一张床上，谈了一夜的话，话题总是离不开对成都老家的关怀，特别是对大哥处境的忧虑。大哥经常有信给他们兄弟俩，多次谈到家道的衰落，人际关系的分崩离析，和他自己心里的苦闷，大哥总是表达他对两个兄弟“学成回来，共振家业”的愿望。尧棠告诉尧林，有朋友要他一起去法国留学，尧林听了，沉吟了一下，说：“家庭也有困难”。然后两人又把话题扯开了，又谈到大哥、继母和留在家中的几个弟妹……

第二天吃了早饭，尧棠准备回上海，临行，尧林从怀里拿出一件东西交给他的四弟，说：“这个你拿着用吧。”尧棠一看，原来是三年前两人离开成都时大哥交给三哥用的一只旧怀表，尧棠犹豫地问：“你自己不用吗？”“我住在学校，用不着，你在外面东奔西走，更有用处。”尧林不等分说就把那只表塞在尧棠的衣袋里。哪知尧棠把它带到上海，才用了两三天，它就被扒手摸走了，也不知是在哪个地方那个时候被摸走的。

尧棠回到上海，卫惠林问他去法国的事情准备得怎样了，尧棠答不上口，就写信到成都，要大哥给他准备路费及到法国之后一个短时期的生活费用。大哥回信诉述了家庭困难，问他能否等二三年后再去，也许那时家庭经济情况可以好转一些。尧棠去信还是坚持出国，并与他争论。可能信中的话讲得急躁了些，大哥写信给尧林，要尧林说服他，并说必要时可回成都筹商一下再走。尧林写了两封信劝尧棠体谅大哥的苦衷，但尧棠仍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尧林考虑到与其两个人从上海、苏州到成都走一次，还不如把时间和旅费省下来，让尧棠到巴黎去，就转劝大哥接受尧棠的要求，大哥终于同意了。他把钱汇到了上海，写信给尧棠，希望他到法国进大学，还是读工科，学到专长后回成都“兴家立业”。而尧棠想到还是离开成都时的两句话：“奋斗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他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尽管他身体不太好，但为此他觉得自己更应该奋发前进。

他委托上海环球学生会替他办好了出国手续，拿到了去法国的护照，他写信告诉了三哥，就在他出发前夕，收到了三哥的来信：

“你这次动身，我不能来送你了，望你一路上善自珍摄。以后你应当多写信来，特别是寄家中的信，要写得越详越好。你自来性子很执拗，但是你的朋友多了，应当好好相处，不要得罪人，使人难堪，因此弄得自己吃苦。卫惠林年长，经验足，你遇事最好虚心请教。你到法国后应当读书为重，外事少管，因为做事的机会将来很多，而读书的机会却只有现在很短的时间。对你自己的身体也应当特别注意，有暇不妨多运动，免得生病……”

那些话充满着兄弟手足之情，但是对当时的尧棠，却并不十分中听。他想到的是对真理的追求，和对革命的向往，但他还是能理解三哥的。临出国前一天，即1927年1月14日晚上，他就给尧林写了回信，而且写到深夜。

当他把信写好，把笔搁在桌上时，他所住的上海法租界马浪路这条弄堂口，一个小贩正敲着竹筒，拖长着声音缓慢地喊着：“白糖——糯米粥！”海关大钟也像与这个小贩的叫卖声互相应和似的，用着同样懒洋洋的节奏，敲了整整十二响。

## 第二节 “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

1927年1月15日早晨，在上海是个阴冷的天气，朔风彻骨，滴水成冰，经过一夜的天寒地冻，各条马路又出现了一具具冻毙的尸体。普善山庄的收尸车还在街头忙着收拾尸体，而外滩的那些洋行大班们，已口含雪茄，坐在舒适的包车上兴匆匆去上班。在黄浦江的公和祥轮船码头，此刻也已熙熙攘攘，送客的送客，上船的上船，响起一片杂乱的喊声。

从法租界马浪路开来一辆出租汽车，在码头边停靠后，从车上跳下来四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其中两个是准备上船去的留学生，另外两人是来送行的朋友。两个留学生中，一位是高个子卫惠林，从他胖胖的圆脸上，可以看得出他那热情直爽的性格。另一位相对来说，比较瘦小，他就是不久就要用“巴金”笔名写小说的李尧棠。他戴着眼镜，穿着一套在虹口旧货店买的西装，披着外套。下车后，他向四面望了一下，看见附近有一个邮筒，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封昨晚刚写好的信，信封上写着：“苏州东吴大学李尧林先生收。”他跑过去把信丢进邮筒里，顺便还向站在自己身边叫卖的报贩买了一份当天的报纸，他很想看一看当时销数很大的《神州日报》和《民国日报》，但这两个报社却已在三天前被军阀孙传芳下令封闭了，今天买到的只有《申报》。《申报》上刊登着美国政府命令檀香山和苏彝士的军舰开赴上海；英国驻威海卫的第二舰队，以及日本的驱逐舰和巡洋舰纷纷调遣来沪的消息。看来半年前进军北伐的革命军眼前节节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和军阀孙传芳统治下的上海形势趋于紧张。尧棠看了报，脸上浮起一层兴奋的表情，但又意识到自己就要离开上海了，来不及迎接这个革命高潮，不免感到遗憾。回到码头上，他正准备上船，和那两位送行的朋友道别，不料这时来送行的朋友毕修勺，在人群纷乱中被一个骗子骗走了一百元钱。毕修勺是《民众》杂志的编辑，左拉作品的翻译者，他曾于1920年到法国勤工俭学，回国才一年。大家认为他既然出过国，上下轮船码头有经验，所以请他做代表，来为尧棠、惠林送行。他们一到码头上，就有一个人自称是轮船公司的接待员来对他说，可以帮助他们把行李装运到行李房去，但先得付一百元的寄存费。他信以为真，抢着把钱交给他。顷刻间，这个人就在人群中消失，再也找不到了，而行李却还在他们身边——这是尧棠出国前的最后一刻，上海社会给他留下一个六十年后仍无法忘记的印象。

他们终于登上了船。那是法国邮船公司所属的一条叫“昂热号”(Angers)的小船，是驶往法国马赛的。他们上船后，接受了出国护照检验。李尧棠的护照上这样写着：

中华民国外交部特发给李尧棠(年龄二十一岁，职业学生，籍贯四川成都)以5583号赴法国护照，务盼沿途文武官员遇事妥为照料。

尧棠是1904年11月25日出生的，出国时还不到二十二足岁。这二十二年的经历，虽然不长，却已尝够了生活中甜酸苦辣的滋味。现在他站在甲板上，看着邮船慢慢地离开码头，江边高大的建筑物逐渐变小，岸上向他招手的送行者也渐渐远去，以至看都看不见了。他的两眼噙着泪花，意识到自己已经开始离开这块生我育我的土地了，这块土地居住着他的多少亲人和朋友！它曾经给过他幸福的幼年，给他知识，又使他感受到许多不幸和悲哀。望着这块渐远的土地，他不能不想起教他爱一切人的母亲，和他那开朗乐观、经常带他出门散步的父亲，以及二姐苍白的脸，三姐临上轿挣扎的形状和哀

哀的哭声。还有可怜的大哥，他在封建家庭崩溃中遭受着灾难，以致一度精神失常，而仍忍辱负重，承受着各种负担。在这块土地上有多少家庭在过着这样的日子？有多少年轻的生命牺牲在腐朽垂死的封建制度压迫下？又有多少无辜的劳苦大众，像成都正通顺街上几家公馆里的轿夫、老仆们那样劳苦一生，到头来只落得瘦骨伶仃，住草屋、食糟糠，甚至冻毙在街上，或者受冤屈，吊死在屋梁上？

在这块土地上，还有像上海这样的地方，它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这里有歌谢舞厅，绅士淑女，也有一无所有的劳工和背井离乡的流浪汉。这里是少数人的天堂，多数人的地狱。这里有严肃的工作，有人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这里也有荒淫与无耻，有贩售肉体的交易所和出卖灵魂的市场。

邮船离开这块大地越来越远了，终至看不见望不到，尧棠禁不住热泪盈眶，想起旧俄时代流行在西伯利亚的一首歌子：“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同时他用自己的语言，从心底默默地念出一句话来：

“祖国哟，我恨你，但又不得不爱你！”

他走到二层楼自己的房舱里，把行李放好。这是三等舱，房间里有八只床铺，他与卫惠林被安排在面对面的两张铺上。他们的房舱对面，便是餐厅，餐厅里有几只长桌，可以坐许多人。以后他们二人就要每天早上在这里喝咖啡了，下午还要在这里喝茶。当然午餐和晚饭也是在这里进行的。

三等舱空气不够流通，十分闷热。幸亏在四层楼有个散步休息的地方，尧棠来到这里，觉得抬头可以看见青天，低头可以看到大海，确实是个好地方。只是这里对面是头、二等舱，望得见西洋绅士和贵妇们在这里来来往往，这些人大都气宇轩昂、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不难看出隐藏在他们内心的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使人觉得难受。

昂热号已驶出吴淞口，停着许多外国轮船的黄浦江已经看不见了，但是尧棠对自己家乡和亲人的想念，却越来越严重了。他想起这次出国留学，没有大哥的资助和三哥关心，是不能实现的。三哥和他从小一起长大，同在和蔼慈祥而又有文化的母亲指导下认字读词，同样接受母亲“爱一切人”的教导。父母去世后，三哥用真挚的爱温暖着尧棠的心，他是母亲“爱”的继承人。自从他们兄弟俩离开成都后，不论在上海，在南京，总生活在一起，同在一盏灯下做功课。他们始终保持着穿竹布长衫、戴滚圆的琳琅边眼镜的内地学生形象。直到尧林进苏州东吴大学，尧棠回上海养病，两人才分开。但是他们仍不断通信，互相关心各人的生活。这次尧棠出国，尧林来信说：不能来送你了，望你一路上善自珍摄。要他多写信来，特别是寄家中的信，要写得越详细越好。尧棠在当晚写的回信，就是刚才在码头上寄发的，信中说：“我很想念你，我很想再见你一面，但是苏州和上海间的距离阻拦了我们。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到我们是离得很远的。但我想以后我会一天天地往更远的地方走了……你不来送我也好，免得我在船上淌泪……”但在事实上，就在此刻，尧棠站在这条船的四层楼甲板上，望着大海，望着天空，想着想着，他的泪又从他的眼角淌下来了。

当天晚上，尧棠和惠林各在铺上躺下，一天的旅程使他们都感觉到有一点疲劳，但惠林还是翻阅着早上尧棠从码头上买来的报纸。他对尧棠说：“现在国内形势比较紧张，军阀吴佩孚、孙传芳慌成一团，帝国主义也纷纷派遣舰队来上海，看来北伐军已逼近上海了。”尧棠口答说：“对，应该说，中

国现在已进入了革命的时期。可是这已不是国民党一党的运动，而是整个民众的革命运动了。”卫惠林听了这话，很感兴趣，还想再说几句，但熄灯时间快到了，又见尧棠已闭起眼睛，准备入睡，也就不再作声。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直到后来在巴黎拉丁区一同住下来，才有机会充分开展。

晚上，尧棠感到一点头昏，虽然没有因晕船而呕吐，但总觉得不太舒服。他仍沉浸在对祖国亲人的思念中，闭起了双眼，分明看见许多人在面前活动，还和他对话。好像千万件往事，一下子都涌上他的心头。只要平时见过一面，曾用和善的眼光看过他一眼的，他都无法忘掉他们。他的两个哥哥，特别是大哥，更使他放心不下。尧棠回想他的大哥从小深受父母宠爱，读书也读得很好，中学毕业时还考第一名，他自己有许多美好的理想，但这些理想后来都一一归于破灭。父母和祖父死后，他作为长房“承重孙”，简直成了大家庭中众矢之的，至今还在受各种不应承受的折磨。而他自己到处打躬作揖的不抵抗主义，更增加他身上的矛盾。在他们兄弟俩离成都前一年，大哥又遭受了四岁儿子夭折的打击。啊，像他这样生活着的人，能活得长久么？自己这次出国，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回来时还能见到他么？……尧棠这样想着大哥的命运，禁不住想立刻写封信给大哥，对他说，“大哥，我永远这样地叫你，然而这声音能渡过大洋越过高山而达到你的耳边吗？……难道人生就是这样寂寞的呀！……”可是此刻他太疲倦了，终于慢慢地入睡了。

第二天起身，尧棠在海上的生活就习惯了。第三天早晨8点钟，船靠了码头，有人说已经到了香港，停在这里要到下午4时才开航，尧棠便和惠林上岸去观光。只见岸上阳光满树，街道清洁，房屋整齐，一问才知道这是九龙，对岸才是香港。由于人地生疏，他们为了寄信，在九龙竟耽搁了许多时间，正想摆渡去香港，不料天下起雨来，只好回船。还没回到船上，天却又放晴了，他们便到一家理发店去理发，理好发已是中午，就近找一家茶馆，两人坐在里边喝茶谈心，顺便买了一些点心吃，这样把时间打发到下午2点钟，才又回到船上，香港却没有去成。

他们所住的这三等舱的房间里，虽有八只床铺，却只住了四个人。除了尧棠和惠林，一个是姓彭的四川同乡，是个学化工的留学生，与他俩性情相投，很快就谈到一起了；另一个是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到新加坡去投亲的程君，他为人很和善可亲，只是因为要经常去隔壁房里照顾家眷，就不能与他们时时在一起。那天船到西贡，靠岸卸货，甲板上人来人往，各种声音鼎沸。尧棠就与卫、彭两位上岸，去领略当地风光，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是南方明亮的阳光，鲜花盛开，瓜果满地，街道也十分宽广，行人大都是法国人和越南人（当时叫安南人）。中国人不多，但他们恰巧遇到了一位。他是个广东人，一家商店里的店员。他们走进这家店里问路，他就把他们拉住了，不但热情地为他们指路，还告诉他们怎么兑换钱，请他们到店里坐，说他是广东人，来这里不久，上岸时受尽了侮辱和麻烦；他说法国人统治越南，从政治迫害到经济压迫，都是不放松的，人要纳税，房子要纳税，生孩子也要纳税，鸦片烟倒是可以公开卖的，甚至设立公烟局，鼓励吸鸦片。他说着，还陪他们去买火车票，到堤岸去玩。第二天一早，广东人又上船来，领他们上岸去游植物园，他的热情使尧棠和卫、彭都很感动，临别，彭送给他一本国内出版的书，书名《帝国主义侵略下之中国》。

那天晚上，尧棠躺在自己从西贡买来的帆布椅上，在甲板上听停泊在海轮旁的小木船上的船客弹越南乐器，凄凄切切的声调，勾起了他对故乡的怀

念，特别是想到不久前死去的三姐。三姐爱过他，他也曾听过三姐幽怨的笛声，而现在她已永远离开他，他也永远不能再见到她了。

隔了几天，船行驶到新加坡，和尧棠他们同住一室的程君，带着他的家眷上岸了，空出来的铺位，由一个姓邓的广东人顶替了。邓君在新加坡工作，这次是到法国去购买机器，因为他原是机电系的学生，曾在法国留学六年，对法国是十分熟悉的。邓既通法文，又懂英语，更会讲普通话，广东话当然更不必说了。邓君又是个性情爽直，容易推心置腹交流感情的人，这就使来自四面八方的船上中国留学生，增加了互相交往的机缘。在香港上船的两个留学生李和黎，也常来尧棠他们这房间叙谈，加上原来在上海与他们一起上船的三个北方留学生，研究文学的范，学数学的巴和刚在北平青德中学毕业的杨，一共九个人，每天晚上总是在甲板上，躺着帆布椅，畅谈各种问题。不论是国际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或是妇女问题，大家谈得很痛快，毫无拘束。

三十多天的海上旅程还使尧棠看到各种奇景，那是大海与日月的结合，美与光的凝聚，艺术与真理的会晤。毫无疑问，尧棠在这里领受了大自然的赐与，他的胸襟有了更深的开拓。在船上，他也看到了人世百相，看到了一些受难的人们的遭遇。有两个波斯教士，本来是到西贡去的，但没有能够在西贡登岸，因为法国警察盘问了他们，不让他们上去。他们回到船上，还受到茶房责备，也只好忍受着不吭声。他们在船上实行苦行者的生活，别人在甲板上舒服地躺在帆布椅里，他们却站着，风浪大时，就抱着一块木头睡在地上，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天气炎热，人家都脱了外衣只穿衬衫，他们却穿着一套厚西装。到新加坡上岸了，尧棠望着他们的背影，既可怜他们的遭遇，又对他们的“忍受”感到厌恶。他以为只有反抗，人类才能得救。“忍受”的结果只能得到死亡。在船上，尧棠还看到五个黑人的孩子拼死搏斗，只是为了捡拾白人在船上丢下去的一个铜子。“这也是人的生活！”站在一旁的卫惠林十分感慨地对他说。尧棠为这一残酷的景象感到心痛，同时这些景象也都勾起他对自己祖国受难者的思念。自己的国家里也有许多人遭受着悲惨的命运。他忘不了童年时带领自己的女仆杨嫂，青年守寡，终于发疯致死；厨司老何和管监刘升，挨了老爷板子，还要向老爷叩头谢恩；书僮赵升，为李家做了几十年的奴才，临死只得到一条破席子，盖在尸体上。一个轿夫因被诬陷做贼，气忿而悬梁自尽。老仆周贵则因偷窃字画，被逐出李公馆，沦为乞丐，最后冻毙在寒冬岁暮的街头。

不幸的乡土，有多少不幸的事情在日日夜夜发生，苦难的人民什么时候才能结束那漫长的悲苦的日子呢？

在长达一个月的海上旅程中，尧棠早晨看海边日出，晚上看海上明月，生活既多彩，却又十分寂寞，他几乎天天在回忆祖国和故乡的春天和秋天，思索着他自己二十一年生活的征程，他又几乎天天为两个哥哥写旅途通讯，讲述在船上发生的和自己所感受到的一切。同时他并不忘记从英文本和世界语本翻译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人们总是看到他不是在闷热的房舱里埋头写作，就是在餐厅里俯首疾书，有时甚至在休息室里，也低着头看书写字。

轮船驶经印度洋面，尧棠给他的两个哥哥写了一封信，讲述了他心中的矛盾与苦闷。信中说“今天除了思念你们而外，我什么都不想。……这一年来我是天天走向孤独了。……然而我又不能不想念你们，我就是这样矛盾的一个人。有时候愤怒地对自己说：



你快些使自己被别人忘却吧，不要别人将来为你的不幸的生活而悲伤，不要使有一个人为你哭泣！然而便是这样，我也不能够忘记别人，即使我可以被人忘却。这一年来生活，尤其这半个多月，只要我见过他一面，只要他曾用和善的眼光看过我一眼，我就不能够忘掉他。何况你们是我曾经相依为命的两个哥哥……”

另外，他在船停靠在锡兰时，看了科伦坡大佛后，还给一个年长的姓沈朋友写了一封信。

“……我在过去的某一个短时期里，也颇有意皈依佛教。因为生与死的苦闷压迫着我，我也曾想在佛经中找到一点东西来解除我的苦闷，但是结果我并没有得到什么……佛教的理论纵然被佛教徒夸示得多么好，但是究竟是非人间的，超现实的。人间的、现实的苦闷，还得要人间的、现实的东西来解除……我想拿佛教的理论来解除我的苦闷，到头来我的苦闷却一天比一天地增加。我所见到的人们的痛苦，也是不能够拿玄妙的理论来解除的。于是我不能忍受下去了，便重回到现实的路上，做一个社会运动者，要用人群的力量来把世界改造，改造成一个幸福的世界，使将来不再有一个人受苦……”

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准备献出一切……”

人们知道尧棠离国赴法，根据他的愿望，是为了去学习经济学，考察社会运动，并进一步研究无政府主义理论。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一个虔诚的无政府主义信奉者。但是从他心底里发出来的这些斩钉截铁似的“信条”来看，他的思想实质，却往往充满了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灵魂的呼喊。

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将在几年以后，人们才会从他发展成为一个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作家这一事实，来找寻到答案……

2月22日海轮通过苏彝士运河，使他们有机会饱览到两岸茂盛的树林和秀丽的风景。船到了塞得港，虽未靠岸，人却能依靠小船划到岸边去。卫和彭觉得不方便，尧棠却鼓起劲头上岸，在海滨看了中世纪法国著名外交家勒赛卜斯的铜像。据说苏彝士运河的修建，是他发起并主持的，因此铜像的石座上刻着一行拉丁文，意思是“我开凿了这个地方”。而铜像勒赛卜斯左手拿着运河图，右手指着江海，眼睛望着地中海，他的形象，确是体现了那么一种很有抱负的神情。和尧棠一起上岸的是在科伦坡上船的一个英国人，他是医科学生，又是基督教徒，因而他要尧棠和他一起去参观了当地的一个教堂。回到船上，尧棠看见正在甲板上散步的卫、彭、邓、黎，禁不住高兴得自豪地说：“我总算到过非洲了！”

离开塞得港，船便进入了风大浪急的地中海，朋友们都感到非常不舒服，有的甚至呕吐不止。尧棠却照常能下床洗脸，进餐厅喝牛奶，这是出人意料的。两天以后，地中海风平浪静，而且天气晴朗，气候凉爽；经过意大利和瑞士，岸上美丽的景色，更吸引了船上人纷纷登上甲板向它瞭望。“明天就可以到达马赛了！”不知谁说了这么一句话，周围的人顿时活跃起来。在上海上船的旅客们屈指一算，都说：“海上三十四天的生活就要结束了。”尧棠感到这三十几天的日子，过得既长久，又好象很迅速，因为船上与大家结成的友谊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晚上尧棠在甲板上望着明月踱步，风吹着他的头发，他未免对这三十四天的生活有点留恋。但他又似乎急着希望明天快些到来，明天就可以到法国了。海上美好的夜景，这对他已无意欣赏了，夜是那样长，他也不想睡眠，他感觉到寂寞。他又想起自己的祖国，自己那不幸

的乡土，和他的两个哥哥。他想起白居易的诗：“时难年荒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途中。吊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这时大哥在成都，三哥在苏州，他们也会望着这轮明月思念远在国外的四弟吗……

### 第三节旅店深夜

第二天清早，尧棠终于结束了长达三十五天的海上放行，昂热号海轮在马赛码头靠岸了。

二月份的马赛天气，非常阴冷。一个四十多岁年纪的法国人，穿着大衣，缩着脖子，坐在沙发上，开始给大家验证护照。西洋人的护照检验完毕，轮到同船去的九个中国留学生。尧棠与卫惠林站在一起，正准备推让，那法国人已把他手上拿着的护照一把抓了过去，并即发问，“你从哪里上船的？”尧棠回答：“上海。”他又问：“到什么地方去？”尧棠又答：“到巴黎。”对方又问：“到巴黎做什么？”尧棠答道，“读书。”那法国人与坐在旁边的一个警官交换了一个眼色，便在护照上盖了个印，算是手续办好了。接着卫惠林也经过了同样的询问，就拿着护照回到房舱，让从旅馆来接客的服务员，把他们的行李拿去交海关检查，然后又让他们把全部行李暂时寄放到旅馆里去。

马赛街道很整洁，也很宽敞，高楼大厦随处可见。尧棠与卫惠林坐了电车到邮局，给在巴黎的朋友吴克刚拍了个电报，告诉他什么时候他们可以到巴黎。不久，他们就与其他一些留学生，在马赛一家大饭店吃了一顿中饭后，一起搭上去巴黎的火车。他们坐在三等车厢里，坐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9点钟，才到达巴黎的里昂车站。里昂车站非常热闹，也装饰得很漂亮。他们一下车，就有一个中等身材、比尧棠大几岁的青年奔过来，与卫惠林握手，这就是他们的共同朋友吴克刚。他又名君毅，早来巴黎，与卫惠林是老相识，和尧棠却还是第一次见面，虽然他们通信也已有两年多了。

吴克刚给他们预订好的旅馆在巴黎的Blanville街五号，这是一幢当时在巴黎很普通的给各国贫苦留学生住宿的大楼。尧棠住在三楼的一间灰色的房子里。窗外的光线被对面的高楼遮住了，如果把窗门关上，房间便一片黑暗；如果窗开着，冰冽的寒风却又受不住。才搬进去的第二天，尧棠一起床就感到有些头昏，而且浑身乏力，看来身上有热度，只好又回到床上躺下去。这时卫惠林、吴克刚却推门进来了，知道他身体不舒服，就给拿来酒精灯和牛奶，煮了牛奶让他喝。他一边喝，一边望着窗外，忽然看见天空有白色的东西在飞舞，而且玻璃窗上响起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卫惠林说：“下雪了。”这使尧棠更觉得四周寒冷。这时吴克刚正在旁边看报，说那个写《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的丹麦文学批评家乔治·布朗德斯去世；另一条新闻则是中国国内北伐军正逼近上海，看来革命形势又有了发展……

过了几天，尧棠的健康恢复，吴克刚就建议尧棠和卫惠林从Blanville街搬到Tournefort街去，那是巴黎拉丁区的另一家旧式旅馆，靠近吴克刚住的地方。尧棠和惠林同住在这个旅馆的一间屋子里。那时巴黎这种让单身穷人住的旅馆不少，每个房间都装有煤气灶，可以不依靠饭铺，自己烧饭吃。只是房间煤气味严重，也不太安全。从中国去的留学生，大部过着这样的生活。尧棠也是这样，经常准备些固体酱油，买点洋山芋、洋葱或其他蔬菜，配着几片面包，就把一日三餐打发掉。每月大概花二十多元中国币，就可以在巴黎过日子，到乡下就更加便宜了。

新的住处条件比原来的好不了多少，屋子很小，阳光常被对面的一所古老大楼遮住，视线也受到阻碍，无法望远。从窗口看下去，只能看到下面一条冷僻的小街，街角有一家很小的咖啡馆，零零落落的有几个人在这里进出。

虽然大哥曾表示希望他成为工程师，但尧棠仍觉得自己对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有兴趣，所以他想在巴黎进大学攻读经济系。因中途插班有困难，就先在法国文化协会主办的 Alliance Française 夜校补习法文，白天也偶然上大学听课。但更多的时间是在旅馆房间里看书。卫惠林则经常在图书馆中自学，白天很少在家。因此尧棠白天很寂寞，但由此也看了很多书，这些书的内容很杂，有政治的，经济的，也有史学著作，更多的则是卢梭、丽果、左拉和罗曼·罗兰这些法国伟大作家的作品。为了排遣寂寞，他自己也断断续续写了一些原打算给自己看的文字，后来就发展为他的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前四章。每天房间里偶然也有很大的声音，那就是有载重的装货汽车在这里驶过，街道就震动起来，房子也震动起来，周围好像发生了什大事。但车辆过去，顷刻又归于沉寂，周围的环境又回到原来那样。只有附近的圣母院钟声，仍按时向这凝滞的空气，带来几声单调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叹。

一到星期日，房间里便热闹了，因为在这个城市里，尧棠除了卫和吴之外，还有几个朋友，其中有作为勤工俭学的《工余》杂志主编李卓吾、冯紫岗。另外一些人，有的在学校读书，有的在工厂做工，这时便三三两两，赶到这里来闲谈。尽管他们信仰不同，性格各异，还操着各地口音，有时甚至还有在法国流亡的外国人，但都给尧棠带来讯息，带来新鲜感，使他感到兴奋。他们经常热烈地交谈，有时还讨论时局，各人谈各人的看法，其间也互相了解各人的生活，并由此了解到社会上许多事情，增长不少知识。吴克刚有个朋友亚丽安娜，是波兰的革命党人，有着金色的头发和美丽的眼睛，现在也在法国避难。她与吴克刚比较接近。从她和吴的谈话中，尧棠知道这是个了不起的女性。她有个母亲在华沙附近的一个村落里，还有一个比她大六岁的姐姐，因为参加革命运动被判罪监禁十五年，后来发了狂死在监狱里面。两年前，亚丽安娜自己也受过当时波兰政府的通缉。在一个深夜，在村狗狂吠的时候，五六个宪兵来逮捕她，幸亏她已接到一个朋友的通知逃走了。尧棠觉得这个故事很美丽，也很使他激动，他衷心祝愿吴和亚的故事能有进一步发展。

一到晚上，更多的时候则是尧棠与吴、卫三个人的热烈谈话。他们当时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都有热情的向往，而且都身在异国，生活上互相照顾，充满着友爱。但是他们既有相同的观点，也常有各种分歧的意见，却又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因此在他们之间经常进行热烈的辩论。星期日，别的朋友都来了，到晚上又回去了，却留下一些话头供他们三人争论不停。那天不知谁从报上看到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与北伐军占领南京的消息，谈起应该怎样看待当前形势问题，三个人就相互亮出自己的观点。起初，他们一致认为现在国内的形势已进入革命时期，但对有些无政府主义者不从实际出发，也不从事实工作，只空谈原则理论，感到很不满意。

屋子里在烧着开水，从煤气灶里出来的煤气味很浓，他们三个人并不计较，仍在幽黯的电灯光下说着话。尧棠和衣躺在自己床上，吴克刚坐在一只破椅子里，多卫惠林则走来走去讲着：

“无政府主义常常因为厌弃现有制度，而不愿去与闻现在的政治，甚至认为无政府主义只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运动，是一种道德的运动，这其实完全是错误的！相反，我们对现在的军阀政府的活动，及其对人民的影响，要充分加以注意！因为我们的革命，不是改换场面的革命，我们是在对抗有组织的敌人，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组织！”

听了卫惠林的话，尧棠也发表自己的意见。

“有些人说我们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不顾实际问题，我想这也无法否认。在一部分人身上，至少在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刊物上，有些理论不从实际出发。他们把原理奉为天经地义，由此来演绎一切。”

接着尧棠又说道：“他们说我们是反对战争的，于是对所有战争都加以否定。他们说我们是为人类谋和平与幸福的，于是连阶级斗争都反对。甚至一般群众运动也都不去参加，因此不与民众接近，不了解民众疾苦。”

关于这一点，吴克刚也禁不住说道：“是呀，无政府主义不应是一个空洞的学说，也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它应该是一个贫民的运动。无政府党应该时时刻刻与平民接近，到平民里面去，使平民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知道自己的力量，敢用自己的努力奋斗，去求得解放，不靠天，不靠皇帝，也不靠政府与伟人……”

屋子里冒出一股雾气，煤气灶上的水开了，卫惠林看了它一下，也管不得把水冲到热水瓶中去，就接着吴克刚的话头，发挥说：

“一般人都知道中国社会很坏，中国平民的生活都很苦。但是它究竟坏到如何的程度，苦到如何程度，原因是什么，却从来没有人去确实考察。我们目前虽不准备从事一次改变政权的运动，但是我们应该详细了解它。比如中国现在的形势，有些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那完全是国民党的运动，与我们不相干；另外有些同志则认为现代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参加国民革命工作。我想这两种想法，都不是正当的见解，因为现在……”

卫惠林的话不曾讲完，吴克刚觉察到他的见解和自己不一样，因为惠林不主张参加国民革命，而他是主张要参加的。这样，他就抢着说。

“中国现在确实是在革命时期，但它似乎与无政府主义本身没有直接关系。这次革命，虽不是一个纯粹的无政府革命，别的革命，也是革命呀！中国现在既是革命时期，那么，无政府党如果是革命者，就应该去参加革命，决不该借口现在的国民革命有许多缺点，有许多罪恶，就站在外面旁观。现在无政府主义者的问题，就在于太注重理论，却不管事实，太不知行动了”。

卫惠林反驳道：“中国现在的问题决不是国民党的政治方法，或武装行动可以解决的。我们决不能介入到他们的行动里去。相反，我们应该去把革命的色彩，更浓化起来，更猛烈化起来。我们不但要打倒外国帝国主义，还要去制止国内资本主义的发达，开辟一条人类完全解放的活路。自然，我们的目的不会在短时间中完全达到，但我们还是要朝向我们的道路前进。我们不能像定命论者所说的那样，无政府主义一定要经过……”

卫惠林激动地说完自己的看法，觉得很轻松，才注意到开水煮沸，就跑过去把煤气灶的开关关上。

但是他的话并没有说服吴克刚，他想再反驳几句，这时尧棠却从床上坐起来，虽然相对说来尧棠比卫和吴冷静了一点，但他的快话快说，仍可以看到他内心的激动：

“现在中国的革命，已不单是国民党的事情，而是整个民众的运动了。这一点，我在离开中国，刚上轮船时，就对卫谈过，因为我们不是看到过许多实际情况吗？成千成万的工人罢工了，许多青年人跑到战场上去作战，许多革命者进监狱受死刑，要说他们是妄想升官发财的人，是新的军阀走狗，是单纯的三民主义信徒，要说他们想建设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我是绝对不相信的。应该说，国民军的北伐是一回事，中国的革命运动又是一回事。半

殖民地国家为求民族独立而进行斗争，虽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目的，但无政府主义者决不能反对。同样，在我们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以前，对于打倒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不能反对。我对苏俄有意见，但我更恨列强；我恨国民党，但我更恨北洋军阀。因为苏俄总不比列强坏，国民党和北洋军阀也并不是一丘之貉。我们现在能把一个更好的东西给民众自然更好，否则，袖手旁观的空谈反对，在资产阶级的学者可以做到，但对一个革命家来说，这便是一种罪恶。”

尧棠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由于卫惠林与吴克刚正听得出神，还来不及插话，他又继续说道：

“我们要知道，参加这次运动的，并不纯粹是国民党人。比如一个罢工的工人，你能说他的意见会和蒋介石一样吗？他完全懂得三民主义么？他读过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么？参加战争的学生，你能说他的意见和他们的总司令蒋介石一样么？假若你注意到实际问题，你将知道事实决不如此简单。工人的要求常与他们切身利益有关，他们了解到的是北洋军阀封禁工会，压服工潮，帮助资本家，视工人如眼中钉，所以他们对它异常痛恨，他们要打倒它。他们这种举动，我们不能反对，因为这关系到他们切身的利益。总之，我们看问题要联系实际，不能空谈理论。对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的罢工运动，我们也要赞助，不能因为它不彻底而加以攻击。所以，作为革命家，对当前中国革命的漩涡，我们应该投身进去，不仅不应反对，就是袖手旁观也不应该。”

尧棠的话还没有完，卫惠林已经有点反感，禁不住插嘴问道：

“这样说来，我们的理想社会什么时候能够来到？”

尧棠接着前面自己的话头，又似乎直接回答卫惠林的问题说道：

“对我们无政府主义者朝夕所想念的，是怎样能使中国发生社会革命的问题。但是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知道社会革命的到来并不是由于我们个人的愿望所能决定，而是社会进化趋势所必至，只能由历史的需要来决定，个人的力量在一定范围内可以促进社会的进化，但不是社会进化的唯一要素。在这个问题上我与惠林意见不同，我是个定命论者，但请注意：定命论（Determinism）与宿命论（Fatalism）不同，它并不否认人类意志的作用，不过它要受环境的支配，他的努力有一定限度。根据现在的条件，要立刻实行无政府主义是不可能的，它不可能想象奇迹一样突然降临，它只能逐渐而来。总之，我们如果投身到中国革命中去，虽不可能立刻使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实现，但至少可以使我们接近中国民众，使运动多少带点无政府主义色彩，这样比袖手旁观攻击就好多了。对于国民党，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批评他们的主张，但决不应该用谩骂的口气。对于敌人，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的人格。自然，对于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孙传芳等野蛮军阀，又在例外。不过有人主张参加国民党，我并不赞成。”

尧棠的话刚说完，吴克刚立刻说：“尧棠的话我赞成，但对参加不参加国民党的问题我还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在现在革命时期，无政府党应用全力反对旧党，对于国民党可以暂时认为友党，予以同情，不加攻击。如果我们积极参加这次革命运动时，在国民党外起不了作用，那就可以考虑参加国民党内去。”

“我仍保留我的看法。假使你们两位同意，我们不妨各人写一篇文章，公开辩论，让大家去作判断。”卫惠林不服气他说。

“可以！有什么不可以？”吴克刚信心百倍。

“写文章当然可以。”尧棠说，“但是我考虑到中国革命正在走向高潮，而我们现在都身在国外，哪里还有说话的权利！而且文章性质又是鼓吹别人去做事，自己却置身事外，在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

“不要紧！写文章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就是对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吗？”卫、吴同声说。

“那也好。”尧棠终于同意了。

正在这时，突然听见外面有人敲门。卫惠林跑过去，把门拉开，只见两个法国人，睡眼朦胧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向他们提抗议说：

“你们中国先生睡得太晚了，讲话声音太响，把我们吵得睡不着觉！”

这才提醒房内的三个中国年轻人去看壁上的挂钟，这时附近的圣母院大钟也响起了沉重的钟声。“啊，是午夜一点钟了！”

三个人只得向两位法国邻居道歉。

吴克刚也忙拿起呢帽，披上大衣，准备回到自己的住处去。虽然他住得很近，但过了子夜，回去难免要惊醒大楼的看门人。无奈，只好再准备一次向人家鞠躬道歉了！

不过这一夜三个人的热烈辩论，不是毫无价值的。隔了一个时期以后，上海《民钟》杂志编辑部就收到了署名卫惠林、芾甘（即李尧棠）、君毅（吴克刚）的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的题目都是《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的》，观点却不相同，它们很快就被印成小册子单独出版，时间是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之前。

感谢巴黎拉丁区这家旅店的那个不平凡的深夜，它给后世提供了机缘，使我们了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革命中，三个留法学生，对祖国革命的热情向往，和对当时形势的各种不同看法。同时也为了解中国文坛巨人巴金，当他年轻的时候在二十年代，他对中国革命的理解，究竟达到何种程度，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资料。

#### 第四节卢梭像前

拉丁区的这家旅馆，它的好处就是附近有个卢森堡公园。虽然季节已经到了三月底四月初，公园内还是草枯树秃，行人稀少。原来巴黎的春天姗姗来迟。尽管如此，尧棠还是每天上午来这里散步，他觉得它比充满着煤气和洋葱味的旅馆五层楼宿舍，空气要新鲜得多了。他有时也拿一本书坐在这里的椅子上看，更多的时候则在这里踱步深思。公园的人不多，偶有三三两两的法国孩子进园内来玩，看见他，总指指点点，在背后喊：“中国人，中国人，”这使他更加感到身居异国，寄人篱下的寂寞。

他仍不时想念他的两个哥哥。他给他们写信，总是诉说着自己的寂寞和孤独。大哥来信告诉他成都家中经济虽还不曾宣告破产，但面临十分拮据的困难局面，已很难给他经济上的支援。在赴法前夕，大哥曾和尧林、尧棠说过，把家中的田卖了，兄弟各人可分两千元钱。尧棠动身时，大哥寄给他八百元路费，就是这二千元中的一部分，后来又寄来七百元，此后就再也没有寄了。他只好仍在夜校补习法文，有时也到大学作旁听生，白天则多半在旅舍狼吞虎咽地看书。一到黄昏，他有时从屋子里出来，也到附近几条街上走走，那时商店门都已关了，街上的行人也不多。他仰头四望，常感到自己好像被关在一道无形的门外，无法了解这个城市究竟有多少宝藏，多少双热情的手，或者多少颗冷酷的心。他觉得自己对它什么部不了解，都十分陌生。眼前他看到的，只是下过雨的潮湿的路面，和好像在燃烧似的泛红的天，以及像两块墓碑一般高耸着的圣母院的钟楼，并听到它悲鸣似的钟声。偶然也有几个行人在他身边走过，那是些穿着破旧衣服的工人和穷学生，以及头颈上套着狐皮围巾的中等人家的夫人和小姐，他们大多沉默着低头走路，偶然也有哼着低沉的悲叹调慢慢走着的，这景象使拉丁区的黄昏街头，增添了更多的哀愁。

尧棠经常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踏着快步走去上夜校，回来的时候，一般总在晚上11点钟以后了。那时街道更加静寂，一盏盏装着煤气的街灯，更加零零落落，更加黝暗，天在下着无声的细雨，他一个人走在国葬院（也就是先贤祠）旁边的一条路上。那里有一座卢梭的铜像，这个被托尔斯泰称作“十八世纪全世界的良心”、曾经填补过历史上长期空着的平民思想家席位的伟大哲人，他的形象深深地吸引着尧棠。他读过他的《忏悔录》。卢梭作为一个平民知识份子，既自信又自重。他厌恶巴黎的繁华和高贵的等级，鄙视上流社会的特权，无视专制主义的淫威，甚至拒绝国王的接见和赐与，全心全意地卫护着人的尊严。他生活贫困而知识广博，物质享受微薄而精神世界丰富。他追求真实，不惜袒露和忏悔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他的心灵像晴空一样纯净；而高贵的上层社会，他们千方百计装腔作势，把自己打扮得道貌岸然，却把不可告人的罪恶隐藏起来，其结果却只能造成他们的内心永远恶浊，如肮脏发臭的阴沟。

尧棠经常走到卢梭铜像前，望着那个拿着书本和草帽的巨人形象，情不自禁地去抚摩那冰冷的石座，犹如去接近自己所敬爱的长辈，站在他的膝下，向他诉述自己的寂寞和悲愤。卢梭对封建统治者和上层社会的无掩饰的反抗，终于被自己的国家驱逐出境，这与尧棠少年时代反对封建礼教，在祭神前不肯下跪磕头，看不惯长辈中间勾心斗角，忍受不了他们对年轻一代和婢仆的摧残迫害，终于毅然决然离开封建大家庭的经历，有很多相通之处。



国内传来消息，革命形势发生严重变化，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武装政变，国民党宣布清党，工人纠察队被缴械，上海总工会被封闭，大批共产党人和群众遭到捕杀。这使尧棠更加想念祖国，想念亲人，日夜牵挂着祖国正在进行着的这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而使他感到意外的是，某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个时候，竟与国民党反动派站在一起，甚至联名发电“护党救国”。特别使他失望的是那个曾到轮船码头来为他出国送行的朋友，竟在上海与李石曾等人合作办起一份《革命》周报，还写信给他向他约稿。尧棠立刻回了封信，说你们与反对革命的人合作已经堕落了，从今以后绝交，至于写稿更不用提了。

尧棠站在卢梭铜像前，为国内形势感到焦急。他由悲愤而转入沉思，由沉思而禁不住口中喃喃说着话，“真理是压不服的，妄图依靠刀枪来镇压革命，纵然伏尸万万人，流血万万步，也是没有用的，理想是杀不死的……”他觉得共产党人李大钊勇敢地走上绞架，临刑慷慨申辩，是个伟大的殉道者，值得钦佩。

那晚，他回到旅舍，把自己想的都写成文章，其中一篇题目便叫做《理想是杀不死的》；另一篇题目是《李大钊确是个殉道者》。为了与那些和国民党合流的无政府主义者诀绝，他又在几天以后写了《无政府主义者并不同情国民党的护党》等论文。这些文章后来都在美国旧金山出版的《平等》杂志上发表了。富有正义感和以人道主义思想作基础的尧棠，通过这次革命流血的教训，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认识，从这时开始逐渐清楚。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本来就没有严密组织，更无严格统一的党章、党纲，在这个时期，也逐渐分化，各人走各人的路。他们有的投靠了国民党，有的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终于成为共产党人。对尧棠来说，只是增强了孤独感。只有在卢梭铜像前，他才得到一些安慰。他虽然在十七岁时就开始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曾翻译过有关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和传记，但他从未整体地接受过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特别没有宣扬过无政府主义的根本实质，即要求恢复使用旧的生产工具和维持旧的所有制及生产关系。即使在法国时期，在这个国际无政府主义发源地和昔日的无政府主义者集中避难所，为尧棠所一直追求称颂的，也只是一些有关无政府主义者为革命而勇于牺牲的殉道精神。

面对着国内反动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屠刀，尧棠在这个时期特别神往于对反动统治者不屈反抗的英雄形象。他对李大钊的就义作了热情歌颂以外，还从现代世界史料中收集了大量的各国殉道者（其中许多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悲壮事迹。这些英勇的牺牲者动人的形象，日日夜夜在他的脑海里沉浮，他禁不住为他们流泪。

有一天晚上，他站在卢梭铜像前，忽然想起了白天在研读现代史过程中，所发现的1886年5月美国芝加哥工人领袖的殉道事件：美国芝加哥工人因为要求实行每日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罢工，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发生了爆炸事件，说有一个警察被炸死。接受了三百个大资本家十万元贿赂的芝加哥法庭，把八个与炸弹案毫无关系的“罪人”，分头逮捕起来，并即判成了“制造杀害罪”，说这些被告在演说和著作中的语言，促使那个至今在逃的不知姓名的人来杀害那个警察。他们把许多宣传无政府主义和劳工运动的小册子、传单、报刊都作为杀害警察的罪证。当年八月，他们把八个“罪人”中的七个人，判处死刑，另外一个尼伯，也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尧棠深为这个案件中的被告们在被判刑后留下的不朽遗言感动。

“我在这法庭上的讲话，如像一个阶级的代表向另一个阶级的代表发言。”第一个演讲的是司柏司，他原是《劳工新闻》的负责人，他的声音坚定有力：“正如五百年前威尼斯人发利里在法庭上受审时说的‘我的辩护就是对你们的控告，我的无辜受刑，就是你们的历史！’今天同样如此，州政府无法证明我和炸弹案有关，却判我以罪，这就断定你们在谋害我，我现在控告检察长和警察长是凶恶的谋杀犯！”

第二个发言的是迭瓦伯，他说：“现在的社会制度不是在天天杀人吗？未成年的儿童被迫干活，妇女们操劳过度而送命，却从未见有法律保护他们。芝加哥几万工人，挤在一个暗屋里，孩子跟着父母同吃猪狗食，死婴遍地，瘟疫流行，而富人高楼大厦，丰衣美食，还要饱暖思淫欲。这样的社会，不就是人吃人的社会吗？”

排字工人斐失儿说：“我虽然参加了那天大会的布置工作，但炸弹案与我毫无关系。我从未犯过罪，然而我知道有个人快要犯杀人罪了，这就是检察长格林奈尔。”

林格是殉道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只有二十一岁，是个德国籍木工，还能制造炸弹。但那天炸弹案与他无关，而且他并不在场。他说：“你们有什么证据来证明我的罪呢？你们说我蔑视法律和秩序，其实真正蔑视法律与秩序的倒是你们的警察。我向你们宣告：对你们，我赞成使用武力。当你们把我们绞死，千万人会来向你们掷炸弹。现在绞死我吧！”实际上，林格并没有上断头台，在执行死刑前一日，他就在囚室里用一颗炸弹把自己炸死了。资产阶级没有能够使林格受绞刑，他们自己却为林格的自杀而丧了胆。

另一个发言的是在1872年离开德国来到美国生活的工人恩格尔。他原来以为美国是自由乐土，一心向往自己能成为这个共和国的公民。但一踏上它的土地，他才发觉事实并不是这样。他说：“我发现在德国社会里看到的罪恶，美国也有。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原因。我在工厂里结识了一个同伴，他向我讲了科学的社会主义逻辑，他说：只要机器原料等仍是资本家私有，并得到国家保护，那么要靠我们的双手劳动来维持生活，那是不可能的。我这才知道美国的‘自由票箱’是一种美丽的神话，只要工人在经济上仍为奴隶，他们在政治上是不可能自由的。”

柏尔森司是最后一个发言者，他的发言长达几小时，最后他说：“我以为凡是自然界的富源，凡是社会上的财产，凡是文明的财物，都是历代劳工的成绩，应该属于人类全体，永远归大众享用。……你们以为使我们上了断头台，社会运动便终止了吗？呵！恐怕不至于如此吧！随着你们对我们的判决，将是美国与全世界人民对你们的判决，这个最大的判决，必将揭出你们的不公，替我们伸冤的。”在断头台上，柏尔森司极其安静，他的双眼向上望，注视着远处。接着，他又以责备和诚恳的眼光望着台下的人们，他说：“美国人允许我谈话么？执行官马曾，让我来说话：让民众的呼声起来吧！——”这时执行官受到行刑的号令，于是，在几分钟后，芝加哥的殉道者便一一离开他们眷恋着的关怀着的世界和人群了。

这些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牺牲的人们，他们临刑前的动人情景，深深印在尧棠的心中。他在白天把这些史料整理成文，还在文章中写上自己的感叹：“以这种至仁至勇的态度而就死刑的，古今来曾有几人！”到晚上，当他路过卢梭铜像前，又不免想起这些殉道者，觉得他们的精神，与卢梭彻底蔑视上层社会的高贵等级，要求恢复人与生俱来的平等自由的权利的意志，是完

全相通的。当年的美国芝加哥这一案件，由于殉道者朋友的请求，经过六年复查，新任的州长阿尔结尔德经手，终于发现当年法官受贿枉法的真相，证明当时警察用枪射击群众的举动，就是一种极大的罪恶，这样，他们不得不替殉道者平了反。

尧棠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歌颂，大都是为一些为理想而牺牲的人们的献身精神的颂扬，出发点很大部分具有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理想的内涵。当时他还把法国的三个理论家的著作，归给出下列几点为无政府主义者所具备的条件，那就是：“富有正义感和反抗精神，热爱自由，有纯正的品质和敏锐的求知欲及好奇心；举止庄严，生活朴素，能刻苦用功；能含笑受刑，相信殉道可以拯救人类。”尧棠认为“从这几点，至少可以知道无政府主义者是怎样的人了。”

他对无政府主义者下这样的结论，当然反映了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者确有一些道德高尚、富有正义感和反抗精神，并勇于殉道的人。但是这样的绪论同时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尧棠当年对无政府主义的认识有一定片面性，甚至可以说，他所理解的无政府主义，和当年某些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青年一样，他们所信仰的东西，实际并不是无政府主义，只不过是身处在封建礼教压迫之中，一种迫切需要自由解放的心理，正碰上比共产主义思想更早输入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这就使当时许多思想进步的青年，与它给了不解之缘。尧棠在出国前所写的二十几篇政论，和到巴黎以后所写的一些文章，很多地方都以无政府主义者自居，并不停地谈到无政府主义，奇怪的是他从未接触到无政府主义根本性的实质问题。这就是对于所有制关系的态度。十九世纪的无政府主义者曾以厌弃工业革命，主张丢掉蒸汽机、纺织机，向往回到手工业劳动时代为其特征；他们的一些先驱人物甚至还幻想农村实行公社理想化，企图把空中楼阁的“农村乐园”搬到现实世界，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而尧棠的言行和作品中，从未流露过这方面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具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本质，而尧棠所虔诚地信奉着的“无政府主义”和他所表示一再崇敬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的事迹，倒是大部分与卢梭式的人道主义思想和行为十分契合。

在有些问题上，尧棠也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存在着严重分歧，甚至不惜展开公开争论。当时他寄给国内一家刊物上发表的一篇叫《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的文章，是写给一个当时尚未见过面的无政府主义者李太一（笔名唯一）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不赞同你们所说，无政府党人以杀害特权者为义务的话。无政府主义者所反抗的是制度，而不在个人。制度不消灭，杀了个人，也无用的。……你把个人看得太重要了，社会革命之不能即时实现，并非由于某几个人之私意所能决定，这是受物质条件之限制的……暗杀有时反能妨碍宣传。如梭克逊的刺杀麦坚尼，布斯之刺杀林肯，结果对于主义之宣传并无丝毫的利益，反引起了一般人对于主义之厌恶。”

尧棠对暗杀问题的看法是很明白的。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写他的第一本小说《灭亡》，并描写了主人公杜大心，以暗杀手段从事革命，终于导致灭亡。他既同情死者的献身精神，又否定了他所采取的盲动手段。

尧棠的“无政府主义”，始终是在人道主义与民主主义思想里打兜的，也就是说，他始终站在卢梭铜像前，喃喃地说着话，而这些话的意义他说自己有时也不懂，其实正是站在他面前的那个拿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公民”，是他把“十八世纪的良心”交给了这个中国未来的大作家。

巴黎，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国际上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曾在这里避难，尧棠在这里结识了一些人，但是他还是经常感到寂寞，和他最合得拢最相契的，还是这个站在先贤祠广场上的巨人。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某些地区许多人为饥饿而哭，某些地区又有许多人在被任意屠杀，他几乎每夜都伏在卢梭铜像前，诉说着自己的绝望。听到圣母院沉重、悲哀的钟声响了，他才离开这里，向热闹的圣密雪尔大街走去。那时他不想到谁的地方去，也不想和谁说话。他只是随便散着步，他看见了不少人和物，许多朴素而愉快的面貌在他的眼前过去了，接着又有不少忧郁的被工作与生活摧毁了的面貌迎上前来。在他的耳边响着从咖啡店传出来的音乐，笑语和歌唱，同时他也听到一些悲哀的谈话和诉苦。他并不厌弃这个城市，他觉得它并不坏，但是他感觉到它对他是既亲切又陌生的，在它这里找不到自己所要求的東西。他觉得这里的每个人、每间房屋都

他感到孤寂。

## 第五节 牺牲在电椅上的“先生”

不久，尧棠迁居。他原和他的好友卫惠林同住。这次搬到吴克刚住的一幢大楼里，但还是那么一家古旧的旅舍，房间还是充满着煤气和洋葱味。他还是靠自己房间里的煤气灶烧饭吃，每顿还总是一些洋山芋之类的蔬菜，加上固体酱油和两片面包。

有一天上午，尧棠从图书馆回来，在旅舍大门口正碰着亚丽安娜。尧棠知道她和吴克刚关系亲密，她是来找克刚的。这个有着金色头发的女郎平日愉快的笑容不见了，今天的脸色是忧郁而又悲哀的。她递给尧棠一封给吴克刚的信，要尧棠交给吴。尧棠问她：“不上楼去坐坐吗？”她苦笑了一下，说：“有急事，不打扰了。”尧棠上了楼，先到吴克刚住处，只见门虚掩着，推开门，见克刚正伏在案头写字。他喊了一声，“老吴，亚丽安娜有信给你。”吴克刚连忙站起来接信，样子很兴奋，但当他把信拆开看后，脸色立刻变得苍白，声音颤抖，痛苦地说道：

“她被驱逐了！”

啊，这个金发女郎向他们说过，她曾在许多国家流浪，如果她在巴黎再被驱逐出境，就没有地方可以让她居住了。现在她怎么办？吴克刚告诉尧棠，她在信中说她只好冒着危险，回到华沙去，说不定她一回到祖国，波兰法西斯政府就会将她逮捕。她家中的几个亲人都先后牺牲了，这次她回去，即使不被逮捕，她的生活将怎样过？尧棠很替她焦急，克刚心中更加难受。亚丽安娜信中告诉克刚，她们一共有五六个人被驱逐出境，其中四个已被迫当天离开了巴黎，只有她一个允许再逗留三天，她急于向各方面联系，已没有时间与他长谈了，只希望他留给她一件纪念品，让她带回国去。

尧棠回到自己房间里，心中茫茫然，在煤气灶上胡乱烘了点东西吃后，就又孤独地上街散步。他怀着一颗空虚的心，在马路上彷徨着。他感到疲倦，又觉得无所适从。好像这世界尽发生一些使人悲哀的事，令人绝望。他非常同情亚丽安娜的处境，也为他的好友吴克刚悲伤。但他毫无办法帮他们的忙。他茫茫然走进一家有许多法文书的书铺。他对英文书更感兴趣，因为他的英文要比法文熟练得多。在英文书架上，他一本本地翻看着，忽然看到一本书，是一个意大利的鱼贩子叫凡宰特写的小书，中间有一段话，映现到他的眼里，立刻又深入到他的心灵中：

“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嘴都有面包、每颗心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才智都得到发展。”

他觉得这话讲得太好了，太符合他的愿望了。他把这本书交给了店员，向他付了钱，把书买了回来。同时又买了二三本与这鱼贩子有关的书，只花几个白天和晚上的工夫，就把它读完了。他发誓要把它们翻译成中文。因为在他的心中出现了一个巨人的形象，他一开始就觉得这个可敬可亲的长者，是个不平凡的人。

凡宰特是十九世纪末叶意大利一个农民的儿子，他自幼很爱读书，但因为贫困，十三岁就外出做工。在他亲爱的母亲去世后，他便离开自己的祖国，到美国去找生路，但是他把纽约街头走遍了，却始终找不到工作。那时美国正发生经济危机，穷人露天睡觉，白天在垃圾桶里捡白菜叶子吃。凡宰特只好到乡镇去碰运气，但是工厂、田庄都回答他没有工作做。饥饿把他累坏了，他的身体已变得弱不禁风，最后终于投身到制砖厂、石矿厂去做小工，生活

困苦，工作繁重，但他还是坚持读书。他研究了克鲁泡特金、高尔基等人的著作，也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马志尼的《人权论》。在现实生活中，他懂得了怎样去爱别人，去同情别人，他也明白了什么是阶级意识，那些人和自己一样，是靠微小的工资养活自己的人。明白了这些以后，他就再也不做被奴役的牲畜，而要求做堂堂正正的人了。由此他还结交了很多朋友，相互的理想使他们成了莫逆之交。此后，凡宰特又到纽约去，在那里的饭店、旅馆里做工，尽管他很勤劳，工作也很出色，不久都被辞退，最后到普立毛斯。在那边的所有公共事业中，几乎都有他的劳动和踪迹，而在制绳公司的工作过程中，由于他在一次罢工风潮中进行活动，又被辞退，而且从此再也找不到工作了，因为老板们发现他常在工人集会中演说。他由此不得不改行，成为一个工作比较自由的鱼贩子。1920年5月，即在凡宰特三十二岁那年，当他正准备召集群众大会抗议他的一个同志在警察署被害事件时，他突然被捕了。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他的好友萨珂。

现在，全世界都已知道，波士顿的法隆已把一个凶恶的罪名，加在凡宰特和萨珂的头上。他们说他俩是一桩抢劫案的凶犯，并判他们死刑。法庭拿不出罪证，只说他俩有“犯罪的意识”。凡宰特在牢狱中写的自传中还说：

“我的心里萌发着博爱的根，怀着对人类的爱。我从众人的自由中去追求自由，在众人的幸福中去追求幸福，我用我的诚实的血汗挣来我的面包，我的手上从不曾沾过一滴他人的血，我的良心是极其洁白的……我相信人们很难完全控制自己，但真正的智慧在于宽容……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房，每张嘴都有面包，每颗心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才智都得到发挥……我以我的慧眼，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了。”

尧棠读了这部传记，心中像雨后的晴空，豁然开朗，他不但下决心要把它翻译出来，而且他控制不住自己心中的激动，还动笔给这个正被关禁在波士顿监狱里的受难者写了一封长信。这时，这两个意大利工人，在美国死囚牢里已被关禁了六年。六年前，他们被诬为杀人的抢劫犯，上诉八次都被驳回。鱼贩子凡宰特和鞋匠萨珂终于被宣告将在7月10日处以电椅烧死的极刑，全世界都震动了，各国报纸都刊登了要求伸冤的群众来信。巴黎街头墙壁更是贴满了各种海报，在尧棠住的那条寂静的街上，旅舍对面的咖啡店门口，就有人张贴了《死囚牢中的六年》的大幅广告，印着“讲演会”、“援救会”、“抗议会”的开会日期。有的马路墙上，还摘录了凡宰特在自传中写的话。虽然如此，波士顿法庭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当时有一个杀了银行会计的凶手马结诺司在法庭上供认，他和几个同伴是1920年制鞋工厂谋杀事件的凶手，这就证实此案与凡宰特、萨珂两人完全无关。如果法庭能根据这个供词重新审讯一次，那么这两个意大利工人就可以平反出狱了。但是法庭竟不肯受理。消息传出，尧棠更为悲愤，他在几年以后回忆当时自己的心情，说：“我是怀着一种感动而紧张的心，像到耶路撒冷进香的耶稣教徒那样地虔诚，坐在我的寂静的屋子里，用大张的信纸将我的胸怀，我的悲哀，我的挣扎，我的希望……完全写下来。”

尧棠的信发出去了，信是寄到波士顿，请萨、凡援救委员会转交，然后，自己又怀着恐惧等着7月10日这个可诅咒的日子到来。那时法国的声援运动十分热烈，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巴比塞和科学家爱因斯坦也发表了宣言，反对对这两个人判处死刑。报纸有关他们的消息也越来越多，经常看到有妇女和儿童为这两个囚犯呼救，同时又看到这个鱼贩子又从监狱里不断地向世

界各地发信。

一个阴雨连绵的早晨，邮递员给尧棠送来一份邮件，那是一包书和一封来信，是从美国波士顿寄来的。啊，那是凡宰特从监狱里寄来的复信。信纸共有四大张，每张都是两面写的，他用恳切的话来安慰、勉励尧棠，请他“不要灰心，要高兴”。他还向这个热情的中国青年，谈起人类的进化和未来的形势，还谈起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以及其他许多人。后来他又说：他应当使尧棠明白这一些，提高自己的勇气，以应付面临的生活的斗争。他谆谆叮嘱尧棠，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要帮助人。随着凡宰特的信寄到，救援委员会还给尧棠寄来凡宰特的自传《一个无产者生活的故事》，以及其他一些宣传品。

尧棠的感动是不言而喻的。他痴痴地坐在桌子前，好像是在做梦。他把这封信读了又读，他觉得一个革命者能在临刑前夕这样地关心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的前途，这种精神是多么可贵，还有什么比这封信更使人感动呢？他流着泪，马上又给这个波士顿囚犯写了封信，告诉他：自己有了生活的勇气了，自己再也不怕有一天会灭亡了。同时他又加了一把劲，很快把那本寄来的《一个无产者生活的故事》译了出来，并寄给上海一家杂志发表了。后来收集在《断头台上》一书中。

就在这个令人坐卧不安、无限焦虑的时刻，尧棠在他的练习本上，写了《灭亡》的第十一章《立誓献身一瞬间》。在那里，他通过小说中的人物李静淑的话，来表达了他当时自己的心声：

“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的罪恶应该由我们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

也就在这个时候，尧棠的周围环境发生了变化，亚丽安娜的四个朋友当天就被逼离开了巴黎，亚丽安娜还容许有三天的逗留。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形势稍趋缓和，亚丽安娜又被允许暂时留一个时期，而那时吴克刚却先回国了，亚丽安娜是在吴克刚走后才离开巴黎的。在他们两人离开巴黎之前，尧棠去医院里检查身体，发现旧病复发。医生劝他到乡下休养。当时法国农村生活费用较低，中国许多留学生大都到巴黎郊区过暑假。吴克刚在离法前为他介绍了沙伦河畔一个小城沙多一吉里的熟人。那边有一个拉封丹中学，可供他寄宿，还可以有机会学法文。在他临去沙城前一天，忽然听到一个消息，说美国麻省省长迫于世界人民的强大呼声，不得不把凡宰特、萨珂两人的刑期推迟一个月。尧棠看见一家咖啡店门口，人们正在互相握手，庆祝这个消息的到来。人们相信，新由麻省省长聘请组成的“顾问委员团”三个委员——哈佛大学校长、麻省工艺专门学校校长和一个退職的老法官，他们会给大家带来希望。

尧棠来到玛伦河畔的沙城，这是1927年夏天。这个小城在巴黎东约一百公里的地方，附近河边有树林可以散步。他住在拉封丹中学里，环境比较安静。他在那边养病，同时补习法文，还看了很多书，并根据英文本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八月初的玛伦河畔，气候温暖，天空明朗，有一天，尧棠从树林里散步回来，接到凡宰特7月23日寄出的第二封信。这封信开头就说：“青年人是人类的希望，”接着他依旧用非常乐观的笔调谈未来，他认为只要我们不灰心，不绝望，努力前进，变革总有一天会到来。这封信是麻省省长宣布对他

们的刑期（7月10日）推迟一个月后写的，而现在新的限期（8月10日）又快到了！

尧棠焦急地等待着从美国来的消息。但是小城没有晚报，也没有人能接到什么电报，他的周围只有几个一起从巴黎来的同学——学哲学的安徽朋友詹剑峰，曾在巴黎一家工厂从事制图工作的山西朋友岳焜，和后来不幸自杀的巴恩波，这些人都是中国留学生，他也无从向他们打听消息。他只能坐在书桌上翻阅旧报纸，读到美国有一个小说家派苏司，曾到监狱去访问凡宰特写下的文章：

“凡宰特坐在一张凳子上，身体粗大，但精神很平静。他有浓密的胡须，微笑时却不抖动嘴唇。我向他致问候之意，他说，他身体很不好，原该更勤苦工作，因要写的东西太多，每天花三个钟头时间读报、写信、作文，其余的时间则在工厂从事制造汽车铁板劳动。他又说，在监狱里写东西很困难。以前在劳动十个钟头左右以后还能坐下来写，很少错误，现在不行了，在囚室写作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反复修改，因为条件差，心思不集中。

“我们在谈到一些教士、牧师攻击他的宣言时，他说那是因为他是无神论者，如果现在他去向他们谦卑地说：神父呵，我现在忏悔了，请赦免我吧！那他们便会帮助他的。……

“凡宰特又说：他拒绝一切宽恕减刑等等的请求。他本来就是无罪的，为什么要求宽恕减刑呢？他说话时很安静，声音一点也不发抖。”

这些旧报还登载着法国援救会的两份电报，一份是给萨珂的：“刚刚读了你给你小女儿的告别信，它使得一切有良心的人都感动了。人家读了这封信以后，还能够杀你吗？我们爱你，我们怀着希望。”另一份电报是给凡宰特的：“我们很悲痛，然而全世界都站在你们这一边，我们不相信美国就会立在反对的地位。你们要活着。你妹妹今晚上船，她应该来得及跟你拥抱，并且替我们吻你。”

这些报道，尧棠虽然过去读过，但今天重读，仍无法使自己的心平静下来。他再次找出自己的练习本，在空页上随着自己的思想匆匆地写着：

“革命什么时候才会到来……我实在不能够再忍耐了。

“……如果杀能够建立起崇高的理想，带来人类的幸福，那么为什么人类至今还会被囚在一个圈子里互相吞噬、互相残杀呢……”

这些当时匆匆写下来的话，后来都用来写在《灭亡》的第三章和第二十章上。

8月11日下午，尧棠读当天巴黎的日报才知道，这两个意大利无辜者，美国麻省当局又把他们的死刑执行期推迟了二十天。这些报纸把这条新闻作头条，有的还以整版篇幅刊登有关这方面的读者来信、专家言论及各界人士的愤怒抗议书，要求把他们立刻释放。有家美国报纸还报道最近一个时期的美国当局的窘相，说他们的国旗在世界任何地方挂起来时，就要派人加以保护，否则就有被撕破的危险。至于美国驻各国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就更不必说了，他们几乎天天受到群众的包围。

尧棠看了这些报道，不觉松了口气，他以为这两个他所崇敬的人，他们的生命不致再受到什么威胁了。他不相信美国政府会继续谋害他们，特别那个哈佛大学的校长，他怎么能同意自己去充当杀人犯呢？

谁知事情出乎意料，1927年8月22日，波士顿法庭中的刽子手，在黑暗的午夜，把这两个代表着“二十世纪良心”的意大利工人准时推上电椅，



执行了死刑。波士顿的午夜，是巴黎的早晨 5 点钟，法国报纸还来不及在当天报上发表这则突如其来的新闻，他们只好在 23 日中午发了一次号外。尧棠这时在巴黎一百里外的沙多—吉里城，到 24 日下午才在当天的巴黎《每日新闻》上读到这个使人震惊的消息。消息一开头就说：“罪恶完成了！两个无罪的人为增加美国官僚的光荣而牺牲了！”还有的报纸在第一版上写着这样的大字：“全世界的良心为两个无罪的人的死而变成黯淡。”还有的报纸发表言论，他们说：“无罪的人被法庭执行了死刑，有罪的人，你们必将受到人民的审判！”尧棠的一个朋友，从巴黎给他寄来一张明信片，说：“两个无罪的人已经死了。但在等着的是那些有罪的人的死！我告诉你时间不会等候得很长的！”

尧棠绝望地在屋子里踱了半天，那时他一个人住在学校饭厅楼上一个大房间里，学校还没有开学，周围环境非常安静，但是他的心却异常激动，他所敬爱的凡宰特，那个曾从波士顿监狱，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为他写过两封长信的鱼贩子，现在与另一个革命者萨珂，一起被资产阶级杀害了。尧棠一天没有出门，但他仍仿佛看见在街头，在公园，在咖啡店里，在各处都有人民在流泪，在哭泣，在控诉，在呼喊。明亮的天空忽然变得阴暗起来，好像太阳也为这两个无辜的人挂起了黑纱，似乎整个世界都在沉落。但他又仿佛听见凡宰特在向他诉说：

“不要灰心，要高兴起来！青年是未来的希望！”他觉得，他也需要控诉。他写了一天的信，寄到各处去，向那个“金圆国家”提出抗议。但是这样，他的心还是没有得到平静。他又一连几天，在他的练习本上，写了《灭亡》的第十七、十八、十九章。

不久，尧棠又从报上了解到萨珂和凡宰特临刑时的神情。据说当晚 10 点 48 分，狱吏来通知，说他们要在今晚受刑了。萨珂在深夜 1 点 11 分被带进刑场，他的身体异常衰弱，然而两眼放光，以坚定的脚步走到电椅上坐下。他用意大利语叫道：“革命万岁！”然后用英语说：“别了，我的妻子，我的小孩，别了，我所有的朋友。”最后他讲了一句：“别了，妈妈。”电流即开始通过他的身体，到 1 点 19 分，医生才宣告他气绝身死。狱吏刚把萨珂的尸首搬到一个屏风后面，凡宰特便被带进来了。凡宰特异常平静，不露丝毫惊恐之色。一进刑场，他便向电椅走去。他握了狱吏的手，向他说：“谢谢你，为我做了一些事情，”然后，他便向旁观者说道：“诸君，我愿意告诉你们，我是无罪的。我从来没有犯过罪。我什么罪都不曾犯过。”最后他说：“我愿意宽恕那些对我不好的人。”他还想把话说下去，但是刽子手已把盔兜笼罩在他的头上了。过了六分钟，他的生命就不再存在。

一个时期以后，尧棠译完了鱼贩子凡宰特的自传。他在那本传记的前面，写了一篇题目叫“呈献给吾师凡宰特”的短文，作为“代序”。那短文说：

“……你在电椅上，在临刑的一瞬间，还像神话上的耶稣那样高呼‘宽恕’。我知道在你的那颗爱字铸成的心中是没有‘憎’和‘报复’存在的。……然而现在我要跪在你的面前，求你的宽恕。吾师呵，原谅我，……至少对于那些吃同类，杀同类，压迫同类的人，我是不能爱的，我是不能宽恕的。”

凡宰特是尧棠接受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的又一个“先生”。但是，尽管尧棠非常崇敬凡宰特，对凡宰特的信仰从未发生过怀疑，而尧棠还是从凡宰特的被诬受害经过，接受了教训。“对于那些吃同类，杀同类，压迫同类的人，我是不能爱的，我是不能宽恕的。”这样的人道主义，才更接近于卢梭的精

神。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尧棠回国，很自然地接近鲁迅，并被鲁迅认为“是一个有热情的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因为他们两人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即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后来也说过：“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他的人道主义就在于爱憎分明，是非清楚。宽恕是有一定范围的，“损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恕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这与尧棠的“对于那些吃同类，杀同类，压迫同类的人，我是不能爱的，我是不能宽恕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 第六节从玛伦河畔到马赛海滨

玛伦河畔的沙多一吉里，是个古朴的小城，尧棠在这里差不多住了一年零二个月，虽然由于凡宰特与萨珂的被害，带给他很大的悲痛，但沙城许多朴实善良的人们，像对待远方的亲戚一样看待他，使他感到温暖。

他寄居在拉封丹中学饭厅楼上的一个大房间里。这个学校以十七世纪法国寓言诗人拉封丹命名，是因为拉封丹出生在沙城农村。尧棠来这里养病并补习法文，比他来得更早的中国同学是安徽人詹剑峰，他学哲学，却欢喜陆游的诗，尧棠经常听到他在隔壁卧室朗诵《剑南诗稿》。另一个中国同学，山西人岳焜，住在学校的学监宿舍隔壁楼上。他是巴黎灯罩厂的设计师，过去也曾在这里学习，现在因为神经衰弱症，来这里休养几个星期。三个人每天很早起身，特别在暑假里，学校里的人都回去度假了，连总学监也只每星期来一次，看看没有什么事就走了。整个学校变得那么清静，除他们三人，只有管门的古然夫人和她的花匠丈夫。

古然夫人头发花白，年过六十，她总是微笑着，像母亲等待着孩子那样，来接待这三个中国青年到她的餐室、也就是门房来进一日三餐。尽管她称尧棠为“麦歇李”（法语李先生），尧棠却从那和蔼慈祥的笑脸上，看到像母亲那样亲切的样子。她的丈夫经常腰系围裙，在校园里劳动，和她一样纯朴诚挚，也从不曾把他们看作寄人篱下的异国人。

尧棠总是每天早晨从古然夫妇那里带来温暖愉快的情绪，一个人走出校门来到玛伦河边的树林里散步，有时他带着一本惠特曼诗集，或者一本左拉的小说，坐在林中的石凳上翻阅着。还有的时候，他们三人一起出门来，高兴地讲着话，边走边谈论问题，然后他们散步回来，各人走进自己的房间，各人做自己的工作。他们偶然也沿着古堡脚下的小路走到街上，那是到桥头花店为校长夫人和他们的十一岁女儿玛丽波儿买祝贺生日的鲜花。花店有一个金色头发的卖花姑娘景丽，她那苹果似的笑脸，看见这三个中国青年走过，即使不买她的鲜花，也总要向他们亲切地招呼“您早，先生。”或者“您好，先生”。理发店里那个年已五十岁左右的理发师，对他们也很熟悉，他在为尧棠理发时，曾为发现他的第一根白发，关心又惊异地笑问：“你头上出现白发？这样年轻。”这也给尧棠留下过亲切深刻的印象。在沙城大街的格南书店，则是尧棠经常去的地方，他不但在那边买过左拉的书，还曾在那里买到过十本硬纸面练习簿，用来作为他写的第一本小说《灭亡》誊清稿本。

就在1928年那个夏天，有一个早晨，他从玛伦河畔的树林里散步回来，古然夫人在门房里递给他一封刚从中国国内寄来的信，那封信经过西伯利亚，打了黑色的邮戳，信封上的字迹，一看便知道是大哥尧枚从成都寄来的。尧棠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把信拆开，大哥在信里写了满满的几张信笺，他一字一句读了，觉得字里行间充溢着兄弟的感情，但语气伤感，还是希望尧棠能和他一样，把维持成都大家庭的担子共同担负起来，“兴家立业”，以慰父母与祖父在天之灵。尧棠读了信，心里非常难过，他觉得他爱大哥，但大哥与他想的太不一样了。大哥是封建大家庭的受害者，他吃的苦比别人还多，连他自己也厌倦这种旧的制度，和旧的生活方式，但他竟还要求他的兄弟与他一同来维护这个封建门庭，以争取“光宗耀祖”！这与他的想法有多么大的距离！他觉得他一定要让大哥来了解自己，请他谅解，他绝不能走大哥同样的道路，他要反抗，他要革命，他对成都的家，早在几年前就从心头把它

丢开了。

他从箱子里取出一年多来断断续续写的一些场面描写和随感录，看了二三遍，决定把它们整理改写成一本有情节有思想脉络过程的小说，让大哥日后可以有机会读到。他愿意有一天跪在大哥的面前，把书献给他，希望他能真正了解他，抚着他的头说：“我懂得你了，从今以后你无论到什么地方，你哥哥总是爱着你的。你就飞向远方吧。”从这一天起，尧棠认真的写起小说来了。他只觉得自己有话要说，有感情需要抒发，却从来不曾想到要做个作家。每天早晨，他踏着松软的泥土，来到树林里散步，听着小鸟的歌唱，闻着林外麦田的麦香，构思着故事里的人物，细节。有些现实生活中的人事，经过他的加工创造，都慢慢地从一些模糊的影子，变得完整具体起来了。李冷，李静淑，杜大心，张为群，以至于袁润身……这些人，都在他的脑海里，也在他的小说里活了起来。他写这部小说，充满着感情，充满着自己的爱和憎，他几乎把自己心里想的东西，全部从人物的嘴里、心里和行动里表达出来。但是也正因为这样，作品里显露了他当时的苦闷和思想矛盾。他有满腔的革命热情，有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强烈憎恨与反抗，但他不知道革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因而小说里的人物，也就反映了当时在茫茫然走着人生道路的知识份子的苦闷。

他只花了半个月的工夫，就把以前写的一些章节整理修改完成。他把它们誊清在格南书店买来的硬纸面的练习本上，共用去了五本。还有五本空白的，他后来带回国来，留作纪念。他把这五本誊清稿，交给了住在他隔壁房间里的詹剑峰看，詹剑峰虽然学哲学，却对文学作品也饶有兴趣，他很欣赏尧棠的文学写作才能，对他的第一本小说说了不少鼓励的话，还指出它在文字上的个别疏漏处。他对尧棠把他们两人的共同朋友桂丹华的爱情故事放在小说中的袁润身身上，觉得亲切，但他也理解尧棠的不安情绪，因为袁润身在小说中是个丑恶的人物，而他们的同学桂丹华却是个善良的人。桂丹华当时虽已离开拉封丹中学，到外地大学去读书了，但书中运用了他在信中向他们诉说的与一个法国少女恋爱的故事。尧棠总有些过意不去。因而詹剑峰很同意尧棠以后有机会准备为桂丹华那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另写一篇作品。这件事尧棠回国不久，就果然把它实现了，这就是他后来写的一篇题目叫《初恋》的短篇小说。詹剑峰对尧棠的第一本小说中描写袁润身的“一个爱情的故事”，还提了个意见，认为袁润身所说“我们便定了一个幽会的地方”的“幽会”应该改为“约会”。尧棠觉得他提得很对，就照他的意见改了。

詹剑峰是尧棠的第一本小说的第一个读者（这个人几年前还健在，是华中师范学院的一个教授），他对尧棠的处女作的认真阅读，增强了尧棠从事写作的信心，他准备自己花钱，把它排印出来，让成都的大哥和已从苏州东吴大学转到北平燕京大学读书的三哥尧林去看看，并打算送一些熟朋友。他觉得印二三百本就够了，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在刊物上公开发表。他把书名称作《灭亡》，署名一时想不出用什么笔名。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听说同学巴恩波在项热投江自杀，尧棠感到震惊，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死，他感到痛苦，为了纪念这个同学，就想到把这个《百家姓》上很陌生的“巴”字用作自己的笔名，只是还缺个字，恰好这时詹剑峰从外面进来，他见尧棠正为自己的笔名苦苦思索，一眼看到桌上放着英译本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就笑着建议用那个“金”字，尧棠接受了，就在“巴”字后面加了个“金”字。

“巴金”的名字就开始运用了。

巴金把《灭亡》的五本誊清稿寄给了在开明书店工作的周索非，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索非收到《灭亡》书稿后，并未按照巴金的计划去为他自费排印，却把它交给了正在为《小说月报》做代理编辑的叶圣陶。当时这家刊物的编辑是郑振铎，他出国去了。叶圣陶经手审读了这部作品，并决定发表。当时远在法国的巴金不知道，他把书稿寄出后，就几乎把这件事忘掉了。由于巴金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因而增加了他与詹剑峰、岳焜两人之间的谈资，他们三人从事的事业不同，对文学艺术却有共同的爱好。巴金看的小说最多，古今中外名家名著，包括中文本，英文本，法文本，凡是小说他都看，当然这个时期他看得最多的还是法国的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等人的作品。他从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学习到怎样把写作与生活结合在一起，又怎样使自己把心交给读者。在沙城那年的八、九月间，他特别热衷于读左拉的小说。岳焜在法国住得较久，在法国看的戏多，他经常向两位中国同学谈论法国舞台的演出剧目，和银幕上放映的影片。有一次，巴金向他谈起左拉的小说，他便讲起法国舞台上根据左拉小说《酒馆》改编的戏，戏中演员怎样认真地表演，主人翁柔尔瓦丝和她的丈夫与女儿的思想感情，讲得非常动听。第二天巴金在散步时，走到格南便把左拉的小说《酒馆》买了来，花了一天半的时间就把它读完了，接着他又设法找到《酒馆》的续篇《萌芽》和《工作》，了解了左拉怎样写柔尔瓦丝的两个私生子的故事。不久他们三人谈起了左拉这几部小说的连续性，刚读过《灭亡》书稿的詹剑峰就笑着问巴金：“你的《灭亡》也准备写续篇吗？”这一问，倒真的引起了巴金继续创作的念头，他想《灭亡》的主人翁杜大心和张为群虽然死了，但活着的李冷和李静淑，今后将会怎样生活？他们前进还是后退？勇敢地活着、战斗着，还是消沉、沦落？他觉得继《灭亡》之后，还应该有一部《新生》。

暑假以后，他们三个人又回到巴黎，各干各的去了。巴金准备取道马赛回国，因为他在法国已将近两年了，他的生活再也无法获得大哥经济上的支持，他决定回上海找工作。就在巴黎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又另读了左拉的其他著作，不少仍是《卢贡——马加尔家族》这套丛书里的小说，都与这个家族后代有关的故事，这使尧棠得到启发，他想把原来写作计划扩大，准备在《灭亡》前后各加两部作品，使它成为五部连续小说，而且五部作品的书名都想定了：《春梦》、《一生》、《灭亡》、《新生》和《黎明》。

那年10月中旬，尧棠正准备离开巴黎去马赛乘船回国，那天忽然发现身份证需要沙城警察局的签字，才可以到中国公使馆去办回国签证。因此他又买了一张来回的车票，匆匆地来到沙城。啊，这曾经在一年零二个月时间带给他无限温暖的古朴的小城，曾经像母校那样接待过他的拉封丹中学，曾经像慈祥的母亲那样关心他并为他提供一日三餐的古然夫人，现在他要与他们分别了，还有那住了一年多的饭厅楼上的宿舍，和学校后院的苦楝树，以及校门外他们散步的玛伦河岸上的树林、麦田，也都将长留在自己的记忆中，但是他现在来得那么匆匆，去得那么匆匆，无法再逗留一些时间了！他感到惆怅，但又没有办法。

10月18日早晨，巴金到了马赛。他原想当天搭船回国，但是因为海员罢工，向东去的轮船一律停开。他只好从轮船公司出来，在一家小旅馆内的五层楼租了一间小房住了下来，一时不知道海员什么时候能够复工。这家旅馆叫美景旅馆，地方就在海边，望得见马赛的海景，它为巴金的思想飞向远方创造了条件，他利用这段时间，又看了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这

套书的其他几部长篇，小说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加强了他对自己心中酝酿的小说人物形象的联想。他盘算着回国后将怎样从事自己的长篇创作，甚至他对计划中将写的四部小说主题内容都考虑好了，《春梦》写苟安怕事的人与旧制度妥协的不幸结局；《一生》写官僚地主的荒淫无耻，最后丧失人性而变得疯狂；《新生》写理想不灭，后继有人；《黎明》写未来社会的远景，也就是自己的理想世界。

当然，在马赛的一段日子，除了看左拉小说和酝酿自己的创作计划之外，也还到旅馆外面走走。有时到海滨散步，看穷音乐师在广场上拉琴，还由于一个巴黎朋友介绍，他在这里认识了一个姓李的四川同乡，这人很热情，经常陪伴他到电影院看电影，从而使在巴黎和沙城几乎不曾进过电影院的巴金，在这等候轮船期间，几乎天天上电影院看电影。他看了电影以后，又总是想得很多，经常在心潮澎湃中回到住所，写稿写到深夜。

这时他每天还得到一家中国饭店去吃饭。在从旅馆到饭店的路上，要经过几条街，这些街道都与他去年1月刚到法国时所看到的马路景象不同。那时大概是匆匆经过马赛，所以只见到一两条主要的大马路，这次深入里层了，发现到中国饭店去的几条街道，大都地面滑湿，摊贩拥挤，果壳菜皮满地，叫卖之声不绝。有的还是狭窄的小巷，交通混乱更不必谈了。中国饭店则是一家刚停业关门的小菜馆，经过熟人说情，才让巴金包饭。这里没有穿礼服的侍者，自己端羹盛菜，与第一次到马赛那天在一家饭店里就餐，和几个朋友占据了一张大桌子，两个穿礼服的侍者在奏乐声中鞠着躬侍候他们，情况完全不同。

印象最深的是，马赛一到晚上，有些街道就出现小偷和娼妓。有时人在黝暗的路灯下走路，连头上戴着的帽子也会给小偷抢走，而在一些挂着珠串门帘的房子门前，则有三三两两脸上涂着脂粉、嘴上涂着鲜红唇膏的妇女在拉客人。即使在电影院里，也有那些女人在活动，据说那些都是当时法国镇压殖民地反抗运动后，一些被杀害的革命者的家属，流浪到这里来，不得已操此很悲惨的皮肉生涯。

巴金在马赛住了十二天，当地海员罢工风潮才宣告平息。他由于那个姓李同乡的帮助，及时买到了轮船票，终于登上了返回祖国的海途。

### 第三章 燃烧的热情与千万颗读者的心

## 第一节返沪以后

巴金是在 1928 年 12 月中旬回到上海的。他在法国整整两年，上海租界的外国大班们已经从经历了一场足以使他们出一身冷汗的虚惊中得到暂时的平静。由于一个将军灵魂的叛卖，上海的革命风暴已经过去，在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飘拂下，劳资纠纷已经用不到大班们担心。从内地迁入租界的殷实富户一天多似一天，外滩银行的白银库存也就从革命前的四千万元，剧增到两亿元巨额。而一百七十家华商银行的兴起，更为外国大班们的资本如虎添翼，有了得力的助手，连《字林西报》上的论客也不得不承认：上海越来越富了。正当这些帝国主义资本家在外滩 3 号上海总会餐厅喝着咖啡笑逐颜开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曾为革命的失败而停止考虑自己祖国的命运。他们凭着各自的理想，还在开展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思维活动。一直向往着有个“没有人剥削着人，没有人压迫人”“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嘴都有面包，每颗心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得到发展”的社会到来的巴金，他一回到上海，就像过去一样，追求着这样的理想有一天能够实现。但这时他身边的钱已所剩无几，不得不急于找一项工作。恰好在开明书店当编辑的周索非，是他的老友，三年前巴金曾与一批友人共同发起创办过无政府主义刊物《民众》半月刊，索非是其中的一位，现在他介绍巴金到上海世界语学会担任函授学校教员，并在沈仲九创办的自由书店兼任编辑。

上海世界语学会是巴金的一些朋友带着献身精神建立起来的一个学术性组织。它在宝山路鸿兴坊 75 号，巴金出国以前就曾在这里学习过世界语。回国后，他几乎每晚都在这里孜孜不倦地工作达两小时。他在这里用世界语翻译了剧本《过客之花》（意大利亚米契斯作）、《丹东之死》（苏联阿·托尔斯泰作）、《骷髅的跳舞》（日本秋田雨雀作）、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匈牙利尤利·巴基作）等作品。这间房子里的写字台前的藤椅，他是坐惯了的；书橱里的每一本藏书他也几乎摸遍了。在回国后的最初半个月，当他还没有找到适当住处时，鸿兴坊这间办公室还曾成为他的卧房。

1929 年元旦，新婚的索非带着他的夫人，找到了宝山路宝光里 14 号一幢石库门二层楼房，作为他们的新居。住在亭子间的房东，同时还答应索非让他的朋友巴金租住这幢房子的楼下客堂间。这样，巴金才开始在上海有了他自己的“家”。这一年他的第一件大事，是第一部文学作品《灭亡》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第二件大事则是他译完了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

巴金在法国时写成的《灭亡》，本来准备自费出版，从巴黎郊外的沙城寄给索非，请他联系出版社。谁知索非一接到书稿，就把它介绍给正在代理郑振铎编辑《小说月报》的叶圣陶，叶审读了这部作品，就把它分四次登在这家月刊上。在最后一次登完时编者发表“例言”说：“巴金君的长篇创作《灭亡》已于本号刊毕了，曾有好些人来信问巴金君是谁，这连我们也不知道。看这篇《灭亡》却是很可使我们注意的。其后半部写得尤为紧张。”连载开始时，恰逢巴金刚刚回国。《小说月报》在当时是权威刊物，巴金是它的忠实读者，每期出版，总亲自跑到书店去买。《灭亡》发表后，当年十月又由索非把这部书稿交开明书店出版发行。许多青年都为这部小说作者热烈的感情和流畅的文字而倾倒，文学评论家谭正壁在他的《中国文学进化史》里说“巴金是新写实主义一派”，也有人在《新文艺月刊》上说“巴金的思想立场是安那其主义的”，另一个评论家则在《现代小说》上说“这是虚无



主义的、个人主义者的创作”，还有人在《真善美》杂志上说《灭亡》的主人翁杜大心“似乎是克鲁泡特金的安那其主义，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和阿志跋绥夫的虚无主义的人格化”，连《中学生》杂志的读者也有各种评论。

巴金在这一年为此发表了“自白”，他说：

“总而言之，我活了二十几年。我生活过，奋斗过，挣扎过，哭过，笑过。我在生活里面得到了一点东西，我便把它写下来。我并不是事先打定主意要写一种什么主义的作品。我要怎样写就怎样写。而且在我是非怎样写不可的。我写的时候，自己和书中人物一同生活，他哭我也哭，他笑我也笑。我不是因为想做文人而写小说。我是为了自己（正如我在序言中所说是写给我的哥哥读的），为了倾诉自己的悲哀而写小说。所以读者的赞许与责骂，我并不在乎。不过我希望批评家多少了解我一点。”

巴金确实不是“为想做文人而写小说”的，他虽然在那时已发表过不少文章，也翻译过不少作品，但是直到《灭亡》出版，他还未曾拿过稿费，他把这本书的版税赠给索非，虽然他自己的生活还是十分拮据。就在这个时期，他在法国编写的另外两本书《断头台上》（其中一篇是凡宰特的自传《一个卖鱼者的生涯》）和《蒲鲁东底人生哲学》（克鲁泡特金作），也在自由书店出版了，这两本书仍是没有版税或稿费的书籍。

他从来不曾想到可以依赖稿费来维持生活。他从事写作只是为了要倾诉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甚至他从事翻译工作，也总是挑选对自己有兴趣的书，或使自己感动的书，来推荐给读者。

这一年他译完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后，立刻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弟弟李尧椽，要求他把它“当作终身的伴侣”，要他把作者“当做模范，去生活，去工作，去爱人，去帮助人。”说自己在翻译这本书时，“流下感激的眼泪，觉得做人要像他这样才好。”后来他还在“前记”中称赞“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书，也是我的知识发展上给了绝大的影响的一部书。”

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1966年俄文本前言（特瓦尔朵夫斯卡娅作）一开头就有这样的介绍：

“本书作者的名字是人们都很熟悉的，因为它早已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莫斯科有一个地下铁道的车站、一个广场、一条大街和一条胡同是以这个名字命名的。……本书是克鲁泡特金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在政治流亡期间写成的，……他经历了农奴制衰亡和革命高涨的时代，经历了‘伟大的改革’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运动。回忆录的第一部分描绘的主要就是这三十年……他把自己遇见过的人物写得栩栩如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作者在谈论科学时，表现了罕见的才华……”

俄文本前言作者说，克鲁泡特金在一个维护农奴制的亲王家庭中长大，有强烈的求知欲，广泛的兴趣，和孜孜不倦的工作能力。他从不满意侍从军官学校的规章制度开始，不知不觉地转向更广泛的思考。他的观点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对人民的了解，同人民的接近，而这种了解和接近本身就是在进步的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风靡一时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他宁愿放弃宫廷中的锦绣前程而到阿穆尔（黑龙江）哥萨克团队中去服役，这表明他受到进步风尚多么巨大的影响。他率先大声疾呼，西伯利亚“不是终年积雪，只有流放犯人居住的一片冻土”，并介绍了西伯利亚的丰富资源。他在那个时期的日记和书信都显示了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当时他坚信“人民一旦起来，哪怕是只用镰刀做武器，他们也能有所作为。”他在西

伯利亚，加深了对“脑满肠肥者的统治”的憎恨，终于放弃了军职，离开了西伯利亚，到彼得堡进了大学，又在俄国知名的地理学家和统计学家的领导下供职，在学术上作出了很大贡献。

虽然克鲁泡特金有许多幻想不切实际，但“这位高尚的、才华横溢的思想家描绘的美好图景：‘一个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一个肯定个人最大价值，把个人的幸福置于最高地位的社会，一个不仅摆脱了金钱的统治，而且也摆脱了官僚和官吏的社会’，确实符合人们梦寐以求的心愿。”而且从专业上来讲，“克鲁泡特金既不是一个化学家，又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既不是一个作家，又不是一个演员，却终生保留着对历史、对化学、对文学、对艺术、对他在某一段时期内从事过的所有事情的爱好和兴趣。丰富的精神需求，在大多数人身上都随着年岁的增长而逐渐减弱，而克鲁泡特金却对所有新的书籍、科学上的新发现、艺术中的新事物，直到老年还保持着一种青年人的、如渴如饥的求知欲。”

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本书，难怪巴金为之倾倒。他把克鲁泡特金当作“一个道德地发展的人格之典型”来要求自己的弟弟向他学习，虽然他并不强求弟弟去向克鲁泡特金学习思想、主张或什么主义。使巴金感动的是他的“人格”，和他的美丽的理想。

他在这个时期的生活过得并不热闹。和他在法国一起留学的朋友吴克刚和卫惠林虽然这时也已先后回国，但他们都到内地去了，吴克刚临行把自己旧居中一张破旧的小沙发送给了巴金。一到晚上，巴金从世界语学会回来，经常坐在这张沙发上进行写作或阅读书籍。他仍是中外文学名著的热情读者。他唯一的消遣是在黄昏的时候，从宝山路通过东横浜路和多伦路到北四川路横浜桥一带散步。那时宝山路还不曾遭受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的兵灾，宝光里附近有许多房屋，也有几家商店，不像后来很长时期只有棚户与荒地，一到晚上，只有火车响着隆隆的声音在铁路上经过，铁路沿线的马路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人影了。当时宝山路横浜路一带有不少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住在那里，因为著名的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等几家印刷厂就座落在这条宝山路上，他们为了工作方便，很自然地集中在这个地方。鲁迅先生刚到上海时，也住在与这里相近的叫景云里的那条弄堂里。人们从宝山路到北四川路去，常要经过东横浜路的景云里弄堂口。北四川路的横浜桥，经常出现着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交替时期巴金寂寞的脚印。

宝山路属于闸北，而北四川路就属于日本商人比较集中的虹口了。当时在公共租界的主管机构工部局董事会里虽有两个日本大班，但一般的日侨还是住在虹口，这些人不少是苏州河南三井洋行或横浜正金银行里的职员，更多的则是在虹口就地经商开店铺出售日本棉织品、玩具、留声机唱片、自行车的小商人。这些人在北四川路一带（也有在提篮桥的）聚居，按着生活习惯，形成一个自己的社会，人们叫它“小东京”。他们经常在自己家中，脱去鞋子，蹲在一种叫“榻榻米”的席子上，喝茶谈唱，自得其乐。有时又三三两两走进日本人自己开的酒店，对着艺妓喝上几杯。有些则是军人家属，凭着各种关系，开个店铺，每月领军饷之外，还从货物买卖中争蝇头小利。这一带日本居民大约有三万人，在北四川路这条神秘之街上，形成一种特殊势力。他们有一个居留民团，和一个非常活跃的各条街道日人联合会，用来专门对付中国居民。在1929年前后还比较平静，等到东北“九一八”事变发生，局势就更加紧张了。

巴金生活这样的环境里，使他更加感到孤独。《灭亡》获得热烈的反响，却不曾使巴金周围的朋友增加。他仍专心致志地从事他的翻译和编辑工作，不曾有继续进行文学创作的打算。他甚至有点灰心，特别在这一年中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房东太太》和第二个中篇《死去的太阳》写完后，他对自己有些失望，曾想从此搁笔，不再创作。

他感到忧郁，时时想念在成都的大哥和在天津的三哥。而他们知道他回国，却很高兴，经常有信给他。那年7月，他的大哥尧枚终于从成都到上海来了。这使巴金的生活顿时热闹起来。和大哥一起来的，还有三叔家的堂弟李西舫，他比巴金小两岁。巴金在童年时经常与他一起玩乐的。大哥到上海后，借住在霞飞路（即今淮海中路）霞飞公寓的一幢高楼里。巴金与大哥相别六整年，见面时虽十分愉快，却又不免泪眼相对，许多话不知从何说起。他们谈到三姐的死，也谈到二叔去世。二叔一心要想继承祖业，维持封建门庭，却又终于无力挽回大家庭崩溃的危局，抑郁而死。巴金想起二叔在他与三哥尧林告别成都时，临行前他还拿出二十块钱，再三叮嘱他们要好好注意安全，当时情景还好像是在昨天一样清晰，禁不住两眼有点潮湿。

巴金知道大哥这还是第一次来上海，便把自己被头从闸北宝光里家中搬来，陪大哥一起住在霞飞公寓里。他还陪同大哥到霞飞路上买东西，也到上海最热闹的南京路去看看，他们在谋得利洋行买到一张两人都爱听的在当时相当流行的唱片，叫《宝贝儿子》，是女歌唱家格蕾茜·菲尔兹灌唱的。晚上，他们睡在一张床上话家常，一边听格蕾茜的歌声。兄弟两人感情非常融洽，但一谈到以后的事情，两人看法就不同。大哥仍还是希望巴金与在燕京大学毕业后的尧林回到成都去“兴家立业”；而巴金对成都的家却不感兴趣，相反，他一想到家，就好像有一个黑影笼罩在自己的头上。他禁不住又想起过去一些牺牲在封建礼教下的青年，因而他劝导大哥与那个千丝万缕的大家庭割断关系，甚至要求大哥也不妨离开成都。但是大哥把这些话都当作孩子讲的话，无动于衷。大哥并不是对家没有憎恨，他早就受够了大家庭中尔虞我诈的苦，看透了有些人的心肠，但是他没有勇气从生活的旧轨道上跳出来。他不断地诉说自己这几年来来的遭遇，还说：“到父亲死后才知道人心险诈，世道凶恶，才知孤儿寡妇的苦。”他自己因为身体不好，已辞掉了商业场电灯公司的工作，因此他个人缺少了一笔收入，但他又不想让大家知道自己家坐吃山空，内囊空虚，唯恐丧失已经不在人世的祖父和父亲的面子。他硬撑着在阔亲戚中间来往，卖了田去做投机生意。好像一个人站在钢丝上，随时有从高空掉下来的危险。

听了大哥的诉述，巴金重新唤起了他对大家庭的回忆。知道了近几年来家庭的变迁，他又开始酝酿半年前从法国马赛回国途中所构思的小说《春梦》的题材，这时就情不自禁地对大哥说：“总有一天，我会把我们家的事情写成小说。”大哥起初似乎并不理解巴金这句话的意思，过了一会，他忽然兴奋起来，说：“你写我家的事，我很赞成，你考虑成熟了没有？我可以帮你回忆往事。”当他回到成都后，又想起这件事，正待写信进一步询问，巴金已来了信告诉他写《春梦》的计划，大哥满腔高兴，复信给巴金说：

“《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书报读过后，我就想写一部书。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欢喜得了不得。我现在向你鞠躬致敬。希望有余暇把它写成吧，怕什么！”

《块肉余生述》（作者）若怕，就写不出来了！”

当然，这封信是巴金在他大哥回成都后的第二年接到的。此刻大哥还在上海。他这次来，当然主要是来看他爱着的四弟，四弟也非常渴望能同他爱得最深的大哥见见面，大哥曾多次写信说他要来上海。现在他来了，与其说他来上海“白相”，还不如说他来上海“避难”。他既害怕成都老家，却又离不开老家。他在上海只住了一个月，还是得回去。回去的那天，巴金和当时在浦东中学念书的表弟高惠生、李丕龙一起坐上一只划子，把大哥送到一艘叫“其平”的大轮船上。大哥泪流满面，竟说不出一句话来。巴金握着他的手说了一声“保重”，想叫大哥别难过，自己却也禁不住两眼噙住泪花，想不知哪年哪月再能见到这个自己最亲近的人。他正准备回到划船上去，大哥却重又把他喊进船舱里，在箱子里取出一件东西来，呜咽着说：“你拿去吧。”巴金一看，原来就是那天两人在谋得利洋行买的那张格蕾茜唱片。巴金原想让大哥带回成都去听的。但是大哥知道巴金爱听，坚持要把它留下，巴金想到他在几天中多次抗拒大哥的劝导，如要他回成都“兴家立业，共度艰难”等，他都没有答应，现在他再也不忍心在这件小事上使他不快了，他便把唱片接了过来，但噙着的泪珠却夺眶而出。

这时黄浦江正泛起一阵风浪，划子左右颠簸着，但见外滩一带已亮起灯光，原来已近黄昏时分了，连天空也已出现了几颗明星。巴金跟着表哥们上了码头，但他仍还东张西望，等待着什么人过来，还准备喊“大哥，你这边走”，却突然警觉到大哥已经离开上海了。他心里恍然若有所失，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凄凉感，随风吹到他的心头，他觉得这么大的一个上海，原来他是这样孤独啊！

巴金又回到了宝山路宝光里14号自己住处，因为大哥临行前已把霞飞路霞飞公寓临时租住的房间退掉。但是出乎意料，索非家来了一个性格豪爽、大方好客、爱书如命、喜打抱不平的客人，他很快成了巴金的朋友。这就是法国文学的翻译家马宗融。巴金早就从别人的嘴里听到过这位高个子的性格，他虽然好发脾气，心地却十分善良。果然，那个晚上，他在楼上索非家中巧遇马宗融，两人都是四川人，又都对法国文学非常熟悉，巴金读过他译的法国短篇小说，马宗融也读过巴金译的《面包略取》，和刚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灭亡》，几句话谈后，双方就感觉到意气相投，话就更多了。两人从法国文学谈到德国文学，最后又谈到《浮士德》。马宗融告诉巴金说四川路的上海大戏院正在放映法国影片《浮士德》，自己正想去看，问巴金去不去，巴金点头，马宗融就约他第二天晚上在戏院门口等候。哪知那晚看了影片后，马宗融又邀巴金到咖啡馆喝咖啡。他的心肠一竿子通到底，把自己心里想的什么都谈了，终于把自己的秘密也揭开来告诉巴金：他正在恋着一个朋友的妹妹，那朋友在法国工作，而妹妹却在四川，是当地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新近来信打听她哥哥近况，信里有些话他摸不透，但看来他和她结合有希望，他准备回四川去看她。他的兴奋，更使他对巴金的谈话没完没了，咖啡馆快打烊了，而他还是拉着巴金的臂膀，说时间还早。巴金为有这样一个人热情耿直、貌如其心的朋友而高兴，他衷心祝愿他能得到幸福。果然不久他回到四川去了。9月下旬的一个黄昏，他终于带了那个对象来到宝光里，这就是七年后写出《生人妻》那本集子的女作家罗淑。这本书后来由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编发出版。罗淑容貌端庄，举止大方，与马宗融正是天生的一对。当时马宗融带了罗淑进来，不像先前那样撒野，大概心里有了爱情，

倒显得斯文起来，对着老朋友索非夫妇和巴金，反而有点腼腆。他说他们来辞行，已买好船票，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去法国，帮她找在那面工作的哥哥。他们这一去，五年以后巴金才又见到他们，而且与他们成了莫逆之交。但是在这五年中，他不曾接到马宗融一封信，马是写信懒人，而巴金又是四海为家，“一·二八”淞沪战争后，他的地址更是飘忽不定，马宗融即使要写信，也要先打听到他的住址才能把信寄发了。

1930年7月，巴金在接到大哥对他准备写“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的小说《春梦》表示“欢喜得了不得”的那封信后，受到很大鼓舞，对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又有所增强。去年他曾被《伦理学》后半部的翻译工作搞得头昏脑胀，而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写作的失败，更增加了他对自己的失望情绪，幸亏后来他又译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和斯捷普尼亚克的特写集《地下的俄罗斯》，这两本书热情的内容与流畅的文笔给了他一些影响，在无形中也提高了他从事创作的兴趣。就在三十年代第一个年头的七月夜里，他睡得正香甜，忽然在梦中被什么声音惊醒，在黑暗中好像看见一些悲惨的景象，耳边也有一些哭声传来。他再也无法入睡了，就在灯下写成了一个短篇小说《洛伯尔先生》。这篇小说的背景是在两年前所住的离巴黎约一百多里路的沙城，这所中学就是他寄住过的那家中学，作品里的音乐家便是那个中学的音乐教师。花店里的那个少女，就是他在生活中看到过的那个见了他们总是微笑着向他们招呼“早安”或“晚安”的卖花姑娘。巴金写完这篇小说，走出房间，到石库门边的天井里呼吸新鲜空气，那时天色已经黎明，早霞正横在空中。他觉得这个刚写成的短篇，比去年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房东太太》要好一些，因为《房东太太》的题材只是听着人家讲的事情写成的；而《洛伯尔先生》在他自己生活中却有影子。他总是欢喜有着自己生活影子的作品，他对它们有感情。对中篇小说来说，也是如此。他爱《灭亡》而不爱《死去的太阳》，他认为《死去的太阳》是他硬写出来的，那里面缺乏他自己生活的依据。因此，他对《小说月报》编者退回他的这个中篇，只有感激，而没有半点埋怨情绪。后来开明书店出版的《死去的太阳》，是经过他作较大修改后才完成的，虽然他仍还对它不很满意。

这一年下半年，他的创作生活渐渐活跃起来。在年底前，他一口气写了十二个短篇。但他与外界接触还是很少。他总是把写成的小说交给住在楼上的索非，让他去联系刊物的编辑部。

## 第二节 闽南的朋友们

闽南的土地像童话般迷人。耀眼的红色土壤，绿色的庄稼，和成排的相思树，以及犹如一个个留着长须的老人般的榕树，使人远远地望过去，好像到了人间仙境。在八、九月间，龙眼树上的桂圆成熟了，更为这片红泥绿树的土地添加了一种澄黄的色彩，谁也不免要为这样动人的景致陶醉。

1930年，巴金正是在这样一个季节来到了福建的晋江（泉州）。比他先回国的吴克刚，已在这里担任黎明高中的校长。这个当年曾很有抱负的法国留学生，在与波兰革命党人亚丽安娜告别巴黎后，一回国就带着自己的理想，投身到这家海外侨胞所集资兴办的黎明高级中学里来，想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这里共同建立起一个理想的乐园。他多次写信邀请巴金到这里来看看，希望给他有个较深的印象。

巴金到了这里，果然被这里的一切吸引住了。这里的确是一些有理想有追求的纯朴的知识分子所创建的梦境。不仅环境清静优美，而且仿佛大家都生活得非常愉快。这里的教师大多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他们都不愿在污浊的社会里混世，想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用爱集体的理想来教育下一代。他们想关起门来，把学校办得像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或者一个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的理想社会。许多人在这里勤奋地工作着，和同学们建立起真诚的友谊。他们信任自己的理想，以为每个人都能像他们一样真诚地待人，诚实地劳动，这个世界就会好起来了。

巴金到了这里，把自己的幻想与眼前的现实结合起来。他作为客人，受到老师们热情的欢迎。他在这里不仅得与自己的朋友吴克刚、卫惠林重聚，而且结识了陈范予、王鲁彦、丽尼、林憾庐和叶非英等一些生活作风非常纯朴而又有才干的人。他们意气相投，经常坐在校园的草地上，或者倚靠着凉亭的栏杆，与大家一起兴奋地议论着世界大事；有时又在晚上打着火把，到古老的院子去敲开油漆脱落的大门，在旧式的木屋里，围着煤油灯谈论各人的志向。他们大都对许多社会现象表示不满，都认为“五四”运动虽已过去，但反帝反封建并没有彻底。他们总觉得社会上的封建的阴影还压在自己头上，更不满于在我们的土地上，外国侵略者还在我们周围张牙舞爪。他们都愿意为培养新一代成长而作出贡献，甚至为事业献身。

生活在这些人中间，巴金不再寂寞，也忘掉老是在苦恼着自己的各种阴影。友爱使他感到温暖。在他患病发高烧的时候，他得到朋友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他觉得他应该留在这里与这些人一起工作，但又有另外一种力量支配他无法为文字工作放弃劳动。他先在这里过了将近一个月的暑假，其后又两次来到这里。他忘不了在这里分享到的人与人之间无私的友谊，和这些人为教育事业所作出的献身精神。同时，他也牢记着发生在这些友人之间的各种动人故事。

使人遗憾的是巴金到晋江不久，就发高烧，吴克刚也患伤寒症进医院了。克刚病愈后，应另外一些人的邀请，转到河南百泉去教书。接替吴校长照料学校行政事务的是生物学家陈范予。这样，没有经过第三者的介绍，巴金就与范予相熟了。黎明高中是在晋江这个古城的武庙（关帝庙）里，他们就在这个武庙的凉台上，和庭前的两棵大榕树下，共同度过将近三十个黄昏。他们相互交换对社会问题的意见。巴金发觉对方是个切实的人，即使谈理想，他也从不把自己放到幻境里去。他的科学知识非常广博，经常与巴金同看秋

天的夜空，从亿万发光的星星中，探索宇宙的秘密，由此领悟到人生的哲理。在黎明来临的时候，他又从湖沼里捞取一杯杯污水，放在显微镜下，与巴金一起来从这一滴水中看大千世界。巴金从他那里知道生命无处不在，生命绵延不绝。人并不是唯我独尊的天之骄子。巴金从陈范予的生物实验中，获得科学知识，并受到唯物主义的思想影响。陈范予曾说：“有人把人生当作秕糠，我却以为它是谷粒。有人把人生视同幻梦，我却以为它是实在。有人把人生作为苦药，我却以为它是欢乐。”巴金与这个人维持了十二年的友谊，直到陈范予在抗战时期患肺病去世。

在黎明高中，王鲁彦是巴金很早就知道他的名字的人，过去在北京世界语学校，巴金曾与秦抱朴一起跟他见过一次面，他比巴金大三岁，是浙江镇海人，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里，十八岁就到上海当学徒。后来他到北平参加蔡元培、李大钊等创办的工读互助团，并在北京大学做旁听生。他受“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从事文学创作活动，成为文学研究会成员，被鲁迅称为“乡土文学作家”。他写的作品《灯》与《狗》，都是巴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的。这次巴金与鲁彦先在鼓浪屿会面。那时巴金住在一家滨海旅馆里，鲁彦穿着一件白衬衫，带着一个本地小孩来看他。他们畅谈了一个多钟头，就成了一对很相契合的朋友。鼓浪屿，这个日光岩下的岛屿，海水拍岸，波浪翻天，房屋精致，庭院花开，马路两边松柏与榕树并立，永远显得树木茂盛，山水秀丽；留给巴金深刻印象的，更有南国朋友的无限情谊，鲁彦是其中的一个。他们来到晋江后，在黎明高中的教室里，经常论文谈艺，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趋向一致。但是日子久了，巴金发现鲁彦性格倔强，不大善于适应环境，而生活的担子又重重压在他那瘦削的肩胛上。鲁彦离开晋江后，又到处碰壁，长期的困苦却磨灭不了他的锐气，患了病后，仍还昂着头，在不公平的人世中奋斗。他写了很多反映农村生活，表达世态炎凉，揭露旧社会悲惨现实的传世之作，但在与巴金相识十四年后于贫病交迫中死去。

曾经使巴金更为感动的是黎明高中的数学教员叶非英。他在巴金第一次与他见面时，还是个从广州来的穿着蓝色西装白色翻领衬衫的漂亮青年。两年后，当巴金第二次来晋江时，叶非英已在当地的另一所中学——文庙的平民中学主持校务，并变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勇于牺牲自己的“耶稣”了。他穿着一身肮脏的灰色学生服，头发蓬松，面容黑瘦，几乎使巴金认不清他是谁。为办学校辛勤两年，他已变得这样瘦，这样老了。晚上，巴金和他睡在一间房里，满屋都是蚊子叫声，他却睡得十分香甜。巴金无意中把他弄醒，他问巴金睡得怎样，巴金说“我闷得很”。他说了几句梦话，又睡着了。

到了第二天，巴金听朋友们谈起叶非英，说他身上有病不肯治，工作忙得连吃饭时间都没有，更没有时间考虑结婚成家，像个苦行僧一样过日子，却与学生很谈得拢。“耶稣”的称号就是这样产生的。巴金很钦佩他对事业的献身精神，临行时听他说学校很希望能增添一些图书，巴金就给他捐赠了两箱书去。朋友们把巴金送到船上，巴金又把剩余的旅费交给他们，要他们转交给“耶稣”，让他抓紧时间看病。等巴金回到上海，“耶稣”却来信说已把钱用来帮助一个贫苦的学生。巴金对叶非英拖延治病，强调“工作更重要”的主张，并不完全同意，但对他的工作精神相当感动。巴金佩服他，但并不想学习他，因为巴金总觉得从事文化建设工作，眼光要放得更远一些，更要有水滴石穿数十年如一日的决心，单靠舍命“拼搏”是不够的。

在黎明中学结识的另一个朋友是后来成为我国著名散文家的丽尼。他的故事也是很动人的，他与巴金的友谊也是很长久的。巴金在三十年代初所写的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正是根据在闽南时期生活中所遇到的事情写成的。当时巴金听晋江书店一个姓沈的朋友谈起，说有个少女，是巴金小说的读者，最近病在床上，不知是何原因，精神有点失常，他问巴金是否可以去看看她。在一个雨后初晴的日子，巴金就与两个教书朋友，踏着泥泞的田间小路，去那个姑娘家访问。到了那边，一看那屋子，显然是个大户人家，但那姑娘却躺在这个庄院的一间阴暗的房子里。对他们的来访，她说了两声“谢谢”，然后只是微笑。她不过二十岁左右，容貌端正，脸色有点憔悴，身上盖着一条薄被。看到他们，她从床上坐起来，对他们的问话，什么都没有回答。当他们告辞时，她的双眼却噙着晶莹的泪花。据说她父亲正逼着她停学，要她与一个不相爱的男人成婚。没有多久，她就发疯去世了。这给巴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样的故事，对他说来是非常熟悉的。他想起自己的成都老家的那些亲姐妹和堂表姐妹们。

过了几天，巴金在学校办公室帮忙料理一些事务，因为暑期就将过去了，学校正忙着新学期的学生注册报到，忽然看见一个活泼秀丽的姑娘跑来，要求办理注册手续。人家说她姓吴，是个归国华侨。她口齿伶俐，行动迅捷，很快就把手续办好，没有多少时间就离开办公室，却给巴金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等到巴金回到上海，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那个姓吴的姑娘爱上了学校里一个姓郭的教师，那个教师便是巴金的朋友丽尼。他比巴金还小三、四岁，原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接受这个南国少女的爱情，也是很平常的事情，而且也只是停留在一般的情投意合上，并没有什么行动。但是给吴姓姑娘的家长知道，竟引起非凡的不满，原来他们早给她挑选了个未婚夫，这个未婚夫正是这个学校的校董，当地有钱的老板。他们给她一种压力，并订出婚期，强令她与丽尼断交。同时并通过社会舆论，把丽尼逐出学校。丽尼只好跑到鼓浪屿朋友家中去避难。而姑娘却不屈服，她在婚期将近的时候，乘着天下大雨，人们不及防备之际，逃出家乡来鼓浪屿，要求跟着他到天涯海角，去做比翼双飞的同命鸟。但是丽尼想到自己是个身无分文的流浪人，是否能保证这个出身富家的少女永远不吃苦，自己心中没有把握，而且社会舆论和专为有权势的人服务的社会法纪对他来说，都是个可怕的压力。他唯恐自己承受不了，因而竟然没有接受这个姑娘的请求，委婉地辞谢了她给他的爱情。悲剧等待着这个姑娘去扮演主角：她跑回家中，像一朵刚开的鲜花，在一场风雨中憔悴地死去。

巴金听到这个故事，就凭着自己在晋江所得到的有关这两个姑娘的印象，加上自己家的一些堂表姐妹们不幸的遭遇，写成了一个以爱情为题材的中篇，他对人说：“那个女郎疯狂了。悖谬的社会制度，不自由的婚姻，传统观念的束缚，家庭的专制，不知道摧残了多少正在开花的青年灵魂！我的二十几年的岁月里，已经堆积了那么多的阴影了。在那秋天的笑，像哭一样的笑里，我看到了过去一个整代的青年的尸体。我仿佛听见一个苦痛的声音说：‘这应该结局了’！”

那时《中学生》杂志恰好正在连载他所翻译的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他就把自己写的这个中篇爱情故事起了个相反的题目：《春天里的秋天》，并为它写了一篇短序，最后一句是：

“我要像躺卧在巴黎国葬院里的一代巨人左拉那样，向着垂死的社会发



出我的最后的呼声：‘我要控诉’！”尽管闽南的景色迷人，尽管有许多纯朴的青年在这里以自己的理想创建各人的梦境，尽管巴金也确实曾经为这里的一些殉道者们的艰苦创业精神所感动过，但冷酷的现实还是给巴金带来了他心的创伤，让他看到即使在黎明中学，也还是在发生青年受屠宰的悲剧。事实证明：门是关不牢的，社会的恶势力还是把手伸到学校里来。丽尼的被逐，姓吴的姑娘的忧郁而死，都是非常现实的。

巴金把他在三十年代初期在晋江一带的生活，称作“南国的梦”，这是十分合适的。

他确实在这里得到过友情的温暖，但他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里建造的是空中楼阁。当时他心中还是充满着矛盾。直到后来，他才清楚地指出他当初是：“用梦想来装饰他们的工作，用幻想的眼光来看新奇的南方景色……今天我不会再做那样的好梦了。但是我对他们的敬佩的感情，几十年来并没有大的改变。”

梦是会消逝的，但友谊犹如高山流水，永远存在。新文学史总将记载巴金的青年时代在闽南与王鲁彦、丽尼、林憾庐、陈范予等人珍贵的友谊。这些友谊后来都发展成为文坛上编辑与作家之间的各种佳话，并由此产生了文学园地里的各种鲜花与美果。

### 第三节大哥与《激流》

从闽南第一次过暑假回来，第二年即 1931 年春天，巴金生平的第一次文学创作高潮就开始来到了。

那时清明节刚刚过去，自然界正处在草木新绿、鸟语花香的季节。随着腊尽春来，气候转暖，人们似乎也活跃起来了。在江湾路鸿兴坊 75 号世界语学会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许多世界语学者和爱好者都三三两两来到这里，用各种方式交流学习世界语的经验，准备参加即将在不久召开的会员大会的工作。在这里从事筹备工作的巴金，是大家联系的对象，有不少人熟悉他，知道他曾在法国留过学，还在《小说月报》发表过中篇小说《灭亡》和短篇小说《房东太太》。有个与报界经常有联系的文化人火雪明，常在当时流行的报纸和杂志上发表文章。那天他见到巴金，就用浦东乡音问巴金：“你有新作吗？”巴金不知他的用意，竟一时答不上话来。因为当时向他直接约写小说稿的，还不曾有过。去年他虽写了十二个短篇小说，都是别人通过索非来要去的。火雪明见他愣着，没有回答，就接着说：“事情是这样的。你知道《时报》的编辑吴灵缘吗？他在那边负责编发长篇连载小说稿件，每天要发一千字，现在他正需要稿件，你能给他写一部吗？”听了火雪明的话，巴金猛然想起去年大哥来上海，在一次谈话中，他曾在无意中向大哥透露他准备写一本以四川老家为题材的作品，大哥回到成都后，还来了一封信，说：“知道你打算写以我家人物为主人公的小说《春梦》，我欢喜得不得了。”而他确实为写这个题材的作品，从马赛回国途中开始酝酿，到现在也快成熟了。虽然现在他正在开始写《灭亡》的续篇《新生》，但他还是觉得写《春梦》更迫切，更重要。这样，他就对火雪明说：“好吧，我试一试。”

那时他还住在宝山路宝光里 14 号楼下客堂间。这一天他回到家里，并没有马上开始动笔，却在书架上拿起一本托尔斯泰的《复活》，想起当初流着眼泪读这本书时的情景，以及自己在书前那张空页上写下的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

“生活本身真是一个悲剧吗？”这时他反问自己，他觉得事实并不是这样。因而不免浸入沉思：“生活应该是一场搏斗。我们生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生命？罗曼·罗兰的回答是‘为的是来征服它。’他说得不错。”

于是巴金坐到方桌边，拿起了笔，迅速地把自己想的记了下来，并顺着思路继续发挥，写道：

“……我的周围无边黑暗，但我并不孤独，并不绝望。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它的途中，它曾发射出种种的水花，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受苦。这一切造成了一股激流，具有排山之势，向着那唯一的海流去。

“我和所有其余的人一样，生活在这世界上，是为的来征服生活。我也参加在这个 Jeu 里面。我也有我的爱，有我的恨，有我的欢乐，也有我的受苦。但我并没有失去我的信仰，对于生活之信仰。我的生活并未终结，我也不知道在前面还有什么东西等着我，然而我对于将来却也有一些含糊的概念。因为过去并不是一个沉默的哑子，它会告诉我们一些东西。

“在这里我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过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我不是一个说教者，所以我不能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但读者自己可以在里面去

寻它。

“有人说过，路本没有，因为走的人多了，便成了一条路……我知道生活之激流是不会停止的，且看它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

他把这一段几百字的短文，作为他的长篇小说的“引言”，并决定把原来的题目《春梦》改为《激流》，因为“春梦”这两个字是不能表达他自己对生活的看法的，而“激流”才真正象征了万马奔腾的生活现实。

第二个晚上，他就把《激流》的第一、二两章写好了。第一章《两兄弟》，他写觉民、觉慧两人晚上从学校排戏回来路上谈话的经过。他一边写，一边回忆起当年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读夜书时，经常与三哥尧林深夜走在“正通顺街”的那条寂静的石板路上，有着方形玻璃罩的清油灯，照着他们的影子走向自己家中的大门前来，两个永远沉默着的石狮子蹲在门口，等候他俩去敲那扇贴着“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对联的黑漆大门。这情景对他是多么熟悉。而在公馆的大门内所发生的事情，今天回想起来，更使他热血沸腾：有多少哭泣的灵魂在这里得不到安息，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在这里被吞噬掉了！这里有自己所爱的人在受苦，也有自己所厌恶所憎恨的事情在不断发生。他的小说一开头就把自己带进家中去，他要把自己的笔去作为攻击那个不合理制度的武器。第二章《琴》，他写了到家里来作客的表姐，她正为外语学校明年暑假将招收女生的消息而感到惊喜。这个少女的形象，在巴金的生活中有他一个堂姐当年的影子……

他把写好的小说“引子”和前两章文字交给了火雪明，请他转给在《时报》工作的吴灵缘，看看是不是符合编辑部的要求。回音很快就来了：编者希望他赶快写，4月中旬就要上版面。实际上，巴金把前两章交出去后，就没有停止过写这个长篇，他一连几个晚上把精力集中在继续写这个“家”的故事，他写得很顺利，因为他对它太熟悉了，而且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他对这个“家”的怀念和控诉。在这个故事里，人物都在他心上活着，他和他们一起生活，为他们的悲而悲，为他们的喜而喜。他写了受压抑中的丫头鸣凤，写了她心中的忧虑；他写了琴，写她怎样为争取能进外语专门学校而作的反抗。在第六章里，他以《做大哥的人》为题，写了高家的长兄觉新，那是他自己的大哥的形象：

“……他生来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着双亲的钟爱，在私塾得到先生的赞美。……在中学里他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四年课程修满毕业的时候又名列第一。他对于化学很感兴趣，打算毕业以后再上海或北京有名的大学里去继续研究，他还想到德国去留学。……然而恶运来了。在中学肄业的四年中间，他失掉了母亲，……不过这还不曾在他的心上留下十分显著的伤痕。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前程和他的美妙的幻梦。同时他还有一个能够了解他，安慰他的人，那是他的一个表妹。但是有一天他的幻梦终于被打破了。那天晚上，父亲把他叫到房里去对他说：‘你现在中学毕业了。我已经给你看定了一门亲事。你爷爷希望有一个重孙，我也希望早日抱孙。……下个月十三日是个好日子，就在那一天下定。今年年内就结婚。’这些话来得太突然了。他不作声，只是点着头。他不敢看父亲的眼睛，不说一句反抗的话，而且也没有反抗的思想。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却关上门倒在床上用铺盖蒙着头哭，为了他的破灭了幻梦而哭。……原来他的相貌清秀和聪慧好学，曾经使某几个有女儿待嫁的绅士动了心。给他做媒的人常常往来高公馆。……父亲不能决定究竟哪一个更适应做他儿子的配偶，

只得求助于拈阄的办法，姓氏写在小红纸上，把它们揉成团，拿在手里，在祖宗神主牌面前拈起一个来，李家亲事就这样决定了。……他的升学的希望成了泡影，而他所娶的又不是他中意的那个‘她’。对于他，实在是一个大的打击。……他不反抗，也想不到反抗。他忍受了。可是心里却为着自己痛哭，为着他所爱的少女痛哭……”

巴金把他的大哥尧枚的遭遇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搬到作品里去，还把他的性格一丝不差地刻划了出来。他在这一章里，后来还写了“五四”运动发生时，觉新怎样地和他的两个兄弟每晚上勤读书报，讨论各种问题。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仍依顺着旧的环境的安排生活下去。当他的孩子渐渐长大，他就把对自己的希望寄托到孩子身上。巴金在这一章里还描写觉新是这样一个人：“他变成了一个有两重性格的人，在旧社会里，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这种生活方式当然是他的两个兄弟所不能了解的，因此常常引起他们的责难。但是他也坦然忍受了。他依旧继续阅读新思想的书报，继续过旧式的生活。”

巴金这样满怀热情地严肃批评觉新，是为了希望他的大哥读到它时能有所警觉。他想这样挽救他，可以免致掉到万丈深渊里去。大哥在上海的时候，他要他从旧的生活轨道里脱离出来，不要再在虚伪的绅士堆里混日子了，但是他没有能够说服他。现在想用小说作武器，将他的大哥从封建力量的俘虏队里争夺过来。他为此订了一份《时报》，打算按日剪报，把它们贴在一本硬面的练习簿上，每隔一个时期，给大哥寄去。

4月17日深夜，巴金把第六章写完，第二天早上，《时报》已经把连载小说《激流》的“引言”和第一章《两兄弟》的前面一部分刊登出来了。他从来没有在报上发表过连载小说，这是第一次，他心里有点兴奋。这家报纸在当天还发了个启事，大字标题称作者为“新文坛巨子”，因而人们特别注意这个专栏的新作是写的什么内容。而他却觉得心中不安，他想：我还只写了一、二个中篇小说，和几篇短篇小说，怎么能给我这样一个称呼呢？可见得报纸宣传有时是夸张的。当时《时报》刊出的《激流》，文字分四栏直排。题目上边有个很大的头花，头花下边有“长篇小说”四个小字，然后才是“激流”两个横排的大字。题目下面署着“巴金作”，旁边还排了两行“版权所有，不得转载”的六号字。巴金觉得这两行字也有些多余，他应约为报纸写稿，只是为了想改变人们的命运，同时实现对大哥的诺言，想帮助他跳出在封建专制统治下的火坑。大哥赞同他写“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的长篇小说，目的在于责备人；而巴金的目的则在反对吃人的封建制度，推翻长期统治人们心头的封建魔王。他想他一定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写进去，甚至把自己都写进去，不是写自己已经做过的事情，而是写自己可能做的事情。写自己，不是为了装点自己，而是要描写一个幼稚而大胆或者有点狂妄的青年的形象。他后来又细细想想，他写觉新的形象不单是为了劝告大哥、挽救大哥，而说实在，也在鞭挞自己，因为大哥的性格固然属于大哥，但从自己身上有时也还是可以找到大哥的影子。他要把觉新的形象，当作一切与旧思想妥协的人的一面镜子。

他把第一批原稿送去时很有信心，也终于见到了一次《时报》编辑吴灵缘。吴灵缘是上海郊区青浦人，当时大概三十刚出头的年纪，比巴金大三、四岁。他穿着随便，不修边幅，在当时是个写流行小说的才子，还出过一本

新诗集《穿红衣的女人》。他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与邓散木、沈禹钟、火雪明三人一起当过学徒，和他们是所谓“同出窠兄弟”。因为他聪颖，工作中很能出新点子，在接替毕倚虹当《时报》文艺编辑后，在版面上有过不少新的贡献。当时《时报》的副刊《小时报》虽已取消，但新闻版上的连载小说却很受人欢迎。这时候，民国初年的一般言情小说已不大为读者所喜爱，吴灵缘就想出要接纳“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学作品进入这个专栏。所以《激流》第一天开始连载，他就在版面上刊登启事，强调作者是“新文坛巨子。”巴金对这样的称号当然有些反感，但他确想把在这里写连载小说之事写信告诉大哥，打算先将第一天刊出的报纸寄去，并附信告诉他已在日夜赶写原先题目叫作《春梦》的那个长篇，而且已开始在《时报》上连载；并向他解释为什么要把《春梦》的题目改称《激流》。他想大哥也许能够理解他的心情。

使巴金震惊的是他的信还来不及寄出，第二天下午却接到来自故乡成都老家拍来的一个电报：大哥尧枚服毒自杀了！

万万没有想到听说巴金要写“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的小说而表示“欢喜得了不得”的大哥，最后竟然对这部小说连一个字都没有看到！茫茫世间，人事是多么难测！巴金把电报捏在手里，禁不住手指微微发抖，这时他真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啊，为自己爱得最多最深的大哥，你怎么可能把自己的生命线割断？前年你知道我回国，特地千里迢迢，从成都老家赶来看我，你对我是多么关切。父母去世后，你为了我在大家庭中受了多少闲气，但你并不怪我，还是在经济非常拮据的情形中，资助我和三哥离开成都来上海，最后又送我出国。你是这世上最体贴我也最能谅解我的人，我却对你的处境如此隔膜，万想不到连我劝你放弃旧的生活方式，重新建立生活秩序的话都没有讲完，你就离我而去！“没有你在，纵有千万的人，对于我也是寂寞”。在1927年3月，我在巴黎时给你写的信中，我就这样说过。而现在，我到什么地方去找你呢？……巴金在自己的房间里痴愣了一、二个钟头，竟一时意会不到在他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帮助他烧饭的那个中年娘姨把晚饭端了上来，可他一口都咽不下，话也一句不想讲，他自个儿走了出去，这时他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孤独！

他走在北四川路上，这条曾被她称为“神秘的街”，依然灯火辉煌，电车、汽车、黄包车在马路上奔驰，各种颜色的人影在他的眼前晃过：有西洋兵挺直着腰站在横浜桥两边，连眼睛都不闪动；有一些狐假虎威的华捕正在搜查从电车车厢里走下来的乘客，也不知出了什么事情，过往的行人也都慌张张，一切都呈现着恐怖与不安。

这些景象对巴金已经非常熟悉。在上海的马路上，特别在这条街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此刻他仍茫然地走着，好像走遍了人心的沙漠。但他耳边却噪音四起，无限喧闹。眼前忽然出现大哥的面影，他好似仍像前年来上海时那样走在他的身边，向他诉说老家这几年来变迁，一桩桩人事的纠纷，一些不幸的人们的悲惨遭遇，和一些封建遗孽利用权势在虚伪的礼教下所作的恶行；他又好像在成都正通顺街老屋的一个小房间里，含着眼泪和自己谈话，讲他怎样难于抵挡各处射来的暗箭……

巴金十分悲愤，他好像还是在老家，在离家前夕忿激地站起来对大哥说道：“我们决不屈服！让他们也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但是他又觉得此刻明明是在北四川路上，在那条“神秘之街”行走，他怎么会和大哥在一起？他真是在做梦吗？……他这才感觉大哥真的死了，电报还在他的身边。他知道

大哥的死，是封建势力压迫下又多了一个牺牲者！他悔恨自己为什么不早些动笔写这个长篇，也许早些动笔，可以让大哥看到，让他在迷梦中苏醒，把他从死亡的深渊下挽救过来。但是现在已经迟了，来不及了！他终于又走到家中，推开房门，禁不住痛哭了一场。

然后他揩干眼泪，坐到方桌边来。“死了的人不能复活，但是对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一定要打击它，用全力打击它！”他想着，并记起了法国革命者乔治·丹东的一句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他摊开稿纸，拿起笔，开始写《激流》的第七章《旧事重提》，他决定把觉新作为这部小说的最主要角色来写。现在大哥死了，他写这部小说更没有什么顾虑了，他觉得揭开环绕在大哥周围的那一层层薄膜，就会暴露出封建大家庭的种种丑恶来。他对这个家的一切太熟悉了！从高老太爷到高觉慧，每一个人的思想、性格、脾气，以及他们各人的经历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他都十分了解。他觉得写这部小说毫不困难。这以后，他每个星期都到《时报》社去送一批稿件，足够一周或十天之用。他在写作时经常动感情，经常是一边信笔疾书，一边禁不住淌眼泪，有时十分忿怒，有时又非常悲哀，他与作品中的人共同生活，一起受苦受难。他有时还丢下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朗诵刚写好的字句；有时又倒在吴克刚离沪时送给他的那只小沙发上叹息呻吟，感到痛苦。他作品里的人物，许多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高觉新是其中一例。（有关觉新的事，几乎一大部分都曾在尧枚身上发生过。）有些人则以几个人的形象揉成一个典型，如梅表姐就是这样。他写得很快，因此他还有时间同时写另外两部小说，这就是《新生》与《爱情三部曲》中的《雾》。

至于巴金的大哥，究竟是在怎样的情景中自杀的？直到巴金接到成都发来电报后两个月，他才看到从老家转来的大哥临死时所写的遗书。

遗书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卖田以后……我即另谋出路。无如求速之心太切，以为投机事业虽险，却很容易成功。前此我之所以失败，全是因为本钱是借来的，要受时间和大利的影响。现在我们自己的钱放在外边一样收利。我何不借自己的钱来做，一则利息也轻些，二则不受时间影响。用自己的钱来做，果然得了小利，于是通盘一算，帐上每月只有九十元的入项，平均每月不敷五十元，每年不敷六百元。不到几年还是完了。所以陆续把存放的款子提回来，作贴现之用，每月可收百数十元。做了几个月，很顺利。于是我就放心大胆地去做了。……哪晓得年底一病就把我毁了。……等我病好出外一看，才知道我们的养命根源已经化成了水。好，好！既是这样，有什么话说！所以我生日那天，请大家看戏后，就想自杀。但是我实在舍不得家里的人。多看一天算一天，混一天。现在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向别人骗钱来用。算了吧。如果活下去，那才是骗人呢……我只恨我为什么不早死两三个月，或早病两三个月，也就没有这场事了。总结一句，我受人累，我累家庭和家人。但是没有人能相信我，因为我拿不出证据来。证据到哪里去了呢？有一夜我独自一算，来看看究竟损失若干。因为大病才好，神经受此重大刺激，忽然把我以前的痰症引发，顺手将贴现的票子扯成碎纸，弃于字纸篓内，上床睡觉。到了第二天一想不对，连忙一找，哪晓得被倒了。完了，完了……”

这时巴金才了解大哥临死时的悲剧是如此令人痛心！他为了做封建家庭的孝子贤孙，放弃自己与一个表姐的爱情，放弃自己到京沪进大学读书的锦绣前程，肩负起家庭“管家”的重担，受尽各房亲戚的倾轧和闲气，却仍在

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境中暗暗挣扎，他东补西贴，耗尽心力，只求能在绅士堆里维持一个“面子”。他始终没有决心改变旧的生活方式，只求与各处妥协，维持原状。而别人却总是利用他的懦弱，处处占他的便宜，使他越来越进入困境。在巴金离成都老家前，在祖父和父亲还活着的时候，他就因为受各种刺激，曾经精神错乱过，但时间很短，不久就痊愈了。这次在一场投机市场的风波中，恰好逢到他旧病复发，等到精神恢复，已经一筹莫展。他在学校里对化学有兴趣，进入社会后又曾从事与西药有关的行业，对药物有研究，那个不幸的晚上，他正是运用他仅有的这点知识，吞服毒药把自己年轻的生命抛弃。他死时神色安定，旁边还安睡着他的一个小女儿，人家是在第二天看到他的遗书后才发现他的嘴边有些粉末，原来他已抛弃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离开世界了。

巴金后来写觉新，始终没有把他的大哥自杀这一点写进去，他还是对着这个人物寄托着希望，他不忍让这个善良的人有这样阴暗的结局。巴金对他大哥深切的同情心，读者是能够理解，并欢迎的。

在大哥自杀后的第二个月，即 1931 年 5 月中旬，巴金的一个在苏州中学教书的朋友杨人榭，知道了巴金因大哥去世，心境不佳，特地来信约请巴金和他在沪的另一个朋友毛一波到苏州欢聚。杨人榭是研究法国革命史的学者，又是京剧艺术的爱好者，他经常以票友身份参加当地的京剧演出，这次巴金、毛一波应邀来访，杨人榭就以京剧演出招待他们。他们看了戏后，又到东吴大学去看一个在那边读文科的文学青年朱雯，当时朱雯正在课余编一本叫《白华》的文艺旬刊，并写过一篇评介毛一波创作的《少女之梦》的文章，毛一波这次来苏州顺便前来看他，并把巴金介绍给朱雯相识。隔一天，杨人榭更邀约三人共游虎丘，并在吴苑品茗。朱雯还带他的未婚妻同来，这就是后来成为女作家的罗洪。这次与巴金一起游览虎丘，毛一波事后还写过一篇题目叫《春天坐了马车》的散文，刊登在上海一家报纸的副刊上。

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本军队侵占了我国东北四省，全国局势非常紧张，上海闸北一带靠近日本海军陆战队驻地，他们随时可以对它进行袭击。许多居民搬到租界，有的干脆迁回家乡，整个宝光里几百户人家差不多搬走一半。索非因为妻子要生第二个孩子，也全家迁移到与开明书店相近的提篮桥去了；房东则早就搬走，所以宝光里 14 号一幢两层楼房只剩下巴金一个人居住。他把书和书架都放在亭子间里，自己搬到二楼。楼上房间比楼下客堂间大，而他除了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一只凳子外，只有那只破沙发。这样，他写稿时，来回踱步的面积就更开阔了。楼下客堂就让给一个为他烧饭的中年娘姨兼做裁缝铺。

《激流》在《时报》连载了五个多月后，忽然停刊了。原来编辑吴灵缘这时已把自己的兴趣移向开店经商。他为了征集资金，让自己的夫人在杭州西湖边开设一家洋货店，曾一度到自己家乡青浦去拍卖房子，把报纸版面之事暂时丢开不管。而且由于东北义勇军抗战的讯息增多，报纸刊登长篇小说的专栏让出篇幅，提供给战地新闻。但是巴金还是继续把这部小说写下去，他觉得应该对读者负责，因为自从这部小说在报上连载后，他和报社都收到过不少读者来信，对小说中人物的命运都表示过关心和同情，他不能让广大读者失望。而战局形势却仍十分紧张，巴金住在这个区域内，不得不随时准备逃难。同时他唯恐小说写得太长了，报社会有意见。果然，不久报社编辑部来了信，埋怨小说写得长了一些，虽没有明确提出准备“腰斩”，似乎已

经是一种暗示。他只好匆匆收场，好在瑞珏离世一节已写好，大家庭崩溃的局面已形成，“家”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但他觉得“激流”却并不曾完，需要继续向前发展。这时他已经意识到需要写三部曲，目前的《激流》只能改称《家》，应是“激流”的三部曲之一。后来《激流》出书时就改书名为《家》，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封面仍由《灭亡》的封面设计者钱君匋设计，他是索非的同事，有时从宝山里开明书店出来，也到宝光里来看巴金。

隔了几天，《时报》编辑部接到了巴金的回信。他告诉他们：《激流》已经写完，在他身边还有几万字的未刊稿。现在他把它寄去，为了对读者负责，他希望报纸尽可能把小说登完。至于稿费，他不要了。这样，《时报》终于把《激流》登完。他们后来果然没有再寄稿费给巴金。

虽然《时报》编辑对待《激流》的最后态度并不令人十分满意，但读者群众中对这部小说的反应却非常热烈。《激流》在开始发表时，就有人阅读过巴金的《灭亡》而对它感到兴趣；他们还因为这是一部写家庭的小说而觉得十分亲切。在《激流》发表之前，在中国除了《红楼梦》之外，还不曾有过这样全面写一个家庭变化的大作品，许多人对小说中一些直接或间接受迫害的人表示同情，并且产生了对封建礼教的反感。后来《激流》改名为《家》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书的初版本很快销售一空，许多学校受过“五四”洗礼的进步教师都把这本书介绍给学生，作为课外书阅读，以此来教育青年认识封建制度的罪恶。广大读者还把觉新作为“作揖主义”“投降主义”和遇事讲妥协的人的代表，来比喻自己周围懦弱怕事的人。他们又把高老太爷作为封建统治者的象征，而把觉慧作为勇于斗争，敢于反抗的叛逆者形象来形容当时的进步青年。这三个艺术典型，与鲁迅小说中阿 Q、孔乙己等人物一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经久流传并作为比喻运用的性格典型。不少青年还直接写信给巴金，向他诉说自己的遭遇，争取巴金的同情，要求他指引前进的方向。长时期来，巴金几乎没有中断过接受这类读者的信件。可以说，他是“五四”以来，中国作家中收到读者来信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的人。他把心交给读者，许多读者也把心交给他了！

这一年初冬，他乘《时报》暂停刊登《激流》的空隙时间里，写完比《激流》还早开始写的中篇小说《新生》，然后又应熟人李少陵的邀约，乘了火车，到他担任科长之职的浙江长兴煤矿去参观。巴金在矿山住了一个星期，并由一个矿工陪同走到矿井下面去看了一次。在这里，一个多月前发生过一次爆炸事件，十五个矿工牺牲。他当时并不曾想到要把这个题材写成小说，只是为了要了解一下矿工的生活。直到两年以后，才因《大中国周报》编者之约，把在这里看到的矿工生活写成小说《萌芽》让他们在刊物上连载。这作品由现代书局出版后，却被国民党政府禁止发行，后来他重写结尾，改题为《煤》，想在开明书店发行，哪知又接到停印通知。直到1935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这本书才因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委员会”不复存在而得到公开发售的机会，不过那时的书名已改作《雪》



#### 第四节炸不掉的心

巴金把《激流》写完，已接近1931年年底。过了阳历年，他接到朋友陈范予来信，说他已从福建黎明中学调到南京工作，而在河南百泉教书的吴克刚目前也正在南京作客，所以希望巴金能乘此时机到他那里一叙。巴金想到他在南京另外还有两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在巴黎一起留学的老朋友卫惠林，他已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做事；另一个则是新结识的朋友散文作家缪崇群，他是《文艺》月刊的编辑。他们与他也有一些日子不见面了，因此觉得趁此寒假期间，去与大家谈谈，确是个很好的机会。

那时上海正面临“一二·八”事变前夕。自从去年9月18日日军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侵占我国东北四省以后，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愤怒的上海市民一致抵制日货，华商银行也拒绝承兑日本商人的提单，一时日货堆积在上海码头上，充塞在货栈里无法流通，连日本的航运都窒息了。有些在上海的日本商店不得不为此关门。1931年10月开始，上海就有三万码头工人的反日罢工，和十万学生的反日罢课。12月9日，上海学生五千多人包围国民党市政府，抗议国民党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同月17日，上海各中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会后还举行游行大示威。1932年1月13日，上海成立了各民众团体抗日救国会。同月20日，日本特务机关联合焚毁我国民族资本家办的三友实业社，捣毁北四川路中国商店。24日他们又故意纵火焚烧日驻华公使重光葵的公馆，以此借口准备进攻上海。25日前后，日本派大批军舰，集结上海，在吴淞口外和黄浦江进行示威，日本领事还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政府道歉，惩凶，赔偿损失以及解散抗日团体。27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下令取消抗日救国会。上海市面一片混乱，特别是闸北一带，因为接近日军驻地，又是日本三万商人和商店的集结地——“小东京”虹口的隔邻，因此闸北居民为了避祸，纷纷迁居，境内十室九空，很多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巴金独个儿住在宝光里一幢两层楼房屋里，也随时准备逃难，幸而《激流》的写作已告一段落，他接到陈范予来信，便准备动身去南京看朋友们。好在那时他住在北四川路底的表弟高慧生在浦东中学念书，寒假期间经常来宝光里巴金这里，巴金去南京就让他在这里看家。

日军开始进攻闸北的那个夜晚，巴金已由南京回沪，正在火车里，火车开到丹阳未能前行，又把他带回南京了。1月29日早晨4点钟，他在寒气的包围中进了下关的火车站，天还没有亮，电灯光显得暗淡，冬天的早晨天亮得迟，他在车站上足足等候了三个钟头，到7点钟才能出站，走到马路上，行人还是十分稀少，车子也还是不多，一切都显得很安闲，很正常。这时一夜未睡的他，觉得非常困倦，不得不找个旅馆把自己安顿下来，然后躺倒床上睡了。

巴金睡到下午，醒后起床就又赶到成贤街去看缪崇群。缪一看见巴金便惊喜地说：“原来你回来了！我们正替你担心。”巴金是25日晚来南京的，曾去看望过缪，因为惦记着上海的局势发展，于28日晚又急匆匆地赶回上海。巴金同缪的相遇纯系偶然。去年早些日子巴金到南京，本是去看一位姓左的朋友，那个姓左的朋友外出未归，却看到一个瘦弱的青年人，一问才知道他就是已通了半年信的缪崇群。当时缪正代替左编《文艺月刊》。巴金与他一谈就谈开了，两人披肝沥胆，非常契合。

巴金看见他很瘦，知道他身体不好，正患肺病，最近还吐了血，就想请

他多注意自己身体，他却拿起桌上的《新民报》号外，说：“你看，真的打起来了！敌人的侵略，我们身为中国人，哪能忍耐得住不反抗！”巴金连忙把“号外”接过来，一看，只见日军进攻上海闸北天通庵路车站的战讯外，副标题上还写着“闸北大火，居民死伤无数。”他的心像被一块沉重的石头压住，唯一的想法是得赶快回上海，要与上海人民一起去经历痛苦的生活。可是，崇群却说：“看情形，火车将要停开一个时期，你回不得上海了，得在南京作暂住的打算，而且住在旅馆不方便，住到我这里来吧。”巴金愣了一下，然后慢慢地说：“你关心我，我感谢。但上海我住了几年了……”他没有正面回答崇群，心里却在想，上海有我的许多朋友，有我的住处，有我喜欢的那些书，而且在日本兵机枪扫射、炸弹轰炸上海人民的时候，我哪能住在南京？

他只是对崇群苦笑了一下，然后和他凄凉地告别。巴金在心底感谢他对自己的关心，同时也在心底祝愿这个善良的人幸福。他在自己患病吐血时，还这样真心地关怀别人。这样的友情是十分珍贵的。

巴金辞了缪崇群出来，时间已近黄昏，他想起“号外”上的消息，仍禁不住心头的激动。他想象着上海目前的遭遇，子弹横飞，炸声不断，许多善良的老百姓正在被敌人宰割，房屋被毁，尸体满地，那将成了怎样的一个世界？那边有他的许多朋友，他们不知怎样了？更无法料想闸北自己住处的命运，他虽没有宝贵的财产，但那里有他自己的手稿，有他日夜辛劳的结晶，还有不少他喜爱的从国外带回来的书籍。他的邻居们怎样了？为他管家的表弟还住不住那边？还有那个为他烧饭的娘姨，想他们总该逃避了这场灾难了吧？天渐渐变黑，他雇了一辆黄包车，急于找朋友打听消息，想尽快赶回上海，但是他忽然听到有个孩子高喊：“快看，快看，看东洋人在上海打败仗！”原来是报贩在叫卖当天的晚报，引起许多人围在那里争购。而他的车子却把他拉远了，但他为听到这样一个消息感到兴奋。

他终于在一家书店门口下车。他看到十几个店员正凑拢着头在读晚报，便情不自禁地跑过去看，才知道驻淞沪的十九路军已出兵抵抗，他们出于爱国热情，主动反击入侵之敌，迎来了全国人民的欢呼。

店员们一边看报一边谈话，不论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不论是伙计还是老板，都说十九路军好：“这次我们再不抵抗，怎么行？把他们打回去，才出我们一口气！”还有人跑过来告诉大家：“白天十九路军开拔经过这里，我们放鞭炮欢迎，他们和我们一起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巴金也觉得自己的心在燃烧，他知道虽然在南京，一旦敌人的魔掌伸到这里，南京的人民也会起来反抗的，也会与这些侵略者拚个死活的！他感到欣慰。

第二天，他又去看了陈范予和其他几个朋友，大家谈的都是上海的战事，大家抢着报纸看，都希望能看到胜利的消息。这些朋友不少是因为各种事情临时从上海来南京的，现在发生突变事件，大家都急于想回去，但是都因火车停顿而阻隔在这里。也有从内地来南京办事或旅行的，包括陈范予，他原想调南京工作，现在看来也可能发生变化，他们听到发生战事，都赶紧搭乘还不曾断线的班车回去了，吴克刚也是这样带了家眷回到河南百泉去的。

巴金被困住在南京，不能回上海，朋友们也有劝他索性去天津看三哥尧林的，巴金自己也为此动心，他本来就十分想念在南开中学教书的三哥，自从大哥去世后，他们兄弟俩曾通过几次信，都曾为大哥的死流泪，并感到焦

惶不安，后来又曾互相安慰，怕对方因悲伤而影响身体。现在日本侵略军在我国到处张牙舞爪，东北三省被占，华北也不平静，天津说不定比上海还乱，他担心三哥的安全。他正打算自己去天津的行程，想不到31日早晨卫惠林打来电话，要他去中央研究院，一见面卫就对他：“听说政府要搬家了！”巴金想，政府不动员人民起来反抗，却忙着想搬家逃难，真有点使人莫测高深。问卫惠林是怎么一回事，他也摸不着头脑，两人就去找别的熟人，想打听一些内情，哪知谁也不知道究竟。倒是当天报纸发表了一项“国民政府迁都宣言”，这才证实真有这样一件事。两人一出门，但见搬迁行李的大小车辆，在街上络绎不绝，不但政府要搬家，居民也在迁居了。卫惠林发现这样的情状，有点不放心起来，就拉着巴金去中央大学看他的未婚妻，哪知她也已准备回家，说敌机可能来这里轰炸，许多人都已拎着行李离校了。有个人对他们说：“政府可能迁到河南洛阳去。”巴金禁不住忿激地说：“洛阳太近了，最好还是搬到新疆去！”

这时巴金只得告别卫惠林，又回到缪崇群住处。崇群那边已住了四、五个人，他知道巴金在南京几天耽搁下来已把盘缠用完，就主动拿出一叠钞票来，借给巴金作旅费。巴金决定想尽办法回上海去；卫惠林留他暂住几天，他也婉言谢绝了。他在南京每天打听有无轮船开往上海的消息，却有人来告诉他，停在下关的日本军舰，昨晚向城内开炮，有个炸弹落在鼓楼上，《时事新报》分馆也中了弹。“为什么我们还不还击呢？日本人这样欺侮我们，政府还要坚持不抵抗政策吗？”那人气忿的问话，也燃起巴金满腔怒火，他忍耐不住在这样环境中闲着，他觉得他应该立刻回到上海去与朋友们一起为抗日救国做一些有益的工作。2月3日早晨，细雨濛濛，是个阴冷的天气。他雇车到了荒凉的下关，在中国旅行社门口看到一张通告，说浦江有渡轮可通。他来到江边，有个人问他是不是想到上海去，巴金连忙回答说要去，他就说：“那你就坐上我的划船吧，我给你划到江心去，因为太古公司的武昌轮停在那边。”巴金喜出望外，就让他划到江心去。哪知那天风浪很大，划船颠得厉害，而巴金只在早上吃了一点点心，中午还来不及吃午餐，空腹碰到风浪，差点呕吐起来，在江上抬头望见江心中那艘轮船上写着“大英国”三字，心里更觉得难过。祖国啊，我们几时能看到你强盛起来呢？

好不容易从划船跳到了轮船上。但船员却告诉他，要等上海来了电报才能开。他十分疲倦地被领进统舱里，躺倒在一个非常肮脏的铺位上，船舱里又闷又吵闹，两桌麻将把他吵得无法睡觉，一夜过去，船还是停在南京下关的江面上，原来船根本不曾开动过，也不知何时能开。巴金起身到舱外一望，天又下雪了，外面一片白茫茫。彻骨的寒风把他重新吹进船舱内，这里仍是又麻将，掷骰子，一片吵声，他只好仍回到铺位上，到下午才听说“开船了。”

5日早上，巴金仍不想起床，因为昨晚又过了一个被吵闹得无法入睡之夜。到中午，有人喊：“吴淞口到了！”他才走到甲板上，看到陆地，看到树木，和疏疏稀稀的房屋，他深深地透了口气，知道真的快到上海了！这次离开上海不过一个短时期，却竟象过了一个整年。

可是，他终于发现岸上被炮火烧毁的房屋废墟了！几架日机还在轮船的上空盘旋着，这些飞机还在远空向岸上投掷炸弹。炸弹三三两两丢在陆地上，掀起一阵阵黑烟，啊，那是我们的领土！船进了黄浦江，渐渐地靠近了陆地，看到的高楼大厦多起来了，终于看见了外滩，望见了外白渡桥，行人，车辆，和北面高空中的黑烟；又听到了隆隆的炮声，密集的机关枪声音。船上有人

惊喊，有人饮泣，有人叹息。

巴金望着对岸迷漫的黑烟，咬紧牙关，默不作声，他觉得自己全身的热血在燃烧，心中发誓要以自己的热血，洒向那些屠杀我们中国人民的日本侵略者脸上去！他知道一个巨大的剧变已经来临。“不要再为个人几本书的烧毁痛惜了，不要再为几间房子的被毁痛惜了！”他默念着，想到尼罗王当年焚烧罗马城，屠杀基督徒，但是最后终必得到历史的惩罚。现在，我们的血也决不会白流，它终必带来我们的解放和自由！

“战争并不可怕，我们有勇气有信心惩罚那些制造灾难的祸首！”

巴金挺起胸，昂起头，望着眼前的现实。船在浦东码头靠岸了，他和三个水手一起跳到一只划子上，然后划到十六铺太古码头登陆。一个朋友看到他，惊喜地问：“你在这个时候回上海做什么？”

“我在必要时，愿交出我自己的生命，”他回答。

巴金回不了自己在闸北的家。他觉得自己成了个无家可归的人了！宝山路当时已变成了一片火海。整个闸北都被日军霸占了。他的住处宝光里附近的东方图书馆和商务印书馆印刷厂早已被敌人炸毁。他晚上没有固定住宿的地方，经常一个人走在冷静的马路上，他强烈憎恨侵略者，他希望血海怒吼起来，把侵略者淹没掉。他找到了表弟高惠生，惠生陪他去看了他们的舅父，舅父已从原在北四川路底的家宅中逃了出来，临时向一个白俄租住了一个大房间，在环龙路（现称南昌路）上。惠生告诉巴金一些有关1月28日晚上他在闸北宝光里所见到的情况，对宝光里房子眼前是否被焚毁也说不清楚。因为当晚局势紧张，他跑到北四川路底舅父家，在慌乱中跟他们一起逃了出来，就再也不曾去过。巴金听了，只好把这件事搁下，却在法租界嵩山路一家医院里遇到索非夫妇，他们也已带着儿子和新生女孩从提篮桥新居逃了出来。索非告诉他，宝光里房屋虽未焚毁，客堂间地板被烧掉，后门也被堵住，而四周都是一片瓦砾，路不好走，要去拿东西，只好等以后炮火停息时再说。第二天，巴金就去亚尔培路（今称陕西南路）步高里52号看两个从日本回来的朋友伍禅和黄之方，他们也是从闸北逃难出来的，看到巴金来，大家都很高兴，说：“这里的人都为你焦急，起初不知道你去南京，都以为你还在闸北，被困在大火里了！”巴金把自己这一星期的经历告诉了他们。他们要巴金和他们住在一起，说“现在是战争时期了，啥都不要计较，我们两个人住一个客堂间，你来了，再搭个铺不就更热闹了么？”巴金真的就在步高里住了下来，虽然他并不是与他们同住在一个客堂间；但是他住的那个小房屋，还是在这幢房子里。

过了几天，索非打听到闸北居民可以进区内探望旧居，就与巴金一起到宝光里去搬运旧宅里的书籍。他们踏着瓦砾碎砖，跨过断垣残墙，来到侵略者所肆虐过的破路残街，鸿兴坊的世界语学会已经成了一片焦土。这个地方巴金曾每天晚上花两个小时坐在办公室的书桌面前从事翻译工作，周围的器具用物、坐椅书橱，都是他十分熟悉的，现在都已变成一片焦木，一切都在侵略者的魔掌中化为乌有了！他们一路上见到的都是歪倒的电杆木，倾坍的房屋，烧焦的木头，还有蜷缩着被烧焦了的尸体，甚至地上还有流淌的血。他们在废墟上慢慢走着，再也认不出哪里是饭馆，哪里是店铺，哪里又是朋友们居住过的地方。他们在路上受到两次搜查，还看见一个中国老百姓在日兵岗哨前受辱，那个老百姓被打耳光后一声不响跑了过去。这样的情景，使巴金终生难忘。他们终于到了宝光里，这条弄堂虽不曾毁掉，但却关着，他

们只得从隔壁被毁坏的墙洞里进去，房子的亭子间被一个炮弹打破，但只毁了家具，其他用物都被人拿走了。巴金和索非一起把书籍搬运出来以后，就回到步高里住了下来。他立刻把这个时期所经受到的思想感情，倾注在自己的作品上，他把去南京时所带的一叠开明书店四百字一页的稿纸拿了出来，他当时准备写的那个中篇《海的梦》，只写了开头的一句话：“我又在甲板上遇见她了，立在船边，身子靠着铁栏杆，望着那海。”

以后到了南京因为发生战争，心神不定，忙于回沪，始终没有动过笔。现在他终于又恢复写这个中篇的打算，他用“高国军队”来代替对日本侵略军的称呼。他把自己在日军占领区所看到的情景全部写到小说里的“奴隶区域”里去。他把这个时期积郁在心头的怒火，都燃烧到小说里去。这是一部为奴隶呼唤人道主义的书，也是一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向它们提出控诉的书。小说从头到尾都是他住在步高里时写成。他写得很快，到2月底就写好了。当时发表在施蛰存所编的《现代》月刊上，先由新中国书局出版，后又由开明书店发行。当时上海以爱国的新闻记者戈公振为主席的上海作家抗日会宣告成立，会上发表《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签名的除戈公振外，还有巴金、陈望道、丁玲等共129人。

他们在步高里住了一个月光景，到了3月中旬，房东就想把整幢房子的租赁权转让给巴金和他的两个朋友。但是他们三人凑不满高昂的租费，只好把房子退给房东。巴金便在环龙路志丰里11号舅父家所住房子中，另租了一个房间；那两个朋友也在这时离开上海了。就在那时，巴金第二次去闽南，回来时舅父已在环龙路另租了一幢叫花园别墅一号的房子，并把巴金的书籍衣物也都安顿到这里来。巴金在这里住到1933年春天，直到在邮局服务的舅父调到湖北宜昌工作，他才随着舅父的迁居搬出了这幢房子。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的续篇《新生》，正是住在这里时重新写成的。

《新生》原早在“九·一八”事变前住在宝山路宝光里时写成，由索非转送到《小说月报》去，这次是郑振铎经手，他们准备在第二年即1932年第一期上把它刊出，并在报上登了目录预告。但在把书印好正预备装订发行时，“一·二八”战事发生了，商务印书馆印刷厂被日军用燃烧弹烧毁，厂区四周几个日夜纸灰飞扬，黑烟冲天。敌人以为把印刷厂烧掉，就可以把中华民族的文化毁灭。《新生》的原稿和排印好的刊物，的确也是在这场灾难中遭到焚毁，一般读者以为再也看不到《灭亡》的续篇了。巴金在2月初从南京回来，从索非口中知道了《小说月报》一月号因印刷厂被毁而未能出版的消息，又从印刷厂熟人处了解到《新生》原稿一起被烧的确讯，他听了并不作声，也不因此而感到难过，因为这个时期他看到的灾难实在太多了，比他的小说原稿更重要的东西都遭到敌人的破坏，许多老百姓都无缘无故地遭到杀害，一部书稿算得了什么呢？当他在南京看到敌人的第一颗炸弹落下时，就已知道为了人民的自由，应该作出怎样的牺牲了。他从南京赶回上海，正是为了要为人民牺牲，要与敌人进行斗争！

当然，牺牲并不等于毁灭！“我的精力是侵略者的炸弹毁灭不了的！”他这样说，并以他那炽烈的情热与惊人的毅力，在当年的7月间，以短短的两个星期时间，写出了中篇小说《新生》的第二稿。

敌人的炸弹，炸毁了房屋，烧焦了土地；却没有炸掉中国作家爱人民、爱祖国的心！

## 第四章在鲁迅的旗帜下

## 第一节难忘的南北之行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的当年9月，巴金来到七年前曾经来过的北平。在这里，秋季依然是天高气爽，晴空万里。巴金的心情却并不平静。他当然早已不是七年前一个晚上那个坐在北海的漪澜堂上，面对海水，孤独而又忧郁地想着自己前途的青年了；现在他已在一年半时间中，写了十本长、短篇小说集子。他的朋友正在成倍地增加。一些刊物编辑已不再仅仅通过索非来向他组织稿件，而是直接找他联系，以致他有时不得不以自己的文章去应酬一些朋友。而那些刊物又经常登些他见了就感头痛的作者名字，他也不得不让自己作品与这些人的大作排在一起。这使他感到痛苦。他想起临行时，索非向他转达他的第一本小说《灭亡》的责任编辑叶圣陶和他的第二本小说《新生》的责任编辑徐调孚对他的劝告，要他慎重发表文章。他感谢这两位师友对他的帮助，但他竟一时无法停住自己的笔，来解脱这样的矛盾。他经常觉得似乎有一根鞭子在鞭打自己，那就是多年来自己所感受到的痛苦，使他觉得非拿起笔来写点东西不可。他简直无法克制自己。满腔的热情驱使他，要他用笔对黑暗的社会提起控诉。他不仅写文学作品，还在这几年中，著、译了近两百多万字的各类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没有稿费，而有些人却以为他发了大财。他并不曾想以文章显姓扬名，只求自己的作品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能有更多的读者听他的申诉。但是现在他的文章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发表得确实不少了，他的名字甚至在包花生米的纸上也常常可以看到。有些人读了他的文章对他不满，把他作为攻击的对象；而有一些人则把他的名字作为广告。他曾经想从此搁笔，放弃文学写作，去从事更实际的工作，但又缺乏这样的勇气，同时对生活的燃烧的热情，又使他难以放弃手中的笔，因此，他还是继续写，写，写……

他是带着矛盾的苦闷的心情，作这次北方之旅的。他的旅行从来不仅仅为了赏玩风景，或为了留恋山川；而是为了寻访友情。他希望从旅行中接触社会，在友情中得到温暖与力量。

这一年九月，他先去青岛沈从文家里住了一个星期。沈是巴金不久前在上海结识的。当时南京《创作月刊》主编汪曼铎来沪约稿，他请巴金在环路附近一家俄国人开设的西菜社吃饭，席间还有一个客人，那就是沈从文。巴金去法国前读过他的小说，后来还在巴黎听胡愈之多次谈过他的作品。他俩一见如故，饭后巴金就又跟着他到西藏路一品香旅社他的住处坐了一会，把他的一部短篇小说集《虎雏》介绍给新中国书局出版，并当场付给了沈从文一笔稿费。沈从文约巴金到青岛去玩，说他在青岛大学教书。巴金到青岛，从文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他，使他有条件写信，写文章，巴金在那里过了一个星期的愉快生活。然后他又来到了北平。来到北平则是由于缪崇群的邀请。

他难忘缪崇群今年一月底在南京接待他的热情。那时他因火车被阻重返金陵，听到日本海军陆战队占领上海北火车站的消息，回到缪的住处看到《新民报》号外，崇群对他说：“看这情形，上海是没法回去了，你就在南京多住几天吧，住旅馆不方便，还是搬到我这里来住好一些。”他虽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但是他感激崇群在他无家可归时伸出的双手。现在，崇群从南京来到北平，是为了料理他父亲的丧事。他住在一个公寓里，和他新婚的夫人住在一起。他的夫人和他同样善良。为了接待巴金，她住到自己父母家去，还从家里搬来新缝的棉被，让巴金与她的丈夫睡在一张床上。巴金在这里住了

一个星期。白天，他们夫妇陪他看电影、游故宫；晚上，他和崇群经常谈话谈到深夜，入睡后巴金又常为崇群的梦呓惊醒，一到早上，崇群问巴金是否睡得好，巴金却总是说睡得很好。实际上，巴金脸上露着笑，心里却只想哭，因为他从崇群夫妇潮红的面颊上，发觉他们都患着严重的肺结核症。而他们仍带着欢笑在他的面前张罗一切，希望巴金在他们的家里过得愉快。

巴金在这个期间并不曾忘记他的写作，他在缪崇群住的那个小小的公寓里，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电椅》，一篇题目叫《灵魂的呼号》的散文的开头。

七天以后，巴金离开了北平。他牵挂着在天津的三哥尧林。三哥在接到大哥自杀的电报时，曾赶到上海约巴金一起回成都料理大哥后事，巴金唯恐陷入家庭圈子，无法自拔，没有同意回去。到现在他们俩还不曾再见过面，他必须去看他。在去天津的火车站上，前来送行的除了卞之琳，还有缪崇群夫妇，他们为巴金抢携行李，像哥嫂那样频频叮嘱他路上注意安全，就是没有说到他们自己的健康。巴金很想说几句安慰他们的话，但他讷讷不善于言的习惯，满腔感激心情，竟一时无从表达，虽深知他们的健康很不好，但仍没有想到这是与崇群夫人最后的一次会面了！

来到天津，三哥正在车站上等候他。尧林自从在北平的燕京大学毕业后，就在这里的南开中学担任英文教师。他在求学时原是个勤奋苦读的好学生，为了能减轻家庭的负担，他一边读书，一边兼作家庭教师，毕业那年家庭破产，无法继续提供他的学费，他就以更好的学习成绩来争取学校的奖学金，并把做家庭教师的微薄收入来交自己的膳费。毕业后到天津，在南开中学做了教师，本可以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但大哥在成都自杀了，留下一个家庭需要他挑起担子，他又心甘情愿地按月把自己的一半薪金寄到四川去赡养老家。他忍受一切，又放弃一切，至今还是个单身汉。他把个人的不幸，埋在心底。在学校里，在众多的青年学生面前，他仍是个开朗乐观的教师，关心大家的学习，也关心大家的生活，经常与同学们谈谈笑笑，甚至与他们一起打篮球，打网球，一起挤在大食堂里吃包饭，天天凑成八个人，围坐在一张八仙桌上，嘻嘻哈哈地把桌上的几只菜吃得一干二净。而他在课堂里教英文，则有一套自己的教法，他不强迫学生死记文法，而是采用直接教学，注意活的语文，鼓励学生朗诵，还教大家唱英文歌。尧林在四川老家时本来就爱好声乐，也喜欢唱歌，学生时代还与巴金一起排过英文剧本。他一向觉得自己寓教于娱乐是个好办法。他还注意学习与休息相结合，有时课上了一半，他让学生奔出教室去河畔散步。当然，他不仅是个循循善诱的教师，还是个有正义感的，在原则问题上不肯随和的人。比如有些人对学生看的课外书，限制得非常严，他们在学生宿舍中发现一些新书，就在教务会议上作为“危险”现象提了出来，而尧林则和他们进行争辩。他觉得引导学生自由阅读，必能使学生进步，对学生管得太严，往往适得其反。

巴金与三哥尧林这一次的会面，都免不了引起对大哥的怀念。巴金觉得三哥比过去瘦了一些，也老了一些，他来到他的宿舍，环顾四周，很为三哥感到寂寞。他问起三哥对他自己今后生活的打算，三哥却始终没有个明确的态度。巴金直率问他是否有结婚的准备，尧林却反而关心起巴金的事来。巴金从三哥的脸上看到他的孤独与疲劳，很想劝他改变一些生活方式，甚至想帮助他介绍个对象，而三哥却无可奈何地说：“这有什么办法呢？”

这一年，巴金还在北平认识了何其芳。后来何也来南开中学教书了，当时他还不曾开始写他的《画梦录》，却已写出了以“这一个心跳的日子终于



来临”为第一句诗句的《预言》诗。在巴金来到南开中学的这一个月，何其芳诗作正趋向高潮，他在9月15日开始到9月23日的八天时间内，共写成了《罗衫》《梦歌》、《一秋天》、《花环》和《爱情》等五首诗，这些诗后来发表出来，脍炙人口，倾倒了一批文学青年。它们发表的经过，大都与巴金有关，多刊登在巴金参加编委的《水星》和《文学季刊》以及后来的《文学季刊》上。后来还都由巴金把它们编在何其芳的诗集《预言》里。

在巴金到北平、天津后的第二年即1933年春天，尧林又来到上海看望四弟巴金。这是江南最美好的季节4月初旬，也正是学校春假期内。尧林一到上海，巴金就与他一起去杭州同游西湖。西湖两岸柳丝飘拂，一片新绿，春天在这里确比别处更为秀丽。但是他们兄弟两人逗留时间最久的地方，还是在岳王坟前。对于宋代的民族英雄岳飞，他们在少年时代就熟悉他，《说岳全传》曾是他们开始课外阅读的第一本小说。这一次他们还在岳坟附近找到牛皋墓，好像看到了这个一千多年前曾经“气死金兀尤”的老英雄。同时这个老将军在舞台上撕毁圣旨的形象，也在巴金的心头浮现出来。巴金从1930年开始，每年都来一次杭州，每次都都要在这里徘徊，怀念这些爱自己祖国，爱自己民族的英雄。对跪在岳坟前的几个卖国贼，特别是对那个身踞重位的秦桧，则觉得他们卑鄙可耻。这次来西湖，是在“一·二八”事变之后，他们已亲身经历了外敌入侵，民族受难的灾祸，深知一旦敌人占领了我们的国土，人民将处在怎么样的水深火热之中。面对古代的民族英雄，更加深了敬仰。兄弟两人还到秋瑾的“风雨亭”前凭吊。他们把这位现代女英雄的形象与鲁迅小说里的描述联系起来。他们背诵张煌言“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的诗句，一边还在那里找到了于谦墓。

三哥尧林回天津时，巴金送他到南京，当时他们的妹妹李琼如已与他们的表弟高惠生结婚，住在南京城里。巴金特地去看他们，并和高惠生一起去为三哥尧林送行，看尧林从浦口乘上北去的火车，巴金才回上海，在上海过了一个月，又与西江乡村师范的陈洪有第三次到闽南泉州。那时吴克刚、陈范予等都早已离开，叶非英因操劳过度，健康情况比过去更差。巴金却在这个时期的平民中学认识了在那边教书的陆蠡，当时他们讲话的机会不多，两人又都不善于交际，还只停留在一般相识上。直到几年以后，陆蠡进了文化生活出版社，他的创作才能，和善良的品格，才逐渐为巴金所了解。

离开泉州后，陈洪有又陪同巴金去广东旅行了一个月。那时《家》（即在《时报》发表的《激流》）早在开明书店出版，与《家》同时开始动笔写的“爱情三部曲”的第一部《雾》，在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刊登完毕；第二部《雨》正在缪崇群编的《文艺月刊》上刊登，他是带着“爱情三部曲”的第三部《电》的腹稿，去广东旅行的。不过在这次旅行中，他被沿途所见的景象吸引住了，并不曾动笔写《电》。

他们是从泉州往香港再进入广东的。在闽南搭小火轮先到香港上岸。陈洪有经常往来闽、港、粤之间，非常熟悉这里的一切，一到香港，他就带领巴金去游览。巴金尽管那年去法国，轮船停靠香港时也上去观光过，但由于人地生疏，所见不多。这次有陈洪有作向导，去了许多地方，他们先坐登山电车到太平山顶，看香港的全景。在这里看到了美丽平静的大海，海水碧清，大小轮船在海面上飘浮着，景色如画；看到整齐的市街，房屋象积木一样排列在一起，穿着各种颜色衣服的人群象蚂蚁似的在街上流动。接着，陈洪有

又陪同巴金下山去街市搭乘电车，这里的电车与上海不一样，都是双层的，他们从先施公司门口上车，一直乘到筲箕湾，……到了晚上，他们又搭小火轮离开香港去广州，陈洪有又请巴金到船舱外，站在甲板上看香港的夜景，巴金抬头向前面望过去，只见香港越来越远了，越远越见得那夜景的美丽：千万盏像星星一样的灯，点缀在山上，街上，建筑物上，四周却是一片诱人的神秘的大海，这诗一样的境界，使巴金几乎为之沉醉。

当他进入船舱内，大自然给他的诗样的幻境立刻消失了。他们是在二等舱过夜，每个人一张帆布椅，座位排得密密麻麻。但这并不妨碍小贩叫卖各种零食和药品，他们一会儿叫卖牛肉干，一会儿又叫卖“十灵丹”，而躺在邻近帆布椅上的四个姑娘，却又摆起桌子叉起麻将来。这使 he 想起“一·二八”事变时，他从南京乘轮船回上海时那受难的一夜，而现在竟然又好象历史重演了。这个晚上，他实际上也只睡了三、四个钟头。第二天早上一起身，走出船舱，却听见一阵锣鼓声，抬起头一看，原来有一只龙船从对面划了过来，这才使他想起今天正是旧历五月初五端午节。

上了码头后，陈洪有陪同他乘车到了新会，洪有他们办的西江乡村师范也就到了。这里也跟福建泉州的黎明中学、平民中学一样，是一些献身于教育事业的青年，凭着他们自己的理想办起来的一所学校。它座落在一个山脚下，房子是由三个祠堂改建的。教师和同学打成一片，相互的关系是兄弟和朋友。为了表示亲切，教师改称辅导员，像大哥哥一样，与小弟弟们经常一起说笑谈心。巴金住在堆着杂物的庶务室里，他的床放在陈洪有的床对面。这间屋子阴暗而闷热，他只能在那里过夜，却不能在白天工作。所以他在白天总在图书馆里看书，或进城去找朋友聊天。还有不少时间，在学校里观察师生之间的关系，分享他们真诚的友谊。陈洪有曾经向他诉述自己患病时，同学们向他流露的关切之情，这些年轻同学总是三三两两轮流来看他，为他煎药，扶他上诊所看病，有时还来到他的病床边谈天，消除他病中寂寞。

巴金还由朋友陪同到附近的城镇和乡村观看那里的农民活动。这些地方当时虽非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管辖区，但思想影响还是有的，他看到一些农民怎样组织起来，和一些土豪劣绅进行斗争。他们经常集会听一些可以信任的教师讲话，同时又自己上台控诉一些一向骑在他们头上的土豪的罪行。巴金还旁听了一次农民的小组讨论会，听他们发表对组织农会的意见。他虽无法完全听懂他们的广东话，但他从他们受昔的脸上所表达出来的诚恳和信任的表情，可以看出农民心中渴望翻身的强烈愿望。巴金的朋友还当场向他介绍了两个中年农妇，说她们曾经面对面地与土豪劣绅进行辩论，是这里的勇敢的战士。而她们在巴金面前却显露着羞怯的微笑。

在从新会城到公益的新宁铁路线上，火车由轮船载着缓缓地驶过潭江，这一不平常的景象吸引了巴金。他禁不住走下车去看船工们的劳动。他看到轮船的甲板上铺着铁轨，火车正躺在铁轨上喘气。有些工人在扛抬铁链，有些工人则全神贯注地掌握着机器，他们一边操作，一边抬头望着前方。前方是平静的江水，四周也是一片汪洋。远处才是江岸，岸上有树林和房子。巴金看到这样的景象，觉得有一种喜悦得使他内心震颤的力量在支配他，使他感到这里的诗情画意。他觉得从机器产生出来的诗，是十分有力的。他默默地想着：“诗应该给人以创造的喜悦，诗应该散布生命。真正的诗人一定能认识机器的力量。”他想起他在上海经常看到一些工人修建大楼，他们把一根根又高又粗的木桩打到土地里面去，这时他们和周围的群众总是脸上洋溢

着微笑；此刻，他们掌握着机器，把铁轨和火车以及千百个乘客一起载向对岸，他们的脸上也浮起微笑。这微笑，就是机器的胜利，机器的力量，也就是机器创造出来的诗！

巴金在这次旅行中，从农民朴实的脸上，和工人坚实的双手里，都看到劳动者的力量。他的心中得到满足，他感到生活充实，身心愉快。在离开西江乡村师范前的一个晚上，他又参加了学校里的一次谈心会，许多教师和同学都发了言，最后大家请巴金也谈一下自己的感想，巴金从一个名叫汤·苦卜尔的英国诗人谈起，说这个诗人有一天碰到一个女孩，请他在纪念册上题签，他就给她写了几句诗，一开头就写，“爱真理，孩子，爱真理吧；它会使你青春的早晨欢欣！”接下去就对生活的态度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

“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自己行为的裁判官。”

后来他又引用了法国一个青年哲学家的一段话，然后发表自己的结论，说：

“所以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生活，热烈地爱人民；帮助那需要爱的，反对那摧残爱的；在众人的幸福里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的自由……”

第二天黄昏，巴金离开了这个乡村师范。临行，学校门前站满了送别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临别依依，有的人两眼噙着泪花。有人问巴金：“你还有话要说吗？”巴金说：“没有了，我反正还要来的。”他确曾想以后还要去，但他也知道再去的机会是不多的。有两个老师陪着他穿过草径向河畔走去，半途中却听见背后有人喊：“等一等，我也来送你。”巴金回过头去，却是个姓林的孩子。两个老师让他一起送了一程，到了码头，叫他回去，他仍不走，直到船开了，他还站在岸上望着他们。

巴金上了小船，在船舱里望着那三座祠堂越来越远，想起这一段时间在这里所得到的友谊，心里不禁有点凄怆。他觉得他在世间所获得的太多了，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付与。在这段日子里，他走了许多地方，每个地方都得到朋友的爱，包括孩子们对他的感情。他觉得这些年来自己全靠着朋友的情谊而能愉快地活着，他差不多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感觉到好象回到了自己的家，回到了在上海闸北被日本侵略者毁坏了的宝光里旧居。他从朋友的感情里得到的是那样多，而自己将怎样为别人贡献一点力量呢？他愿意自己成为一块木柴，在阳光下感受光，感受热，让自己燃烧起来，粉身碎骨，也要给人们增添一点暖和，加上一点温馨。

当然，他在旅行中，不仅得到知识，得到力量，得到友爱；同时还看到人间的不幸，世态的炎凉。

告别了乡村师范的朋友们以后，他就应邀到西关赴一个朋友的宴会。在那里他从一家酒楼的热烈的场面上，发现到一个惊心动魄的社会阴暗面：在美丽的楼台亭阁里，在喧闹的舞台歌榭中，在山珍海味的盛宴酒席上，竟在一次次地演出一幕幕贩卖妇女的丑剧。一个五十多岁的黄脸妇女，牵着一个青年女子，向一桌桌筵席上的人兜售，有的索价一千三百元，有的索价一千五百元。那些可怜的默默无言的弱女子，颈后拖着长辫子，并且能写几个端庄的毛笔字，却在当众估价出卖，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这是一种怎么样的社会制度？巴金目睹这样一个黑暗现实，心里极不愉快，他知道自己祖辈父辈都买过姨太太，在同辈中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是像现在这样在茶

馆酒楼公开兜售女人，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感觉到一股猛烈的怒火在心头燃烧，他要控诉！

到了广州，他住在珠江的南岸，寄宿在机器总工会的三层楼一个小房间里。这里住着许多因参加工潮而被开除的失业工人，环境十分嘈杂，一到晚上，因为楼下是个娱乐场，经常演出粤剧，声音就更加吵闹，因此常使巴金无法入睡，即使他拖迟到每晚九、十点钟回来，这里也还是很不安静。但是巴金还是坚持阅读和写作，因为喧闹只能影响他的睡眠，却不能阻拦他的工作。

在他住的楼房对面就是架设在珠江南北两岸的海珠桥，他每天早上去河北，或每个晚上回河南，总要经过这条像上海外白渡桥那样的大铁桥，不同的是桥下有一条长堤，是人们在河北的一个游览胜地。每晚，巴金总是从那条长堤迈着石级走到桥上。沿着长堤停泊着一艘艘船艇，天黑时，船上的姑娘就从船舱里来到堤上，向这里的行人或休息乘凉的工人轻声地问：“要不要乘船艇玩去？”这些为生活所迫的女人，穿着黑色的香云纱衣裤，像鬼魂一样躲在黝暗的灯光里，出卖着自己的身体。从她们没有表情的脸上，巴金再一次看到这个社会罪恶的黑影。

当然，也有许多只供游览的小船。有一个晚上，他和两个朋友一起在长堤上走着，只见许多女人正在问过路人要不要雇只小船游江，朋友中的一位是当地一家旅馆的会计，对四周环境非常熟悉，当时他就叫一个中年妇女带着大家乘一条小船去游览。船由那妇女的丈夫撑着，她自己则在后面荡桨。他们熟练地转了几个弯以后，很快就把小船撑到了一个四周都是画舫的热闹中心。巴金从小船的舱口上望出去，只见那些水上画舫里，有的男人抱着一对姑娘，有的则是一个年轻女人陪着几个男人，各种不文明的景象使人感到吃惊，但奇怪的是这些画舫还紧紧挨拢在一起，各不相涉，好像司空见惯，毫不知耻。巴金见了这些现象，不免发愣，但就在这时，他们的小船已被船夫摇到一条灯光辉煌的大船边，巴金回头一看，见船头上，挂着一块招牌，写着“花捐征收处”几个大字，招牌边还站着一个警察，正在奉命执行征收“花捐”任务。巴金这才恍然大悟，知道靠妇女出卖肉体吃饭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了！

隔一天他又见到了那个做会计的朋友，谈起那天晚上游江的事，那朋友告诉他说，“你不知道那地方的名字吗？它叫‘鬼棚尾’。因为它接近租界，所以大家给它起了那么一个名号。”

巴金住的广州珠江南岸，当时还是个赌场的集中地，在那里有大大小小的公开赌窟十多家，多以什么“公司”为名。这些“公司”也和“鬼棚尾”的画舫一样，要向当时政府纳税交捐。这不能不引起巴金深思，他想：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使发横财成为人们的普遍愿望。连穷人都幻想以极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酬报。因此他们也参加摇花会，买彩票，但是他们本钲最少，最后吃亏上当的还是自己，而由此获利的，却是谁呢？

在一个多月的游历中，巴金看了许多丑恶的众生相，加深了他对社会的认识。那些日子他还经常到中山大学生物学教授朱洗的家里作客，有时则到朱教授的实验室里闲谈。他认识他们全家人，也看到过朱家的一个女佣，她是从顺德乡村来的劳动人民，平时一张黄脸上总是笑容满面，还欢喜讲话。她的样子很粗鲁，却爱时髦，常打扮成像个有钱人家的太太，传说她常在主人给她的买菜钱中捞油水。巴金对她的印象并不很好。那天，天下着细雨，

巴金和陈洪有一一起在中山大学生物实验室里和朱洗聊天，时间已接近黄昏，天色快黑了，却见那女佣送了伞来催朱洗回宿舍去吃晚饭，这次竟看不见她的笑脸，似乎话也不多，把伞递给朱洗后就走了。朱洗望着她的背影远去后，悄悄地对巴金和陈洪有说：“她回乡三天，杀了一个人，今天一早回来了。”两人听了，很为惊奇，就向朱洗探问经过情形，据朱说，那女佣回到顺德农村，听说她的兄弟给一个当地经常欺压农民的土豪打伤了，她就跑去和他论理，那土豪二话不说，竟也把她打了一顿，身上还留下不少伤痕。女佣挨了打，回家在床上躺了一夜，心中越想越不服气，第二天就拿了一支手枪去找土豪，那土豪正在河畔踱方步，看到她走来，就嘲笑她，问她挨打挨够了没有？她一气就拿起枪，连开了三枪，把这个仗势欺人的恶霸击毙了。这时，邻近的农民听见枪声，都跑了过来，她也不逃，说，“你们去报警吧，我杀人偿命！”那些农民互相望了一望，也不说话，心里却很觉痛快，过了一会，有个人说：“你走吧，我们不会抓你的。”她就回城来继续替朱家做佣人。

巴金听了朱洗的叙述，脑海里很快浮起了那个在高尔基的《草原故事》中出现的女英雄形象。他想：要了解一个人；多么不容易！我几乎把一个英雄看作一个不光采的贪财的女人了！

这件事，也给巴金积累了平时观察人的经验。

许多人旅行，总把注意力放在游山玩水上；巴金的旅行，却是这样的不平常。

## 第二节和鲁迅的会见

巴金风尘仆仆地从广州返回上海，恰好上海正在传说着最近发生的一件大事，说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了爱国人士杨杏佛，反动派的黑名单上的下一个暗杀对象将是鲁迅，而鲁迅却不顾危险，还是去万国殡仪馆亲自为杨杏佛送殓。

巴金对鲁迅是十分敬重的，十二年前他去北平考大学，因病临时未进考场，住在北河沿一个公寓里，陪伴他度过这半个月寂寞苦闷的生活的，就是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他早就读过鲁迅的小说，但他不是一开始就懂了它，而是逐渐深入了解它的。他觉得鲁迅对社会知道得多，知道得深。鲁迅的作品不但教会他懂得写作，而且也教会他懂得人生。它是他的启蒙老师。他在几年中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后来又读了鲁迅的另外两本著作《彷徨》和《野草》，他更热爱它们，还背诵了它的某些篇章。现在，他听了有关鲁迅的传说，他为他耽心，更对当前社会的黑暗现实感到忿怒。

过了一个月，即1933年8月初，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月刊刚刚创刊，第一期的内容有鲁迅矛盾的言论，也有巴金的作品。刊物的主编傅东华在靠近南京路的会宾楼找了个小房间，请几个作者聚宴，想听听大家对刊物的意见。被请的人不多，巴金到时，看见个子不高、戴着金丝边眼镜的主人傅东华和助手黄源已坐在那边，等候着大家。旁边还有矛盾，他对《文学》的支持是很大的，不但自己写稿，还帮助傅东华向各方面的作者组稿。巴金和他虽是第一次见面，但早就在成都时知道矛盾的名字，他特别欢喜读他翻译和介绍的被压迫民族的短篇小说。五年前他在法国，还读过矛盾在《小说月报》发表的三部曲《蚀》，回国后才知道原来矛盾就是这个刊物的前任编辑。巴金把他当作前辈一样，尊称他为“沈先生”。他们两个正说着话，看到接着来到的还有叶圣陶，他现在已是巴金所熟悉的人了，因为他在《小说月报》上经手编发过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巴金回国后曾由索非介绍，见到过他，但不经常来往，虽然巴金把他当作者师。后来到的还有郑振铎，是《文学》的另一挂名主编，他也是文学研究会成员。此外还有鲁迅的弟弟周建人。他们都是《文学》创刊的积极支持者。大家正相互招呼着，忽然房间门帘一掀，一个老人进来了，巴金抬头一看，就知道那是鲁迅先生，瘦小个子，浓黑的胡髭，浓黑的横眉，可是比在照像上看到的更加和善慈祥。

傅东华给大家作了介绍，这次很自然的，被介绍的重点是巴金，因为许多人是相互认识的，而巴金却与不少人是初见，他也是席中最年轻的作家。

鲁迅一到，席上便热闹起来。他说话亲切，自然，幽默而有风趣。大家知道鲁迅来上海已经六年，一直住在虹口东横浜路景云里23号，刚在不久前迁居到施高塔路（即今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来到这里要乘二十分钟时间的电车，他精神很好，讲了许多话，一点也不疲倦，谁也不曾感觉到他患有肺结核病。当时东北义勇军还在我国东北与日本侵略军浴血作战，国难临头，敌忾同仇，人民是坚决支持抗日力量的。而国民政府连全国各界人民慰劳马占山将军的两千多万元捐款，也要贪污虚报，公布的数字只有一百七十多万元，所以引起各方普遍不满。1月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5月中，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代表全国人民到德国驻沪领事馆抗议希特勒残害无辜，压迫学者，到6月18日杨杏佛就被暗杀了。当时的局势这样严峻，而中国的文艺界，林语堂办的《论语》半月刊，却在这时竭力提倡“幽默”

和“性灵”，他自己又写了一篇《做文与做人》，说左翼作家光喊“打倒，起来，杀、杀、杀”的口号，“到处骂人”，“所以首要弄到失业，然后怨天尤人，诅咒社会。”还发表《蒋介石亦 论语 派中人》，提出“希望一般跟人家喊主义喊口号的酒囊饭袋书蠹能够听蒋先生的话，打破主义的迷信”。他讲的，当然是反话，但很不严肃，听了只使人发笑，因此他写信向鲁迅约稿，鲁迅复信说：“重重压迫已不能喘气，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断然拒绝。

这天，鲁迅先对《文学》杂志提出一些希望，并为傅东华出了一些具体点子；然后与大家一起谈到京沪那些帮闲文人的各种丑态，和国民党的既愚蠢又恶劣的宣传方法，最后终于谈到林语堂和他编的《论语》。鲁迅和大家对《论语》所提倡的“幽默”和“性灵”都感到不满，认为他们油嘴滑舌，既脱离当前现实，又很不严肃，只能引读者走向歧途，削弱民众的战斗力量，归根结蒂，是为统治者作了帮闲和帮凶。鲁迅又告诉大家，他曾写信给林语堂，劝他翻译点英国古典文学作品，因为鲁迅知道林的英语基础很好，如能把他的才能用在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上，那比目前提倡幽默小品要有意得多；林语堂却拒绝鲁迅对他的建议，他很不高兴地回信说，等到自己老了，再考虑去做这样的事情。而鲁迅还是替林语堂的才能表示可惜，觉得他的这位老朋友把时间精力花在办《论语》这样的刊物上，太无聊了，他希望林语堂有一天能转变。

巴金听着大家畅谈，有时自己也偶然说上几句，但他讲得很少，主要是听着鲁迅亲切自然、诚恳动人的谈话，觉得这样一个有笔如椽的大作家，和他相处竟是那样平易近人，而且心地是那样热情，那样善良，那样慈祥。他为之感动。他从鲁迅身上，既吸收了他的思想的精华，也感受了他素质的纯美。他觉得鲁迅有满肚子的好心好意，好像随时准备着分给和他接近的人。鲁迅的眼睛明亮如炬，它的光芒，照透了人们的心，使善良的人感到温暖，使邪恶的人为之颤惧。巴金见到鲁迅虽还是第一次，但这“第一次”就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鲁迅也早从《小说月报》上读到过巴金的《灭亡》和他的短篇小说，也知道他的《家》刚在开明书店出版。他在谈话中，不时用和善的期望眼光扫射到巴金热情的脸上。

这一天相聚，茅盾在座上也讲了不少话，他与鲁迅往来是十分密切的。这一年1月，他的《子夜》出版，第二个月他就带着夫人和孩子到鲁迅家，把《子夜》当作礼物送给鲁迅。鲁迅读了后很高兴，多次在给朋友的信中称赞这部作品是一部巨制，认为那是左翼作家的骄傲。他给当时正在苏联的朋友曹靖华写信，说“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亦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计三十余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不久前，鲁迅还与茅盾、郁达夫等一起联名发唁电给被法西斯当局杀害的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家属，并为死者的家属募捐。那时巴金也已读过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杰作，他对这些作品都很赞赏。他对今夜鲁迅、茅盾、叶圣陶几个人在这个没有人打扰的旅舍房间里的会晤，听着他们对文学界现状的谈话，觉得那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就在一个月里，巴金与鲁迅、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一百零五人，联合发表《中国著作家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事》，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四省，拥护9月初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世界反战会议。

就在这一年9月，即巴金从南方旅行回上海不久，就收到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的请帖，他发去贺电，祝他们“幸福无量”，却来不及赶去参加他们的婚礼了。听说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的水榭举行婚礼，虽没有主婚人、证婚人，但客人倒是不少，大都是北方几个大学和文艺界熟人。那天沈从文穿了一件蓝毛葛的夹袍，张兆和穿的是件浅豆沙色的普通绸旗袍，两人一团喜气，也使在场的客人分享了他们的快乐。客人中有靳以，更有比他们大几岁的郑振铎。靳以也是巴金的熟人，他在两年前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曾因与巴金同在《小说月报》上的同期版面上发表短篇小说而结识，现在他正与郑振铎在北平一起筹备创办一本很有规模的大型期刊，这就是后来在文学史上发生过很大影响的《文学季刊》。沈从文接到贺电，忙写了信给巴金，要他到他的新家作客。巴金先到天津去看了三哥，与三哥一起生活了几天，就搭车赴北平。

沈从文的作品文字质朴而优美，当时已出版了十几本集子，很有文名。他的为人和他的文字一样很朴实，还很好客，惜人才，爱朋友。朋友不论新旧，总是热情接待。当时他的新居在西城达子营。院落虽小，却有一株枣树和一棵槐树。正屋三间，厢房却是沈从文的书房兼客厅。靳以也是这里的常客，那时他已在大学当助教，郑振铎则是他的教师。郑振铎身材颀长，为人耿直，肚子里容不得半点疙瘩，有话总要说出来。靳以则纯正无邪，比他更天真的是肖乾，他比巴金小五岁，那时他虽还没有开始帮沈从文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但他们已非常熟悉，巴金把他当作小弟弟，肖乾则把巴金当作大哥哥。他们两人有时还一起去北海漪澜堂前划船。肖乾身体比巴金健壮，他认为写文章编副刊，巴金是个大哥，划船该让他占先了，但当两人脱去外衣，各划一只小船比赛时，巴金撩起衣袖，拿起木桨，奋力向前，结果肖乾只能与他拉成个平局：两人同时到达一个终点，谁也不曾制服谁。

巴金站在漪澜堂前，回想当年为了考北大因病没有考成，也曾来过这里，在这里静坐了一个晚上，现在七、八年过去了，他在这里有了许多朋友，这些朋友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这就是性格开朗，对朋友有真挚的感情，他在这里获得友情的温暖。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孤独和寂寞了。

住在沈从文家中，巴金感到很舒适，他每天三次就餐，同桌还有别的客人，却总让他坐在上位，使他有点拘束，此外他也觉得在这里非常自由，写文章看书，一点不受干扰。这个时期，沈从文一边在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一边还为天津《国闻周报》写连载长篇《记丁玲》。巴金则在这里写成了短篇小说《雷》。这篇小说是在他写《爱情三部曲》过程中的产物。

《爱情三部曲》的第一部《雾》，开始写的时间是在1931年初夏，比写《激流》还要早几天。后来写《激流》开始，《雾》的写作也并未停下。他写这两部作品是交叉进行的。写完的时间，《雾》与《激流》（即《家》）基本上也都在同时，即当年年底。《雾》的主人翁周如水，是根据巴金的一个朋友张晓天的性格写成的。那时张晓天刚从日本回来，常到巴金的闸北宝光里住处闲谈，有时候还留宿在他家中。张欢喜谈他自己的恋爱经验，有时酒醉回来，更兴致勃勃地谈女人，讲他本来不抽烟的，后来在追求一个姑娘的过程中，有些苦恼，就抽起烟来了。巴金想睡，要把灯熄掉，仍不能减少他谈女人的兴趣。巴金不欢喜他的性格，就想写一本小说来劝劝他，免得他那单恋的梦做得太长。张知道巴金写他和他所追求的对象的故事，起初很高兴，后来迫切地向巴金索阅原稿，越看脸上越变得可怕了，看着看着便把原



稿丢在桌上，说：“岂有此理！”其实巴金开始写时本是满怀友情的，哪知他一直写下去，憎恶的感情就很自然升上来，结果却真写出了个使人憎厌的性格，几乎得罪了那个阴友。这使巴金感到苦恼。当时巴金并不经常抽烟，此刻竟也像他那样抽起烟来。烟雾把他们两人的眼睛都遮蔽了。但巴金仍无法答应他把小说重写，因为他觉得他并不是存心挖苦他，小说是根据作者生活中所流露的感情写成的，并不要求全部真人真事。张沉吟了一下，说：“至少有几处非改不可”，巴金只好把他提出的几点删掉了。但张还是不够满意。而巴金却觉得《雾》虽不是十全十美的作品，但他确在这里创造一个性格典型，像这样性格的人在我们生活中是不少的，他不能为了朋友，放弃这本小说。但为了使朋友放心，他终于又作了一些修改，把从张生活中搬来的具体事例全部还给他，另外构思了一些情节把它们补充进去，然后才寄给了在巴黎时就曾来往，现在在《东方杂志》做编辑的胡愈之。

当然，《雾》并不只写了一个以张晓天为蓝本的周如水，在这里他还写了陈真，这是巴金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另一种性格典型。有的人说那是巴金自己，也有人说那是在写陈范予，也有人猜想是不是以在四川患肺病的一个朋友作影子。其实在陈真身上，在他所经历的故事中，既有陈范予的事迹，也有巴金自己的生活，更有许多人的经历，陈真就是陈真，巴金在这部作品中，特别强调追求性格描写。陈真有长处，也有弱点，他不是巴金的理想人物，但他爱他。

巴金在完成《雾》的创作后，又以八九个月时间，写成了《爱情三部曲》的第二部《雨》。在写作过程中，经历了“一·二八”事变，有一部分是在战乱逃难中写的，还有一部分是在旅途的船舱里写的，后来的一部分则在福建泉州的黎明中学那个破庙宿舍中写成的。它先在纓崇群编的《文艺》月刊上连载，当时在南京工作的卫惠林看到这篇小说，以为《雨》里的吴仁民写的是他，实际上也确是他的写照，但他却错把陈真当作巴金，以为巴金在为自己身体不好而感到绝望，因而他为巴金担心，还给他写了一封信，说“前几天读了你的小说的前三章，写得很好，只是阴郁气过重，我很为你不安。你为什么总是想着那可怕的黑影呢？我希望你向光明方面追求吧！”

巴金很感激老朋友卫惠林的关心，但他以为他还不够了解他，就写了封回信：

读完你的信，我很感激你的好意和关心，但我并不同意你的话。我承认你是一个比较了解我的人，我们又曾经在一起度过一部分生涯，我们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过。你不记得在巴黎旅舍的五层楼上我们每晚热烈地辩论到深夜，受着同居者的干涉的事情吗？在那些时候，我们的眼前现露着黎明的将来的美景，我们的胸里燃烧着各种语言的朋友们的友情。我常说在人的身上我看出了理想的美丽，我在写给伦敦友人的信上就常常用了embody（体现）这个动词。你还记得那些可祝福的日子吗？但是现在我们渐渐地分离了。生活改变了你的性格，你是渐渐地老了。

我没有什么改变，不过身上心上加多了一些创痛。我至今还是唯一的了解你的友人吧。然而我怕你是渐渐地不能够了解我了。你为什么还以为陈真就是我自己呢？你不能够看出来我和他中间有着很鲜明的大的差别吗？

我知道我和别的许多人不同，我生下来就带了阴郁性，这阴郁性差不多毁坏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我那追求光明的努力却没有一刻停止过。我的过去的短促的生涯就是一篇挣扎的记录。我的文学生命的开始也是在我的挣扎

最绝望的时期。《灭亡》是我的第一部小说。我开始写它时，我们曾经交换过许多封长信，从太阳的动或不动，谈到人类社会演进的路向，从决定论谈到你的自小哲学，和我的奋斗哲学。你知道我那时的苦痛的心情，你知道我在写小说，而且你自己也受了我的影响动手写起你的自传式的小说来。你知道我从没有一个时候绝望过，我从没有一个时候失掉我对于那黎明的将来的信仰。

你不过读了《雨》的前三章。我以后将怎样写下去，你还不曾知道。你说这小说的阴郁气过重，但这阴郁气也并不曾隐蔽了那贯穿我的全作品的光明的希望。我早已不去想那黑影了。事实上，我已经把它征服了。你知道龚多塞在服毒以前曾写下他的遗言道：“科学要征服死。”另一个诗人也说：“爱要征服死。”这句话也曾被我的《死去的太阳》的女主人公重复说过。我的爱已经把那黑影征服了。我的对于人类的爱鼓舞着我，使我有力量和一切挣扎。所以在夜深人静时黯淡的灯光下鼓舞着我写作的并不是那悲苦的心情，而是爱，对于人类的爱。这爱是不会死的。事实上只要人类不灭亡，则对于人类的爱也不会消灭，那么我的文学的生命也是不会断绝的吧。你不必为我担心。

巴金在答复了卫惠林的信以后，就根据他原来的设想，把《雨》写了下去。他原来计划就是要写一个粗暴的浮躁的性格。他现在果然把这个性格写活了，因为他非常熟悉这个性格，他不但熟悉他的外表，还了解他的内心。这个性格便是他的热情的友人卫惠林的性格，即《雨》中的吴仁民，虽然有一部分并不真是卫惠林的亲身经历，但巴金觉得按照他的性格，他完全可以成为吴仁民。卫惠林是巴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非常忠实地在《雨》里写了卫惠林的为人，因此他后来经常翻阅自己这本小说，他觉得这里有他过去好友的影子，虽然后来生活改变了卫惠林的性格，也许由于热情有了寄托，岁月使他变得沉静，成为一个稳重的大学教授，卫惠林不再是《雨》中的那个卫惠林，但《雨》里的吴仁民仍然留着巴金昔日好友的影子。因而他特别喜爱这部小说。而且除了卫惠林，《雨》里还有他不少朋友的影子，他们有的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和真诚，有的却象大哥哥那样曾经为巴金所敬爱……

现在，《雾》和《雨》都已先后出版，《爱情三部曲》的第三部却还不曾动笔，他来到北平，准备把它写起来。他寄居在沈从文的家里，一切都很方便，他可以安心地进行写作。但他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在动笔写《爱情三部曲》的第三部《电》之前，却在沈家几天时间里，先匆促地写出了个短篇，那就是《雷》。原来他那时忽然想起了一个姓袁的朋友，这个朋友身材颇长，憎恶女性，平时被大家当作粗暴的人。有一次巴金离沪旅行，他前来送行，却碰到大雨，当晚他就留宿在船上，竟从他的嘴里听到有关他自己的一个恋爱悲剧，这就是先后有两个女人追求他，却被他拒绝了，因他心里有比爱情更重要的理想。另外，巴金还从个别场合听到过这个朋友的谈话，说要杀死一个友人的妻子，以儆戒其他的女人，因为他发觉那友人自从结婚后，就迷恋家庭，把朋友抛弃了。巴金很想把这个朋友性格写出来。他原来想把它写成中篇，但结果却写成一个短篇，题目叫《雷》。他把它寄给了刚创刊的《文学》杂志发表了。

就在这个时候，燕京大学心理学讲师夏云（沈从文表弟）约巴金到燕大去玩。夏云住的燕大教师宿舍，房间宽敞，环境很好，夏云说这里原是从王府的花园，他邀请巴金住在他那边写文章。于是巴金告别沈从文，把自己

行李搬到燕大教师宿舍，这里白天没有人，巴金一个人住在里面，觉得很宽敞，也很安静。他在这个时期，差不多全身心都扑在《电》的那个故事情节里去了。谁如果站在他的身边，谁也会觉得惊奇：他的思路怎么会这样畅通，精神怎么会这样集中，笔头怎么会这样敏捷，他差不多没有停笔沉吟的时候，文字像一队队兵卒，在他的指挥下，听凭他的调遣。他笔下的人物随着他笔的移动，哭着，笑着，爱着，恨着，受苦，享乐，革命，反革命，挣扎，死亡，复苏……生活是这样千变万化，这样奔腾向前，他笔下的人物好像都活了起来，他似乎看得到他们，摸得到他们，和他们握手，和他们拥抱，一同欢笑，一同伤悲，他好像跟他们在共同生活着，而不是在描写他们，在塑造他们……

他的感情完全投入在这个时代的这些人物中间，他的文字像喷泉一样从他的自来水笔下面冒了出来。仅仅三个星期，他就飞快地写完了《电》。《电》是像闪电一样在巴金的笔下出现的，而且是巴金在他全部作品中最欢喜的一部。不幸的是这部作品刚写好，《文学》把它安排上版面后，国民政府的图书审查委员会却不让它发表。他们把它从目录中删掉了。

因为他们既害怕它的内容，又害怕这篇作品作者的名字：巴金。原来他们已把他列入鲁迅、茅盾等人一起作为禁止发表作品的作家名单里去了。后来，巴金只好又把《电》拿回来，得到郑振铎、章靳以的支持，他把《电》里凡是在《雨》与《雷》中出现过的名字全都改掉，又把《电》的题目改成《龙眼花开的时候》，把作者的名字改成“欧阳镜蓉”，这样迷住了统治者的眼睛，这部作品才得以安排在《文学季刊》上公开发表了。

巴金写完《电》后，又从燕大教师宿舍搬到沈从文家居住。但这时靳以已租了三座门大街14号房子，作为《文学季刊》的编辑部，也作为他自己的住家。他希望巴金能够搬到那边去住。因为他们请巴金当《文学季刊》与《水星》的编辑委员，帮他们编审稿件。巴金这才从沈家搬到三座门大街来。

巴金从1933年9月到北平，除了年初曾回沪一次外，一直住在北平，直到1934年7月才返回上海。他在北平通过编辑工作，结交了不少朋友，还在靳以陪同下第一次去冰心家拜访。同时还跟老舍、张天翼等联系。还发现了不少新人，选拔了不少新作。有一次他与靳以谈怎样把《文学季刊》办好，他认为不但要团结著名的作家，发表他们的新作；还得努力发掘一些新的作者，刊登一些发人深思、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靳以思索了一下，说有一个剧本放在他的抽屉里已经近两年了，作者曹禺是他在南开中学的同学，现在清华大学当研究生的万家宝，因为是他的好朋友，至今未曾推荐。巴金就请他把稿子拿出来，让他看一看。巴金在编辑部的南屋里，一口气把它读完后，就决定刊用，把它付排，在1934年7月出版的第一卷第二期《文学季刊》刊出。这就是使我国戏剧掀开新页的一块里程碑《雷雨》。

万家宝（曹禺）和巴金，后来逐渐成为好朋友。曹禺同巴金和巴金的许多其他朋友一样，性格开朗，谈话恳切，而他的满身活力，却超过别人。当时他刚利用假期，和同学们一起，从日本游历了一个星期回来，谈起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东京神户的风物人情，他的言辞竟然和他写的剧本一样，既有声，又有色，巴金不禁为之神往，想自己也当找个时机去日本一游。巴金还在同一时期，结识了经常来这里谈话的作家李健吾、曹葆华、蹇先艾。肖乾每次从海甸进城，总要在三座门歇脚。那时他刚从大学出来，读过巴金许多作品，很钦佩他那用真挚感情写出来的感人肺腑之作，他自己的头脑则是

个大杂烩，有进步思想的影响，也有从课堂里搬来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与巴金谈话，总是敞开心胸，随意抒发自己各种观点，这种观点又可能随时变化。巴金却总是透过眼镜，注视着对方，安静地倾听着他的意见，然后坦率又干脆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否认有灵感与天才的存在，认为重要的倒是在于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理解。他还反复地对肖乾说：“写吧，只有写，你才会写。”不久，巴金回到上海，却意外地发现阔别五年的好朋友马宗融和罗淑已从法国回来。他们还带来了已经能够摇摇摆摆地走路只会讲法国话的女儿。

他又能和马大哥经常见面，又能经常听他高谈阔论了！这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在北平听曹禺谈起的那次日本之行，当他和曾经在日本留过学的朋友吴朗西、伍禅讲到这件事，吴朗西他们竭力鼓励巴金到日本去学日语，吴还替他介绍他们在横滨的一个姓武田的日本朋友，说他正在一个高等商业学校教中国话，有可能接待巴金，让他住在那边。巴金就请吴朗西先写封信问一下武田，问他能不能接待一个叫“黎德瑞”的中国书店职员，因为他想到日本学日语。隔了几天，回信就来了：武田欢迎“黎德瑞”前去横滨，他家里容纳得下这位中国客人。

巴金将赴日本的消息在朋友中传开，当年 10 月初，文学杂志社的傅东华、黄源等就给巴金饯行。这次的宴会是在南京饭店，他们定了个房间，可以自由谈话。鲁迅先生也来了，巴金自从去年 8 月初次与鲁迅会面后，他们又在宴席上碰见过多次，现在相互熟悉多了。鲁迅知道巴金即将去日本，十分高兴，谈话的中心自然而然地集中在讲述日本风俗人情方面，因为他自己年轻时在日本留过学，回国后又有不少日本朋友，一直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友谊，对日本情况很了解。他的话讲得很生动。还讲了一两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由于言语不通闹的笑话，意思是希望巴金能把日文学好，还希望他在日本仍能继续进行创作，“到了那边，文章也得多写”。巴金非常感谢鲁迅对他的鼓励，并问鲁迅什么时候再去日本？因为他听说曾有人劝鲁迅到日本休养。鲁迅笑了笑，说：“将来再说吧。”巴金想这次要是鲁迅能同去，那就太好了。饭后大家又留在房间闲谈，鲁迅谈起最近楼适夷等几个熟人被捕的情形，使人想起不久前鲁迅为日本友人所作的《无题·万家墨面》的“于无声处听惊雷”诗句。巴金似乎看到鲁迅从眼里射出来的愤怒之光。鲁迅、茅盾后来在他们接受伊罗生的委托，编选一本中国作家短篇小说集《草鞋脚》时，他们不但选入了巴金的短篇小说近作《将军》，而且还给《将军》的作者写了介绍文字，他们说：“《将军》作者巴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可是近来他的作品渐少安那其主义的色彩，而走向 realism（现实主义）

了！”

### 第三节横滨的困惑与东京的受难

他到横滨去乘的轮船，叫“浅间丸”，睡的是二等舱位，所以餐厅宽敞，船员对乘客也很尊敬。当时从上海到日本，很方便，既用不到护照，申请什么签证；船到时上岸，也不必办任何手续，更不用受海关检查。巴金到横滨登岸后，抬起头就看到武田夫妇已经领着两个女儿（一个17岁，一个10岁），打着一面写有“欢迎黎德瑞先生”七个字的小旗，在码头上迎接他。

这是1934年11月24日。横滨已经进入初冬季节，武田的家在本牧町的一座小山上，他是当地高等商业学校的一个副教授，教的是汉语，人很和善，也很忠厚，他把自己的书房借给巴金住，让巴金随意翻阅他的藏书。但是当时日本正在法西斯统治下，特务警察严密控制着整个社会，巴金访日虽不是为了这个原因而改名换姓，但他为了方便，不希望人家知道他是个作家，还是假称自己是中国一家书店里的职员叫黎德瑞。“德瑞”的名字在中国是很普通的，巴金在北平时就听靳以与另一个朋友陆孝曾讲过铁路上有个工人伍德瑞，他们经常托他办事，巴金就把这个名字借来，换了个“黎”姓，因“黎”与“李”同音，人家叫他时，他容易感应，便于迅速对答。他连他哥哥的名字也预先想好了，万一日本警察询问时，他可以回答，假拟的哥哥名字是“黎德麟”。果然，没有几天，日本警察听说武田教授家来了个中国客人，便乘人不备，突然闯进门来查户口，高喊“黎德瑞”，问他“你几岁？结婚了没有？”巴金迅速作了回答，接着又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他的哥哥叫什么名字，巴金按照原定想好的作了应答。这样，一连几天大清早都来问东问西，他总算没有被找出什么破绽，暂时过去了。

现在，他可以安下心来学日语、写文章了。但是写文章也只好保持秘密状态，怕别人发觉他是个作家。这样他写稿时总得在旁边放几本书，一有人进来，他便把书将稿纸遮住，让人感觉他是在专心看书。他在武田家写的第一篇小说是《神》，它的主人公长谷川君就是他的房东武田副教授。因为他和武田住在一幢房子里，一起吃饭，一起谈笑，武田有客人来，他也用不到躲避，他还和武田一家同去附近朋友家作客。武田为人老实，待人诚恳，他用中国话跟巴金聊天，说些心里的话。巴金就把他一家观察周到了。他发现武田是个日本知识分子的典型，在他的玻璃大橱里有许多哲学和社会学著作，也有不少无神论者的论著，更多的是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高尔基、卢骚、雨果、左拉等人的作品，但是他自己却是个信神拜佛的人，而且信神拜佛还刚刚开始，十分虔诚。这使巴金十分困惑，他不能理解武田看了那么多的具有高度智慧的书，却这样迷信鬼神。每个晚上，巴金住在这个环境幽静的小山上，从窗外望出去，看着清朗的月光下，海水像一条条银链，在洋面上飘荡；听到客厅里武田的诵念佛经声音，他实在很有反感，感到自己处境寂寞。

有一次，武田对巴金说：“我整天念经，你会觉得好笑吧？但是说实在的，我信奉日莲宗的佛教，念《法华经》还刚刚开始，我为了戒除凡心，下决心皈依佛教，还按照规矩，绝食过三次，每次三天，使我以后饭量都增加了！”他又说：“以前我还是个无神论者呢！”说完，他哈哈大笑。巴金起初唯唯答应着，总觉这个人庄重和蔼的脸上隐藏着一种愧色，或者说是一种悲哀，就忍不住问道：“你看了那么多书，它们一点不阻挠你信教吗？”武田犹豫了一下，忽然坚决地回答说：“神告诉我不必再读书了，信了神，就

有神通力，以后不读书，也可以著书呢！”他的妻子是个温顺的旧式的日本女人，十分敬服武田，她非常勤劳，每天做饭烧菜带小孩子，清早起来也跟着武田大声诵经。两个女孩有时也跟着她们的父母一起双手合十跪拜祈祷。武田还告诉巴金说：“在我们这里，宗教常常是家传的。”巴金不禁为这两个孩子的未来担心。那天，他向武田借报纸看，因为他发现这个家庭什么东西都齐全，就是好像不曾订报。果然，武田的脸上显露出窘迫的样子，不好意思地答道：“我家原订《朝日新闻》，现在已停订了。”他看见巴金有点感到奇怪，便又解释道：“我在学校也不看报。有什么好看呢？还是不知道时事好！知道了有什么意思呢？报上总是报道战争，屠杀，灾祸，痛苦……总是那么一些事情，还是不看比看好，免得心头不安，心中烦恼。”

巴金终于逐渐明白武田诵经念佛是怎么一回事了。他在这里日子愈久，愈发觉武田言行矛盾，可以看出他内心的痛苦。这显然是个曾经追求过自由而最后在黑暗社会的压迫下，无可奈何地放弃了自己的追求，从一个无神论者变为一个有神论者。他想用宗教来驱除自己的“凡心”，用念经、苦行、供神、绝食来抵制自己心头的自由思想之火。然而结果会是怎样呢？巴金替武田担心，他认为他有可能“跌进深渊”里去。

巴金写完《神》以后，隔了一个时期，他又与武田一起在海边散步，他从他的嘴里了解到武田的另一个秘密，这就是武田在他结婚以前曾认识过一个姑娘，他们相处得很好，已经达到热恋的阶段，但是武田的父亲却来了一封长信，否定他同那个姑娘订的婚约，不久，姑娘的父亲也对他们的婚约严加反对。这样，姑娘就要求武田与她一起“心中”（日本青年恋爱不成，常常一起殉情结束生命，叫“心中”），而他却没有同意。他写回信给她，认为“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人没有一点力量，所以违抗命运的举动是愚蠢的。我们只是一叶小舟，应该任凭波浪把我们载到什么地方去。顺从了命运活着，以后总会有好的结果……”这样，他们就分离了。后来，武田结了婚；姑娘嫁给了一个商人，不久就患肺结核，一直病在床上。而武田每天工作回家，却总是虔诚地跪在神橱前面念经，为她祈祷，有时一气就念两个钟头。

那天武田上楼到书房来看巴金，说他昨晚已与那姑娘会面过了。巴金问他怎么一回事，他说：“昨晚我念经的时候，她在‘床间’出现了。她说她还把我记着，说她已恢复健康，我们以后还能在一起生活，后福不浅呢！”他显得少有的高兴。巴金问他她还在人间，怎么会有灵魂在他的“床间”出现？他说：“活着的人灵魂也可以到处来往的，这要靠信佛信神的人心诚意真，方能有所感应。许多人都从念‘日莲宗’的《法华经》得到不少好处。你多住些日子吧，日后要像我那样日夜诵经，你也就可以少些烦恼。”巴金十分讨厌这种迷信道理，对他的好心却有点感激，不觉又怀疑地问道：“你真的相信有鬼吗？”他说：“当然，没有鬼还成什么世界？要是没有鬼，我们从什么地方去找寻公道？世间一切因果报应，一切苦乐善恶，都能在鬼的世界找到根源，找到结果的！否则，谁给我们主持正义？谁能制恶扬善？”巴金听了他的话，进一步明白了武田的为人，原来他是看出了社会不公道的现象，希望这世界有些改变，但他却将希望寄托在另一个世界的统治者，自己只求在念经跪拜中找到荫庇，得到安慰。鬼的世界正是在他这种精神状态中出现的。但是不久出乎武田的意料之外，他不但没有再能看见她，与她生活在一起，那姑娘竟患病去世了。过了新年，一天午后，武田念了三四个钟头的经，天将黑了，巴金看见他手上提了一份供物，准备到海边去，便问：

“昨天晚上你又在‘床间’看到谁的灵魂吗？”武田说：“看见了，就是她的灵魂。”两人默默地来到海边，武田把供物抛到海里去，悲伤地说：“她的样子很憔悴，流着眼泪要我救她。看来她在阴间也过得不好，我今天给她念了经，想超度她，使她过得幸福一些。”巴金想起过去武田给那姑娘写的信，就说：“你信中不是说顺着命运就能有好结果吗？她怎么死了，死了又仍不幸福？”武田听了他的话，像被谁突然擒住了一样，颤抖了一下，竟讲不出一句话来……

巴金又根据武田的故事，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鬼》。他从武田身上完全看清了日本社会被法西斯统治所扭曲了的知识分子的灵魂。虽然他在这篇小说的最后，暗示了主人翁的最后觉醒。但这只是表示了他对武田的一种期望。现在他还是感到寂寞，又感到痛苦。他听着武田大声诵经的声音，更觉烦躁不安。纵然武田一家对他十分友善，并一再挽留了他，要他再住一年半载，但他再也忍受不了这样的精神折磨，决心到东京去。即使东京有人告诉过他，迁到东京，不出两个月，他就会被日本警察捉去，他也要离开这里。因为他实在无法与鬼神共处。善良好心的武田却始终不知道巴金内心的痛苦，他还是经常晚上走到书房里来，甚至有时巴金已经睡下，他还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推开门进来，要在屋子里为巴金诵经，替他赶鬼。巴金差点笑出来，但为了礼貌，他只好从地铺上坐起来，这时武田便在他头上叽哩咕噜地比划着念经，这叫人怎么受得了！在武田家一共住了三个月，其间他还写了个童话《长生塔》，这是他在离开上海前答应《中学生》杂志编辑部约稿而写的。他在这里面描写一个暴君为了谋求自己的长生不老而强迫“贱民”为他建造宝塔，当塔刚刚建成，他登上最高一级，塔就倒了，把他的尸体压在石块下面。巴金是想通过这个故事来咒骂当时国民党的最高统治者，文章结尾的最后一句话是：“沙上建筑的楼台是立不稳的。”他预言了蒋家王朝的失败。

来到了东京，巴金住在神田区的中华青年会楼上宿舍里。他住的房间家具不多，陈设简单，却有个两层的大壁橱，这很符合他的理想，因为他不论在成都，在巴黎，在沙城，或者在上海，他都欢喜跑书店，买书籍；而在横滨本牧町的小山上，除了听武田念经使他感到苦恼外，没有书店可跑也使他感到寂寞，现在东京神田区中华青年会附近却有很多西文旧书店，而且一个人往一间屋子，还有个大壁橱，这就太符合自己的理想了，因而他几乎每天上街三次，总去各家书店看看有没有自己要看的英文版或法文版书籍。他把买来的书，全都放在大壁橱里，不时的翻阅，倒把学习日语的事放在次要地位了。当然，他还是向楼下办公室报了名，按日去听陈文澜讲授的日语课。他读的是一本日本作家岛本健作写的有关监狱生活的小说。教师讲课讲得还不错，只是巴金把复习的时间多花在阅读买来的西文旧书上，所以一时竟没有把日语学好。同时，他还在楼下大厅，经常看到杜宣、吴天他们在排练曹禺处女作《雷雨》。他结识的日本人也不多，倒是看够了在这里经常出入的那些日本便衣刑事警察，他们的“派头”叫人看了心里不痛快。

原来那时正碰上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即将来到日本东京访问，日本帝国主义害怕中国爱国者对日“满”勾结进行打击，就严加防范，把每一个在东京的中国人都当作敌人，特别是对刚来东京的中国留学生更为注意，他们相信“宁可错抓一百，也不放过一个”，企图把这些留学生个个都看管起来。就在溥仪来到的前两天，有个四川籍女同学来找巴金，悄悄告诉他，他的两个福建籍朋友被日本警察在半夜里带走了，还在他们租住的一幢房子里进行

了搜抄，要他注意提防。巴金把她送走后，就动手整理自己的书稿和信件，把那个在 1930 年福建晋江认识的朋友袁国钦写给他的信件撕毁了，又把新买来的西文旧书也整顿了一下，然后躺在床上想了想，日本警察问起他的经历来，他该怎样答复。又想到前几天还坐省钱电车到逗子，转赴叶山去看过朋友梁宗岱、沉樱夫妇；自己最近还在东京接待过从北平来日本京都的诗人卞之琳，……想这总不至于成为“刑事”们对自己进行迫害的口实吧？他想了—下，觉得什么都不成问题的，就放心吃了中饭，照常上街去逛西文旧书店，回来在楼下食堂吃晚饭，还想再去书市看书，在饭厅中却碰到那个胖胖的姓“二宫”的便衣警察，他看了巴金—眼，—晃又不见了，—会又在楼梯旁和另一个刑警鬼鬼祟祟地上下，这使巴金警惕起来，怀疑他们会不会有什么行动。但他还是到书市逛了—会，才又回到住处。晚上 10 点钟光景，—躺到床上，把灯熄灭，就出乎自己意料之外地呼噜呼噜睡熟了。

哪知睡到半夜，忽然被—阵声音惊醒，电灯亮了，几个黑影子在他惺松的睡眼前显现出来，啊，五个刑警，其中—个便是那个肥胖的二宫。巴金只好从床铺上坐起来，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连说“对不起”，要他先把衣服披在身上，说虽然是在 4 月间夜里还是很冷，要多穿衣服。巴金站起来，把衣服穿好，心里倒平静起来，知道他们为的是什么事来了。果然，二宫要他把壁橱打开，让他把书—本本翻看；另—个亲自动手把书桌抽屉移了开来，取出巴金朋友的来信，—封封地拆阅了—遍；第三个检查皮箱，把衣物几乎掏得箱底朝天。最后他们又唯恐有什么漏检，准备把悬挂在书桌上的电灯搬到壁橱旁边来，哪知刚伸手碰到电线，灯就熄灭了。

房间忽然—片漆黑，五个大汉顿时焦急不安，在房门内外，时进时出，鬼鬼祟祟商量了—阵，就派了—个人去找洋烛。在黑暗中，房间忽然安静下来，大家默不作声，好像整个世界都死了。而这时巴金心中的忿怒之火却燃烧起来，他忍耐不住地问：“你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回答是：“有很多事情。”巴金听了，禁不住鼻子哼了—声，意外地却听到其中有个刑警忽然问他：“你冷吗？”巴金昂然回答，“不冷。”对方这才说：“你坐吧，事情还多着呢！”巴金在床上坐了—下来，这时听见廊上的壁钟敲了两下，原来是午夜两点钟。人间见不得的黑暗勾当，总是选择在这样—个暗地里进行的。

那个外出的刑警把洋烛找来后，他们又作了—次最后的搜查，他们—边读他朋友给他的信，—边问长问短，关照他把钱钞放在身边，表也揣在怀里，还叫他带—条毛巾，说要带他到警察署去。巴金只得耐住满腔怒火，跟着他们来到马路上，这时天空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是个名符其实的黑夜；也是个冷气侵骨的寒夜。跟着他们走了一阵，不久就到了—个他经常走过而又不大注意的高楼门前，原来那就是警察署，这是他今夜才发觉的。现在他走进房子里，上了楼，看到电灯通明，审讯就开始了。他们问了他—下经历，他还是按照刚来东京时准备好的话回答他们。问了一阵后，那为首的课长在—张白纸上写了个名字，问他认不认这个人。巴金—看就知道那是昨天被他们捉去的那个朋友的名字，想他们—定已到那朋友家中去过了。便回答了他们，说那是在北平做过教授的学者，而他们却把他说成“流氓”。过了一会，那课长问他：“你想不到会把你‘请’来吧？”巴金说：“不但想不到，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呢！”对方却轻轻地笑了一—下，说：“不是你的事情，是你的朋友的事情”。巴金想既是这样，自己就可以回去了。哪知道他们仍把他留下来，而且对他说：“今夜的事很抱歉，我们执行的是上面的



命令，不能不做。现在你先去晒一觉吧，明天再问一次，你就没事了。”巴金就这样被无缘无故地送到一个很脏的牢房里，只听见一阵沉重的铁门响，就被关在一个已经有七个囚犯躺在那里的小房间里。他弯了腿躺下去，很想睡一下，却觉得浑身发热，怒火从心底燃烧，令人作呕的臭气又从四面袭来，他怎么也睡不着。这时听见旁边有个人叫他：“你进来睡吧。”原来有个犯人正翻身让他进去，还从自己身上腾出一条薄薄的毯子，推给他，要他盖上去。他答应着，把毯子接了过来。就在这时，听见外面时钟正敲4点钟。过后，又听见外间警察的叱喝声，咳嗽声，还有不知什么人的相互争吵声。再过了一会，不知是否到了5点钟，总之，整个牢房喧闹起来，管监的警察大声呼喊，叫大家起身了，还从铁格子外伸进手来，把每个监房铺在地上的席子、毯子都收了回去，于是房间里只剩下一个个黑影，因为人站起来了，天还不曾亮，灯光从走廊里照进来，而窗子又那么高，踮起脚也看不见外景，监房似明似暗，闪烁着一片片黑魆魆的人影子，每人的面貌都看不清。这时巴金也只好揉揉眼睛站起来，但真站起来却又唯恐遭到叱喝，有囚犯告诉他：在监房里只能盘腿坐着，不能站立的。这更使巴金感觉到自由是那么可贵。

囚房里的人都互不知道姓名，一般只用号码点名。忽然牢门开了，看守进来点名，点到“七十八号”，没有人应声，看守就对巴金说，“这是你的号码”，巴金想人都要出去了，还给号码做什么，看样子还不能放出去吧？心头一团火又上来。幸而坐在旁边一个“七十六号”犯人开始和他交谈。他问巴金：“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呢？”巴金说他好好睡在家里，就被他们“请”进来了，什么都不知道。七十六号又问他从事的行业，巴金说：“我是学生”。对面有个穿西装的七十五号听了，就插嘴说：“看来你是思想犯。”巴金也只好摇头，答不上话。这时七十六号笑起来，幽默地说：“根据你们孔夫子的春秋笔法来讲，你被捉进来，就该明白你为什么被捉。”巴金听他出言不寻常，就问他：“你是个大大学生吧？”他却说他是职员。巴金又问他：“那你是思想犯了？”他却摇摇头，说他只为了偷三本书，因为要读书，却买不起书，正说着，听见隔壁一个监房里，警察正在叱责一个患病的囚犯，问他为什么不好好坐着，而要躺下去？那囚犯苦苦哀求也得不到同情，最后警察打开隔壁监房的门，响起了打人的声音，于是哭声、骂声、劝声、吵闹声，混成一片。

巴金只觉自己全身发烧。犯人中有的面色惨白，有的在求神保佑。只有七十六号那个青年囚犯仍安静地坐着，一动也不动，脸色阴沉，他回过头倔强地对巴金说：“我可不怕。求神有什么用？它能为人们伸冤吗？”七十七号不服气，但很温和地劝止七十六号：“年轻人，你不懂，你别浮躁，一切都由神看着的，他公平无私，不会辜负我们！”七十六号听了，更动起感情来，说：“什么神公平无私，你看见过他吗？别人享受，你受罚，他见到了吗？为你伸了冤吗？”七十七号叹了口气，说：“你啊，你敢说神不好，你是什么啊？”七十六号听了，几乎要跳起来：“我是什么？我是人，是人，你懂不懂？人，人，人！你知道吗？”大概他的声音太大，被过路的看守听到了，他俯着身子在铁格子门外厉声喊起来：“七十六号，你这混蛋，你嚷嚷什么？你要造反吗？”一刹那间监房静了下来，好像一切都死去了，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消逝了，世界成了个黑暗的深渊似的一片。巴金一夜没睡，这时感到非常困倦，真想闭起眼睡下来，但只能靠着墙壁，迷迷糊糊地梦幻似地睡着了。

但只有片刻工夫，铁门开关的巨大声响又把他惊醒，接着又是警察向各个监房叫号的声音。巴金只等着他们叫“七十八号”，认为叫到就可以出去，哪知他们叫的都是被拷问的犯人，监房里差不多一半的人被叫出去，只是没有轮到他。他心头焦急，想一个人失去自由，一天都是这样难受，那么一年、十年、几十年，将会是怎样过的？他们受的折磨，真不堪设想。他烦躁得简直无法吃下东西，送来的午饭都给同房间的人分吃了。牢门突然又被打开来，七十七号受审回来，脸像死人一样发白，一句话都不说，叫了声“倒霉”，就倒在地上了！接着又有一些人被传唤去受审，又有一些新的人进来。“南京先生”，有人叫道。看来又是三个“思想犯”的中国学生。巴金把身子倒向角落里，噓了口怨气，七十六号问他：“怎样了？是不是有点抑郁，透不过气来？”巴金摇了摇头，并不作声。七十六号说道：“你读过纪德的《田园交响乐》吧？他说得多好：‘没有眼睛的人是多么幸福！’我真恨我的眼睛为什么亮着？我真不愿看到这个世界！为什么书店里堆着书没人买？为什么我要看书，他们却把我关到这里来？我是人，我要看书，他们为什么这样对付我？这个世界是多么丑恶，多么不合理！”他的忿激，使巴金一时说不出话来。别的犯人却想劝止，要他小声些，别让警察听到了，否则他更要受到迫害。牢房里又沉默了，过了许久，那七十六号又悄悄地和巴金讲起话来：“你能和我做朋友吗？你是学生，又没做什么事；我只偷了三本书，我们都不会关得很久，我们出去能做朋友吗？”巴金点点头，诚恳地对他笑了笑。恰在这时，牢门开了，看守把巴金叫了出去，七十六号急忙自言自语地把自己家中的地址念了一下，显然他希望巴金以后能按址去找他。

巴金终于这样离开了日本警察署的拘留所，时间已经下午4时了，他在这里被整整关了十四个小时。像做了一场梦一样，他为什么被关进去，又为什么被放出来？自己一点也不明白。仅有的一个理由，这就是法西斯的专制制度，它可以随便叫一个人失去自由。

他回到中华青年会，竟没有一个人知道他遭受了那么严重的一次侮辱，那么大的一场灾难。只有一个中年的日本职员，他好象在昨晚就听到一些声响，发觉了这个中国留学生过了一个不平凡的夜晚，这时禁不住悄悄地对他说：“昨晚上我就听到你房间里有人说话，只是不敢声张。这些人不讲理，是强盗，是土匪，不是人！”巴金只好对他苦笑，他知道日本人民对日本法西斯统治者也是不满的，只是都不敢作声，不敢反抗。后来他又听说昨天晚上在叶山的梁宗岱家里和在京都的卞之琳住处也遭到同样搜查。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是没有人权保障的，这次是他亲身经历了帝国主义统治下所过的奴隶生活。他再也不想在北京住下去了，就写信给横滨的武田，告诉他在东京的那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夜晚，他是怎样无缘无故地遭遇了一次牢狱之灾。忠厚诚恳的武田回信说：“你要是不去东京，就不致发生这件事。欢迎你回到横滨仍住到我家里来。”这个老实人，他把这种事看得十分简单。巴金回信表示感谢，但他并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再回到横滨去。

巴金没有回横滨与武田重聚，却在第二年即1936年他回上海一年以后的秋天，又看到了一次武田。那是武田从横滨来上海到他虹口妹妹家作客，后来又回到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来看“黎德瑞”先生。巴金像接待一个老朋友似地，请他到永安公司楼上的大东茶室吃晚饭，两个人回想起在横滨的日子，都禁不住对当年互相信赖的友谊表示怀念。武田的精神似比过去开朗了许多，巴金问他是不是还像一年前那样虔诚地在佛像前诵经，他笑了一笑说：

“那是过去的事了。”巴金为他没有“跳进深渊”去而感到高兴。当然这是后话。

此刻还是1935年4月，巴金按照那个晚上被逮捕的经历，写了一篇《东京狱中一日记》寄给上海《文学》杂志编辑部，准备发表在当年7月出版的该刊特大号上。不料在当年5月，上海《新生》周刊由于发表了一篇题目叫《闲话皇帝》的文章，内容谈到日本皇帝，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刊物因此被国民政府以“侮辱友邦”罪封闭，主编杜重远还被判了一年两个月徒刑。影响所及，本已编进《文学》杂志的《东京狱中一日记》，也就被国民党党部的检查老爷在稿样上红笔一勾临时抽掉。这对在日本受尽人家欺凌的巴金来说，是很不甘心的。这些丑恶现实引起他强烈憎恨。为什么日本的报刊天天大骂中国，把中国人骂得狗血喷头，而我们国内报刊却不敢哼一声？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民在国外可以被法西斯统治者随意囚禁，而回到自己国家来还不能向自己的同胞申诉呢？他把文章稍稍作了一些修改，并简化题目为《一日记》寄给了北平的《水星》月刊，因为这个刊物还是他在北平时与靳以卞之琳一起负责过编辑工作，他对它有感情。哪知文章排成清样后仍没有得到刊登的机会，因为书店经济困难，刊物停办了。

在巴金带着心中的创伤和强烈的反帝爱国意识回到祖国的时候，已经是1935年8月。当时他接到朋友吴朗西、伍禅的来信，告诉他已经筹备成立了一个出版社，并已开始用他的名义编印一套《文化生活丛刊》，催他回去主持编辑工作，他买了一张“加拿大皇后”号轮的三等舱票，到横滨上船，离日返国。由于时间来不及，他没有能去本牧町小山坡上的武田家告别，但对武田的友好感情，他心里还是有依依惜别之意的。

#### 第四节来到编辑的队伍里

虽然许多事情时过境迁，往往为后来人所无法设想；但是历史总还是铁一样存在着，不容置疑。在二、三十年代，在旧中国，确实经常有那么一些知识分子，带着自己朴素理想，以对事业献身的精神，办过不少在今天看来可能被有些人认为吃力不讨好的傻事。跟在闽南办平民学校一样，日本国学生吴朗西和他的朋友伍禅、郭安仁（丽尼）在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间，鉴于当时出版商只热衷于竞时尚，办刊物，追求利润，却不大愿意为知识界实际需要认认真真地出几本好书，他们决心自己动手，来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原没有什么资本，只是准备联系个印刷所，然后把自己写的或组织到的稿本交出去，委托他们把它印出来，到时凑几个钱去支付印刷费。他们的第一本书是他们的朋友白石（许天虹）所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本便是丽尼自己试译的《田园交响乐》，那是法国作家 A·纪德写的一对青年爱情的故事。他们开始是用“文化生活社”名义出书，并冠以“文化生活丛刊”字样发行；同时又借用他们的朋友巴金的名义作主编。当时巴金还在东京，正用“黎德瑞”名字住在中华青年会的宿舍里，当他接到吴朗西他们的来信，要他去参加他们的创业，并主持编辑业务时，这使他立刻想起在闽南住在破庙里与学生打成一片办平民教育的朋友们，他们夜以继日地为培植新的一代的成长，无私地耗费心血，这情景曾经使他十分感动，要想留在他们中间工作，但因为自己对事业的志趣更近于文学，而终于没有留下来，他常常为此而心头不安。现在，这样的工作机会在文学领域中出现，并需要他去贡献力量，他觉得义不容辞，因为他一向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牺牲，而不是在于接受与获取。他决心把自己对文化事业的理想，与这个即将到来的工作结合起来。

巴金于 1935 年 8 月回到上海，正是国民党统治的最黑暗年代。那时上海《申报》主笔史量才已被暗杀于沪杭公路上；瞿秋白、方志敏也相继在闽、赣监狱中被害；上海《新生》周刊不仅因发表《闲话皇帝》而被勒令停刊，主编杜重远还被判徒刑入狱；国民党政府发布《敦睦友邦令》周知全国，“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而鲁迅却正是在这一年写了旧诗《亥年残秋留作》赠许寿裳，以“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预示黑夜将要过去，黎明就要来到，并在同月托史沫特莱代发贺电给陕北中共中央，祝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宣称“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与中国的将来。”

吴朗西他们以热情的期待心情，欢迎巴金的归来。他们相信有了巴金，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就有希望。巴金想的则是怎样首先依靠前辈作家鲁迅和茅盾他们，再团结一些有希望的青年作者把事业办起来。他想起去年在北平时，曾经与靳以合编过一套丛书，包括了十个作家写的作品，其中有沈从文的短篇集《八骏图》，靳以的小说《珠落集》，郑振铎的文论《短剑集》，卞之琳的诗《鱼目集》，李健吾和曹禺的剧本《以身作则》、《雷雨》等。当时曾交给立达书店，并收过三百元钱的预支稿费，但不知为什么，至今没有付排出版。他想把它要回来，由新成立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时伍禅更把自己买彩票中奖的钱拿出一部份给文化生活出版社作为资金，巴金也垫出三百元寄给靳以，要他把这十本书稿赎回来。巴金觉得这套丛书十本还不够，还须听听鲁迅的意见，并请他领头支持。因此他与吴朗西、丽尼、伍禅等商

量，他们都觉得巴金这个主意很好，有鲁迅带路，路就更开阔了！丽尼还以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黄昏之献》稿本推荐给巴金，希望他能把它一起编进这套丛书里。正在这时吴朗西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也是巴金的老朋友黄源来看他们，他当时正帮助傅东华编辑《文学》杂志，又协助鲁迅编辑去年9月创刊的《译文》月刊。他想编一套《译文丛书》给生活书店出版，但他的计划不曾为生活书店所接受，问文化生活出版社能不能考虑。巴金觉得既是这样，就不妨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来出版，好在黄源与鲁迅很熟悉，鲁迅十分支持他的工作。《译文丛书》也必能得到鲁迅支持的。

原来去年9月创刊的《译文》杂志，最初的三期实际上是鲁迅编的。在这以前，黄源在劳动大学编译馆工作时，听过鲁迅两次演讲，替他做过记录。后来他到新生命书店当特约编辑，鲁迅为了推荐一部书稿，即苏联作家革拉特柯夫的小说《士敏土》译稿，要代这个译者看校样，曾与黄源联系。黄源听人说，鲁迅不容易对付，最好不与他发生关系，就把校样送到内山书店，即使看到鲁迅，也躲着他。黄源后来才知道那些话是别人的造谣中伤，鲁迅不是什么不容易对付的人，恰恰相反，鲁迅是很容易接近的。那是在去年夏天，黄源接到茅盾来信，说鲁迅想和茅盾以及刚摆脱《自由谈》编辑工作的黎烈文合作，三人发起创办一个纯文学的翻译杂志，他希望黄源能就近与生活书店联系一下，并请黄源出面担任个名义上的编辑。因为几年前由于出版界对外国文学作品的乱译、抢译，声誉不好，译作销路一度下跌，使书店老板一看到译稿就摇头拒绝出版，许多刊物也以“不收译稿”来迎合读者口味。鲁迅对这现象非常痛心，下决心要改变出版界这种不正确的看法，同时还要纠正乱译、抢译的歪风，所以他准备“以少数志同道合者的力量办一种小刊物，并没有销它一万二万的大野心，但求少数读者购得后不作为时髦装饰品，而能从头至尾读一遍。所以该刊的印刷纸张力求精良，译文亦比较严格。这刊物不是一般的读物，只是供给少数真想用功的人作为‘他山之石’的。”（茅盾给黄源信）。黄源收到茅盾的这封信时，想到自己在《文学》杂志社工作十分忙，恐照顾不过来，但既然茅盾信中只要他当个挂名编辑，并明确“看来稿、校对等事，皆我们办”，他也就没有顾虑了。这样他就与生活书店联系，当时生活书店在新书业中还是有远见、有冒险精神的，他们一听说由鲁迅主编，总算答应了，就由书店经理徐伯昕出面，在“觉林”餐馆宴请鲁迅、茅盾和黎烈文，讲清楚：先试办三期，稿费编辑费不支一文，若销数超过几千份能保本，则再订合同补救。鲁迅也不计较自己的工作全无酬报，就按照书店决定9月16日的创刊日期，认真严肃地干了起来。他不但自己翻译了三篇外国作家的作品，还让黎烈文译了两篇，茅盾译了三篇，同时他又亲自动手做具体的编辑工作，从审阅稿件，配制插图，精选木刻，到设计书样和版面，无不一一照顾到。最后鲁迅就请茅盾约黄源同在茅盾家中会面。那天，黄源先到了茅盾家，不一刻，鲁迅也就穿着一件白色的夏布长衫，挟着一只书包，冒着炎阳进来了。茅盾准备介绍，鲁迅却点了点头，连说“见过的”。说着就解开书包，拿出稿子，和预备翻印插图的画册交给黄源。黄源一看，鲁迅把《译文》创刊号的篇目排列次序及每篇译稿所用字体，及插图大小，都写得一清二楚。最后谈到开本大小，鲁迅说：“我主张别致一些，人家办刊物，多用十六开本，我们用三十二开本，怎样？”茅盾黄源都说好，鲁迅便又对黄源说：“排版格式，你来决定吧。”黄源同意了，说等校样出来就给鲁迅送去。鲁迅却亲切地说：“路很远，你送来送去不累吗？我看还

是你校一校吧。”黄源看到鲁迅对他像对待很熟的朋友一样，随便说着话，并无半点架子，也就把心放了下来，并有了工作的勇气，不考虑自己的忙碌，接受了校对的任务。后来在工作过程中，黄源才知道《译文》创刊号中，译果戈理的《鼻子》的许遐，译立野信之的《果戈理私观》的邓当世，译格罗斯的《艺术都会的巴黎》的茹纯，都是鲁迅的化名。起初黄源并不了解为什么鲁迅连译文署名都要用这么多笔名，等鲁迅写信告诉他，“因为检查诸公，虽若‘并无成见’，其实是靠不住的，与其以一个署名，引起他们注意（他们肯定译文社中，必有我在内），以至挑剔，使办事棘手，不如现在小心点的好。”黄源这才理会到鲁迅这样隐姓埋名苦苦的干，全是为了对付检查老爷的干扰，以便将自己的乳汁顺利地哺育千百万青年。《译文》创刊号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不但再版加印，而且达到第五次（版）加印，鲁迅为此感到高兴。第二期，他又用了几个笔名，译了五篇小说和散文，其中有一篇就是高尔基的《俄罗斯童话》，后来在《译文》中连载。第三期出版后，鲁迅笑着对黄源说：“下期起，我不编了，你编吧，你已经毕业了。”但他与茅盾、黎烈文以后还是尽力支持《译文》，有约稿总是几天内就如期赶出来。而黄源为了照顾鲁迅身体健康，有时故意把鲁迅的译稿搁着缓发，使他知道《译文》稿源充足，并未闹稿荒，这样让老人家放心，不再为《译文》操劳。

现在黄源知道巴金开始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业务，并担任了总编辑之职，就建议将鲁迅译的《俄罗斯的童话》作为继《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田园交响乐》之后出版的《文化生活丛刊》的第三本书。黄源还代译文社邀请巴金与吴朗西参加9月15日《译文丛书》编委会在南京饭店举行的宴会，交换对《译文丛书》出版计划的意见。那天晚上，巴金又与鲁迅会见了，而且还见到鲁迅夫人许广平，和他们的八岁孩子海婴；还有茅盾、黎烈文、胡风、傅东华等人。那时鲁迅刚译完高尔基的《俄罗斯童话》（根据高桥晚成日译本转译），并在《文学》月刊连续发表了六篇《论‘文人相轻’》，身体却不很好，人也瘦了一点，虽然两眼仍炯炯有神，还很健谈。而且思路敏捷，讲话条理清楚，既风趣乐观，又幽默动人。他听说巴金回来负责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工作，很高兴，对文化生活出版社愿意接受为生活书店拒绝出版的《译文丛书》，更表示支持；知道文化生活出版社就要把他译的果戈理小说《死魂灵》第一部发到印刷所去排印，还告诉巴金，他正在打算把A·阿庚的《死魂灵百图》翻印出来，这样更有助于读者对这部小说的理解。大家对果戈理这部杰作都很有兴趣，对这部作品所刻划的五个个性非常突出的地主典型，都觉得读后有鲜明的印象，特别对其中的普柳什金嗜财如命，贪婪成性，果戈理用“含着眼泪的微笑”来对他进行入木三分的嘲讽，表示非常赞赏。当然，这些也有赖于鲁迅译笔的信达，得以传神到中国读者面前。因此，在这个场合上，巴金很自然地想起曾听说鲁迅自己打算写一部有关中国社会与中国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不知现在是否动笔，如能把这部长篇交给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那就太好了。他把自己的想法讲给鲁迅听，鲁迅却仰着头，抽了一口烟，微微而笑，然后回答说：“想做的事情很多，总是做不完。目前只能就现在来得及做的，先做。”他又说：“我还想过，准备写一本中国文学史，并把法布尔的《昆虫记》翻译过来。只是时间不够。”巴金听了他的话，便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说文化生活出版社准备出一套以发表当代作家文学作品为主的《文学丛刊》，第一次出十六本，已经组织到

郑振铎、沈从文、吴组缃、艾芜等十个人的近作集，想再在上海约请六个人各编一本集子出来，这样丛刊的第一套就能一齐出版了。“周先生，你也在最近编一个集子给我们吧。”巴金终于把要求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鲁迅听说这个丛刊开本是三十二开的，每本字数不多，也就点了点头答应了。这时茅盾也在一旁，巴金也把同样意思向他讲了，茅盾也答应把自己最近写的一本中篇小说《路》交给巴金。巴金听了非常高兴，黎烈文也说：“今天的聚会，不但解决了《译文丛书》的出版问题，还为《文学丛刊》落实了计划。”大家都很满意。傅东华虽在现场不曾吭声，事后却把饭桌上的事情在无意中告诉了生活书店。哪知生活书店知道了很不高兴，认为黄源拿生活书店的工资，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做事，就要撤掉黄源《译文》编辑职务。他们请鲁迅到新亚酒店赴宴，在席上把这个主意提出来。鲁迅心想，这不是他们在和我“吃讲茶”吗？怎么会专横、小气到这个地步！一气就放下筷子，一言不发走了。不久，《译文》也就这样停刊了。而且黄源在《文学》的编辑职务也因此卸除。直到第二年3月，上海杂志公司才把《译文》接办过去，仍由黄源主编。

过了几天，鲁迅请黄源告诉巴金：他准备编入“文学丛刊”的那本书是短篇历史小说集，书名叫《故事新编》，除了已发表过的《不周山》等几篇外，还有三、四篇正在动笔写，等写好了，一起送来。巴金想，鲁迅健康欠佳，估计短期内完成不了三、四篇小说的写作，只好等待一个时期再说了。哪知丽尼他们把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文学丛刊》的广告很快登了出来，还宣布了第一集十六本书名和作者名字，并说要在旧历年底前出齐。鲁迅看了广告，心里发急，觉得如果再不动笔把那三、四篇历史小说写好，就要影响巴金的计划了，老人终于日以继夜地把《故事新编》未完成的《出关》、《采薇》、《起死》三个短篇，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赶写了出来，和先前所作《不周山》（即《补天》）、《奔月》、《铸剑》、《理水》等五篇，编为一集，并写了一篇序，于当年12月下旬托人带交巴金。当时许广平见鲁迅写得辛苦，劝他歇几天再写，鲁迅还说：“我怎能不写呢？不写就要耽误书店出书了！”黄源把鲁迅夫妇的这些对话，在闲谈中讲给巴金听，巴金对鲁迅这样支持他的工作，从心底感激，后来，《文学丛刊》第一集的十六本书出版了，他翻开《故事新编》，就想到鲁迅对待人的诚恳与热情，和他对工作的认真与负责态度。从鲁迅帮助黄源创办《译文》过程中所显示的热情培植青年的精神，巴金现在从自己的经历中也感受到了。应该说，鲁迅的伟大人格影响了巴金。

巴金从事的编辑工作，越来越忙，读者给他写的信也越来越多，他几乎没有一封信不认真处复。他开始从读者中找到朋友。有的人因为他的热情鼓励而成长为作家；有的人由于他的指引而解除心头的烦闷，找到了思想的出路；有的人则因为读到他所编写的书而奔向革命；还有人在危难中得到他的无私救援而逃出火坑。

这时巴金已离开他舅父家，而在虹口狄思威路（今溧阳路）麦加里21号定居下来。和他同住在一幢房子里的，仍是索非夫妇。他再也不像几年前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居住时那样寂寞，他有了很多作家朋友，也有了千万个读者在他心里，他们的大量来信来稿，更增加了他工作的热情。他从友人处得到温暖，同时也把自己身上的热量散发给别人，使别人也觉得在他的身边是这样暖和。这时和他来往得最勤的仍是从法国归来的马宗融夫妇，虽然他

们住在法租界的拉都路（今襄阳南路）306 弄敦和里 21 号（现改为 22 号），与他的住处溧阳路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但是他仍和索非等几个熟人，每个月总要在拉都路那边相聚几次，甚至住几个晚上，因为他们几个人碰在一起，谈文学，谈生活，谈理想，总是谈兴很浓，谈到深夜。当时马宗融应中法文化基金会之约，正在为他们翻译一本法文哲学著作，非常辛苦，也很紧张，而他的习惯总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所以有时即使有客来，也让客人在楼下谈天说地，自己却在楼上埋头苦干。而每当巴金来到，他总是兴高采烈，放下译笔，走下楼来，与大家一起喝着咖啡，参加大家无拘无束的谈话。他的夫人女作家罗淑也就陪同马宗融搬凳移椅，招待客人，有时还替大家张罗饮食，在马宗融与客人的谈话中，插上几句，使周围的气氛更加活跃，更加欢愉。在这个家庭中巴金经常被当作小弟弟一样接待，是他家最受欢迎的客人之一，巴金也把马宗融夫妇当作大哥和大嫂，有些事情总找他们帮助解决。

有个曾在厦门工会工作过的朋友，因参加了当地电灯公司工人罢工活动而被捕过，出狱后到东三省参加了抗日义勇军，有一次来沪看巴金，巴金外出，他就去开明书店访索非，因为索非也是他的熟人，他还把一只皮箱寄存在索非家中。这一年（1935 年）冬天，恰巧日本有个水兵叫中山秀雄的，在沪被人杀害，日本侵略者就趁这个机会想消灭上海的抗日力量，他们的海军陆战队在虹口的一些弄堂里，进行了挨家挨户的搜抄。当时巴金和索非的住处恰好也在日本人的势力范围内，索非夫人鞠馨提醒索非，那个在东北当义勇军的朋友所寄存的箱子，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三个人就把箱子打开一看，发现箱子里不但有文件，而且还有一支手枪和一百颗子弹。巴金没法，只好把那只箱子带着，乘了一辆人力车，冒险通过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警戒线，来到法租界拉都路敦和里马宗融家中。马宗融和罗淑听巴金讲了这箱子的来历，二话不说，就把它搬到楼上藏起来，直到他们在一年几个月后去广西教书，将房子转让给别人时，才把箱子设法托付给了另一个朋友，让他以后转还原主。

《文学丛刊》第一集的十六本书，终于在 1935 年旧历年底前陆续出齐。这一集不但有鲁迅的《故事新编》、茅盾的《路》，还有巴金在日本时写的三篇小说汇集《神·鬼·人》，其中《人》就是他那篇被国民党审查老爷从《文学》杂志上删除的文章，现在他把它化装了一下，终于在自己编的丛刊内出书了。这套丛刊受到了读者热烈的欢迎，不到半年，就重版多次。在每本书后，都有整套丛刊的书目，并标明售价。价格最高的是曹禺的《雷雨》，但也只卖四角半；其他如张天翼的《团圆》、靳以的《珠落集》、何谷天的《分》、肖军的《羊》，都是三角半；至于茅盾、鲁迅、巴金、沈从文、鲁彦、艾芜、吴组缃、郑振铎、丽尼、李健吾十人的集子，则都在三角以下；卞之琳的诗集《鱼目集》，只售二角。书后吸引人的还有两百多字的一则广告，那是巴金亲自动笔撰写，经与吴朗西、丽尼、伍禅和不久前来出版社工作的陆蠡共同商量定稿的：

我们编辑这一部文学丛刊，并没有什么大的野心。我们既不敢扛起第一流作家的招牌欺骗读者，也没有胆量出一套国语文范本贻误青年。我们的这套小小的丛书虽然也包括文学的各部门，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编者也不是文坛上的闻人。不过我们可以给读者担保的，就是这丛刊里面没有一本使读者读了一遍就不要再读的书。而且在定价方面我们也力求低廉，使



贫寒的读者都可购买。我们不谈文化，也不想赚钱。然而我们的文学丛刊也有四大特色：编选谨严，内容充实，印刷精良，定价低廉。

这里所说的这套“文学丛刊”的“四大特色”，确是名符其实的。不但第一集的十六本书都有根高的质量，在同年（1936年）七、八月份，文化生活出版社又编印出版了第二集的十六本书，各集仍都保持了题材、风格、形式多样的特点；而且既有成名的老作家的作品，更有不少新人的新作。除了当时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的何其芳、芦焚、曹禺三位新进作家的作品外，还有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如陆蠡的《海星》，肖乾的《栗子》。陆蠡是吴朗西在中学时代就认识的朋友，他在1935年曾到上海南翔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教过书，1936年初来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他工作勤奋，事无巨细，都非常认真负责，既在昆明路德安里编辑部协助巴金从事编辑工

作，又在福州路436号四楼营业部帮助总经理吴朗西做会计，还和另外一个同事共同担负起出版部的各种事务，经常跑印刷所和装订所，作必要的联系；一到晚上，还在灯下译书、写文章，总是熬到深更半夜。他进出版社以后，发觉巴金虽然担任总编辑，却从来不曾有总编辑的架子，不但亲自审稿，还亲自做校对工作，亲自复读者来信，有时还为读者上街买书寄书，甚至动手打包裹。书一出版，不论自己写的，人家写的，他总是欣喜万分，有时还代作者寄赠朋友，甚至埋头做补书工作。

书对他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特别是他经手编校的书，他经常把它们当作宝贝一样的爱护，偶然发现排校错误，他总是深悔自己粗心大意，没有把工作做好，首先责怪自己，从不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为了把书能印得好一些，不出差错，他亲自跑印刷所，与排字工人打交道，和他们交朋友。有次一个青年工人为急于赴朋友的约会，嫌在校样上一改再改，显得不耐烦，巴金既体谅他的心情，又耐心向他讲清必须修改的道理，使对方乐于接受，而又心境舒坦，最后把工作做好，又能及时去参加约会。不少排字工人至今还在传说当年巴金与他们亲密相处的情景，当然这些工人现在也都是阅历丰富的老工人了。他们很多已经退休，他们是在冬天的街心花园里，伴着阳光向人述说这些往事的。巴金还和鲁迅一样，经常积累国外出版的书籍，从它们中间借鉴装帧、设计的图样，把它运用到国内出版的书刊上来。他还收藏各种古籍善本，从中汲取精华，增强自己各方面学识。

值得提出的是巴金在出版社从事如此辛勤的工作，却从来是义务劳动，不拿一文钱的薪金。他的生活还是靠稿费收入。这一年年初，他的《爱情三部曲》已经出版，《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和第二集也都在开明书店出版发行。他把这两本书继去年出版的《俄国社会运动史话》和《狱中记》，再一次赠给鲁迅，请他指教。鲁迅对巴金的作品是看得不少的，他不但认为“巴金是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的作家”，而且还认为“他是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 第五节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巴金不仅担任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还应良友图书公司赵家璧的要求，与靳以合编了一份新的文季刊物《文季月刊》。1935年11月，巴金去北平住了三个星期，曾为《文学季刊》停刊帮助靳以把工作结束。上海的《文季月刊》编辑工作，实际是北平《文学季刊》的继续，不过把原来的季刊改成了月刊，发稿的节奏律更强罢了。这时郑振铎也已由燕京大学返沪，李健吾也来到了上海，加上原在《申报》编《自由谈》副刊的黎烈文，和在《大公报》编《文艺》副刊的肖乾，大家经常在一起。巴金在上海的朋友更多了。

编辑工作的忙碌，并不曾使巴金放弃自己的创作。在1936年，他仍每个月至少写一万字。白天，他总在几个地方奔波，从事与编辑、出版有关的业务；晚上才回到狄思威路麦加里家中写自己的文章。当时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部在昆明路德安里，营业部和收发室则是在福州路436号《大公报》的三楼，而《文季月刊》的编辑室却在北四川路良友图书公司中。尽管巴金当时已很出名，从1929年开始，已出版了十二部中、长篇小说，十本短篇小说集，六本散文集，十七种翻译作品，总共写了三百多万字，但他的生活还是挤电车、住亭子间，在狭窄的房间里办公，在没有电梯的大楼上跑楼梯，过着十分忙碌、非常辛苦的生活。

有一次，他给一个青年读者写信，这样诉述他的一天：

“我在大太阳下面跑了半天的路，登了五十级楼梯，到了福州路文化生活出版社，刚刚揩了额上的汗珠坐下，你的信就映入我的眼帘。我拆开信封，你那陌生而古怪的笔迹刺着我的眼睛。我看了几个字，把信笺放回到信封里；我又去拆第二封。……我把别的几封信都匆忙地读了，同你的信一起放在衣袋里。我和这个地方的人说了几句话，便又匆匆地走下五十级楼梯，跑到街心去了。刚好前面停着一辆无轨电车，我一口气跑了过去。车子正要开动，我连忙跳了上去。车厢里的人很少，我占着宽敞的座位……我便取出你的信来，仔细地但很费力地读了一遍……电车到了一个站头，我下了车。我半跑半走地到了另一个地方（北四川路），又登上了几十级楼梯，在窄小的《文季月刊》编辑室里坐了下来，我开始校对一篇我的稿子（《文季月刊》纪念“九·一八”的《卷头语》）……我写完那篇短文……发回给排字工人……有人来通知说，一个从乡下来的朋友在下面等着我。我便走了下去……我们到附近一个咖啡店里去谈了一个钟头……我回到编辑室，看见写字桌上有一封从北方来的信，也是一个不认识的朋友写的……过了一阵，一个电话打来，要我再到我先前离开的那个地方去，有人在那里等我。我匆忙地走到无轨电车的站头。无轨电车又把我带到先前来过的地方。我又登了五十级楼梯走到三层楼上。在这里

我和不曾约定而无意间碰在一起的几个朋友，谈了将近一个钟头的话。我又应该回到一点多钟前离开的那个地方去。因为那边还有朋友等着我一道吃饭……”

作为当时已全国闻名的大作家、总编辑巴金，过的是这样劳累的生活，是今天许多人难以想象的。这当然有旧中国的时代影子。巴金的生活是这样，当时的一般作家当然过的日子更差。就在这个时候，巴金接到缪崇群从南京来信，告诉他他的夫人患肺结核去世了！巴金想起几年前在北平的一个秋夜，他在缪崇群住的公寓里作客，崇群的夫人怎样从她父母家郑重其事地搬来一

床新缝的棉被为他安排床铺，白天又怎样和崇群热情地陪伴着他去看电影、游故宫，后来这对病弱的新婚夫妇又怎样挥着手送他上火车，给他带来多少友情的温暖，而现在她却抛下和她同样病弱的崇群，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崇群给巴金的信中说：“她临死的时候还说，她死后我将是世界上一个最飘泊的人。我飘泊到什么地方去，又为什么要飘泊，她就没有给我说，连我也不知道。”这样绝望的倾诉，更使巴金感到悲痛，更为他的那个善良的朋友感到不安。他的心变得沉重了，禁不住为他们落泪。

巴金接到许多读者的来信，亲自答复他们的提问。他倾听他们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同情他们的不幸，必要时还给他们以具体的帮助。曾有个姑娘因受刺激到一个地方带发修行，不幸陷入人家的圈套，她从杭州西湖边尼姑庵写信给巴金要求帮助，巴金就约鲁彦、靳以同往，假扮“舅父”身份还清她的欠债八十元，把她从虎穴救了出来，并资助她到上海与舅父团聚。巴金作品的读者面非常广泛，青年读者更多，他们都把他作为知心的朋友和尊敬的老师。巴金自己也把心交给读者，一方面听取他们对他作品的意见，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向读者倾诉，经常把自己对事情的想法坦率告诉对方，把所有的读者都当作诚实可靠的人，从不预先设防。他曾把类似缪崇群这样朋友的不幸遭遇告诉读者，并向读者申述自己心里的悲痛，和对社会的不平。他有时也告诉读者自己怎样在一条大街上遇到突然的交通封锁，因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有特权可以把许多中国人在中途拦住，让他们任意搜查。他还给北方一个青年读者复信，发表自己对某些文学现象的意见。那读者对上海当时文坛有些看法，他认为“上海显然有一种倾向：要搅入无谓的笔战里。”他告诉巴金：“北方的青年很为这件事忧愁过。”因而他向巴金发表自己的意见，说：“这里（指当时的华北）连话都不准说，在上海的人却在嚼舌头，内争，有什么好争，北方读者读到那些文字，心更凉了。”巴金读了这样的信，就回答说：

“你这一段话，我是料不到的。可是我读到它，我几乎要落泪了。这时候窗外正响着兵车的隆隆声，一个不可知的奇怪的命运在前面等着我们。也许明天我和这周围一切都不会存在了，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对于这个我并没有一点害怕。但是一想到和我同时代的无数的年轻的心，我总有一点留恋。朋友，甚至在最后的一刻，倘使我还有一点力量，我也要拿来给年轻的心添一点温暖。所以我无论如何要静下心来给你写这封信……你们北方青年可能对上海文艺界的情形不大了解。我自己并没有参加最近的文艺论争，但我得说一句公平话，这绝不是无谓的笔战，更不能说是‘内争’。这论争对于新文学的发展是有帮助的。有许多问题是要经过几次的论争后，才逐渐地明朗化而终于会得到解决的……”

当时以鲁迅为旗帜的上海革命文艺运动确是如火如荼。就从1933年开始来说，影响最大的日报《申报》副刊《自由谈》由黎烈文担任主编，鲁迅、茅盾、瞿秋白等发表了大量的杂文，在上海舆论界起了很大的作用；茅盾的《子夜》与巴金的《家》出版，为革命文艺赢得了众多的读者群；许多新作家如沙汀、艾芜、欧阳山、张天翼、靳以、曹禺、何其芳等人，继巴金的出现而初露头角；一些进步电影上映，如田汉的《母性之光》、《三个摩登女性》，夏衍的《春蚕》、《上海二十四小时》等都在观众中得到好评；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影评小组，几乎占领了上海所有大报的电影副刊。当然，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没有停止，相反，他们变本加厉，在1934年2月底，国民

党上海市党部正式宣布，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命令，查禁“反动”书籍一百四十九种，举凡鲁迅等人著作，一律禁止印行和出售。禁书名单中涉及的作家计有鲁迅、郭沫若、陈望道、茅盾、田汉、沈端先（即夏衍）、柔石、丁玲、胡也频、周起应（即周扬）、华汉、冯雪峰、钱杏邨、巴金、高语罕、蒋光慈等二十八人。凡是这些人的著作、翻译，一律禁止。这就是当时为什么巴金的长篇小说《萌芽》在现代书局出版被查禁，改书名为《雪》拟在《文学》月刊发表又被检查抽掉，最后又易书名为《煤》仍不准发行的原因。特别使人愤激的是连巴金在《文学》写的一篇“新年试笔”，国民党检查官也勒令把“巴金”两字改作“比金”，才允许发表。国民党政府这样倒行逆施，遭到由开明书店领衔的二十多家书店联名反对，他们向国民党市党部两次“请愿”，抵制这种扼杀进步文化的禁令，国民党不得不放宽了禁书尺度，允许一部分书籍删改后重新出版。而在读者拥挤的书市中，越被禁的书越受欢迎。因此国民党感到单靠检查书报、电影还不够，就用暗杀、绑架手段来对付革命文艺工作者，并对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进行了三次大破坏，不少左翼作家遭到逮捕，有的还被杀害。

面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得寸进尺、贪得无厌的侵略，和国民党对外投降、对内镇压这样一个严峻局势，鲁迅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他认为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应“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而在左翼作家联盟内部却很早就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倾向，他们当然做过不少工作，也有一定成绩，但他们的圈子比较小，团结面不广，甚至都没有争取像巴金、叶圣陶、郑振铎、王统照等这些正直的作家，参加左翼作家联盟。而对鲁迅也仅止于尊敬，虽被他们尊称为“盟主”，最后却连鲁迅自己也说“实际上他们把我也关在门外了。”直到萧三从莫斯科写信来，劝导他们按照陕北党的政策，纠正“左”的倾向，他们才下决心把“左联”解散，以求抗日联合阵线的队伍扩大；但后来他们又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没有按照萧三与鲁迅的意见，在解散“左联”以前发一个宣言，讲清为什么要解散“左联”。这使鲁迅与“左联”一些实际负责人之间增加了距离。鲁迅支持胡风在“国防文学”口号之外，另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并拒绝在文艺家协会宣言书上签字。而当时作为“左联”行政书记的徐懋庸，更背着周扬、夏衍等人擅自写信给鲁迅，坚持他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情绪，提出不少不正确的看法，和足以影响革命作家内部团结的意见，以致激怒了鲁迅，在病中写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信。这封信具有重大的文献价值，它阐明了鲁迅拥护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严正立场，使当时进行的两个口号的论争进入结束阶段，许多人逐渐同意了两个口号并存的意见。在信中，鲁迅还针对徐懋庸对巴金、黄源、胡风等人的攻击，进行了严正的批评。鲁迅说：“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有《译文》这切实的杂志和别的几种译书为证。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黄源也签了名的。这样的译者和作家要来参加抗日的统一战线，我们是欢迎的，我真不懂徐懋庸等类为什么要说他们是‘卑劣’？难道因为有《译文》存在碍眼？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要巴金负责？”这样义正辞严、是非分明的声辩，不但澄清了视听，还使这场

论争的意义引向深入，没有人再写文章反对鲁迅。

一个多月以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白区领导人刘少奇以“莫文华”的笔名，在《作家》二卷一期发表了一篇高水平的题为《我观这次文艺论争的意义》的总结性文章。它一开头就指出：“这次论争的最大意义，我想是在克服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这一点上吧。文坛上的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现在似乎还没有完全克服掉，但在论战过程中，很明白的，已逐渐克服了许多了。”“在这次论战的开始和论战以前，在文坛的一角确存在着两派，即周扬先生与胡风先生的对立。但因有两个口号的论争以后，形势变了，一边仍是以周扬先生为中心的原来的一些人，而胡风先生等却忽然中途不见了……却有鲁迅先生茅盾先生……出来给周扬先生等人以重大的批判……同时也批判了胡风聂绀弩诸人的态度。形势就一变而成为新的两种对照：周扬是主张用‘国防文学’口号为联合战线的口号，反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鲁、茅等却是主张抗日统一战线应用抗日的政治的口号，而不应以‘国防文学’的口号去限制它的扩大，但并不反对‘国防文学’为自由提倡的口号，因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也可用，因为和‘国防文学’并不对立的。这里显然是理论上的两派，而不是口号与口号的两派了。我们也很清楚：鲁先生和茅先生等的意见是正确的，他们提的办法是正当的，适应于现在实际情形的；同时，论争愈发展下来，周扬先生等的意见的错误和宗派主义与关门主义，也完全暴露了，终于因为理论上站不住而改变态度了。这就是这次论争经过的大概情形。所以，这次论争的意义决不在争口号，而是在克服文坛上的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

刘少奇在这篇文章中，最后还有几句极其精辟、值得人们永远深思的结论。他说：“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在文坛上非常根深蒂固，有着历史性；我们若从新文学历史上去看，则如创造社、太阳社，后来的左联，各个时期都有各式各样的宗派主义的浓厚的表现。并且它有着艺术理论上的根源，即机械论，以及还有着客观的原因。——这个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的历史性和客观原因，就证明着我们克服的困难，但同时更证明我们克服的必要了。”

巴金在给北方一个青年读者的复信中，说他虽然并没有参加这次论争，但他对那个北方青年为上海这场笔战表示忧愁而感到惊异，纵使当时国难临头，窗外响着兵车的隆隆声音，他也要静下心来，给对方写这封信，告诉他：“这绝不是无谓的笔战，更不能说是‘内争’。这次论争对于新文学的发展是有帮助的。有许多问题是要经过几次的论争后，才逐渐地明朗化而终于会得到解决的。”他不仅预言了这场论争的意义和最后结局；而且实际上他自己也并没有置身事外。应该说，他还是参加了这次论争的。虽然他并没有在论争中写过文章；但他站在鲁迅一边。在中国文艺家协会发表宣言的同时，他与黎烈文一起起草了经鲁迅最后修改定稿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他们宣称，当民族危机达到了最后关头，他们绝不屈服，绝不畏惧，更绝不徬徨，犹豫。他们将更加紧紧地把握住现实，更加沉着而又勇敢地担负起艰巨的任务。同时愿意和站在同一战线的一切争取民族自由的斗士热烈的握手。在这个宣言上签字的，有鲁迅、茅盾、巴金、曹靖华、曹禺、靳以、黎烈文、鲁彦、胡风、唐弢、孟十还、张天翼等四十二人。

当时巴金已经从狄思威路麦加里搬到拉都路敦和里 21 号，这里本是马宗融夫妇住的地方，由于他们去桂林教书，巴金就在这幢房子里为他们看家，当然，周围环境比麦加里清静了一些。那时他刚刚开始写《激流》三部曲的

第二部，即《家》的续篇《春》。这部小说的开头，是在麦加里那个弄堂里的楼上亭子间写的；到敦和里才开始大段大段的写下去，在《文季月刊》上连载。但《春》的写作，还来不及写完四分之一，《文季月刊》就被国民党政政府勒令停刊，同时被封闭的尚有其他十二家期刊。这时，鲁迅先生不幸去世了。

巴金是在10月19日鲁迅逝世的当天就听到噩耗的。当时他真无法相信鲁迅会这样早离开了大家。他记得4月间他还在一个宴会上再一次向鲁迅约过稿，请他继《故事新编》之后再编一本集子，以便收到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第四集《文学丛刊》里去，鲁迅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并在不久托人带了口信来，说他的那本集子名叫《夜记》。后来他病了，把这件事搁了一些日子，但不久巴金知道他又在写文章，并已把《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四篇文章编好，准备把它们收在《夜记》里，他是无论如何想不到他会突然离世的。对于鲁迅，巴金和他见面次数并不太多。但对鲁迅的印象，已不是最近几年、而是很早就深入到巴金的心坎里来了。当他在1923年离开成都，转道重庆，坐轮船来上海的时候；当他在1925年在北京考大学，因病没有进考场，寄居在北河沿一个公寓里过着寂寞难耐的生活时，鲁迅的作品都是鞭策他、鼓励他继续前进的力量。多年来，在他的旅途中从不曾忘记带着《呐喊》、《彷徨》和《野草》。他至今还能够背出《伤逝》中的几段文字。他不仅向鲁迅作品学习到驾驭文字的方法，而且还像一棵小草那样，从鲁迅身上汲取像阳光那样的恩泽；特别是与鲁迅交往后，鲁迅的为人，他的平易，他的诚恳，他的对青年无限热情，和他那颗爱憎分明的善良的心，使巴金感到无比温暖。他永远不能忘记，不久前《作家》月刊编辑孟十还告诉他，鲁迅有一篇《答徐悠庸并有关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文章将在《作家》发表，现正在付排，巴金为此赶到印刷所去看，那是冯雪峰的记录稿，经许广平手抄，并有鲁迅的修改笔迹，关于巴金的几句话，也正是鲁迅亲笔增添进去的。巴金更从日常工作中，亲切地体会到鲁迅的办事认真，对工作绝对负责的精神。他对书稿的编校、印刷工作，总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对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巨大支持，使文化生活出版社得以顺利发展。他在病中还为其写作，唯恐影响出版社的出书计划。从书的装帧、用纸、插图到内容的校对，他都十分关注，他亲自动手扎包裹，寄赠友人。他还曾垫出七百元钱给出版社，让它作为代印代发《死魂灵百图》的周转资金。他对现实生活观察细致，明辨是非，不畏强暴，同情弱者。他一生教导人们反抗黑暗势力，追求光明，并预言一个自由、平等、独立的新中国将要到来，而他自己却为这个理想的实现做着铺路的工作。巴金曾以鲁迅做人的态度来衡量自己的行为，鞭策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正直的人。他想，鲁迅这样一个有伟大抱负、有伟大心灵的巨人，他怎么会忽然在一个早上在我们的身边消失？他难以想象这样一个可怕的现实突然会在他的面前出现。但是这个善良的瘦小的老人果然离开了我们，巴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任它从脸上掉了下来。

当天，巴金与靳以、曹禺一起赶到了北四川路底的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鲁迅寓所。他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里。鲁迅家中的朴素的陈设，使他一到这里就好像十分熟悉，很自然地认出那是鲁迅的家。他跑上楼，走进房间里，先看到鲁迅夫人许广平，她的悲痛的脸比以前消瘦多了，在她的旁边则是九岁的海婴，鲁迅留下来的遗孤。老人静静地躺在床上，闭着双眼，似乎在养神。巴金真希望老人能醒来和他讲话，像往常那样，坐在他的身旁，

回答他的提问，并答应他的约稿要求，看到老人点着头的微笑。但是老人永远不会醒来了，人们已永远失去向他再作请教的机会了！这时巴金又一次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鲁迅寓所门口，站满了各国记者，除了中国记者，还有塔斯社的，路透社的，法新社的，哈瓦斯社的，以及日本同盟社的记者。在巴金来到鲁迅家以前，孙夫人宋庆龄已经过来了，她是当天早晨在家里接到冯雪峰的电话，知道鲁迅病危，就由冯雪峰陪同赶到大陆新村的。一上楼，进入鲁迅卧室，鲁迅已经溘然长逝了！许广平正站在床边哭泣。冯雪峰想自己是地下党员，无法出面料理丧事，茅盾又恰好去浙江乌镇老家探亲，就与孙夫人商量。宋庆龄想到沈钧儒，就来到他的律师事务所，请他帮忙向虹桥公墓买一块墓地。沈很快就把事情解决，并与孙夫人一起主持鲁迅的丧事，和冯雪峰一起商定了鲁迅治丧委员会名单，其中有蔡元培、宋庆龄、沈钧儒、马相伯、内山完造、史沫特莱、茅盾、萧三、胡风、周作人、周建人等。冯雪峰向中共中央发了电报，中共中央同意把毛泽东名字列入治丧委员名单中，并发来了吊唁的电报，还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为鲁迅举行国葬，同时撤销对鲁迅著作的禁令。国民党政府不仅没有接受，还派了特务分子来监督鲁迅的丧事。以夏衍、周扬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上海“文委”则发动所属各联和有关人民团体，连夜组织了一支以“文委”所属各联为主的队伍，包括几千个学生、店员、工人、家庭妇女，前来参加送殡，他们沿途高呼爱国救亡的口号，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示威大游行。

鲁迅灵柩停在万国殡仪馆，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群来瞻仰遗容。当时一些青年作家张天翼、黄源、黎烈文、靳以、欧阳山等都曾经在这里做接待工作。巴金更是连续两个晚上在鲁迅遗体旁边为老人守灵。夜是那样深沉，前来吊唁的人都散去了，巴金站在灵前，看到半截玻璃棺盖并不曾掩盖住鲁迅慈祥的脸，他想着自己从老人身上得到的恩惠，想着老人一生所遭受到的困苦与压抑，以及他不屈的斗争精神，和他为开辟中国未来幸福前途所作的努力，深感目前外敌入侵、国土沦丧、民族危亡，而国内统治者仍以鱼肉人民为乐，人民大众是多么需要像鲁迅那样的人来带路！现在他离我们而去了，但我们一定要擎着鲁迅的旗帜前进！巴金噙着泪水，注视着老人的遗容，禁不住从心中发出自己的誓愿：

“你像一个普照一切的阳光，连我这渺小的青年也受到你的光辉；你像一颗永不殒落的巨星，在暗夜里我也见到你的光芒。中国青年不会辜负你的爱和你的期望，我也不应当。你会活下去，活在中国青年的心里，活在全中国人民的心里……”

1936年10月22日，巴金参与了长达十几里的送殡队伍，并和张天翼、胡风、靳以、黄源、黎烈文、萧军、姚克共八位作家一起扛棺，亲自把鲁迅灵柩葬入虹桥万国公墓的墓穴里。

## 第五章烽火友情



## 第一节初秋的号角

1936年10月22日，上海人民为鲁迅送殡的队伍浩浩荡荡，沿途高呼爱国救亡口号，声音响彻云霄，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示威游行，也是一次上海革命力量的总检阅。能有这样的一次盛举，一方面，是因为共产党地下“文委”，通过所属各联和有关人民团体，已把这支队伍连夜组织起来；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是由于上海文艺界当时已在鲁迅旗帜下团结起来了。原来经过两个口号的论争，党内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受到批判后，在鲁迅去世前的一个月，曾由冯雪峰和茅盾、郑振铎的力促，使上海文艺界各方人士发表了一个《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言论自由宣言》，签名的二十一个人是：鲁迅、郭沫若、巴金、王统照、包天笑、沈起予、洪深、林语堂、茅盾、陈望道、夏丏尊、周瘦鹃、叶圣陶、谢冰心、张天翼、傅东华、郑振铎、郑伯奇、黎烈文、赵家璧、丰子恺。这个宣言由茅盾、郑振铎起草，冯雪峰定稿。这张名单充分体现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广泛性，与文艺界力量的集中壮大，为抗战开始后文艺界团结一致抗敌御侮，作好了准备。

正当作家们团结抗日，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出版界却遭受了一次严重的打击。这就是1936年12月，国民党政府竟然颁布命令，查封了上海十四家杂志。其中既有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星期刊》和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也有巴金、靳以主编的《文季月刊》，孟十还主编的《作家》。

《文季月刊》是在1936年6月创刊的。那时在北平出版的《文学季刊》刚刚被迫停刊，巴金为它写了停刊词后回沪，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向巴金表示，希望他和靳以能帮助良友图书公司另编一个文学刊物。巴金商得靳以同意，决定将季刊改为月刊，还亲自为刊物写了发刊词。《文季月刊》就这样办起来了，它不但保持了《文学季刊》的原来作者队伍，还扩大了组稿范围，约请了一些不曾在《文学季刊》上发表过作品的作家叶圣陶、茅盾、沈从文、丁玲、蹇先艾、草明、欧阳山等人写了稿，此外，还刊登了刘白羽、邵荃麟、葛琴、田涛、齐同等当时一些新作家的不少优秀之作。

不料《文季月刊》才出了七期，又被迫停刊了，这对巴金、靳以两人说来，虽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但这绝未影响他们献身文学事业的决心。就在1937年3月，他们又办起了一本二十六开本的月刊《文丛》，由靳以主编，巴金以“李国桢”的假名担任发行人，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外形虽然小些，内容依旧丰富，更具战斗性，版面设计上还有许多创新。到了7月，芦沟桥事变爆发了。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这次中国驻军进行了奋力还击。震惊世界的号角响了起来，炮声把全中国人民的心都唤醒了。救亡的歌声响遍了城市和乡村，谁也不愿做亡国奴，连国民党的一些官僚也不想把汉奸的臭名戴在自己的头上了。接着是8月13日日军偷袭上海，淞沪战争爆发。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团结一致对日，神圣的全面抗战开始了。

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在闸北亲身遭受过外敌人侵灾难的巴金，现在他再一次领受了帝国主义给予中国人民的祸害。他知道一个个村庄正在被炸受毁，一个个城市正在遭到焚烧，灾区人民正在成批地死亡。他发觉死对人们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问题在于大家能不能摆脱对死的恐惧。他在淞沪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天下午，就在上海的电车上，看到大世界前面落下一颗炸弹后上海人民对战争所显露出来的神情。他看见马路两边人行道上，人们身上带着血迹，正手牵着手，在结伴同行。他们的脸上十分严肃，没有一

点恐惧或悲伤的样子，就像一些勇士在强暴的敌人面前从容就义。当时有十几辆车子受炸后的残骸还留在马路上，有一百多具的尸体横躺在一块空场里，普善山庄的工作人员正忙着在收拾这些无辜的牺牲者。这是巴金在这次战争中所看到的第一个景象。他想：“个人的生命容易毁灭，群体的生命却能永生……这一次中国人民真正团结成一个整体了。我们把个人的一切完全交出来维护这个‘整体’的生存。这个‘整体’是一定会生存的。整体的存在，也就是我们个人的存在。我们为着我们民族的生存虽然奋斗到粉身碎骨，我们也决不会死亡。”

郭沫若从日本“别妇抛雏”回国，上海文艺界开大会欢迎他，巴金参加了。夏衍公开出面主持的报纸《救亡日报》出刊了，巴金与王任叔、阿英、邵宗汉、金仲华、茅盾、范长江、柯灵、郭沫若、夏衍等一起出任了这家报纸的编委。在鲁迅先生逝世周年纪念座谈会上决定成立的文艺界救亡协会，巴金和郭沫若、陈望道、汪馥泉、欧阳予倩等十一人被选参加临时执行委员会。巴金还与茅盾一起主持了《呐喊》周刊（后改名为《烽火》），那是当时上海最有影响的《文学》、《译文》、《中流》、《文丛》四种文学期刊在战时的联合刊物，它是作家们在爱国救亡运动中与敌人进行搏斗的匕首。

这个时期巴金写诗、写散文，也写短论。他的诗，描写了人们曾经怎样为求得片刻的安宁而在屈辱中贪生，但是敌人一排枪、一阵火毁灭了我们的梦境；同时也带去了我们许多年轻的生命。他歌唱人们从黑暗中发出反抗的呼声，洒着血冒着敌人的枪弹前进。他鼓励人们宁愿在战场上作无头鬼，也不要做一个屈辱的奴隶而偷生。巴金还写散文，批评一个日本社会活动家山川均，这个人曾经被我国翻译界作为社会主义者，把他的言论介绍到中国来，但日本侵华战争一发生，他就立刻站在日本侵略者立场上，用恶毒的语言来咒骂中国人民对日的抗战。巴金把日本空军轰炸松江车站的景象描写给他看：日本侵略者以八架飞机对付中国十辆运送难民的列车，经过五十分钟围攻，它们投下了十七枚重磅炸弹。当最初的两枚炸弹落下时，后面的四节车厢就被炸毁了。血肉和哭号往四处飞迸。接着头等车厢又着了一个炸弹，有的人被炸死了，活着的全从车厢里仓皇逃了出来。飞机飞得很低，急急地追赶着这些在站台上奔跑的人，并用机关枪密密地扫射他们，于是人群一排一排地倒了下来。巴金把这样一个惨象记叙后，接着问山川均：“对于这样冷静的谋杀，你有什么话说呢……自然，你没有看见一个断臂的人把自己的一只鲜血淋漓的胳膊挟着走路；你没有看见一个炸毁了脸孔的人拊着心疯狂地在街上奔跑；你没有看见一个无知的孩子守着他的父母的尸体哭号；你没有看见许多只人手凌乱地横在完好的路上；你没有看见烧焦了的母亲的手腕还紧紧地抱着她的爱儿。哪一个人不曾受过母亲的哺育？哪一个母亲不爱护她的儿女……我们素来憎恶战争。但我们绝非甘心任人宰割的民族。当我们的自由与生存受到威胁时，我们是知道怎样起来防卫的……而你们派遣重兵远涉重洋来毁坏文明的都市，和平的乡村，你们是为了什么而作战的呢？”

巴金义正辞严地告诉这些侵略者：“是你们的‘皇军’亲手普及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教育，培植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意识，煽动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感情。是你们用飞机，用大炮，用火，用刀，教育了中国人民，使他们明白‘抗日’是求生存的第一个步骤，并非中国人生来就具有抗日的感情的。”

这时巴金还曾写信给一个远方的友人，——三年前曾经热情接待过他住在横滨的日本知识分子武田。巴金恳切地劝告这位忠厚老实的朋友从迷梦中

醒来，他告诉武田，日本占据了满洲，使中国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日本人民也不曾得到好处，他们的肩上反而增加了一笔负担，还使二十万日本子弟变成炮灰。真正得到好处的，只是极少数的日本法西斯统治者，他们升了官，发了财。巴金很关心武田的处境，他听说日本熊本师团的一部分人已经来上海作战了，武田是后备役，目前还轮不到，但总有一天他也会被迫来华充当炮灰。巴金想起武田的女儿文姑给他的一封信，信上说“已经是连虫声也静下去了的深秋了，你先生在这样静寂的夜里读书的姿态还在我的眼前浮现”。这些话使巴金想起当年在武田那和睦家庭里安静度过的日子，并想起了武田给他的友情。但是现在他觉得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大炮把两人中间的友谊隔断了，它毁坏了我们这边的建设，并还将带来更大的祸害，他希望友人武田能行动起来。他写情给武田说：“我并不是来求助于你，我并不代表那无数受了损害的中国人民来求你们给一点点同情。我要求的，只是你和你的同胞们的反省，希望你们起来和我们共同努力，毁灭那个破坏人类繁荣的暴力。”

那时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部已从昆明路德安里迁移到法租界巨籁达路（即今巨鹿路）福润里内。但它和其他书店、出版社一样，往常的业务差不多都因战争的发生而处于停顿状态中了。文生社的工作人员有的回乡，有的转业，有的撤退，有的到重庆筹备出版社迁川，唯有陆蠡挑起留守的担子。巴金则把主要的时间花在那本三十二开的小册子《烽火》周刊上，因为茅盾不久前离沪赴港了。环绕《烽火》周刊，他们还以烽火社名义，编发了《烽火文丛》、《烽火小丛书》（最初还编有《呐喊文丛》《呐喊小丛书》）两套小丛书，都是以宣传抗战作为主要内容。巴金为了让这些小册子如期出版，不仅自己彻夜赶写文章，还与朋友们写信广泛联系，与靳以一起组约稿件，在空中敌机盘旋下，在敌人的机关枪扫射声中，亲自跑印刷所，改稿子，看校样。他在鲁迅逝世一周年前夕，为赶印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的《鲁迅先生纪念集》，坐人力车把沉重的印书用的纸张搬到印刷所去，一路上他看够了敌机在头上飞来飞去，听厌了从飞机中传来的机关枪声。他想起一年前站在鲁迅灵前，人们说过的话：“我们要继承鲁迅先生的遗志。”现在我们实现誓言的时候到了！在前线开向敌人的炮火，在山间田野流着的中国战士的血，正是我们这一代人向鲁迅先生生前所创造的事业的酬答。“抗战一定胜利，新中国一定到来。”巴金不但把这两句话牢记在心中，还多次写在他自己的作品中。

这一年的十一月廿一日，上海的租界成为孤岛，因为四周的中国地界都被日军占领了。这一天许多人流着泪站在苏州河南岸，面对着浜北的大火，看敌人的铁蹄下，国土沦丧，同胞遭殃。巴金也像别的人一样，隔着一条苏州河，看到了对岸的沦陷景象。那是一片火焰：房屋在燃烧，生命在丧亡，电线、树木、家具、门窗、店铺、招牌全都化成灰烬……他知道他住过的闸北宝山路房屋，继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之后，现在又再一次在火海中毁了；他知道他短期住过的杨树浦房子，现在也该在火海包围之中。这些地方曾经留下过他多少生活的影子。结识过多少朋友，他们曾经给他过多么温暖的友情，现在他们都在哪里？此刻，在那里受难的都是他的同胞，他的朋友，他的兄弟：焚烧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国土。这是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理想在受着煎熬，受着摧残。他望着火海返照到天空中去的漫天红光，心如刀割，禁不住燃烧起满腔悲愤，满腔仇恨，想到亚·赫尔岑的《暴风雨后》的一句话来：“这样的几分钟会激起十年的憎恨，一生的复仇。”他发誓总有一天

要昂着头回到这个地方来！然后他离开河岸，回到法租界自己住处，准备着怎样把上海沦陷的景象反映到《烽火》周刊上去。

但是一到年底，上海租界的情况就开始改变。虽然当时英美等国还不曾与德日意三个法西斯轴心国宣战，上海租界还可以暂时保留着一个中立的“孤岛”局面，日本军队还暂时无法进入租界控制一切，但是中国人自己办的报刊，租界当局已无法阻止敌伪从外面伸进一只魔手来进行干扰。所以当时上海的“中国地界”一旦沦陷，原在租界出版的一些报刊都纷纷停刊了，《烽火》也就在这时被禁发行，不得不考虑迁广州出版。直到1938年初，《译报》、《文汇报》等报纸以洋商名义登记的办法，可以拒绝敌伪检查，“孤岛”上海的新闻文化界才又出现了一个时期继续坚持抗日的热闹繁荣景象。

这时，巴金已从拉都路敦和里迁到霞飞路霞飞坊（即今淮海中路淮海坊）59号索非家三楼，他在这里写完了在战争发生前就开始动笔的“激流三部曲”的第二部小说《春》，这部小说原在《文季月刊》创刊时连载，边写边登，因刊物停刊而暂时辍笔。现在他连自己都想不到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在这样一段苦闷的日子里完成这样一部作品。他在写作过程中曾多次烦躁地掷下笔，准备马上离开“孤岛”上海到别处去，甚至坐在书桌前一个钟头还写不出一个字。但是他还是终于控制了自己的感情，使自己仍然回到那个大家庭的故事中去，这不仅仅因为自己并不曾因战事而把旧的生活经历遗忘，还由于开明书店正等着，准备在上海把这本书排印出版。他这才又拿起笔来把淑英和蕙这两个少女的故事继续写下去。他住到霞飞坊后，就很自然地常在黄昏时分，来到霞飞路一带散步了。这里马路宽，商店很多，但它两旁绿树成荫，房屋整齐，巴金在散步时常常看到一些青年学生从学校里放学出来，他们抱着书，和同伴说着话，慢慢地走回家去。他从他们年轻的脸上看到希望，看到理想。他常想为他们写些东西，觉得带一些温暖和同情给这些青年朋友，就是自己的幸福。

写完《春》，看完开明书店给他的校样，那已是1938年的阳春三月。现在他决定离开上海到广州去，临行前却接到李采臣自成都来信，说马宗融夫人罗淑在产下一个男孩以后，不到二十天就患产褥热死在医院里。这个不幸的消息，使巴金比去年听到缪崇群夫人逝世时更感到悲痛。他记起去年夏天，在桂林教书的马宗融夫妇来上海过暑假时，马大哥临行原想把怀了孕的罗淑留在上海，哪知在他返桂林途中，却在湖南听到“八·一三”抗战爆发，就想重回上海把罗淑接回去，罗淑不愿他往返跋涉，力主自己单身赶回湖南与马大哥团聚。临走时，她对巴金说：“这个时候我一定要赶回到老马身边去，他像个大孩子，性子又像一团火，没有人帮助他不行。”这时巴金就让正准备去南京的华林陪同罗淑送上一程，他特地到西站排队，为他们购到两张车票。罗淑终于冒着沿途敌机的轰炸赶回到她丈夫的身边，当年11月，听到中国军队在上海撤退的消息，夫妇两人拍电报来询问巴金的安全，劝他也回到内地去工作。这两年来，她与马宗融像氏兄长嫂一样关心他的生活，他们的家成为他们几个朋友日常欢聚的地方，朋友们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二次聚集在这里谈笑。每次马宗融听到他们的声音，总是烧好一壶咖啡，从楼上跑下来，发出爽朗的笑声，而把热情藏在温厚外表里的罗淑，则每每在大家的谈笑中插几句十分得体的话，把客厅里的欢乐气氛很自然地增加到最高度。许多人说罗淑性格驯良，是个贤妻良母型的女性，但她有时又急公好义，勇于承担一切。罗淑在文学创作上也有才华，她暗暗地进行短篇小说创作，却

不让人知道。当她的第一篇小说《生人妻》由巴金署上“罗淑”笔名交给靳以发表在《文季月刊》时，靳以还以为那是个陌生的作者，却不料竟是他所十分熟悉的马宗融夫人罗世弥。巴金发现了她的创作才能后，曾多次鼓励她继续进行写作，她后来果然又写了一些，如《刘嫂》、《桔子》、《井工》三个短篇。当她临行时还说有几个短篇正在修改，等改好了再寄来，但是现在巴金再也收不到她的稿子了。他感到很大的悲伤。他觉得自己好像丧失了一个长姐。这三四年来，在他生活上、工作上遇到麻烦，心境苦闷时，她曾多次开导，安慰他，有时甚至责备他，指出他的缺点。他认为她是许多朋友中给他帮助最多的一位。现在，她去世了，那么为自己也为大家所热爱的马大哥又将怎样呢？马大哥丧失了这样一个善良、聪颖的妻子，他面对着给她留下来一个待送入学的女孩，和一个新生的男婴，他将怎样生活呢？马大哥习惯于整日在书斋里生活，他面临如此巨大灾祸，巨大悲痛，巨大困难，我们应该怎样安慰他呢？巴金揩干眼泪，给马大哥写了一封信，他借用了意大利爱国者玛志尼劝慰赫尔岑的几句话，对马大哥说道：“勇敢些，你要抑制悲痛，不要叫你的精神破碎。我常常以为我们亲爱的人的死会使我们变成更好的人，你的义务是去做一切她所喜欢的事，而不去做任何她所反对的事……”

巴金带着痛苦的心情在3月离开了“孤岛”上海，他准备一到广州后，就为罗淑写一篇纪念文章，发表在《烽火》周刊上。那时文化生活出版社已在广州筹设了办事处，《烽火》也准备迁广州印刷出版。这次巴金将与靳以一起到广州，在那边经手编发《烽火》复刊号稿件。到码头来送行的是在上海留守的陆蠡，他正与朱洗、金堤、雨田等人筹备编一本《少年读物》半月刊，因此得请巴金在旅途中为这个刊物写些稿件，巴金答应了。

陆蠡又名陆圣泉，原是吴朗西在杭州之江大学的同学。巴金早在几年前在福建泉州的平民中学见到过他，但那时他们并不曾交谈。后来他调到上海南翔立达学园教书，1936年初才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他在社里，不仅协助巴金做编辑工作，还帮吴朗西做过会计。此外，他还经常跑印刷厂，为书籍的出版把好印刷、装订质量关。他白天工作量经常超过八小时，一到晚上又在灯下埋头写文章，或从事翻译。他的散文集《海星》、《竹刀》、《囚绿记》，和翻译作品《葛莱齐拉》（法国拉马丁作）、《罗亭》与《烟》（俄国屠格涅夫作）都出自他的这种勤奋工作精神。鲁迅逝世的时候，他说：“鲁迅这样支持我们，我们把文生社的工作做好，才对得起鲁迅。”后来他去了一次北平，淞沪战争发生后，许多人离社，他却回到上海，以后就经常与巴金坐在一起工作，并经常在书房客厅里谈到深夜，这才相互更熟悉了。后来他们还是每隔一周到外边聚餐一次，参加的还有研究生物学的朱洗。巴金认为和陆蠡在一起，心里总是感到很暖和，他觉得那是个崇高的灵魂，虽然他貌不惊人，说话不多，但他心地坦率，忠诚待人。他不善交际，朋友很少，但是一旦相交，患难与共。他觉得朋友们把文化生活出版社交给这样一个人，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 第二节 患难知己

巴金、靳以去广州，经过香港时就去找正在编《文艺阵地》的茅盾。茅盾知道他们到广州就准备恢复《烽火》的出版，非常高兴。他回想到去年8月沪战刚开始时，他在上海就约了冯雪峰去找巴金，向他提出准备编办一个“能唤呼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大众中去，提高大众的觉悟，开创出一个抗战文艺的新局面”的刊物，当时获得巴金完全同意，记得巴金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丛》也将停刊，上海杂志公司的《中流》、《译文》也已决定停刊，现在可能出现这样一个反常现象，抗战开始了，但文艺阵地上却反而一片空白！这种情形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出现，否则我们这些人一定会被后人唾骂的！不过当前书店、出版社都忙着准备迁内地，作长期抗战的打算，顾不上出版新书、新刊物，所以新刊物只有我们自己集体动手办，由文化生活出版社负责发行。好在一份小型周刊所费不多，出版了第一期，销路估计一定不差，就可以接着办下去。”当时冯雪峰说：“这是个好办法，何不就作为文学社、中流社、文季社、译文社四家的联合刊物，大家共同办起来，资金由这四个刊物的同人自筹？”茅盾听了十分高兴，当晚茅盾、巴金两人就分头找了黎烈文、王统照、靳以和黄源，取得了他们的一致同意，刊物就这样办起来了。刊物由茅盾、巴金发行，取名《呐喊》。但才出两期就被禁止发行。巴金到巡捕房交涉，没有结果，就另换了个刊名《烽火》，继续出版。当年10月，茅盾离沪去香港，刊物由巴金主持，直到上海沦陷，刊物又被禁出版，现在要去广州复刊，茅盾对巴金说，“过去为了应付上面的登记，你挂了个发行人名义，我挂了个编辑人名义；现在我不好再挂编辑名义了，这次我们就颠倒过来，让我挂发行人名义吧。好在我虽在香港，却经常去广州的。”这样，巴金到了广州就把《烽火》复刊了，不过为了使刊物每次出版的准备工作做得充裕一些，他把周刊改为旬刊，同时又协助靳以复刊了大型文学期刊《文丛》。

这时巴金已开始了以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火》的创作。他又要写作，又要编刊物，还要跑印刷所，甚至亲自打包，扎好刊物送邮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却忙得无法抽身去参加。生活是这样紧张，几乎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当然，他在广州一坐到办公室，还是首先写了一篇纪念罗淑的文章，并为这个早逝的友人编了一本遗作集《生人妻》，还替它补写了“后记”。他说：“在这种时候我们的生命犹如庭园中花树间的蛛网，随时都会被暴风雨打断。倘使我们不赶快做完一件事情，也许就永无机会做好它。今天还活着谈笑的人明天也许会躺在寂寞的坟场里。飞机在我的头顶上盘旋了三天了，谁能够断定机关枪弹和炸弹明天就不会碰到我的身上？然而我活着的时候，我还是要工作。我愿意趁这个时机，多做完一件事情。所以我就这样草率地将《生人妻》编成了。倘使这草率的工作使得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世弥感到不满，那么还望她原谅我。”

巴金是以这样崇高的感情，在炮火连天、炸弹片横飞的广州，酬答了死者生前对他的友谊。后来他又继续收集罗淑的遗作，为她编成了第二个集子《地上的一角》和第三个集子《鱼儿坳》。

上海沦陷后，许多作家艺术家和新闻界人士大都撤退到广州和武汉。1938年的广州，它的夏天和秋天，始终是在敌人的轰炸之中。巴金、靳以他们来的正是时候。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办事处是在惠新东街上，这条不长不短的

巷子，过路人一听到警报就跑到办事处来避难，因为它在楼下，上面还有二、三层楼面，敌人掷下来的炸弹如果很小，也许还可以让人寄托不致被炸死的幻想。巴金在这里有时坐在写字台前写信看稿改校样，有时和客人进行热情的谈话，有时也放下笔从窗口望出去，看对门的石阶上那个穿黑色衫裤的瘦汉子在干什么……但是警报来了，他只好放下这一切，去等待着头上的敌机投下来的炸弹，究竟去肆扰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场合，去把哪一些人炸伤炸死。接着是我们这一边的高射炮响了，它那震耳的响声与敌人的炸弹声混成一片，然后警报解除了，他跟着人们去附近看被炸的惨状，他看到过一个人躺在一块空地上，血迹满身，肠子露在外面，脸色雪白，眼珠突出，却还在慢慢转动；有一次在警报来时他看见十几个壮丁站在树下说话，十几分钟以后却见那边只剩下几堆血肉……这些目睹的现实，使巴金更燃起仇恨的烈火，满腔的悲愤，但是当时全国人民在抗战初期所显示的敌忾同仇，敢于牺牲，勇于承担的坚毅精神，使他更为感动。他写信给正在上海编《少年读物》的陆蠡说，他在这里“和无数的普通的人一样，过着很平凡的生活。”他说：“这里的居民不爱死，但也不怕死；他们把‘死’看得很平常……一个人死了，别的人仍旧照常工作。一幢房屋毁了，别的房屋里还是有人居住。骑楼下的赤血刚刚洗净，那个地方立刻又印上熙攘的行人的脚迹。一个人倒下，一个人流血，在这里成了自然的事。甚至断头折臂也不是悲惨的命运。倒下去的被人埋葬，活着的更加努力从事工作。”

他看到这里的人们相互之间的界限正在消灭，人们让出自己的住房给老弱妇孺作避难所，人们冒着被压伤的危险在危楼下抢救被炸的同胞。在献金台前，群众的救亡歌声彻夜不绝，献金的队伍也络绎不绝，甚至乞丐也来到献金台前献上自己的“余钱”。敌人的残暴，教育了全体中国人，谁也要千方百计为抗日战争尽一份心，尽一份力。

虽然敌人这样狂轰滥炸，在广州生活十分危险，巴金意识到广州是个炸不垮的城市，他能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工作，他觉得太满意了。因此当7月初，上海急电需要他去修改《爱情三部曲》时，他也只回到上海工作了两个星期，就在当月底又急急赶回广州，并在这次把他的未婚妻陈蕴珍一起带来了。

陈蕴珍笔名“萧珊”，也用“程慧”名字写过作品。她是上海爱国女中的高中毕业生，原是个进步青年，爱好文学，也喜欢动笔，三年前在上海中学为了参加学生运动，曾被反动校长开除，不得不回到家乡宁波迎风桥，在自己家中住上几个月，才再来上海考爱国女中。当时爱国女中在英租界的南阳路上，是个历史悠久的学校，教师很赏识萧珊的才华，也鼓励萧珊看各种课外书。萧珊一接触到巴金作品，就让巴金笔下的人物和故事，以及他那流畅的文字吸引住了。1936年的一个早晨。她情不自禁地提起笔来写了一封信给巴金，诉说她对他作品中人物的同情，并告诉她自己所在家庭、学校的情况，和自己思想的苦闷；同时还给他寄去一张自己的照片。巴金给了她一封回信。以后她就经常去信提各种问题，并谈她对有些事情的看法。巴金像平时对读者复信一样，总是很坦率地讲出自己某些问题的一些意见。这样，就在1936年那个使许多青年人憧憬未来、憧憬革命的年月里，他们的心接近了，也终于见了面。他们俩的第一次会面的地方是新雅饭店。巴金发觉那是有个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的姑娘，既诚恳又热情。而她又终于鼓起勇气，请他到学校去演讲，因为她是班级里的什么长。巴金起初婉谢，因为他深知自己不习惯在许多人面前讲话，更不善于演讲，所以一再推辞，于是陈蕴珍又请

巴金邀约李健吾去学校演讲，并要他努力促其成，巴金没奈何，便邀了李健吾同去。李很会讲话，讲得很生动，果然受到同学们很大欢迎；巴金只讲了几句，而且讲得并不流畅，但是他的作品同学们读得很多，作品中的人物大家很熟悉，他一上台大家就像看见了自己的亲人一样，听了他的话更感到他的心和大家的心连在一起。因此，他的话虽然不多，却仍获得大家热烈的鼓掌，而且经久不歇。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仍还有人记得他当时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四川人”，使人觉得他讲得真实，也很恳切。那天的会由萧珊主持，她非常兴奋，脸上泛起红晕，同学们都感谢她能请到这样一个使人倾倒的作家来给大家见面。学校对作家讲课很感到兴趣，再要萧珊来请巴金，并叫他们的学生会主席陶肃琼一起来请。两人到了福州路436号当时文化生活出版社四楼出版部，巴金就向他们介绍了靳以，靳以拗不过她们的邀请，就到学校去做报告，从此他就与陶肃琼相识。以后，萧珊给巴金写的信更勤，她更关心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了，她对他说：“我很愿意知道你现在的情形，告诉我一些关于你的故事吧。那么我们中间会了解的。”于是巴金就只好选择自己的一天生活经历原原本本地写信告诉她：他怎样冒着炎暑，跑了半天路去出版社上班，又怎样收到一些读者来信，遇见一些朋友，然后又到另一个刊物编辑室去工作，读到一篇怎样的稿，然后怎样接待一个从乡村来的友人，邀请他到咖啡馆听对方讲些什么……巴金把自己一天的故事都向她讲了，然后对她说：“你说：‘你给了我生活的勇气。你给了我战斗的力量。’朋友，你把我过分地看重了。倘使你真的有那勇气，真的有那力量，那么应该说是社会把你磨炼出来的。你这个‘陌生的十几岁的女孩’，倒是你说对了正确的话：‘去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高潮把我鼓舞起来，使我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斗争的路途！在这半年的战斗中，我得着不少的生活知识与宝贵的经验。我抛弃了个人主义的孤立状态，而走向集体的生活当中。我爱群众，我生活在他们中间。是的，我要把个人的幸福建筑在劳苦大众的幸福上。我要把我的生命和青春献给他们。’你看，现在是你给了我勇气使我写出上面那些事情的。那么让我来酬你吧。”巴金和萧珊的友谊，他们相互之间的感情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战争开始后，他们的心更贴近了。巴金比战前更忙，萧珊也临近毕业，但为民族解放斗争而吹起来的号角，使她在忙于应付毕业考试的同时，还跟着同学一起去战地参加救护队，为抢救被炸受伤的同胞而付出自己的劳动。她觉得这样冒着生命的危险，替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出点力是一种幸福。她的这种热情，勇敢的精神，和善良的心情，给巴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现在，她终于高中毕业了，她那亭亭玉立的身材，一双美丽的大眼睛，都显示了一个姑娘对自己未来前途的期望与憧憬，在这个时候她特别希望巴金对她的帮助。她早在一年前就曾隐约地表示过要早些离开学校，离开家庭，到社会中去。当时巴金对她说：“倘使我的推测不错，那么我觉得就应该给你一个警告了。但是你不要误会，不要以为我就赞成现在的教育方法和考试制度；不要以为我就偏爱大家庭。我绝对不会。我只想提醒你，使你把周围的情形看得更清楚一些。我说过孩子的心就像一只羽毛刚刚长成的小鸟。在羽毛还未丰满的时候，一只小鸟是不能远走高飞的。天空固然广阔，但到处躲着凶猛的老鹰，它们具有尖锐的眼睛，和锋利的嘴爪，准备着捕食一只迷途的幼禽……不要把一切的希望都付托给一时热情的冲动，决定一个计划还得靠一副冷静的头脑。”现在一年过去了，战争锻炼了她，又等着她去投奔这个正在飞速前进的时代。而且她已经从中学毕业出



来。她究竟升学还是就业？她究竟在孤岛上，还是到大后方去？这些都要求巴金进行帮助。而且她也确是这样热切地期待着巴金，并多次要求他把她带到他工作着的地方去。

巴金终于满足了她的要求，把她从灯红酒绿的上海租界，带到炮火连天炸弹横飞的广州。

临行前夕，萧珊睁着她那双美丽的眼睛问巴金：

“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做一个战士。”巴金答道：“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他的武器也可能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他并不一定要流仇敌的血，却能更有把握地致敌人以死命。”

到了广州以后，他们住在惠新东街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办事处里，巴金像接待朋友一样安排了萧珊的生活，并暂时让她在出版社里尽义务帮助工作。

广州依然在日夜遭受轰炸之中。那天下午，巴金正准备给上海的陆蠡写信，忽然来了一个客人，巴金就放下笔和他谈话，还不曾谈上几句，却听见有人喊“飞机，飞机，”接着是高射炮的炮声响了起来，门外突然闯进来一些过路人要求躲避，他们进来后都蹲在地上不动，然后天空中有一阵“飒飒”声传过来，随着一个炸弹在远处落地，爆发出一个沉闷的炸声。空气这样紧张，还不曾给人透一口气，又听见一阵“飒飒”响声，接着是“轰”的一声巨响，坐在藤椅上的巴金，只感觉到一股风吹到他的腿上，房子似乎也摇动了一下，知道这次显然是邻近地方被炸了！他定了定神，发觉屋子里还是那么静悄悄，只在桌上多了一层灰，蹲在地上的人都慢慢站起来，和他原来在一起谈话的朋友脸上好像蒙了一张白纸。飞机远去了，警报也解除了，那个朋友离开了屋子。过了一会，巴金却见正在广州办《宇宙风》月刊的林憾庐来看他，说在他住处后面落了三颗炸弹。巴金就跟着他去看灾区。一到那边，发现他们那条街好像经过了一次激烈的巷战，电杆木歪倒，电线落在街心；房屋坍了好几间，不少原来整齐的房屋都变成断垣残壁，和一个没有屋顶的空架子。这天市里共出动了二十多辆卡车，到灾区去装载受伤的平民，送他们进医院急救。一些小孩因伤势沉重，躺在卡车上号哭。据说有人在轰炸时被炸断手臂，自己从地上爬起来拿着那断臂还不断奔跑；一个坐在地上的母亲只剩了半个脸，还抱着她那无头的婴儿……

林憾庐是福建人，巴金在一九三一年前在福建泉州黎明中学访问时与他相识。那天恰好他送他的儿子来上学，就碰上了。当时两人虽谈得不多，但巴金知道他立志改革社会，是个善良、正直的人。后来他的兄弟林语堂从上海移居美国，把自己创办的《宇宙风》委托给他代管，他就放弃了原来教师兼医师的职业，从福建泉州来到上海，从事《宇宙风》编辑工作。他是个基督教徒，又是个忠诚的爱国者。为了争取刊物的自由出版，他把它与祖国民族解放的命运联在一起，随着战线的转移，把宇宙风社迁到广州。他的年龄比巴金大十几岁，巴金把他当作长者，还鼓励萧珊为《宇宙风》写稿。后来萧珊果然在颠沛流离的旅途中，用“程慧”笔名给它写过几篇富有生活气息的散文。

不久，巴金又从广州去了一次武汉。那时武汉正处在大会战前夕，巴金的许多朋友都在那边。武汉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所在地，老舍是长驻

在这个会里的一个主持人。巴金早就想到那边去一次，可是在候车期间，却传来粤汉铁路又让敌人炸断了的消息，在武昌的朋友也劝巴金暂时不要去了，因为道路艰险，一般人是吃不起这个苦的。哪知眼前这样的情景，反而增强了巴金去武汉一次的决心，他要把对萧珊的感情，对朋友们的感情，都融化在对民族解放战争的感情里面。他一定要去看看大会战前夕的武汉，去看看武汉当时作为文化中心的这个城市它的人民怎样生活着，战斗着。

陪同他和萧珊同行的还有一个广东的朋友陈洪有，就是五年前曾陪他去参观过广东新会西江乡村师范的那个热情的教育家。这个朋友对这里的路程比较熟悉。他和他们商量好决定先坐船去清远，再由清远乘汽车到银盏坳，然后搭火车到武汉。那时正是8月底9月初，天气还很炎热，去清远的船很小，乘客很多，虽然开了船，坐在船舱里还是觉得十分闷热，而且他们上船时，所有的帆布椅都让别人占领了，幸而这里的茶房（服务员）还比较客气，向他提出意见后，临时给他们添了三张。当巴金一躺到椅上，就再难“杀出重围”了，因为乘客拥挤，四周被重重包围，这是他们这次赴汉口之行所感觉到的第一个战时印象。一到晚上，沿途上船的人增加，船舱里更闷热了，有人还因此呕吐，感到头痛的人更是不少，不免有人埋怨，也有叹苦经的，忽然听得有人说：“都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否则这路途哪里来这么多人，我们哪会吃这种苦！我们只有同心协力，努力争取胜利，才有以后好的日子呢。”经这么一说，埋怨的声音顷刻没有了。第二天一早到了清远，然后他们租了一只船，冒着雨划过江去，来到汽车站，才知道汽车票卖光了。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陈洪有听旁边有人在谈论包车，就与他们搭讪，承这批人照顾，允许他与巴金、萧珊搭车，虽出高价，但并没有座位，只好坐在自己行李上，一路上摇摇晃晃，来到了银盏坳。这银盏坳，一直是敌人的轰炸目标，车站一眼望去，都是断垣残墙，碎砖片瓦。候车室没有屋顶，只剩一个空架子，里边杳无一人，连售票处也是临时搭的草棚。只有到了晚上，乘客才汇集拢来，空地即刻变为卖零食的市场，米粉担，饭铺，粥摊，样样有。人们像饿狼似的在这里等车挤车，并在摊头买东西吃。火车为了躲避轰炸，白天无法开；每晚总要过了12点，才姗姗来迟。火车来过后，乘客上去了，摊贩也散了，天一亮这里又变成一片空无一人的荒墟。谁也料不到天亮以前，这里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此刻正是晚上待车的时刻，人声嘈杂，各种场面都有。巴金在这里看见许多人正在为修复铁路，在路轨上调换枕木，铁锤敲着钉子，发出 的声音。而另一批工人则正在用葵叶为候车室盖屋顶，他们有的人爬在屋上面操作，有的人正把葵叶从地面向上传递上来。他们点着煤油灯，毫不迟疑地劳动着。巴金想：敌机明天完全可能又把那铁轨炸断，把那房屋炸毁，但是我们仍会在行车前把铁轨修复，把房屋盖成。敌人能炸毁建筑物，却不能炸毁我们的工作精神。这正是我们抗战必然胜利的保证。

但是那晚许多人等车，等到深夜1点钟还不见火车驶来，却传来电话说今晚南下的车没有了，明晚才有可能有一班慢车。可是几个钟头以后，敌机又会来轰炸，像现在这样一大群人聚集在这里，那将会导致怎样的可怕的后果。这时车站站长也感到问题严重，便从清远叫了七辆大卡车来，重又把所有的候车乘客送回到清远去。巴金、萧珊和陈洪有都被挤散在一辆车子里，里面没有灯，四周漆黑一片，而且闷热不堪，行李也被分散在四处，只有萧珊总算找到一个座位，是坐在别人的行李箱上。巴金和陈洪有只好站着，回

到清远汽车站已经深夜2点多钟了，然后再雇船到了对岸，找到一个住处已经3点多钟，实在太疲倦了，大家一睡就睡到吃午饭的时候。到了下午5点多钟，又按照原来路线千辛万苦来到银盏坳车站，仅仅一天不到的时间，银盏坳又变了样；它又被轰炸过了！昨天巴金散步过的地方被炸出了个大窟窿，人只好绕着道走路，汽车到这里只好停下来，不能像昨天那样把人和行李直接送到火车站了。这次他们总算买到了三张车票，但是月台上的三节客车车厢已挤满人和行李，连门都关不上。他们三人只好和一个铁路职工一起乘在一节没有窗口的货车车厢里。那职工对铁路沿线情况很熟悉，向大家讲了许多眼前交通线上的实情。过了一会，一个查票员上车来，谈到敌机在广州的一次轰炸中，人们所遭受的损失，他的脸上流露出愤怒之情，巴金就把陈洪有送给他的那本《日寇暴行实录》借给他看。他拿去仔细看了一会，然后把书还给巴金，只见他两眼噙着泪光，说：“多谢了，这仇恨我们是会永远记住的！”巴金从这些铁路职工的脸上看到他们共同的感情，战争把人们的心都贴在一起车子快要开的时候，又上来一些人，而且搬上来一袋袋邮包，巴金这才知道他们乘的车厢原来是邮车。邮包堆得半个车厢都满了。车开后，车头上的烟灰就像雨点似的落到大家头上，巴金的左眼被揉进了灰粒，好不容易才把它弄掉。天亮后，睁开眼才发现自己穿的白色西装全都变成黑色，抬头看看别人，只见他们的脸上也都蒙上一层灰尘。过了一会，到了英德，才有机会在车站上洗脸，吃饭，喝冷茶。这里没有警报，也没有遭到过轰炸，月台上人来人往，一片和平景象，使人几乎忘掉这几天又紧张又艰难的战时旅程。过了英德以后，在中途曾因为火车头出事而滞留了几个钟头，此后的路程便比较顺利，但因为慢车，靠的站头很多，而且每个站头停留的时间都比较久，所以还是使人感到很疲劳。最后终于到了乐昌。找了个小旅馆休息了一下，准备第二天换乘“广武通车”，可以有较好的条件，乘上卧铺，直接到武昌去。

那天一早起身，三人就带着行李到乐昌车站去，途中遇到许多熟人，都是在清远和银盏坳候车时相识的，现在他们也跟着在这里换车去武昌了。三人买的是二等票，有卧铺，看来也许可以不像前两天那样心慌意乱地抢车了。车开后还未到砵石，火车却因躲警报，钻到一个山洞里停住不开了，洞内一股煤气味，使人感到很不舒服，却也无可奈何。警报解除后，火车出了山洞，才使人感到眼明气清。过了几个钟头，终于到了衡阳，但已是晚上，巴金很想下去看看这个据说是未来的战时中心城市，却被列车员劝住，因为他怕客人下车，座位被军人占领，到那时就有理也不易说清了。第二天晌午，快到长沙的时候，火车才终于停住，这次是列车员劝说大家下来，原因是有了空袭警报。于是乘客纷纷下车，各人拣各人认为合适的地方跑去，连列车上的铁路职工也把车厢里的门上了锁，下车来躲炸弹。这时陈洪有就领着巴金、萧珊进树林里去，因为他知道树林后面有座瓦房，可以在那边歇脚。巴金和萧珊随着洪有走了一段路，果然看到那户人家的主人出来迎接，把他们三人引到自己的客堂里，叫他一个小女儿出来端茶倒水，十分客气。据主人说他原是上海商务印刷厂工人，这次是请假回乡来探亲，幸而此地离长沙还有三十里路，否则也可能被作为轰炸的目标。他说长沙最近几乎天天被炸，人口却并不曾减少。说话间，忽然听到空中有飞机声音传过来。接着，地面上的高射炮声音也响了起来。估计长沙又被炸了！主人叹息着，陈洪有却愤激地冲出门外去看天空，然后回来高兴地告诉大家：“我看到的，有一架中国飞

机去追击了！”不久，空袭警报解除，他们与那瓦房主人道了别，随着别的乘客从四面八方跑了回来，重新上车，互相叙述一个钟头里各人看到的景象。直到下午3时许，才到达长沙站。只见月台上一阵动乱，一群候车的乘客纷纷拥上车来，把车厢塞得满满的。巴金从窗口望出去，看到一座高楼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听人说这本是长沙著名的六国饭店，最近被敌机炸毁，当时有两对青年男女正在这里举行婚礼。炸弹投下来后，一对新婚夫妇男的死了，另一对则死了新娘。情景十分悲惨。这些旅途中的所见所闻，巴金都一一把它们记在自己心里，以致半个世纪以后回想起来还好像历历在目。

隔一日，列车终于安全地到达了武昌。在蛇山上巴金看到了战壕，马路上有人成群结队地在唱保卫大武汉的歌曲。然后他们三人又到轮埠搭船往汉口去。在汉口，巴金住了半个多月，会见了很多老朋友，他们在这里都工作得很好，许多人精神振奋，相信抗战一定能够胜利。这些朋友的心态，与汉口马路上的景象是完全一致的，在这里马路上不少地方都扎起了铁丝网，有些界区还装上了铁门，江边也沿着江堤筑起了工事，战时戒备的气氛是这样浓厚，但是人们却很镇定，看不出有些什么恐慌的情绪。朋友们一到晚上就络绎不绝地来到旋宫饭店看巴金。这里有胡愈之，也有王鲁彦……他们好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计划，中心就是保卫大武汉。巴金在这里一点也不感觉到寂寞，他在这里好像到了自己的家，因为他在这里朋友太多了，这些朋友在这几天好像也把巴金的住处当作自己会亲聚朋的场所。巴金曾经写信给上海朋友，说他在汉口半个月中自己的生活：“我没有一刻不是和三个以上的朋友在一起。在睡觉的时候这个房间里也有五六个人。一张不够长的长沙发使我的颈项睡得麻木了。但是五六小时的睡眠并不曾使我们中间任何人感到疲乏。在这里我们过的是兴奋的日子。”

患难中，到处都有知心的朋友。那个时期，确实使人难忘啊！

### 第三节颠沛流离的日子

巴金和萧珊从汉口回到广州，已是1938年9月底。到了10月初，整个战局形势已有很大变化。当时日军已开始进攻广东。它们从大亚湾登陆后，由于中国军队事先没有作很好的准备，日军入侵几乎是长驱直入。可是广州市人民不了解真相，还是斗志昂扬，在10月10日“国庆节”晚上举行的火炬游行，八万名壮丁从河南宣誓以后，列队向汉民路进行，经过海珠桥，一路上火炬在黑暗中闪动，不但参加游行的壮丁精神抖擞，连夹道观礼的群众也都信心百倍，非常感动，认为广州至少还可以坚守几个月。

那个晚上，巴金也在哥伦布咖啡店二楼，和几个朋友一起，看了游行队伍在店门前通过。当时广州为了战时节电，晚上在9点钟以前都没有电灯。咖啡店里只有黝暗的烛光。游行队伍远去了，他从咖啡店里出来，从惠福东路到惠福西路，路上一片漆黑，两旁浓密的树林更把夜装饰得更加神秘。可是他的心却仍为刚才看到的火炬队伍而激动，他感到自己的心也像熊熊的火炬那样在燃烧。此刻虽然游行队伍过去了，而保卫大广东的歌声仍在他的耳边响着，他想，虽然广州现在处在敌人包围之中，但人们团结一致的力量是无穷的，抗战终必胜利。刚才在咖啡店里看到的情景已与过去不同。他去汉口以前，咖啡店总有不少浓妆艳抹的妇女，现在却很少见到或者说已完全没有了，眼前大都是穿军装的青年，有些本来不是军人现在也穿起军装来，甚至有的从事艺术教育工作的教授也全副武装，准备参加保卫广州。他回到家里已经10点钟了，这时电厂已经发电，他可以扭亮电灯工作了，他把案头上放着的稿子校样读了一遍，想着一个星期以前他编好的《烽火》与《文丛》两个刊物的稿件，至今还搁在印刷局里，不曾印出来。心里有点遗憾，原因是印刷工人已有一部分撤退，书店也在开始迁移，不知今后日常工作怎样维持下去？继而一想，这些还是小事，值得忧虑的是在这个城市还有几十万人民，似乎目前战局对他们毫无影响，因此他们照常上班，也不想作什么应变准备，更不考虑逃难。有的人还正在打算参加巷战，与入侵之敌进行肉搏战。这些现象又应该怎么看法呢？他有点迷茫。

隔了几天，他接到《救亡日报》总编辑夏衍给他一封信，向他详细地陈述了目前战局的真情。《救亡日报》在八·一三沪战开始时创刊，同年11月中国军队西撤后迁到广州长寿路（即现在的曙光路）办公，1938年1月复刊。报刊每晚请当地的《国华报》印刷厂代为排印。5月，广州市内遭遇到一场大轰炸，几千人被炸死，国民党派驻在报社的汪馥泉逃往香港不再回穗，另一人张镰因贪污案也离开报社，这样报社内就都是“自己人”了。这里除了夏衍，还有林林、姚潜修、叶文津、郁风、彭启一、周钢鸣、华嘉等。欧阳山、草明、司马文森、黄新波、高灏、高汾也给他们当过记者，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但也因为这样，国民党政府对他们封锁消息，使他们不大容易迅速摸清战局真情，不过比一般老百姓还是知道得多些。在10月10日晚上火炬游行“庆祝大捷”以后，当地的党政机关实际上已开始每晚悄悄地撤退，那些做官的家眷则早在日军登陆前就逃往香港。看来当局已早下决心放弃广州。夏衍这时便写信告诉巴金，叫他作好准备。

巴金读了夏衍的信，很感谢夏衍在这样的时刻给予他这样真诚的友谊，使他多知道一点当前战局的真情。那天他帮萧珊去银行汇款，在交通银行门口看到“警报期间，停止营业”的布告，跑到上海银行门前，也贴着一张布

告，写得更干脆，说他们已迁香港营业。他联想到电报局、邮局及各种公用事业机关办事的人越来越少，知道广州一定要被放弃。到了10月19日傍晚，但听见警察正挨家挨户通知，说“敌机明天要来大轰炸，请趁早离开市区。”这时市区内一些平民正在慌乱中携箱倒篋，整理行装，听到警察前来告急，更急急忙忙奔往穷乡僻野去。警察则在这些仓惶出逃的人们背后，捡拾他们来不及拿走的东西。尽管报纸天天报道战事节节胜利的消息，但敌人早已越过博罗进犯增城，甚至增城早已失守，而报纸还在宣扬“前线大捷”。当地十几家报社已有七八家迁走或者干脆停刊了，只有《救亡日报》和少数几家报纸还在按日出版，准备与这个城市共存亡。

巴金的行李原留在香港，不曾带到广州来，本来想过了10月，再去香港取回。看来现在已去不了香港。而他又很不愿意与广州告别，他爱这个城市，他想象不出明天的广州将有一个怎样可怕的结局。夜深了，大概是午夜两点多钟，他还站在自己住的四层楼的阳台上，面对夜空，从黑影中他还能分辨出前面的建筑物是大新公司，是新亚酒店，是爱群大厦……现在都沉睡着。难道一到明天，这些高大的建筑，都要让敌人的炮火摧毁吗？他知道在这个城市中，有不少人已经离开。有些热闹的街道已经荒凉起来，但是来不及走的人还是很多，今晚不可能有更多的交通工具把他们送走，那么剩下来的人怎么办？他们为他们担心，也为这些人感到忧虑，同时他又对当局早些时候所表示过的准备牺牲的“悲壮剧”没有演出而感到不满。他想他们比老百姓还逃得早，逃得快，这是多么可耻！在自己的印象中一向认为炸不断的海珠桥和血染不红的珠江，明天海珠桥真还能继续把珠江两岸连在一起吗？珠江它真能不染一滴血吗？他心忧这个城市的前途，也心忧住在这个可爱城市里的人民。只是没有想到他自己。他相信自己是能够安排自己命运的。

10月20日早晨5点钟警报就响起来了，接着就是高射炮在附近高楼上向空中发射。显然，敌机就在人们的头上。炮声像巨人怒吼，震耳欲聋，但大家听惯了，也并不觉得怎样可怕。不久，在报社工作的青年记者叶广良来了，他请巴金赶快撤退，叫他赶紧准备好行李，并告诉他到码头上船的时间。于是巴金把这个消息去转告萧珊、李采臣和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弟弟张宗和。张宗和是为了看他的女朋友来广州的，临时走不了，只好找上巴金。大家把行李整理好，便根据约定时间来到了岸边，并与林憾庐父子及《宇宙风》社三个职员一起集合，等着叶广良来到。这时已经5点半了，街上连卖菜人都没有，人力车也销声匿迹，只有码头上人多而乱。太阳一早就露面，使人感到又是个燥热的天气。大家正焦躁地等候着，忽见叶广良跑来，露出一一种怅憾的惜别之情，对巴金说：“就这样要走了！”巴金问他是否一起走，他说：“我要留下来的。等着城里筑起工事，我就下乡去打游击。”原来他已与他的哥哥约定，日军一进城，他就回到家乡石龙，与他哥哥一起去参加游击队。但他不相信明天日军就会进城，他认为他在这里至少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此刻他好不容易帮巴金、林憾庐一行十个人雇到一只小艇，准备摆渡到停在江心的一艘大木船上去。临行，准备留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办事处的陈雅卓在岸上为他们送行，他是广东新会人，这时他不停地向大家招手，巴金把头伸出舱口外，对他大声地喊道：“你要小心啊，该走时就走啊！”巴金知道这个人一旦回到家乡，那就会有朋友邀请他去参加抗敌工作。船终于慢慢离岸，连岸上的树木、沙袋也渐渐不见了，最后终于整个广州市都在他们的面前消失。

大概花费了将近一个星期的时间，木船从水路经过了容奇、禄步、都城等地，到达了广西梧州。由于在船上生活了几天，一上陆地就感觉到特别的轻松愉快，那天他们一清早就在梧州街上散步，却意想不到在一个机关的大门前看到一张通告，这才知道广州在他们离开的第二天即10月21日，就被日军占领了！

不久，巴金接到留守在书店里的陈雅卓来信，更知道了广州沦陷时的一些实情。陈雅卓在信中说，21日早晨，他先在公园附近听到隆隆炮声，然后又听到密集的枪声自远而近，一到街上，只见逃难的人群，像潮水涌来，连军警人员也杂在老百姓队伍里，和大家一起飞奔，当时浓烟黑雾满街，但闻呼儿喊娘之声，哀声遍地。沿路市民都埋怨当局为何不在路边上挂个箭号指出逃难的路线方向。而敌机为掩护敌军入侵，连续投弹，不到半点钟就把海珠桥炸断了。消防队员则弃消防车而逃。虽有大火，却无人扑救。渡河时则因人群拥挤，老弱妇孺纷纷落水。一个妇女背负着一个孩子，双双跌入河中，孩子淹死，那妇女爬到浅水里，望着孩子尸体哀哭，却没人去理她……

巴金没有想到当时全国人民期望的“保卫大广东”，却原来是这样的一出悲剧！他意识到自己对现实想得太简单了！

他们一行10人，在梧州住了几天，等候机会买去柳州的船票，以便转道赴桂林。当时巴金在梧州日报社门口看到人头攒动，人们正在争阅战地快讯，他走过去一看，却在《梧州日报》读到武汉撤退的消息，不觉心情黯然。但是当他在南华酒店门前看到一大群男女青年在热情地高唱救亡歌曲，并作誓死保卫广西的演讲时，他又感觉到自己并不孤独，他觉得人民的心总贴在一起，抗战是一定会胜利的，不管战局如何逆转，政府如何腐败，中华民族决不会屈服，最后的笑声总属于我们，而不属于敌人。几天后，他们买到了票，乘一艘去石龙赴柳州的拖渡船，终于到了柳州。柳州和梧州不同，它还没有受到轰炸，所以景象竟是十分平静，市面也很好，有一些可以安静谈心的地方。他们在新柳江饭店二楼吃茶，虽人声嘈杂，却有屋外柳树丛中悦耳的鸟鸣声传到室内来，使人顿时忘却战时旅途的疲劳与烦躁。午后，巴金又和林憾庐一起去中山公园，在茶棚里饮茶，树荫挡住了灼热的日光，周围花木飘香，环境非常幽静。两人谈起这半个月共同的所见所闻，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抗战初期所不曾有过的黑暗现实，如有些城市不战而退，有些地区不少人发国难财，给这两个善良的人心头都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他们结论是一致的：人心不可侮，光明总在前头。他们从来不曾失去过对未来的信心。晚上，林憾庐父子还约巴金、萧珊和李采臣等到广东酒楼吃饭。这家酒楼是沿江建筑，很有特色。他们凭着窗栏远眺江景，但见月光皎洁，江波晶莹闪烁；一艘艘渡船，在水上飘落，露出灯光点点，衬上山影一片，使人感到这样的景色仿佛只有画家笔下才有。当时林憾庐饮了一点酒，微笑着，比往常显得更加温和，他虽然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他更乐于与非宗教徒为友，是个抗日战争的热烈拥护者。他与巴金各人办一个刊物，各人支持一个出版社，又同样从“孤岛”上海奔向战火笼罩下的内地。他编的《宇宙风》，质量不算很高，但他从他兄弟林语堂手里接受这份事业下来后，始终认真严肃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它效劳，他从不责怪他兄弟向他摆的洋派架子，相反，他遇事总先看看自己的缺点和弱点，他的心比今夜月色还要纯净明亮。巴金把他作为知己，因为自从抗战开始后他经常和他来往，他觉得他是很能了解人的，也很能帮助人的。巴金记得上海刚沦陷时，他在租界听到一些传说，也接到

几次朋友们警告的电话，他把那些话打电话告诉林憾庐，而林在电话中则发出爽朗的笑声，他的乐观与镇定增强了巴金的勇气。巴金对林语堂印象并不太好，但他觉得林憾庐确是个善良的人。他给的友谊，使巴金感到温暖，觉得自己并不孤独。今晚，在这样一个富有诗意的夜里，他又听了他谈的关于抗战现状的看法，他再一次感到在这个人身上富有光彩，因为他心地坦率。理想高尚，而且忠诚而又热情地爱着我们共同的祖国。

他们到了桂林，住的地方在漓江东岸福隆街，也就是林憾庐的寄寓。憾庐对巴金很尊重，他把他的住处安排得很好，使他住在这里不像一个客人，巴金很欢喜他这个“家”。小小的板房，纸糊的窗户，长满青苔的天井，一片绿色的菜园，真太使人满意了！而且望过去，对面不远就是七星岩，是个天然防空洞，一听到警报，就可以跑过去。可惜到七星岩来躲警报的人太多了，进去后常使人感到胸闷，而且警报一解除，大家抢着奔出来，每每使洞口阻塞。所以有时听到警报，巴金还是上月牙山去。但月牙山后来被县政府当作办公的地方，不许闲人进出，这样就只好到七星岩去了。

这时桂林已成为全国有名的“文化城”。许多文化人因武汉、广州的沦陷都迁到这里，巴金的挚友王鲁彦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位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很有成就的作家，在泉州黎明中学时就与巴金结识，但是不论在福建，还是上海，或者在汉口，巴金都不曾见到他有非常爽快的笑容，他总是愁眉苦脸，看得出生活担子把他压得透不过气来。现在到了桂林，巴金发觉他身体比以前更差，但是鲁彦的脾气还是十分倔强，对现实不肯屈服。巴金在桂林碰到的还有一个老朋友，这就是丽尼，他也是巴金在福建泉州认识的一个散文家。1933年12月，巴金曾带着他的处女作到北平，推荐给靳以在《文学季刊》上发表，后来又把另一组散文介绍给黄源，发表在上海出版的《文学》月刊里。他的第一本散文集《黄昏之献》，和第二本散文集《鹰之歌》，以及以后的《白夜》，都是由巴金经手编发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丛刊》里的。这些作品实际是中国文坛散文诗的先驱之一，可惜这位十分有成就的作家，他早在青年时代就命运多乖。为了生活，他曾进一家机关工作，没人向他约稿，他写了稿也不知寄给谁去。这次他随机路过桂林，住在旅馆里，出来闲逛，却出于意料遇到了巴金，巴金为《文丛》向他约稿，第二天早晨他就到福隆街来看巴金，把一篇散文交给他，还说还有几篇文章准备校改后交给巴金，另外还翻译了契诃夫的几部剧本，都藏在他的行李里，打算过一些时候交来。巴金听了很高兴，与他谈得正起劲，外面却响起了警报，两人就从后面出去到月牙山上躲避。哪知一上山就看到敌机向城里投弹，看方向估计有可能就投在丽尼所住的旅馆所在地区。警报一解除，两人急急下山，丽尼来不及与巴金道别，就匆匆忙忙地奔回去。巴金回到住处，不放心丽尼的安全，想进城去看他，不料街道已经给封锁，无法过去。等到第二天下午，街上秩序恢复了，就去旅馆找丽尼，哪知面前只有一大堆瓦砾，黑烟还在弥漫，在烟雾中只见丽尼和几个老人、中年人在一起翻砖瓦，他看见巴金，苦笑了一下，说：“烧光了！”巴金难过地问他：“那怎么办呢？”他还是笑笑：“机关迁移，来这里原是过路，今天就准备走了！”巴金又问：“那么，稿子呢？”丽尼还是笑：“反正现在没用，也没有人要，烧了也就算了！”巴金听了，心里好像被刀割了一下难受，也仿佛被迎头浇了一瓢冷水，就对丽尼说：“你别这样说，你再写吧，写了寄给我，我们要的。”那天丽尼果然离开了桂林，后来他也果然又重译了契诃夫的剧本，但再没有读



到他那富有诗意又有爱国激情的美丽的散文了！

由于“大后方”重庆国民党控制思想文化太严，人们受不了，从重庆来桂林的人也不少。而广西是与蒋介石有矛盾的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桂系集团”所统治的地方，而且还有李济深、黄绍竑的影响。在抗战初期，周恩来还亲自向白崇禧做过工作，所以在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桂林“气氛”确是比别的地方好一些。不仅国民党各派系都要在这里建立据点，就是坚持要与中共合作的各种进步组织也多在这里活动。夏衍的《救亡日报》在广州坚持出版到10月21日日军入侵那一天，工作人员才从敌人密集的炮火下全部撤退。他们选择了桂林这个文化城复刊，原因也就在当时桂林确比较“宽松”一些。这里有个组织叫“广西建设研究会”，由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挂名担任正副会长，实际负责人是广西文化界元老李任仁，委员中包括了李四光、胡愈之、欧阳予倩、张东荪、张志让、夏衍、姜君辰、千家驹、范长江等。李任仁还是广西临时参议会会议长。巴金到桂林半个月以后，恰逢他们设宴招待来桂林的文化界著名人士，也就和胡愈之、陶行知等一起被邀出席，此外当时被认为日本的反战进步作家鹿地亘夫妇，也参加了。隔了两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成立，参加的多是从广州、汉口等地撤退到桂林的文艺工作者，地点在当时著名的集会场所倚虹楼。巴金与夏衍都被选为分会理事。当时或稍迟来到桂林的，还有茅盾、田汉、洪深、欧阳予倩、丰子恺、胡风、周立波、邵荃麟、杨朔、骆宾基、端木蕻良、方敬、叶浅予、关山月等人。报刊除了《救亡日报》，还有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聂绀弩等主编的《野草》，文化生活出版社也设立了桂林办事处，续印了两期《文丛》，那是在广州撤退时就打好了纸型的，巴金一到桂林，就各给它们加写了一篇卷头语，他说：“本期《文丛》付排的时候，编者（指靳以）已经‘入川’了……我带着《文丛》的纸型走过不少的地方。在敌人接连不断的轰炸下它居然不曾遗失或者损坏，这倒是意外的。现在我还能够在桂林将它浇成铅版，印成书，送到读者的手里，在我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我当然高兴。这本小小刊物的印成，虽然对抗战的伟业并无什么贡献，但是它也可以作为对敌人暴力的一个答复：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他又说：“这本刊物是在敌机接连的狂炸中编排、制型、印刷的……我压下愤怒的火几次走过灾区。我看见那些残破的房屋，看见头发和衣服还粘在地上的带血的人皮……这景象我一生也不会忘记……我在这个城市里经历过它最惨痛最艰苦的时刻，我应该借着这本小小刊物把这个城市的呼声传达给散处在全国的读者诸君。”此外，当时文化生活出版社还出版了巴金的《旅途通讯》。林憾庐也在这里筹备了《宇宙风》的复刊工作。此外，那时艾青在编《广西日报》副刊，王西彦在编《力报》副刊。

巴金在这个时候，除了写些散文，他还继续写他从1938年5月就开始的《火》的长篇创作。这部小说的第一部他在广州只写了第一章，在桂林他也写了几章，但没有完成；直到1940年9月在昆明才把它写完。《火》的第一部是以青年妇女冯文淑为主角，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八·一三上海战争开始以后到上海成为孤岛。小说中冯文淑参加青年救亡团和到伤兵医院做护士，实际上都是萧珊的事情。萧珊曾以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过一篇通讯，题目叫《在伤兵医院中》，交给茅盾发表在《烽火》周刊上，用的是“慧珠”笔名。巴金听过萧珊讲过这些事情，看了这篇通讯，他就根据这些材料写了《火》的第一部第二章。他写这部小说，前后时间较长，不像过去写别的长篇那样

一气呵成，而是断断续续地，或忽断忽续地写它的。这当然是由于战时生活不安定，但也与他对这方面生活不大熟悉有关。但那时桂林遭受敌机轰炸，一次比一次厉害，那是巴金目睹的，桂林市区的建筑原本十分完整，后来开始大轰炸，他亲眼看到这个城市房屋一次又一次被毁，后来几乎有一半以上的建筑变成废墟，以至到处是断垣残壁。他曾多次站在月牙山上，看到敌人投下燃烧弹，房屋怎样着火，市区怎样成为人海，建筑怎样变成焦炭，生命怎样受到毁灭。就在1938年的最后两天，他看到这个美丽的城市，被一大片火光笼罩着，天空迷漫着黑雾……每次警报解除，他都要到受灾的地区看看，他觉得敌人的暴行，可以增强对法西斯的认识。每一次从东岸跨过浮桥，由水东门进城，他都带着无限的仇恨去看同胞的受难，亲人的被害。但是由于当时抢救清理工作做得比较及时，他来到时往往被害者的尸体已经被车走了。有一次，在远处却看到一个人倒在了一辆汽车残骸边，奔过去一看，却不是人，而是一个死人留下的印痕。尸体早给搬走了，留下来一些皮和血肉、头发粘在地上，烧剩的碎衣残布零落地散在旁边。据说那是个汽车修理工人，警报来时他来不及躲避，炸弹把房屋、汽车炸毁，也将这个正在汽车边工作的同胞烧死了。也就在这一天下午，十八架敌机在空中盘旋了一下，投下了一批炸弹，又炸死了许多人。当时在桂林的一个全国著名音乐家张曙，因躲避不及，就是在文昌门大火中牺牲的。这个年轻的文艺工作者，巴金在一个月前还在一个座谈会上见到过他，而现在就如此突然地离开了大家。他的死，给桂林文艺界带来了更大的仇恨。

巴金经常在这样的灾难中经受感情的折磨，他有不少熟人在这场灾害中遭受到各种各样的损失，有的毁坏了住屋，有的失去了亲友，有的甚至捐献了自己的生命。有一次巴金还到桂西路去找过一家书店，哪知到达后只见到平地一片。他记起在这个书店里的三个和蔼可亲的店员，抬起头却只有细雨濛濛，举目四顾，竟然空无一人。不少热闹的马路，变成冷僻的荒郊；多少和睦幸福的家庭，一刹那之间只剩下孤儿寡妇，站在废墟上响着哀哀的哭声。

“什么时候才是我们复仇的日子呢？什么时候轮到我们的飞机升到天空，把那些刽子手打下来呢？”

巴金相信这样的时刻总有一天要到来。

#### 第四节“孤岛”一年

1939年的“孤岛”上海，新闻出版事业出人意料地繁荣：由鲁迅夫人许广平亲自筹划的不朽巨制《鲁迅全集》编成付梓，美国进步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广泛流传，以洋商名义发行的《译报》、《译报周刊》、《文汇报》、《导报》、《大美报》等抗日报刊纷纷出现，象征着中共地下组织与上海群众紧密联系的大型报告文学集《上海一日》公开出版，……

上海租界虽在敌伪势力包围之下，人民群众身处逆境，仍敌忾同仇，矢志不屈，勇于斗争。尽管敌人用暗杀、掷手榴弹、写恐吓信、甚至以注射毒汁的水果“馈赠”，来对付抗日爱国的大学校长、法院院长、报刊编辑记者、作家艺术家以及各条战线的知识分子，抗日的声音并未在出版物中消失，相反，报纸、期刊、舞台、讲坛上表现中国人民在敌伪势力面前毫不动摇的抗战意志的作品，言论，更加如火如荼。

这时，巴金与萧珊暂时回到上海。他们在这一年初春离开桂林，当时桂林经过四次大轰炸，市区有一半变成废墟，许多工作陷于停顿，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办事处也受到影响，一时无法开展业务。他们经金华、温州到沪后，就首先为萧珊到昆明考大学作了一些准备。巴金又回到霞飞路霞飞坊59号与索非同住的一幢房子里，并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担负起一部分编辑工作。当时文化生活出版社已迁到巨籁达路（即今巨鹿路），与霞飞坊离得不远，可惜的是陆蠡主编的《少年读物》已经停刊，陆蠡已回乡去，巴金曾按时写过《旅途通讯》给这个刊物发表。现在他把已完成了的本书各篇交给雨田主持的《少年读物丛刊》出版。但巴金与朱洗仍写信给陆蠡，希望他回上海来继续负责文化生活社一部分工作。巴金还为艾芜编了一本叫《逃荒》的短篇小说集，因为在桂林时艾芜曾和他谈起这件事，所以他把这本书编好后，还替它写了一篇“后记”，他说：“在这时候我们需要读自己人写的东西，不仅因为那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而且因为那里面闪耀着我们的灵魂，贯串着我们的爱憎。不管是一鳞一爪，不管是新与旧，读着这样的文章会使我们永远做一个中国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还替另外两位作家毕矣午、屈曲夫各编了一本短篇小说集。他在给屈曲夫的《三月天》写的编后记中说：“前年作者去北方时，我们一起在朋友家里吃了一顿晚饭，以后我便没有机会再见到他，也得不到他的消息……朋友却担心着屈曲夫的安全。我没有朋友的那种想法。有的人忙于工作，有的人没有固定的歇脚的地方。一切都在动，我们常常追赶不上。我们想念朋友，得不到音讯，朋友们也难知道我们的行止，彼此打听消息……但是有一天无意间两个朋友在一个新地方遇到了……这是多么快乐的时刻！”巴金对现实总是这样乐观，对朋友总是这样期望，认为他们总会永远愉快又健康地活着。但是，他哪里知道当他重见屈曲夫时，已在全国解放以后。那时屈曲夫已担任《解放军文艺》的编辑职务，而且大家都已进入中老年了！

巴金从文化生活出版社同事中，了解到当时还有不少熟人在上海，比他年长的有郑振铎、许广平、周建人、郭绍虞、方光焘、夏丐尊、王统照、周予同、魏金枝、王任叔、赵景深，和他年龄相仿或比他年轻几岁的有梅益、于伶、李健吾、唐弢、柯灵、师陀、肖岱、林淡秋、陈西禾、钱钟书、傅雷等，他和这些作家大都是认识的，他们都在抗日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且有不少人是他的朋友，但在这个时期，他和他们交往还是不多，他把极大

部分时间花在埋头写作上，主要是写成了《激流》三部曲的第三部《秋》，也就是在他一生创作中写得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但那是在这年10月才开始写的。在此之前，他也写过一些短文，如曾发表在柯灵主编的《文汇报·世纪风》上的《八月十六夜在广州》和《桂林的微雨》，都是反映在敌机疯狂轰炸下人民的艰难困苦生活，和坚强不屈的斗争意志的。他还针对当时现实写过一些杂感，这些杂感数量不多，却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已不再停留在单纯的对抗战事业的歌颂上。时代呼唤他作更深入的战斗。在《宇宙风》上他发表了一篇杂文《公式主义者》，说“公式主义者……的特长是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也就是不相信自己叫人相信的话。他们常常用自己的行动来推翻自己的主张。所以，最先从武汉撤退的便是高叫保卫大武汉叫得最响的人，正如上海沦陷后仓皇地逃走的人就是那些慷慨激昂高唱上海必守论的民众领袖。他们写出来的是一般人承认的公式，他们所悬念的却是自己切身的利益……从这里我们便明白：笼统地说一句‘抗战第一’，其实等于白说，因为意义太含糊了。我们应该叫出的口号是‘抗战与改革’！这两者是应该同时进行的……倘使叫一些人流血，而让另一些人得利，像目前这样地一些人为抗战牺牲生命，在抗战中受苦，而别一些人却借抗战发了财，则最后胜利不属于‘我’，都有问题了。”这篇文章观点鲜明，坚持抗日爱国，并反对国民党统治下一部分人借抗战发国难财。它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喊出了劳苦大众的共同要求。但是汪精卫卖国贼在香港办的报纸《南华日报》却以为有机可乘，竟把这篇《公式主义者》转载。巴金知道后立即在香港《大公报》和上海《文汇报》柯灵主编的《世纪风》上发表启事，声明“我的论据决非卖国求荣的汉奸所能利用，我的口号是‘抗战与改革’，决不是‘和平’。在这时候谈和平，无异乎任人宰割。”在对某一些文艺问题的看法上，巴金也作了不妥协的斗争，即使是熟人，在真理面前，他也并不让步。他有个比他年轻几岁的朋友，受人约请，与许多人一起抢译美国作家赛珍珠的《爱国者》，为了做广告，把小说内容吹了一遍之后，甚至说巴金也支持他译这本小说。巴金知道了，立刻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1939年7月的《鲁迅风》上，他愤激地说，“《爱国者》是一本虚伪的书……这书里没有一个真实的中国人……这书里到处都是对我们这次抗战的有意或无意的误解……比如关于八路军虐待俘虏的描写就完全与事实不符。”因此，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爱国者》的翻译者便不能不愤怒地叫出：我控诉！”那个朋友，后来当然还是朋友，因为他把巴金认作诤友，终于接受了巴金的劝导，把这本书放弃，再也不让它重版了。

在巴金从桂林回沪后不久，阔别已久的三哥尧林从天津来了，他是巴金写信把他请来的。因为尧林身体不好，而且在他个人的生活际遇上也不很顺利，同时长期在敌伪统治下的北方教书，心境也不舒畅。巴金早在去年经过香港时便曾写信给他，要他到南方来，他当时回说再在天津当一年教员然后来，现在他听说巴金在上海，就改变了主意，决定接受巴金建议，来沪找工作。那天巴金正在楼上写稿，听到大门外有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叫他的名字，他惊喜地从楼上窗口望出去，啊，是尧林，是三哥，他的脸又黑又瘦，几乎不认识了！那一定是旅途艰难，把他害苦了！巴金立刻跑下楼去，三哥却已从楼下跑上来了！两人见了，都双眼噙着晶莹的泪珠，几乎要拥抱起来，最后则是互相拉着手臂，却一时什么话都讲不出来，只相互问着好。这一年三哥已经36岁，还没有结婚，而且好像连对象也不曾有。巴金记得这几年来，

他只去过三次天津看三哥。三哥在南开中学工作了十年，一直住在学校简陋的宿舍里，周围都是一些十几岁的中学生，他把他们当作朋友，他们却难以了解老师心头的寂寞。他寒暑假也不到南方来，总以看电影作为唯一的消遣。巴金曾想帮助他解决对象问题，使三哥有一个温暖的小家庭。但他几次想打动他的心，探问他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而他对巴金的关心超过关心他自己，使巴金有时不得不直截了当地逼着他回答对自己前途的打算，这时他就露出寂寞的笑容，无可奈何地说：“这有什么办法呢？”巴金很想重新燃起三哥已经消逝了的年轻时代的热情和勇气，但他一时想不出办法。现在，他回上海来了，巴金终于紧捏着他的手，对他说：“现在你什么事都不要操心，住在这里，我要让你过安定生活，你太疲劳了！”他知道三哥爱好音乐，在成都时三哥就欢喜唱歌，而且特别爱好声乐，多年前两人从成都来到上海，经常一起听唱片，纵然穷得有时连饭费都交不出，也省下钱来买了架唱机，两人轮着摇动唱机柄，头碰着头，聚精会神地听宝贝白玲唱英语《卖花歌》。这次三哥回到上海，他很快成了工部局交响乐队每星期日在工部局礼堂和兰心剧院（即今上海艺术剧场）举行演奏会的常客，而西洋古典音乐唱片更为他所喜爱，差不多每天都要播放几张，来遣散他心头的寂寞。当然，他还用“李林”的笔名埋头翻译冈察洛夫的小说《悬崖》，同时还准备翻译冈察洛夫的另一部名著《奥勃洛莫夫》。他的英语基础很好，少年时代就在成都外国语学校读书，上大学又是专攻英语，毕业后一直担任中学的英文教师，他的一生可以说没有和英语分过家。翻译的虽是俄国作家的作品，但他工作认真，除了很好钻研英译本，把它读懂读透，还参阅俄文原著，以及其他有关作者、作品的各种评论文章，使自己对从事的工作有更多的了解。

两年前，巴金还曾给三哥介绍过一个在天津读书的中学生杨苡与他通信。那个在中学读书的杨苡，是巴金作品广大读者中的一员，她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时，还是个十七岁的姑娘。像杨苡这样的姑娘，在巴金的读者中是不少的，有个女孩由于出生在一个封建家庭里，她无法与同学们一起参加当时的救亡运动，当她看到她的一些青年朋友办墙报，搞营火晚会，参加示威游行，而自己则被家长禁闭在家里，没有自由，她心里感到苦闷，甚至想单独离开家庭出走，因此写信给巴金，希望巴金能给她帮助。巴金回答她说，她应该像一只小鸟，永远怀着冲进自由的天空里去的雄心，只等着羽毛丰满的时候的到来。而目前她实在太幼小了，应该暂时忍耐一下。但那忍耐，意思是“对于未来胜利的准备”，并不是长久的屈服。他还说，“不要把一切的希望都付托给一时热情的冲动，决定一个计划还得靠一付冷静的头脑。”对方起初不大肯接受这样的意见，她坦率地写信给巴金说，想不到他也会说这种平凡的话。这使巴金感到痛苦，他只好发表自己的意见，进行劝阻。他说，倘使某一个女孩在家庭以外没有可以信任的朋友，有一天因为一时的气愤，或者一时感情的冲动，觉得不能够再在家庭和学校内住下去了，要跑到那个广大的世界里去，靠自己两只洁白的手和一个正直的灵魂，建立一种合理的新生活。她的眼光是正确的，她的志向是伟大的。我们绝不能在这个孩子的情上浇一瓢冷水。于是她实行了她的计划，带了一点够维持一两个月生活的钱。她走进了这个陌生的社会，却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工作，带的钱不久就甩完了，却没有做出一件有益的事情，甚至不曾遇到一个指路的人，还可能遇见一些骗子，她应该怎么办？以后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落在更悲惨的境地，就是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去。有的人经几次碰壁后，便厌倦了，

认为自己的理想错误，索性走到守旧的路上去。他们并未曾改造社会，反而被社会改造了。因此，巴金认为做一件事，应该有步骤，有方法。女孩终于被说服了，暂时没有离开家庭。到了1938年春节，巴金还写信要杨苡与李尧林认识，因为尧林在天津南开中学做教师，杨苡也在天津，巴金相信尧林能帮助她继续用功读书。后来他们两人果然通了不少信，也见过几次。到1939年1月，杨苡已到昆明联大读书了，巴金在桂林又鼓励萧珊与杨苡通信，这两个姑娘结果成了很好的朋友。

就在这一年夏天，萧珊也终于到昆明去考大学。当时从上海乘海轮绕道海防到昆明去考大学的高中毕业生是很多的。那天萧珊由她父亲陪同来到十六铺码头，她父亲不放心她独个儿出门，特地事先设法替她找到两个同行的伙伴，萧珊因此认识了两个本届高中毕业生，一个叫王蘅文，一个姓姚，都是与萧珊年龄相仿的姑娘。但开船那天，萧珊却迟到了，王姚两人正在船上找她，一见船已缓缓离开码头，不免心里焦急，正在这时却见一艘汽艇后面驶来，原来正是萧珊的父亲雇了一辆小汽艇把她送来。但见萧珊急得满面通红，上了轮船，向她父亲流泪挥手告别。两人帮她放好行李，问萧珊是哪个学校毕业的，准备去考哪个专业，萧珊说自己学名陈蕴珍，是爱国女中上一届毕业生，准备去昆明读外文系。她们两人是省立上海中学同班同学，王蘅文准备去考医科大学，姓姚的同学则是回乡探亲，去找她哥哥。萧珊听说王蘅文也到昆明考大学，感到格外亲切，王蘅文见萧珊眼睛明亮，身材匀称，而且心胸坦直，性格热情，非常可爱，以后就每天一早起床，一同跑到甲板上看海上日出。萧珊面对红日冉冉上升的美景，总是高兴地喊着：“太阳出来了！”然后三人又一起去餐厅吃早饭，饭后又相互谈心，这时王蘅文才知道萧珊是巴金的未婚妻。王蘅文问她为什么没有看到巴金来送行，她说巴金正在香港，几天后轮船停靠香港时，估计巴金会来接她上岸去游览香港的。王蘅文在初中时就读过巴金的小说，也读过他的翻译作品，他的《家》给她印象更深，知道这次轮船靠岸有可能见到巴金，心里一阵高兴，便对萧珊说：“那时候别忘了给我介绍啊！”萧珊说：“那当然，让他请我们一起喝咖啡好了！”果然，三天以后，轮船到达香港，巴金与萧珊有机会会面了。

原来巴金是专程去香港取回寄放在萧乾处的行李的。这行李原来寄放在萨空了处，萨空了去了新疆后，就把行李转托给萧乾，当时萧乾已在香港《大公报》工作。萧珊与巴金约好在这一天来接她。哪知巴金到码头，轮船已提早到达，萧珊已去《大公报》找巴金。巴金见到她后，她介绍巴金与王蘅文相识，并一同在附近一家咖啡馆喝了杯咖啡。王蘅文本来以为巴金写了那么多作品，一定到了中年，这次一见才知道他还是非常年轻，看来不过三十岁左右，穿得朴素，不过一件白衬衫，一条白裤子，但长得很端正，脸孔略显得苍白消瘦，性格似乎相当沉静。萧珊却十分活泼，喝咖啡时主要是她高兴地谈旅途中有趣的见闻。船在香港因卸货停了三天，她们每天白天上岸，分头会亲访友，晚上又都回船睡觉。三天后轮船又启航了，到了海防，那已经是越南地带，当时虽然未被日本军队占领，还在法国人手里，但这里只有讲法文或广东话才能与人打交道，幸亏萧珊能讲几句简单的广东话，总算租到了一家华侨开的旅馆房租比较便宜，她们三个女同学住在一起，生活还是很方便。这时王蘅文很感谢萧珊，对她说：“我很惭愧，你父亲临行时再三托我照顾你，我也拍胸保证把你照顾好。哪知还是靠你的才干，解决了我们三个人的日常生活和住宿问题。”萧珊听了很高兴，她们一路上嘻嘻哈哈，就

把旅途的日子快乐地打发过去了。从海防到昆明，她们和从上海同去考大学的一些年轻人一起向火车站包了一节没有窗口，只有一个通风洞和一扇进出大门的当时人们叫它为“闷子车”的四等车厢。大家各自带好行李，并沿途带足干粮、开水和水果。随着火车爬山坡，钻山洞，讲着笑话。火车途中很少停靠，只在天黑时才停站。那时大家就各找旅馆投宿，第二天一早再回到车厢上来。在这样的旅途中，萧珊比王蘅文还适应，从无一句怨言，或表示要男同学帮忙，大家说她一点小姐气味都没有。

几天后她们终于到昆明，姓姚的同学家在昆明，又是来就业的，所以就由家人接回去了。萧珊由沈从文派人接去，住在西南联大宿舍，因为那时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所以住在那边，比较方便。王蘅文则住在城里女青年会里，那边有几个她在扬州中学读书时的老同学，她们与她一样是来昆明考大学的。当时大学全国统考已快开始，考后还要等候发榜，所以她们都要在昆明作至少住二三个月的打算。在这期间，王蘅文还与萧珊她们一起到滇池和西山龙门一带游览，并照过相。萧珊很能爬山，那时她在昆明通过沈从文的介绍，又结识了不少新的同学和文学界朋友，他们都很欢喜她。有一天萧珊还进城来找王蘅文，要她一同去西南联大看当晚演出的话剧《原野》，说这出戏曹禺将亲自登台演出，导演是西南联大文学教授孙毓棠，金子则是凤子扮饰的。王蘅文虽准备进大学学医，但对文学也很有兴趣，听说有那么好的机会看《原野》，二话不说就随着萧珊出城来到西南联大看戏。这确是个令人永远难忘的夜晚，剧本好，导演好，名家演出，更使广大文学青年神往。当晚，戏演结束，王蘅文还到萧珊的宿舍里，与萧珊兴奋地讲戏，讲到半夜，才赶回女青年会宿舍。这一年10月，大学统考发榜，萧珊考进了中山大学读外文，但几个月后她又转到西南联大；王蘅文则录取在重庆的中央大学，读的是医科，很符合她的志愿。这个姑娘后来始终在自然科学战线上奋斗，到了八十年代成为我国最有声望的从事细胞生物学的病理及职业肿瘤病专家。她与萧珊在昆明分手后，在几十年茫茫的人海沉浮中，仍曾有一二次会面的机缘，容以后再述。

那时巴金已从香港拿了寄存的行李，回到了上海霞飞坊，他开始写《秋》。当时他住在三楼，索非夫妇住在二楼，三哥尧林住在三楼亭子里。巴金写《秋》，与写《家》和《春》时不同，这次他是集中时间、集中精力一口气把它写成的。那是一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最初他也没有料到竟会写得那么长，而且边写边排，开明书店的几个老编辑包括夏丏尊、徐调孚、周予同等当时都在上海，他们并不催促他，却给他以一个特别“优惠”的条件，就是可以在未写完全书前，就可以看到已写好的一部分校样。他每个晚上9点钟开始动笔，一般总是写到深夜两三点钟，有时还写到第二天凌晨4点，还不肯把笔放下。那时内地正在讨论写作上的“抗战无关论”，巴金的《秋》无独有偶，正与钱钟书的《围城》同时地在这漫漫长夜里双双诞生，而两位作家的抗战意志却并未因从事这两个“与抗战无关”题材的写作而受到销磨，相反，巴金的爱国热情比谁都高，在“孤岛”上海生活得越来越厌烦，耳闻目见的一切都使他感到愤怒，因而不能安心工作，他一方面写《秋》，一方面又把自己充满着抗战激情的散文作品送到报刊上刊登，与许广平等人一起响应柯灵主编的《文汇报·世纪风》副刊发起的“稿费义卖献金”，把自己作品的稿费捐献给抗日事业，为保卫祖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秋》写到了四十万字以上，他终于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完成了高家的绪局，那是个秋

天的结局，如觉新所说的：“我的生命也像是到了秋天，现在是飘落的时候了。”高家的故事结束了，时代并未结束；高家到了秋天，祖国迎来的却是春天。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初，巴金把《秋》写成。同月下旬，书也就在上海福州路开明书店门市部出售了。这是《激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它的内容和《家》《春》一样很快唤起全国读者与黑暗的旧制度、旧势力作斗争的热情，更激起了正生活在“孤岛”上海的青年们奔赴抗日前线的决心。在这些青年的心坎上所投下的石子，很快泛起了漩涡。就在《秋》出版后的第一个星期，即这一年的6月1日，就有个在高中读书的青年用感激的心情，写了“读后感”，在当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

巴金带了《秋》的精装本，在7月初乘“怡生”轮离开上海转道海防去昆明。临行时，为他送别的是陆蠡与李尧林。这两个善良的人，他们生活在“孤岛”，他们的心却一直联结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当巴金向他们挥手告别时，他们的眼睛都噙着晶莹的泪花，他们都为巴金的远去而感到伤心，但是他们知道巴金是一定要回到内地去的，那边祖国在召唤他，人民在期望着他，还有更多他所亲近的战友和亲人在热情等待着他。

他们两人各从自己的泪眼中望着站在船台上的巴金，只见巴金亲切和善的脸上泛起一层微笑，他们知道他是多么真挚地在爱着他们，祝福他们。而他们呢？他们的命运怎样？在敌人魔爪下生活着的未来日子，会变得怎样？巴金没有想到这正是他与陆蠡的最后一次见面了；也没有想到当他再一次回到上海，他的三哥尧林也只是在病床上与他作最后几天的团聚了！



## 第五节生者与逝者

巴金从上海到昆明去，是沿着一年前萧珊、王蘅文她们走的路线前进的，这就是先从上海乘船到海防，然后再由海防搭火车赴昆明。但是巴金走的这一年已是1940年7月，当时法国军队已经战败，巴黎正准备宣布向德、意、日三国所组成的“轴心国”投降，日本侵略军也就乘机机会，威胁法国殖民当局把越南割让给它。所以当时海防形势非常紧张，与一年前情况不大相同。现在，不论海途还是铁路沿线，乘客都比过去增多几倍，人们都想乘日军占领海防前赶回昆明去。幸亏巴金单身出门，所带行李很少，领护照办签证手续也还比较简单，得以顺利地上船，中途只是因为遇到风浪，才在福州湾停了一天半。到了海防，他在一家华侨旅馆里住了一个晚上，结识了一些同行的旅客，因此第二天乘火车，便依靠人多，得以互相照应，买到车票。有的人因为带的行李较多，便遭到法国检查员的不少留难，有的旅客甚至被强迫脱去脚上穿的长统皮靴，以减轻身上重量。火车到了河内，又换乘滇越路的车到老街，沿途昼行夜宿，行李随客人上下，年老体弱者都被弄得狼狈不堪，行李带得多的人更不必说了。在这中间，巴金帮了不少人的忙，有时替他们代为看管行李，有时还帮他们卸货歇肩。他在路上，还看到不少战时的“社会相”，有人为了要把几瓶三星牌白兰地酒带到昆明去，需要在关口贿赂越南官员，把钱塞到越南人手里，越南人脸上毫无表情，手上却把钞票捏得很紧。巴金在“孤岛”上海沉闷地住了一年多，又在旅途中看够异国人的横征暴敛，现在从河口铁桥进入中国境内，意识到自己又踏到祖国土地上，禁不住激动万分。但是一到云南省入境处验看护照时，一个姓杨的官员一看护照，只见上面写着：“李尧棠，四川省成都市人，三十六岁，书店职员”，便问他在哪家书店工作，巴金回说在开明书店，杨先生就要求看身份证，而巴金却拿不出来，对方就要他打电报给昆明开明书店复电证明。这样，一刹那间，出现僵局。结伴同行的一些旅客，以为巴金不能和大家一同入境了，很为他焦急，巴金也感到为难，忽然想到临行时上海开明书店曾请他转达昆明开明书店一封信，信中要求对方转帐，付给巴金四百元稿费。巴金这时就只好把信拿给那杨先生作证明，并把随身带来准备送给萧珊的精装本《秋》交给他看。杨先生大概有点文化，他看了信和书，非常高兴，不但再也不要他作进一步证明，而且还与另外两个海关人员一起到客栈来看他，邀请他过境到一家华侨酒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还附带把巴金的两个结伴同行的旅客也请去作陪。在进餐的时候，杨先生谈到他自己在学校读书时怎样读巴金的作品，又怎样和同学议论一些小说里的人物，在座的另外几个人也有读过《家》的，也有读过《灭亡》的，也有读过《爱情三部曲》的，大家一时把话扯得很远，这时，杨先生更高兴。饭后，他们说说笑笑回到河口，三个主人把三个客人直送到客栈门口，再三表示友好道别。第二天早晨，巴金就凭着杨先生给他护照上盖着的通行印章，离开了那个掩没在原始森林中的朴素的小城，上车去昆明。

到了昆明火车站，只见阔别一年的萧珊正和她的一个同学在月台上等他。他和她们谈了一些话，知道萧珊已从中山大学转到西南联大读书，学习生活都不差，与同学们相处得也很好，特别与杨苡很接近，相互关心，非常和睦，巴金听了很高兴。他在旅馆里休息了几天后，就到昆明开明书店去找经理卢芷芬，把上海开明书店的信交给他，领到了四百元稿费。卢芷芬原在

上海开明书店从事古典文学编辑工作，他的夫人也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他们本来就知道巴金，这次相见，很快就熟了。当他们知道巴金住在旅馆里时，觉得这样太不方便，就建议他搬到书店附近的一个栈房里来住，那间房子是他们租下来用作书库的，现在书只占了一半，还有半间可以住人。巴金本来就准备找个地方把《火》第一部写完，因为这个长篇在他心头搁置较久，早在写《秋》以前就开始动笔，本想在离沪前写好的，无奈碰到法国战败，上海法租界盛传日本侵略者就要派兵进驻，以致人心惶惶，朋友们也一日几次来向他报讯，他只好把《秋》结束，带了《火》的残稿离开上海。现在听卢芷芬夫妇这样说，便决定搬到这个玻璃屋子里来。它的周围环境很安静，房子座落在一个花园里，屋内比较宽敞，有书桌、家具可以现成享用。

住下来的头两个月，生活很安定。当时日军还不曾占领海防，敌机还无法常来昆明骚扰，住的园子也十分清静，除了一些清脆的鸟鸣，和偶然间看到几只松鼠在松枝上互相追逐，发出轻微响声外，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连狗也被主人带出门去，不放在家。朋友们来的也很少，只有萧珊，在暑假期间是常客。他写的《火》第一部，进展很快，原先已发表过六章，在上海曾加写了一章，这次就在这静寂的环境中把其余的十一章都写好了。好在他写的这部作品主人公冯文淑，原型是萧珊，特别是在这第一部里，有些生活都是萧珊经历过的，他可以按照她的性格和生活写出一些故事。他有时一边写，一边想：如果萧珊不与他接近也许她会随着战地服务团到前方去，更有可能到延安去……

在写作过程中，在生活上经常得到卢芷芬夫妇的照料，特别是卢芷芬自己，他不但为巴金找到《火》在《文丛》上已发表的部分，让巴金续写时有个依据，而且后来还帮巴金誊清原稿，使巴金能及时将《火》的第一部稿件寄到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日本侵略军进驻海防后，它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从这个据点出发，派飞机到昆明轰炸。这以后，巴金的生活便不得安宁，即使放下笔，在那静寂的园子里，定着神听几声鸟鸣，也会突然被一阵凄厉的警报声所惊醒，那就不得不锁上门，跑出门到郊外去躲警报。后来狂炸开始，卢芷芬夫妇有时也来约巴金与萧珊同去郊外，好在住的地方离城门不远，往往躲过一二小时，就坐在草地上和他们共进午餐或晚餐，吃的东西大都是他们夫妇事先准备好带去的。

在昆明写好《火》第一部，巴金终于到了“大后方”重庆。那是在这一年10月。他是乘飞机到达那边的。住的地方是老友吴朗西经办的互生书店里，在沙坪坝。他们在上海八·一三战事发生后分别，已有三年了。巴金到重庆不久，由老舍等主持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召开了一次欢迎来渝作家茶会，巴金在会上与七十多个作家团聚，其中有一部分是初次相见，更多的是久别重逢，这里有茅盾、冰心、郭沫若、田汉和艾青，也有挚友靳以、马宗融，他们两位都在复旦大学任教。而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则是和他第一次见面。周恩来在巴金面前显露的亲切的微笑，和他紧紧的握手，为巴金驱散了雾重庆的寒气。他在会后一星期，又从重庆到江安去看了一次老友曹禺。当时曹禺正在戏剧专科学校当教员，并写好了一个剧本《蜕变》，巴金为它写了后记，并在这里住了一周。临行，他留给曹禺两本书：《秋》和刚出版的《火》。然后又回到重庆。

新的一年开始了。1941年1月，他从重庆来到了离别十八年的成都，他

在这里住了五十天，会见了一些老友，也去看了自己的一些亲属，他们都已因大家庭的分崩离析，分散住在各处。成都正通顺街的老屋，早已几经易手，为别的姓氏所属。那天黄昏，他来到这条宽阔的街上，像老朋友重见那样，感到亲切，一种说不出的感情，使他把脚步停住，站在十八年前的故居门前徘徊不去。啊，那一对曾经被他当作过坐骑的石狮子已经不见，防火用的盛着水的双石缸也早被人搬走，但是大门开着，嵌在内墙照壁上的“长宜子孙”四个字还依然存在。他很想进去看一看，不知母亲住过的上房还在吗？后园、马房有没有被毁弃？还有那棵阅尽人间沧桑的桂树不知怎样了？十八年前那个春天的早晨，他离开时大哥和三姐曾为他和三哥送行。那时三姐刚出嫁一个月，但不到一年半就传来了她的死讯，大哥来信诉述她临死时受婆家冷落的景象，几年后连大哥都自杀了！在这座房子里，曾有过多少年轻的生命被吞噬掉。照壁上“长宜子孙”四个字是祖父留下来给他后代的。这个老人白手起家，创立他的基业，临死千叮万嘱，要儿孙为他保留他的房屋与字画等等，但是最后还是春梦一场。他哪里知道财富并不“长宜子孙”，倘使不给儿孙一种生活技能，不让他们去看看广大的世界，不向他们指出一条生活道路，“家”和财富对他们只能是囚笼，只能销蚀他们年轻的心灵，只能使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毁灭。这次回成都，他听说五叔死在狱中，觉得这是旧制度所造成的又一个悲剧，他酝酿着将以五叔趋向堕落的悲剧为题材，写一本小说。

巴金在昏黄的街灯下离开了他的十八年前的故居。他没有像他的姑母和嫂嫂那样到那个已属他姓所有的公馆里去看一下，也没有像他们那样站在园中的花树下垂泪凭吊，去慨叹自己那个家族的盛衰。当他离开那个公馆的门口时，他看到从门缝中露出来的灯光，好像看到欧洲古代传说中所讲的哈立希岛上的灯光，那是爱尔克为她航海的兄弟照路的灯光，是期待她那个出远门的兄弟回来的灯光。可怜的爱尔克她至死都没有等到她兄弟回来，而自己却终于死了！巴金想到当年为他送行的三姐，他曾答应她回来时向她诉述外间世界的景象，现在他回来了，而她却早已不在人世。在这个他永远也忘不了的城市，这一次他回来住了五十多天，但也还是感到十分短促。当他向它告别，像过去一样，仍还有一些亲人来看他，屋然这里已经少了一些人，也增添了一些人。在临别的前几天，他还到成都郊外去看了一次罗淑的墓。他还记得四年前八·一三沪战初起时，他在上海西站为她送行，当时她为了关心丈夫马宗融在战乱中的安全，特地千里迢迢冒着炮火投奔到这里，后来却因患产褥热死在医院里。现在巴金站在她的墓碑前，看到这里的一堆黄土，一丛矮树编的短篱，不禁思索起埋葬在这里的那个年轻可爱的生命。她生前曾给朋友们多少温暖的友好的感情，她的短命竟使她的天赋的创作才能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要是她能多活十年，一定会给后人留下几部描写四川盐场生活的精品。

巴金回重庆后，为罗淑生前留下来的几篇遗作和一些残稿，编了一本她的第三个集子《鱼儿坳》。接着他开始了《火》的第二部写作。当时和他一起住在沙坪坝互生书店里的田一文，在三年前曾参加过战地工作团，在当时的“第五战区”从事过宣传工作，巴金与他以及书店里的另外几个朋友，经常在一起散步，或者到茶馆喝茶。田一文比较年轻健谈，记忆力也不差，他常谈起当时工作团的一些情况，这使巴金想起《火》的主人公冯文淑，他要让冯文淑的故事发展下去，他认为最好的出路是让她到战地去，而自己却没

有这方面的生活，现在听了田一文讲的材料，同时又回想起三年前自己在汉口一家饭馆中吃饭，曾遇见一个姓胡的四川妇女，她曾经带着二十几个姑娘在战地服务团工作过，并在上海战场上活动了一些日子，她给他的印象至今也不曾褪净。他就凭着这些材料和印象，开始了《火》第二部的写作。那时他在书店附近租了一间环境比较清静但并不大的屋子，作为自己的写作室，每天关起门来，坐在一只白木椅上，靠着一只白木小桌，把这部小说写了出来。恰好这些日子正是重庆的雾季，敌机很难在天空一片迷雾中活动，所以从这一年的3月底，写到同年5月下旬，《火》第二部就顺利地写完了。这部小说显然与去年写的《秋》有很大的不同之处，这就是《秋》是根据自己所经历的生活写成的，许多人物虽然虚构，许多细节虽凭想象，却都有自己生活的影子，有生活的根据，绝不是凭空而来。《火》的第二部材料则大都出自别人的嘴，间接听到的多，不是从自己生活中直接汲取提炼加工而来的。因此，巴金事后曾对人说，《火》的第二部是他的“失败之作”。当然，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所反映的感情，即抗日爱国的情，还是十分真实的。

雾季过后，敌机的骚扰就多起来了。他在被炸灾区看到过我们人民在牺牲后不闭的眼睛，他知道那是战士的眼睛，期望着我们战胜的旗帜能在敌人阵地上升起来的眼睛。这样的眼睛也使他想起刚去世不久的一个老朋友，这就是他在十二年前闽南地区认识的陈范予，他死时还是对自己的理想充满着信心。他是教育家，又是个自然科学工作者，曾在福建泉州中学从事平民教育，也担任过上海立达学园农村教育科主任。他是肺病患者，但他热爱生命，曾经写过《生之欢乐》、《战士颂》等散文来热烈歌颂人生，歌颂人生的美、爱和力量。他坚信知识、信仰和意志，就是科学工作者作为战士的武器。他在他最后的两年，还完成了《科学与人生》、《达尔文》、《科学方法精华》三部译著。到他躺在病床上的最后一刻，还在写着他的一篇题目叫《理想社会》的文章。他的死讯是巴金几个月前在成都听到的。当时巴金正在自己的故乡想念已逝的长辈和年轻的同时代人，却不料还给他传来那么一个使人悲痛的噩耗。他禁不住想起当年在泉州的一个武庙里，每天早晨看陈范予从露天水潭里带回来一瓶污水，放在显微镜下看无数微生物的出生、活动与死亡；并听他讲无穷大的世界，与无穷小的天地。他从陈范予那边曾学到过不少知识，并还在以后的十二年受过他的关切、鼓励、期望与扶助。甚至在“八·一三”战争发生后，他还在自己十分困苦的生活中，给巴金汇款，唯恐他因战争影响生活。这次巴金在成都听到他的死讯，回到重庆，竟还读到范予临死前寄出的一封亲笔写的告别信，他一开头就说：“无论属于公的或属于私的，我有千言万语需要对你说，但我无从说起。”当他叙述自己的病状时，说“自从去年冬至节以后，忽然变成终日喘哮不绝，且痰塞喉间，乎卢乎卢作响，咽喉剧痛，声音全部哑失。现由中西医诊断，谓阴历12月一个月为生死关键。最近几个月来……连鲜牛奶、鸡汁都不能自由的吃。四肢和身躯已成枯柴……”巴金读了这封信，不能想象他怎么还能执笔，是什么力量在使他还能这样热情地散布生命，还能如此热烈地歌颂“生之欢乐”，并为他写出充满友爱的信？这不是像战场上的战士一样，临牺牲还以不闭的眼睛，望着城头，期待着胜利的旗帜升起来，那样勇敢，那样坚毅不拔吗？巴金不能不为此而流泪。

不久，他又来到了昆明。这正是西南联大的暑假期，他又和他的未婚妻萧珊会面了。当时萧珊已和王树藏、刘北汜、肖荻等人从拥挤吵闹的学校宿

舍搬出来，住在钱局街金鸡巷一个称作“先生坡”的地方作为宿舍。这里同学来往很多。已经与年轻的诗人赵瑞蕤结了婚的杨苡，也经常抱着他们刚出生的婴儿来看萧珊。那是一幢一排三间的楼房，中间是客厅，两旁是住房。楼下住着房东。这次巴金仍像从前那样，与萧珊朋友般的住在一幢房子里。他在这里趁着雨季，没有轰炸的干扰，写了将近二十篇千字左右的随笔和杂感。白天常到附近小饭馆吃饭，更多的时候是上小铺子吃碗“米线”，把午饭或晚餐打发掉。有时他还与萧珊一起去金碧路看电影。看电影一直是巴金的爱好，不论在战前，还是在战后；在法国，还是在上海；以至在桂林，重庆，昆明，他都以看电影作为他业余的主要娱乐。昆明雨季，路滑难走，但比起“躲警报”来，那就好得多了。所以雨季对看电影，也是个较好的时机。一个月以后，昆明雨季过去了，于是人们又在敌机的威胁下生活。大家又随时随地准备着“躲警报”。那天，敌机狂炸结果，连“先生坡”附近也落了弹，楼房受到震动，玻璃窗震破，碎瓦残砖到处飞溅。晚饭后，巴金到灾区去看，看到有一座楼房只剩了一个空架子，七歪八斜，快要倾坍了。人们正在敌人所造成的废墟上挖掘被炸死者的尸体，在一个中了弹的防空洞旁边，有三具尸体被挖出来了，人们用草席把他们盖着，有一只搭满着泥土的小腿露在草席外，有七八个人面带悲哀的神色，站在周围，他们一言不发，有人还在落泪，有个中年妇女指着那条露出草席外的小腿，说：“那是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她说话的声音很低，却引起一阵唏嘘声，然后又出奇地沉默。巴金满腔怒火，想着这些死者，在几个钟头以前还都和大家一样安静地过着生活，敌人一个炸弹就把这些年轻的生命毁灭掉，“陈家三小姐”他并不认识，也许见到过，也许从未见过，但都是同一个城市里的人，都是他的同胞，因此，他在一篇短文里写道：“为什么我们要忍受这样的迫害，要承受这样的残杀？这样一个少女的命运，为什么他们还不赶快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环顾四周，觉得寂静得可怕。他发觉自己脸颊上有点潮湿，仰头一看，才发觉落雨了。但雨并不能浇灭他心中的怒火。他再朝废墟看了看，只见一个角落里，一棵被炸残的树枝上，正开着一簇深红色的花，迎着细雨盛放。炸弹并不曾把这棵树炸掉，绿色的生命仍在延续。我们的土地是倔强的，它永远孕育着生机。在敌人的肆虐后，那些逝者虽已看不到绿树红花了，但绿树红花却在告诉未死者：中国土地上的生命是不会完结的，中华民族是不会灭亡的！

又过了一个月，大概是九月十天左右，巴金和他的同事王文涛由昆明来到桂林，重新建立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办事处。萧珊随行到桂林，但几天以后她就回昆明西南联大上课。在桂林，王鲁彦正在为主编他的《文艺杂志》忙碌，他是巴金在闽南认识的老友，比巴金年长，不仅是个“五四”时期的老作家，还是个工作认真的好编辑，可惜这时他为生活所迫，身体已变得愈来愈坏，而且患了晚期的肺给核病。巴金在鲁彦办的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作品，当他每次把作品交给他时，看到他清瘦的脸色，总要为他的身体耽心。一天傍晚，鲁彦从桂林三家村把巴金送到洋桥，巴金要他一同进城，希望能找一家小馆子共进晚餐，多谈一会儿，而鲁彦却说他身体支持不住，要回去了。巴金站在桥头，看见他支着一根手杖，歪斜着肩胛，一拐一拐地走着，远望他的背影在黄昏中消失，忽然意识到这位老友的身体更加衰弱了，禁不住热泪盈眶。他想到自从战争开始，他已哭过罗淑，哭过陈范予，看来不久就有可能要轮到哭鲁彦了！敌人不但直接杀害了无数中国人，战争还使贫困的中

国知识分子加速了死亡。

巴金没有想到在鲁彦的健康还不曾进一步变坏之前，他的另一个老友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突然去世。这个老友，就是他在东江路福隆街的邻居林憾庐，那是在1943年2月，一直在桂林主持宇宙风社，编辑《宇宙风》月刊的林憾庐，几年来勤奋工作，刊物按时出版，事业有一定发展，但因工作劳累过度，患了肺炎，当地缺医少药，他依靠自己仅有的一点医疗知识，为自己开方给药，却没有见效，到病重却又碰到一个庸医，虽然出了重价，“特效药”却并无特效，终于不幸去世。他也是巴金在福建泉州黎明中学认识的，抗战后一起“逃难”，一起“躲警报”，一起带着一批朋友从上海到广州，从广州到桂林……增强了相互之间的了解，成为患难中的朋友。他的耿直，善良，对国家民族存亡的关切，对朋友的无私帮助，都使巴金感动过。林憾庐办的刊物，不但巴金自己曾为它写过稿，萧珊也曾以“程慧”的笔名为它写过旅行散记，并从这本刊物上拿到她一生中的第一笔稿费，又以这笔稿费买了一只立灯送给她正在患病中的母亲。正直的林憾庐十分珍惜巴金对他的友谊，同时也一向赞赏萧珊待人的真挚的感情。他对她以第一笔稿费购礼物献赠母亲的举动，几次在别人面前加以推重。他以有巴金萧珊这样两个朋友作为邻居，而私心引以为幸。巴金对老友林憾庐的去世，十分悲痛，他为林的丧葬奔走了两天，他觉得他的这个老友不只是在几个朋友中间致送温暖的人，他还是个热情的爱国者，抗战事业的热烈拥护者，也是我们文化事业的一个热情的理想家。他的死，曾使巴金一时无心动笔，他给杨苡写信时说：“我写不下去了，我一个老朋友昨晨病故，棺材还停在这儿。”但他又说：“想到一个人很快死去，不免有生命易逝之感。但是我还有够多的生命力。我还要勇敢地活下去。”

过了两个月，巴金开始写《火》的第三部，这次他把一个基督教徒田惠世作为这部小说中的一个主人公写进去。田惠世的人物原型就是林憾庐。

## 第六节胜利前夜

《火》的第三部第三章《田惠世》在王鲁彦主编的《文艺杂志》发表后不久，即1944年5月初的一个早晨，巴金与萧珊来到贵阳结婚。巴金与她恋爱八年，原该结婚的时候了。当时巴金整四十岁，萧珊二十七岁。他们选择了一个非常清静的场所——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作为结婚的地点。在那里既不举办仪式，也不邀请客人，更不大办筵席，只在离开桂林前，委托弟弟李济生代他们印发了一份“旅行结婚”的通知给朋友们。

贵阳，巴金在两年前曾单独到过这里，住过六天。那时，他听人说，“贵阳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不料到了这里，却碰到一连串的晴天。天是淡青色的，并无一片云彩。阳光像一双温柔的手，抚慰着树枝，让树叶泛起一层金色的亮光。麻雀在屋檐上轻轻叫着，苍鹰则在高空悠悠飞翔。杨柳出叶，桃花初开，一切都充满着朝气，显示着希望。晚上，又是星光灿烂，月光皎洁，使人容易引起各种幻梦的夜。这次来到这里，也还是这样的季节，这样的月夜。他们住的“花溪小憩”是一个宾馆，它建筑在花溪公园里，对外公开营业，但客人很少，平时这里看不到什么人，真是幽静极了，只是它只供住宿，不供应饭菜。巴金与萧珊住进来后，每天得走半个钟头的路，到镇上找饭店进餐，连早上吃点心也只好这样。他们的新婚第一夜在镇上小饭馆进的晚餐，是一份清燉鸡和两样小菜。然后乘着月色，谈着话，缓缓散步回到宾馆，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他们谈着往事，从八年前开始通信时的喜悦心情谈起，一直谈到对未来日子的打算。仍像平时一样，萧珊谈的总比巴金谈的多一些。这几年来他们并不是常在一起，即使在一起，不是在逃难的旅途中，就是在躲警报的树林下。八年时间里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宁静的夜晚，从没有像今夜这样有从容畅叙的机会。四周没有人声，只听见外边溪水在奔流，水声整夜不断。他们轻轻地谈着一些已经消逝了但足以勾起忆念的旧事，同时又谈着未来，谈及对战后的打算，他们感到宁静的幸福。两人似乎对生活都没有什么多的要求，巴金想的只是将写哪些题材的作品，目前则准备在这里住几天后。先让萧珊到重庆，再到成都老家看一下，会一会他的继母和家里人，巴金自己则准备在回桂林之前，在贵阳的中央医院诊治一下鼻炎，并在这些日子里开始写他的中篇小说《憩园》……

他们在花溪住了三个晚上，又回到贵阳城内，两天后巴金就为萧珊买到了开往重庆的邮车车票。他把她送上车，看汽车驶向远方，才回到旅馆。当天下午他便到中央医院看门诊，医师说他的鼻中隔需要动手术矫正，这样他只好准备住院。但病床需要登记，他又只得回到旅馆。为了节约，他住了两天，又换了一家小旅馆，改住单人房间，那边连窗户都没有，白天也要开灯，但这对巴金来说，不存在大问题，因为他惯于坐茶馆，白天不是在大街上散步，就是到茶馆泡一碗茶，在躺椅上躺着，酝酿小说或借以观察人。偶然也伏在茶桌上，动笔写上几段；晚上才回到那没有窗子的旅馆小房间里写文章。这样的生活也不过二三天，就住进了医院的外科第三病室里。那是个三等病房，有二十多张床铺。他在这里共住了十多天，动了两次手术，第一次是医鼻子，第二次是治小肠气。他作为病人，用的名字是在日本时用过的“黎德瑞”三字。医院里谁也不知道他就是作家巴金，外面也没有谁知道他在这家医院治病。他没有来探望的亲友，更无人来照料。尽管在动手术时施用局部麻醉药使人难受，但在寂寞中却给识了一些医师、护士和病友，接触了社会

的一角，看到了一些世情。这给他后来写《第四病室》的中篇，奠定了生活的基础。

但是出院后他仍继续写那本已开了头的《憩园》。当时他住在中国旅行社的招待所里，一方面等待买车票，一方面观察手术愈后效果，所以他还不急着离开贵阳，这恰好给他以抓紧写这本小说的机会。《憩园》写的是他的五叔的故事。这个五叔在《家》中曾被巴金作为高家五老爷克定的原型描写过，他是个封建大家庭中的败家子，人很聪明，从小受祖父的恩宠，长大以后，在外面狂赌滥嫖，吸毒，骗钱，无所不为，而祖父并不知道，等到事情败露，局面已经无法挽回了。1941年巴金回成都，得悉五叔刚刚死在监狱里。这次，巴金又以五叔为主角，塑造了《憩园》中的杨老三。他写这个故事，写得非常顺利，几乎是越写越快，因为他熟悉这个故事里的人物，也了解他们的内心，和复杂的思想感情。他不是事先想好一个思想框框去写这些事情的，而是按着他所熟悉的生活规律把故事开展的，因此他写得很自然，很有感情，人物很真实。他站在人道主义的高度上，写出了人物精神上的负担和他们的悲剧。

巴金当时每天上街到冠生园饮食店解决三餐，早上吃猪肝粥，其他两顿吃汤面，生活非常简单，此外便在招待所写稿。这时他已不再坐茶馆了，好像作品里的人物都在等候着，要他去为他们表达痛苦与欢笑。在贵阳他未能把《憩园》写完，就接到萧珊来信要他到重庆去，说马宗融、靳以等老朋友都在热心地期待着与他重聚。他只好改变回桂林的打算，准备先去一次四川。在去重庆的旅途中，他仍随身携带着一锭墨，一支小楷笔，和一叠当作稿纸用的信笺，每到一个站头，就在所住的客栈里，找个碟子或茶碗盖，倒点水，磨起墨来，继续写那本《憩园》。沿途汽车在像一条盘绕着的带子上驶行，翻山越岭，左拐右弯，忽而溪水山田相间，黄色的菜花遍地，有时又是铃声叮叮，驮马成队；三五个农民站在路边，望着他们的汽车微笑。车子到坝水镇，乘客们下车吃饭，然后再上车，到太阳快要下坡，车子经过被称作“黔北锁钥”的娄山关，到达桐梓站，已经天黑。这个晚上，巴金借住在车站附近的一个人家家家里，仍还是点起一支随身带来的蜡烛，写那《憩园》的故事，写到半夜。第二天早晨又赶车上路，经过山岭重叠、云雾遍天的花秋坪，车子一个弯一个弯下了山。在那险峻的山路上，开车司机虽然紧张，却很镇定，这使巴金心中暗暗敬佩，并对他充满了信赖。另外，他还看到车上的邮务员，一路上为邮政代办所装卸邮包，辛勤劳动：不少乘客也都用尊敬的眼光看着他们。车子过了綦江，到达一品场，海关人员便上车来检查旅客的行李，这就意味着重庆就快到了。傍晚5点半，车子果然到了海棠溪，巴金见到了夫人萧珊，她正站在那边等候他，并追上来在车窗外微笑着向他招手。

到了重庆，他们俩住在民国路145号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庆办事处门市部楼梯下的一个小间里。那个房间只有七八个平方米宽，而且只有一个小窗户，十分潮湿。他们除了一张床，一张小条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巴金只让萧珊买了四只玻璃杯，就这样组织起了一个小家庭。办事处的经理田一文一定要把自己楼上的房间让给他们住，但巴金说什么也不肯。巴金夫妇新的生活就这么开始了。这时战局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变化，湘桂大撤退，桂林一夜之间就被敌人攻占，这使巴金再也无法回到桂林去了。他只好安心在重庆住下来。当时他总是白天坐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办公室处理出版社的一些杂务，或接待来访的朋友。萧珊除了协助巴金看看校样之外，还常坐在办公室的藤



椅上看书。到了傍晚，他们就出去散步，偶然也去看一场电影。晚上，巴金就在他们那间小房间继续开始写稿。

住在重庆的朋友们知道巴金新婚来到了重庆，都高兴地跑来看他们。首先是在复旦大学教书的靳以和马宗融，还有住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斜对面的冯雪峰，他们是这里的常客。靳以、马宗融每次从北碚到重庆市区来开会或参加什么活动，时间迟了，赶不上船，就来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找巴金作通宵长谈，以便天明前赶上机船。在这种情况下，冯雪峰有时也来参加。他们四个人各有专长，但有一个共同的性格，就是都很坦率，耿直，真诚，善良。因此，他们聚在一起摆龙门阵，从不出现冷场，常常一边烤火，一边喝茶，一边谈话，甚至从黄昏直谈到第二天黎明。他们的谈话内容可以从对战局的议论，谈到对某些具体事件的看法，也可以从对十七八世纪某个西方作家的评价，谈到当代艺术某一流派的发展，反正无话不谈。他们多的是共同的兴趣，也有不尽相同的见解，但是他们谈了就忘了，从不把随便闲聊时别人的谈话，记在心里。

自从巴金来到重庆，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就几乎成了当时当地作家之“家”。曹禺经常到这里来“打牙祭”。有些人一进城，便在这里歇脚，迟了赶不上船，就在店堂办公室放开被头席子，打铺留宿。至于寄放财物，封发信件，那就更多了。当然重庆也有像何其芳那样久别重逢的朋友。他原是巴金在1932年就认识的诗人和作家，当年还是个穿长袍的斯斯文文的大学学生，巴金曾为他编发过《画梦录》、《还乡杂记》和《夜歌和白天的歌》等集子。1944年夏天，巴金一到重庆，何其芳就给他送来延安生产的小米和红枣，并告诉他不少有关解放区的事情。不久，何其芳又到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来接巴金，两人一起坐公共汽车到曾家岩“周公馆”去赴周恩来邀请的便宴。同席还有老舍、曹禺、夏衍、刘白羽。主人除了周恩来，还有林伯渠、王若飞作陪。

萧珊则更有她自己的小伙伴。那年冬天，巴金因为工作忙，离不开重庆，萧珊自个儿到成都，作为新过门的媳妇，住在巴金的继母家里。当她听说几年前曾与她一起从上海到昆明参加大学统考的王蘅文目前正在成都一家医院从事临床实习，便写信告诉她，要她到继母家中相聚。王蘅文接到信，第二天就赶来看她，只见萧珊穿着一件很合身材的毛衣，还是短发、旗袍，非常朴素，却洋溢着青春美。她告诉王蘅文，她已与巴金结了婚，住在重庆，这次来成都婆家作客，巴金还刚刚过四十岁生日。她说巴金的继母待她非常好，也和她非常亲热，像对待自己的女儿。萧珊还是象过去那样开朗，诚挚，又带几分活泼，天真。临行，她把巴金译的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送给王蘅文，这本书正是王蘅文所十分喜爱的书，她曾在战前的《中学生》杂志上读过几章。在这个时期，像王蘅文这样来到萧珊住处与她谈心的还有不少人。萧珊与巴金在重庆，好友杨苡曾三次去文化生活出版社看他们。有一次去的时候，还带了她的诗人赵瑞蕪同去，只是没有带他们的孩子。但是那天他们到得迟了，时间已近黄昏，一到就要忙着为他们安排住宿。这次是田一文跟诗人同睡，巴金让萧珊杨苡睡在一起；自己则在办公室桌上写了一个通宵的稿子。晚上，杨苡穿着萧珊的土布睡衣，与女主人对坐在一只三尺半宽的床上，抱着膝盖开始她们的“悄悄话”，一直谈到天色渐明，才各管各睡下去。第二天早上，巴金看见她们就笑着说：“昨天晚上你们一直谈到半夜，哪有那么多的话好说呢？”萧珊杨苡两人相视而笑，昨夜确实不着边际地讲了一大

堆话，却再也记不起讲了些什么了。杨苡只记得萧珊对她说：“我也得生小孩呢？我可不愿你那样，这么年轻就拖个孩子，那太可怕了！”然后两人又抱怨这场战争的时间拖得太长了，萧珊说：“你不觉得我们一生中最好的时光都在战争中度过了么？”就这么几句话；杨苡还留在自己的记忆里，其他却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这时，他们几个人，包括田一文在内，大家围坐在桌子边，就着辣乳腐吃稀饭，巴金还特地上街买了几只咸鸭蛋，切开来却有些臭味。这一下可热闹了，于是萧珊笑个没完，连声嚷着：“李先生真好笨啊，买个臭鸭蛋招待老朋友！”这使杨苡和她的赵瑞蕪都不好意思起来，巴金却笑嘻嘻地说：“陈蕴珍倒会讲现成话，你们晚上不睡，早上不起，还不是靠我给你们弄早饭！”他的话引起又一阵笑声，这样随即开始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又一个热闹愉快的日子。

当然，那个时期巴金也不是每个时刻都过得幸福愉快，相反，这些日子也有许多事情使他烦恼，悲哀，或者感到愤怒。两年前他在桂林洋桥边所预感到的不幸事件终于来临了；这就是他的老友王鲁彦患肺病死了，死在凄凉的乡下。巴金是从报上知道这个不幸讯息的。当时他坐在陈设凌乱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办公室里，大街上的一片吵闹声正从门外传进来，而当他读完报上这条新闻时，他的心却感到十分孤寂。往事的回忆，使他感到痛苦，他想到这几年来罗淑的死，陈范予的死，林憾庐的死，以至于今天王鲁彦的死，都意味着“大后方”知识分子的困苦。特别像陈范予、王鲁彦这样长期患着肺结核，而没有得到治疗的机会，终于一天天走向死亡。在后方这样的人为数不少。他的另一个朋友缪崇群，现在也正在受着这样困苦生活的煎熬，巴金知道崇群总有一天也会像范予、鲁彦那样向人世作痛苦的告别。在这年头，只有那些官僚，那些囤积居奇，做投机买卖的，才赚大钱，发大财。只有知识分子受冻挨饿，连大学教授也不例外，小知识分子更不必说了。现在人越善良，越受欺侮，生活也越苦。缪崇群长期患着肺病，为了生活在正中书局工作，当个小小的校对，有时也做些编辑工作，他的散文写得很好，很有独特风格，却不受上司赏识，因为上司要的是奉承拍马的人才，不要他这种老实人。广州沦陷后，巴金沿着西江流亡到桂林，曾在一家北方饭店遇到缪崇群，还是那个老样子：浮肿的眼皮，微笑的嘴唇，脸色十分苍白，但看来他好像比过去稍稍健步。他陪着巴金萧珊游了几天桂林山水，然后离广西去重庆，为了等候车子，临行时他还搬到巴金寓所住了几天。巴金对他充满朋友的感激之情，他不但在战前曾向巴金慷慨地给予可贵的友谊，在战时也曾为巴金的生活频添人间的友情和温暖。巴金萧珊婚后来重庆，缪崇群一听到消息，也随即从北碚赶来看他们。他自己没有家，到处碰壁，不被人重视，一个人孤零零地活着，看到巴金结婚，有了家，他比什么都高兴，因为他在巴金这个家庭里得到同情，得到友谊的接待。他在文章中情不自禁地唱着这样的颂歌：

“我铭感着人间还有熏风，还有灵雨，还有同情，还有自然的流露，还有爱……”

1945年1月14日，缪崇群终于在旧历岁暮、新春未临的寒冷之夜，病逝北碚。他在病重的时候，还是那样有事不肯麻烦别人，也害怕损害别人，他独个儿躺在宿舍里，唯恐惊动别人，连一口水都喝不到。当被人发现，把他抬进医院里后，断气时也没有一个人在身边，谁也不知道他是哪个时刻死的。14日去世，18日巴金才听到这个噩耗，急忙赶去，只见到当地“斜坡上”

多了个新掘的孤坟，这就是写过九本散文集的那个善良的作者的结局。

巴金痛感又一个挚友的离世，他下决心要把上月刚开头的长篇《寒夜》写下去。这本书原是应老友赵家璧的邀约写的。赵家璧原是战前巴金、靳以合编《文季月刊》的倡议人，他们曾有很好的合作。抗战开始后他在桂林从事出版事业，曾初具规模，却不料在“湘桂大撤退”中，产业全部遭毁，来到重庆，他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巴金看到他遭受这样的损失，心里也替他难过。赵家璧说他在桂林受炸之前，原曾抢出过一部分纸型，但这些东西在金城江的大火中也化为灰烬，这巨大的损失使他痛苦，但他并不灰心，决意要在重庆建立新的据点。他希望巴金能给他帮助。巴金理解他的困难，因为文化生活出版社在桂林大火中也受过损失，他决定先给赵家璧的事业以支持，准备写一部长篇让赵拿去出版，好在这部长篇的题材是他近年来从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的，他对它太熟悉了，这就是写知识分子在大后方的遭遇。那个故事中的主人翁汪文宣，他的身上有缪崇群，有陈范予，有王鲁彦，也有巴金的一个表弟，和巴金自己的影子。巴金常常想：“我二十五岁患过肺结核，如果我不是偶然碰到机会顺利地走上文学道路，拼着命写了一大堆小说，那么从桂林逃难出来，很可能到书店做个校对，万一肺病复发，我一定落到汪文宣的下场。”他决心要写出这些小人物的受苦，来谴责当时的社会制度。虽然这部题目叫《寒夜》的小说，人物是虚构的，背景和某些事件情节却非常真实。他开始写的时候，还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那间楼梯下的小房间，当时正是坏人当道，好人受气的时期。他所写的故事也就是在这幢房子的周围发展着，主人翁汪文宣一家人住的地方就像民国路那幢三层大楼这样的房子。当然，他是住在破破烂烂的三层楼上。楼下是公司和商店或者当时叫“写字间”的办公室；楼上有职员宿舍，写字间，也有私人住家。汪文宣在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里当校对，这个图书公司就以缪崇群工作过的正中书局作模特儿。巴金写的汪文宣就是像缪崇群那样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工作辛辛苦苦，工资、地位都很低，受尽损害，受尽侮辱，却不敢反抗。他写的汪文宣一家的故事，则是当时这些贫困知识分子所有家庭生活的集中典型表现。巴金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正碰着战场失利，兵荒马乱，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民不聊生的现实，而在他生活的周围，又不断发生着酗酒、吵架、离婚、自杀、贫病、死亡以及遭受敌机骚扰等各种不幸事件。在这些动乱不安的现象中，知识分子的遭遇，和他们的心态，巴金是十分熟悉的，所以他写得很快，也很顺利。但后来又不得不中辍。

那是因为1945年这一年，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无法根据自己的计划安排生活。这是个大动荡的一年，也是个大转折的一年。巴金为了投入斗争，争取抗战早日胜利，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比从前多了，如当年2月间，他和老舍、茅盾等三百人在重庆《新华日报》联名发表《文化界时局宣言》；又和郭沫若、老舍、胡风、邵力子等出席了有一百多人参加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曹家巷文化会堂举行的抗协成立七周年暨第一届艺术节纪念会。6月间，他又与郭沫若、老舍、叶圣陶、洪深、陈白尘等二十三人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发起为茅盾的五十寿辰举行庆祝会……身边的事情多了，他不得不把《寒夜》的写作暂时搁浅，而赵家璧的图书公司已经办了起来，他不能失信于这个多年相交的老朋友，就在百忙中熬了一个多月的通宵，把在贵阳时就酝酿成熟并早已动笔的中篇小说《第四病室》先赶写了出来，交给赵家璧。家璧拿到这部原稿，如获至宝，为了保证书的印刷质量，他特地把书的纸型

送到上海去印，好在这时时局已经急转直下，轴心国崩溃即在眼前，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也已指日可待了。

那时巴金已搬到沙坪坝，借居在朋友吴朗西家中，因为萧珊怀孕，需要休息，再也不能让她住在楼梯下那个小房间了。恰好8月14日早晨，从广播中传来日本天皇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八年抗战，人民备尝艰难，胜利喜报传来，举国若狂，重庆更是彻夜灯火通明，欢声震天动地，街上男女老少，不认识的也拉起手来跳舞。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人来人往，朋友们奔走相告，比办喜事还要热闹。巴金和萧珊也和大家一样，禁不住热泪盈眶。特别使巴金高兴的是，能和阔别五年，长久不通音讯的三哥尧林会面了！他当天就拍了个电报到上海，问候三哥的近况及朋友们的安全。三哥回电来了，说他大病初愈，而陆蠡却下落不明。这使巴金说什么都要及早赶回上海，探问究竟。哪知重庆所有交通工具都被做官的人抢去搞“劫收”（接收）了。那些抗战“无功”的人，却只有瞪着眼睛看人家飞来飞去。巴金没奈何，只好把萧珊送到成都老家，让她住到继母那边去，以便生孩子时有人照料，自己就在重庆等着，看有没有飞机票，或轮船票。好不容易听说长江轮船有两张铺位，就又把萧珊从成都接了回来，哪知这是一只非常小的火轮，铺位无法躺卧，这对怀孕的萧珊是十分不适宜的，巴金只得把她留下，自己先回了一次上海。待他再返重庆时，萧珊临盆的日子已到了，他们的女孩是在重庆宽仁医院出生的。

## 第六章期待

## 第一节胜利时刻

幸福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幸福只属于个人所有，别人无法分享，那只能引起你一点内心的喜悦；有些幸福，则异乎寻常，那是开放性的，人与人之间，心与心之间，喜悦之情可以沟通，可以交流，那是属于全民族的欢乐，整个世界的欢乐，一个人一生中难得遇到的一次、二次的欢乐。说实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在广播中宣布对中、英、美三国的投降，立刻使我们全国人民疯狂了。这是整整八年亿万人民付出血与泪得来的代价。不论在沦陷区，或者大后方，欢乐犹如一颗炸弹在高空中爆炸，使阴雾弥漫的大地，顷刻变得明亮，人们沉郁的脸庞忽然发出光彩，停滞不动的河流，突然跳跃起来。在山城重庆，街上有互不相识的人携起手来唱歌跳舞；公共汽车上，人人都争着把自己心头的喜悦向别人诉说；而千万户的“下江人”家里，则正在为不久能够结束颠沛流离的生活，回乡看劫后家园而欢庆一堂；不少七八十岁的老人为自己一生中第一次碰到这样深入人心、遍及全民的喜事，而感到心满意足，兴奋得终夜不眠……

在民国路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庆办事处，本来就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现在更热闹了，不少作家都来这里互道衷情，探听消息；有的从北碚来，赶不上班船，就在这里借宿，相互了解各人的今后打算。不少人准备回上海，但是飞机票一时买不到，水路船程更遥遥无期。恰在这时，传说毛泽东要从延安来重庆与蒋介石共商国事了。

这些日子来，巴金也比平时更注意看报。他知道自从英美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德国法西斯军队受到左右双方夹攻，它们的死期就不远了；果然，到这一年5月初，他就听到了希特勒服毒自杀和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接着是在重庆蒸笼般的大热天里，传来了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和美国的第二颗原子弹投在广岛爆炸的新闻，这也就等于宣布了日本法西斯统治者末日的来临。而苏联军队开进了我国东北敌占区，和美国的第二颗原子弹投到长崎爆炸，更使日本天皇不得不在广播中向波茨坦宣言作出投降的回响。在这些天大的喜讯不断冲击下，文化生活出版社访客盈门互道庆祝。巴金忙于接待朋友。大家从谈话中无不显露出十分欢愉的心情，在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发出平时很少有的光彩。也就在日本天皇发表《停战诏书》后的第十二天，8月27日的重庆《新华日报》登出了一条“毛泽东同志即将来渝”的“本报讯”，这使许多人感到惊喜，认为中国人民所普遍长久期待的“和平”日子就要来到了。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果然由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张治中陪同，从延安乘飞机来到重庆九龙坡机场，同来的还有周恩来与王若飞。毛泽东穿着蓝灰布中山服，戴着巴拿马帽，微笑地和欢迎者一一握手。他是健康而又愉快的。在欢迎的队伍里，有邵力子、雷震、张澜、沈钧儒、左舜生、谭平山和郭沫若夫妇。他的汽车在驶向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路上，受到市民的热烈关注。他们满怀高兴，用仰望的笑容注视他，并不断向他挥手，情不自禁地喊着：“毛泽东，毛泽东！”他们从心底欢迎他亲自到重庆来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

巴金和其他作家一样，与人民群众怀着同样的心情，把希望寄托在这次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上。当然，他读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他觉得毛泽东这样的一个人理想境地，也许真会通过这次和谈逐渐实现。他在战前早已

尝够国民党专制统治下人民生活痛苦的滋味；八年的战争经历，他更充分感受到“大后方”人民生活的苦难。他迫切希望能改变现状，他相信战后改变现状是完全可能的。他也了解国共两党之间的尖锐斗争，自从1941年春天在重庆抗敌协会召开的一次欢迎周恩来的会上，他与周恩来相识以后，他的心目中共产党的印象逐渐加深了。虽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当时的认识显然还是十分肤浅的，但是确实比过去有了很大的不同，特别是以后与周恩来有了多次的接触，周恩来谈话总说自己是毛泽东的学生，并流露出对毛泽东的敬爱之情，这给巴金以很大的影响。他从周恩来亲切的谈话，热情的循循善诱的态度，感到共产党人的良好作风，及他们与人民之间的亲密的关系。那是国民党大官身上找不到的。他还曾多次听周恩来的演说和谈话。但给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1944年，这年夏天，国民党的军队在湖南打了败仗，衡阳的守军投降了敌人，于是，开始了湘桂的大撤退，湘、桂、黔三省的老百姓备尝艰辛，纷纷逃难到四川来。而国民党却把真实的战情封锁了，谎报“前线节节胜利”，这使重庆的知识分子很不满意，有不少人还因而灰心丧气，但又没有办法，思想上找不到出路。就在这时，周恩来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文学工作者协会理事会，向巴金、茅盾、老舍等作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把八路军抗敌的情况向大家传达了，指出人民军队怎样以少胜多，战胜貌似强大的敌军，让大家在困难的时刻，看到光明。通过一个晚上的恳切交谈，周恩来把乐观主义精神带给了作家、艺术家们。巴金觉得自己正是从周恩来身上开始接触了毛泽东思想。现在听说毛泽东从延安到重庆来了，他像许多人一样，以欣喜的心情，期待着时局的进一步明朗。

9月1日晚上，下了一场细雨，炎热的山城气候顿时转凉，人们为心头郁积的闷气消除而感到愉快。这时中苏文化协会正在召开一次富有历史意义的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的盛大鸡尾酒会，会上还庆祝了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主持人是会长孙科，和副会长邵力子。到会的除了一些党政要人之外，还有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夫妇，武官罗由和宋庆龄、郭沫若、茅盾、夏衍、阳翰笙、侯外庐、王芸生等文化、新闻界人士。当时几千市民都兴奋地聚在街上看热闹，大家都想看看毛泽东，因为人多，汽车多，交通都阻塞了，在大门口维持秩序的警察和宪兵，一时都感到为难，中苏友协的二楼早已挤满了客人，孙科、邵力子早在这里做接待工作，宋庆龄、郭沫若也早来到这里，还有冯玉祥、翁文灏、陈诚、陈立夫、张治中、沈钧儒、谭平山等人，也早在相互握手招呼，忽然楼下一片鼓掌声，都说毛泽东到了，一刹那间，守候在楼下的一批客人，已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蜂拥着送上楼来，于是又响起一片掌声。接着是他们与大家一一握手。不少人与毛泽东几十年不曾见面，现在重逢，握手言欢，真是太高兴了！冯玉祥两手握着毛泽东的手，随后举起酒杯，说：“您来了，中苏友好条约缔结了，让我们为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实现而干杯吧！”毛泽东也露出感动的神色，高兴地一饮而尽。这次盛会虽然很热闹，但被邀请的作家并不多。毛泽东到重庆后，是用分批接待的办法，请各界人士到他下榻的地方——上清寺与他会晤的。几天之后，巴金、老舍、胡风、邵荃麟、傅彬然五人一起被邀去上清寺，当人们把刚满40岁的巴金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握着巴金的手笑着说：“啊，巴金先生，听别人说你年轻时也信仰过无政府主义，是这样吗？”巴金说：“是呀，听说你从前也是！”毛泽东笑了，他说：“是的，那时我们对什么都感兴趣。”巴金又问毛泽东，知不知道匡复生？毛泽东说：“匡复生是个

教育家。”这时有人插话就把话题扯远了。

他那亲切的，一见如故的谈话，把巴金这几年从周恩来所传神给他的毛泽东形象，更加具体化了，他感到兴奋和愉快，并觉得站在他面前的那个传奇性的人，正是人民的领袖，因而增加了对他崇敬的心理。巴金从小痛恨封建等级制度，他像他的母亲一样，一向同情下人，怜惜穷人和弱者，而对恃强欺人的暴力统治总有反抗之心。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接受了民主主义思想，这使他更加看不惯官僚老爷作风，而他在国民党统治的社会里看到的，多是一些利用权势，发国难财作威作福的老爷们；老百姓却在受苦受难。而在共产党那边，他通过对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认识，觉得他们都是与普通人一样，和大家心连着心，非常可亲。而且许多事情，他们的观点与他的想法，非常接近。当然，当时巴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站在他面前，脸带笑容的人，二十年后会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给全国人民带来一场大灾难。

过了一个月，重庆人民为胜利来到而兴奋的热潮过去了。除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人们买到飞机票，已提早离开山城，奔赴各地去搞“劫收”之外，其他好像还是和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一天傍晚，天色渐暗，而街灯却亮不起来，这是因为“修理锅炉”，全市停电。地面则因早晨下过一场雨，变得十分潮湿难走，气候也忽然转寒，冷气袭人，这使在路上行走的巴金禁不住连打了两个寒噤。这时，他忽然发觉自己来到了胜利大厦附近的街上，那正是一个半月前人们曾在这里狂欢的地方，而现在却出奇地冷静。在昏暗中，他看见一些行人急着赶回家去，周围显得十分凄凉。不过四十多天时间，当时人们聚在广场上笑着，跳着，叫着，唱着，打鼓的打鼓，放鞭炮的放鞭炮，跟着挂灯结彩的吉普车跑路的小孩，显露着笑脸的大人和老人，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巴金忧伤地回忆着，却在这时，有个老太婆伸出一只枯瘦的手到他面前，向他发出哀求：“先生，我们从桂林逃难出来……”巴金向长衫袋里摸钱，却没有找到一张钞票，他感到非常羞窘，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加快步伐向前行走。接着，却听见有两个人在对话，一个说：“你哪天走？”另一个说：“走不了，船票哪有我们老百姓的份？”一个说：“想办法吧，当黄鱼行吗？”另一个又说：“不好当，我有两个亲戚一上船，就给抓出来了！”那个只好叹气：“唉，怎么办呢？我下个月再不走，就要饿饭了！想不到胜利是这么一回事！”

这两个人的对话，特别是最后的一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在巴金头上，他感到寒冷。这使他想起有一次一个朋友的谈话，这个朋友说：“胜利只是一个开始，它并不是结束。它并不会给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相反，它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问题。现在决不是应该欢笑的时候。”

对眼前形势这样清醒的认识，使巴金以后不再像刚在胜利来临时那样盲目乐观。他在暂时无法买到飞机票回沪的期间，重新开始写他的长篇小说《寒夜》。但是也正当他开始执笔写的时候，一个机会来了：中国旅行社的一个朋友为他设法买到了去上海的长江轮船船票。虽然这时萧珊已经怀孕，但估计她的临盆期还在一个半月后，为了急于想了解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陆蠡的下落，和三哥李尧林的病情，巴金终于还是先回了一次上海。

他到上海是当年的11月1日，离胜利消息传出来的时候还不过两个多月，但国民党的上海接受大员已经把上海闹得天翻地覆，给在沦陷时期吃了四年亡国奴苦头的上海人民，又带来了新的灾难。巴金一到霞飞坊59号家



里，看到了三哥李尧林，只见他脸色苍白，形容枯槁，病倒在床上。问他是否一直这样躺着，他却说他才躺倒两天，病势不重；不像上次患的肋膜炎，症状凶险，幸亏邻居索非一家帮助照料，总算度过了难关。当晚，兄弟两个人睡在三楼同一间屋子里，尧林兴奋得话都说不完，巴金也以能看到三哥是他这次回沪最大的快乐。但是他看到三哥瘦得可怜，还是劝他少讲话，建议他以后再花两个星期的时间，把话分几次讲完。三哥觉得自己身体还不错，巴金看到他精神振作，每天早上量好体温，总是高声说“好多了，好多了”，也就相信，估计只要好好休息，增加营养，三哥的健康可以恢复。

这时朋友们知道巴金回沪，来看他的人渐渐多了起来。首先是他去文化生活出版社找到了一些熟人，追问陆蠡失踪的经过。1941年巴金在成都时就听到陆蠡遭到敌人逮捕的传说，到了桂林又听说他入狱后下落不明，以后一直打听，总是得不到确实的消息，有时朋友们见面，在静夜里围着一张破旧旧桌子，又难免谈起这个忠诚老实的朋友，为这个痛苦的传闻而焦急不安，总以为抗战胜利后，他能从狱中放出来。但是直到现在，还不曾见到他的踪影。后来吴朗西从留在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人员吴培炘那边听说，“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本侵略者进入了上海租界，受日方控制的捕房派人到福润里出版社来逮捕陆圣泉（即陆蠡），但是他们没有找到他。陆蠡得知消息后，就去找朱洗商量。朱洗是法国留学生，他相信法国人可能同情我们。陆蠡也认为如果他不出面，可能累及旁人，已经受到抄查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可能损失更大，就自己跑到法捕房去讲理，不料他到了法国捕房即刻就被移交给公共租界中央捕房特高科，这样就等于进入虎穴了。当晚9点钟，社里同事吴金堤、朱洗、吴培炘带了点心去看陆蠡，陆蠡似乎神色安详，但敌人却不许他讲话。此后就再也没有看到他。只听说他被转解到日本宪兵队，虽多方营救，再没有确实消息了。”当时巴金连这样的经过，都不曾听人谈起，他只听见有人传说，陆蠡被捕后，口供强硬，他承认他自己是爱国者，对敌人说，汪精卫是汉奸，“大东亚战争”必然失败。敌人就把他杀害了。

巴金回想到他和陆蠡、朱洗在过去一个时期曾经聚在一起，他们在书店客厅里往往谈到夜深，有时甚至谈到宵禁的时间来临。陆蠡虽然貌不轩昂，语不惊人，却总是埋头工作，不求人知。他的朋友不多，但如与他结识，他总是披肝沥胆地忠诚待人。他很有写作才能，写出东西却不肯轻易发表。巴金认为他自己活着这么多年，认识了不少的人，但像陆蠡那样有义气、无私心、为了朋友甚至可以交出自己生命的人，还是见得不多的。他对陆蠡下落不明，感到非常悲痛，他希望有一天陆蠡能出人意外地回来，但看来这个希望越来越少了。

他在这次回上海的一个多月时间中，为了找寻陆蠡，问了不少人。那天，和他住在一个弄堂（霞飞坊）里的夏丏尊来看他了，夏是个长者，开明书店编辑业务的主持人，战前《中学生》杂志和《新少年》半月刊的社长，也是意大利名著、当时畅销书《爱的教育》的翻译者，他与巴金虽然过去来往不多，但他主持的开明书店曾编辑出版了巴金的许多作品，巴金对他是非常感谢的。这次来看他，因为他们经过八年抗战，都有不同经历，夏丏尊在上海长期蛰居，洁身自好，但在抗战胜利前一年，也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过，同时被捕的还有许广平、柯灵、李健吾等作家。夏丏尊问了“大后方”一些熟人的情况，接着巴金也谈起陆蠡的下落不明。夏丏尊说，一进日本宪兵队都难免受到敌人的刑罚，侥幸不死的大都受到刑伤，他与其他几个作家都没有例

外。巴金见他身体不好，脸带病容，知道他在沦陷时吃了不少苦。谈到胜利后的眼前情况，夏丏尊和巴金一样，对国民党都不抱什么希望。他在巴金家坐了一个钟头就回去了，这是巴金见到这个老人最后一面，因为第二年4月间，巴金还在重庆，夏丏尊就去世了。据说他逝世时，曾对开明书店的同事和老友叶圣陶慨叹说：“胜利，究竟是谁的胜利！”

巴金在这时期对筹备恢复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业务，作了一些部署。但也就在这时，三哥尧林的病势加重了，虽然巴金曾千方百计为他增添营养，订牛奶，搞鸡汁，甚至为他奔波到处想办法弄到“新会橙”，但是尧林体质还是一天不如一天，对这一点，巴金起初并不曾注意到，因为尧林自己一直说他的身体还不差，后来有个朋友提醒巴金，要他劝说尧林住进医院去，巴金对三哥劝说了几次，但是尧林还是不接受，后来拖延不了，就说：“过两天再说。”巴金不忍勉强三哥做他自己所不愿做的事，就又只好让他拖延了两天。最后尧林自己也觉得不行了，承认“这几天连起床大便，都没有气力了”，这才让巴金把他送到了一家环境比较幽静的医院里。这家医院的病房，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面前的花园；关起房门，屋子里没有一点声音。这样的环境虽然很符合李尧林爱静的性格，但他已再也没有多余的时间享受这样的生活了。尧林在病房里只静静地躺了七天，有一个晚上，巴金整夜陪伴着他，怕他寂寞，或者需要什么；当巴金守在他的床前，校改小说《火》的校样，到了半夜，却听见他说：“没有时间了，讲不完了。”巴金问他要讲什么，他说“有很多话要讲，只讲给你听”。巴金劝慰他，要他好好休息，他叹口气说：“来不及了。”好像不认识人似的，翻了一翻眼皮，又闭上了眼睛。第二天早上就又清醒过来，好像并没有什么病痛似地既不呻吟，也不叫喊，像平时为人一样，一点没有什么要求似的，一边说着“蛮好”，一边就这么睡着，非常沉静。但是就在两天以后，一个早上，医院忽然来了电话，一个在那边轮值陪夜的朋友对他说“三哥完了”。巴金站在电话机旁竟一时愣住了，他万想不到三哥会那么快离世。等他赶到医院，只见病房的门没有关上，护士、工人在来来往往进出着，尧林在床上已让人们用白色被单盖上了。巴金把三哥头上的面纱揭开，只见他的脸又黄又瘦，想不到一夜之间竟老了那么多。

巴金流着泪把尧林的遗体移到上海殡仪馆入殓。来向三哥告别的朋友不多，大都是这几年在上海认识的友人。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担任英文教员十年，一些了解他的同事和青年学生这时都不在上海。巴金想起廿二年前，他与三哥一起从成都出来，三哥一直关心他，即使在生活极度困难的读书求学期间，也总是把自己做家庭教师得来的仅有的几个零用钱，分给他使用。三哥毕业后，找到了职业，这时大哥服毒自杀了，他就主动地挑起维持老家生活的担子，按月寄钱到成都去。生活把他压得透不过气来。看电影是他寂寞的生活中仅有的乐趣。他没有结过婚。战前巴金曾到天津关心三哥的成家问题，而他总是说：“这有什么办法。”他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的多。1939年他从沦陷了的天津逃到“孤岛”上海，巴金原想让他安安静静地就此休息几年，哪知他勤奋地从事翻译工作，译了冈察洛夫的长篇《悬崖》，一部中篇小说《阿列霞》，一本三幕剧《战争》，一本法国通俗小说《无名岛》，还留下两部未完的译稿，——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和威尔斯的长篇小说《莫洛博士岛》。巴金觉得三哥像一根火柴，给人带来光和热，而自己却卑微地毁去。三哥教书教了十年，许多学主都在背后敬爱地谈起他，感激他

对他们的循循善诱，精心培植，而他却一无所求，从不惊扰他人悄悄地离开这个世界。

巴金把尧林葬到虹桥公墓。尧林生前曾在上海智仁勇女子中学兼课，五个学生在他墓前种了五棵柏树。巴金在墓地周围徘徊了半天，他感到寂寞。他不能忘记善良的三哥给他的印象。他记得上次在离开“孤岛”上海去昆明时，三哥把他送到驶往海防的轮船上。船开了，他站在甲板上向三哥挥手，三哥在岸上微笑，而站在三哥旁边的还有另一个人，这就是陆蠡，他也向着巴金微笑。而现在，仅仅不过五年时间，他们两个人都离开他了，永远也见不到他们了。多么匆促的手足之情，多么短暂的友谊！但是他们的为人，他们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还要多的无私的情操，是多么使人难忘！

在把尧林遗体葬到公墓以后的第三天，巴金就离开上海，重又赶回重庆。在旅途中，他回想这一个月在上海的生活，感到悲哀、惆怅，又十分疲劳。而到了重庆，萧珊已经住进重庆宽仁医院，临盆在即。12月16日，他们的女孩出世，明亮的眼睛，惊奇地望着世界，一半像她父亲，一半像她母亲，这使巴金和萧珊都非常高兴，但是巴金还是忘不了他的三哥，他把这个女孩叫“小林”，为的是纪念尧林。同时他还给她个学名，叫“国烦”。

这时中国老百姓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确都处在国事纷乱的烦恼之中：国共两党的会谈纪要“双十协定”刚刚公布，三天以后人们就发现蒋介石正向他的部下发布“剿匪”，要他们“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册》，督励所属，努力进剿”。接着，何应钦在广州召开“剿匪”会议，声称：“国共现虽进行谈判，但绝不能因此对共产党有丝毫宽恕，今后对广东方面之共匪必须彻底肃清，一个也不许放掉”。11月间，他又来到北平发布紧急命令，命令他的军队分兵三路，进攻张家口、承德、沈阳。隔了一个星期，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策划在六个月内击溃八路军、新四军主力，这就引起重庆廿七家杂志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不要内战！”并要求美军退出中国。重庆的工商、文艺各界也派出代表五百多人举行反内战大会，当场通过成立反内战联合会。12月1日，昆明各大中学校学生举行反对内战的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宪警武装镇压，教师学生多人被枪杀。巴金和郭沫若、茅盾等十八人联名致电昆明各校师生，为反内战中被难烈士表示悼念……

就在这样一个时刻，周恩来又和叶剑英、吴玉章、邓颖超、陆定一组成中共政协代表团，再一次由延安乘飞机来到重庆，参加即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共政协代表团提出三项办法提交国民党政府代表：（一）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二）凡与避免内战有关的一切问题，均应于军事冲突停止后，经和平协商办法解决；（三）在政治协商会议指导下，组织全国各界内战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内战区域实地考察，随时报告事实真相。

1946年的新年来临了，国共谈判代表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获得了一致的意见。不久，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到1月底会议结束，通过了关于军事、宪草、和平建国、政府组织和国民大会等各项问题的决议。看来似乎局势比较稳定了，但是潜在的矛盾并没有消除，相反，斗争更尖锐，更复杂，更隐蔽了。蒋介石密令国民党军在停战令下达前，抢占战略要点。于是以承德为目标，分三路向热河进攻。正当重庆二十多个人民团体一万多人在较场口集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时，国民党派特务五六百人捣毁会场，并打伤大会主席团郭沫若、李公朴等六十余人，许多人还遭到逮捕。

较场口事件引起全国人民愤慨，“要和平，反内战”的呼声在各地普遍响了起来。

有一天晚上，周恩来又应邀到重庆张家花园文协来向大家讲话。这次他介绍的是延安文艺工作者怎样为工农兵服务。他举出了一些重庆文艺工作者所熟悉的作家名字，讲他们怎样和劳动人民接近，到农村熟悉农民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心灵，自己怎样改变思想，写出了为群众所欢喜的作品。周恩来讲的事情，重庆的许多文艺工作者过去都不曾听说过，他们觉得非常新鲜，也很向往有这样一个环境，有一天也能使他们自己与劳动群众在一起，心连着心，然后写出自己过去从未接触过的题材的作品。他们嫌弃眼前苦闷的生活，迫切要求改变现状，所以会场内虽然被邀请听讲的人数不多，但大家思想很集中，场内很静，大家几乎全是屏息静气听着的。巴金没有例外。他从少年时代就追求有一个“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现在，与劳动人民共同生活，这就意味着没有等级，没有贫富悬殊，没有人被奴役，没有人被欺凌，这很符合他的理想。他从心底里被周恩来所描写的解放区知识分子生活所吸引住了。同时，他也从周恩来的介绍中，了解到这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他特别从周恩来所谈到的欧阳山写《高乾大》的事迹中受到感动，他觉得他的老友欧阳山走的路子很新，他很怀念他，虽然他好久没有见到他了，但何其芳、刘白羽从延安来，他们也是巴金的老朋友，他从他们的身上，看到毛泽东文艺思想对他们的影响。巴金觉得自己的眼界开阔了许多，他很想丢开他写惯了痛苦生活的笔，同旧的生活决裂。

周恩来的讲话绪束，夜已经很深了，虽然重庆的夜幽黯而惨淡，但这一夜巴金的心头却充满了温暖，他怀着尊敬的心情陪着周恩来走上张家花园通大街的一级一级的石板坡，当时周恩来披着一件旧的黑大氅，慢步走上山坡，巴金想到白天听人说中共代表团可能在最近由重庆到南京去，就问他何时成行，周恩来说他明天就走，还说国民党对谈判毫无诚意，然而还是要谈下去，这样可以向人民揭露他们企图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巴金说：“斗争很艰巨，希望多多保重。”周恩来却满有信心地说：“只要坚持斗争，人民一定胜利。”说完，他跨上最后一个石级，与巴金打了个招呼，就同陪他的那个同志一起上车走了。

巴金看到周恩来上车离开，他在黑暗中突然感到非常孤寂。那是 1946 年 5 月 2 日的一个夜里。第二天傍晚，重庆的晚报就登出了一条快讯：“中共代表团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廖承志、秘书长齐燕铭、王炳南、《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等及随员四十五人由重庆飞抵南京。”

这个时期，在抗战中来重庆的“下江人”，已陆续分批返回长江下游的各大城市，重庆的人口锐减。化龙桥边再也不是前些时候载歌载舞、爆竹连天的景象了。

过了半个月，巴金也离开了重庆。这不仅因为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正需要他去重整旗鼓；而且他的萧珊也已经在 4 月底带着他们的女孩小林先回到上海。霞飞坊 59 号的三楼和亭子间正空着，等待着它们的主人去建立一个新的家庭。

## 第二节在上海定居

巴金这次回到上海，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庭——除了他自己，还有他的爱人萧珊，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小林，——那比过去在上海作单身汉时代，当然感情更有所寄托了。虽然，这时在战前常在一起的好朋友，已有不少人离开了上海，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经常相聚在一起，相互谈笑，一起工作，一起谈论时局了。黎烈文、索非已远去台湾，黄源早去苏区参加新四军，曹禺、老舍则赴美国讲学。章靳以在重庆复旦大学教书，眼前还来不及随校返沪。只有郑振铎、许广平、李健吾、唐弢等几个战前熟人，在抗战时期一直蛰居在上海，现在终于久别重逢。郑振铎在沦陷期间，从不公开露面，却暗中为保护国家文物，免被敌人劫夺，做了许多工作；1945年12月，抗战胜利后的第四个月，在郑振铎主持下，成立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那天巴金还不曾返沪，但大家仍把他选为理事。那天的会是在江西路金城银行六楼举行的。会场是由在金城银行工作的诗人王辛笛介绍的。会议的主席是郑振铎，他说：“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的名称，因抗战已经得到胜利，已通知把‘抗敌’两字取消。在抗战中，文协的总会做了许多工作，成绩很大，我们上海分会由于上海处在敌占区，所以到现在才成立，今天许多人从战场上和大后方回来，与备尝沦陷之苦的上海作家、艺术家重聚一堂，互相慰问，好像一家人破镜重圆，情景是非常使人感动的。我们上海作家中如许广平、夏丏尊、李健吾、柯灵等，都遭到过敌伪逮捕，审问拷打，吃了不少的苦。其中陆蠡被捕后至今还生死不明。这种苦楚，在后方的作家们也许并不知道；而后方作家几年来颠沛流离，也恐为上海作家所不能想象。‘文协’在抗战中最大的好处是它不分派别，团结对敌。这样的精神，今后还要贯彻下去，因为它在各地都有分会，包括延安在内。这是一个足以表示团结的组织。现在已有十几个会员从重庆回到了上海，不久可能还要增加，将来上海有可能要成为总会。我们要做的事，最要紧的是对内谋国内和平团结，反对内战；对外谋世界各国的和平团结，反对待强凌弱。”这次到会的有六十多人，其中被选为理事的，除了郑振铎和巴金，还有许广平、李健吾、柯灵、唐弢、夏丏尊、夏衍、于伶、顾仲彝、赵景深、张骏祥、叶以群、葛一虹和姚蓬子。其他到会的，还有徐调孚、王辛笛、佐临、郭绍虞、顾一樵、蒋天佐、凤子、孔另境、杨绛、索非、赵家璧、魏金枝、朱雯、师陀、唐纳、钱君匋、周建人、崔万秋等，他们中有的被选为监事，有的被选为候补理事。

上海文协成立不久，即1946年初，在上海经营钱庄的刘哲民，因为与柯灵在抗战时期患难相共的良好友谊，战后就接受柯灵的建议，办起了一个“周报社”，由柯灵邀请他的老友唐弢一起主编《周报》，受到群众很大的欢迎。后来就发展成为上海出版公司。这家出版公司在陆续出版了诸如唐弢编的《鲁迅全集补遗》、景宋的《灾难前后》、郑振铎的《蛰居散记》、钱钟书的《谈艺录》、柯灵、师陀合著的《夜店》等书之外，还另外创办了两本刊物。这就是施蛰存、周煦良联合主编的《活时代》和郑振铎、李健吾联合主编的《文艺复兴》。郑振铎、李健吾主持《文艺复兴》编辑工作，虽然并不拿工资，但是他们为了想把上海三十年代文艺事业兴盛局面恢复，在组稿工作中是很努力的。他们在创刊号上不但自己动笔写稿，组织到茅盾、杨绛、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郭绍虞的论文，而且把巴金的长篇小说《第四病室》连载了。上海读者与大后方作家隔绝八年，渴望能读到战前在上海的一些作家的新作，

特别象巴金这样作家的作品。所以，《第四病室》一经刊出，《文艺复兴》创刊号像《周报》一样，顷刻被抢购一空。但是，巴金原答应《第四病室》让赵家璧新办的晨光图书公司出版发行，而且赵家璧已经在重庆打好纸型，准备运上海印刷了，巴金没有想到自己的原稿让一个朋友顺便带到上海后，会在《文艺复兴》上开始连载，因而赵家璧一到上海，了解到这件事，就向郑振铎、李健吾两位老朋友打招呼，请他们中止连载，因为全书即将在上海印行，继续连载就不好了。巴金回沪才知道事情经过，觉得很对不起《文艺复兴》读者，便答应李健吾，要将自己已在重庆开了头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寒夜》赶写出来。

他几乎把1946年下半年每个晚上的时间都用在《寒夜》的写作上。那个时候，人们在抗战胜利初期满腔欢腾的心情已经消失了，接着看到的是接收大员的耀武扬威，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投机奸商的丧心病狂，和哀哀小民的忍饥挨饿，卖儿鬻女。上海市场一片混乱，人民日益不满。7月初的一个深夜，巴金从梦中被孩子的哭声吵醒，看到萧珊把孩子从小床上抱起来喂奶，过后孩子又睡着了，萧珊也又重新入睡。但巴金却再也睡不着，他起床站在窗前，望着窗外已经完全进入睡眠状态的弄堂，忽然被一种思绪所困扰。他记得六年前，上海还处在“孤岛”时期，当他把《秋》赶写完毕，决定离沪的时候，他也曾在一个月夜望着这条弄堂，那时他对现实是抱着多么坚强的信心，虽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已经把魔爪伸到我们祖国大陆的心脏间，他也有满腔悲愤，只是希望之光还在他的眼前照耀。而现在八年抗战得到最后胜利，自己又回到上海原来住的地方，而希望却又到何处去了？他感到困惑，一种无可奈何的失望心情使他痛苦。就在这静寂的夜里，他忽然隐约地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哭声，那是老人的，也是青年的，更是妇女的哭声，好像到处都在向他提出抗议：“八年前，你要我们寄托希望，相信未来，要我们把一切都贡献给抗战事业。可是现在胜利了，希望在哪里？独立、民主、自由又在哪里？你骗了我们，骗了我们！”巴金听到耳边这样的责问，警觉到那是一些在抗战中牺牲受难的人们的哭泣，那些在战时被炸弹炸掉了手和脚，甚至头颅和身躯的人们的哭泣。他感到浑身打颤，却无法回答这些冤魂的提问。眼前，坏人享乐，好人受苦，物资为少数人掠夺，而多数人却一切都感到缺乏。官僚发大财，投机家获巨利，汉奸摇身一变成为巨商大贾，甚至重又登上官场，捞取人民血汗，这是使人多么悲愤的世界！他想到这里，感到十分痛苦。他反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还不站起来，揭露黑暗，争取民主，独立和自由；为什么我们只躲在黑暗里伤心哭泣？”这时，他忽然听到远处鸡鸣，原来天已快亮了。他开始摊开稿纸，把半年多前曾开过头的长篇小说《寒夜》，重又执笔写起来。当时正值盛夏炎暑，上海天气非常热，他长了一身痱子，苦不堪言，但是仍坚持不辍地写下去，一直写到这一年冬天。

《寒夜》里的人物，对他说来是十分熟悉的。不论是汪文宣，还是汪文宣的妻子曾树生，或者是汪文宣的母亲，他们在他的生活里早已存在很久了，他确实非常熟悉他们：汪文宣在大学念教育学时，在他的脑海里充满着他自己对现实的理想。从他善良的意愿出发，他准备救人济世，使人们普遍得到幸福。但是一进入社会，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这里是官僚和资本家当权的世界，是投机家的乐园，阴谋家的竞技场，一个忠厚的知识分子很难找到出路，只有在这里沉沦。他的生活越来越苦，地位越来越低，从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技能在这里并没有用处，这里却另有一套“知识技能”需要学会，

这就是怎样钻营，怎样排挤别人，怎样爬到别人头上，啃别人的骨头。而汪文宣在这方面一点本领都没有。为了求得一家有口饭吃，他逐渐变成一个胆小怕事、只求苟安、见人低头、甘受欺侮的小公务员。原来的“理想”烟消云散，最后落得患肺病、失业、咯血而死。他的妻子曾树生也是教育系毕业的大学生，同样也有自己的理想，也想“为教育事业献身”。但是一进入这样的社会，她只有靠自己的美貌在一家银行里被人家作玩物，充当“花瓶”。这不是她的志愿，她也不愿这样生活下去，但为了挑起养活一家人的半个担子，她又不得不这样做下去，她只怨她丈夫没有用，但又可怜他老实，恨他不给她“自由”。但当她离开了丈夫，以至丈夫因贫病死去，她的“自由”来了，却仍无法得到“自由”的快乐。这就是她面临的社会。她的婆母也是好人，但是她对能挑起半个家庭的担子的媳妇，却恨之入骨。她看不惯曾树生花枝招展地打扮去侍候她的上司，但又无法不用媳妇的工资来养活一家人。她们两人的矛盾集中在汪文宣身上，使汪文宣在社会上所受到的痛苦之外，再加上家庭中所受到的痛苦，双重的压迫使他不能不向命运老人交出自己的生命。一家四口人（一个是十三岁的儿子），个个都是好人，但是社会给他们带来矛盾，带来悲剧。这就是抗战胜利来临前的社会，这就是寒夜，这就是“的确太冷了”的重庆寒夜。

这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是继战前茅盾《子夜》出现后，我国长篇小说艺术的另一个高峰，也是巴金本人不论从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圆熟阶段的卓越之作。它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无疑是个巨大的丰碑。它是怎样完成的呢？在完成过程中，巴金曾想起一些什么呢？

他写这部作品的生活基础，就是他亲身所经历过的重庆寒夜，“富人享福，穷人受欺”，他对这个社会太熟悉了。甚至汪文宣一家四口人住的地方，也就是当时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所在的那幢大楼，巴金住在楼下，汪文宣住在三楼。整个故事的发生，发展，结局，都在巴金生活的周围。故事开头的写作，也正是在巴金所住那间有老鼠臭虫肆虐的楼梯下的小屋中。回到上海，在霞飞坊59号三楼继续写这部作品时，虽与重庆民国路这幢大楼离得远了，但几年来“寒夜”生活的深刻体验并不曾在他的脑海里淡忘，街上的那家冷酒馆，街角的那家咖啡店，以及附近的“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对他的印象还是十分深刻。而汪文宣，这个人物他更是非常熟悉。他觉得汪文宣有时像是那个在正中书局工作过的散文家缪崇群，有时又像在临死前还在追求“生的欢乐”的自然科学家陈范予，有时则像拄着拐杖走路的小说家王鲁彦，他们都是他非常亲近的老朋友，虽然他们生前的经历与汪文宣并不一样，但他们的生活，他们所走的坎坷道路，却是这样的相似。他们都是善良的知识分子，有善良的愿望，但在社会上却受欺凌，受压迫，为生活所逼，走投无路，最后都不免患肺病咯血死去。巴金甚至有时以为汪文宣也有他自己的影子，他想如果他不是因为有些机缘，使他从事现在那样的工作，他也完全有可能后来变成汪文宣这样的人物。因为汪文宣这样的人在当时社会里太多了，他生活中所产生的矛盾，和他悲惨的结局，是当时知识分子普遍的命运。

巴金写这部小说，写得很快，也写得非常顺利，比写《火》的三部曲不知痛快多少倍，好像小说里的人物与他在一起生活，一起流泪，一起叹息。每个晚上，他总觉得自己又回到重庆的民国路上，他看见人们因物价飞涨而愁丧了脸，因生活苦闷而不断喝酒，因心境恶劣而借细故发脾气，吵骂，打

架，自杀……

《寒夜》是在1946年8月出版的《文艺复兴》第3卷第1期开始连载的，当时是边写边登。1946年12月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就把《寒夜》写成。因此，1947年1月出版的《文艺复兴》第3卷第6期也就把这部长篇连载结束了。

当时，许多作家、艺术家包括巴金、叶圣陶、靳以、肖乾等人在内，已经从重庆等地陆续回沪，其中还有曹禺和老舍。他们两人离国赴美前，上海文协曾在福煦路（即今延安中路）九星大戏院召开了一次上海文艺界欢送他们出国的大会，在大会上他们两人都作了一些富有感情的讲话，老舍的话更是嘻笑怒骂，生动幽默，对鼓动内战、压迫人民的反动派进行了无情的讽刺。

老舍在抗战时期一直是主持文协工作的驻会代表，他在重庆与巴金也是相处得很好的朋友，在巴金的长篇小说《电》出版时，他曾写过一篇评论文章，肯定这部小说的人物“像水晶一般的透明”，文字“非常利飏，清锐可喜”之外，其中还曾谈到他与巴金的友谊，他说：“巴金兄是个可爱的人。他坦直忠诚，脸上如是，心中也如是。我只会过四、五次，可是第一次见面就使我爱他。他的官话，要是我给打分数，大概过不去六十分。他匆匆忙忙的说，有时候我听不明白他的话，可是我明白他话中夹着的笑；他的笑是那么亲热，大概无论谁也能觉到他那没能用话来表现清楚的一些热力，他的笑打入你的心里。”在巴金的女儿小林出世时，老舍知道巴金还给她按着大家庭的“火”字排行取了个名字叫“国烦”。老舍为此给巴金直率地提了意见，他说：“国烦，国烦，好难听，国家的事儿已经够叫人烦躁了，你还给孩子取那么个名字！”巴金接受他的意见，所以后来巴金和萧珊对那女孩总把“小林”叫上口，不大用“国烦”那个名字了。

巴金对这些离沪的老朋友，都忘不了他们对他的美好的感情。不仅对老舍、曹禺，他也想念当时去了台湾的周索非、黎烈文，以及曾经在法国一起度过两年留学生活的老友吴克刚。大家知道，当时我们刚把台湾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收回，那边需要大陆大批知识分子前去参加建设。这些知识分子都是本着热爱祖国、热爱建设事业的无可非议的真诚的心，前去这块脱离祖国已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土地参加各种工作的。

索非是巴金青年时代的朋友，他从法国回来后，一直与他住在一幢房子里，在上海几次迁居，都不曾把他们分离。在他战时离沪奔赴“大后方”的时候，索非夫妇一家一直为巴金照料着病中的三哥李尧林。当尧林在医院去世时，索非夫人还由此失声痛哭，巴金感谢他们夫妇对他们兄弟两人的长期照顾。他衷心期望他们的家庭得到幸福。但是不幸的是索非夫妇去台湾后不久就离异了，巴金曾为此感到难过。

去台湾的另一个朋友黎烈文，则是巴金在1933年夏天认识的。那时黎烈文在编《申报》的《自由谈》副刊，托人向巴金约稿，巴金以后也就成了它的作者，并由此与黎烈文相识。当1935年12月巴金从日本回国，从事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工作的时候，黎烈文也就成了《文学丛刊》和《译文丛书》的组稿对象。他们两人的感情和共同的语言，是建立在对鲁迅的一致尊敬上。而历史也将证明他们的业绩。正是由于巴金、黎烈文及其同伴们如靳以、黄源等人在鲁迅感到“两间余一卒，荷载独徬徨”的时候，他们以自己的认真工作和对工作切实负责的态度，使鲁迅得到安慰，并从他们那里汲取了力量。当鲁迅发觉这些正直的有成绩的青年作家受到不应该有的冷落时，他就出来



支持他们，让他们也有对时事发言的机会。因此，巴金与黎烈文的感情，还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境遇上。他们曾经在鲁迅的支持下，合作起草过《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表达他们热爱祖国，忠于人民的抗日意志；后来他们又与黄源、靳以、孟十还等分头编辑期刊，虽然并不是每个人对各个政治问题都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但是他们所编的刊物《译文》、《文季月刊》、《中流》与《作家》，在当时却都是在鲁迅的旗帜下前进的。黎烈文为了编《自由谈》，发表鲁迅、茅盾和其他进步作家言论，遭到反动派的排挤，编《自由谈》而缺乏自由，最后只好辞职。后来他编《中流》半月刊，又终于与《译文》、《文季月刊》、《作家》一起受到战事的影响，不得不停刊，改出联合刊物《呐喊》。抗战胜利后，黎烈文从福建到台湾，进一家报馆原想重操旧业，哪知没有多久，就又因为要“自由”而得罪了上级，不得不又“自动辞职”，进台湾大学教书。

听说台湾是个美丽的岛屿，同时考虑到文化生活出版社能不能在台湾建立一个分社，巴金曾在1947年初夏，应台湾几个朋友的邀请，去了一次台北。他到了那边，住在老友吴克刚家里，当时吴正在当地担任图书馆长。尽管他们相别几年，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差距比在法国时也许更大，但作为一个善良的人来说，相互之间的友谊是不会忘记的，何况吴克刚也不过是一个图书馆长，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也不真是属于“官”字辈。巴金受到他的热情接待，但住的还不过是一间极普通的房间，吃的也不过一般菜肴，出游也得乘公共车辆。他也会见了另外一些老朋友，如黎烈文和索非，他们的生活境遇自然比吴克刚更差。黎烈文虽名为“教授”，生活却不宽裕，要维持一家每日三餐，他除了教书，还得业余从事译书工作，介绍法国作家的作品，因为他和巴金一样，也到法国读过书，懂得法文，他就在这时把自己译的梅里美的短篇小说集译稿，交给巴金，让他编进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译文丛书》里去。黎的夫人雨田，也是一位能写能译的作家，巴金也经手编发过她的作品。在巴金到台北作了半个多月的客，回沪以后，不久黎烈文来上海，他也住在上海住了将近三个星期，得与一些老朋友重聚，使他后来在回想起来，像有一串记忆的珍珠，挂在他的心灵上，足以使他数述遥远的可贵的友情。他回去以后，不但给巴金写信，感谢上海的朋友们给他以“这次在沪无忧无虑过了三个星期”的旅行；他与巴金经常通信，直到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从未忘怀这个平时很少发脾气的友人，他是这样豁达坦率，这样心无芥蒂，容易相处。巴金不能容忍别人对这样的一个朋友的误解，当然他更反感别人不负责任地给他随意在头上泼污水。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想在台湾设立分社的计划并没有实现，当巴金从台湾回来后，曾又请他的兄弟李济生按着他的脚印去过一次台湾。那是在这一年的秋天，当时正在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庆分社工作的李济生来到了上海，他住在霞飞坊他哥哥家的二楼房间里。这个房间原是巴金的客厅和餐室，日常在这里接待朋友的来访。现在，李济生在这里晚上用行军床搭个铺，把它当作卧室。他在这里先住了一个月，受到他四哥和嫂嫂萧珊的热情款待。一向跳跳蹦蹦天真活泼的萧珊，现在俨然成为上海一个中等人家的家庭主妇，她早上买小菜，中午带领一个保姆烧饭做菜之外，白天还得把主要的精力花在抱小孩上。女孩虽然比较文静，周岁多的婴儿毕竟娇嫩，所以萧珊在她的身上确实花了很大的心力。李济生看到四哥和嫂子在家里过得幸福，心里也感到痛快。他在抗战后期曾在桂林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办事处，湘桂大撤退时，

带了一大批纸型逃难，也该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一个有功之臣，他不但在银行工作过，很有经营管理的本领；而且也有一定的编辑经验，曾与许多作家打过交道。这次他到上海，开明书店的叶圣陶、范洗人、章锡琛还在书店宴请郑振铎、巴金和他三人。席间谈起到台湾开展出版业务，大家都建议济生不妨去看看有没有可能在那边设立个分社。李济生不久去到台北，他像他哥哥那样，晚上在吴克刚家中借宿，白天就到有关朋友处走访办事，发现在这里办出版社首先是难以找到适当的房子；其次，看来当时台北刚回归祖国，当地人民长期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生活，中文书籍对他们当时情况说来似乎还不是十分急需，特别是新文学书籍销路恐不会很大。这样，他回沪后把了解到的实情一谈，巴金他们也就把原先的打算取消了。

李济生去台北时还找过在台湾师范学院教书的张易，向他带去巴金的嘱咐，要他向台湾大学的文学院院长钱歌川打个招呼，请尽量照顾那个原系“部聘教授”马宗融的情绪。因为马宗融那时刚刚从上海去台大任教。他原在重庆复旦大学教书，后来随学校迁回上海，因为同情学生运动，在校务会议上拍桌怒斥学校当局不该让军警进校逮捕同学，结果被学校当局无理解聘。马宗融为人豪爽，爱真理，重友谊，嫉恶如仇，凡是看不惯的事，他就要发议论，而且没有保留，从不计较什么后果，因此不免处处得罪人。在平时，巴金曾经替他担心，因为知道他性情耿直，同其他教授相处并不十分融洽，虽然他在文艺界知心朋友不少，而在学校里他越来越显得孤单，所以曾劝他注意工作方法，一方面支持他为真理斗争，另一方面也劝他对人对事还该从实际出发，分别对待，耐心地做工作。马宗融到了台北，虽然生活还算安定，但他新来乍到，朋友不多，却很关心上海学校的斗争，对现实感到不满，经常借酒消愁，身体变得很不好，偏又碰到台大中文系主任、鲁迅的老友许寿裳在家中被人杀害，他听到这消息，更是悲忿，曾亲赴刑场去看当众处决凶手，回来后又拉着一个好友喝酒骂人。巴金知道后，又写信劝慰他，但远道的友情竟无法解除他精神上的苦闷，他的酒越喝越多了，终于病倒在床上……

那个时期，在《文汇报》担任驻渝记者的黄裳从重庆返回上海。他过去曾寄过一本书稿给巴金，并作了自我介绍。巴金很赏识他的才华，把他的书稿编入了中华书局出版的一个《丛书》里，这就是作者的第一本散文集《锦帆集》。1942年冬天黄裳曾在重庆找过巴金，却没找到，因为巴金到桂林去了。1944年夏天他又去桂林文化生活社看望巴金，不巧又没见到，直到1945年秋天，抗战胜利后，才在重庆见到巴金。他这次回沪见到巴金时，才知道他的老师李尧林已经去世了。黄裳无意中却从巴金女儿小林的侧面，看到了李尧林先生瘦削的影子。

巴金欢喜买书，他有许多共同爱好买书的朋友，如李健吾、唐张、陈西禾、黄佐临等，其中还有黄裳。但黄裳爱买中国古籍的线装书，而已金买的却多是外文版；日书。买外文版旧书的爱好，是巴金在法国和日本时形成的。胜利后到了上海，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不仅在文化街福州路，而且在静安寺和霞飞路一带的许多书摊，留下每次世界政局变动后，外国人离沪时卖出来的大批书籍。巴金买的不仅有英文书和法文书，还有俄文书、日文书和德文书。他的博学，使他的买书范围非常之大，内容除了文学艺术部门之外，还有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和社会方面的东西。他的买书爱好，还影响了他家庭的陈设布局，三楼卧室除了靠后角落里的一只铁床和朝东临窗的一只写字台外，中间全部成为玻璃书橱的领地，人只能在书橱与书橱之间的一个

弯弯曲曲的通道上行走。此外，亭子间也是他堆书的地方。二楼房间则是他的餐厅和会客室，来访的人们常常看见他从三楼把眼镜挂在额上，挟着一本书，嘴里念叨着什么，一步一步走下楼来。

当然，他偶然也买些中国古书。从幼年起，他就开始读旧诗和古文，以至人到中年，对某些古籍还能倒背如流。有时饭后和熟人谈笑，一时兴起，他还能背诵出通篇的《长恨歌》、《琵琶行》之类的长篇古诗，偶尔于谈兴正浓之时，还托黄裳什么人给他买些唐诗选本，黄裳就曾给他买过一本棉纸印的明万历刻本《批点唐诗正声》。

买书是件愉快的事情，但是那时还有一种苦却叫人忍受不了。那就是由于物价飞涨，物价今天与明天不一样，甚至上下午都有不同，这就使上海人民不得不考虑把自己每月工资的收入，一拿到钞票就得上街去兑换成银元，这样才能保值。即使像巴金这样的大作家，为了维持一家生活，在这个时候也无法例外。开明书店给他的稿费（版税）最初是每隔二个月结算一次，后来改为半年结算一次。由于货币贬值，有一次巴金领到稿费，只够他喝两杯咖啡。因此，每次稿费到手，他和萧珊都不能坐视这些钞票贬值，这样，也就学会到霞飞路（当时已改称为林森路），去买卖“大头”（银元），巴金一上街也总要注意一下烟纸店门前挂的银元折合法币的牌价。在料理这些家庭琐务的过程中，黄裳有一次也曾为萧珊做助手，因为物价一天一个样子，到书店领取版税，取到支票，必须立刻到银行里去兑现，然后领到用线绳扎起来的一捆捆钞票，跳上三轮车，再到市场去换成银元，或直接去购买家庭日常用品，这就不能不是日常生活中一场紧张的战斗。

在这些为生活所纠扰的日子里，经常给巴金家日常事务帮助的，还有顾均正夫妇。顾均正是开明书店的老编辑，他曾在三十年代与索非同住在狄思威路的麦加里，因而也与巴金认识。后来他们又几乎在同一时期搬到霞飞坊，虽不在同一幢房子里，却住得很近。巴金每次回家，总要走走过 63 号的顾家后门口。顾均正为人正直忠厚，和开明书店许多老编辑一样，只知埋头工作，而生活过得并不富裕，又总是露着淡淡的笑容，很少为个人生活问题发牢骚。巴金有事找开明书店，常托他带口信去，他总是很负责的把事情办好。他们两人经常见面，但长谈机会却不多。均正夫人则经常出点子帮助萧珊把家务做好。那时有什紧张物资在街上供应，巴金家也常靠均正夫人通知。这时原也住在霞飞坊的夏丏尊已经去世，他老人家临死时曾向老友叶圣陶发出过一声感叹：“胜利，究竟是啥人胜利——无从说起！”这句话已经通过报纸，成为上海人民的共同感叹。顾均正与巴金在弄堂里见面，谈起面临的越来越不像样的市场情景，也不免说一声“胜利，究竟是啥人胜利”了。

### 第三节书的因缘

1947年6月的上海，竟然比夏天的重庆还要炎热，这使巴金感到意外。他身上生满痱子，白天简直无法工作，只好把编书工作也挪到晚上做。这一个晚上，他坐在霞飞坊家中三楼的靠窗桌子旁，一口气看完了卢剑波寄给他的全部稿件，全身不禁微微颤动。

他好像又看到了这个在成都担任教师的老朋友，他那多病的身体似乎比从前更瘦了，想起来他还不过40岁，怎么会衰弱得那个模样呢？但是从他这四五年来的几十篇短文看来，他内在的生命力却是这样坚强，虽然他已经经受了很长时期的精神折磨，在他的生活历程中，曾彼军阀政府拘捕过，也曾为爱情的苦恋受到创伤，而为追求理想与自由燃起来的心火，则从未熄灭。他虽然病弱，却歌颂“生命的欢乐”。他以他对生的意志，征服了死亡。他爱一切生命，甚至“以怜悯的心眼哀矜愚昧与痴顽”；从枯黄的草叶上，他也能看到早晨的露珠，想起自然寄托在每一茎草叶上的爱。

巴金非常敬重这个在贫病中挣扎，而又在追求中坚强如铁的友人，虽然环境逼迫他后来变得像一只封闭在茧子中的春蚕，像一头在沙漠中踽踽独行的骆驼，但他对未来还是充满着希望；他在青年学生中间，看到朝阳带着新生的光与热冉冉上升。

巴金喜欢这样的一个友人和他的文章，他把他寄来的稿件选取了其中的二分之一，在灯下编成一本散文集，书名叫做《心字》，是作者自己起的。

卢剑波是他在1921年故乡成都时就开始通讯的朋友，1923年他们第一次见面，他们曾经有过共同的理想，现在虽然分子多年了，但无私的友谊，如高山流水，永久存在。这种真挚的友情，如皎洁的皓月，点缀在夜空，使巴金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更加庄严和美丽。

巴金为友人编作品集，已经不是这一次了。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为友人罗淑编过四本书：

《生人妻》是巴金在广州烽火连天的岁月中编成的，当时罗淑逝世不久，巴金在“生命犹如庭园中花树间的蛛网，随时都会被暴风雨打断”的情景中，抓紧时间把这个短篇小说集子编进“文学丛刊”里；

《地上的一角》是罗淑原需要整理和加工的小说初稿，但在还未动手加工整理之前，她就患产褥热离世了。巴金曾在逃难途中，在敌机的连续轰炸中，把它一字一句地抄写，因为原稿的笔迹很为潦草，在付排前非把它誉清不可。1939年6月巴全回“孤岛”上海时把它编好，让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鱼儿坳》是巴金1941年3月住在重庆沙坪坝时，在一个细雨如丝的春夜中把它编成的。那是罗淑写的另一个短篇集，虽都是未完成的作品，却渗透着作者对被侮辱者与被受害者的同情。

现在，1947年，巴金又把罗淑的一本译文集《自甲骑兵》交付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那是他在1941年8月就给她编成的。当时他在昆明，天天面临着敌机的轰炸，“是在一种抓彩的情形下过活。我们每天都在抓彩。抓的不是金钱，却是死亡。倘使一旦抓到，则在轰然一响之后，我的心灵就会消灭，我也没有机会来做任何事情了。”巴金是在这样的生活情景下，把罗淑的书编成集子的。而且他每把罗淑的书编成一集，就给它写一篇短序，向读者介绍作者，也向人们推荐作品。

巴金在他的编辑工作中，寄托了他对友人的真挚感情，同时也对读者绝对负责，让他们读到一本书，必有所得。他确实如鲁迅所称赞的那样：“他工作得比别人更认真”。他在上海“孤岛”时期，曾为艾芜编成一本书名叫《逃荒》的短篇小说集，他编书决不仅仅为了个人的友谊，还因为在这时期我们需要读自己人写的东西。

他在编成《逃荒》后的第二年冬天，又在重庆为“曹禺戏剧集”编发第四个剧本《蜕变》。他曾在曹禺的家里住了将近一个星期，几乎每个晚上，都坐在一间楼房里，与作者隔着一张写字台，面对面坐着，在一盏摇晃的清油灯下，进行着长时间的谈话。巴金情不自禁地向作者透露了自己读曹禺作品时的感动。他是曹禺最初三个剧本的第一个读者，从《雷雨》到《日出》，到《原野》，都是经过他和靳以的手送到读者面前去的；这次《蜕变》是个例外，因为它在出版以前，已有个油印本，在各地演出了。但是当巴金读到这个油印本时，他还是像过去那样，一口气读完了它，并掉了眼泪，还毫不掩饰自己的感动，向作者透露自己的愿望：愿意继续担任作者作品的编辑者，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个剧本，让读者分享自己的喜悦。

341

巴金为人编书，不仅仅为了友谊，也不仅仅为了让自己工作着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书，有时甚至纯粹是为了要让自己的感情散发给读者，让读者也与他一样来从自己爱好的作品中有所感受，有所得益。在战时的重庆，他见到了冰心，当时出版界出的书，内容大都有关抗战，这当然是很自然的；但是巴金觉得在书店里买不到像冰心这样的作家在抗战前写的作品，这是不正常的现象。他难以忘记他自己在十几年前曾是冰心作品的爱好者，他十七岁时从成都出发乘船去重庆，经过泸县，还上岸买过冰心的一本诗集《繁星》，和他的三哥尧林一起念诵她的诗句。他们从冰心的作品里，曾重温失去了的母爱，并看到孩子般纯洁的心灵。因此，当他一天见到冰心，他就说她的书应该在内地重印出版。不论是否在战时，冰心的作品都有助于一个人品质的修养。冰心愉快地接受了巴金对她的建议，她本来也是巴金作品的颂扬者，信任他的为人，这时就说：“这事情就托给你去办吧。”巴金受到她的委托，便在几个窗外响着淅沥的雨声的夜晚，对着一盏油灯，怀着激动的心情，重新读了冰心的作品，分成三册把它们编成一部《冰心著作集》，并得到她的同意，交给重庆开明书店出版。他还给它写了一篇“后记”，说他自己固然“是三十几岁的人了，可是世间还有着不少孤寂的孩子。对那些不幸的兄弟，我想把这本《冰心著作集》当作一份新年礼物送给他们，希望曾经温暖过我们的孩子的心这册书，也能给他们在寒冷的夜间和寂寞的梦里送些许的温暖吧。”

巴金为朋友和作家的作品编集子，也为一些素不相识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写的作品，从事编辑校对工作。在战争年代，在上海，在香港，在广州，在昆明，在桂林，在重庆，他都曾接受过一些年轻的作者的要求，成为他们作品与读者见面的媒介人。他从未见到过田涛，只是因为战前曾接到过他寄来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原稿，经他介绍给一家书店而没有下文，几年来他一直把它挂在心头。战争开始了，作者奔向解放区，虽从未接到他的来信催询，巴金还是没有忘记这件事，他不忍辜负作者远道寄稿的盛意，而原先寄来的一部分原稿转给那家大书店又一时无从查询，他只好自己花功夫把作者散发在各个刊物里的作品搜集拢来，有的甚至还要一字一句的誊写成篇，编成一

集，这就是“文学丛刊”第六集中的《荒》。另外一个青年作者屈曲夫，在抗战中失去音讯，下落不明，巴金也怀着十分想念的心情，回忆着他在战前曾为《文季月刊》写稿的印象。他不相信朋友们对屈曲夫的安全作不幸的猜想，他认为得不到一个友人的音讯原是常有的事，总有一天屈曲夫会与大家重逢的。巴金话是这么说，但显然他也并不放心屈曲夫的安全。在深夜，在没有和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翻阅那些旧杂志，重读作者的旧作，禁不住百感交集，无法入睡，他终于给这个青年作者编成一本短篇小说集《三月天》，让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在他主编的一百六十本“文学丛刊”中，这样的青年作者是很多的，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作品集，是作者生平的第一本书。他们都是通过巴金的手，成为有著作出版的作家。罗淑、田涛、屈曲夫等人之外，还有个郑定文，他是上海沦陷时期储能中学的一个办事员，他的几篇小说大都发表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月刊上，而且都在突出的位置上刊出，编者还每次都写“编后”加以推荐，受到各方面的注意。不幸的是在抗战胜利时，他在苏南敌后根据地的一个村子里，因为跳水营救一个同志而牺牲了。他的遗稿经朋友托人交给巴金，巴金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把它一篇篇读完，十分感动，他并不认识作者，也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喜欢这些作品中所写的那一个个平凡的故事，和生活中看来似乎非常细小的一些情节。巴金也十分同情作者笔下所描写的一些小人物的不幸遭遇，同时充分肯定作者的文笔朴素，抒写自然。他立即写信给那个向他推荐作品的魏绍昌，答应为这本书亲自做编辑工作。他在从事编选的过程中，也为作者的短暂一生感到惋惜。他想这样一个有写作才能、又有艺术良心的青年，如果不是在贫苦的境遇中生活，而有个安定的环境，让他自由地写作，他的成就一定会更多。他读着这些优美的文字，为作者编成一本题为《大姊》的短篇小说集。然后他说：“我想到这个我素不相识的作者的短短的贫苦的一生，我真愿意我能够大叫一声。我要叫出我心上那些块垒。”

给予生活在贫苦角落里的青年人以有效的帮助，给予那些无辜受冷遇者，被压迫者和被损害者以真挚的同情，这是巴金一生行动的准则。让每个人都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受教育的机会，有讲话和爱国的自由，有控诉霸者和不受欺凌的权利，这正是巴金所日夜追求的。在他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工作中，在编辑方针和作者队伍的组织上，都体现了这样的精神。

《文学丛刊》的160本作品，它们的作者除了鲁迅、茅盾、王统照、郑振铎、沈从文、鲁彦、冯至等是“五四”时期或稍后于“五四”的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之外，极大部分是三十年代成长的作家，其中主要的力量如靳以、曹禺、李健吾、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肖乾、曹葆华、芦焚、吴伯萧等是巴金在北平编《文学季刊》时结识的；另一些则是巴金通过与鲁迅来往而认识的，如胡风、萧军、萧红、艾芜、何毅天（周文）、沙汀、张天翼、舒群、蒋牧良、欧阳山、叶紫等；另一部分是一些在上海生活较久或与文化生活出版社有较多关系的作家，如丽尼、陆蠡、荒煤、黎烈文、柯灵、唐弢、林柯（陈西禾）、海岑、一文等；最后一部分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学生，和抗战胜利后到上海认识的一些青年作家如方敬、刘北汜、穆旦、林蒲、李白凤、黄裳、陈敬容、阿湛等。另外一些则是巴金在登上文坛以前就认识，或虽已进入文学界而还是在青年时代便有来往的老朋友，如卢剑波、缪崇群、

罗洪、罗淑等。

这些作家中有许多人在《文学丛刊》中出版的书，既是他们的第一本书，也是他们的成名作。何其芳的《画梦录》、曹禺的《雷雨》、芦焚的《谷》、臧克家的《运河》、陆蠡的《海星》、丽尼的《黄昏之献》、刘白羽的《草原上》、肖乾的《栗子》、荒煤的《忧郁的歌》等等，可说都是如此。这些著作在文学史上无疑都将各有它们自己的地位，而这些成果的出现，又都与巴金在文学编辑工作方面的不断耕耘有关。

《文学丛刊》并不是巴金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的唯一成果。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另一种丛刊《译文丛书》，在我国普及世界文学名著，特别是俄国文学名著的工作中，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译文丛书》最初由黄源主编，抗战爆发后，黄源去解放区参加新四军，即由担任总编辑的巴金兼任主编。它出书先后共约五十种，最早出版的有果戈里的《死魂灵》（鲁迅译）和弱小民族短篇小说集《桃园》（茅盾译），吴朗西也曾参与编务，后来则几乎都由巴金一手承担，从组稿审稿到校稿，他都一揽子包了。他曾为出版介绍旧俄文学与苏联文学作品，作过很大努力，有计划翻译出版了屠格涅夫的著作，如《贵族之家》、《罗亭》、《前夜》、《父与子》、《处女地》、《烟》等，和契诃夫的剧本《三姊妹》、《万尼亚舅舅》、《樱桃园》、《海鸥》等，以及果戈里的《巡特使及其他》、《密尔格拉德》，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杜勃洛夫斯基》，托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冈察洛夫的《悬崖》，高尔基的《阿托莫洛夫一家》，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穷人》等。除了俄国文学，《译文丛书》还介绍了法国文学，主要有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左拉的《娜娜》、莫泊桑的《两兄弟》、纪德的《地粮》等，英国文学作品有狄更斯的《双城记》、《大卫·柯贝菲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勃朗特的《简爱》和德国作家雷马克的《流亡曲》、《凯旋门》等。

巴金在编《译文丛书》时，既依靠鲁迅、茅盾、傅雷等名家，又不断发现，培植新手，帮助朋友们校改译文。许天虹译的《大卫·柯贝菲尔》，高植译的《安娜·卡列尼娜》、李健吾的《情感教育》等，他都给它们做过校对工作。汝龙则是在翻译高尔基、库普林、契诃夫等人的作品过程中，得到巴金的鼓励与赏识，成为翻译界的名家。

文化生活出版社虽在抗战中遭受过不少损失，但胜利后由于巴金用全力支持编辑工作，再加上李采臣在经营上花了不少精力，所以业务曾蒸蒸日上，资产大增。可惜的是这样的情景没有能够维持得长久，大概在1949年初，出版社内部发生了人事纠纷，以至在解放前夕巴金就辞去总编辑职务，不问社务，一切全由吴朗西主持了。后来著名生物学家朱洗还被推选担任为新成立的董事会董事长。但从我国文化出版事业的整个利益未看，这样一个由作家、翻译家自己创办、经营的，目的不在于赚钱，而在于认真出书的出版社，让它随便散伙，那是很可惋惜的。特别像巴金那样，生活靠稿费收入，工作纯粹属于义务劳动性质，本人又非常熟悉编辑业务，对出版事业又非常热情，如鲁迅对他的日本友人增田涉所说的，“巴金工作得比别人更认真”，那么让他离开出版工作，损失的究竟是谁呢？

当然，这样的问题，要目光短浅的人来回答，是有困难的。

#### 第四节长夜已尽

巴金每天伏在案头上工作，不论在家中三楼房间里，还是在出版社办公室里，总是专心致志，集中精神，把全副心力花在文稿上。但是时局的急剧变化，国事纷繁，各种重大事件不断发生，仍不能不使他奋起参加斗争。

还在重庆的时候，当他听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因为游行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而被国民党政府镇压，发生流血事件，就曾与郭沫若、茅盾等十八人联名打电报给昆明各校师生，表示对被害师生的悼念；同时还发表给政治协商会议各委员的公开信，呼吁结束一党专政，制定和平建国纲领；废除现行的文化专制统治政策，确立民主的文化建设政策。到了上海以后，他又听说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推翻了政协决议中的各项民主原则，通过了反共的决议，致使中共代表团飞返延安，内战又开始。这时他又和张澜、沈钧儒、郭沫若等联名发表《致美国国会争取和平委员会书》，呼吁和平，并与马叙伦等上海各界人士联合写信给蒋介石、马歇尔及各党派，要求他们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放下武器，恢复和谈。但是，正如西谚所说：“人要自取灭亡，必使自己疯狂。”国民党的先生们对全国广大人民“反内战，要和平”的一致呼声不仅充耳不闻，还唆使特务在1946年7月中旬先后暗杀了一再呼吁和平的民主人士李公朴和闻一多。

巴金是在7月13日上海《文汇报》先看到李公朴“遭狙击殒命”新闻的。那是12日从昆明发出的一个电讯：

“李公朴偕夫人张曼筠女士暨公子，11日晚10时许，乘公共汽车回北门街寓所，至学院坡车站下车，步行至学院坡时，突闻枪声，李即受伤倒地。警局闻讯，驰往侦查，凶手已于黑暗中逃逸，当场捕获嫌疑犯一名……李氏因流血过多，延至今晨5时30分，不治身死。”

14日这家报纸又报道了这件凶案的续讯，标题是“李公朴被刺殒命后，昆明学生痛哭失声”，副标题是：“李氏临终说，我准备好了为民主而死。”这则报道还透露了凶手暗杀李公朴时，用的是“特制手枪”，声音很小，因而当李氏被击时，跟随在后面的李夫人起初竟没有发觉，直到李倒下身去，高呼“我中弹了”，才知道她的丈夫被害。

这条新闻登出后，引起了全国人民震动，巴金也十分愤慨，当他正准备有所表示时，却在17日早晨上海《文汇报》第一版上读到“昆明又发生一血案，闻一多被狙殒命，其子亦中五弹”的新闻。

闻一多是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全国著名的诗人，巴金虽与他很少交往，但也读过他的作品，也在昆明时见过面，知道他在1922年清华大学毕业后曾赴美国学过美术和文学，归国后一直在大学教书；抗战时期，他接受现实生活的磨练，从象牙之塔出来，投身到民主运动中，思想有很大进展，在西南联大担任教授，萧珊还听过他的课，受过他的激励。抗战胜利后，他把长期留在他嘴边的一络黑胡髭剃去，表示自己内心的喜悦，但是事实却使他失望，抗战结束之后竟然发生内战，他感到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他到各处去做报告，为人民提出控诉，向国民党政府呼吁要求和平，不要战争。李公朴被刺后，他在追悼会上说：“李公朴没有死，他活在我们心里，”而且还大声地喊道：“斗士的血是不会白流的！反动派，你们看到一个人倒下了，但也该看得见千百个人站了起来！”就在他说这些话的第二天，即7月15日下午5时测分，他从昆明府甬道14号民主周刊社外出时，被两个暴徒开枪杀害！连



跟在他身后的儿子也被枪击受重伤！

暴虐的统治者对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进行这样惨无人道的镇压，激怒了巴金，他从他的书桌上抬起头，对眼前的一切看得更清晰，他决心要为人权控诉！这时茅盾来了电话，他的看法与巴金完全一致，他并告诉巴金：郭沫若建议要他和巴金、叶圣陶、胡风等十三人联名致电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控诉国民党特务用卑鄙的手段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罪行！巴金毫不迟疑地签了名。他要用作家的良心，向全世界揭露当前中国的黑暗现实，控诉法西斯的残暴统治，和人民生活的无比痛苦，同时呼唤给人们以民主和自由，给人们以生的权利！

在他们十三人联名拍发电报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同一时刻，在 7 月 16 日，巴金又与茅盾、叶圣陶等二百六十人联名发表《中国文化界反内战、争自由宣言》。而同月 17 日下午，国民党的上海市警察局却以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派了几个警察拿了一纸“命令”来到文汇报社，“罚令自 8 日起停刊 349 七天”，理由仅仅是该报《读者的话》（柯灵主编）在 12 日曾刊登过一封署名“一群警察”的来信。（信中大意说：“我们是一群被社会人士所憎恨的警察，但这鄙视的造成倒不是我们本身，而是别人拿我们做工具去压迫奄奄一息的饥饿良民。我们警察原不是不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我们见到全市工人学生欢送人民代表马叙伦等诸先生赴京请愿，制止内战，我们也感动得热泪直流，但使我们悲愤的是他们到京时被什么‘苏北难民’围打，而在场警察竟若无其事，这怎么对得起人民？这是我们警察群的耻辱，我们要洗刷这莫大耻辱！”）而警察局竟对刊登此信的报社加上这样的罪名：“意图离间上下，混淆社会听闻，破坏公共秩序”，因而不迟不早，偏选择在这个关键时刻，派员前来监视执行停刊一周的命令。

罚《文汇报》停刊一个星期，目的是很明显的。但是人民是吓不倒的，《文汇报》被停刊七天，还有《新民晚报》和《联合晚报》存在，还有《周报》（唐弢、柯灵主编）和《民主》（郑振铎主编）在战斗，即便是停刊一星期后的《文汇报》，也还是刊登了大量的读者来信，和中华全国文艺协会等单位的来函，抗议反动派对文化新闻界的迫害；同时又补充报道了人们对李、闻惨案的强烈反响。

当时巴金与在新闻界工作的夏衍、金仲华、柯灵、唐弢、黄裳等人的友谊是深厚的，他常从他们的嘴里听到一些发生在社会上的新闻，还曾积极支持《周报》对反动派企图建立“警管区”制度的斗争。到了 1947 年 5 月，形势进一步恶化，当杭州、无锡、合肥、成都、上海、南京等十余个城市，相继发生群众抢米风潮，上海各校学生举行反内战游行示威，并迅速扩及南京、杭州、北平、沈阳、青岛、开封等地时，上海的三家进步报纸《联合晚报》

《文汇报》《新民晚报》，也就在这个月的 25 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了。隔了两个月，上海的几家进步刊物也被勒令停刊，其中《文萃》的编辑部的三位工作人员还遭到逮捕杀害。

暗无天日的上海，人民已经没有自由发表言论的园地。但巴金家里还是有许多朋友来往着，这里有靳以，他虽远在江湾复旦大学教书，却还是经常来向巴金谈学校里的事情，谈同学们为反内战而进行的斗争，老师们又怎样为一些不同的观点而争吵着。这里还有在影剧界工作的李健吾、陈西禾，和已从美国讲学回来的曹禺，他们的谈话中也很自然地带来当前影剧圈子的讯息。这里还有老友师陀、肖乾和诗人王辛笛。辛笛在 1933 年清华大学读书时，

就在北平与巴金结识，当时他还在《水星》杂志发表过作品，后来到英国留学三年，而现在他是上海金城银行秘书，常与文化生活出版社有些经济上的往来。师陀则是1936年下半年从北平来上海定居时，就由靳以介绍，认识巴金，以后几十年他一直住在上海，与巴金维持着较好的友谊。肖乾则是刚从英国住了七年回沪，现在寄住在复旦大学宿舍，他因为经过婚姻波折，已不像过去那样活跃了。但是他一到市区，还常到巴金家中来。他不能忘记抗战前在《大公报》编《文艺》副刊时，常与巴金、黄源、靳以、黎烈文、孟十还等到大东茶室欢聚，讨论各人怎样办好自己的刊物。对他说来，印象特别深的是1936年10月鲁迅去世时，《大公报》要闻版报道鲁迅去世消息，登载了一篇题目叫《悼鲁迅先生》的短评，对鲁迅进行讥讽、攻击，他曾为此而向《大公报》提出辞职，巴金知道了，对他的处境十分同情，也非常支持他为此辞职，他对肖乾说：“对，辞职去。不要怕没有饭吃。文化生活出版社正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来参加译书。我们向你约稿，可以预付部分稿费。”后来《大公报》应肖乾的要求，在文艺版刊登了一篇社论性质的文章，对前一天的那篇短评进行了纠正，肖乾才总算没有辞职。但是巴金在他困难的时候，坚持原则，支持他伸张正义，他是不会忘记的。当然，巴金家的常客还有出版界中人，这里有赵家璧、朱洗、吴朗西、和他的兄弟李采臣等。尽管报上没有言论自由，但在巴金家里，他和朋友们还是自由自在地对每个问题各抒己见，有时甚至大声地进行辩论，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自己的发言。

巴金一边为出版社编发、校阅沙汀的长篇小说《还乡记》、李健吾的翻译小说《包法利夫人》，一边又在忙碌中抽时间从事翻译工作，他从1948年初开始翻译薇娜·妃格念尔的回忆录，到9月初译完这部回忆录的第二卷《狱中二十年》。妃格念尔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俄国革命党人，曾被沙皇逮捕，坐了二十年监狱，她写的回忆录，巴金在二十三岁时就读过，当时就准备把它翻译出来，并说过“这部书像火一样点燃了我的献身的热望，鼓舞了我的崇高的感情。我每读一遍，总感到勇气百倍，同时又感到十分的惭愧。我觉得在这样的女人面前，我实在是太渺小了。”现在虽然二十年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忘记当年的誓愿，他终于把它译了出来。

同样，他还在这一年完成了另一个夙愿，这就是为三年前逝世的友人缪崇群编了一本散文集《碑下随笔》。他曾在缪崇群去世的时候，与几个朋友谈起过为崇群编印全集的计划，他认为他那个善良的友人——缪崇群生前的遗著固然需要整理收集，而且他给许多朋友写的信也多是感情真挚、文笔流利的散文。巴金记得抗战初期在桂林东江路的木屋里，崇群曾到他家中作客，他看到过崇群给几个朋友写的信，都是写得非常好的，并曾对崇群说：“你的信写得好，不像我写信时拿起笔随便写几句就完事。”他还半开玩笑地表示以后有机会要给他编一本《崇群书简》。从那时开始，巴金就有意收集他的信件，并在上海霞飞坊寓所保存了崇群几十封旧信，当1940年巴金第三次离开上海后，却因日军侵占租界，在一次敌伪大捕抗日分子的恐怖活动中，被在上海养病的三哥尧林烧毁了。后来巴金又在桂林住处积存了一堆崇群写的信，又在1944年7月发生的一次大火里，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全部存书一起被焚毁。在重庆，巴金又保存了崇群的十几封信，胜利后第二年，在托人带两箱书物去上海时，又在中途遭到意外，杳无音讯。巴金为这些不幸的事情感到痛心，虽然最近他刚病了两个多月，现在刚恢复工作不久，但他还是

坐在火伞高张、阳光直照的小楼上，为缪崇群的八篇短文和仅存的五封书简仔细地看完校样，他想到作者生前付与朋友们美好的感情，禁不住想起了另一个朋友韩侍桁（崇群的老同学）在编选崇群的另一本遗著《晞露新收》时写过的两句话：“他的名字因他的作品长存下去，而像他那样可珍贵的友情，在这人间恐将永无重获之期吧。”这时，巴金好像听到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召唤他，他猛然惊醒：“那是崇群！”他觉得崇群虽然离开了人间，但他对朋友们的崇高的感情是永远留在大家身边的。

巴金从重庆回上海，不过三年工夫，他不仅写成了不朽的现实主义巨著长篇小说《寒夜》；还主持恢复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出版工作，编发了不少足以推动新文化运动继续前进的新书稿，包括《文学丛刊》和《译文丛刊》战后出的一些译著；并多次热情地参加了反内战、争自由的斗争。不论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他对人民革命事业的贡献都是十分巨大的，他在读者中间威望愈来愈高，也是很自然的，因而遭到处于敌对状态的《中华时报》的谩骂，是一点也不奇怪的。问题在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上海的几家进步报纸还不曾被查封之前，有一位署名“莫名奇”的忽然在《新民报》晚刊副刊上连续发表两篇文章，指责巴金，说“用高尔基的话，那些新伤感主义的作家是应该捉来吊死的。”而《联合晚报》的另一个作者则在副刊上发表一篇题目叫《从生活的洞口……》的文章，对这种论调进行附和，说它骂得“很痛快”，还说：“但其实不必这么愤慨的。这些作家用鲁迅先生的话：‘做戏的虚无党，罢了，既不敢明目地卖身投靠，又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哎哟哟，黎明，’这就是一切。”

从自己阵营里杀出来的这些程咬金们，是巴金一时意料不到的。但问题很明白：曾在抗战前当着鲁迅的面出现过“左”派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阴魂，并没有因为鲁迅去世而跟着消失，它们仍在文坛上飘荡（甚至几十年后还要存在），巴金对此十分厌恶，恰巧这时《寒夜》将出版，他就利用写“后记”的机会，给予还击：

“我应该向《夜光杯》和《夕拾》的编者道贺，因为在争取自由，争取民主的时代中，他们的副刊上首先提出来吊死叫唤黎明的散文作家（或者不叫唤黎明的作家以及所谓“新伤感主义的散文作家”）的自由。这样的‘自由’连希特勒、墨索里尼甚至最无耻的宣传家戈培尔之流也不敢公然主张的。虽然他们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和自由的敌人。而谈到自己所不喜欢的文章就想把作者‘捉来吊死’，这样的人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我们自己的老古董秦始皇就玩过‘坑儒’的把戏……可是连秦始皇的霸业也仅能传至二世……”

一九四七年三月，《寒夜》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又出人意料之外，就是《文汇报》上由郭沫若挂名而实际上并不是由郭沫若负责具体发稿工作的《新文艺》周刊，竟刊登出那个写《从生活的洞口……》的作者的另一篇文章《略说‘不安’》，在攻击唐弢的同时，又把巴金带了一笔。唐当时很生气，曾向《文汇报》提出抗议。这次巴金没有作声，因为两个星期以后，郭沫若已经在同一报纸副刊版面上，替他拭去了被沾在身上的无知唾沫。

郭沫若毕竟是个有见识的革命家，他在读了《新文艺》的那篇《略说‘不安’》与另一篇题目叫《从文艺界的恶劣风气想起》后，很为震惊，他立刻写成了这篇题目叫做《想起了砍樱桃树的故事》的文章。文章一开头，他就讲了个华盛顿童年时的故事。他说华盛顿小时候，他父亲给了他一把小斧头，他高兴极了，走进园子里，碰着任何树木就砍，结果连他父亲最喜爱的樱桃

树都砍掉了。父亲回家，盛怒之下，加以追究。华盛顿流着眼泪，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父亲觉得这孩子诚实，便把他宽恕了。

郭沫若的文章，讲完这个故事，接着就对那两个他所不认识的写文章青年说：“两位朋友，我们实在是错了，我们的斧头砍得太高兴，砍上了樱桃树！你们是青年朋友，或许是出于一时的好胜，而我们主编者的责任更大，犯的错误也就更厉害，我现在诚心诚意地含着眼泪承认自己的过失！”他又说“要向唐弢先生、巴金先生请罪，”在称赞了唐弢在抗战中的功绩和在战后主编《笔会》的成绩之后，他又提到了巴金，他说：

“巴金先生……是我们文坛上有数的有良心的作家。他始终站立在反对暴力、表扬正义的立场，决不同流合污，决不卖虚弄玄，勤勤恳恳地守着自己的岗位，努力于创作、翻译、出版事业，无论怎么说都是有功于文化的一位先觉者。青年们是欢喜破坏偶像的，巴金先生的偶尔遭受拂逆，我相信这是一种消极崇拜的表现，或许也正足以证明巴金先生的优越的成就吧。”

最后，郭沫若的文章又谈到文艺批评问题，他说：“要建立批评，必须建立自己的诚意。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做人的标准，也就是做批评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明是非，分敌友，严爱憎，慎褒贬……我很难受，不幸在我们所主编的刊物上，竟表现了一种徒逞快意的倾向……我实在为批评的前途感觉着充分的不安……”

在我们现代文学史上，有过多次的论争，这些论争看来是一个战役、一个战役的发生，似乎互不相关，其实都贯穿着一些相类似的问题。有些问题当时下过结论，今天看来却未见得一定十分正确；有些则是可以作再一次回顾，当然可以加深我们的认识。像上面的一次风波，也许还谈不上什么论争，但有些现象、因果，或仍能给人一点启示。需要补述的是：这件公案了结后，第二年，即1948年1月，《寒夜》再版。大概感于郭沫若所讲的砍樱桃树故事的诚意吧，仁慈宽厚的巴金把“后记”作了改写。他几乎不再提到这件事了。而不幸的是还不到几年的时间，那个写《从生活的洞口……》和《略说‘不安’》的作者，即郭沫若笔下砍樱桃树的那个诚实的“华盛顿”，自己却在一场风暴中被新一代的“华盛顿”当作樱桃树砍掉了。历史真是无情。看来把斧头给孩子总是慎重一点为好。

巴金把《寒夜》后记进行改写，当然是巴金的宽厚待人。但这并不等于他的初版后记所写有误。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应该说，它是完全正确的。巴金从三十年代开始从事文学以来，根据他的创作实践经验，对有些文学创作问题的看法，有许多是很正确的。不要说在四十年代那些随意泼人污水的谬论无损于他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同时也驳不倒他的观点；即使在三十年代初期，他刚写完《家》与《雾》不久，他的创作实践已经让他认识到某些文学创作问题上的真理，而这些真理在我们的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曾屡遭淹没，只有到眼前才有可能重新露出耀眼的金光。

这里有一个实例可以补述：

1933年1月，巴金曾到合州，在生物学家朱洗的故乡作客，住了五天。当时年轻的徐懋庸还不曾写信给鲁迅谈统一战线问题，当然也还不曾开口骂巴金、黄源和胡风，相反，当时他似乎还很敬重巴金，因为他是巴金朋友吴克刚的学生。他在台州一个中学的图书馆里借书，意外地碰到巴金，他说：“会在合州遇见巴金先生，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他就在这个图书馆里，同巴金谈了许多话。后来他把那天的谈话情况，写成一篇题目叫《巴金到台

州》的文章，发表在 1933 年 2 月 25 日出版的上海《社会与教育》杂志第五卷第十三期上。其中有一段这样写的：

……最后，我单刀直入地说到他的作品。

“您的《砂丁》《煤坑》这类作品，是有实际的观察做根据的吗？”先是这样的动问。

“有的，我曾经到了矿山和煤坑”我亲眼观察过那种情形。”

在这时候，我忽然觉得他的尖锐的眼光从两片玻璃为障碍蔽物，很留心地在侦察我。我把我的眼光迎上去，他的就避开了。

“我同意于《现代》上一个读者的意见，你的作品的结局，过于阴暗，使读者找不到出路。”

“是的。不过，我的作品是艺术，不是宣传品，我不想把抽象的政论写入我的作品中去。我从人类感到一种普遍的悲哀，我表现这悲哀，要使人类普遍地感到这悲哀。感到这悲哀的人，一定会去努力消灭这悲哀的来源的，这就是出路了……”

“我认为自从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时代以来，暴露社会的黑暗，表现人生的悲哀的作品，已经很多很多了，在读者的心中，黑暗感已经太浓重，此后是需要指引新的社会新的人生的光明了。”

“是的，不过作家的意识是被生活所决定的。我的生活使我感到尚有猛烈地攻击黑暗之必要，我的生活给我太多悲哀，所以我自然地写出了那些作品，我不能故意地去写别样的作品。”

接着我转到另一方面：

“我先前住在都会中的时候，读到你的作品，非常地受感动，但在农村中生活了两三年以后，我的感觉就不同了。你所表现的悲哀，对于生活在农村中的人，有许多地方是很隔膜的。”

“那是因为我一向住在都市中的缘故。”

这一句话，被我敏捷地捉住了：“所以，我想先生可以

到农村中去住若干时候，看看农村中的情形……你曾经自叹你的作品或将写完，也可以向这方面去找一点新的题材么？”

关于这一点，他的答复，颇出我的意外，他说：

“这自然很好，可是并非必要。我认为艺术与题材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艺术的使命是普遍地表现人类的感情和思想。伟大的艺术作品，不拘其题材如何，其给予读者的效果是同样的。”

要求每一篇小说创作都要向读者指出出路，无疑是一种“左”的教条主义理论。这种理论确曾长期地统治过我们的文坛，以致我们对许多作品的评价，历来就很不公平。另一种理论也足以压抑文艺创作的生机，这就是题材决定一切。而在 1933 年春天徐懋庸所写的巴金访问记中，巴金所说的话，实际上对这样两个问题，已经给予解答。可是不知是哪一种说不清楚的力量，这两个文学创作问题上的真理始终被埋没着，虽然巴金用他自己创作的经历证实了这两个真理的存在：他的两部最成功的作品是《家》和《寒夜》，而不是《砂丁》和《煤》。当然，巴金从来（包括他与徐懋庸的那次谈话）也不曾否定过作家“下生活”，他自己不但在解放后下部队到工厂，而且早在解放前就下矿井到农村，但这对作家来说只能是一种生活的补充，扩大一些视野，而不是主要的，或者如他所说的“这自然是很好，可是并非必要。”作家写作主要是靠自己长期的实际生活经历，直面人生，和由此而来的最深

感受。《家》和《寒夜》正是这样产生的。

临近解放的上海寒夜，比临近抗战胜利时的重庆寒夜，还要寒冷。有一个晚上，虽已冬尽春来，但春寒料峭，特别在半夜里，仍冷得可怕，巴金坐在自己房间里，刚放下工作，忽然电话铃响了起来，那是在复旦大学教书的贾开基打来的，当时他和马宗融同住在复旦大学的“大教联”招待所（当时叫“联络站”）里，他告诉巴金：“马大哥去世了！”

近两年来，马宗融在台北教书，他学识丰富，原是“部聘教授”，非同一般，因而生活还算安定，但他的情绪不好，周围环境使他感到苦闷寂寞，经常与他的老友乔大壮备酒对酌，一起发牢骚，患了病又没有认真的治，说“死了也要回上海”。巴金怕他在旅途中劳累，反会加重病情，曾写信劝他不要急着马上回沪；而他不听，终于有一天，躺在担架上，让人抬了回来，还带着女儿马小弥和男孩一起回到上海。他原从复旦大学被排挤出去，回来后发觉宿舍早被人占了，自己只好住在北京路的一个“联络站”里。偏逢当时上海已临近解放，学校乱哄哄，“联络站”也是人来人往，缺乏秩序，但是马宗融还是觉得能够回到上海，和老朋友们一起等待解放，心里非常高兴。巴金去看他，他虽然满身浮肿，起不了床，却仍满脸是笑，抓起巴金的手不放，轻轻地说：“这可看到你了，你不怪我吧？我没听你的话，就迳自回来了！”巴金差点儿流出眼泪来，但还是强噙着泪珠不让它流下，向他说了一句：“你回来就好了！”他知道他生病，但没有料到鲜龙活虎样的马大哥，竟病得这样。后来他又经常去看他，有时还和萧珊一起去，看到马大哥和孩子们住在一起，又有复旦的老朋友们帮助照料，而他又有说有笑，巴金心里竟不知如何是好，他替马大哥担心，又似乎觉得眼前还不致有什么大变化，却想不到他就这么快离开这个世界了！

巴金接到电话，在这午夜，他发觉连自己的心都在颤抖。而目前又在宵禁期间，马路上戒严，交通隔绝，在天亮前无法赶去，一时竟想不出什么办法，不觉倒在沙发上愣住了。他记得四年多前，在抗战胜利的消息还不曾传来时，却先传来了朋友纓崇群去世的噩耗，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上海就快解放了，和他在战前生活在一起的马宗融大哥却又闭上了眼睛。可怕的1949年上海的春寒，它比1944年重庆的寒夜还要冷，要是让他有时间再写一部关于寒夜的小说，他会比现在已经出版的《寒夜》写得更长更深的。

天一亮，戒严令解除，上海马路上的人流又恢复了。做官的和有钱人正在准备逃难；工厂企业在筹凑款项向职工发“应变”费；许多教师和学生被三三两两地逮捕到警察局里去；街头显得更为兵荒马乱，商店橱窗里的陈列品已一无所有，因为商品都因金圆券贬值被抢购一空。唯有四川路桥堍两边热闹非凡，人们正在那边争购银元，满街的议价声，和银元贩子大头小头买进卖出的呼声，以及银元相撞的“擦擦”声打成一片。

巴金和萧珊虽天刚亮就赶到“联络站”，马大哥早已断气了，只见他的两个孩子在哭，复旦几个朋友守在旁边等殡仪馆的车子来把遗体送去。到了举行告别仪式的一天，朋友们来得不少，大家想到马宗融生前性格豪爽，富有正义感，很重友情，爱为朋友打抱不平，现在却闭起眼睛，静静地躺着，都很悲伤。复旦学生来的也很多，他们没有忘记马老师一直支持他们进行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都在灵前恭敬地鞠躬行礼。巴金和萧珊还随着到徐家汇回民公墓去参加了公葬仪式，想到马大哥生前毫无积蓄，只留下两箱书（后

来捐给学校)，和没有父母照顾的两个孩子，就自动承担了他们的一部分生活问题，在办完了马宗融的丧事后，他们就把两个孩子接到自己家中抚养。

这时，文化生活出版社经济也比较困难，兼以人事纠纷，编辑工作短时期中一度停顿，临解放时更难出书，只靠现成的纸型印一些书出来发卖，维持社中开支。巴金本人原不支薪，生活完全靠稿费，这时基本上无收入，再加上钞票贬值，存在银行的钱，几天之内就化为乌有，日子确实不好过。

正在巴金与萧珊抱着四岁的女孩小林，相对发愁的时候，住在同一条弄堂里的邻居顾均正夫妇来看他们。两家人谈起这些日子的生活，真是度日如年。均正说，开明书店给职工“应变费”每十天发一次，每次十块银元，问巴金：“你怎么不向开明提要求呢？”巴金对他微笑着还不曾答话，萧珊就说。“那顾先生，你就给巴先生转达这个意思吧！”顾均正一口答应，第二天就把十块银元送了来，说是预支的版税，办法和他们预支工资一样。但是等到开明书店第二次送来十块银元后不久，上海就解放了。

上海对于巴金来说，从1923年第一次来沪算起，到现在1949年，已经有26年了。他既爱它，又恨它。爱它，是因为它有光荣的历史，在这里有人民的劳动，也有人民对事业的奋斗，和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抗；这里有他的亲人和朋友，有他长期生活和劳动的足迹；在这里更有他的事业，他曾为之奋斗，他的《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他的《寒夜》、《新生》以及其他许多中长篇创作和几十篇短篇小说以及几本散文集子，都是在这里写成的；他曾在这里度过多少不眠之夜，在灯下付出多少心力，从事写作和编辑工作；这里他曾享受过多少朋友热情的关注，有过鲁迅对他的鼓励和指导，有过叶圣陶等年长者对他的帮助，有过靳以、丽尼、陆蠡、黎烈文、黄源等友人和他真诚的协作，有过索非、马宗融、罗淑、吴克刚等许多朋友对他生活上的关怀。当然，这里还有他温暖的家庭，更有他的爱妻萧珊和女儿小林……上海，他爱它，关心它，希望这块美丽的土地能给人们更多的幸福和快乐！

上海，他也恨它。他不能忘记它又是一个罪恶的都市，一个冒险家的乐园。他曾写文章形容过这些帝国主义冒险家利用这里的低价劳动力，来开办工厂，制造商品，取得广大的市场，并且组织发行网，来推销从海外运来的剩余物资。他们自己住进中国劳动人民流着血汗建造起来的高楼大厦，享受舒适豪华的生活，却让中国工人“蜷缩在寒冷的小屋中和摇动的阁楼里，睡在高楼前的人行道上，挤在苏州河边的乌篷船中。在这里成千上万的工人为了微少的工资把生命消耗在不合卫生的工作条件下面，在这里小孩挨饿，妇女受辱，和平的人民被人枪杀，人间最可宝贵的东西——劳动力毫无原因地披浪费、被糟蹋……”他亲身经历过多少无法使人容忍的场面，他看到过英国警察在马路上勒令每个行人举起双手让他们随便抄身；也看到过法国殖民者在法租界与南市交界处关起铁门，举起铁棍，不让中国难民在战乱中逃进租界；他还亲见一个中年人因为经过日兵岗位没有鞠躬行礼而被打耳光，也看到过美国水兵在三轮车上拥抱着中国妇女招摇过市。他曾站在苏州河边，遥望闸北被敌人占领，房屋被烧毁，马路变焦土，自己的住处周围被炸；他也曾短期蛰居“租界”，看敌伪肆虐，汉奸横行，人民经受大搜捕的恐怖，爱国者的头颅被挂在电杆上示众。而“胜利”后，接收大员享尽特权，巧取豪夺；流氓恶霸，依然故我；奸商投机，哄抬物价，更加猖獗。人民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工人一天劳动十八小时还得不到一家

的温饱。有些妇女以卖淫为生，每天晚上她们在大世界、四马路、先施公司一带成群结队，等候顾客来买她们的身体，然后让可怕的性病传染开去，使上海成为国际性的梅毒流行城市。而那些对社会不合理的现象进行反抗的革命者，敢于追求真理的人们，他们被逮捕，被拷打，受最残酷的刑罚，甚至被成批杀害……

现在，这个受侮辱、被压迫的城市——上海，它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命运：横渡长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攻克一个个城市，来到上海四郊，枪声不断，炮声在响。巴金想到周恩来在重庆对他的谈话，想到在延安和苏北工作的朋友们，想到前些时候刚离开上海去香港的一些老友，他怀念他们。他迷迷糊糊睡了一个晚上，然后发觉长夜已尽，天逐渐亮了，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那是在《大公报》工作的刘北汜打来的电话，他给巴金带来期待的讯息。他告诉巴金说：

“ 人民解放军进城了！ ”

1988年10月3日初稿

1989年7月10日二稿



下卷

## 第一章曙光来临

## 第一节不平常的团聚

日子很容易消逝。四十多年前的事，现在回想起来，竟恍如隔世，似乎一切离我们都已经十分遥远了。

一九四九年初夏。在上海，路边的柳枝刚从嫩青转向新绿，杨梅和枇杷，却已经上市。随着解放上海的炮声停歇，市区嘈杂的叫卖声，又渐渐地响了起来。显然这个窒息了两天的大都市，它的心脏并不曾因为经过一场战乱而停止跳动。虽说暑期即将来临，气候却还是出人意料的凉爽，而天又晴空万里，像是在给大家兴奋的情绪添枝增叶，使人们的心境更加明朗。

那时我们都还非常年轻，好像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使用不完的劲，谁也不曾想到有一天大家也会衰老。不说别人，就连

当时已经写过几十部作品，早给千百万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巴金，他才四十五岁。如果人生以百年计，无疑这是他一生中最佳的年龄。

这天晚上，他虽并不像往常那样通宵写稿，却为平时所少有的兴奋情绪，干扰了睡眠，特别是在《大公报》做编辑工作的刘北汜来了电话，告诉他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之后，他更无法入睡；他意识到新的时代已经来临，这是他与他的朋友们多年来所期待的，也是多年来所努力争取的日子，现在已在眼前了。他当然不会以为这就是他青年时代所向往的“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嘴都有面包，每颗心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才智都得到发展”的那个理想社会到来了，但是他确实知道这几年来他与他的那些朋友们所亲近的中国共产党，是人民拥护的党，包括他自己曾经与他们谈过话的周恩来、毛泽东等人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就将来全国各地，和全国人民生活在一起。不久前，他还与郭沫若、茅盾等人联名发表过宣言，要求民主，伸张正义，对国民党政府进行过斗争，而现在国民党垮台了，他感到高兴，也感到欣慰。

他还怀念他的那些过去曾经在一起工作，一起谈笑，后来到解放区去了，至今一直没有音讯的作家朋友，他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了，比如黄源、夏衍、萧军、何其芳、刘白羽、曹葆华，还有一些他曾为他们编印过作品集子的青年朋友如屈曲夫、田涛等人，他们现在都过得好吗？今后也许又有机会见面了。他一向重视友谊，他曾经为自己有许多知心朋友而感到欣慰。眼前他虽有几个朋友远在海外，但他仍怀念他们；有些朋友曾想在解放前离开上海，他劝他们留了下来，他相信新的时代会使自己过得愉快，也会使他的这些朋友过得幸福。

五月的朝阳已经照到他的窗口。当他起了床，听见萧珊已经从菜场买了菜回来，正在楼下和邻居谈马路上所见所闻。原来炮火曾使上海两天停市，今天菜场才恢复正常供应。她一边谈话，一边烧早饭给四岁的小林吃。是的，巴金在这幢三层楼房子建立起小家庭，转眼已有三年几个月了。小林已经从怀抱的婴儿成长为能走能说的小女孩子；萧珊也已从一个青年学生型的上海姑娘，锻炼成为能烧饭做菜的主妇。而巴金则在这幢房子的三楼房间中，继在抗战时期完成过《激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秋》后，又在抗战胜利后写成了另一部不朽之作《寒夜》。这幢房子就是霞飞路霞飞坊五十九号的三层楼西式弄堂房子。（霞飞路在抗战胜利后曾被改称为林森中路，解放后改作淮海中路。霞飞坊也改称“淮海坊”。）每当黄昏时分，巴金经常在霞飞路上散步，有时还伴着萧珊到老大昌咖啡馆喝咖啡。

今天一早起来他就十分兴奋，既然解放军已进入市区，必须去看看这闻

名已久的大军，顺便到文化生活出版社走走，惦记着那儿值班的同事们。这多年来，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主持这个出版社的工作上。吃了午饭，他正准备出门，恰好住在附近的黄裳到霞飞坊来看他，他便邀他和自己一起去巨籁达路（今巨鹿路）一弄八号文化生活出版社。到了那边，听人说解放军正排着长队，从西郊开进市区，他和黄裳便从巨籁达路来到福煦路（今金陵西路）爱多亚路（今延安中路）交界的地方，挤在浦东大楼四姊妹舞厅门前看热闹的人群里，看穿着黄色军服的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从西向东进军，估计去江西路福州路一带接管国民党市政府。来自农村的解放军一张张朴实的脸，感动了巴金。

从这一天开始，上海沉浸在更大的欢愉之中。上海人从来不曾看到过的腰鼓队开始在街头出现了，这些队伍来自工厂，来自学校，先是自发的，零星的，跳跃在南京路上，在静安寺路上，在爱多亚路上，在霞飞路上，……后来就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游行。红旗，口号，腰鼓，显示着上海人民群众空前未有过的欢腾。

三天以后的一个黄昏，忽然有个戴着眼镜穿着解放军制服的中年瘦个子来到霞飞坊五十九号，他径自跑到楼上巴金家中，用双手紧握住巴金的手不放。原来他不是别人，正是巴金在一九三四年认识的在鲁迅身边工作过的黄源。当年他曾在鲁迅指导下编《译文》月刊，又在鲁迅鼓励下支持过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帮助他征稿，充实译文丛书内容。他和黎烈文、靳以等人也是朋友。巴金并没有忘记当年黄源和他的友谊，当时大家曾相互支持各人主编的刊物，抗战一开始又团结起来，把四个刊物合并，成为《呐喊》（后改《烽火》）。后来黄源回家乡看望父亲，去苏北参加了新四军。十多年不通音讯，各人经历了一段不相同的生活，但心还在一起，友谊是长存的。现在，两人又突然见面了。黄源现在是军管会的文艺处负责人（后来成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两人相互注视了一下对方，啊，大家都没有大变，只在脸上显得比过去稍稍苍老了一点，原来都已从青年时代进入中年了！

黄源向巴金问起了黎烈文情况，巴金告诉他黎烈文是在抗战胜利时去台湾教书的。黄源又和巴金谈起他们共同的朋友陆蠡。他说，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突围出来，曾历尽艰险，在丹阳弄到一张证件，乘火车到上海，直奔巨籁达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来找过巴金，哪知巴金已写完《秋》重返内地，当时接待他的正是陆蠡。黄源在上海找到地下党组织后，陆蠡曾帮助他处理善后事宜，却不曾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面。接着，黄源把自己这几年在解放区的经历也约略地谈了一下，又告诉巴金一些有关在解放区工作的作家朋友近况，然后说军管会工作已经开始，上海的接管工作就要全面展开。巴金听了，非常兴奋，他意识到人民就要自己掌权了！

又过了几天，巴金正在家中继续翻译德国作家鲁多夫·洛克尔的短篇集《六人》，忽然接到周恩来从北平发来的电报，邀请他到北平去参加即将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这显然将是一次不平常的团聚。当时全国政协尚在筹备之中、大陆尚未完全解放而文代会却将首先召开。会议的日期在七月初。离现在只有二十二三天了。各地作家正在积极准备启程，有的且已到达北平。巴金的许多朋友在上海临解放前已都先后去香港，如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胡风、郑振铎、许广平、柯灵等人，他们将直接从香港去北平；和巴金一起从上海出发的，将有靳以、王辛笛、李健吾、唐弢、

赵家壁、陈子展、赵景深等几位。巴金抓住尚未北上的几天时间，赶紧把《六人》的译作定了稿。

这时《解放日报》已在五月二十八日随着上海全市解放的喜讯，在上海人民面前出现。同时在一九四七年被迫停刊的《文汇报》，则在六月二十一日复刊，他们发表社论《今后的文汇报》说：“上海解放了，全国解放近在眼前了，我们的《文汇报》今天在上海复刊，让我们欢呼，向中国共产党欢呼，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欢呼！没有他们的领导，没有他们坚决的奋斗，哪有今天！……”在前一日，复旦大学也由军管会接管，全体师生通宵联欢，在盛大的晚会上歌声阵阵。作家靳以、许杰、魏金枝、赵家壁、陈子展、罗有六人还在《文汇报》副刊上发表《北上感想》的短文，庆贺革命胜利，表示由衷的兴高采烈。欢送文代会代表北上的一个盛会在当时的逸园饭店（即今文化广场）举行，主人有中国共产党人、军管会的领导成员陈毅、潘汉年、夏衍、韦悫、于伶和周而复。陈毅市长在讲话中宣称“文艺界是革命先驱”，他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垮反动派。接着，代表们纷纷发言，这里有冯雪峰、熊佛西、陈望道、蓝马、周信芳、方令孺、穆木天、许杰，也有巴金。巴金的发言虽然很短，也很匆促，但这是他生平在这样盛大的集会上的第一次发言，也确实是他从心底里发出来的抑制不住的心声。

巴金在上海临解放时，曾有人劝他移居海外，他则认为：“人民拥护共产党，我应该和人民在一起。”他不但并未移居海外，而且还劝他的朋友和他一起留了下来。他充分相信人民会把国家建设好。他的朋友靳以还在六月二十五日出发北上前，发表了一篇短文《从黑暗到黎明》在报上：

“我看见匪军和特务们包围了学校和工厂，我看见和我相熟的人被捉进了警备车，我看见人们在大路上被枪杀，我看见沾满了一地的脑浆和鲜血，我看见在路上惶惶然走着的逃难的市民，我看见只有一只猫溜过的空寂的街道，我看见像狗一样地顺着墙壁急急逃走的匪军，我看见敌人的坦克，我看见蒋匪王朝的崩溃。我看见天亮了，我看见黑红脸膛的可爱的士兵进城了，我看见我们的队伍来了，我看见无数的挂着笑容的市民出现在街头，手拉着手团结起来。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兴奋过，快乐过；我不只一张脸在笑，我的全身都在笑。”

靳以的文章，不仅写出了解放上海时靳以异乎寻常的兴奋情怀，似乎也表达了巴金这样作家的心情。他们被编在以冯雪峰为团长的南方第二代表团里，团员包括江苏、山东等地的作家、艺术家共有一百七十多人，巴金是这个团的十一个团委之一。虽然有许多人已先去了北平，但在一路上结伴同行的还有七十多人，他们乘着火车先到达南京，受到南京市长刘怕承的欢迎。代表团到北平时，已是二十六日晚上了，到车站来欢迎的有茅盾、周扬、丁玲、欧阳予倩、艾青、田汉、冯乃超、洪深和柯仲平。

巴金到了北平，文代会招待组把他安排在和靳以、辛笛、李健吾、唐弢、赵家壁几个人同住一个楼面上，大家同进同出，同样兴高采烈。这里除了唐弢、赵家壁，其他几个人都是三十年代巴金在北平编《文学季刊》和《水星》时的老朋友，因此大家在这里都碰到不少熟人，也一起去游了北海、颐和园，还要求辛笛在琉璃厂附近的一家酒菜馆请大家吃饭，因为辛笛那时还在银行工作，收入比别人多，而他也一向总肯慷慨解囊。好在文代会要在七月二日才开幕，预备会也要在六月三十日才开，所以这几天他们就有时间找朋友团聚。但许多熟人都见到了，就是缺少了一个大家所熟悉的沈从文。文代大会

共有来自全国十个代表团，代表总共七百三十三个人（实际出席六百多人），为什么只有沈从文不见呢？

巴金想起十四年前即一九三四年冬天，在北平结束了《文学季刊》工作后，曾到达子营沈从文家住了几天。那时沈从文已把《大公报》的《文艺》副刊编辑工作交给他的后辈萧乾，自己仍担任着每周出一整版的《星期文艺》编辑工作，巴金为它写了一篇文章后就回上海。临行，沈从文夫妇送他上火车，从文握着他的手，微笑着问：“你还来吗？”巴金只说了一个“我”字，便再也讲不出话来，他们对他们一家多年来亲如手足的热情接待，是多么感谢。当然他对文代会代表名单上没有沈从文的名字感到遗憾，并不仅仅出于个人的感情，更主要的是，他觉得沈从文这样一个写出了《边城》、《八骏图》和《湘行散记》等作品的作家，不论在中短篇小说方面，还是散文方面，他都是三四十年代中国作家的卓越代表，把他排挤在文代会门外，无论怎么说，都是不公平的，而且从个人品德上来看，凡是熟悉沈从文的人，也都说从文为人极好，能经常帮助朋友。当年他为营救被羁押在国民党牢狱中的丁玲，曾花费了很大的心力，为之奔走，虽然没有多大用处。在这期间他还写过《己丁玲》一书，曾希望能写出他所十分熟悉的这个革命作家的真实形象，但是当书出版的时候，才发现文章已被反动的审查官删得体无完肤。而这一过程，文艺界许多人并不知道，似乎有的人也不想知道。

当巴金发现文代会代表名单中没有沈从文后，就约靳以、李健吾、辛笛他们一起去看他。见到他时，他仍像往常那样微笑着，和他的夫人张兆和一起招待大家。他问起一些熟人的近况，还限于上海的一些老朋友，当时他似乎仍十分关心文艺界，但文艺界却没有把他作为代表，与大家坐在一起迎接新时代的曙光。巴金心中有点茫然，意识到他的老朋友这时内心十分寂寞，却也无能为力；他这时的处境与沈从文不相同，他和靳以、辛笛他们一样，正兴高采烈，心头充满着对未来祖国的希望；对自己工作事业的发展，满怀信心。

这个时期，巴金还与靳以、辛笛一起会见了从解放区来的曹葆华，他原是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认识的朋友，当时在一家报社编文艺副刊，同时也写诗，从事西方文艺评论的译介工作。抗战开始后他去了延安，巴金也收到过他在当时写的诗，曾为他编过集子。现在，他们又会面了，曹葆华十分热情、谦虚，还邀请巴金到他的住处去，用黄色的小米干饭款待他。当然，巴金在开会期间，还碰到何其芳、刘白羽等人，他们也都是他在抗战前的朋友。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终于在这一年七月二日上午九点钟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这确是一次不平常的团聚。会议共开了十八天。在这期间，巴金还与靳以一起参加了大会主席团的常委会。在这些大会、小会中，他听了不少报告和发言，长了不少见识，遇见了许多老朋友，结识了不少新朋友。特别是与一些从香港出发来北方的老友重逢，他更感到亲切。因为这些朋友原与他一起住在上海，他们在北平解放时已从尚未解放的上海出走香港，等待着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胜利。这些老朋友中，叶圣陶是巴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发稿人，巴金曾把他当作者师，多年来叶圣陶也一直十分关怀巴金，不仅在写作上，还在处世待人上，他不希望巴金有点疏失，当他到了香港后听传说巴金已去了台湾，非常焦急，曾写信向在报社工作的黄裳询问是否有这样的事情。黄裳把实际情况告诉了他，他当然非常高兴。现在，他们见了面，两人紧紧握着手，互相注视了一下各人的脸，眼睛禁不住

露出激动的泪花。大会是按号人座的，小会的座位比较随便，两人就经常坐在一起，有时专心听朋友们的讲话，有时则相对作会心微笑。他们两人相差整整十岁，但是他们很少年龄隔阂，不论在抗战前，还是抗战时期，或抗战胜利后几年，他们都同住在一个城市里，却不常见面，但仍互相关注着各人的工作，各人的处境，两颗善良的心在黑暗的旧社会中都期待着有一天能看到人民的解放。现在这样的日子诞生了，而且两人都有机会参与这样日子的接生工作。这是一次多么使人兴奋难忘的机缘！叶圣陶在刚诞生的《文艺报》“庆祝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专版上发表了一篇头条短文，他说：

文艺界从来没有像这一回文代会似的大集会。包括的部门这么多，代表所从来的区域这么广，都开了新纪录。会期又在全国解放快要实现，新政治协商会议已经着手筹备，中华人民共和国跟联合政府快要成立的时候。

意义太重大了，真该“划时代”三个字来形容。参加了这个划时代的大会的朋友们，谁都会心中自忖，并且互相勉励：咱们在修养上，创造上，乃至服务上，都得来个“划时代”才行。……

大家来个“划时代”，事实上确乎办得到，只要把握住文艺的方针不放松。……重点恐怕还在怎样加深修养、提高创造，以便收到最大的效果。这需要彼此切磋观摩，关起门来独个儿摸索是不成的……

在连日召开的全国文代大会上，有许多内容扎实、新鲜的报告，除了郭沫若的总报告外，周扬的报告谈解放区文艺，茅盾的报告谈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斗争。此外丁玲、艾青、李伯钊、柯仲平、刘芝明、赖少其、袁牧之、吕骥、江丰、张庚十个人也作了专题发言。

大会会场中间挂着毛泽东与鲁迅的画像，周围是红色绸带。大会每个代表胸前都佩带着圆形纪念章。会场两壁高悬

各方面送的锦旗，其中不少写着“为工农兵服务”字样，鲁迅艺术学院赠献的锦旗上的祝辞则是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从下午两点钟讲到晚上八时。全场始终肃静，代表们全神贯注倾听着。正当周恩来讲话讲到一半，突然全场掌声雷动，原来毛泽东来到。他在群众欢呼中上了台，讲了几句很短、但几十年后仍还留在人们耳边的话：

“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大众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人民欢迎你们！”

在全场爆发起来的欢呼和掌声中，巴金也和大家一样，感情被卷在无边广阔的热潮里。他发觉自己全身在燃烧。“人民需要你们，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人民欢迎你们！”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话，更叫人难忘呢？还有什么比这样的话，更能使作家、艺术家激奋不已的呢？

当然，谁也没有想到，仅仅短短的几年以后，这些为人民需要，受人民欢迎，同时又被人民尊称为“人民的文学家和艺术家”的在场六百多个人，至少有三分之二陆陆续续地被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划归到人民的对立面上去，直到毛泽东逝世，史无前例的“文革”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后，才为这些“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的文学家、艺术家进行了平反。

就在这次大会后十天，即七月十七日晚上，巴金在大会的招待所里，应《人民日报》约请，写下了一篇书面发言，题目叫做《我是来学习的——参加文代会的一点感想》，刊登在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全国文代会代表对大会的感想”专栏里。后来他回到上海，又在八月二十日上海《文汇报》上改成一篇短文发表，全文如下：

参加这个大会，我不是去发言的，我是去学习的。而且我参加像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集会，还是第一次。在这个大会上，我的确得到了不少的东西：

第一，我看见人怎样把艺术跟生活揉在一块儿，把文字和血汗调在一块儿，创造出来一些美丽健康而且有力量的作品，新中国的灵魂就从它们中间放射出光芒来。

第二，好些年来我一直是用笔写文章，我常常叹息我的作品软弱无力，我不断地诉苦说，我要放下我的笔，现在我发现确实有不少的人，他们不仅用笔，并且还用行动，用血，用生命完成他们的作品。那些作品鼓舞过无数的人，唤起他们去参加革命的事业，而且还要教育更多的年轻的灵魂。

第三，我感到友爱的温暖。我每次走进会场，总有一种回老家的感觉。在六百多个面孔中至少有一半是我没见过的，可是他们对我并不陌生，我看到的完全是诚恳的亲切的脸。我仿佛活在自己的兄弟们中间一样。谈话、讨论、听报告，交流经验，我不感到一点拘束。自由，坦白，没有丝毫的隔阂，好像六百多个人都有同样的一颗心似的。

应该说，这些都是巴金的由衷之言。他所反映的情景逼真；他所歌颂的眼前现实，是基于对过去的唾弃与批判。在旧时代，作家、艺术家为生活各奔东西，有的忍饥挨饿，有的到处流浪，不少人写作无目的，像一盘散沙，各不相关，甚至老死不相来往。他们没有人关心，没有人支持；犹如在黑夜中行走，没有人提灯为大家作向导。现在，一切改变了，这次不平常的团聚，曾给巴金和许多作家、艺术家带来了多少美丽的希望！



## 第二节在人民的欢腾中

在北平度过了热火朝天的七月，巴金八月初回到了上海。在这次回来路上，同行的还有冯雪峰。他是巴金在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时认识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巴金记得那时为鲁迅逝世，曾与雪峰一起参加了治丧工作。丧事结束后，王鲁彦约了雪峰和巴金一起到他家里吃饭，大家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因为雪峰虽是党员理论家，却并无架子，他耿直，真诚，又非常善良，与巴金十分契合。抗战期间，雪峰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斜对面的作家书屋里，一有余暇，就过来与巴金聊天，有时谈上半夜，甚至通宵，也不感到疲倦。现在革命胜利，两人一起从北平返回上海，无间的友谊加上对未来事业共同的信心，使他们谈得更为欢愉。

恰好这时从北平到上海的直达火车开始通车，他们就乘了直达车回到上海，再也不需要像六月间从上海去北平时那样在南京耽搁时间了。到了上海，气候已经进入盛夏，群众欢迎解放军进城的热情，到眼前还不曾稍减。先是七月间文艺

界慰劳解放军，影剧义演会串，广播募捐，又举行规模宏大的游园会，为观众签名义卖纪念品，张瑞芳、白杨、石挥、黄宗英、王丹凤、上官云珠、张伐等电影演员，和周信芳、李瑞来、金索雯等京剧艺人，都踊跃参加了。到了八月初，各行各业普遍举行劳军义卖，凡是属于日用百货业、棉布业、酒菜业，以至如浴室、旅馆、理发等服务性行业的人员，也都纷纷为慰劳解放军义卖和服务。这是上海人民发自内心的爱国热潮。上海人民亲身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生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对他们说来，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他们曾经多次起来掀起反抗的高潮，但都以失败告终。而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斗争，取得了革命胜利，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是如此严明，他们进城不拿人民一针一线，连一杯水都不叨扰人家；他们激战几昼夜，进入市区后只躺在马路旁休息。这与解放前国民党军队到处闹事，欺压人民，相比之下，真有天壤之别。现在上海人民能不欢欣若狂！他们都愿以自己最大的力量来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南下，争取全国各地都能得到解放。

巴金回到上海，听萧珊向他诉说了这一个多月来上海人民的热烈兴奋情况，脸上也不觉微微泛起红光，他也禁不住向萧珊讲了那些久别重逢的朋友们近况，只是萧珊问起为什么沈从文没有参加大会，巴金对这个问题却无法回答。眼前的巴金，他的感情完全沉浸在兴奋之中。因为在文代大会上接触到的场面，听到的和见到的，都给他以极为新鲜的感觉。他很想把自己的心情一吐为快，但是他又遗憾于在离北平前几天的那次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大会上，当人们高喊他的名字，要叫他登台讲话的时候，他却从会场上逃了出来，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上台讲话的经验，也没有向群众演说的才能，他不想以自己的缺点去折磨人。可是实际上，在他的内心里，有多少话要向朋友们说，有多少感情要向人们倾诉！说实在，他虽然在会场上有不少多年不见的老友，也有一些虽不认识却听别人谈起过他们的名字，但是真正认识他们，还是在这次大会上，因为通过这次大会，他才具体地了解到在解放区有那么一支很大的文艺队伍，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如《第七连》的作者丘东平，《随粮代征》的作者高咏等作家，他们不仅用笔，还用血灌溉了我们的土地。巴金认为自己写的书仅仅在一些大城市中间销售，而解放区的

同行们却把文艺带到山沟里去，带到农村中去；他们犹如长着翅膀能自由地飞遍全国，而自己却被四面的高墙围困着，活动的天地很小。他想起自己过去所了解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俄国有些革命者，他们宁愿不要高贵的身份，离开养尊处优的家庭，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投身到平民中间去干活，而现在这些解放区的文艺战士所走的道路，比过去那些俄国青年所做的更为彻底，而且他们也更为幸福，因为他们的工作有了开展，理想得到实现。特别使巴金感动的，是这些文艺战士用歌，用戏，用对人民无微不至关怀的心，在群众中散播了爱的种籽，给那些需要爱的人带来了爱，给那些摧残爱的人受到打击，而他们自己却从不夸耀自己的成绩，也不在什么地方写下自己的名字；眼前他们也不曾在大家面前显示英雄的外貌。巴金面对这些穿着平常，看来普普通通的同行，心中有说不出的感动与敬爱。

他真想找机会把自己的这些感想写出来。而眼前上海却有许多事情等着他料理，他只好暂时作罢。但是有些作家已经比他更快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一到上海，就向等候

在火车站的记者发表谈话，其中最积极的是胡风，他一开头就说：“文艺运动的新方向，是毛主席的方向。我愿意做毛主席的小学生。”然后他告诉记者，他已在安东造纸厂、丰溪重工业厂、皇姑屯铁路工厂生活了一个多月，他发觉“无产阶级创造性很高，组织性很强，他们肯自我牺牲。”他自己决定再进工厂去学习。他的谈话，在八月六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后来军管会文艺处又开会欢迎文代会代表南归，在那次会上，主持会议的是黄源，代表领导致辞的是潘汉年，他号召文艺界加强团结，要团结一切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开展更广泛的人民文艺运动。然后夏衍讲话，他要求大家谈谈参加这次文代会的收获，希望能通过谈收获，从认识走向实践。冯雪峰则称道这次文代会是中国革命文艺的大会师。巴金还像过去那样，在会上保持缄默，虽然心中有很多话要说。胡风却禁不住又站起来发言，他说：“我很惭愧，我想不到我到上海，而上海的革命秩序已经建立起来了。”然后又说：“革命文艺运动，不但文代会代表有资格参加，留在各地工作未曾参加文代会的人也应有资格参加。”接着他又表达了自己“下生活”去的决心。

巴金把在北平时在《人民日报》发表过的《我是来学习的一一参加文代会的一点感想》短文，修改后交给《文汇报》发表，在上海只住了四十天，九月初又去北平开会。因为七月间的全国文代会闭幕前，曾宣布成立了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他被选为文联的常务委员。这次是文联常委会开会。然后他还要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他和胡风同住在会议招待所华文学校中，两人住的房间相邻，原很有时间谈话，但胡风朋友不少，来看他的人很多，巴金也经常外出去找人，因此仍无倾心长谈机会。巴金对胡风的印象是不错的，他觉得胡风为人坦率，但似乎过分天真，他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时就看到过胡风，当时胡风虽比他低二班，五卅运动时却比他活跃。不过那时两人还不曾有过来往，也不曾讲过话。直到一九三六年他们才一起参加了鲁迅先生的治丧工作，还一起把鲁迅棺木扛入墓穴。当时胡风在编一本不定期刊物《海燕》，孟十还在编《作家》，黎烈文在编《中流》，黄源在编《译文》，巴金和靳以在编《文季月刊》，大家都十分敬爱鲁迅先生，把鲁迅作为团结的中心。还让鲁迅领衔，搞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宣言，来表达抗日救亡的主张。在抗战期间，巴金与胡风有一个时期都在重庆，两人也偶有来往，但是巴金对胡风从事的文学理论工作并不感到兴趣，因此两人在这方面很少凑在一

起，胡风似乎十分严肃认真地在做他的理论工作，巴金也以为他比自己进步，或者说他认为胡风更靠拢共产党。靳以也与巴金有同样的看法。甚至到了解放初期，巴金还没有意识到胡风其实与许多人有矛盾。当时他们住在一个招待所里，两人还与住在同一个楼面上的艾青、马思聪、史东山等人一起拍照，一起进餐。

这时巴金心中经常牵挂的仍是他的老友沈从文，这次来北平，又去看了沈从文，而且不止一次。七月间去看他时，同去的人多，有些话七扯八扯都扯远了；这次两个人细谈，才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原来在北平解放前后，当地就有人写文章批评他，有些还是在香港发表过的。最近又有一些报纸作了转载，批评的文章很尖锐，他的心里有些紧张。但他显然是希望从解放区来的个别熟人比如丁玲能给他讲些公平话。因为他（她）过去曾与他有过交往，比较了解他。但是也许由于他所期望的人——他（她）在延安整风中接受了教训，或者由于其他各种原因，要想帮助他而无法向他伸出手来，结果似

乎并不曾有什么人来帮助他。沈从文心里有点黯然。了解内情的人，知道他曾用小刀划破手臂上的血管，企求离开人间。但他得救后，并无什么怨意，脸上还是浮现着微笑，仍热情地招待着去看他的客人；并且听他说，准备去参加革命大学，或者干脆改行……

到了九月下旬，巴金接着出席文联常委会会议之后，又参加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届全体会议。如果出席全国文代会，根据巴金自己所说，是好像在狭小的笼子里，看到了长着翅膀的笼外的同伙；那么九月间的会，就不但使巴金看到了笼外的同伙，还使他看到了广阔的天空。

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制订了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人选，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徽和年号以及国都所在地。这个会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刻，它意味着旧统治王朝的覆灭，和新体制的诞生。巴金以他的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参与了这样一些重大事件决议的过程。历史把这个作家推上了政治舞台。他和当时中国其他一些杰出的作家、艺术家如茅盾、梅兰芳等人一样，在此以前，从未在中国的参政会上有过一个席位，但是现在他们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坐在一起。单就这样一个现象，就够被压得气都透不过来的中国的老百姓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兴奋若狂！同时也使这些热情的有个性的作家、艺术家，他们自己也开始卷入群众疯狂似的欢乐的热潮中。

随着政治上“一边倒”口号的提出，我们建国初期的许多改革，都是跟着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老大哥”学习的。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开国大典，百万人的大游行，这样巨大规模

的庆祝，在中国历史上旷古未有。这果然显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人民的团结坚强，与对敌人的巨大威力。这样壮阔的气势，当然激动了千千万万人，也激动了千千万万感情丰富的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当巴金站在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望见天安门广场上数不清的迎风招展的红旗，听见从下午三时开始，接连六个小时春雷般的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使他“如此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民光辉灿烂、如花似火的锦绣前程”，感觉到“心要从口腔里跳出来，人要纵身飞向天空”，“个人的感情‘消失’在群众的感情中间”，以致他在六年后还回想起这个“大欢乐的日子”，认为“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向全世界宣告中国

人民站起来的时候了”，那是“觉醒起来、团结起来的中国人民揭开了历史的新一页，结束了过去的痛苦和屈辱的生活，做了自己的主人。”以致他在十年以后，也还认为当年那个晚上，是他“最大的幸福”，他说，“望着广场上数不清的头和手，望着一片红旗的海洋”，“我知道一个幸福的时代开始了。”

当年巴金心中的欢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二十年代，他曾在一个晚上发出过“无边的黑暗中一个灵魂的呻吟”；在三十年代初，他又曾在一本书的序文里喊出“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的受苦像一根鞭子似地永远在鞭打着我。”他的作品里描写的几乎全是人们的苦恼，世间的悲剧。因为在他四十多年的生活中，他所看到的都是好人被压，穷人受欺，哪有今天这样几亿人民扬眉吐气，欢欣鼓舞？他写作时，常常因为主人公的悲惨死亡而流泪。他也曾想给正直的普通人安排一个幸福的结局，但是现实生活中，正直的人受到不公平待遇，常使他爱莫能助。因此，他的作品总是给人们增加忧愁，而无法给人们解脱痛苦。他自己也为此感到阴郁。而现在，革命胜利了，人们都在跳呀，唱呀，歌颂解放。他以为人民如此热爱共产党，反映出自己过去对党的认识不足，觉得自己应该和人民在一起，改造自己的思想，同时面对这样一个激动的场面，巴金也禁不住在心中喊着：“我要写人民的胜利和欢乐，我要歌颂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伟大的领袖！”

这时巴金和全国许多作家、艺术家一样，似乎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时常感到孤独和寂寞了。

### 第三节家庭与事业

解放给每个家庭带来了变化。霞飞坊的一百多户人家，因为人民政府的建立，人心渐趋稳定，人们不再为了保证市值，忙于把每个月的工资收入，急急地上街去换取银元。现在，有孩子的人家，几乎都有了腰鼓，这玩意儿即使不带它上街去参加庆祝游行，放在家里让孩子敲敲，也似乎能增加大人们的兴头：说实在，那时节，凡是上了学的儿童，个个都会哼那支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住在五十九号的巴金家里没有例外。萧珊持家，再也不担心大米与煤球涨价，她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看管四岁的小林身上。现在，这孩子已经能跟着邻居孩子一边唱歌，一边跳橡皮筋。自从懂人事以后，她的印象中爸爸总坐在三楼窗口写字台旁写字，或者横躺在二楼沙发上看书，一有空便逗着她玩，有时家中缺了保姆，爸爸就帮着妈妈生炉子，却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天天不在家。“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呢？”有时，小林就难免有这样的问话。在这时，萧珊就拿起报纸，从新闻报道中，找到北京开会的消息，揣测大概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巴金哪一天才能回上海。

这时萧珊已经怀孕。她希望有个男孩，而巴金却盼望为小林添个妹妹，为她作伴，以减轻孩子的寂寞。确实，自从解放后，巴金忙多了，即使在上海，也总在外开会。幸而萧珊有个知心朋友萧荀，她经常来霞飞坊帮助萧珊料理家务，使萧珊在寂寞的日子里也有个能够谈心的伙伴。萧荀是一九四四年与萧珊结识的。她本是巴金大哥李尧枚的大女儿李国煜的同学，战时曾到重庆沪江大学读会计系，还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过。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上海，她跟着来上海，在圆明园路沪江大学读夜校，住在巨籁达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里，仍在出版社工作。巨籁达路离霞飞坊不远，她一有空，就来看萧珊。当小林幼小时，刚学会讲话，就能迎着萧荀叫“好姐姐”。那时巴金刚在这里建立起家庭，经常有不少客人来谈天，有时还留下来吃饭，靳以、师陀、王辛笛、李健吾、黄裳等人都是常客。那时家里虽有保姆，萧珊还是自己喂奶，忙得团团转，连巴金有时也不得不放下笔来做点细事，甚至孩子把大便拉在地上，他也只好自己拿上一叠草纸把大便揩掉，丢到马桶里去。那时节萧荀就成了萧珊的好帮手，至少她抱着小林逗她玩，可以让萧珊在忙乱中用不到多费手脚。

萧珊经过几年家务锻炼，已不像初建家庭时那样生炉子都要巴金给她摇扇子。她操持家务，既勤奋又懂得节约，不少邻居都称赞她是个好主妇；但她到底出身大家，有时有什么事不如意，还不免闹点情绪，这时巴金就放下手中的书，下楼来耐着性子给她做思想工作，或者干脆帮着她做点家务劳动。凡是知道五十九号家庭情况的人都说，巴金比萧珊更有耐性。巴金只有在别人把他书桌上堆着的书翻乱时，才可能发脾气。

原来巴金在做单身汉的时候，就欢喜买书。二十年代后期在法国，不论在巴黎，还是在沙多一吉里，他都跑书店；三十年代到日本，他在横滨和东京也买了不少书。回到上海，人家在他的闸北宝山路宝光里那个亭子间里，看到凡是放东西的地方，都放着书。现在，霞飞坊的家，他那间三楼卧房，放在屋中央的几口红木书橱，已经把床和写字台挤逼到东西两个角落里，人只好侧着身子在书橱与书橱之间走路。他那个本来就作为堆书地方的三楼亭子间，就更不用说了。他爱书，有时近乎童话里的小女孩爱她的布娃娃那

样，连晚上做梦都要想着它。与他有同癖的是他的老友郑振铎，不过巴金买的书更多的是外文书，而郑振铎到处搜购的是线装的古书。使人兴奋的是刚解放时，和当年抗战胜利时一样，又一批外国人和中国人撤离上海，他们临行前卖出来一大批书，不仅使福州路一条长街到处是书摊，还使海格路（今华山路）靠近静安寺一带的旧书业货源充足，生意兴隆。这样，巴金和郑振铎、靳以、李健吾、陈西禾、黄裳等人都成了这里的常客。他们有时还互通书的讯息，偶然到各人家里鉴赏，作为业余生活的一种情趣。有一次巴金就曾与郑振铎一同专程到黄裳陕南村家里去看书。

巴金在解放初期几次赴北平开会，虽然十分忙碌，也还是抽空去琉璃厂旧书店集中的地方，买了几本珍贵的书籍带回上海。但他这时对他曾经耗费了十多年心血与精力，培育扶植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却已经难以继续主持下去了。这是因为内部的人事纠纷过于扰人。文化生活出版社经抗战胜利后几年的惨淡经营，业务有了发展，资产也有所增加，基础比过去稳固多了，在进步的新出版业中有了较高的地位和威信。这一情景，临近解放，愈显突出。但也就在这时，原先忙于自身工作的创建人，和一些过去与出版社有些关系的朋友们，都因形势变化，想再回出版社领导工作，或再跟出版社挂上钩以进入文化界。这样出谋献策的人多，相互间意见又不一致，甚至由此产生隔阂，巴金竟也成了矛盾的中心，原来简单的事也复杂起来，使书生气的巴金穷于应付。他没有想到他放弃了自己宝贵的写作时间，希望为人民做点实际工作，使出版社刚有了一点成绩，竟惹出如此多的麻烦，看来还不如埋头写作，从事本行的好。解放后半年多来，他几次去北京开会，出版社工作更难兼顾，因此先后辞去出版社有关职务，最后连挂名的总编辑也难以继续，全由老友吴朗西主持。恰好这时，冯雪峰来征求巴金意见，说国家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邀他去京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巴金想我连一个私营的出版社都没办好，被人事纠纷弄得烦恼不堪，怎么能领导一个国营的大出版社；还是专心从事写作，为新中国写点作品吧。好在胡、冯两位都是多年老友，想必能够谅解的。因此他把自己的心意表达了。结果冯雪峰只好自己应召赴京，把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职务承担下来。

巴金把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逐渐卸去后，却又不得不为后来的平明出版社出点力。这是因为这个新办的出版社的创办人李采臣是他的弟弟。李采臣原是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人员，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协助巴金总管业务，他对业务比较熟悉，办事干练；为出版社增加资产，有过不少贡献。他的缺点是说话锋芒毕露，颇为自负，往往给人难以共事的感觉。文化生活出版社本来就与一般企业、商店不同，它类似同人组织，组织机构又不很完善，有点关系的朋友都爱在这里发表意见，作种种干预，容不得李采臣这样不善于与大家搞好关系的人。所以在一九四九年冬天，巴金去北京开会期间，文生社董事会临时通过决定，要李采臣辞职。而平明出版社，正是李采臣辞去文生社工作后，拿出自己仅有的一点积蓄，找原立达学园的老同学马云、郑明远、陆清源、李德洪等人商量筹集股金开办起来的。这时，文生社的一部分老朋友，如王辛笛、李健吾等，也纷纷出钱认股，并要求巴金主持编务，作个挂名的总编辑。巴金不能坐视兄弟失业，觉得李采臣精通业务，在人民刚获得解放需要新文化的时候，让他再有一次锻炼的机会也好，因此巴金对平明出版社的编辑工作上曾给予有力支持。在后来短短的几年中，平明出版社共出版了《契河夫选集》《巴尔扎克选集》等书三百多种。

一九五一年三月，巴金的最小的弟弟李济生从四川来，他是应吴朗西电召来上海述职的，并商量今后重庆办事处的业务问题。济生主持文生社成都、桂林、重庆等分社有年，算得出版社的一个老职工。这时巴金刚从北京参加全国文联第四次常委扩大会议返沪不久，住医院为疝气手术后回到家里，为了不影响即将临盆生产的萧珊休息，他住在二楼。李济生来上海，也就临时搭个帆布床和巴金住在二楼那间平时接待客人的屋子里。他有与他哥哥那样的热情，并且心直口快，见了巴金更有说不完的话，两人睡在一间房里，外边的人听他们大声谈话，还以为有一屋子的人在里面。两人谈话谈到深夜，第二天醒来就迟了，于是小林从三楼下来，看这个新来的叔叔还躺在屋子中央，闭着双眼打鼾，便好奇地用小手去搔他的鼻孔，济生醒来，不觉哈哈大笑说：“别搔，鼻孔里脏——！”巴金也醒了，看小林一副好奇的样子，知道她听不懂济生的四川话，也就笑着对他说：“你别说脏，她不懂，上海人不叫脏，叫‘龌龊来’。”原来小林跟着她妈妈睡，也就跟着妈妈学上海话和浙江话，四川乡音自然感到陌生听不懂。济生住了一段时间，即随吴朗西去武汉，奉命返川结束重庆的业务。

就在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萧珊生下第二个孩子。一个月前，巴金就写信告诉过业已离开文化生活出版社一年了的田一文，他在陈述文生社目前情况已到了印不出书、发不出薪水的地步之外，还对田一文说萧珊就要生第二个孩子，认为“小林一个人太孤单，能添个妹妹也好。但以后不能再生了。”写了这封信后第二天，他又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并应邀出席了毛泽东为政协特邀人士举行的宴会，一起出席的有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冰心、老舍等作家。

当他开完这次会回沪，已是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前夕。这是忙于开会的年头，说不清的大大小的会，连他自己都已记不起究竟开了哪些会。因为除了政协与文联的会之外，还有许多会如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等等，他都要去参加。而在这样忙乱的日子里，他还译完了德国作家鲁多夫·洛克尔的短篇小说集《六人》，高尔基的几篇回忆录，和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蒲宁与巴布林》；写了解放后的第一篇作品《一封未寄的信》，还为罗淑译的《何为》写了新版前记。

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是在七月二十四日开幕的，主持会议的是夏衍。郭沫若和茅盾都从北京寄来了祝辞，郭沫若的祝辞是：“扩大并巩固文艺工作者的团结，树立批评与自我批评风气，为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的人民文艺的创造而奋斗。”茅盾的祝辞是：“加强团结，加紧学习，配合新上海的生产建设，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陈毅市长到会讲话，并抄录了一段《共同纲领》的话，献给大会：“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奖励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发展人民的戏剧电影事业。”会议开了六天，有报告，有发言，还有分组讨论，参加的有五百多位代表，选出了文联主席夏衍，副主席巴金、冯雪峰、周信芳、丰子恺等。大会开幕的第一天，巴金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会”把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他称道这个会加强了文艺界的团结和友爱，即将成立的“文联”将是我们的“一个甜蜜的家”。

就在大会的第三天，卅三岁的萧珊腹部出现阵痛，由她的好友萧荀雇了一辆三轮车把她送到预约好了的福煦路中德医院。巴金闻讯从会场赶来，却未曾听到萧珊生产的消息。但是当他知道医院已在待产室中为萧珊安排好了

床铺，并由萧荀陪夜之后，他才放心赶回会场。在第二天会上巴金被宣布当选为市文联副主席时，正是萧珊因难产而经受痛苦的时刻。她经受两天一夜的煎熬，终于度过了难关。为她接生的助产士沈庾香，是中德助产士学校的高材生，在一年多时间中已接了一百多个婴儿诞生。幸运的萧珊，虽然难产，却遇上了这么个助产士，得以不动手术。在廿八日晚上八点三刻，一个男孩终于出生了，他的身子茁壮，声音洪亮，这就是李小棠，三十多年后被人称为“八十年代文坛新人”的小说家李晓。

一个星期以后，巴金把萧珊从医院里接了出来。萧珊回到霞飞坊，发现她的女儿小林比原来更为活泼，而小林却发现她妈妈从医院带来了一个弟弟，她自己已成了姐姐。多亏萧荀的热情照料，并经沈庾香的定期来访指导，使萧珊产后体力恢复很快，萧珊、萧荀与沈庾香之间的亲切合作，还给她们带来了相互之间的友谊，多年以后，沈庾香与一个新闻干部结婚，自己也有了孩子，她把她的孩子给了萧荀，使不曾结婚的萧荀，也做了“妈妈”。

小棠出生后三个月，巴金的继母邓景蘧从四川来到上海定居，与她同来的还有与巴金同父异母的十二妹李瑞珏。她们到了上海，为巴金增添了热闹，也为萧珊减轻了一部分家务负担，但同时也使巴金的住房更加拥挤，幸而这时巴金有了一次出国的机会，那就是去波兰华沙参加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



#### 第四节为了和平的出访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上午，萧珊产下第二个孩子还不满两个月，巴金在上海刚开完市第二届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就准备当天下午搭京沪车去北京，然后再由北京出发去波兰首都华沙，参加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临行，萧珊特地准备了一顿比平时丰盛的午餐，为巴金饯别。因为火车一点半开车，与他同行的有金仲华、马寅初、盛丕华、袁雪芬、刘良模、黄宗英等人，大家约好一点钟在北站会集，所以萧珊带领保姆在午前十一点钟就把饭烧好。这是巴金结婚成家后第一次出国远行，五岁的小林听说爸爸又要离家，看着妈妈为爸爸准备好行装，她便把爸爸的手拉住，哭着不让他出门。

巴金看着小林的小脸，和萧珊手上抱着的婴儿，不觉想起这次出国任务的重要。他想：“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更美的将来。……倘使我们能够在和平斗争中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倘使我们能够为年轻的一代争取到和平，我们可以说是尽了父亲的责任，也可以说是尽了作家的责任，尽了人的责任了。”

人们该还记得将近两个月前，即这一年的八月二十七日，周恩来曾以我国外交部长身份向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抗议“侵朝美军飞机侵犯我国东北领空”。但美国飞机和军舰还是不断来侵犯中国领空领海；九月十五日，美军以三百艘军舰和五百架飞机，掩护四万多军队在朝鲜仁川港登陆，一直进攻到中朝边界鸭绿江边。十月八日，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发出了“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十月十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就跨过鸭绿江到达朝鲜前线了。

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的中国人民，忽然又面临着战争的威胁。

巴金没有忘记在抗战时期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战争悲剧。他曾在上海大世界门口，看到因炸弹落地发生大火，房屋被毁，人们成批死亡；他也曾在北站看到列车还不曾开出，而敌人的飞机已向车辆投弹，手无寸铁的乘客纷纷从车厢中奔出逃命，而敌机则尾随人群的奔跑而乱抛炸弹；他也曾经历广州等地的大轰炸，街道烟雾迷漫，刚才还在与大家说话的人，几分钟以后就变成血肉一片；他也曾在昆明看到敌人轰炸后的街景，楼房只剩了一个空架子，人们正在挖掘被炸死的尸体，一只沾满了泥土的小腿露在草席外，有人站在周围落泪，有个人指着尸体说：“那是陈家三小姐。”他也曾看到在那些年代妇女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母，老人无人赡养，婴儿丢在街头。人们生活悲惨，文化人贫病交迫，不少朋友忧郁而死。

战争是多么残酷，和平是多么可贵，巴金认为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任务应该是宣传和平，反对战争，希望人们能团结友爱！

他抱着这样渴求和平的心情，告别了家人，告别了上海，与大家一起上了火车。经过两天旅程，在二十七日早晨，他们到了北京，住在东方饭店里。当天晚上，郭沫若向大家汇报了这次中国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团筹备经过。巴金这才知道这次代表团共有十七个代表，郭沫若是团长。

第二天深夜，他们接到通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派了专车来，邀请十七位代表前去中南海开会。到了那边，巴金坐在后排，只见周恩来拿着名单，向大家问：“巴金同志来了没有？”巴金站起来回答说来了，周恩来就过来与他握手，并问他身体好吗？在上海生活得怎样？出国参加外事活动，手头

工作不受影响吗？巴金一一作了答复，发觉日理万机的周恩来还像抗战时期在重庆那样关心大家，使人心里感到温暖。

周恩来显然认为代表团中有的人并不一定能像他自己那样认识目前的国际形势，也完全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抗日战争胜利了，解放战争胜利了，正该埋头重建家园，现在又要拿起武器去支援朝鲜战争，不是要影响国家建设吗？

于是，周恩来把这一年来的形势分析了一遍，然后他又重述了二十多天前他在政协一次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国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他又说：“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他还指出，“苟安不能得到和平，火烧到自己家门口，我们要建设也不可能。”最后，周恩来还分析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本质，他把毛泽东主席这句话作为真理，向大家作了阐释。

巴金听了周恩来两个小时的谈话，觉得心里明白了一些，他对这个问题原先多少也有些疑虑，现在那些疑虑消失了。特别是关于我国人民与朝鲜人民的友谊，周总理讲得那么具体，那么生动，给他的印象是那么深。这也使他想起抗日战争前与抗战期间他所接触过的朝鲜朋友，他觉得他们对革命的热情，对同志的友爱，都是很难使人忘记的。

时间虽然已经过了午夜，但回到东方旅馆，他一点也不觉得困倦，他原是习惯于通宵写作的，现在他又拿起了笔。他是这样激动，他觉得他应该把自己想到的，去告诉那些西方作家，让他们也能像自己那样明白过来，把保卫和平作为作家的责任。

他写的是一封公开信。他先介绍了自己的国家，说我们这个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曾经发过灿烂光辉的文化”，也有着“广大的山明水秀的国土和众多的刻苦耐劳的人民。”但是“人民几千年来受尽了封建制度的剥削、榨取，一代一代在专制独夫的残暴政治下面憔悴死亡。”他们忍饥受寒，但是他们也从未失去斗争的勇气。

巴金又介绍了上海，因为他是从中国的上海来。他最熟悉上海，因此他在信里把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作了十分具体形象的描写。他说：“一只一只的远洋轮船，载来一批一批的冒险家。他们利用这里的廉价的劳动力，开办工厂，制造商品，争取广大的市场，并且组织发行网推销他们从海外运来的剩余物资。他们在这里建造了高楼大厦，过着舒适豪华的生活。而上海的人民呢，却蜷缩在寒冷的小屋中、摇动的阁楼里，睡在高楼前的人行道上，挤在苏州河边的乌篷船中。在这里成千的工人为了微少的工资把生命消耗在不合卫生的工作条件下面，在这里小孩挨饿，妇女受辱，和平的人民被人枪杀，人间最可宝贵的东西——劳动力毫无原因地被浪费，被糟蹋。这就是帝国主义的一百年来的成就……”

巴金写到这里，时间已经接近黎明，他没有写完。他需要休息，因为天一亮，他又要和大家一起参加活动，明天晚上，他们就要启程去华沙了。

他是在去华沙途中，在西伯利亚的火车车厢中，把这封给西方作家的公开信写完的。

在继续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的脑子里还留着刚在北京车站上，北京人民向代表团送行的热烈景象。晚上九点钟，灯光照得车站如同白昼，站上红旗招展，人群拥挤，北京市长彭真代表北京人民向大家表达了对和平的期望，

表示为保卫和平，愿作出一切牺牲。并向大家带来讯息，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率领下，已举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已迫使美军和李承晚军队退至清川江以南。

此刻，巴金坐在西伯利亚的火车中，车厢比较宽敞，卧铺也比较整洁，但是在这样的深晚，他仍不想睡觉，禁不住把前晚未写完的信稿从皮包中拿出来，继续写道：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光辉的开始。中国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者，推翻了反动统治，解放了全中国，只是为了一个和平的企图：把中国建设得更好、更美，……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可以说我们比谁都更爱和平，更宝贵和平，更需要和平……”

“但是现在和平受到威胁了……落在朝鲜土地上的千万吨炸弹便是对世界文明的严重威胁……”

“作为有良心的作家，我们有责任团结全人类，帮助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撇开思想、宗教、语言、肤色的差异，只要是善良的人，只要是爱和平、爱人类的人，让我们团结在一起，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奋斗，为创造新世界的文明而奋斗。我们有责任使受骗的人们睁开眼睛，我们有力量救出即将充当炮灰的年轻的生命的生命，我们更有把握看见侵略者的王国的崩溃……”

“我还记得我动身到华沙来的时候，我的五岁的女孩依恋不舍地拉住我的手不肯分离。我爱我的女孩，每个父亲都爱他的儿女。年轻的一代的确是可爱的。我们这一代已经受够苦难了，可是我不愿意看见孩子的小眼睛上有一滴泪水，我不愿意让谁伤害一根年轻的头发。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更美的将来。为着年轻的一代我们应当贡献我们的精力和生命……”。

当然，这封信在火车上也还不是一个晚上写成的，断断续续地写了几天，直到十一月初在车厢里的最后一个晚上，巴金才把它写成。当他把笔放在袋里，他好像看见他的小林又在他的身边，拉着他的手，摇着摇着，同时也看见他的那个新生的婴孩——他曾为他起了一个与他自己的名字“尧棠”连在一起的名字：小棠——闭着眼睛甜睡在他的母亲怀抱里。

“我愿意每张嘴都有面包，每个家都有住宅，每个小孩都受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巴金把自己年轻时期的理想，都与眼前的现实联系了起来，于是，他困倦的眼皮不觉开始渐渐下垂。他不由自主地睡着了。

在西伯利亚国际列车中，他们共度了十个夜晚，在十一月九日才抵达莫斯科，并在当地参观了列宁博物馆，瞻仰了列宁陵墓；然后在十二日又随代表团搭乘从莫斯科去华沙的火车，于十三日抵达波兰首都华沙。

在代表团的十七个人中，大部分都是巴金的熟人，其中特别是郭沫若和金仲华，巴金不但早与他们相识，而且还觉得他们两人待人真诚，十分可亲。巴金常以这次旅途能由郭沫若担任团长感到高兴。他觉得郭沫若在国际交谊中，精神饱满，富有感情；在平时谈话时，他也一向待人恳切，并无虚假。至于金仲华，他在战前编《世界知识》，原是国际问题专家，巴金与他接近，常感到非常愉快。解放后巴金也还经常到他家中，不仅在他家中品尝他母亲烧菜的手艺，而且还时常听他亲切、诚恳的谈心。他知识丰富，谦虚耐心，善于听别人意见。他生活俭朴，甚至每晚睡在三用沙发上。他长期与母亲住在一起，只留一个小外孙女在自己身边。这次巴金与他一起到华沙，有更多

机会相互关心，巴金为此高兴。

第二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是在他们抵达华沙后的第三天召开的。当时有七十多个国家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大会。地点在波兰语出版社大厦。主持大会的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参加大会的各国代表团团长在连续的几天会上，也纷纷发了言。继苏联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发言后，第二天，中国的代表团团长郭沫若也发言了，他的声音洪亮，很有感召力。中国代表团团员之间感情融洽，生活愉快。他们有时也三三两两在华沙街头散步谈话，有时还遇到一群孩子向他们高呼：“博孤伊（波兰语：和平）！”然后向他们递上纸和笔，要求他们签名。当他们签好名把纸和笔还给孩子们时，孩子们便连称“谢谢”，回去了。看来波兰人民包括孩子们在内，对出席大会的各国代表是十分友好的。闭幕那天，从早晨六点钟开会，一直开到午夜，的确很累，但那时巴金他们还在壮年，生活又十分新鲜，纵然开会时间那么长，情绪也仍十分兴奋。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大家来到场外喝咖啡，谈起各人的感受与今后怎样工作，金仲华情不自禁地对巴金说：“我们互相帮助，共同前进吧。”他那出自肺腑、毫无半点虚情假意的态度，直到几十年后，巴金还留有印象。

这次出访，最盛大的场面，是在大会闭幕那天晚上，即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深夜。那是一次波兰人民群众表达憎厌战争、要求和平的集会，是环绕着欢呼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胜利闭幕而举行的一次大游行。台上是波兰政府的领导成员和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七十多个国家代表团代表，他们穿着不同服装，讲着不同语言，但有个共同的愿望：要求和平！反对战争！台下的人们，穿着各种漂亮的衣服，举着颜色不同的旗帜，唱着嘹亮动听的歌曲，跳着姿态优美的舞蹈，走过检阅台前，与台上如雷的掌声，欢呼声，互相照应。

这确是一个美丽的夜晚，使长期生活在孤独、寂寞的旧社会里的巴金感到振奋。他像去年在自己国家里庆祝建国大典一样，为能在台上看到人民群众这样热烈、这样欢乐的场面而觉得幸福。

他的欣慰是基于对人民的热爱，对旧世界的憎恨。在旧中国漫长的黑暗年代里，人民生活困苦，许多人被压在社会最低层，忍饥挨饿，流离失所，而魂在人民团结，生活改善，社会渐趋安定，群众拥护共产党，因而他也感到由衷的兴奋，并觉得要纠正自己过去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在实践中改造自己的思想。而今天，在华沙城过着这样美好的夜晚，他面对如此盛大的国际性节日，内心欢愉也是无法形容的。这是因为他非常了解这个城市的昨天：那是在一九三九年秋季，当华沙市民被政府的官员们抛弃，向入侵的德国法西斯军队进行自发的抵抗，而终于弹尽粮绝，英雄的战士成千上万倒下以后，剩留下来的大批妇女与孩子，从此在侵略者的铁蹄下过着非人的生活。一九四三年夏天，在华沙城的犹太区曾有几十万的犹太居民被成批屠杀，起义的人民用少量的手枪和长镐，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飞机大炮和机关枪，在坚持了三周以后，剩下站在正燃烧着的六层大楼屋顶上的最后三个人，他们用波兰国旗包住自己的躯体，高呼“波兰万岁！”那是在一九四四年秋天，华沙城有二十三个妇女和两个女孩被纳粹匪徒抓了起来，被当作活的路障来掩护匪军向波兰起义军进攻，其中有个母亲对孩子说：“要是我给打死了，你得记牢：你不要流一滴眼泪，你不要悲伤难过，你得保持波兰女人的尊严，不要在他们面前露出你的软弱！”就是这些血的历史，长留在战后全世界被压

迫的人民心中，也留在巴金的心中。

现在新的华沙城出现了，从废墟上建筑起来的住房、学校、医院、博物馆都非常具体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所有华沙人民都成了向废墟作斗争的勇士，他们用和平的手重新建设了文明的城市，还以最大的努力建造了一个全欧洲最大的印刷厂，这就是可以容纳三千人参加的“波兰文学之家”，也就是这次召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会场。

象征着战后人民胜利，迫切要求和平的华沙城这次盛会，使巴金由衷感动。他热爱人民，看到人民胜利，并为胜利而欢乐，由此他也十分欢乐。在会上，他听到一个波兰女代表以母亲身份向大家宣称：“在波兰有六百万的男人、女人和小孩死在战争里。至今还有一百五十万的孤儿在哀哭他们的父母。”他也就情不自禁地和大家一起高呼保卫和平！当然，这时人们不会想到，四十年以后，波兰人民忽然又一次起来，重新建立起他们的政府。但这并不是四十年前人民的过错，也不是四十年后人民的过错。历史虽然如此无情，但相信它总是滚滚向前。

当时巴金与郭沫若、金仲华等一行十七人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在华沙过了一个热烈兴奋的节日般的晚上以后，又在波兰逗留了四天。他们在奥斯威辛参观了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集中营，又在波兰古城克拉科，欣赏了一次交响乐演奏会，访问了一家钢铁厂和这个厂的工人宿舍，同时还在这个古城看到了七百多年前的波兰王宫。

四天以后，他们离开波兰来到莫斯科。在苏联，他们以二十多天的时间进行了参观访问。他们到过莫斯科红场，列宁格勒冬宫，列宁故居，还在列宁墓前献了花，在普加乔夫受刑台前作了凭吊，同时又看了彼得大帝铜像，游览了高尔基艺术剧院，和柴可夫斯基音乐厅，在那边观赏了柴可夫斯基的舞剧《天鹅湖》，和普希金的舞剧《青铜骑士》。

## 第五节在朝鲜战场

巴金一回到上海，人家要他去参加的各种会议还是每天排满，而他仍在晚上勤于执笔。就在这个时期，他发表了他的译作《红花》与《信号》，那是只活了三十三岁的旧俄时代作家迦尔洵的短篇小说，他在俄国文学史上曾被称为“社会心理小说的创始人”。巴金还把这个作家的生平介绍给中国读者，然后又加了迦尔洵的另外两个短篇《一件意外事》和《癞蛤蟆和玫瑰花》，用以揭示沙皇统治下人民痛苦的生活。

此外，巴金还把这次出访华沙，在途中和回来后写成的有关散文，编成一个《华沙城的节日——波兰杂记》：另把在奥斯威辛所见所闻，编译成一个图画集《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一并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当时平明出版社人手虽少，业务却逐步发达起来，几年工夫，不过增添了一两个人，书却出版了不少。译笔谨严的傅雷对出版要求一向很高，但他对巴金十分信任，他把自己重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几部名著全部交平明出版社出版。巴金还在过去编辑工作中发掘了个翻译新手，并给以培养和充分信任，把二十八本的《契河夫选集》翻译任务交给他，这就是后来成为翻译界名家的汝龙。

从波兰和苏联回来后第二年，国内随着土改、镇反运动的开展，同时在知识界开始了思想改造运动，和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巴金是看过电影《武训传》的，他记得当时是作为解放后一部重点影片来鉴赏的。赵丹在三十年代主演的《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巴金很早看过。这次赵丹在影片里饰武训，他的演技十分传神，他那老泪纵横受尽侮辱，仍然坚持求乞募捐办学的形象，曾给巴金以深刻的印象。但是现在这部影片受批判了，许多人为它说过好话，现在都作了检讨。在上海，连夏衍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误。巴金幸亏在看了《武训传》影片后，没有公开发表过什么言论，他总算逃过了这个403403关，没有参加这一次文艺批判运动，但是他对赵丹当时的心情是想象得到的。不久，他又离开喧闹的上海，参加老根据地华东访问团沂蒙山区分团，到山东地区参观访问。他是抱着改造自己思想的心情，去这个老根据地进行了解和学习的，虽然在名义上他是这个分团的副团长，同行的人不少，其中有他的老朋友靳以，和靳以的同事、在复旦大学教书的方令孺。

七八月里的天气，非常炎热，而在沂蒙山区，这时却是雨季。他们先到了潍坊市，然后从潍坊到沂水。巴金跟着大家沿路聊天，留心周围事物，随时向大家谦逊地提出问题，了解情况。他像新闻记者一样，经常手里拿着一本笔记本，凡有可记的，他都把它们一一记下。有一次，大家乘着客车在公路上行驶，中途遇到了大雨，恰在这时汽车要摆渡到对岸，而车上人多，渡船怕超载，只好动员一部分人下车。巴金知道后，他首先下车，接着大家也就纷纷跳下车来，汽车和人终于分批顺利到达对岸。巴金从不以自己是访问团的领导成员而高人一等，享受特殊待遇。在这一点上，靳以和方令孺也是这样。方令孺性情坦直，心里藏不住一句话，凡是她想到的，她都要说出来。她也抱着知识分子要改造思想的决心，所以在访问老区过程中，主动找苦吃。她和一个女同志同住在一个农民家里，她的床就傍着一具棺材，她并不在意，还把它作为锻炼自己胆魄之用。巴金过去与她虽认识，却不很了解，从那时

候开始，他与她熟悉了，并和靳以一样，称她做“九姑”。

巴金一到莒县，就和靳以、方令孺他们一起住在一个小学的校舍里，自己挂蚊帐，自己扫地，自己洒洗。他们冒着炎暑步行，走到沂水专署，分批接待烈属和军属，然后和大家一起座谈。当这些烈属和军属老人来到时，巴金看到他们满身汗水，就亲自给他们倒洗脸水，还为他们点火敬烟。在座谈会上，巴金与靳以、方令孺等都热情地不断提问题，向老人们请教老根据地人民的斗争历史，和眼前的生活情况。巴金在老区参观访问过程中，每到—一个地方，都如饥似渴地希望自己能对新的世界多了解—些，能多熟悉—些，多懂得—些。但每当群众知道他就是著名作家巴金，向他求教，要求他能向大家讲—些话时，他却总是红起脸来，—句话都讲不出，最后只好仍像他在抗战前那—次向—些中学生讲话时那样，十分腼腆他说出—句：“我不大会说话。”

巴金急于要求自己接近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群众生活，并在写作上表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不久，他终于上朝鲜前线去了，他的决心是很大的。这次赴朝战地访问团是以中国文联名义出面的，实际发起和组织者，是当时在中宣部文艺处担任处长的丁玲。丁玲虽然三十年代曾在上海生活过，但她在解放区的一段经历，显然这时比巴金那样一直在白区工作的人要有更多的发言权。她在半年前，曾在报刊上发表过对青年作指导性的文章，题目叫《在前进的道路上》和《跨到新的时代来》，她在谈到巴金的作品时说，巴金作品虽然“对革命起过好的影响，但他的革命既不要领导，又不要群众，是空想的，跟他走是永远不会使人更向前走。今天的巴金，他自己也就要纠正他的不实际的思想作风”。她鼓励巴金到朝鲜战场去，并经中宣部安排让巴金担任这个访问团团团长。巴金抱着为人民改造自己思想的决心，和代表团的另外十五个成员，去北京北官房二十号文学研究所宿舍，进行了三个星期的赴朝前的学习，终于在一九五二年三月七日启程离京。这个访问团除了巴金，还有担任副团长兼党支部书记的葛洛，和访问团其他成员古元、白朗、王希坚、罗工柳、辛莽、菡子、谔斐、寒风、西虹、高虹、西野、王莘、伊明、黄谷柳，这些都是当时著名大作家、美术家和音乐家。

他们在沈阳住了几天，然后又到安东宿了一个晚上。十六日下午乘火车跨过鸭绿江，—到志愿军政治部，就被安排分散住在朝鲜老百姓家里，但—到夜晚，住处附近忽然受到敌机轰炸。为了保证作家、艺术家们的安全，政治部甘主任就要他们搬家，并很快把他们的行李全部搬到半山上的坑道里去了。由于山路很陡，上山要费很大的劲。山上坑道深而且长，幸亏里面有灯，还放了小床和小桌，可以住宿，也可以工作。当天晚上，政治部还给大家开欢迎晚会，开完会已经十—点半了，宣传部卓部长陪巴金在黑暗中上山，巴金跌跌冲冲，差点儿摔倒，幸而通讯员扶住他，才好不容易来到宿舍的洞口。

二十二日上午，他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会见的地点在山下大洞内的—个办公室里。彭总—看到这些作家、画家都穿上了军服，非常高兴，第—句话就是：“你们都武装起来了！”接着又发现十六个人中有几个女同志，就说：“你们里头有好几个花木兰！”接着，他开始谈话，讲了三个小时。后来宋副司令员和甘主任也讲了话。宋副司令员对大家来朝鲜战场表示欢迎，彭总插话说：“我虽然没有说欢迎，但我心里是欢迎的。”大家笑了起来。彭德怀还留大家吃了饭。饭后在洞口休息，洞外大雪飘飘，洞中却很暖

和。

在与彭德怀会见后第二天下午，大家讨论了彭总的谈话。许多人在谈了感想后，鼓励巴金写一篇“会见记”。隔了两天，巴金就把文章写好。这就是后来在我国五十年代文坛上被大家到处传诵的那篇著名散文《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这篇三千字左右的文章，对彭德怀将军有不少生动的描写：

……他进来了，我们的注意的眼睛并没有看清楚他是怎样进来的。一身简单的军服，一张朴实的工人的脸，他站在我们面前显得高大、年轻。他给我们行了一个军礼，用和善的眼光望着我们微笑说：“你们都武装起来了！”就在这一瞬间，他跟我们中间距离忽然缩短了，消失我们亲切地跟他握了手，他端了一把椅子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我们也在板凳上坐下了。他拿左手抓住椅背，右手按住桌沿，像和睦家庭中的亲人谈话似地对我们从容地谈起来……

他的明亮的眼睛射出一种逼人的光，我们看出来他对美帝国主义的憎恨跟他对朝鲜人民的热爱是一样的深。他有点激动了，揭下军帽放在桌子上，露出了头上的一些很短的白发。这些白发使我们记起他的年纪，记起他过去那许多光辉的战绩。我们更注意地望着他，好像要把他的一切都吸收进我的眼底。大部分同志都不记笔记了，美术组的同志也忘了使用他们的画笔，为的是不愿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听着他的浅明的、详细的、反复的解说，望着他那慈祥中带刚毅和坚定的表情，我感到一股热流通过我的全身。他的朴素的话语中流露出对民族对祖国的热爱。他的恳切的表情上闪露出对胜利的信心……

巴金把文章写好后，交给访问团的支部书记葛洛和其他一些同志看了一下，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巴金参考了他们的意见，又增加了几句话，然后把这篇散文交给新华社。第二天，彭德怀从新华社看到原稿，写了一封信给巴金，要求作一些修改，他用的是商量的口气，信的原文说：“巴金同志：‘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可否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许可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些，使我有些害怕！致以同志之礼！”

巴金读到这封信后，觉得彭总提的第一个意见提得很对，大家在感性上确实曾有过那么一个过程：在未见到彭德怀将军以前，大家都听说他是个严肃的人，所以刚见到他时觉得他是个长者，后来他坐在大家面前，听他的谈话，渐渐地产生一种与亲人谈话的感觉，因此就把“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改成“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了。

巴金在朝鲜七个月，他曾到过平壤、开城，但更多的时间是在战场上与战士、干部一起生活在从兵团到连队里。他写的都是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普通战士。在进入朝鲜以前，他曾读过别人写的反映志愿军部队生活的通讯报告，他对志愿军战士也有一些印象，他总认为他们与自己总有一些距离，但是没有想到，真的到了部队，他的真诚、坦率、谦虚，以及满腔的爱国热情，受到部队同志热烈欢迎，并给予无限信任和尊敬。这些战士极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的非常单纯的年轻人，他们的爱国心，与他们对抗美援朝意义的认识和理解，几乎与巴金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往往主动向巴金伸出友爱的手，像接待兄弟一样把他接待到连队里，接待到战壕里，只要巴金提出什么要求，他们就一定加以满足。他要看什么，他们就给他看什么，他要求谈什么，他们就给他谈什么。他们经常冒着炮火封锁线，陪他上前沿阵地，和战士们一起



开小组会，一起听指导员讲话，有时还跟着战士或通讯员一同爬山过岭。在途中谈生活，拉家常，甚至讲笑话，或者坐在朝鲜老百姓家的屋檐下，听他们讲怎样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烈士们怎样为祖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战士们年轻、健康、淳朴的脸，的确给过巴金以深刻的印象。他们那种“一人吃苦，万人幸福”的忘我精神，也深深感动过巴金。他甚至觉得他在年轻时代所向往所追求的殉道精神，在这里得到具体体现。他相信自己这一段生活将对自己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在生活上和在创作上都将有所变化。“每天我都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推动我，有一种感情在激励我，有一种爱在我心中燃烧”。他曾几次表达自己在这个时期对生活有过这样巨大的冲动，和认真的非凡的实践。

他确实以他热情、流畅、朴实、诚恳的文笔写了不少反映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的作品。读过他的作品，谁都会体会到巴金的心头积藏着无数志愿军战士的英雄形象。为了写好这些英雄，巴金在保持他原有的风格外，调动了艺术上各种手段，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故事把他们表现出来。作为认真从事创作的正直作家，他的确用尽了他的所有力量，他用最多的篇章献给站在最前线的普通战士们。他以两万四千字的短篇小说《黄文元同志》，塑造了一个志愿军战士的典型：他出身农家，父亲从前耕过地主的田，现在日子好过多了，有个小妹妹在乡里上学，在他去年五月报名参军出来的时候，乡里正进行减租退押，他们全家都感谢共产党，他自己做梦也想见到毛主席。他每隔三个星期给他父母写一封信，但双亲都不识字，他们托人给他写回信，鼓励他为人民立功。他曾在一次占领一个无名高地的突击战中，与副班长一起各人抓到一个俘虏立过功，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他在等待着机会。终于又一次反击战开始，他随他所在的排在深夜出发到了潜伏地点，离山顶上敌人的铁丝网不到一百米，为了不使敌人警觉，同志们都严守纪律，一点响动也没有，而且身上从头到脚都插满野草，把自己伪装起来，直熬到第二天下午两点钟，敌人突然盲目地打起炮来，一颗燃烧弹落在黄文元身旁，他的身体着了火，如果他这时站了起来，或者在地上打个滚，他身上的火还是可以扑灭的，但这必然会惊动敌人，使目标暴露，不但反击任务不能完成，参加反击的两个排的同志都有被消灭的危险。因此，他只好一点不动，让火在自己身上燃烧，终于牺牲。

《黄文元同志》是巴金第一次赴朝鲜时的一篇小说创作。这确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小说通过“我”，写了不少有关黄文元与“我”在班里共同生活时的情景，他为人纯朴，诚恳，勤劳，勇敢，还富有理想，十分关心别人，与“我”在短时期中建立起来的友谊，是使人难忘的。由于前面的描写十分细腻，读者对黄文元的印象很深，所以在他为争取反击战的胜利，保全同志的安全而牺牲时，更使人增加悲壮的感觉。

这个时期，巴金写得更多是反映真人真事的散文。这里有在执行任务时，误踏敌人地雷身负重伤，依靠未受伤的右膀和右腿，爬了十天九夜，从敌人阵地回到自己阵地的张渭良；有所住的洞子被敌人炸塌，自己被封在洞里，仍敲着碗，唱着歌（《王大妈要和平》、《东方红》和《歌唱祖国》），让外面的同志听到后挖土救出的赵志仁；有在成群的敌人中间投下一个飞雷，趁着敌人血肉横飞乱成一团的时候，以无比的镇定和勇敢，补充自己的弹药，使六十三个敌人都成了他的俘虏的刘光子；……那时，巴金“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他结识过很多的志愿军战士，甚至当他在那年十月准备离朝鲜回国

时，他还逐一地记述了“那些兴奋的日子”的记忆，用来告别使他难忘的那些战友。他像那些战友在阵地上不断变换战术一样，他这次写的散文用的是与对方直接讲话形式，比如他写那个在铁原阻击战中坚守二二二高地英雄，他就这么写：“徐申同志：这四个月来我常常想到你，想到你脸上的笑容，想到你的响亮的声音。你谈到去年国庆节你归国观礼在天安门看见的景象，谈到在北京意外地见到母亲的情景，那时你多么地兴奋，……”比如他在写那个在国寺峰阻击战中的独胆英雄时，他就那样写：“陈超同志：孩子们的歌声一定会给你唤起不少痛苦的回忆，但也会给你带来温暖。因为你是一个女孩的父亲。旧社会使你跟你的孩子于分开。新社会让你给你的孩子带来光荣。过去的痛苦日子不过是一场梦魇。你已经在新社会中为祖国为人民立了功勋……”又比如在写曾与他一起生活过的那个副连长时，他就这样写：“李平同志：我们分别不过一个月，可是你的面貌常常出现在我的眼前。功臣榜上没有你的名字，然而称你做‘一个最可爱的人’，你应该毫无愧色。跟你在一起生活的半个月中间，我得到不少的益处。在做人和处理事情两方面，我都得向你好好地学习。作为一个副连长，你把战士当作自己亲兄弟一般看待。再没有人比你更可爱了。要是战士受到一点委屈，你的脸上就露出痛苦的表情。我时常想起我跟你一块儿去看望病号的那几个黄昏，你那么殷勤地照料病人的饮食，关心病人的生活……”

这些战友对巴金及其伙伴们确也如对待兄弟那样欢迎他们。他们不但为他安排床铺，为他准备饭菜，一到连队，有时还在土墙上张贴标语，“祝巴金、黄谷柳同志身体健康！”黄谷柳是广乐作家，访问团下部队常把团员分散成几批，黄谷柳经常与巴金在一起，巴金曾在他的小日记本上题写字句：“我等着您的歌颂平壤的诗篇！”巴金还给志愿军那些搞政治工作的干部写信，虽然他们在功臣榜上没有名字，然而他们却是启发、鼓励、帮助英雄立功的人。巴金说：“我越注意你们的生活，越了解你们，我越不能不敬爱你们。”当他发觉与他同住在一间土屋子里的一个科长，在胃病折磨中始终没有停止工作，始终用一只手捂住肚子，让另一只手不断写着字，巴金想最好有个热水袋，多少可以减轻他的痛苦。他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上，直到他离开朝鲜后几天，在沈阳一家百货公司找到，便买了带给那个科长。这些同志，他们“每个人的心里都燃烧着祖国的不灭的灯火”，使巴金也像文工团的女同志那样，觉得能够为战士们做点事情是“最大的幸福”，觉得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多大的光荣！”

巴金在朝鲜战场生活了七个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为保卫祖国安全而表现出来的献身精神，使巴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更有所寄托。他从这些纯朴的人们身上汲取了创作力量。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以朝鲜战场为题材的创作，并不曾由于他已写出了诸如《坚强战士》、《黄文元同志》等较好作品而就此停笔。相反，朝鲜战地生活成了他在解放后进行短篇小说创作的题材仓库。他不但在一九五六年写了《活命草》和《明珠与玉姬》，还在六十年代初期连续写了表现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人物的作品如《团圆》、《无畏战士李大海》、《副指导员》、《回家》等七个短篇小说和一个未发表的中篇《三同志》。甚至在“文革”十年动乱结束，他在重新恢复写作后不久，还以《杨林同志》为题，写成了在《巴金全集》中的最后一篇短篇小说。

这些短篇小说曾在一个时期作为我国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

许多反映我国五六十年代短篇创作成就的文学选本，也都把《坚强战士》、《黄文元同志》、《明珠与玉姬》、《团圆》等作品编选入内。其中《团圆》改编成电影剧本《英雄儿女》上映后，还曾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欢迎。

## 第六节作家缘

这一年十月中旬，巴金和赴朝访问团十几个作家、艺术家一同回到北京。

北京刚度过热闹的国庆三周年，街头节日气氛还是到处可见，王府井大街上的商店玻璃橱窗，仍是五彩缤纷，在吸引着行人，就连马路上的彩牌楼也还未拆尽。气候更是秋高气爽，满街一片晴光。四十九岁的巴金，精神抖擞，充满信心，兴匆匆来到西堂子胡同顾均正家里，与特地从上海赶来迎接他的萧珊和他们的七岁女儿李小林会面。

萧珊自从与巴金结婚后，从未有过这么长一段时间的别离。虽然巴金在朝鲜每隔一些日子总给上海家里寄信，但萧珊总无法回答小林经常吵着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幸而这时小棠已牙牙学语，并开始学步，不像喂奶时期那样离不开身；还专门雇了一个叫丁香的保姆带领小棠，有时萧荀还被邀请住到霞飞坊来，和萧珊作伴睡在同一张床上，帮着照料小棠和小林，使萧珊有可能也有些时间努力学习俄文，并从事屠格涅夫作品的翻译工作，同时还抽空代巴金处理一些读者来信。当然，继母虽说上了年纪，瑞珏进了平明出版社做会计，工作很忙，但她们也还是帮着做点家务，包括看小孩，这样萧珊就能有机会带着小林来到北京迎接巴金。

顾均正原是他们在霞飞坊的老邻居，建国前他与巴金时相过从，巴金有关开明书店的事，常常托他带讯。不但巴金与顾均正是好朋友，萧珊与顾均正夫人（他们叫她“国华嫂”）也十分熟悉，因为萧珊到了上海后，刚碰到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物价飞涨时期，市上哪些日用品缺货，哪些东西急待配办，她常很不在行，这样，国华嫂就成了她的家务顾问。好在萧珊性格坦率，人缘极好，碰到国华嫂待人也很真诚，两人就常有来往了。建国后，开明书店迁北京，顾均正全家随社迁居，巴金几次到北京开会，总要到他西堂子胡同家中作客。每次巴金回上海，总把顾均正夫妇对萧珊的问候带给萧珊，还要她去北京看他们。萧珊过去广州、昆明、桂林、重庆都去过，就是没有去过北京，这次有这个机会，就带着小林先一天住在顾家。国华嫂看到小林，想到自己两年没看到她，就长得了那么高，还连连向她喊“顾家妈妈好”，禁不住心里高兴，忙称赞萧珊说：“你真有计划，先生了个女孩，隔几年才又生个男孩。看你把小林养得多好。”她们谈起别后两家的生活，总有说不完的话。

顾均正在三十年代初就在开明书店当编辑，他参加过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月刊和《新少年》半月刊的编辑工作，还在这两家杂志发表过不少科学知识小品，给那个时期的青少年留下过很好的印象。战前他编写的《十万个为什么》，曾是当年流行全国深受群众欢迎的科普读物。现在他仍在开明工作，但正在等待着机构合并的变化。一年后，开明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他在那边，仍埋头苦干，不求人知，对朋友却乐于帮助。这次巴金从朝鲜回来，一家住在他的寓所，他不但用丰盛的饭菜招待，还和夫人一起陪他们到颐和园、北海去玩，向萧珊、小林讲清朝王室曾经在这里怎样生活。巴金和他的赴朝访问团朋友们在向全国文联一起作了总结汇报后，约一个星期，就带着萧珊和小林回到上海。在回沪前，他还带了萧珊、小林去看了他的一些老友，其中卢剑波还是他在二十年代就结识的学习世界语的同学，现在卢剑波正在北京学习俄语，他们谈了一个下午，还同到一家川菜馆去吃了一顿成都家乡菜。

巴金回到上海，看到他的儿子小棠不但已经学会走路，而且还能自己跑楼梯，喊萧荀“好姐姐”了。他心里真有说不尽的高兴。

巴金本来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团聚，但他总是摆脱不了古今中外的作家缘：一到上海，各种会议就把他包围了，不是为国际作家友人迎来送往，便是作为作家代表出席全市性的各种大会，如纪念志愿军出国作战二周年大会，上海市三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全市各界悼念斯大林大会等等；至于与文艺界直接有关的活动，那就更多了，如华东与上海文联、文协主持的大小会议，《文艺月报》编辑部召开的各种座谈会，差不多把巴金每天的时间都排满。

巴金虽然这样忙，在晚上却仍抽出一定时间，写了不少反映抗美援朝前线的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时期，他还奋力重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交给平明出版社出版。至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事情，这时巴金已经完全不插手了，他给当时在武汉的田一文写信说：“我也很关心文生社，但我一个人没有力量使它往正常的路走。……我现在只是这样想：朗西拖得下去，就让他拖去。拖不下去时，让同志们去弄……这是我们大家的心血。”

就在这个时候，巴金还不曾忘记帮助比他年轻的一些朋友。当他收到当时在南京工作的杨苡一部译稿《俄罗斯性格》后，就给她看了那八十多页校样，然后带着批评的口吻对她说：“我觉得你译得有点草率，你本来可以译得好一点。”因此，他请当时在平明出版社工作过一个时期的汝龙给这部译稿作了一些改正，巴金自己也为它改动了几个字。隔了一个时期，巴金又写信给杨苡，对她说：“你说你要译w·H·（按指《呼啸山庄》），我希望你好好地工作，不要马马虎虎地搞一下了事。你要是认真地严肃地工作，我相信你可以搞得好。但已出的两本书（按指《俄罗斯性格》和《伟大的时刻》）都差。我这个意见不会使你见怪吗？”也在这个时期，巴金接到田一文寄给他的两篇稿件《老李的信》和《歌颂王崇伦》，要求他转给《文艺月报》，因为巴金是这家刊物挂着名的主编。田一文在解放前曾与巴金长期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同事，更早以前还共同有过美丽的理想，都愿为人类谋幸福，为理想献身，但当时并不明确那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他们相互信赖，巴金还根据田一文的战地生活经历，作为他写小说《火》的一部分素材。巴金一直以平等态度对待一文，还引导他读书，总用这样的口吻对他说话：“狄更斯的《大卫·考伯菲尔》可以看看”，或“左拉的《娜娜》你还没有看过吧？可以看看。”他从不说你应该做什么读什么，而是用商量的口气。他曾为田一文编发过一本散文集，但他仍严格要求他。现在他寄来两篇稿件，巴金看了一遍，然后把稿件退还给一文，附信给他说：“……我没有把你的稿子送到编辑部，因为我考虑之后觉得这些稿子不合用。你的文字是不坏的，朴素、流畅、明白。我读到它们，就像见到熟朋友，我对你的文字是有感情的。内容也没有问题，你写斗争，写新人新事。但是我觉得你的文章有一些大缺点，就是空话太多，而且都是人人会说的空话；另一个缺点是写自己也多。你自己受到感动，却不能通过人物、通过具体事件，来感动读者。只说自己如何感动（我也常犯这个毛病），却忘了如何使别人也感动……”

巴金第二次去朝鲜，已是在一九五三年八月中旬。在行前，胡风曾表示要想与巴金同去，因为那时他已从上海调到北京，虽没有分配什么工作，却已迁家在京定居，似已作为专业作家，和其他几个作家同到东北一家医院“生

活”。过一个时期，在那里搜集到一部分志愿军伤病员的事迹，所以要想再到朝鲜去看看。巴金到时候，就去胡风家中问讯。恰好那天下午，巴金在琉璃厂附近书市买了不少书，书重拿不动，就在街上随便吃了一顿晚餐，雇了一辆三轮车到胡风家来，下了车，把书放在车上，敲门进去，只见胡凤正在吃晚饭，还有客人。胡风要想留巴金一起进餐，不料他已吃过了，外面还停着车，只好不留他了，坦直告诉巴金：朝鲜他暂时不去了，因为《人民文学》正等着他把他那篇从医院蹲点回来写的报告文学《身残志不残》修改后送去刊用。

那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双方在板门店签订的停战协定已在上月公布。但是巴金还是去志愿军部队里生活了四个多月，写了不少篇散文和报告文学。

在这段日子里，巴金完全和这些来自农村的纯朴的战士一样，沉浸在对祖国的热爱里。大家远离祖国，“祖国”。对于大家比在国内更为具体。战士们通过亲人寄来的信，同胞们送来的慰劳品，以及一切凡与祖国有一丝联系，或可以有一分足以作为联想根据的报纸、图片、日用品，都寄托了对祖国的向往、思念和怀恋。

巴金望着志愿军战士纯朴的脸，看到他们纯朴的心，觉得无比的温暖，因而享受着和他们同样的从“祖国”两个字而得到的无上光荣与幸福。对他们来说，随着对“祖国”的具体认识，光荣与幸福在他们心上也是非常具体的。他们今天感到的欢乐，是建筑在对过去痛苦日子的回忆上：过去忍饥挨饿，受迫害，受凌辱，被压在人家的脚底下，呻吟哀叹，大难来临，各自逃命；而现在，有土地，有衣穿，受到关怀，受到尊重，被慰问，被鼓励，有事共同商量，互相帮助，大家团结起来，同心协力，为革命建设而一起奋斗。这样的两种现象一对比，今天是多么幸福，生活在人民的大家庭中是多么光荣！巴金觉得如果仔细观察，志愿军战士们的深厚感情，他们对祖国的深切的爱，正是寄托在这些事实上面。在营教导员向他们传达祖国几年来的建设成就时，他们是多么高兴！因而巴金觉得自己也必须把在朝鲜前线的这些可爱的人所想的、所做的一切事情，带回给祖国；同时也必须把自己在祖国的见闻，随时带给志愿军战士。这样一想，他觉得自己责任重大，生活也十分充实。他曾多次给在国内的亲友们写信，说过“在这里，生活多么丰富！”或“在朝鲜的生活，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影响”。

巴金先后两次去朝鲜，留在他的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志愿军战士的爱国热忱和“一人吃苦万人享福”的牺牲精神。他作为作家，自己的要求也是通过人物的描写，写出这两种高尚思想，实际上，他所写的几十篇散文、报告文学和几个短篇小说，都环绕着这两个中心。他不但自己写，还鼓励他那个访问团的其他同志都来写。同时，他还要求参加实际斗争的志愿军指战员也都能动笔写出他们自己亲身的经历。

这一年的国庆节期间，恰好是全国第二次文代大会在北京召开，巴金在朝鲜无法出席，便写了一封信去致“衷心的祝贺”，同时还在信中抒发了他自己的心情。他说：“去年我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间生活了七个月。现在我又到了他们这里。我的心始终忘不了这些人和这种生活。我想念这些人就像想念自己家里人一样。去年我离开志愿军的时候，一个兵团的政治委员对我说：‘你不要忘记你是这个兵团的人啊！’这句简单的话使我非常高兴，我觉得成为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是莫大的幸福。”在他叙述了自己在朝

鲜的生活情景后，又说：“我在志愿军部队中间七个月的生活，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影响，在生活上和在创作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生活在新的人中间，我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在我的周围每天都在发生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我每天都受到那种深厚的爱和强烈的恨的感染。我自己的感情也逐渐在改变……可是……我没有写出我应该写的文章，我没有写出堆积在我心中的爱……一直到现在我仍然因为我没有写出我应该写的文章而感到苦恼……。”

巴金的感情是真实的，他非常相信他所走的道路正确，但它并没有能解决他在创作上的苦闷。这要等待在几十年后，在人们为与他的那些同时代的老作家们一起总结经验的时候，才有可能得出经验和教训来。

当然，他的勤奋，仍为他在朝鲜战场的生活留下了三本小册子，这就是一九五三年二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通讯报告集《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一九五三年九月平明出版社出版的小说散文集《英雄的故事》和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通讯报告集《保卫和平的人们》。几年以后，他又根据这个时期的生活，写了七个短篇小说和一个中篇。作家出版社把那七个短篇汇编成一本叫《李大海》的书。

值得珍视的是当他第二次从朝鲜回来，忙于开会，忙于学习，忙于送往迎来，忙于参加各种活动，忙于赶写朝鲜题材的作品之外，还把四十年代初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的旧译俄罗斯作家和思想家赫尔岑的《一个家庭的戏剧》校阅一遍，重交平明出版社出版，改名为《家庭的戏剧》。这是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的一部分，屠格涅夫曾称这本书“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因为它是赫尔岑在欧洲流亡期间所写的流亡者及其家庭的生活。他不仅写他自己的家庭悲剧，还通过这个悲剧刻画了当时名噪一时的那个写政治诗的作家黑尔威格的卑鄙人格，及和黑尔威格臭味相投的黑尔威格夫人爱玛可笑又可怜的行径。巴金以非常流利的译笔译述了赫尔岑对这一对夫妇之间关系非常生动的描写：“起初我（赫尔岑）跟他（黑尔威格）中间还有很多隔阂，使我们不能成为亲密的朋友。他没有那种纯朴、但白的天性，没有一切坚强而有才能的人所不可缺少的那种完全开阔的心胸，这在俄国中间又是每个有才智的人差不多都有的。他不坦白，不光明，他害怕别人，喜欢偷偷地享乐；他有一种柔弱的女人气，他重视琐碎事情，重视生活的舒适，他有一种极端的不顾一切的利己心，这种利己心到了天真和无耻的程度。对这些缺点我以为他自己只应该负一半的责任。命运把一个这样的女人放在他的身边：她用她的似是而非的爱情和过分的照顾煽起了他的利己倾向，鼓舞了他的种种弱点：使那些弱点在他的眼睛里变成了美德。他在结婚以前很穷，——她给他带来了财富，她使他享受豪华，她成了他的保姆，他的管家，他的护士，她成了一个连一分钟也离不开的最下级的必需品。她对那个‘承继歌德和海涅的地位的’诗人怀着一种永久的崇拜、忠诚、恭顺到了极点，同时她却用资产阶级的豪华的鸭绒被毁坏了、闷死了他的才能。”这本书的译述，是巴金为中俄文化交流做的又一件好事，同时也为他二十年后准备把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全部翻译过来的计划作了精神准备。他一向很喜欢赫尔岑的作品，认为赫尔岑的文字带感情，很感动人。他就是喜欢这种带感情的文字。

这一年，正是俄国的另一个作家契诃夫的逝世五十周年。契诃夫在中国有广大的读者。同时，他的作品也为巴金所喜爱。巴金曾说契诃夫作品为读

者留下了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俄国社会的缩图，它把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没落的外省地主、小职员等形象，都写得十分出色。但在巴金青少年时代，契诃夫作品却并不曾为他所理解，他说：“我读来读去，始终弄不清楚，他在讲些什么。”以后，他与它接触多了，就认为有些“了解”，但是他又觉得它写的反抗太少，看了后有一口气憋不住的感觉，因而有时甚至感到厌烦。在巴金有了长时期的生活经历以后，他才逐渐喜欢了契诃夫的作品。他发觉契诃夫写的当时俄国社会的面目，和他笔下出现的人物，实际上在我们中国社会也经常出现。特别在旧社会开始崩溃、反动统治把人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巴金发现到处都有契诃夫笔下的人物，到处都有契诃夫所谓的“霉臭”。因而巴金说：“我翻开他的著作，就好像看见他带着忧虑的微笑在对一些人讲话，我仿佛听到他那温和而诚恳的声音：‘太太先生们，你们的生活是丑恶的！’”巴金为此在这一年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目叫《纪念契诃夫的话》的文章，谈他对契诃夫作品认识的经过，最后他终于下结论说：“契诃夫写那种人物，写那种生活，写那种心情，写那种气氛，不是出于爱好，而是出于憎厌；不是为了欣赏，而是为了揭露；不是在原谅，而且在鞭挞。他写出丑恶的生活只是为了要人知道必须改变生活方式。”

不久，巴金应邀赴莫斯科，参加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他在那边不仅会见了苏联作家费定、诗人马尔夏克等人，还与民德小说家勃赖德尔、罗马尼亚诗人别纽克、保加利亚作家斯托扬诺夫等人一起参观了契诃夫纪念馆，并到契诃夫墓前献了花圈。他在这一场合，还与契诃夫夫人克妮碧尔作了友好的交谈，当然，他们是通过翻译谈话的。

这次在莫斯科，除了参加契诃夫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大会，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他连续看了几场契诃夫作品的演出。这些演出都是非常精彩的。他看戏的地方是在莫斯科艺术剧场。他在四年前曾在这里看过契诃夫的《三姊妹》，现在却让他连续看了两个晚上的《万尼亚舅舅》第一个晚上只看了第三幕，没有布景，只有几件简单的道具，但是苏联人民演员奥尔洛夫演的万尼亚舅舅的形象，使他难以忘怀。第二个晚上，看的仍是《万尼亚舅舅》，但是这次演出的是整个戏，而且既有道具，又有布景，同时巴金还带了他的朋友焦菊隐的中译本去，边看边读，因而他从头至尾都懂得台词。戏把他带到旧俄时期的生活中去了，他把整个心灵都沉浸在剧情发展里，最后，当万尼亚舅舅伏在写字桌上写了两行字，又停下来，听到外面传来的马铃薯声，现出无可奈何的痛苦的表情时，巴金差一点也跟着他流出眼泪。事后，巴金说：“再没有比这个为着虚假的‘偶像’浪费了自己一生的悲剧更令人痛心的了！”巴金在一片掌声中走出剧场，他非常兴奋，发觉契诃夫作品确实不仅揭露了现实社会的丑恶，同时还加强了人们对未来前途的信心。因为闭幕前的一个动人的场景还留在巴金心中，那是万尼亚舅舅对索尼雅说的话：“你可真不知道我有多么痛苦啊！”而索尼雅却跪在他的面前，拥抱了他，并对他说：“我们要继续活下去……我们就会看见光辉灿烂的、充满愉快和美丽的生活了……”

隔了一天，他又在另一个剧场瓦赫柯但夫剧院看了契诃夫的另一个作品《海鸥》的演出。这个剧本曾被认为“比较复杂”，有些人还以为它“难懂”，但是巴金并不认为这样。当他访问了契诃夫的故乡以后，有一天，在列宁大运河中，他与翻译沙夏同乘在一条船上，各自躺在甲板上两把并排放着的帆布椅上，面对两岸秀丽的风光，谈着这几天看的契诃夫的戏。巴金一边翻阅



《译文》杂志上刊登的《契诃夫论》一边向沙夏发表自己的意见。《契诃夫论》是几天前在纪念会上作报告的《契诃夫传》作者叶尔米洛夫写的文章，巴金觉得这篇文章的某些观点值得商榷。作者认为《海鸥》的主题是事业，而巴金则认为青春才是《海鸥》的主题。对《万尼亚舅舅》巴金也不同意叶尔米洛夫的看法，巴金说：“叶林娜绝不是一只猛兽。她自己就是被庸俗势力的一个代表（那个教授）毁掉了的。”因此，巴金以为契诃夫作品是在劝导人们：“不能够再这样生活下去。”年轻的仅二十五岁的沙夏，当场以微笑和点头，来报答巴金的热情与坦率。

巴金这次在苏联的访问，前后逗留了二十天时间。他除了在莫斯科、契诃夫故乡访问外，还到过雅尔塔，在契诃夫别墅会见了契诃夫的妹妹玛利亚·巴甫洛夫娜·契诃娃。后来又在斯大林格勒，参观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战场巴甫洛夫楼，和马马耶夫岗。然后他就转道莫斯科回国。当时北京已是炎炎盛夏天气。等到他回来后的第二个月，即一九五四年九月初旬，为出席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从上海再到首都，正碰上这次大会“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奠定基础”而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选出毛泽东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大会根据毛泽东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会场内外一片欢愉热闹气氛。

巴金是四川代表，他由衷拥护宪法，并早已在两个月前讨论宪法（草案）时，就在上海与王西彦联合署名在《新民晚报》发表过一篇短文《热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表示内心莫大的欢悦，与对民主与法制社会的无限向往。当然，他在这次大会上，更是衷心为人民有了自己的宪法而高兴。他还响应号召，行使民主权利，在会上发言，提出对目前文艺创作问题上的看法，认为时代是这样光明灿烂，人们是在这样热情劳动，在我们的国家里人人都在发光，发热，文学作品要热情歌颂新人新事；但无可否认，有些不健康的落后现象还是存在的，那我们就要既有歌颂又有批评，不能追求四平八稳，人好我好大家都好。他认为作品揭露不健康的落后的现象，如官僚主义等问题，也应是我们的责任。他发言后，还应《人民日报》记者之约，把它整理成文，交给他们发表。同时还写了一篇生动的短文，交给《文艺报》刊用，这篇短文描述了在人代会小组讨论宪法草案时大家兴高采烈的欢愉情绪，认为民主自由的空气已经形成，人民长期斗争的成果已经到手了。自己也从众人的欢乐中找到了个人的欢乐，心与六亿人民一起跳动，感到无限幸福。

和他在同一个小组里的作家还有沙汀、艾芜和胡风，因为他们都是四川省产生的代表。胡风也和巴金一样，一时兴高采烈，他以为当前这个情景，与他和他的那些朋友向党内一些文艺界领导同志正在进行的文艺问题论争，看来形势显然对他有利，因此也就讲了不少意见。只是巴金并不知道胡风的情况，他总认为胡风比他更靠拢党，他哪里知道胡风早在这次大会召开前两个月，已向中共中央提出他那关于文艺问题的三十万字意见书了！

谁知难以预测的未来，正在等待着他们。

## 第二章 忧乐岁月

## 第一节 迷惑不解的事情

一九五四年秋冬，大概是巴金一生中心境最明朗的一个时期。旧时代黑暗统治的阴影已在他的心头消失，使他迷惑不解的新的社会现象还不曾在眼前升浮起来，连解放初期老朋友沈从文未能参加文代会这样一个令人不愉快的印象，这时也似乎已经不复存在，因为沈从文经过在革命大学一个时期的学习，已经安排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巴金重又看到了他那出自内心的敦厚的笑容。《武训传》的批判虽然带给他一点小小的遗憾，但五十年代初期的几个政治运动，都与巴金没有直接关系。相反，对旧社会的强烈憎厌，倒使他感觉到这几个政治运动不仅有助于消除旧的垢污，还有利于人民政权的巩固。

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在举起自己的双手与全体人民代表一起投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禁不住热泪盈眶。人民有法可依，“梦想变为现实！”这是茅盾对眼前情景的赞美！而巴金则想着：民主！自由！让那些在炎日下流汗耕种的农民得到民主，得到自由！让那些在工厂矿山里开机器挥铁锹的工人得到民主，得到自由！让那些在课堂上，在书桌边工作的知识分子得到民主，得到自由！让一切在旧社会渴望了一生都没有得到过民主自由的人们得到民主，得到自由！这将多么使人振奋，多么使人欢愉！他不但在人代会上响应号召，运用民主权利，提出自己看法，要求文艺作品歌颂新生的东西，批判旧的落后的东西，还要求揭露官僚主义，改正目前作品“四平八稳”的文学现象；而且，他还在人代会闭幕后一星期，参加中国文联的第二届全委会议，参与讨论了这一年来文艺工作上的领导思想作风问题，赞同提出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开展作品竞赛和自由讨论。

巴金这次回到上海，不仅使萧珊从他那将满五十岁的脸上，看到未逝的青春的微笑；同时还发现在他带回来的行李中，除了新买的各种版本书籍，还有各地名烟和各色名酒。巴金原无烟瘾，只在朋友相叙，谈得热闹时，才偶尔抽一支烟以助兴；巴金的酒量也不大，稍饮脸上即泛起红晕，但是他从未在与朋友同餐时拒饮过对方的祝酒。烟和酒在巴金心里，总是与友情联系在一起。这次他从北京人代会供销处买到不少名烟和名酒，为他的家庭招待客人时，添加了友情的欢乐。

但是不论对巴金家庭来说，还是从朋友们的感受上来讲，谁都认为眼前的巴金住房实在太小。淮海坊（即霞飞坊）五十九号楼下客堂自从索非一家在抗战胜利时迁出后，即为另一户人家所住；原归保姆住的二楼亭子间，现在已由来沪定居的巴金继母与十二妹李瑞珏住着；保姆只好每晚在二楼搭个临时铺。三楼卧室原来就是巴金的书房，藏书把这个房间的空间占了四分之三，床铺和写字台本来就局处一隅，夫妇俩带着小林住在这个角落里，现在又添了个小棠，不能不使巴金夫妇想到要另觅住房，找个较大的栖身之处，以容纳这一家老小。偏巧这时巴金的妹妹、为大家称作“九姑”的李琼如也来沪定居，她寡居多年，一个儿子也已因病去世，目前孤身一人。巴金非常同情九妹的不幸遭遇，但她来沪后巴金竟无法把她安顿在自己家中居住，只好让她暂时住在文化生活出版社隔壁李采臣所租住的一间屋子里。这就更使萧珊急于搬家。恰巧这时上海市有关领导，也感到巴金的外国朋友不少，国际上要想来访问巴金的人很多，让巴金在淮海坊五十九号二楼会客室接待外

宾，太不方便了。

这样，为巴金找房子，就成了领导和朋友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但是怎样的房子才适合巴金家庭住呢？谁也说不上。巴金的唯一愿望是不要住在高楼公寓里。那种高高在上，靠天近，离地面遥远的房子他不欢喜。他在上海习惯于住里弄房子，但他更爱内地的平房，能日常看到一些绿色的草木更好。就在巴金还不曾找到新房子的那一年岁暮，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思想方法论开始了。这本是一次有意义的普及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运动，它首先从肯定“两个小人物”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评开始，然后发动各方面人士从各个角度对新旧红学派的思想和方法论进行了规模庞大的讨论。如果这个运动能像开始时那样提出旨在“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领域里，清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并不是对哪一个个别的人的问题。对任何人在研究和考证工作上的或多或少有益的贡献，都应受到尊重。”那么它的最后一定会给我们的思想学术界开拓一条光明灿烂的大道。不幸的是对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还来不及作一次科学的总结，还来不及分析清楚哪些是真正的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哪些是过火的实际上还是唯心主义的批评方法；对俞平伯这一类专家在学术史上究竟功过如何，也都还来不及作出恰如其分、实事求是的评定，而批判文章却一篇比一篇严厉，运动也一浪高过一浪，从批《红楼梦研究》到批胡适，从学术讨论，发展到批判政治思想，又进而发展到批胡风，接着就是反右和“大跃进”；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红楼梦研究》的学术讨论最后竟成为“四人帮”在政治上篡党夺权的工具。这是最初想通过《红楼梦研究》的讨论，提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学风的人们，所始料不及的。

巴金从幼年时代起，就接触《红楼梦》。他家里从他父亲到大哥、姐姐，差不多每人枕边都有一部版本不同的《红楼梦》。甚至到现在，他家中年过八十的妹妹，还能背诵大观园里的姐妹们所作的诗词。巴金自己在十几岁时读过《红楼梦》，说《激流》三部曲的作者没有受过《红楼梦》的影响，是很难使人相信的；但对巴金来说，他在文学创作上影响最大的，确实还是十八九世纪的外国文学。他平时谈话，很少对人谈《红楼梦》，也很少讲起《红楼梦》中的人物，不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谈到小说创作方法，举例也是以欧美小说和俄罗斯文学作品为主，即使谈到中国文学创作也多谈现代小说，很少谈古典文学作品，虽然他从小接触旧小说，但这些作品似乎对他印象不深，他只讲过《说岳全传》是他看的第一本旧小说；至于《红楼梦》他只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有过书面的论断，那是他先后写给《红楼梦》的两位研究者周汝昌、魏绍昌的。巴金在复信中说：“我对《红楼梦》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十几岁时翻看过它。我最后一次读《红楼梦》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在开往马赛的法国轮船上，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一部反封建小说。它当然不是曹雪芹的自传。但是这部小说里面有原作者自传的部分，书中那些人物大都是作者所熟悉的，或他所爱过，所恨过的；那些场面大都是作者根据自己过去的见闻或亲身的经历写出来的。作者要不是在那种环境中生活过，他就写不出这样一部小说来……”

巴金在写这段话以前，从未在《红楼梦》问题上发表过书面看法。在一

九五四年底至一九五五年初，当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指出“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还说像俞平伯这一类知识分子，“当然是应该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这些话曾在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传达，并对《文艺报》在处理“两个小人物”稿件上的态度进行了批评。华东作家协会为此曾开过有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问题讨论会，巴金出席了这个讨论会，但没有作正式发言。

惊动巴金的运动，是批判胡风。那已是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当时虽说岁序更新，北国冰雪尚未融化；在南方也还是寒风凛冽。巴金正在为上海的报纸写回忆去年秋天为纪念契诃夫而访苏的文章，他忽然接到一九五五年第一期《文艺报》及该社给每个订户赠阅的附刊《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一册。他虽然不知道胡风这本“意见书”早在去年九月召开全国人代会前，已提交中共中央；但巴金仍惊奇于胡风的劲头高，行动迅速，禁不住想起三十年代中期，听黎烈文谈起，鲁迅总说胡风太热情，容易激动；看了他的意见书，却又觉得内容没有什么大错。而根据迹象，知道《文艺报》把它印发出来，难免要把它作为改进文艺工作的参考材料，供大家讨论。这样一想，他就禁不住为胡风担心。到了第二个月初，巴金又到北京，遇见了胡风。那是在中南海听周恩来总理报告。休息时，巴金在怀仁堂门边迎面看见胡风，就跑过去与他握手，只见胡风脸色忧郁，向巴金寒暄了几句，然后低声问巴金，看了他给中央的意见书了没有，说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要巴金也对他提意见进行帮助。巴金虽知道他的处境困难，但并不曾意识到有这么严重，就情不自禁地安慰他说：“不要紧的，你想得太严重了。你那意见书我看过，这些都不过是思想问题，只要认识错误就好了。你为什么要那样紧张呢？要注意身体，不要把身体累垮了。”

当时巴金说的是实话。他是这么想的：“这些都不过是思想问题，胡风为什么要那样紧张呢？”当然，胡风心情紧张也是符合实际的，因为他比巴金知道得多。不论有关胡风和他的那些朋友之间的关系，或者有关胡风与文艺界领导之间的关系，这些都不是巴金所能想象的。巴金目前只惊异于胡风与党的关系竟然有如许隔阂，那是他原来所不曾意料到，完全与他过去的印象不相同的。多年来他一向的印象是胡风比他进步，胡风比他更靠拢党，而党也信任胡风。他记得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曾出钱给胡风办刊物，有事总听他的意见，而胡风他们写的文章，也总比别人更革命。巴金想解放以前，写文章要把那些呼唤“黎明”而未参加左翼的作者都捉来吊死的那些“左”派青年，不正是胡风的朋友吗？他们怎么可能反而与党有距离？是批判胡风文艺思想，连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也发动起来了，“座谈会”由靳以主持，开的还是理事扩大会，在会上吴强作了传达。巴金虽然出席，但已来不及参与具体工作，因他接到北京通知，又要作出国准备。这次是去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国家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是郭沫若。临行前，巴金在《人民文学》三月号上读到路翎写的一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觉得写得生动，不一般，自己也很喜欢，但他知道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与朝鲜姑娘之间是不许谈恋爱的。路翎这篇小说的有些细节显然是没有生活依据的，他很想写一篇文章谈谈这篇作品的艺术思想上的问题，可是现在来不及了。他为此有点遗憾，恰好这时他接到沙汀来信，知道沙汀已回到四川，准备摆

脱其他事务，专心创作，他为老友感到高兴，便复信给沙汀，一方面表示欣慰，另一方面又为自己不能专心从事写作而担心。他在信中对沙汀说：“出国我不怕，我只怕出国回来更没有时间写东西。”

果然，等到巴金在一九五五年四月赴印度参加亚洲国家会议回来，他再也没有时间写他自己原来准备写的东西，因为国内文艺界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活动，已发展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政治性的反对胡风反党集团的运动。这使巴金感到震惊。因为把文艺思想争论当作政治斗争来进行，这是人们所不曾料想到的。特别是未曾经过核实，就把胡风和同他有联系的一批文艺工作者当作“反革命集团”的做法，混淆敌我的界限，是人们所无法预料的大冤案。最不幸的是，毛泽东威望特别高，很少有人想到他亲自批的材料，观点竟然这样武断。

其实吃惊的并不只是巴金一个人，而是全国人民都吃惊的。早在巴金这次出国回来以前，在南京工作的杨苡来到巴金家中看望萧珊时，就为此事吃惊过。起初，两位老友久别重逢，有说不尽的心里话，杨苡看到小林长得那么高了，屈指一算，竟快十足岁时，禁不住回想起那时在重庆，杨苡到民国路文生社探望萧珊情景，而现在萧珊的第二个孩子小棠也出世了，而且已进了幼儿园，能跟着他姐姐喊“杨阿姨”。一谈到朋友们的状况，杨苡提起南京近来批胡风思想，说不少人好像着了魔，一味把人家往深处推，有些熟人还正在挨整。萧珊与杨苡一样，都心直嘴快，一听说熟人受牵连，便大声说：“他有什么关系？我知道得最清楚。像这样的人都有问题，怕什么人都要……”话还没说完，只见靳以蹬蹬地跨着快步上楼来了，他住在江湾复旦大学，一进市区，仍像从前一样，总要来看巴金夫妇。这时他听了杨苡与萧珊的谈话，连忙摇手说：“别嚷，胡风的问题不简单啊，学校里不单是把他作为文艺思想问题来批判了，事情扩大啦！”这使萧珊和杨苡顿时都愣住。靳以当时是作协上海分会的负责人，又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消息自然比别人灵通。而且他比巴金更熟悉胡风，平时两人一见面就相互说笑话。抗战时期在重庆一起搞文协工作，他也一向认为胡风比别人更接近共产党，更了解党的意图，当时他还常从胡风那边探听消息。现在要批判胡风，不单要批判他的文艺思想，还要批判他的政治思想，这使靳以吃惊。所以他听到萧珊和杨苡为胡风鸣不平，就连忙劝止她们，怕她们在公开场合也去发表这些看法，那就难免要引起误会了。

巴金回到上海，与上两次从波兰、苏联回国时心境不一样，上次兴高采烈，这次却胆战心惊。虽然出国前就知道胡风闯了祸，却再也想不到他的罪名会上纲到“反党”这么一个高度；而且牵涉范围竟扩大到他的周围朋友。这对他真是个晴天霹雳。巴金翻阅了前些日子的报刊，发现批判胡风的文章一天比一天多，调子也一天比一天高，到了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胡风集团的第一批材料时，舒芜在被诱迫中已把胡风和他之间来往的信件都交出来了！《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编者按”，指名道姓地叫路翎以及“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这些信件来。随着，还有一些舆论，强调反胡风人人有责，个个有份，不能“与我无关”，这使巴金想起去印度前曾有人来向他组稿，他曾推说就要出国，没有时间赶写，而现在看来再也无法推却了。恰在这时，《人民日报》又以二、三版整版篇幅，在“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通栏标题下，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一致要求“揭穿胡风的反动面目”，声讨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说那是一篇彻头彻尾的

假检讨，要他老老实实低头认罪。有的人还主张尽早撤销胡风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委员和理事职务，并开除他的作家协会会籍。

北京发动了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全国各地随着都响应起来。上海本来就是胡风活动的基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一个副社长和一个副总编；以及一个老编辑和两个青年编辑，又都被划为是胡风的密友。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派了个干部去这个出版社作动员报告（地点在康平路一百五十五号），报告结束，编辑部的人都回到康平路八十三号原编辑部办公室去办公，唯有胡风的那些“密友”都留了下来，进行隔离审查。接着是市文联召开座谈会，主持人实际是在市委当“不管部部长”的张春桥。名义上他“不管”，实际上他管得最多。一切都由他秉承市委书记兼市长柯庆施的意旨，事先布置，事后汇报，中间是他向文艺界挥舞指挥棒。但他在群众中没有威信，谁也不知道有那么个姓张的曾在三十年代以“狄克”的笔名也写过文章。这样，只好仍请市文联副主席巴金出面（市文联主席夏衍这时已调北京），叫他主持会议。张春桥自己带头发言，然后一批民主人士陈望道、金仲华、刘思慕、舒新城、沈志远、卢于道、周谷城、熊佛西等纷纷发言，这些人都是文化界著名人士，中间还插了个当时谁也不曾听说过的姚文元，他是作为“小人物”被张春桥赏识，从卢湾区委宣传部选拔出来的批胡风积极分子。当时他正在张春桥的支持下，在《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三篇《批判胡风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点》的文章，第一篇批判胡风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性规律性，第二篇批判胡风污蔑劳动人民的反动观点，第三篇批判胡风反对有组织有领导的阶级斗争。而现在这个大会，看来正是在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阶级斗争”。

巴金基于对领袖的崇仰，和自己对思想改造的迫切，他在台上与他的好朋友金仲华、方令孺等人，怀着同样忠诚的心，表示愿与人民一起把胡风的反党思想批倒。但是胡风文艺思想究竟错在哪里，他实际上并不了解；胡风的反党行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也十分茫然。眼前在他心上有一种沉重的无形的压力，使他感到害怕，他早年信仰过无政府主义，对苏共和他们党的领导人提出过批评，现在对胡风算旧帐，说不定有一天灾祸也会临到自己头上。他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照上面的布置办事。会上，一所大学二十几个教师联名发言，要求大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销胡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同时表示同意北京一些同志的建议，要求中国文联主席团撤销胡风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开除他的作家协会会籍。群众大会一千多人举手通过这个建议，巴金在这种场合下，不举手是不可能的。

现在作家的孤独和寂寞感，又回到巴金身上。但是他不敢将这样的孤独感和寂寞感像过去那样，在文字上表达出来。人家来约稿，来催稿，来命题作文，他只能按照别人说过的话照搬照抄。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第二批材料》发表的第二天，北京又一次召开了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由郭沫若主持，发表“请依法处理胡风”的开幕词，一致通过“向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对胡风的反革命罪行进行必要的处理”决议，而实际上，胡风早在十天以前就已被逮捕了。巴金写的杂文《必须彻底打垮胡风反党集团》发表在上海《新闻日报》上，后又经《人民日报》转载。文中说：“这个集团，应向党和人民投降，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不久，《人民日报》记者又来要求巴金表态，巴金只好又写了一篇题目叫《他们的罪行必须受到严厉的处分》的文章去交差。五月底，巴金终于把早已准备写的那篇《谈路翎小说 洼地上的战役》写了出来，这次是向《人民文学》还债。但这已与他在去印

度前想的不同，当时他还是从内心欢喜这篇小说的，只是觉得它有较大的缺点，有些细节没有生活根据，是作者凭空想象出来的。现在他把这篇作品，摆到政治上来批判，所以就根本谈不上使人“欢喜”了，因而他把它的题目写作《谈洼地上的“战役”的反动性），一看就知道已把这篇作品彻底否定。但哪里知道这篇文章在《人民文学》八月号发表出来时，题目又被编辑部加了码，改作《谈别有用心的〈洼地上的战役〉》，而且似乎面目全非，不仅加了不少政治术语，还给路翎戴上“反革命”帽子。按照平时习惯，巴金在这种情况下不免要发脾气，这时却只好一声不吭，倒反而要感谢编辑帮忙了；因为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一个多月，由他挂名主编的《文艺月报》，因为发表了音乐家贺绿汀《彻底揭发暗害分子胡风》一文，由于文章写在《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发表之前，而在《文艺月报》出版时第三批材料已经发表，文章已与运动精神不符，引来了大批读者来信责难，这使贺绿汀不得不作公开检讨，说自己的言论“实际效果是替胡风黑帮分子打掩护”；《文艺月报》也不得不承认“对这一错误……应该负主要责任”。如果八月间出版的《人民文学》不把巴金在五月底写的批评路翎的文章提高“规格”，巴金肯定也要像贺绿汀那样“公开检讨”了！巴金拿着《人民文学》想了一个晚上，终于对人家的怨气消除，反而感谢《人民文学》在匆忙中为他加酱添油了。

巴金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发表了批判胡风的文章以后，作为上海市文联和作协负责人，本不想再在自己主编的《文艺月报》上表态。但贺绿汀文章出了事后，他又得过一次关。特别是由于一位诗人在党报发表文章，责问《文艺月报》六月号为何不转载《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使《文艺月报》更处在被动地位上。这样，巴金在四面楚歌之中，不得不再一次补课，一方面请《文艺月报》补登第三批材料，另一方面自己又写了一篇《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在《文艺月报》七月号刊出，以示积极。他在文章中提到的两件事，第一件就是一九三四年九十月间，他去日本前，在南京饭店聚餐，鲁迅在座，讲起有人说胡风是特务，鲁迅表示不信；第二件事是一九五五年二月间，巴金在北京听周恩来报告，遇见胡风，胡风说他自己犯了错误，要巴金提意见。这两件事在当时都是真的，巴金在三十年后经过“文革”磨难，曾在《随想录》中反省，回忆此事，他忏悔当时不该为了求得自己过关，在写文章时硬说第一件事是鲁迅受了骗；第二件事是胡风说这两句话是“做贼心虚”。他认为当时自己干的，包括写批判路翎的文章在内，正是“向着井口投掷石块”；“为了那些‘违心之论’，我绝不能宽恕自己”。同时他还提问：“难道我们那时的文艺工作就没有失误吗？”

说实在，这是巴金三十年后的现在认识。在当时，他虽然心里痛苦，却看到几乎每一个作家、艺术家都在这样说，这样做，这样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日子也就在心神不宁中打发过去了。也就在这时，他除了写批判胡风文章，还开始动笔写不少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散文，在听了李富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以后，他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题目叫《“数字的诗”，幸福的保证》；接着又在《文艺报》和《文艺月报》上写了另一篇散文《最美丽的，最光荣的事情》，说“社会主义离我们很近，它是可以摸到实在的东西了。”就在这些一味为政治服务的作品开始在我们的文坛上逐渐多起来的时候，巴金的老友、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却在非公开场合里，偷偷地对人发表议论：“我



们的文学艺术作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是对的。但这首先应该是文艺作品。要是首先不是文艺作品，而是一篇政治报告，经济讲话，或者一件什么宣传品，哪还谈得上什么政治标准，艺术标准呢。

巴金这时似乎并不曾想到这一点，似乎这时《激流》里的觉新性格在他身上复活。他和许多艺术家、作家一样，早把文学艺术忘掉，他甚至把强调“学问”、“才华”都当作反面东西来进行批判。他下的决心是要对自己进行思想改造，尽管在他内心中还存在压抑感，也对某些问题感到困惑，但却不敢往深处想，周围气氛实在使人无法动弹，甚至对家里人说话这时也好像有一种障碍。直到几十年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当时一味迷信“天王圣明”，“想不通就不多想”，“也没有时间苦思冥想”，正是使我们的许多作家创作园地趋于荒芜的一个致命伤。说实在，当时即使有谁想明白了，谁能说这是一桩冤案吗？谁也都只能是《激流》中的觉新。

## 第二节迁居以后

朋友们为巴金找房子，终于找到。地点在西区武康路上，线索是作家协会提供的。屋子模式属于上海人习惯称作的“花园洋房”。它原为一个法国侨民租用，后来业主退租回国，曾由中共上海市委教卫部使用，恰好这时中共中央为改善知识分子居住条件，请上海市委拨出一部分房屋给各有关单位，这座房子也就腾了出来，交给作家协会让巴金考虑。巴金先让萧珊去看了一下，萧珊觉得这房子占地面积虽宽，却不大实用，并嫌它每月房租一百四十五元太贵，而且屋子光线不足，心里犹豫，决定不下来，最后还是请巴金忙中偷闲，亲自跑去定局。巴金对房子本来要求不高，觉得只要不是高层公寓，能把全家七八个人容纳下来就基本可以；到了那边一看，屋前有个较大的草坪，还有几棵树，很有些绿意，便感到满意了。这

样，在一九五五年国庆前几天，全家就从淮海坊搬了过去。

那时巴金与萧珊为已逝的朋友马宗融夫妇照顾的两个孩子已经长大，女孩马小弥早由靳以介绍到革命学校学习，男孩马少弥进了中学后，也已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学习；巴金和萧珊把住在采臣家的九妹李琼如接了来生活在一起，让她住在新屋三楼上，这三楼的另一间房是巴金的藏书室。继母那时已快七十了，为了她行走方便，萧珊让她住在楼下，客厅就在隔壁。和她同住的仍是继母的亲生女、被大家尊称为“十二姑”的李瑞钰。巴金与萧珊带着两个孩子住在二楼左边房间里，右室则是巴金的书房，但是他更多的时候是在二楼阳台上搭建的房间里写稿，因为这里光线比正房充足得多。

搬家的时候，繁重的工作是大批书籍的迁移。人们不难想象，那天淮海坊的邻居们，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目瞪口呆，惊奇于五十九号门里，原住着巴金夫妇和他们的子女，竟有数量如此惊人的古今中外各种版本的藏书，一车一车的运往新居。主持这项工作的得力助手是巴金的小弟弟（十七弟）李济生，他比巴金小十三岁，当时还只有三十八岁，算得上年轻力壮。巴金把这些书籍安顿在新居的三楼藏书室中，但仍容纳不下，最后又不得不利用楼下的汽车间，把剩余的书籍放进去。

这时小林已进小学读书，小棠也已送幼儿园。幼儿园在茂名路，每天晨晚由小保姆丁香接送。丁香非常欢喜小棠，萧珊叫小棠称丁香做“姐姐”。“姐姐”从绍兴农村来，她虽然很能干，却不会讲故事。而眼前最吸引小林和小棠的，却正是生活在故事里的那些人们的生动事迹。这样，萧珊的朋友萧荀就成了他们日常最受欢迎的人。她不但给他们讲好孩子的故事，也给他们讲《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小棠特别爱听《西游记》里孙悟空怎样与天兵天将打仗；当然，《三国演义》里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与关、张、赵、马、黄这些英雄人物，也给他幼年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居的屋前草坪，由于主人的更换变得更有生气。勤劳而富有建设才能的萧珊，不但因居住环境的改善，使她有可能在继续从事屠格涅夫作品英译本的翻译工作之外，还有时间进修俄文；而且在闲暇时还能把花园打扮得更加美丽。她知道巴金欢喜樱花，还爱玉兰树，因为玉兰树与樱花都是成都老家有过的东西，他看到这些树木，就会想起故乡和故乡的人。所以萧珊在为这个花园种上月季花、珠珠花和牡丹花时，也为它栽上樱花与玉兰。只有茶花比较难养，她几次种植，都在炎暑和严寒中枯萎。

当时社会上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家具价格都比较便宜，买的

人也少，特别是一些红木家具，在市场上很多，萧珊为布置客厅和几个房间，也添置了一些。特别是客厅，为了接待朋友和外宾的来访，便于有较多的客人一起聚谈，就买了两套沙发。同时，她也希望小林能从童年起有点音乐修养，为她购置了一架钢琴。巴金的朋友们至今该还记得，在那个时候去巴金家中，常常有机会可以看到十岁左右的小林坐在钢琴旁边，用她的小手指试弹动听的乐曲。

现在，巴金有个较大的客厅可以接待朋友了。第一次在这里受到接待的外宾是法国作家萨特和德·波伏瓦。萨特是法国战后重要流派存在主义的倡导者，他的代表作《恶心》中的主人公罗康丹是个典型的存在主义人物。萨特主张文学作品应该写真实，并干预社会现实，他反对文字雕琢和浮华的辞藻。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法国是和萨特的名字一直联系在一起的，她和他巴黎大学求学时就结下亲密的友谊。他们两人一起创办《现代》杂志，参与国内外社会政治活动，反对法西斯主义。他们两人实际上是一对作家夫妇。这次他们一同来访问中国，对中国充满了友好的感情。

时间是在十月九日下午，他们由早年曾在法国生活过多年的女作家陈学昭和上海剧协秘书长姚时晓陪同，来到巴金新居。这两位外宾见到巴金，本来是有更多的话好谈的，因为巴金在法国留过学，读过许多法国作家的作品，而且他与他们又同样欢喜鲁迅的小说，在文学创作上又有不少可以相互契合的观点，但是由于巴金刚刚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胡风运动的斗争，他的态度相当拘谨，谈话也十分拘束，尽管萨特向巴金热情地赞美鲁迅的短篇小说，又提出作家写工农兵问题，说作家写自己不熟悉的人和事，用第一人称写，是不是可以方便一些。对这样的问题，巴金本来可以谈得更多，但是他只吞吞吐吐地说了一些这样的话：“屠格涅夫喜欢用第一人称讲故事，并不是因为他知道得少，而是因为他知道得大多，不过他认为只要讲出重要的几句话就够了。鲁迅先生也是这样，他对中国旧社会知道得多，也知道得深。我却不然，我喜欢用第一人称写小说，倒是因为我知道的实在有限。自己知道的就提，不知道的就避开，这样写起来，的确更方便。”

巴金在这个问题上，几年后曾补充表达了他的思想。他认为他学写短篇小说，屠格涅夫和鲁迅都是他的老师，但是他向他们“学”，并不是要把他们的某篇作品作一次分析，第一段怎么写，第二段怎么写……结尾又怎么写，然后如法炮制；而是从它的内容出发，看它们怎样表达作者的思想，使自己从中获得启发。他喜欢或厌恶一篇作品，“主要是喜欢或厌恶它的内容，就像我们喜欢或厌恶一个人，是喜欢或厌恶他本人，他的品质；至于他的高矮、胖瘦以及服装打扮等，则都是次要又次要的事。”他向屠格涅夫、鲁迅等许多作家老师学习的，就是这一点。这与萨特主张文学写作要写生活真实，不尚文字雕琢，是完全可以相通的。但是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两人会见时，在许多方面都没有得到畅谈，这与巴金当时惊魂未定显然有关。

当时国家经济形势确实有了好转，建国初期国民党留下来的一堆烂摊子已经经过整顿，工农业生产都已走上正常的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党已经注意做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的团结工作，来开始准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这时，不但市场空前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而且各条战线人们工作积极，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的劳动热情高涨。

这样的现实，也确实给予巴金一种力量，使他更无保留地在自己的散文随笔中，进一步歌颂自己的国家。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召

开时，他说，他一提起笔，就好像看见这些充满朝气的脸，发光的眼睛和响亮的快乐的声音。他们都是新中国的希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支柱。他们对他们充满感激和敬爱，并由此增加自己前进的勇气和信心。他回想自己那一代青年，不是白白浪费了生命，就是横遭摧残，憔悴死去；而现在青年得到国家培养和爱护，有充分发挥智力和才能的机会。就在这时，巴金还接到南通女子师范幼师师范科首届毕业生来信，告诉他有一百八十二个毕业生将要走向生活，她们渴望为祖国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增瓦。另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实施的消息来到时，巴金又收到北京清华大学六百多个应届毕业生来信，说他们是学习电机、无线电、土木、水利和动力机械的学生，就要作为祖国工业建设的干部而投身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紧张建设中去。巴金为这些年轻朋友奋发有为的坚强意志，而感到说不出的欣慰。

巴金在这个时期特别重视对教师的尊重。这是因为他有两个孩子正在他的身边成长，他有切身的体会，觉得唯有对教育工作重视，使孩子们健康成长，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完成。在一九五五年国庆节来到的时候，他特别向教师们表达自己“充满衷心的祝贺”，他对他（她）们说：“新中国有这么多的值得夸耀的好青年，不能不说是你们的成绩……好比一棵树，它能够成长，能够开花结果，得感谢最初给它浇水、添泥的园丁；好比一只鸟，它要养到羽毛丰满，学会飞翔，才能够飞向天空，年轻人也需要教给他们各种知识，帮助他们智力和体力的发展，给他们指出正确道路的教师。”巴金还说，他“不仅作为公民，而且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都要向为祖国作过贡献的教师表示感谢。

在一九五六年新年即将来到的时候，巴金坐在床沿上，对躺在被窝里的五岁孩子小棠讲故事，他看到小棠正睁大眼睛注意地听着他的讲话；这时十岁的小林已在楼下练好钢琴，嘴里喊着“妈妈”走上楼来了，萧珊也就顺着声音带着她到浴室里去。这时巴金还听到楼下花园篱笆外，响起一群过路青年的歌声。同时又听到躺在床上的孩子对他说：“爸爸，明年我要读大班了，真开心啊！”孩子翻了一个身，又说一些话，就睡熟了。巴金望了一下他那甜睡着的微笑着的脸，就跑到隔壁书房里，坐到书桌前，写了一篇“新年随笔”，抒发了他心头一种幸福的感觉。他想起契诃夫那句沉痛的话：“我小时候就没有童年。”他也想起鲁迅先生几十年前的呼吁：“救救孩子！”而现在，我们的孩子接触到的是一个跟过去完全不同的环境：整个社会改变了，整个国家改变了。孩子们自己也知道生活在爱中间。巴金还想起了一个志愿军战士对他讲的话：“只要我能够给这些小脸上添一点笑容，吃多大的苦我也情愿。”他还想起不久前，法国作家萨特对他谈的“对新中国的观点”，萨特说：“我们时常十分感动地想到：许多工程师、工人、农民像未卜先知的人们那样，很自然地对我们描绘一个他们自己看不到而要等儿女们来代替他们看到的未来社会。”巴金觉得我们目前正是人人在为下一代工作着。每一个人已经开始把自己融化在集体中间了。

当时社会的变化，确是比较明显，巴金是植根于对旧社会的不满，和对新社会的变化而产生出这样的思想感情。但是巴金对眼前的文学现象，在内心里是并不满足的，他至少感到有一种压抑，有一种不让人畅所欲言的力量存在，以致眼前文学创作上有一种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存在。然而他的这种感觉当时还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并不十分明显；到反右后的“大跃进”年代，才逐渐明朗起来，而那时，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投入这个漩涡里，无法自

拔了。

一九五六年一月，他与周立波一起去东柏林参加了一个星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第四届作家大会，这次与会对他个人来说，大概纯粹是一种礼节性的往来。在参加大会前一个月，曾有个德国政论作家到我国访问，这个德国作家临行时，在机场对为他送行的巴金说：“你们这样经常迎来送往，怕不大有时间写文章吧？”这个作家大概有感于我们两个国家作家有同样的烦恼，说这话显然有感而发。巴金为了避免引起人家笑话，只好应付着说：“我并不经常接送客人。”但他知道实际上当时火车站、机场的候车室、候机室，几乎已经成了指定的几个作家、艺术家的会客室了，有时甚至一天还跑两次呢。当然，这次出国去柏林参加的会，性质上也有点类似送往迎来，他虽然为此也写过一篇文章，但看来也只是一篇应酬性的通讯。

从德国回来，他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扩大会。在会上，周扬作《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他把巴金与茅盾、老舍、曹禺、赵树理几个人并称为“当代语言艺术大师”。第二天下午，巴金与其他参加会议的代表，一起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接见。这是解放后，毛泽东第二次与作家们的会面，是经过批判《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的第一次会见，显然并不是一次偶然性的机遇，而是一次有计划的安排，看来文学创作将受到一次新的“鼓励”。果然，第二天，陈毅副总理到会上来谈了一下发展文艺创作的问题。隔了一个月，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几天以后，最高国务会议上，双百方针就宣布了。

### 第三节说了一些心里话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中国文坛的春天到了。那时苏共刚开过第二十届代表大会，会上揭露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和对他的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后果，这给国际上带来了很大的震动。中国共产党不主张全盘否定斯大林，但主张破除对斯大林与苏联经验的迷信，对我们解放思想是有利的。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在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扩大会上，在与中共领导及市领导人的交谈中，在与作家、艺术家朋友的广泛接触里，巴金都受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气氛的感染。党要求知识分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看来十分真诚。而巴金也从自己善良的愿望出发，响应号召，在那一年七月开始，连续写了十几篇杂文，对眼前某些不正常现象提出了意见。这实际是巴金后来写《随想录》的先声，虽然当时他的这种运用杂谈形式直抒所感的积极性，不久就受到挫折。

他的声音是首先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出来的。他的第一篇文章是用“余一”笔名写的《鸣起来吧！》他针对当时许多人谈“百家争鸣”，只停留在称赞“百家争鸣”好，或者只关心怎样“鸣”才能“鸣”得对，甚至害怕没有领导的“乱鸣”。这样，巴金就首先“闯”出来说：“现在还是‘言归正传’，让大家先来‘鸣’一下吧。倘使把时间大量地花在事前的讨论上，等到得出结论，定下不少新的清规戒律，号召大家起来齐鸣的时候，恐怕没有多少人有勇气来‘鸣’了。”他又说：“请不要估低群众的水平，因此也用不着害怕‘乱鸣’，群众不会拥护‘乱鸣’的。我觉得即使有人‘乱鸣’，也比没有人‘鸣’好些。”过了几天，看到茅盾用“玄珠”笔名谈“独立思考”，巴金也用同样题目谈了这个问题，但他比茅盾谈得更坦率，他说：“我们并没有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问题在于：有些人自己不习惯‘独立思考’，也不习惯别人‘独立思考’。他们把自己装在套子里面，也喜欢硬把别人装在套子里面。他们拿起教条主义的棍子到处巡逻，要是有人从套子里钻出来，他们就给他一闷棍。他们听见到处都在唱他们听惯了的那种没有感情的单调的调子，他们就满意地在套子里睡着了。”

巴金说这样的话，完全是从他周围的生活实际出发喊出来的声音，人们该可以想象得到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以后上海文坛以至中国文坛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巴金还在这篇短文中说：“他们的棍子造成了一种舆论，培养出一批应声虫，好像声势很浩大，而且也的确发生过起哄作用。可是这种棍子并没有打掉人们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打闷棍，头一次也许有用处，要再来，别人早已提防了。谁都知道，教条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他们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他们需要‘鸣’，也应当鼓励他们大‘鸣’。要是他们真的大‘鸣’起来，教条主义者的棍子就只好收起来了。”

巴金讲的话，当然是真理，但持真理的人有时不一定掌握实权。他今天这样说，看来还不曾有人来反对，但躲在一旁紧握实权的人却早已记在心里。他们在等待着他说更多的话，他们准备伺机报复。

在许多与文化有关的工作体制和工作作风问题上，巴金也“鸣”了起来。他继续在《人民日报》写文章，要求人们“重视全国人民的精神食粮”。他说：“读者抱怨买不到书；出版社抱怨好书销得少；而新华书店决定印数时又太武断；新华书店抱怨出版社的新书内容介绍写得简单而不可靠，始终不

见有人出来考虑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他还在上海的《文艺月报》喊出“观众的声音”，他说：“有人把戏曲界的‘百花齐放’归功于戏曲改革的工作，却似乎忘记了观众、忘记了艺人，也忘记了过去那许多优美的剧目。有人强调戏改工作的必要，却似乎忘记了许多年来我们许多优秀的艺人就一直在改戏。”他认为最近几年，有些人“撇开演员的舞台创造，用大刀阔斧把剧本斩来砍去，将观众爱好的保留节目改得面目全非”，是无法使人赞美他们的工作的。

对编辑工作，巴金最了解，同时眼前他身受其害，这方面的意见更多，更尖锐。他在《文艺月报》的另一篇短文上，搬用鲁迅的话，要求编辑“笔下留情”。他说：“我有一个很肤浅的疑问：是不是成熟的作家的‘佳作’，都是编辑修改出来的呢？随便举几本书：《战争与和平》、《复活》、《父与子》、《红与黑》、《包法利夫人》、《阿Q正传》，它们是经过谁修改的？……不错，沙皇统治时期中，在俄国有有人喜欢删改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和高尔基的文章，但这种人绝不是编辑；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中国也有人删改过鲁迅的文章，但这种人也绝不是编辑，”他又说，“我也曾做过文学刊物和出版社的编辑，也曾看过‘成熟的作家’们的来稿。我一字一字地校过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的原稿，我不但没有在这些原稿上删改一个字，我反而学习到许多东西……鲁迅先生的生活态度和工作精神对我有更大的影响。在二十年的编辑兼校对生活中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虚心’、‘认真’、‘负责’。我懂得关心人，尊重人：懂得尊重别人的作品，尊重别人的风格。我懂得：编辑的工作是为作者和读者服务，任劳任怨……”

他的这个意见，当时虽曾引起出版社个别编辑的不同看法，但了解当时新闻出版界情况的人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为什么巴金会有这些饱含辛酸的感受，因为他和其他不少作家的文章都曾多次、特别在反胡风运动中，被人任意宰割，甚至被“加上编辑得意的话”。他是以自己的切肤之痛，来为广大作家们呼吁的。至于改稿，他在后来一篇题目叫《辞 帽子》的短文中作过阐述，他声明并不曾断言文章完全不能删改，但这可以由编辑和作者双方协商解决。

正在巴金与一些作家、艺术家和其他各界的专家学者们刚刚开始试着“鸣放”的时候，有些人已经觉得不耐烦了，他们提出这样的反问：“不需要‘争得好、鸣得好’吗？”也有人在《文艺报》提出了要求“持平之论”的大旗，认为巴金的“观众的声音”“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最近几年的戏曲改革搞坏了一切事；似乎……似乎解放后强调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改革方针是毫无必要的”。

这样，使巴金不得不在刚从北京迁回上海复刊的《文汇报》上发表《秋夜杂感》，对这些批评予以反批评，他说：“现在的问题绝不是‘鸣’声多，而是‘鸣’声少，这也是可以想象到的，因为人并非电铃，只要手一按就会发出‘鸣’声。就拿我来说吧，即使有了这样好的方针，也得让我对一些问题好好思考一下，我才可以‘鸣’出我个人的意见，……所以在这样的時候提出‘争得好、鸣得好’的问题来，实在太早了。”对要求“持平之论”的人，他说：“几年来一直给压在‘保守思想’这顶帽子下面的‘观众’今天刚抬起头来发出点声音，就只见‘持平之论’的大旗在前面迎风招展。他只好埋下头去不响了。”他认为要让人家诉苦诉得太多了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持平之论”。而在目前，向他提“持平之论”的“搨松同志”，他的“持

平之论”却并不真正“持平”。

巴金说他那篇“观众的声音”，只是指出了戏曲改革中的一些缺点，并不想把文章写得“全面”。他认为那种“肯定优点，指出缺点，然后提出一些改进工作的具体意见”的文章，写的人已经够多了，用不着他来写。巴金惊奇于挹松同志说他“举出《三岔口》和《雁荡山》作为‘专家’破坏遗产的罪证”，并对“专家”加注：“新文艺干部”，而他根本不知道从事戏改工作的是新文艺干部，他认为作为观众花钱看戏，就戏论戏，用不着知道其他。

也就在这一九五六年九月间，在反胡风运动中显过身手的姚文元，终于耐不住寂寞，在《人民日报》发表《扶得东来西又倒》，说自己“近来看了某些尖锐和不尖锐的文章”，“深感矫枉过正的现象严重”，因而要求批评有个“努力的方向”，即“恰到好处”，认为“恰到好处的批评是最尖锐，最正确的批评”。

巴金当然没有想到这个人后来竟会和张春桥一起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克星，他当时仍把他当作一个刚露头角的青年作者来看待。他以非常坦诚的态度，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千字文，与他进行说理。

他说：“姚文元同志认为‘很多人不习惯于这种恰到好处的艺术’。我觉得‘不习惯’的说法就不是‘恰到好处’的说法，因为这不符合事实。说话没有达到‘恰到好处’的水平的人并非‘不习惯’于‘恰到好处’，而是这个水平不容易达到，绝不是单凭个人主观的努力一下子就可以达到的。我们固然看见过连脸部表情都是‘正确’的人，但是我们更常见的却是那些喜欢在‘报告’或‘发言’后面加上一句‘我的意见不一定妥当’的人。我觉得后面一种人更可爱，因为他们实事求是，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在达到了‘恰到好处’的水平以后才出来发言……即使没有说得‘恰到好处’，也可能对人有利益。据我个人理解，‘百家争鸣’的方针至少不排斥这么一个作用：鼓励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因此发生辩论，这种辩论也有助于阐明真理。”

真理在哪一边？谁的话符合真正的马列主义？这是非常明显的。但不幸的是，“争鸣”不由持真理的人左右，他们说的合乎真理的话，反而在日后成为他们的“罪状”。巴金在这个时期所发表的杂谈，后来都成了张春桥、姚文元他们据以打击巴金的“法宝”。

写文章为生的巴金，却并不了解别人所设陷阱的可怕。他在发表了《恰到好处》与姚文元对阵之后一个星期，即当年九月二十七日，又在《解放日报》“雨夜杂谈”作《论“有啥吃啥”》的杂文。这次他越出文化艺术出版界的范围，来谈社会生活问题，对当时的上海市委领导人要求人民不要拣精挑肥，苛求市场供应，应该“有啥吃啥”的讲话，提出了意见。

作为全国人民代表、上海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席，他对上海人民的生活问题谈了一些看法，本来是很正常的。他说，有些人只看见酒楼菜馆的人群拥挤，却不曾去听家庭主妇和保姆们因每天在菜场排队买菜的困难而发出来的牢骚，以为只要大声一呼“有啥吃啥”，馆子的营业就可以清淡起来，菜场上从此可以再看不见排队的人。这样想法实在太简单了。“其实即使真的做到了这样，也不见得就解决了问题，因为人民的需要仍然是存在的。”因而他认为“有啥吃啥”的说法有问题。当然，目前的确还存在着困难，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生活水平提高多少倍，做到“吃啥有啥”，然而人们的需要



仍还应该受到尊重。“我们国家里现在的确有少数这样的人，他们只图自己方便，宁愿叫多数人不方便。对于他们，‘有啥×啥’的说法就是一个‘锦囊妙计’。过去有一个时期，有些省里连老头子也穿起花花绿绿的汗衫来了，因为有人在鼓励‘有啥穿啥’。花布多了，卖不出去，连小学校的男老师也得买几尺花布……农民手里刚刚有了钱的时候，推销工业品的任务又来了。这些农民不是吃了‘有啥买啥’的亏么？但是对于推销‘存货’或‘完成任务’的人，‘有啥买啥’倒是无上法宝了。”

巴金在这个时期所写的这些杂文，其实是他在解放后十六年中所写的作品最接近自己生活，也最能表达自己真情实感的写作成果之一。虽然这些也是响应号召而写的，也是为更好建设社会主义而执笔，但决不是为了应酬，应付人事，或出于无奈，言不由衷；而是发自内心，充满着对人民的忠诚。

这个时期，他还连续写了几篇追念鲁迅的文章，自从一九四九年十月，他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篇《忆鲁迅先生》的散文，以抒发建国初期迎着灿烂的阳光表示对鲁迅的感激之情以后，他一直不曾写专文怀念鲁迅。这年九月二十五日是鲁迅七十五岁诞辰，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十月十四日，上海市还为鲁迅举行了迁葬仪式。

那天早晨，作为上海市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筹备委员会主任的巴金与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来的茅盾、周扬、许广平，以及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来到虹桥万国公墓礼堂。他们看到人们已经把鲁迅灵柩从旧墓中掘出，进行了整理装修，放在礼堂中央。他们就把预先准备好的鲜花呈献上去，并把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复制旗帜盖在灵柩上，然后他们又与章靳以、唐弢、许钦文、孔罗荪等一起从虹桥随车运柩来到虹口公园。虹口公园就是现在的鲁迅公园，过去鲁迅健在的时候，曾经常在这里散步。因为它与他的住处施高塔路（即今山阴路）邻近。灵柩运到后，守候在门口的鲁迅生前老友宋庆龄就与大家一起把灵柩缓缓地扶向新的墓地，公园内已挤满几千位来宾，这里有工人、农民的代表和机关干部、各界人士、新闻记者，他们都是鲁迅人格的敬慕者，和鲁迅作品的热情读者。

巴金面对这个景象。禁不住想起二十年前在万国公墓，当时宋庆龄先生曾在送葬的六千多群众面前讲过的话，她鼓励大家努力前进，并为大家指出中国的前途；同时又用“将来的光明”安慰过站在她旁边哀哭的许广平。现在，二十年过去了，宋先生消瘦了一些，许先生的头发也白了一些，她们两人仍然站在一起，宋先生扶着许先生的左臂，与许先生一同抬起头看到毛泽东为新的墓地题写的“鲁迅先生之墓”六个大字，及雕塑家萧传玖所塑造的鲁迅先生坐像时，流露出对逝去的战友无限怀念之情。周围的同志和朋友，也都看着鲁迅先生坐像上，看到他老人家慈祥的眼光，和坚毅的神色，都不免感激地想起先生生前为真理而斗争的历史。

这时，墓前的两棵高大的广玉兰和四周的松柏，正在微风中摇动。阳光照在每棵树上，也照在每个人身上。秋天的晴空，明亮又纯净。巴金想起二十年前的傍晚，在万国公墓把鲁迅灵柩放入墓穴时，群众散去后的凄凉景象，当年二十几个人的心境犹如黄昏的暮色那样阴暗，现在噩梦已经过去，今天在鲁迅新的墓地前，环顾两旁花架，相信明年就会看到鲁迅先生睡在百花中间。当他准备与大家一起离开虹口公园，回过头去看到高大的塑像，他似乎仍然看到鲁迅矮小的身材，黑色的长袍，浓浓的眉毛，深邃的眼光，和慈祥的微笑。老人家似乎要从坐椅上起身站起来，两根手指夹着一支香烟，发出

爽朗的笑声。巴金想：先生过去是年轻人的朋友，以后仍然将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来看望先生，“他们会把新中国每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带到先生跟前，他们会把自己心里的话向先生倾吐。”

过了五天，即十月十九日上午，上海在大光明电影院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大会，巴金是大会的主席团成员。他在大会上发表了他自己写的开幕词，他说：

鲁迅先生是中国伟大的作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在他的五十六年的光辉灿烂的生活中，先生为祖国和人民树立了不朽的功绩，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生前，先生的一枝笔、一颗心把千千万万的青年引到他的身边；死后，先生的名字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今天在这里纪念鲁迅先生，我们中间有先生生前所敬重的战友，有先生“引以为光荣的”同志，有在先生的关怀和教导下成长的作家和艺术家，有先生生前所期待而终于来不及见到的新的青年……二十年前上海人民公葬先生遗体于上海西郊万国公墓的时候，称先生为“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的灵魂是绝不会死灭的。先生永远是我们的精神的依傍……

巴金以真诚恳切的口气，希望人们都能虚心地向鲁迅先生学习，要求大家为了年轻一代，都能献出自己所有的光，所有的热，所有的爱，把我们祖国建成人间乐园。不幸的是，现实往往与愿望相违背，就在这几天，他在家听到一个消息：在他的住处附近，一个六岁的女孩给汽车碾死了。当交通民警闻讯赶到时，那女孩还能说话：“叔叔，叔叔，抱我起来啊！”但说完话，她就死了，对孩子这样的惨剧，巴金难过了几天。他说：“车子碾死小孩的事情，今年我就听见人讲过好几次，都是目击者的口述。可是本地的报纸对这种事情似乎不感兴趣，不见有只字记载。”他认为“还有人根本否认这种不幸的事情。他们认为今天的小孩处处得到照顾，好像连汽车在小孩面前也会后退三步”，因此他说：“闭上眼睛不敢面对现实的‘无冲突论者’，他们把自己关在新的‘象牙之塔’里面，当然看不到汽车轮下的鲜血。”

由此，他又写了一篇杂文，在结尾中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们借用一句鲁迅先生在三十七年前写的一句话：‘救救孩子！’”

#### 第四节整风座谈会上

巴金在这个时期，思想是完全敞开的。他不仅写了许多杂文，发表了不少自己的意见；还在各种座谈会上，或在家里接受各报记者的访问时，他几乎都畅所欲言。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下旬，当他出发去四川成都之前，在与上海《文汇报》记者谈话的时候，他就表达了自己这几年来由于社会活动太多而缺乏时间写作的焦急心情。他说，他准备写《家》《春》《秋》的续集《群》，把党慧到上海后怎样投入群众运动的经过写出来，可是忙于接待外宾和各种会议，把写作都耽搁了。

他这次去成都，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去视察四川省图书发行工作的。同去的还有浙江省从事文史领导工作的专家宋云彬。他们在上海坐飞机赴重庆，早晨七点多钟起飞，过南京、汉口、宜昌，都按次序在那边停了一下，到重庆已是下午三点五十分了。在机场接待的同志把他们接到第一招待所住宿，两人都住在靠北那座大楼的第一层楼面上。宋云彬离开重庆已经十年，巴金从一九四六年五月来上海定居后也一直没有到过重庆，这次两人到重庆都是久别重来。巴金想起十年前毛泽东主席曾作为客人，在这里附近的上清寺下榻，还约请过他与老舍、胡风、邵荃麟、傅彬然四人去他住处谈话，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而现在大家都已在共产党领导下工作，并作为人民代表来到这里，只有胡风被摒弃在门外，不觉心境黯然。当时重庆正是雾季，到下午才能看到晴天，他们花了几天时间，了解了当地一些有关图书出版工作，然后乘火车来到成都，同住在城内永兴巷招待所。

成都是巴金的故乡，但宋云彬却是初到，他比巴金更有兴趣游览名胜古迹。杜甫草堂当然是名胜之一。但巴金告诉宋云彬，成都远郊还另有一个“草堂”，这就是巴金的老友李劫人的“菱窠”。这个“菱窠”是李劫人在抗战时期为了自己、也为了朋友们躲避敌人的空袭建造的“草堂”。他把这个草堂作为住宅，直到今天。宋云彬虽读过李劫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曲，但并不相识，这次经巴金介绍，终于认识了。他们一同在李劫人草堂里看了他收藏的字画。当然，他们在成都比在重庆花了更多的时间了解四川全省的图书出版发行工作。

巴金还在这里会见了阔别多年的青年时代朋友吴先忧和卢剑波。吴先忧是巴金十七岁时在成都编《半月》刊时的同事，他为解决刊物的经费问题，曾经上当铺把自己的长袍当掉，他的“自食其力”和“自我牺牲”精神，曾使青年巴金把他当作“第三个先生”。现在他在一个中学担任校长，巴金见他工作顺利，心境愉快，自己也觉得高兴。卢剑波是巴金在二十年代信仰无政府主义时的朋友，他现在四川大学任教。巴金看到这两位老友，好像又回到自己的青年时代。吴先忧陪同他到商业场参观，当年旧貌依稀，禁不住使巴金想起那时大哥在这里工作时的情景。而在他的另一个友人、成都市长李宗林问他要不要去看他的老家正通顺街的旧宅时，巴金更情不自禁地表示出对它的怀念。

自从一九二三年他十九岁时离开成都后，他只在一九四一年初春回成都住过五十天，他记得当时还是在抗战时期，房子已是成都保安处长刘兆藜的住宅，巴金不仅再也看不到当年的那些青年伙伴，而且也无法入内看自己旧居。他除了看到大门打开时，照壁上那个蜂色篆文“长宜子孙”四个大字外，

其他什么都无法再见到了。因为大门外站着的卫兵，他们正在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第二年，他为了治牙病虽又曾回过成都一次，但并不曾到正通顺街去，他想到门外的卫兵，再也不想到那个老宅去了。

现在，李宗林问他要不要去看一下旧居，他就说“去看看也好。”第二天，他终于来到了在十九岁时离开的旧居。啊，这次连“长宜子孙”的照壁都不见了。这里已成了解放军部队战旗文工团员的宿舍，新房正是在旧时花园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但是二门、中门、堂屋和上房都还在，巴金还看到了大哥住的屋子，和他与三哥尧林同住过的装有玻璃窗的小屋。他在这里仿佛看到了大哥深夜摸索进轿子里打破玻璃，又仿佛听到祖父咳嗽着从右上房穿过堂屋走了过来，他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场大梦。这时，李宗林让同来的人给巴金照了一些相，有站在玻璃小屋窗前的，有站在堂屋门口的，有站在祖父房间窗下的……

巴金在成都，也还是向当地记者直率地谈了一些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当时香港影片《春》、《秋》正在成都放映，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家》也已摄制完成。巴金对这三部影片的编、导、演三方面都还是比较满意的，特别是对反封建主题，都掌握得比较好，但是他对影片处理某些人物，停留在外形上丑化他们，而不是从他们思想感情上来进行分析，内心上来进行刻画；有些外景如房舍院落，也与当年情况相距很远，感到遗憾。

在成都访问了一个月以后，他回到上海。他又对那个临行前曾访问过他的《文汇报》记者说：“我总觉得捐了一个作家的头衔，而写不出一部像样的作品，是愧对人民的。我深为这件事而感到苦恼。我决定从一九五七年开始，以十几年时间来完成一部长篇，这就是我想把《激流》的续篇《群》写出来。虽然谈不上以此报答人民，但是我想我是应该这样做的。”因此，他打算尽量减少自己不必要的交际工作，他说：“如果上海不允许我有较多的写作时间，那我就决心回到成都去。”

一个月以后，《解放日报》有个女记者也去访问巴金。巴金说：“现在的社会里，一个人有了一些成绩就受到表扬，这是很好的。但如果你是个作家，出了名，你到一个地方，别人就请你讲话，安排你和群众见面，到处受到包围，于是你就没有机会观察人，倒是人家在观察你了。而且有些人知道作家来了，就起了戒备心思，怕说错话被你写进小说里去；或者故意说什么，做什么，让你写。这样，你就不容易像普通人那样真正地深入生活了。”这个记者还向他提供了一个情况，说有人就快从大学文科毕业，一心想当个作家，但是他选来选去，选不准什么职业才符合他当作家的要求。这时巴金就说：“你最好劝他去做实际工作，不论到工厂、农村、商店，或者做记者都好，但就是不要去当作家。因为有了坚实的生活基础，作家就不必临时抱佛脚去体验生活了。”巴金一向认为苏联作家爱伦堡那句“二十岁做作家是不幸的”的话，令人深思。他觉得如果他的《激流》三部曲能写得迟一些，生活积累得更多一些，各方面更成熟一些，就会通过更多更深刻的形象，把那封建家庭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更充分地表现出来。

一九五七年文艺界的春天，是随着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来到的。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

排和“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等方针。讲话还指出，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与此同时，即三月六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上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泽东还在这次会上讲了话，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在这时，巴金在北京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创作规划会议，并与赵丹、方纪等作家艺术家一起，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在与他们一一握手、问了各人的近况后对他们说：“你们都是作家艺术家嘛，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嘛！知识分子我们要团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是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接着他又谈到讲话和写文章，他说：“写文章应该以理服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就是以理服人嘛！但是现在有些人写文章不讲理，他们是以势压人！”

隔了几天，到了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目叫《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它说：“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社论还指出，在该报一月七日所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按：作者为陈其通、陈亚丁等四人），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社论认为这种方针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社论还说，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鸣得很不够，放得很不够。

巴金从北京回到上海，正碰上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海格大楼邀集上海作家靳以、傅雷、罗稷南、许杰等人开座谈会，说党内整风，要让大家特别是党外人士提意见。他希望巴金带个头。巴金说：“以前我提意见总有点顾虑，因为虽说对事不对人，但事情总是人办的，仍难免要牵涉到具体的人事上去。现在领导上发扬民主，一再鼓励大家讲话，我还是那么一些意见：我认为上海领导对文艺工作不够重视，缺乏认真研究。至于如何发展上海的文学创作事业，怎样抓创作思想，如何加强研究继承古今中外文学名著精华，提高文学作品质量等问题，也缺乏统盘筹划。上海过去有不少出版社出版文艺书籍，进行竞赛；而现在却只有一家文艺出版社独家经营。出版部门出书考虑欠周到，问题很多，书又缺又滥，应出的不出，不该出的却积压成山。初中语文课本有文言的教材，教师备课买不到参考书。有的书却印了十几万册，堆在仓库里卖不掉。去年鲁迅逝世二十周年，号召大家学习鲁迅，而《鲁迅全集》却只印了两万册。”

巴金的话，原是对事不对人，但中共上海市委分管文艺和出版的，正是那个张春桥。当时张春桥虽没有吭声，但后来许多事情都证明：他心中十分恼火。巴金又说：“如何开展文艺工作问题无人考虑，对作品的批判倒是经常有。但只有对作品的批判，缺乏对作品的鼓励扶植，是无法繁荣文艺创作的。”

听了巴金的话，市委书记柯庆施脸色有点异样，闷声不响。接着他又听了靳以、傅雷、许杰、罗稷南等人的发言。

座谈会本来定第二天继续召开，因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访沪，大家忙于接待，就把会议推迟到十天以后。中共上海市委在原地方举行第二次作家座谈会时，主持人换了个领导同志，但这次在主持会议的人旁边，却坐着个从北京来的康生。会上首先发言的是王西彦，他说上海作家协会不务正业，像衙门，尽做表面工作，不干实事，抓创作不力。接着是谷斯范发言，他说创作过分强调思想性，抓主要矛盾，表现正面人物，使作品都概念化，一般化。两人发言完毕，巴金又站起来讲了话，这次他的讲话似乎作了准备，他说：“上次我在会上的发言并没有顾虑，报纸发表我的发言摘要倒像是有顾虑似的：不是没有把我的主要意思登出来，就是把我的意思搞错了。我想这样做对百家争鸣不会有好处。第一，领导上对文艺工作不重视。说市委领导对文艺工作不重视，不是指对作家的安排不够，也许有些人还照顾得太多了。对作家来说，主要的不是照顾，而是能用自己的创作为人民服务。过去有些作家穷困一生，可是他的作品却流传万世。我说领导上不重视文艺工作，是说领导上对文艺上的问题没有认真研究，认真讨论，却常常匆匆作出决定，甚至发出粗暴的批评。我们常常谈领导，可是我作为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就感觉到作协的工作好像没有人在领导。这在作协里面，也不曾专门研究创作问题，对怎样发展创作、组织创作，可说都没有人认真考虑。究竟谁在领导作协，我也始终搞不清楚。只有在党支部通知我写某人的材料时，我才感觉到我在被领导，因为什么时候要，我就得在什么时候交。《文汇报》在四月二十一日刊载作协召集剧作家座谈会的消息中，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作协领导的新文艺出版社，今年这方面的选题就很少。’我就不知道作家协会怎样在领导新文艺出版社？它连自己本身工作都不曾做好。”

巴金在这里提的意见，显然既针对领导，也针对报纸。他是挂名的作协主席，既不了解作家协会，更不了解报纸上所说的“作协领导的新文艺出版社”是怎么一回事。接着，他又干脆地说：“总之，需要领导的时候，看不见领导；不需要批评的时候，批评倒偏偏来了！”

他举了两个实例，第一个是关于举办文艺俱乐部的事，他说这原是赵丹在政协一次会上提出的一个建议，后来全国作家协会理事扩大会上，把在京沪两地各举办一个为全体文艺工作者服务的俱乐部作为计划，提到周恩来总理面前。周总理认为这个要求不高，还给俱乐部安排了一处房子，但是上海后来并没有办到，说是还有许多困难，这样就把这个计划放弃了。可是过了几个月，提倡勤俭节约了，报上忽然提起这件事，批评说这是铺张浪费。巴金说：“读了报上这样的批评文章，我就不股。有个文艺俱乐部，让全上海的文艺工作者在这里经常谈谈话，交流经验，作点观摩演出，对文艺工作还是有好处的，并不违背艰苦朴素精神的。”

他举的第二个实例是关于杂文问题。他说，去年六月在北京参加人代会，遇见胡乔木同志，他鼓励大家写点杂文。七八月间，茅盾、夏衍和巴金自己都用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杂文。当时上海报纸也找巴金写，他就写了《论“有啥吃啥”》等几篇短文。哪知文章发表后，党报就有人化名作文反驳，还开座谈会，请来一位负责同志发表谈话，说写杂文要学鲁迅，抓主流，还要大家向群众解释商业部门的工作困难。巴金说：“我当时听了就不大满意。鲁迅的杂文是针对敌人的，他否定了当时的政治社会制度，他认为制度不变更，错误缺点就没法改正。我们现在写的杂文，是针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出缺点，只是希望纠正缺点。难道批评官僚主义，要求扫清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上的障碍，就不是主流吗？”巴金又说，他这次从四川回来，听说上海领导上提出要求我们写文章做到全面。“而事实上群众提意见，是很难做到全面的。因为他们没有搞实际工作，无法了解内情，议论难免片面。倒是搞领导工作的人，他们了解全局，按理应该做到全面看问题，而事实上也难免出现片面现象。比如照顾高级知识分子，要大家搬上十八层楼，在报上大肆宣传，甚至拍照，写访问记，让大家知道这些人得到安排；等到发觉群众有意见，认为让这些人集中在一起，高高在上，也不好，这时领导却又不出来讲话，替他们分担责任。又比如，近两年来，报纸上努力宣传我们的生活怎样美满，举办时装展览会还不够，连烫发的式样都登报了，还为这些活动拍摄电影，鼓励人们吃得好，穿得好，唯恐人们不注意生活上的享受；现在又在提倡艰苦朴素了，批评一些人追求享乐、奢侈的生活。我们这样翻来覆去做工作，看来也是不够全面看问题的。”

巴金终于谈到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本身的问题。他说：

“要抓好作协分会工作，得有专人认真研究问题。我是专业作家，只能做个挂名主席。说实在，我和作协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有时我代表作协在会上讲话，也不都是我自己的意见。作协办的《文艺月报》，我也曾是挂名主编，起初还参加过一些会议。在一次理事会上，有人还批评编辑只强调艺术水平，而忽视政治水平。我后来就表示过不能同意。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是不能分开来的。作品没有艺术性，就不能起政治作用。《文艺月报》本身的艺术水平本来就不高，现在再强调不让注意艺术性，那就可以不必办这本刊物了。在反胡风运动中，《文艺月报》来不及赶上转载第三批材料，有人就在报上公开批评，说这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其实当时《人民文学》也没有刊登。结果是销路从二十几万份跌到几万份。《文艺月报》编辑中表示不同意批评的人，都被整得哑口无言。这样做，只是在鼓励人作应声虫，和培养作家成为灵魂工程师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文艺月报》从创刊开始，和新文艺出版社一直不断地有矛盾冲突，同样是党所领导的事业，何以不能有共同的语言，这很难使人理解。”

在上海抓文艺工作的领导人，谁都知道是张春桥；在报社工作化名写杂文要求人们提批评做到全面的人，也有很多人知道那是被张春桥后来颂扬为“金棍子”的姚文元。

巴金的发言刚结束，参加座谈会的柯灵站起来说：“我想谈一谈文艺界的团结问题，这实质是党群的团结关系问题。党群关系不好，双方都有责任，但主要责任在党员。听说有一位党员作家，对某一位党外的老作家说‘谁知道你们在国统区干些什么，’我看这是一棍子打死的典型。因为谁也没办法活回去，重新到解放区过日子。这样的思想作风，只能像《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的那句话：有点沾染国民党的气息。”当然，接着发言的，还有许多人，他们的发言各有自己的角度，也各有自己的内容，但不论怎样，从今天看来，当时这些发言还都是比较恳切的，与党内整风的要求是符合的，纵使有的人说了些过头话，也可以理解的。至于巴金，他的这些话，谁都可以判断出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恳切关怀，和一颗忠诚于人民的心。

## 第五节惊弓之鸟

在一九五七年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中，想乘机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进攻，妄图取而代之，这样的人也许不能说一个没有；但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确是铁一样的事实。

紧张恐惧的气氛，不仅存在于被划为“右派”的人们心中，还普遍地笼罩在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家庭中，巴金家也不例外。他的许多熟人在报上被公开点名，过去经常来自己家中闲谈的朋友不来或者少来了。不久前“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时期已经过去”的这样一个说法还在耳边响着，眼前呈现的景象却分明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报纸社论从呼喊“鸣得很不够，放得很不够”，忽然急转直下，要求“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使巴金一时转不过弯来，在自己脑子里回忆着这几个月来写了哪些文章，在哪些会上讲了哪些话，有哪些话容易被人找作话柄，因为确实有些类似的话已被别人上纲上线，当作“靶子”批判了。使他特别感到意外的是：正是那个为向领导提意见要不要全面问题而与他开过笔战的姚文元，在这场运动中，正站在运动的最前沿。他的名文《录以备考》，正被作为冲锋枪，向人们迎头击来。

恰好在这时，巴金又被通知到北京去开会。他到了那边，私下庆幸“领导”没有把他划成右派，让他参加“反右”活动，一面又觉得左右的界线并不分明，有些人被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实在冤枉，特别是他的那些朋友，他最了解他们，他们不过有点牢骚，甚至他们某些见解并不比他更“右”，他们怎么可能是与党和人民为敌的“右派”呢？他这样想，却并不敢站出来替他们讲一句公道话，而且还时时战战兢兢，提心吊胆，唯恐自己也让人当场揪出来。恰好这时《人民日报》来向他约写“反击右派进攻”的稿子，他想起在离沪前刚给《文汇报》写了一篇题目叫《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文章，应付面临的险境；现在到了北京，看来局势比原来更严重，自己不得不用这种表态文章来保护自己，当天便写了一篇与《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文章内容相似的文章，题目叫《中国人民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反正《人民日报》记者也不计较两篇的题目、内容都差不多，大家都只求过关，第二天就把它发表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代表们都住在前门饭店，和他同住一间房的是沙汀，斜对面住的是同从上海来的杂文家林放。林放和他一样，原来爱说笑话，现在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了。巴金记得在前一时期，林放也曾发表文章，谈过群众对领导提批评免不了片面的问题，而且他还与巴金几乎是同时写文章批评过正在流行着的“有啥吃啥”说法。现在他们两人心中都好像有十五个吊桶在七上八下动荡；互相看看各人的脸，只是心照不宣，暗暗互祝平安。他们所参加的人代会上的四川小组，有两个人已成为当时反右运动的目标，那就是章乃器与潘大逵。这两个人开始接受人家对他们的猛烈开火。巴金在小组会上一句话不说，私下庆幸自己一直不善于在会上发言，因而这次人家也没有对他期望有什么精彩演说。林放则在会上作自我检讨，希望能顺利过关。果然他的发言，得到最高领导的肯定，认为他的检讨非常及时，并得到暗示，把发言改成短文，连夜打电话给他自己所主持的《新民晚报》发表，更由此得到谅解，被肯定那是一篇认真的自我检查，一切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都要像他这样低头认错，作出像样的检讨。



巴金虽没有像林放那样受到公开的肯定，但心中有了榜样，同时让他参加各种会议，他也不免心里充满感激之情；然而仍无法摆脱对朋友如宋云彬、萧乾等人遭遇的牵挂，由此心里惴惴不安。七月十日，周恩来总理召集文艺界人士在紫光阁开会，巴金迟到了，走进会场，只见已有许多人在座，在他还不曾选定座位前，抬起头，忽然发现老友萧乾，正低着头自个儿坐在后座，没有人理他。巴金早就听说萧乾已被他当时所在单位《文艺报》社点了名，老友情绪紧张又低落，他心里有所不忍，就很自然地坐到他的身边去。萧乾两眼无神，绝望地望了他一下，说自己愿意“下生活”去。巴金情不自禁地对他说：“不要紧的，你别怕嘛，不要抬不起头来，有错误就决心改吧，思想上有认识就好了。”但说实在，他连自己都不知道应该怎样提高认识。就在这时，忽然周恩来总理在上面点名，要巴金坐到前面去。巴金站起来，一边向台上应声点头致意，一边又弯下腰小声对萧乾说：“要虚心，要冷静。”说着，就跑到前面去。虽然这时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已经在十天前发表，但是知识界对这场风暴的到来，确实是思想上毫无准备，因为他们虽然都各有朋友，但从未意识到朋友中有那么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事情实出意外。

尽管几天以后，巴金又参加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中国文联邀请的座谈会，在郭沫若的主持下，听了周恩来、陆定一、周扬等领导人的讲话，鼓励文艺界人士积极参加反击“右派”斗争。但是巴金在会后的第二天，也即是他返沪前一天下午，还跑去找他的老朋友冯雪峰，仍把他当作无话不谈的知己，还应邀同去新侨饭店楼下的大同酒家吃饭。巴金像在重庆与他同住一条街时那样，向他直率讲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对反右提出疑问。他以为雪峰是党员，应该比他了解得多，谁知雪峰自己就是这场斗争的对象。他夫妇陪着巴金吃完饭在马路走了一阵，对巴金的提问只能讲些人们早在会场上听到过的话，也许这正是雪峰自己已经意识到大祸临头的思想反映，而巴金一点也不知道，他做梦都不曾想到这个在鲁迅活着的时候就引导不少作家靠拢党的人，竟然是反党分子。当然，他更没有料到再隔一两个月以后来北京，他竟然会被迫上台与靳以作联合发言，“揭发批判”冯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和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以及艾青的“到处串连”。

好像什么事都难以预料，似乎一切都只有天知道，唯有祈求在冥冥中自己有个福分，能顺利度过这个难关。想起这一年来他写的十多篇杂文，和在几次鸣放会上的发言，有些话正是眼前人家在批判会上所批判的话，这就使他更感到心惊肉跳，甚至迷迷糊糊中认为自己真的说错了话，因而也急于要求改造思想。回到上海，萧珊也为他担心，禁不住在暗地为他奔走，到有关的场合去听听有没有不利于他的风声。

就在这时，他开始觉得自己的头上有个“紧箍咒”，以后只要人家一念那本经，把他前一时期真心实意地写成的文章和发言一提，他的头就痛了起来，思想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活跃了。原来准备丢开杂务，专心致志写的那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群》，这一创作打算早已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只有一个念头，这就是忙于应付当前的过关！哪里需要他去浇水救火，他就去浇水救火；哪里需要他去跟着人家向井里丢石子，他就跟着去哪里丢石子。像有千万双眼睛盯住他，要他继续写反右文章，应声说“反右是政治斗争，也是思想斗争”，还用“余一”笔名在报上连续写了三篇“过关谈”，谈知识分子应该怎样“过关”，改造思想，以响应“反右”的“伟大斗争”。在

上海的人代会上，他又与周而复、柯灵、靳以、郭绍虞等联合发言，揭批孙大雨；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他虽未发言，却不得不硬着头皮作会议的主持人，让别人来批判“右派”作家。那些作家，有的还是他的熟人和朋友。

到了年底，好不容易反右高潮过去了，他如释重负，在接到通知要他参加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到苏联去出席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大典。临行的晚上，他苦笑着对萧珊说：“看来一九五七年的难关已经度过，我真是‘福将’吗？”但他并不相信他今后能长期保持着太平无事，他总感觉到那些一手拿棍子，一手拿框框的人正在镜视着他。他们决不会把他放过。果然，从北京到上海就有一批人似乎有计划地在第二年发动了一场对巴金的围攻，巴金在一九五八年的日子，并不比一九五七年好过。这场围攻，当然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进行的。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不但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上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还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这就给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些“左”派在“大跃进”的混乱中以可乘之机。《文艺报》首先组织读者来信，要巴金对他所写的《法斯特的悲剧》一文作出检讨。因为他们认为巴金对美国作家法斯特脱离共产党声明的批评十分软弱，只是表示“惋惜”，甚至寄予同情，逼令巴金当众认错；在张春桥领导下工作的徐景贤又奉命写了一篇《法斯特是万人唾弃的叛徒——和巴金同志商榷》，以响应《文艺报》的批评。然后他们又唆使出版界的人发表文章，批评巴金在一九五七年“提出了一个错误的口号”，这就是“文艺应该还给人民”，逼使巴金又不得不认错，说自己“在旧社会中生活了几十年，始终钻不出小资产阶级的圈子”，因而“必须彻底改造自己”。接着，一场规模庞大的对巴金作品的批判，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对巴金的批判，当时的所谓“讨论”，先由姚文元在《中国青年》杂志写了一篇题目叫《论巴金小说〈灭亡〉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长文作为开场。大家知道姚文元是姚蓬子的儿子，他本来是胡风的敬佩者，他曾把他的“胡伯伯”请去他工作单位——上海卢湾区团委作报告，自己又专心研究胡风的作品和理论，并已开始动手写一本《论胡风文艺思想》的书，而在一九五五年听说要批判胡风后，就立刻把手上所写的学习胡风理论的书，改为分篇发表的大批判文章，一跃而成为反胡风运动的健将。他在一九五七年本来也参加大鸣大放，写了不少反对“把同志当作敌人来打击作为抬高自己威信的手段”的文章，并主张“批判家应当成为作家的知音，懂得作家的心的挚友”；而一听说反右，就立刻掉转枪口。他的《录以备考》，是张春桥在看到了毛泽东发交党内干部阅读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同他通了气后，当夜赶写出来的。并不真是“姚文元阶级斗争嗅觉特别灵敏。”这次要批判巴金了，他当然也奋勇而上，而且动作非常敏捷。他一开头就用文坛主人的口吻俨然把界线划清，将所有老作家都划归到“客座”即工人阶级的对立面去。他说：“老作家写创作经验谈，我们是欢迎的；问题在于是站在新的工人阶级立场上有区别有分析地对待过去的著作呢，还是站在旧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无批判地肯定一切呢？”这种踞高临下的审判者身份，用有色眼镜来看待老作家著作，自认为是改造者，而别人则是被改造者。当时客观环境造成双方的不平等地位，使姚文元在巴金著作面前更加趾高气扬。

尽管巴金在一九五八年四月号《文艺月报》上谈他的早期创作《灭亡》时，一开头就承认自己写这本书时是受了外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我

今天无法再讳言我思想的局限性。”姚文元从他“左”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出发，仍要求巴金在二十年代法国写作的文学作品《灭亡》来为今天“新的历史时期”政治服务。他和他的伙伴们把小说主人公的思想行动都当作作者思想和行动来批判，把文学艺术的特性都化作乌有。

姚文元如此这般的在《中国青年》呼喊要在巴金作品“讨论”中“拔去白旗，插上红旗”，几乎是同时，北京的另外两个刊物又都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发表了各种各样的意见，虽然也有不少不同的看法，参加讨论的人也多数是青年，但基本结论都由策划者定了调子。其中还有一些大学生中以姚文元为榜样的“新生力量”和“理论尖子”，不但参加各报刊讨论，还出版了书册，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巴金创作评论》，武汉大学中文系的《巴金创作试论》等。

在“讨论”开展了一个时期以后，俨然以青年导师姿态出现的姚文元，又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长文《论巴金小说〈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和它的消极作用——并谈怎样认识觉慧这个人物》，除了仍以他的“左”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分析评论文学创作《家》之外，在最后还以“讨论巴金同志的作品有什么重要意义”为插题发表了这样的一段话：

“今天我们处于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土地上已经没有高家了，克明等等那一帮人正在劳动改造，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在这样的条件下，《家》中的积极作用、进步作用只存在历史意义而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而《家》中那些消极的、错误的东西，在今天却显得非常突出了……《家》中的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爱情至上主义、同情地主阶级的没落感情，和今天共产主义思想尖锐对立着……着重指出它消极的一面，展开思想批判，对巴金作品进行讨论，意义也就在此。自从大跃进以来，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飞快地提高。共产主义精神的高涨，集体主义思想的高涨，是我国当前思想生活中的特色。在高度民主的基础上高度的集中，是共产主义必然的发展趋势，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等等表现人民高度觉悟的新事物，和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这类意识形态发生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反映这些思想的文学作品的腐蚀作用越来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就越来越感到巴金同志有些作品中的思想感情和今天的生活不对头，原是十分自然的；因此，对巴金同志作品的讨论……澄清巴金作品在青年中的消极影响，正是青年们共产主义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

姚文元这段话的戏剧性在于：历史证明《家》的时代实际上并没有如姚文元所说“已经过去”，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封建意识在现实中还是严重存在，所以还有张春桥、姚文元这类人钻空子的余地。

至于巴金，他的作品成就，并不因为姚文元他们在一九五八年所发动的这场围攻而受到损害。读者依然争读《家》、《春》、《秋》，巴金仍旧是青年们所敬爱的作家。但是相反，巴金自己却成了惊弓之鸟，他知道自己在“鸣放”中，说过“要独立思考”，“要把文艺交还给人民”等类的话，本来这些已经成为套在自己头上的紧箍咒了；现在再加上这场围攻中给他的这么多罪名，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只有作好准备，继续检讨，举手投降了！

因此在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中，巴金再也无法根据早些时候自己心中的打算进行文学创作，他只能不断应付眼前的局面，在这个时期他写的随笔和杂文，有的是为了政治运动过关，有的是为了适应国际斗争和国际友谊的需要。除此之外，出于自己真心实意写的，也有一些，如《廖静秋同志》

和《悼振铎》、《谈我的散文》。但这些文章有的也不能不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否则可能会讲得更舒畅，内容更充实。即以《悼振铎》一文来说，巴金与郑振铎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在北平一起编过三十年代初期出版的《文学季刊》，还共同在上海“孤岛”生活过一年，胜利后又长期在上海，他们开过笔战，却相处得很好。郑振铎为人爽直，待人真诚，他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去苏联时飞机失事遇难，巴金十分悲痛，如果当时情绪稳定，巴金的悼念文章决不致写得那么拘谨，那么单薄。至于这个时期巴金写的回忆创作生涯的文字，对自己作品的过分贬低，也显露了他在反右运动后的那种灰黯情绪。甚至有人向他反映他的作品并不会因为“左”的思想泛滥而受到影响，要求为《家》作宣传时，他也加以拒绝。那是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他给当时在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吴海法写回信说：“我不赞成您组织《家》的读书报告会。我并非不愿意人读《家》，不过我觉得倘使要组织报告会，推荐书的话，还是挑选一种反映新的现实的小说好一些。”巴金知道吴海法当时在苏北邳城一所中学实习。吴海法发现这个学校学生多人经父母包办婚姻，为启发学生觉悟，免作封建思想的牺牲品，所以准备组织《家》的读书报告会。但巴金迫于形势，竟无法支持。实际上在巴金的回信寄去时，那个读书报告会已经开过了。

巴金的这种灰黯情绪，其实也反映了当时不少老作家的类似心境。一些曾经在鲁迅旗帜下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作过各种斗争，解放以后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的许多作家，在反右运动前后，迫于“左”的压力，如郭沫若、茅盾等人都写了些并非实事求是的违心文章，这无疑是个悲剧。而由于这些作家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这些文章当时在读者中不能不起一些影响，这更是值得人们深思的了。

### 第三章风雨过后

## 第一节“赞歌”的悲歌

岁月如梭，转眼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已在眼前了。尽管一九五八年出现的大跃进形势，到当年年底，已发觉问题严重；但由于庐山会议不是反“左”，而是坚持继续反右，虽然时间到了一九五九年秋天，“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仍在全国各地迎风飘扬。报纸还因为国庆十周年就快来到，变本加厉地宣扬着“三面红旗”给伟大祖国带来的新气象。报纸的版面一反常态，不仅用红色套印连续报道来自各处的“胜利”消息，而且所用字体越来越大，画面越来越多，因而版面发稿字数也就越来越少。最受用的，还是那些在报社工作的校对先生们，他们因为校样字数的减少，而感到工作轻松起来。

随着新闻报道水稻亩产万斤等神话的出现，文艺界的奇迹也突然应运而生。不论在农村，还是在市区，到处举行着赛诗会和赛歌会。就在这些会上，往往一个晚上就涌现出千百个作家和诗人，有些地方甚至连念惯符咒的巫婆，这时也都重又冒出来，变成了能唱善哼的民歌手。工厂的车间里，不仅在墙上，就连机器上都贴满了“我就是龙王，我就是玉皇”这一类的诗句。上海作家协会大厅里也日夜赛诗赛歌，鼓声锣声不断。随着大批知识分子和干部“下放”到工厂和农村劳动，作家也像一群鸭子似地被一阵潮流冲了下去，这本来也许未始不是一件好事，可以让他们看到基层的实际；但不知一种什么力量，使大家看到的情况大都属于假象，许多人一到工厂就闭起眼睛歌唱“大跃进”；一到农村，就说“吃饭不要钱就是好”，毫不怀疑地相信毛泽东所夸说的“中国可以在十五年之内赶上英国”。

经过反右，在“大跃进”中胆战心惊的巴金，虽然没有像当时的一些中青年作家那样在热火朝天的高潮里，变成随口乱喊的良歌手；但是，他还是不断地忙于应付眼前的各种任务，用散文形式写了不少“赞歌”。这些“赞歌”，跟郭沫若写《遍地皆诗写不赢》组诗，茅盾写《跃进中的东北》通讯一样，都受了当时许多虚假现象的蒙蔽，以致都犯了浮夸的毛病。郭沫若当时写的诗，还经常由新华社编发，由于他的诗所记述的生产数字，跟不上每天“跃进”数字的变化，所以他的诗从写成到发稿，常有多次的数字更改，这从现在他留下来的诗句就可以想象到。如“番薯争取亩产一万斤”，“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又如“不闯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这样的诗句，即使不算是当年所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典型，也至少可以看出当时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下，郭沫若在创作中所作出的可怕牺牲。巴金当时的“赞歌”虽然还不曾出现诗人般如许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他和郭沫若、茅盾一样，出于对旧社会的厌弃，对新社会的热情，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他也跟着大家唱出了对夸大了的现实的颂歌。

巴金在一九五九年为上海报纸写的《一九五九年元旦试笔》，颂扬大跃进“震惊了全世界”，他描写我们的社会：“人们踊跃地参加义务劳动，好像去吃喜酒一样；公社里吃饭不要钱；在很短的时间里，已基本扫除了全国的文盲；千百万首诗，几千万幅画在各地出现；技术革新的花在每个角落都开得鲜艳异常。”他甚至把在法国信仰无政府主义时背熟了的凡宰特对理想社会的描写“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嘴都有面包，每个心都受教育，每个智慧都得到光明”，也搬来套用在当时工厂“大跃进”景象的记述：

“每个脑筋都在开动，每双手都不休息，每一样东西都发生作用，每个人的精力都取得成绩，每一颗心都充满力量，每个人的前途都充满光明。”

一到一九五九年九月，面临国庆十周年纪念，全国报纸和杂志的记者编辑拥到巴金家中逼稿，这时他家的大铁门早被人拆去大炼钢铁，改换的红色木大门挡不住如此巨大力量的冲击，也只好开门揖“道”，来者不拒，他连写了七篇迎接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的纪念文章，这就是发表在《收获》的《我又到了这个地方》，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最大的幸福》，发表在《文汇报》的《无上的光荣》，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堂》，发表在《新闻日报》的《星光灿烂的新安江》，发表在《上海文学》的《迎接新的光明》和发表在《萌芽》上的《我们伟大的祖国》。

这些文章中，有几篇写他在宝山县彭浦公社参观访问利在新安江工地“下生活”后所见所闻，虽然免不了受当时的浮夸风影响，但是有些具体人物形象的记述，因为有生活依据，通过巴金流畅的文笔，读来还是可以看到当年建设者的形象。比如他在新安江工地，曾遇见过一个不到四十岁的管子工人，他从东北来，已经在新安江安了家。但他不久又要离开，因为管子工人总是比一般人先到工地，离开工地也比别人早，厂房建好，安装机器的时候就不需要他们，他们又要赶到别的地方去做同样的开辟工作。这个工人去过河北的官厅，到过四川的狮子滩，以后他当然还要不断的到其他水电站工地上去。他对巴金说：“我跑的地方越多，我越高兴，这说明我们祖国的建设事业越来越兴旺了。”

巴金这个时期到农村，也到工厂和工地，多半还和别的作家一起去，有时还带上了萧珊，因为这时巴金与萧珊合作翻译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的工作已告一段落，萧珊就有时间帮巴金做些其他工作。有时读者写信给巴金，适值巴金外出访问，无法亲自料理，萧珊就代为处复。作家协会组织作家和编辑部人员到工厂农村去访问，萧珊也多次参加，她和巴金一样，纯朴地相信“下生活”对自己改造思想有利。到新安江工地访问，就是其中一次。

这次同去的，除了萧珊，还有柯灵、王辛笛、唐弢、魏金枝、罗洪等作家。他们到了那边，都非常积极地主动找工人谈话，因为他们知道新安江水电站这一项巨大工程，是由我国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制造的，所以都很感兴趣，都很想多了解一些关于这项工程建造过程中的感人事迹。他们都把这样的访问，作为接触工人群众的良好机会。萧珊和巴金都随身带了一本笔记簿，随时随地把沿路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巴金除了采访做笔记之外，在工地访问中还随时照顾萧珊，怕她不注意安全。一到招待所安顿下来，则各人自理日常生活，巴金并不因为有萧珊在身边，生活琐事就全依靠她。他还是起早落夜，和别的人一样，把个人的生活料理得很好。只有在归程中，路过金华时，萧珊感染上丹毒，幸而就医及时，经过治疗也就好了。

在新安江水电站的访问，果真开拓了巴金和萧珊的视野。他们不但在那边看到了耸立在江面上的拦河大坝，还看到了大批民工在工地上日夜劳动的热烈场景。而在与众多工人的谈话中，更接触到了他们在艰苦岁月中的内心活动。

当然，巴金在国外也参观过不少地方，见到过不少现代化建设。在中国农村和工地上所看到的群众艰苦劳动，不能不使他回想起在国外所接触到的实际。在给报刊写纪念国庆十周年文章的时候，也就很自然地谈到这一点。有一次，他在彭浦公社参观奶牛场，禁不住想起了在苏联和民主德国集体农

庄里访问过的奶牛场，他们用的是挤奶器，而我们还是在靠人工挤奶。这时巴金当然意识到我们的落后，但是他还是十分乐观地说：“我明白这种差别不久便会消失。”这时他又把自己的热情倾注在眼前的现象上。他看到挤奶的人有男有女，他们坐在矮凳上，两只手动得十分灵巧，高大的、毛色光滑的荷兰奶牛服帖地听着他们的指挥。他听公社的人介绍，公社有五处牛棚，养牛二百九十七头，每天分三次将牛奶送到食品厂去加工。巴金看到年轻的农民们骑着自行车送奶进城去，车子跑得像箭一样地快，他感到高兴。

巴金就是这样把自己在工地、农村中所看到的一点一滴景象，加上自己美好的感情和想象，写了七篇迎接国庆十周年的文章。当然也有不少当时十分风行而今天读来不觉使人厌烦的豪言壮语，确如巴金后来自己所谈，存在着“越是空虚，越是需要装饰”的假象。同时在这些文章中，在字里行间，也有一些巴金从不自觉中流露出来的讯息，很值得人玩味。这就是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谈起他曾打算写一部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小说。他说：“解放前我见过不少有才能的人，他们不是贫病交加，壮年枯死，就是白白地耗费光阴，扮演了一辈子没有人欣赏的小丑戏……我想写几个我熟悉的人，也有可能写到我自己。这里面有教授，有医生，有工程师，也有作家。我当然不会替这些人吹嘘，但是我也不打算大出他们的洋相。我只想通过他们十年来变化，歌颂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辉面貌。”如果不是后来太多的运动干扰了他的计划，那么这部小说写成，将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这真值得人们三思。

当然，这个时期，从巴金的另外两篇报告文学《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与《创造奇迹的时代》来看，也不难回答人们在上面提到的疑问。就是这两篇报告，不论从巴金当时所花的艰苦采访劳动，和他所运用的文字功夫，都无可非议。但事实是瑞金医院医护人员发扬了救死扶伤精神和施展了高超技术进行抢救，才使皮肤烧伤面积达百分之八十九点三的炼钢工人丘财康得以保住生命。而作品歌颂的主角却是病人，不是医师，不能不使人想到在当时所流行的思想指导下“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这个“左”的理论对作家和记者们的影响。应该说，丘财康事件的作家采访活动，是当时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典型。先定好了工人是改造阶级，知识分子是被改造阶级这个框子，从这点出发，即使医生救治了病人，也只能写病人“挽救”了医生，而不许写医生挽救了病人。因此，真实的生活就不能不在政策的威力下低头。特别是在“大跃进”的浮夸风迷漫下，无数事实被颠倒是非，而人们耳濡目染，见怪不怪，最后就孕育了“文化大革命”的诞生。作家的悲剧是，他们越尽心尽力，越得不到好心好报。他们的努力，只留下一批使自己感到痛苦的作品。巴金在经受了“文革”的煎熬后，从爱护人民的利益出发，进行了忏悔，是很自然的。他明白如若对过去历史的苦果仍觉得没有尝够，还是嗜“左”成癖，那么民族的灾难就会无穷。

在我们花费了巨大资金和人力，硬撑着腰，以比建国大典时规模更大的游行庆祝队伍，和震天动地的“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度过了国庆十周年之后，“大跃进”给人们带来的困难，便越来越显著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



## 第二节和靳以告别

巴金到宝山县彭浦公社参观访问，是与一些作家同去的。在这些作家中间，与巴金最接近的，就是曾在复旦大学教书的章靳以。

靳以在一九三一年就与巴金认识了，那时他还在复旦大学读书，已经在《小说月报》发表作品，有时两人作品还在同一期刊出。两人又曾多次共同编过刊物，后来靳以到重庆复旦大学任教，两人不在一起了，但一九四四年三月巴金一到重庆，靳以就又经常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来看巴金，成为日常相互谈心的挚友。抗战胜利，两人先后回到上海定居。解放以后，又在作协上海分会共事，还常有机会一同去北京开会。靳以也去过朝鲜战场，还与巴金一起访问过山东老根据地。一九五七年开始，两人又像解放前那样合办一个刊物，这就是《收获》。这是接受中国作协书记处委托而创办的。在《收获》的编辑工作上，靳以比巴金付出了更多的心力。刊物筹划在反右运动以前，而正式出刊恰逢运动开始之时，这种遭遇是建国后许多编辑所引以为苦的常事，而《收获》恰恰碰到了这样一个局面。一九五七年初靳以就与周而复、孔罗荪等谈起要办这样一个大型期刊，大家都有一个美丽的设想，当年四月巴金也同意了靳以的要求，与他分挂刊物正副主编名义，并决定了《收获》的名称，便开始按计划组稿。但是第二个月，反右的风暴就来了。到了六月间，靳以不得不在已经编好的第一期刊物上，补写了一篇符合当时运动标准的“发刊词”，急如星火地寄给当时正在北京开会的巴金，让他这个身任“主编”的人签署，还让他征求一些在京编委同意。

巴金知道靳以工作很努力，在政治上更积极靠拢党，在运动中总是十分热情投入，而且常常一马当先，虽然有些事情他自己也并不很理解，心里有时有疑问，但靳以相信毛主席不会错，共产党不会错，所以虽然身体不太好，患有心脏病，总还是热烈响应，累了也不太注意保养。他到工厂、农村去的次数比巴金还多。在反右时，或在“大跃进”中，写的文章也一篇接着一篇，在老作家中，怕只有老舍才赶得上他那么高速度。面临一九五九年建国十周年到来，巴金写了七篇歌颂祖国的文章，靳以比巴金写的篇数一倍还多，他日夜不停，一气写了十五篇散文、随笔和诗歌。

巴金和其他朋友，看到靳以这样生龙活虎，都为他高兴。大家知道靳以是这一年五月入党的。这十五六篇作品，都是他在入党前后写的。他确实对党和国家充满感情。但他入党后仍像入党前那样谦虚、热情待人，对朋友乐于帮助，不像有些人一入党就和党外同志疏远了，巴金也并不因为朋友入了党而觉得有隔膜，他自己虽从未打过要求入党的报告，但朋友入党，他也为他们高兴。

比靳以入党稍早一些的唐弢，当时曾根据上级有关同志的嘱咐，在一次与巴金的闲谈中用十分随便的口气对巴金说：“老巴，我看你也该向党打报告，提出要求了。”巴金笑了起来，很快回答说：“我这多年自由散漫惯了，组织观念不强，恐怕还得努力。谢谢你的关心，我想还是留在党外的好。”巴金说的是实话，他自从对青年时代那个美丽的理想感到不切实际以后，就从来不曾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生过怀疑。相反，他是这样热情地歌颂着眼前的现实，即他所说的“空前的春天”，认为“六万万中国人用跑步迎接一九五八年的春天”，是“用‘千军万马奔腾’的字眼来形容它，还嫌不够！”但他确实没有想到过要打入党报告，因为他觉得自己长期从事创作纯然是个

体劳动，自由自在的惯了，毛病一时改不了，眼前还是以不受任何约束为好。但是对朋友们入党，巴金总为他们高兴。许多人了党的朋友，他还是照常和他们一起谈笑，一起交换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仍非常相信他们，因为他知道他们的为人。靳以就是其中的一个。多年来，巴金和靳以一直共患难，同甘苦。抗战前，他们曾为合编的刊物《文季月刊》被禁止出版而同感忧患，抗战中他们又为《烽火》《文丛》从上海迁广州而一起忙碌奔波，解放后他们曾为人民取得胜利而欢欣若狂，互相激励，一起下生活，一起去革命根据地参观，到朝鲜战场采访，又一起到苏联访问：反胡风和反右则又同感疑虑，而又无可奈何，几次都以联合发言的方式，求得共同过关。

一九五九年恰好是靳以五十大寿。在“大跃进”中，靳以以他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比巴金加倍的努力，连写了十五篇歌颂“幸福的日子”的散文和随笔，替自己的生辰增添了更多的光彩。他几乎每个晚上都给巴金打电话，和他讨论《收获》的编辑工作，并兴高采烈地告诉他自己又写成了一篇怎样的作品，用什么形式写的，似乎有意在激励巴金与他竞赛。但是人毕竟不是铁打的，何况靳以实际的健康并不好，在十七岁时就发现心脏有病。而靳以却很少考虑自己的体质，能否适应这样一个使他经常处在兴奋状态的形势，甚至医生多次给他警告，他都并不在意。在巴金向他诉说自己最好能活到一百岁，才能把工作一件一件做好时，靳以就说一个人活到一百岁也还不够，工作永远做不完。他几乎每天都是晚睡早起，奋力写作。他的满面红光，朋友们还以为这是他健康的标志，不料这竟是他心脏衰弱的象征。终于他因两次心力衰竭进入华东医院。医师为他抢救生命，警告他工作不要过分紧张，情绪不要过分兴奋。但是靳以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照常上课教书，到作家协会开会讲话，在刊物编辑部讨论稿件，晚上常常坐在写字台边埋头写作到深夜，有时甚至不知东方之既白。在这年十一月初，他第三次进了医院，但谁也不曾意识到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时刻。当巴金到医院去看他，他还笑着拉着他的手，叫他不要再来，说自己过几天就要出院。他还向他谈起《收获》的下期内容。甚至在十一月六日那天晚上发病前几小时，他还高兴地向病友发表他对创作问题上的看法。但到了深夜十二点钟，护士听到靳以在床上打铃，跑过去看时，只见他脸色变白，双手按住胸口，说是气闷，要她叫医生来看急诊，医生赶到时，他只说了一声“难过，”就闭上了双眼，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想到自己会离开人间，他的夫人陶肃琼和他的孩子也都没有想到他会离开她们，和他交往有几十年的老友巴金和巴金夫人萧珊（陶肃琼在中学读书时的同学）也都没有想到生龙活虎的才五十岁的靳以，会这样突然离开大家。

巴金夫妇听到噩耗，立时赶到医院，但是平时十分热情欢喜说话的靳以，早已一声不响地走了。他们后来又去靳以家中看望他的家属，巴金想起抗战前一年他怎样受萧珊的邀请，和李健吾一起去爱国女中和同学们讲话；后来萧珊又和陶肃琼到福州路四百三十六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部来，巴金把靳以介绍给她们认识。靳以后来和陶肃琼恋爱结婚。

现在，靳以走了。巴金来到了万国殡仪馆，他在院子里看到台阶下的那块黑色木牌，上面写着“章府”两个大字。院子里静悄悄，他才觉得他好像是在做梦。他想起一九五六年鲁迅遗体迁葬，他也曾与靳以一起扶着灵柩上车去虹口公园。而现在靳以也随着鲁迅先生去了，他与他的三十年友情也就那么匆匆地过去了。他似乎隐隐听见靳以的家属和靳以那个半瘫痪的女孩的

哭声。

靳以突然离开人间，这一现实与眼前万马奔腾的“大跃进”形势，显然很不相称。这使巴金忽然感到十分寂寞。靳以以他炽烈的感情，倾注在社会主义事业上。他和所有的作家、艺术家一样，把全部精力投入在对“大跃进”形势的歌颂上。但“大跃进”究竟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什么？靳以不惜舍命写出来的十五篇歌颂眼前现实的作品，究竟能在群众面前逗留得多久？看来谁也不会去想这样一些问题。然而，实际上，当时作家们的热情，不过是一片过眼烟云，它随着“大跃进”夸饰现象的消逝而同归于尽了。

当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靳以撒手西去的时候，人们已开始遍尝“大跃进”带来的苦果。为了应付粮荒和日用品的严重缺乏，不得不实行限制使用粮食和日用品的各种措施。从发粮票、油票开始，到发糖票、肉票、布票、鱼票、蛋票、香烟票、糕点票，以至于火柴票，反正要买什么，除了钞票，还要凭证，凭券，凭票，凭卡，而且数量有时还要随着货源多寡随时增加或减少。许多人家的主妇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和丈夫吃饱，自己经常饿得眼睛发黑，身子摇晃。巴金家庭并不例外，萧珊为了保证巴金与两个孩子吃饱穿暖，自己在这个时期的体重显然下降。就连好朋友杨苡从南京写信来托她在上海买一件毛线衣，她也无法办到。因为在上海，这一年只给每户发过一张毛线票，而凭这张票也只能买一斤毛线，替两个孩子添冬衣还不够哩。

这时上海市政协文化俱乐部餐厅也突然顾客盈门，有些政协委员在外面吃不到东西，只好到这里来讨个方便。但这使一些本来经常到那里就餐的反而裹足不前，因为他们上了年纪，无法与大家挤着抢菜要饭。翻译家罗稷南曾在家里苦笑着对一个新闻记者说：“文化俱乐部餐厅现在变成了打谷场，你去看看，人像夏天里的蝗虫在那边轰隆轰隆。我这个白发老人哪抢得过他们！”后来文化俱乐部餐厅采用了凭餐券进餐的办法，每月给每个委员十几张餐券，这样就比排队抢购好多了。巴金当然不会天天去文化俱乐部，但有了餐券，他有时也让萧珊伴着柯灵的夫人陈国容一起到餐厅买菜，各自带回家中受用。但更多的时候，是他自己带着萧珊和孩子去文化俱乐部吃饭，有时还有他的弟弟李济生参加，因为济生这时正下放农村劳动。在农村用力气的多，吃的却比城市更困难，所以这些下放干部一有机会回市区，许多人就千方百计找地方“加油”。巴金的胞弟也无法例外。

也就在这年的十月里，巴金的继母邓景蘧去世。她在四十五年前嫁给巴金父亲，在成都李公馆生活了还不到三年，巴金父亲就在一次流行性疫病中死了。她在丈夫在世时生了巴金的十二妹李瑞珏；在丈夫去世后一个月，又产下遗腹子李济生。邓景蘧与巴金的大哥共同支撑着老家，在旧社会度过了艰难的岁月。大哥死后，处境更为艰难，经济上多靠三哥尧林按月接济，巴金也时作支援。老人对李家第三代的抚养成长，付出过不少心血。当一九五九年她和瑞珏随同济生自重庆来沪，巴金曾把他们安顿在淮海中路霞飞坊的房子里，五年以后又共同迁进武康路新居，在这里过了一段她一生中比较安定的生活。

继母去世时，恰巧巴金决心避掉一切活动在四川从事写作。行前他曾劝慰继母去医院进行一次彻底的检查，哪知在他走后一月，继母竟以肝癌不治去世。萧珊和济生联名打了电报向巴金报丧，劝阻他不必回沪，因为已有支援西北去宁夏定居的李采臣来沪奔丧，他们会把丧事办好。但想不到只在六年以后，安葬于万国公墓的继母墓地和早些年安眠于虹桥公墓的三哥尧林的

墓地，都在“文革”中被毁，这使巴金一家为此感到十分遗憾。

### 第三节过去了的“死城”

一九六一年春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代表到各地视察，巴金报名选择了赴西南的一条路线，因为云贵高原一带地方，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留有他的足迹，他对它们比较熟悉，好像老朋友一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后来经大会安排，决定让他到云南昆明，并去锡城个旧。

巴金到了昆明，禁不住想起了二十年前，在“孤岛”上海写完长篇小说《秋》后，第一次来到昆明时的情景。当时当地的开明书店负责人卢芷芬，把他接待住在书店栈房里。那栈房本是个书库，地处一个人家的花园中心，四周都是花木，环境十分幽静，他在这里写完了《火》的第一部。在写作过程中，每遇空袭警报，卢芷芬夫妇总进屋子来喊他一起去找地方躲避。有时，他的未婚妻萧珊从西南联大来看他，碰到敌机空袭，也总和他一起跟随着卢家夫妇到城外去，经常躺在树下小河边斜坡上，看敌机在空中盘旋；待警报解除，重又回到城里。有时看到敌人施虐后，街上房屋焚毁，同胞遇难，路面上血迹斑斑，死难者家属哀哀哭声不绝……

现在，战争年代早已过去了，昆明经过十年建设，马路拓宽，出现了不少高楼大厦，人民在和平的环境中生活着，莫说当年恐慌地四处躲警报的现象早已没有，就连巴金在一九四一年第二次到昆明住过的地方——钱局街金鸡巷被称作“先生坡”的那幢房子，也已经被拆除，改建成一排整齐的公房。虽然国家经济困难，物资缺乏，在饭馆和点心铺门口，和别的城市一样，出现着拥挤排队的现象，但从旧社会和历次运动中所延续下来的人们不安定心态，这时似乎已经消失，人们脸上都有愉快的微笑。

这次他来昆明，主要是去看离昆明有二百多公里之遥的个旧市。个旧是座锡城，以产锡著名。巴金在去个旧路上，途经石林，他在这个游览胜地，与三四个同行者在石山上走得满头大汗，也算作了一次畅游。幸而有个在昆明工作多年的四川同乡青年，一路上照料着他的生活，使他得以在当天晚上安宿在路南彝族自治县。这个青年很了解个旧情况，他对锡城热情的描述，引起了巴金对个旧的许多回想。

这个晚上，巴金在招待所的院子里散步，他一边踱着，一边听着同乡青年的谈话，自己却想起一九三二年春天“一·二八”事变后，和刚从日本回国的朋友黄子方、伍禅一起住在上海法租界步高里时的情景。当时自己刚写完中篇小说《海的梦》，正在另写一个中篇《春天里的秋天》。有一天，在住处与黄子方闲谈。黄子方是云南人，他告诉巴金，他本来准备到锡矿公司做事，到了那边，一看到当地矿工的生活，就再也没有兴趣在那边工作了。原来个旧的锡矿工人，都被叫作“砂丁”。他们有的是逃犯；有的是被骗卖身受愚的外乡农民；有的发觉被骗后想逃跑，便被武装警察锁上脚镣强迫劳动。他们大都穿着麻衣，拿着铲子爬进洞去，挖到锡块就放在自己背着的麻袋里，慢慢地爬出洞，把锡块从麻袋里倒出来。他们脸色发青，呼吸困难，倒在地上，像个死人。有人因为受不了这样的苦，想在倒锡块时逃走，但只要一开步，武装警察就会立刻向他开枪。黄子方目睹那种惨状，就对介绍他去参观的同学说：“你们使的都是昧心钱，我不想要一个。”便离开了那里，再也不去了。

黄子方讲的话，留给巴金很深的印象。他至今还记得黄子方当时对他讲这些话时的情景，子方的两眼噙着晶莹的泪水，最后他又说：“要是我不离

开那边，那我可能会患精神病；或者被他们抓去，甚至枪毙。”

一九三二年五月，黄子方离沪时，巴金已把《春天里的秋天》写完，迁居环龙路（南昌路）花园别墅一号舅父家，恰逢新创刊的《申报月刊》向他约稿，他就想到黄子方向他讲过的“死城”个旧这个故事。当时巴金只到过煤矿，却没有去过锡矿，更没有机会亲临“死城”。但是黄子方讲的故事使他激动，他终于花时间，把《砂丁》这个中篇写了出来。当然，因为缺乏生活，他对这个中篇并不太满意，但在我国西南有那么一个“死城”，有一批人在那边以别人的生命，为自己谋取血腥钱；另一批人则在受欺骗，受苦难，受迫害，这个印象在巴金脑海里始终存在，没有消除。以致今天解放十年多了，他一听到人们谈起云南，就想到那可怕的“死城”个旧；即使在四季如春的昆明，他也难以忘怀当年黄子方所描述的锡矿工人生活的印象。当年巴金写《砂丁》的时候，他根据这个印象，塑造了一对青年恋人的悲惨经历，主人公升义死在锡矿的一次事故里，他的情人银姐却还在一个公馆里照常帮工，天天祷告神明保佑她的升义哥早早发财回来。而在锡矿里，公司没有因为这个事故的发生而受到什么损失。“他们又招来了新的砂丁。公司每年照常拿进许多万晶亮银元。老板们发了财，把钱存在大都市的银行里……日子平淡地过去了，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新的变化，一直继续到现在，而且要继续到将来一切都翻转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会到来的……”

这“将来一切都翻转过来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眼前的年月：一九六年春天？巴金这时深信不疑。他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终于在一个早晨，坐着车子离开住过一个晚上的路南彝族自治县到个旧。一路上兴奋地想着就将看到的锡城新貌，虽然他也遗憾于他的那个老朋友黄子方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个旧终于变了！首先让巴金看到的，是金湖宾馆门前美丽的景色：喷水池边的石栏杆上放着各种盆景，宾馆每一层玻璃窗上挂着浅红色窗帘。远处的山坡上，有一幢幢蜂色和灰色的楼房，那是新建的工人宿舍。这使巴金想起自己小说里所描写的旧时代阴暗潮湿的炉房，和那两座光秃秃的老阴山和老阳山；而现在连这两座山边也绿树成荫了。巴金住进这家从乱坟堆中砌造起来的宾馆，从窗口望向市街，意识到个旧这一“死城”，现在真的新生了！

他在这里住了六天，有时也在门前院子里散步。但他把主要时间，安排在参观矿山工人的生活上。他到处去找寻自己当年所描写的遗迹，却什么都没有看到。他只听说这里的工人在劳动时曾经从矿渣里挖出当年遗留下来的脚镣，有些脚镣是铁铸的，有些则用铁丝扭成，有些甚至还带着枯骨。据说过去进锡矿当砂丁的人，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去。

现在巴金看到的则是满街振奋人心的标语，和反映工人生活的壁画。人们唱着歌去上班，也唱着歌走进宽大的坑道，或是来到露天矿场劳动。人们再也不用穿着麻衣，掂着麻袋，去爬洞口了；现在多的是昂头挺胸的青壮年工人，他们使用的是风镐、电钻、水枪和电铲车，再也不用双手一块一块地挖矿。连几年前到这里访问过的人，也觉得自己好像走错了地方，因为就是这几年，一个小小的炼锡厂，变成了一个有一百米高烟囱的大厂，锡水长流，由工人当家作主了。巴金也下了矿井，替他引路的是个检查安全的工人。他们来到离地面两百米的坑道里，看到几匹马正拖着运送矿砂的车辆，在沿着铁轨前进。据说这个矿山里有三百匹这样的马，现在依靠技术革新，不但人们减轻了过度的体力劳动，连马也沾了光，不再驮负笨重的矿砂，只要拖车

就行了！

巴金在这里也接触了一些先进工人，从他们的嘴里，知道了一些有关建国前共产党人在锡城从事革命活动的故事。有个从北京回来叫李鑫的大学毕业，他曾在昆明工业学校当过教师，后来被上级派到矿山工作。他为了把工作做好，在进矿前，先作了一些准备，第一是把身上的皮肤晒黑，第二是每天到河边用砂石擦足，使自己的脚板起了厚茧，这才换上破衣来到矿山当矿工，与工人打成一片，随时随地联系实际，启发工人分析现实，认识现实，提高大家的觉悟，为党做了不少工作；但是不久，他就被敌人发现，与几个同志一起被逮捕，被审问，被判决，终于走向刑场。即使这样，他们并没有屈服，在走向刑场的路上，他们还一路上宣传着自己的革命理想……

巴金还在个旧市文化馆看了“矿工今昔展览会”，他在这里看到的工人宿舍，当时称“伙房”，实际是一种吊脚楼，矿工们从活动的梯子上爬进去后，门就被矿警锁上了，四周则是监视他们的碉堡。矿工睡在“伙房”的地铺上，几十个人挤在一起，盖的是破席和烂稻草，他们在碉堡的枪枝监视下，像猫爪下的一群老鼠，缩成一团，动都不敢动。巴金想这些矿工过去的的生活，原来比他在三十年代初期写小说《砂丁》时所想象的还要可怕。

现在他看到的是个旧新一代的矿工，穿着新衣服，捧着决心书，准备在技术革新运动中去当标兵；听到的是一些先进工人对他的谈话。他们向他申诉个旧工人过去生活的苦难，并介绍从小被骗到矿山戴过脚镣下洞的“老”砂丁”和他认识，还在晚上陪同他去京剧院看《杨八姐游春》，在看到戏中皇帝出丑和杨八姐骂昏君时，巴金和这些工人一起欢笑。

在个旧逗留了六天以后，巴金曾经想把他在一九三二年所写的中篇小说《砂丁》进行改写，但是当时接连不断的“中心任务”干扰了他对自己的创作认真考虑。他还是被“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形势所困扰着，急于匆匆地反映眼前的“春天”。至于他所看到的春天里的个旧，究竟也只有短短的六天时间，他能写出两篇散文来表现它，应该说已经很不错了。至少他所描写的六十年代初的个旧，比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的个旧，已经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景象，这该是十分真实的。至于巴金在六十年代初所看到的锡城个旧，是不是全部，是不是还停留在表象上，那就要让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个旧人来回答当年“大跃进”时期，他们曾经用怎样的心态来接待过这个全国人民代表了。对巴金来说，他在一九六一年到个旧，还是和他在一九五九年到新安江工地一样，接触了一些现场，开拓了视野；但他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的思想和文章不能不受当时“跃进”迷雾的影响，当然，比一九五八年唱的“赞歌”，也许已经切实多了。

巴金这一年到云南视察，是在三月中，看来早已到了春天，但两年前对他的作品批判，留在他心头上的寒流，并未消除。就在他来昆明前的一个月，他还因一个朋友的遭遇而感到烦恼。这个朋友就是一直和他与萧珊有来往的杨苡。杨苡在南京大学教书，常与巴金和萧珊通信，也和靳以是好朋友。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靳以去世，杨苡按理是会亲自来上海向他遗体告别的，但她竟没有来，只拍个电报给萧珊，要她代送个花圈。原因是她的两篇儿童文学作品出了问题，受到了批判；人们还把批判会发言记录全部刊登在江苏省文联主办的刊物《雨花》月刊上。

一九六二年二月，杨苡悄悄地来到武康路巴金家中，她看到萧珊正在家中帮助巴金处复读者来信，还知道她在最近曾去建设工地和郊区农村人民公

社”下生活”，改造自己的思想，这使杨苡想起过去许多事情。那时萧珊还是上海爱国女中的学生，抗战一开始，她就抛弃舒适的生活，冒着敌人的炮火，走上前线去做救护工作。上海沦陷，变成“孤岛”，她就来到内地在西南联大读书，还在晚上参加举着火把的抗日爱国游行。抗战后期，她和巴金组织了和睦的小家庭，变成了能够吃苦耐劳的主妇，一解放，她又学习俄文，力求上进，有了更多美丽的梦。她曾和杨苡随意谈笑中说她打算在前面的草坪上，竖起一个架子，装一个白色的长吊椅，一到春天，就可以和巴金坐在一起看书，然后摇呀，摇呀，说得大家全都笑得合不拢嘴。……现在，她正在看信，隔几天又要“下生活”去。看来她也有了变化。杨苡把有关自己最近被批判的事，告诉了萧珊，也告诉了巴金，并说有人甚至说她“配合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三个人坐在二楼卧室隔壁的大书房里，炉火虽然烧得很旺，但仍觉得非常寒冷。听了杨苡的叙说，萧珊忧郁地这样发问，却又好像在问自己：“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事情怎么会这样发展的呢？”她真不懂，杨苡也真无法回答她的发问。这时，巴金却悄悄地告诉杨苡，说：“靳以临死前，在医院里也听说你受到了批判，他很不放心，曾叮嘱我，要我帮助你……”

虽然杨苡得到巴金、萧珊的安慰和勉励，增强了生活的勇气；但说实在，巴金自己的心也还没有完全安定下来。不久前，还有人在一家大学学报上发表文章，用着那个时期最流行的腔调，说《寒夜》中“人物的革命活动都没有和当时党领导的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有所结合和联系”，在今天如果不对此“加以批判地分析”，那就“对读者有极大的危害”。至于《寒夜》中，究竟有哪个革命人物，有哪些“革命活动”？那个批评家并没有指出，这就不仅使这部小说的作者巴金心中无数，难以回答；就是所有读者，怕也对这个批评家提出的问题，感到离奇。



#### 第四节在杭州和成都

从个旧回来后第二个月，巴金到北京去参加了中国文联第四次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在这次会上，决定了同年五月要召开全国第三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指定要巴金在会上有一次发言。巴金回到上海，当晚就坐在武康路家中二楼书房写字台前，准备拿起笔写发言稿，但不知为什么，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而这时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正根据上级指示，配合政治，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在文艺上“挖祖坟”，开始对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展开批判。巴金没有想到上海的这个会，后来竟然开了四十九天，在群众中得出了个“托尔斯泰没得用”的结论，把西欧文学也彻底否定了。幸而这场讨论，巴金得到孔罗荪的照顾，以巴金“不搞理论”和“社会活动多”为理由，不曾叫巴金参加。巴金就以准备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发言稿为名到杭州去了。浙江省文联主席方令孺是他的朋友，十年前巴金曾与她一起去山东老解放区访问过，去年他与萧珊到新安江采访，也曾路过杭州，承方令孺像对待亲人一样的接待。这次他们再去杭州，虽说是去准备发言稿，但也是为了去看看方大姐，她待人热情，和她相聚，使人感到愉快。哪知两人到了杭州，她却到北京看病去了。浙江省的同志安排他们住在西湖旁边的招待所。这里环境幽静，干扰很少，确是写文章的好地方，但是那个发言稿还是写不出。几次写了几个字，又不得不把它撕掉，实在说，在这样的时刻写这样的发言真是太困难了，他为此心里感到烦躁。

有一次，他独个儿来到湖滨散步。虽说日子已经五月间，这里还是柳丝飘拂的一片翠堤，他望着静静的湖面，什么都不想。偶然想起那要写的发言稿，思想却又被一九五六年三月自己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上的发言内容所掩盖。说真的，一九五六年那次发言，他是掏着心说出来的啊：

“……我被人称为作家以后，我就觉得我的肩头挑上了沉重的担子，我的责任感也加重了……要做莎士比亚、歌德、雨果、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高尔基的同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创作是一个很严肃、很艰苦的事业。即使是最有才能的人也得上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包含着辛勤的劳动，丰富的生活经验，正确的世界观，还包含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生活是创作的泉源……作家要是没有一肚皮的话想告诉人，他怎么能写作？作家要是没有自己想说的话，他为什么要写作？……我们可以造一万把式样完全相同的椅子，或者照一个美观的图样做一百只景泰蓝花瓶，我们却不可以写一篇内容和已发表作品相同的小说……因为创作里必须有自己的东西……”

巴金记得当时在他的发言中，还说过这样的话：

“创作是个人的劳动，作品是有个性的。而且作品的内容和作家生活在其中的时代与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吴敬梓写不了《红楼梦》，曹雪芹也不会想到写《儒林外史》。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唐代大诗人是好朋友，但是李白写不出杜甫那样的诗……即使是具有同样正确世界观的作家也会有各人不同的工作方法，即使生活在相同的环境里面，也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反映生活……我说创作是集体事业，还因为作品必须在读者中间起作用，在群众中间产生好的和坏的影响。即使一个作家花去五年十年的劳动写成一本书，他也没有权利要求发表他的作品，让它在群众中间产生坏的影响。他应当考

虑怎样再花若干时间重写他的作品……”

巴金记得当时他的那次发言，在最后还这样郑重地提出过要求：“让一个从事创作的人有充分的时间，至少也得拿起笔写完若干字的时间，而且还得有执笔以前的酝酿、思索的时间……读者向作家要求的是作品，所以必须有作品。但是作家写作品也需要时间，这不是零零碎碎的几小时或几天，这应当是一段较长的时间……写作也需要强度的、忘我的劳动……草率决不是成功的方法，我们单看一页托尔斯泰的手稿就知道创作需要什么样的劳动了。要繁荣创作，要提高创作的质量，就得让作家在自己的工作上多花工夫。作家的学习和改造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们也得跟作家的创作活动结合起来，才可以产生效果。”

那次发言，到现在整整四年过去了！当时只在《人民日报》摘要发表了一些，以后就开始反右运动、反右倾和大跃进运动，再也没有人记得他的这个发言，连他自己差不多都把它忘掉了！而当时他所提出的问题，眼前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变本加厉。虽然被称作“作家”的人越来越多，而作品却越写越滥，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更加严重。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就要召开了，又要叫自己发言，能讲些什么呢？说实在，他自己的思想也非常混乱，竟不知一九五六年三月那次会上讲的究竟对不对。想起这几年的被人批判，和批判别人，这笔糊涂帐，连自己回过头去看一下的勇气都没有啊！

他在湖滨走了两三个小时，隔天又到西山公园的竹亭里坐了一个上午，望着自己熟悉的西湖景色，禁不住愣住。这样来来回回，挨了好些日子，又换了三个招待所，终于在花港那个住处断断续续地写完了发言稿，题目是《文学要跑在时代的前头》。按着当时流行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说法，讲了许多豪言壮语，把形势夸张了一番以后，提出要求作家迅速把大批涌现的先进事迹和先进人物反映到作品里来。同时，他又借这个时机，再一次承认了自己需要思想改造，并劝说大家都要重视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以指导创作。

这个发言稿拿到大会去宣读时，已经是在七月下旬了，因为那次大会因筹备时间来不及，延迟到七月二十二日才开幕。事情的戏剧性还在于，虽然在会上从陆定一的祝辞、郭沫若的开幕辞到周扬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报告，和茅盾作的《反映社会主义跃进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报告，以及巴金的发言《文学要跑在时代的前头》，都强调了要作家们赶上大跃进时代，迅速反映大跃进中的大量新人新事；而就在开会前的一个月，巴金在上海担任主编的《收获》杂志，本来可以大量登载反映时代的作品；但由于中国作家协会派人来通知，因“大跃进”经济失调，加上“自然灾害”，物资缺乏，纸张紧张，不得不停刊。巴金想到靳以发起创办的刊物，却让他来收拾掉，心中十分难过，但也无可奈何。他转而一想，把刊物停办，腾出一些时间来自己多写些作品也好。这样一到秋天，他就可以下决心在上海摆脱一些社会活动，去故乡成都，专心从事写作，以求完成自己在上海作协会上所订的“创作跃进规划”了。

果然，这一年八月，他在北京参加了第三次全国文代会闭幕式，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后，就在第二个月开始恢复从事小说创作。自从一九五六年五月他写过一篇题目叫《活命草》在《人民文学》发表之后，他有整整四个年头零四个月不曾写小说了。反右以后的这几年，他一直在战战兢兢、忙忙碌碌地应付政治运动和各种日常事务，不是开会，就是出访，即有写作，也多是散文随笔，而且大部分是为了去完成眼前的任务，有一些还是为了应

付国际和国内斗争的需要。说实在，有些问题也不容他细细思考，斟字酌句，大都匆促上马，旨在表态，写成后也不想再看。有时把这些文章编到他自己署名的文学作品集子里去，他还很不愿意，因为把它们算作文学作品，是很勉强的，所以有的甚至干脆扔掉。写小说，他一般总是作为他创作生涯里的重点工程看待。自从一九二七年开始拿起笔来写《灭亡》之后，几十年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长的一段时间中止过小说创作。现在他下决心，定下心来，写它几篇。

从北京回到上海，虽炎暑气温尚未降低，但他在离京前曾偕同萧珊带着小林和小棠，与沙汀一起去北戴河住了几天，随身也带回一篇写朝鲜战场的小说草稿，这是他住在北戴河招待所时，晚上乘着凉快写的，题目叫做《副指导员》。回到上海，他又把它修改了一下，终于顶住上海的暑气，将它定稿。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连队的副指导员，在他的亲哥哥英勇牺牲后，怎样坚守战斗岗位，抱着乐观主义精神，在战火中抢救一个朝鲜老大娘出险，并由此激励了另一个年轻的战士。

写好了这篇小说，他决定出发到成都去。早在几个月前，他就接到过沙汀和吴先忧从成都来信，要他到那边作客。实际上，巴金自己在四年前的一个冬天，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到四川视察后回到上海时，就对一个记者表示过，打算在以后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交际工作，“如果上海不允许我有较多的写作时间，那我就决心回成都去。”但是没有想到后来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斗争和大跃进运动，又把他困住了这么多年。现在故乡有那么多熟人在等待着他，又有几个好朋友在热情邀请他，特别是成都市长李宗林，已经为他安排好一切，等他回去。他就决定再回一次成都。但是当时因为要准备第三次全国文代会的发言稿，而且那时又刚从云南回来，得把准备写的个旧纪行那篇文章先写出来交卷，同时还要主持一个欢迎以野间宏为首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的大会，这样就耽搁下来。现在他写信给沙汀，决定在九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动身去四川，但上海的统战部长周而复临时却又把他留了下来，要他参加一个有关统战工作的座谈会。这样，他在十月初，才又回到阔别了四年多的故乡成都。

李宗林见到巴金，非常高兴，他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四年前曾陪同巴金在成都进行过访问，还陪巴金一起去正通顺街看他的旧居，拍了不少照片。巴金是多么关心着故乡的建设，怀念着故乡的朋友和亲人！这次李宗林把他安排住在成都学道街一座小楼上。他知道巴金这次来成都与上次不同，必须有个清静的环境，让他专心从事创作。

巴金在成都住了四个多月，在那里度过了一九六一年的新年；到二月中旬才返回上海过春节。他在那座幽静的小楼上，接着《副指导员》以后，又陆续写了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四个短篇小说《回家》、《军长的心》、《无畏战士李大海》、《再见》和一个中篇小说《三同志》。同时，他还为他的不朽之作——长篇小说《寒夜》作了精心的修改。这一年他五十七岁，已年近花甲，但他几乎仍保持着中青年时那样旺盛的创作精力。

从朝鲜战场回来将近十年，巴金还不曾忘记他在战场上与年轻的志愿军战士们二起生活的日子。虽然当初他也写过很多篇作品，也有如《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坚强战士》、《黄文元同志》这类曾被多次收入各种选本之作，但其他都写得比较仓促，艺术上不够完美；这次写的几篇小说，却比较动人。不论描写一个身负重伤还抓了个敌人回“家”的志愿军战士，

还是记述一个与志愿军战士共患难同生死的长征干部，或者刻画一个“只手生擒六十三个敌人”的志愿军英雄，巴金都显示了自己在战场上与志愿军战士亲如兄弟般的感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艺术魅力。

有一位在志愿军某团阵地当过通讯员的战士，当年曾陪同巴金在前线采访过，据他说，那时巴金脸色红润，宽阔的前额下有一双智慧明亮的大眼睛。他身着草绿色的军装，脚穿一双发给志愿军团级以上干部的红牛皮马靴。巴金曾热情洋溢地向大家介绍过祖国学生的参军、淮河的疏浚、宝成铁路的通车，也谈到志愿军归国代表在上海做报告时广大听众在大雨滂沱中巍然不动一直坚持的动人场面。当同志们向他介绍志愿军的英雄事迹时，巴金总是一边深思，一边摘下那顶被涔涔汗水浸透了的军帽，把它放在桌上，又从军装口袋里取出一个本子，快速地记录着。有时战士们晚上越过封锁线护送巴金回驻地，巴金还沿途向大家询问部队的一些情况，谈得高兴时，巴金还曾向战士背诵过西蒙诺夫的诗歌《等着我吧》和《战斗后的夜晚》。他一边背，一边微笑着点头。有一个夜晚，这个通讯员战士曾把巴金送到临津江边某团团部指挥所，在巴金住的一间草屋里，窗户、门子都用绿色的雨布密封起来，虽然天已经很晚，巴金还让团长和政委围着一支烛灯，向他介绍了一个连队坚守佛冈山七天七夜，毙敌五千名的事迹。巴金边听边记录，还询问了战士们的一些日常生活细节和战时心理状态。当同志们离开巴金的住处后，巴金仍在暗淡的灯光下整理记录稿，陪同他的通讯员战士在里屋和衣而睡，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只见巴金还坐在桌边不断写着……

虽然在朝鲜战场的七个月访问，早已成了过去的事情；但当时接触到的各种印象，巴金到一九六〇年冬天和一九六一年春天，并没有淡忘。相反，现在有了这一段不受烦琐事务的干扰，集中精力的时间，他的写作比前一时期顺利多了。这几个短篇在艺术上都是比较完整的。至于那部十六万字左右的中篇小说《三同志》，则是以一个新来的连队年轻通讯员杨林，和他的两个伙伴为主体，写他们在朝鲜战场上的生活。杨林出生在四川农村，自幼丧父，由寡孀的母亲把他养大；因为贫困，没有很好进过学校。入伍后，他由一个不识几个字的文盲，变成能学了写快板诗和决心书的战士，后来牺牲在一次激烈的战斗里。故事的中心，是写这个战士的成长。他性格纯朴，思想积极，勤于学习，又热情劳动。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特别是受同志们的献身精神所感染，逐渐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作品中有不少地方写到他从别人嘴里听到的英雄故事，特别是从指导员身边听到这个指导员当通讯员时，他怎样受教育，有许多生动的描述。这本小说在一九六一年写成后，没有出版。直到三十年后，当出版社准备把它编进《巴金全集》里去的时候，巴金还在小说的前面写了那么一句话：“我写了自己不熟习的人和事，所以失败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原来，巴金两次到朝鲜战场，在志愿军部队生活了一年多，交了不少朋友，单是和他们的谈话记录以及积累的英雄故事，就有十多册。他确实从内心爱像杨林这样纯朴的战士，但他觉得仍没有把他们写好。当时《三同志》脱稿后，他曾交给萧珊看，萧珊也同意把这部小说锁在箱子里，不拿出去给人看。她只说了一句“小说要有点情节”的话。巴金了解所谓缺少情节，主要是由于自己还不够深入生活，探索到人物心灵的活动。到了九十年代，巴金在给《巴金全集》编者王仰晨的信中谈到这件事时，他说：“其实写自己不熟习的生活，写自己不熟习的事情，对作家来说，是自讨苦吃，除非深入生活，把不熟习的变成熟习，作家就难写出一个活人，更

不要想写出什么成功的作品了。”

但是一九六一年的成都，巴金在完成《三同志》写作的同时，还是感到好久以来不曾有过的心境舒畅。原来他正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他正在校改长篇《寒夜》，他觉得改得很痛快，很符合自己的心愿。他喜欢《寒夜》，虽然不久前还有人在批判它，说什么“没有写出党的力量”，但他现在有了信心，纵然他过去自己也说过这是一本悲观的书，绝望的书，但现在他经过思考，深知它并不是一本悲观的书，更不是一本绝望的书，相反，它是一本希望的书。因为他写的这本

书，在控诉旧社会，旧制度；目的在驱除黑暗，迎接光明！他写《寒夜》，比写朝鲜战场小说顺利得多，因为《寒夜》写的是他最熟悉的生活，是按着他长期经历的旧社会知识分子所过的生活提炼成的；并不是临时“下生活”听人家说说写成的，更不是从别人闲聊中偶然听到一两句话演化而成的。

他在成都生活安定，工作顺利。但是当他走出自己所住的小楼，却发觉成都经过“大跃进”，也跟其他地方一样，“三年自然灾害严重”，物资缺乏。他看到街上有的地方挂着“本日供应蔬菜”的牌子，有的地方则写着“供应凉粉”的字样，从那边过来的人，端着碗在埋怨“就这样一点点”。而当巴金去姑母家，却发现他少年时代十分亲近的“香表哥”濮季云，正从灌县都江堰辞职回来，他身体不好，人很瘦，国家经济困难，年龄还不满六十，人家就把他打发回老家来。巴金见他意志消沉。打不起精神的这副模样，想起年轻时表哥在李家谈得晚了，就留下来与三哥尧林和自己睡在同一个床上。三个人躺在一起太挤，大家便横着身子睡觉。这个表哥与三哥同一个班级，在外国语专门学校读书，是巴金学英语的启蒙老师，有时还告诉过他不少科学常识，巴金对他印象很深。这次巴金约他一同到中山公园喝茶，这也是青年时代一起来玩过的地方，而现在人事全非，更增加了香表哥无限伤感。

过了一些时候，巴金又去姑母家，却见表哥已躺在病床上，无法起来迎接他。巴金见他的床边桌上放着满满一杯药汁，还不曾喝，就端起杯让他喝了。表哥喉咙比过去更嘶哑了，他说自己是“肝火旺”，医生讲过“不要紧”。但巴金后来听自己的侄儿李致说，他在医院恰逢濮季云在那边看病，看来他患的病，有点像肺结核，曾劝他住院治疗，但他不愿意，因为在国家经济困难期间，病人更倒霉，住院不见得有好的护理，也不见得有好吃的饮食。他终于搬住到城外他儿子住的宿舍里去了。巴金请他的侄女李国莹去看他，回来说他的神色越来越不好，营养不良，要吃挂面也买不到。巴金连忙设法替他弄了一些挂面，叫侄女骑自行车送去；几天以后，消息传来，他去世了，没有追悼会，没有丧仪，一死就把他的遗体火化了。巴金知道后，觉得出乎意料，同时也感到十分难过。他对香表哥，像对自己的哥哥一样，有多少话要对他说！但是太意外了，就这么快，离开了这个世上！他这个时期正在修改《寒夜》，而他的香表哥，竟也像小说中的汪文宣一样，咽了一口气，就把这个世界扔下了！巴金的姑妈也为儿子死得凄凉而十分悲愤。老人家过了没多少日子，也去世了！巴金觉得对这一家人像欠了一笔债似的，感到不安。

巴金觉得知识分子长期受苦的悲剧应该很快终止，他把校改过的《寒夜》校样，从成都直接寄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责任编辑，第二天就乘火车回上海。

## 第五节愉快的东京之行

巴金在成都住了四个多月，本来还想再住一个时期，争取把早已装在心里的另外两个题材也写成小说，但没有想到北京来了个通知，要他作好思想准备，在三月中旬去日本东京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会东京紧急会议。而且内定他担任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

这样，巴金只好在春节前赶回上海。一九六一年的上海春节，虽然仍按一九五九年以来的办法，凭票证供应年货，显示出物资短缺现象还未消除；但人们已经听到消息，说上面已在批评“大跃进”刮的“共产风”，指出“人祸”为害不小，必须赶快解决；这样，大家心头的疙瘩逐渐解开，特别是在文艺界，思想又开始活跃。

巴金没有想到自己离沪四个月，形势已有好转，心情比较舒畅，他很快准备了一篇在亚非作家会议上的发言稿，抒发了自己对世界的期望，说我们亚非人民最美好的理想，就是“从世界上消除一切压迫、剥削、罪恶、灾难，使整个世界充满自由、和平、友爱、幸福”；他要求“世界上一切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作家携起手来，共同写出人类历史上最辉煌最伟大的诗篇。”

这次一同出访的作家代表，大都是他所熟悉的老朋友，如冰心、沙汀、刘白羽、林林和叶君健。但当时我国与日本还不曾建立外交关系，在日本访问，到处遇到阻力，犹如在荆棘中行路，需要十分的小心谨慎。幸而日本作家中有不少进步友好人士，乐于和新中国作家们推心置腹交朋友。他们主动向来自中国大陆的人伸出援助的手，因此在日本一个月，巴金仍走了不少地方，也结识了不少日本作家，汲取了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东西——友情。

巴金他们作为新中国的作家代表到了日本，首先得到的是广大爱国华侨的关心和帮助。他们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中国作家，从住宿、饮食到交通，都给予方便；甚至还暗中保护他们，唯恐他们受到伤害。代表团一到东京羽田机场，巴金就看到无数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热烈地欢迎他们。一个在东京侨居多年的年轻华侨小韩，为巴金当了将近一个月的义务翻译，他还替巴金的访问活动沿路摄影，等于为中日作家的友谊发展，作了很好的生动记录。小韩和巴金白天在一起，为他作翻译，为他摄影；一到晚上又要和其他华侨朋友一起给大家安排第二天的行程，经常弄到深夜一二点钟才能睡眠。和巴金一样，冰心也有个为她专作口译的华侨青年小缪。她与冰心感情融洽，几天以后，两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久别重逢的母女那样亲热。巴金从心里感谢这些华侨对代表团的关怀，但是他们说：“只要祖国有人来，哪怕我们再忙，我们还是心甘情愿。”巴金发现“祖国”两个字在这里比任何东西都要珍贵。他自己也一样，一登上飞机，机身离开大陆，自己就有离开母亲的感觉，越是离开得远，离开得久，这种感觉就越是强烈。他完全能理解这些年轻华侨嘴里吐出来“祖国”两字的分量。

得到这些华侨朋友无私的热情帮助，巴金在日本的访问是非常顺利，也非常愉快的。他结识的日本朋友，都是非常友好的，不少人还是比巴金年长的日本文坛前辈。他们大都在国内享有盛誉，有很成功的专著，并在民主斗争中有光荣的经历。其中有一位青野季吉先生，他七十多岁，是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也是日本文艺评论家，一九五六年曾和另一个日本作家宇野浩二先生一同来过中国访问，巴金和他认识，这次又见面了，不但在亚非作家会

议的欢迎晚会上，而且还到他环境幽静的家里作过访问。巴金发觉青野先生比五年前瘦多了，也衰老了一些，据说他患了胃癌。在欢迎晚会上见面以后，第二天开大会时巴金就听说他昨晚回家路上昏厥，所以上午没有来出席大会。下午，青野季吉先生却出人意料地拄着手杖出现在朋友们中间，而且坐到中国作家代表团座位上来和巴金叙旧，他告诉巴金他在日本侵华期间曾来过上海，那时上海很复杂，各方面人士都有，他一到上海，日本便衣侦探便一路追踪着他，当时他还很年轻，比较机警，终于把他们摆脱掉。但是，一个月后，他从上海乘轮船返回日本，登上岸就给日本侦探逮捕了。他称颂中国得到解放，一九五六年在中国受到朋友们的友好相待，很希望有机会能再到中国看看，因为他对中国很熟悉，也很有感情。他的话很使巴金感动，觉得他确是日本文艺界的一个坚强战士，但他又为青野的健康担心，今后是不是再能在上海接待他，心中实在无数。

大会闭幕后，巴金与沙汀在日中友协的一个日本友人陪同下，曾去访问了青野季吉。他们坐在主人的客厅里，度过了一个友好亲切的黄昏。客厅虽然不大，但亮光充足，室内到处都是书，不但书架上下满是书，而且摊在地上的也不少。他们坐在书的围城里谈着话。青野友好的微笑，使他脸上的皱纹也叫人感到亲切；他讲的话不太流畅，声音也显得苍老，但他的真诚、坦率，使巴金和沙汀都十分感动。他通过自己的经历，讲了不少自己和别人的事，然后下结论说：“知识分子离开人民是找不到出路的，要不，就只有毁灭自己。”

这个对自己的理想十分忠诚的日本进步作家，他大概想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总想把自己心里的话，在与客人会面的很短的一个小时内，全部讲出来，但看来他的精力不足，显得非常吃力。在巴金和沙汀向他告别的时候，他还是把客人一起送到门外，并在他们的汽车边频频摇手。在离开东京那天，许多日本作家朋友都来送行，巴金认为青野季吉身体不好，估计他不会来机场，早一天就以中国作家代表团名义写了封信去慰问他，向他致意，哪知第二天在机场，见他仍拄着拐杖，喘着气赶来送行。他带着忧郁的脸色来到机场休息室，坐在巴金身边，表示惜别，并不时向进来的熟人打招呼，还开玩笑对大家说：“我要跟着中国代表团到中国去。”巴金握着他的手，劝他早些回家，并不安地说：“你不该来送行，你的身体不好。”青野先生却说：“不，我应该来，我不来送行，那怎么可以？我还要去中国呢！”谁知不到三个月，这个友好的日本作家就闭上了眼睛，永远也不会到我们国家来了！

在东京附近的逗子，巴金和沙汀还去访问过日本的另一个年长的作家藤森成吉先生。那是个瘦小的老人，巴金在三十年代初期就读过他的剧作。当时巴金寄住在日本横滨一个信仰佛教的日本朋友家里，后来他回到了东京，还常坐电车来逗子到叶山去看一个中国留学生，但当时巴金并不知道写剧本的藤森也住在附近，要不，他很有可能去拜访他，因为当时他对那个剧本有较深的印象。这次，他作为中国作家代表来这里，能看到藤森成吉，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藤森在几年前也访问过中国，与巴金见过面，现在他在写一本有关几个日本画家的书，这些画家虽然不很知名，却有生动的事迹，写出来足以引人深思。

藤森先生的书房比青野先生的客厅还小，但同样，他的书很多，书房放不了，连弯弯曲曲的走廊也都是书，而且不少书还摊在地上，作为资料等待

着藤森去查对。显然主人不仅是个勤奋的作家，也是个勤奋读书的知识分子。巴金还听说他在青年时代经常与体力劳动者打成一片，即使成名后也还经常深入工农群众生活，有时还当工人。他的兴趣十分广泛，对中国画也非常爱好，到了北京总爱到故宫博物院参观，有一次还因在那边逗留太久而误了点，没有赶得上飞机，他就趁此机会，去西安领略中国故都风光。这个知识广博的老人，他比巴金大十二岁。那天他与巴金、沙汀聊天，一边吃点心，一边谈话，竟谈了三个钟头，主客双方一点倦意都没有，直等到窗外毛毛雨停歇，才相互道别。

与个子瘦小、须发花白的藤森成吉先生的形象相反，石川达三先生是个身材高大、体健力强的日本作家。他在早年曾流着眼泪写过一本深入人心的小说《活着的兵》。在这本小说中，他凭自己一颗正直善良的心，勇敢地描写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暴和侵略野心。书里的几个细节和场景，多年来一直留在巴金的印象中。这次巴金在亚非作家会议的闭幕式上，听到石川先生所致的闭幕词，情切意真，义正辞严，禁不住与大家一起向他热烈鼓掌。有一次，巴金和刘白羽到石川家中访问，听他谈起他当年写《活着的兵》时，他用低沉的声调说，当时他明知这本小说会替自己招来麻烦，但他为了维护正义，出于作家良心，他什么都不怕，因为他的见闻完全真实，他不能在现实面前闭起眼睛瞎写。果然，他后来由此遭到迫害，受到监禁，但是他不后悔，他认为他应该对读者负责。

中国作家代表团在日本，除了参加会议以外，就是四出访问日本友人，但也有不少日本作家来中国作家住处访谈，比如一直热情为中日人民友谊奔走的三岛一先生和他的夫人，为自己的理想坚持斗争的广津和郎先生，以及“松川事件”被告中的杉浦三郎先生，他们都曾到巴金住处来过，进行了热情的访问。巴金从这些作家口中，知道了与会各国作家来往中的许多事情，从中汲取了作家之间的友谊。那一天，巴金和几个中国作家到了镰仓，住在旅馆里，恰巧碰到下雨，还不曾打算出门，日本年轻的小说家有吉佐和子已赶来看大家。大家就在和光旅馆的小客厅里接待她。

有吉佐和子有着鹅蛋形的笑脸，巴金曾在东京多次看到过她，但她到中国作家住处专程访问，这还是第一次。她和日本许多年轻人一样，对世界充满着好奇，她到过美国，但美国有些人的种族偏见，使她终于放弃在那边“留学”的机会；她现在正在学中文，她想找个时机到中国去看看。她告诉巴金东京一家报纸正准备连载她的一部长篇小说；同时她还打算着手写另一个长篇，以描写广岛原子弹战争受害者为题材。当她听说在场的中国作家冰心也去过广岛时，她说：“原子弹投在广岛上已经十五年了，但是在去年还是有一百多个广岛居民死于原子病。现在，美国人在那边设立了原子病研究所，只是为了研究原子病的破坏能力，了解原子病人的痛苦有多深。”

巴金知道有吉佐和子过去写过一篇短篇，那个短篇写一个人到广岛去探亲，到了那边，却看到主人正在发疯似地命令自己的孩子喝酒饮茶，因为他听说酒和茶能治疗原子病，但结果什么都没有用，都逃不掉悲惨的命运。的确，有吉佐和子非常熟悉广岛，她说她在广岛认识过一个年轻的姑娘，今年二十三岁，她在七岁时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影响，至今还不能正常走路，走几步就跌倒在地；这样她就只好整天躺在床上。对她最大的危害，还不是走路，而是她不能用脑，只要稍稍思考一下问题，她就会昏厥过去。

这样悲惨的故事，在有吉佐和子的心里装得很多。这位日本青年女作家



的来访，给巴金的印象很深。他从她那美丽的脸上，看到她内心的痛苦。应该说，这种痛苦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带给日本人民的。今后决不允许再有这样的灾难在人间发生了！巴金很想有机会也去看看广岛，可惜，因时间来不及，没有得到安排。他想今后总有机会去的。

这次赴日访问，巴金所结识的日本作家中，使他难忘的还有一位是中岛健藏先生。在中国作家代表团举办的告别酒会上，日本文学界著名评论家中岛先生有一段极其动人、充满对中国人民友好感情的讲话，他讲完后从台上走下来，两眼噙着泪水，巴金禁不住当场上去和他握手，感谢他对中国人民的友谊。接着，他自己也掉泪了。在这一个月的访问中，中岛健藏总是在胸前挂了两架照相机，不断地找寻机会，抓镜头为大家拍照。他为人正直，诚恳，心地善良，爱自己的国家，也爱我们的新中国，他为中日人民友谊的发展做了许多实际工作。他喜欢喝酒，酒量不小，虽然巴金向他劝酒，但又怕他喝得过多，影响健康，因而有时又劝他有所节制。中岛健藏工作并不顺利，还经常受人歧视，书店不出他的著作，文章找不到发表的地方，有时还要接到恐吓信。他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卖掉汽车，以所得垫补家用。他为正义斗争，这样的生活已有了一段很长时期。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期间，他在新加坡当随军记者，看到过日本军国主义随意逮捕、枪杀华侨。有些死者的母亲还拿着儿子的照片，要中岛健藏帮助她追查儿子的生死存亡。他为此感到苦恼，积储了对军国主义侵略者的仇恨。他认为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他选择了他晚年最重要的工作，这就是要为这个目标奋斗到底。巴金很敬重他的为人，把他当作长兄；并把中岛以发展中日友谊作为他一生中最后的工作，称为“天鹅之歌”。在一九六一年这次访问中，他们两人曾在箱根温泉旅馆小涌园的小客厅里，对坐谈心，各抒己见。以后他们的友谊又得到了发展，相互间多次的来往，相知更深，直到中岛在一九七九年去世。

跟中岛健藏先生一样，井上靖先生也是巴金在一九六一年于东京结识，而后来逐渐发展为好友的日本作家。他是名著《天平之甕》的作者。巴金曾在这一年三月，在井上靖家中那个美丽的积雪庭院，度过一个气候寒冷而友情温暖的夜晚。他们坐在楼上的书室里，谈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井上靖广泛地介绍了日本中世纪以来的文化发展的情况，和近、现代作家的主要著作内容，最后还送给巴金几册他自己的著作。

巴金的赴日访问，汲取了洋溢在中日两国作家心灵中的友谊，同时也游览了很有诗情画意的美丽的富士山。巴金在自己少年时代就听过他的两个在日本留过学的叔叔讲起过富士山，说日本人很爱这座山，并把它称作“圣山”。这次，他在《知识分子的肖像》的作者龟井胜一郎先生的陪同下，坐了“观光车”，又乘了游艇，绕着富士山走了一圈。他们几乎花了一整天时间，在导游员的导引下，有时透过茂林看戴着雪帽的山峰；有时又在湖上抬头看山顶；有时又低下头看水面上的富士山倒影。虽然很累，却从各种角度，看到了富士山的形象。给巴金留下更深印象的，则是龟井先生热情的友好的笑脸。他陪同中国友人绕着壮丽的富士山访问了好几个城市，几天中为大家安排日程常常工作到深夜。在离开金泽的前夜，他为照顾中国客人，左手被汽车门碰伤，还来不及包扎，就和大家一起参加作家座谈。等到会议结束，他才去医院治伤，回来后，他又在自己的房间里，若无其事地接待中国作家对自己的慰问，像亲人一样和大家欢叙。

龟井先生对内滩渔民的斗争，十分支持。他曾陪同中国作家到那边进行

过访问。巴金站在海边，看到灰色的海面很不平静，海水急急地拍打着海滩，他觉得海好像要向他发出控诉；龟井胜一郎在旁边指着远处迷雾中一处残破的小楼和一些土堆，对他说：“这小楼就是观测所的楼房，而那堆土，则是弹药库的残余。”原来这里就是日本人民当年反对美军建立军事基地的地方，附近至今还残存着一些零星的带刺的铁丝，是当初美军架起来的长达四千米铁丝网，用以拦阻日本人民群众的冲击。由于日本人民坚决反对把内滩砂丘地用作美国兵的打靶场，进行了三年的斗争，终于胜利，现在连兵营的大门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片寂寞与凄凉。

当年“反对基地实行委员会”的委员长出岛权次，和副委员长滨田长松，陪着中国作家来到内滩渔村，村子里的居民带着微笑欢迎大家。这里有老人，也有中青年；有渔民，也有工人；有已经有了孙子穿着和服的老太太，也有在铁路上工作的年轻共产党员。就是这些人，他们赤手空拳，为保卫内滩斗争了三年，终于取得了胜利。

巴金和大家一起，在阳光下几乎走遍了整个村子。他充满了信心，认为只要赢得人民，和平总会战胜战争。

在金泽市，他们还曾在龟井先生的陪同下，到兼六公园的樱花树下散散步。巴金把满园的樱花看作是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樱花十分美丽，开时一大片，几天风雨就落英满园，所以人们很欣赏它的“瞬间美”；也有人对此发出叹息，把它比喻为人生的短暂。但是巴金认为樱花看来好像每年只开几天，但在他的印象中，樱花是永久的美。他说他在一九三五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到过东京上野公园，那时樱花璀璨，曾给他留下第一印象，虽然当时他被日本刑事警察署无理拘捕放出来不久，心情不好，但樱花美的印象却永远留在心里，把它当作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不因外界条件的改变而有所改变。几十年过去，他还是没有忘去它的美。一九五五年，他的家在上海迁居，院子里为此新种下两株樱花，年年开花，美还在心中。尽管开了又落了，但美的印象不变。他把自己的想法，讲给日本朋友听，日本朋友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并说以后一定要在樱花时节去巴金家中访问。

在日本访问了整整一个月，巴金和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同志们，每个人心中满载中日人民友谊，终于来到东京羽田机场准备回国了。来送行的除了年轻的华侨朋友，更多的是新结识的日本作家，虽然临别时大家免不了掉泪，但是大家相信心连着心，美好的日子在未来，重逢的日子在不久之后。中岛健藏先生仍然赶来为客人们临别时的情景拍照；平时讲话不多的历史学家三岛一先生则指挥着大家唱《东京——北京》，他为客人们忙碌了几天，现在还当这支歌颂友情的歌曲的合唱指挥，巴金问他：“累吗？”他说：“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朋友越来越多，累也是高兴啊！”龟井胜一郎也来了，堀田善卫先生也来了，藏原惟人先生也来了，甚至青野先生也抱病赶到，木下顺二先生还陪着客人从福田家旅馆坐车到机场，但这些主人都留在机场休息室，站在平台上不停地向中国朋友招手；只有石川达三先生和白石凡先生拿到通行证，陪着中国客人走到飞机的扶梯口，和大家握手告别。

“再见吧，朋友！”站在平台上的不断挥手，站在扶梯口的也不断地挥手，大家说着同样的一句话，心与心都相通着。

巴金坐到机舱内，和旁边的老友沙汀相视而笑，两人禁不住畅谈起这一个月愉快的旅行来。

## 第六节友情难忘

巴金回到上海，已经是五月初。萧珊见到巴金，觉得他这次出访，与往常不同，出乎意外地反而胖了一些，知道他在日本生活过得比较愉快，心里也很高兴。巴金却发现萧珊瘦了不少，想必她工作太忙，国家还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各种副食品和日用品都需凭票购买，家务上要操心的杂事特别多，把她累坏了。巴金听萧珊说，杭州的方令孺托人带过口信来问，今年是否仍去杭州？去年她去北京求医，没来得及接待他，今年她可专程等着他们去。巴金访日回来要写的东西很多，如果在上海住下来，那就会被杂务绊住，会议通知也就会蜂拥而至，那自己心里要写的文章也都无法写了！这样，巴金就征得萧珊同意，决定两人应方令孺之邀去杭州写作。好在这时他们的女儿小林已经进市二女中读初中，儿子小棠也在小学里，离暑假还有一段时间。两个月后暑假到来，萧珊答应孩子们那时陪同他们另上黄山去。

巴金到了杭州，仍住在花港招待所。这时西湖的桃花虽已谢了，天气也渐渐热起来，但堤上杨柳青青，一片新绿，似乎春色尚在，使人顿然忘俗。方令孺在这里已当了两年浙江省文联主席，见到他们，仍像孩子似的和他们攀谈，心底的话全都倒了出来，嘻嘻哈哈，讲得非常坦率，使巴金、萧珊都觉得她十分可亲。她还陪同他们去了灵隐，同时也邀请他们到灵隐附近白乐桥她那个幽静的屋子里作客，啄饮着龙井新茶，谈起一些往事，也相互询问了沪杭两地一些熟人的情况。巴金这时才发觉方大姐似乎在这个时候，流露出她一点内心的孤独和寂寞。

巴金这次在杭州住了不到一个月，却也写了两篇记述不久前东京之行的散文，又抓紧时间写了描写朝鲜战场的短篇小说《团圆》，后来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小说还不曾写完，便接到通知，说龟井胜一郎要在月底来上海。巴金想起龟井先生在东京曾热情陪同中国作家代表团代表游富士山，还和他一起在金泽市兼六公园看樱花，他的恳切友好的笑容，一直留在巴金的心里。现在知道他要来上海，巴金很高兴，就决定回上海去。这时又由上海转来沙汀一封信，问他从日本回来后的情况怎样，巴金写信告诉他，说自己已在杭州住了三个星期，后天下午就要回上海了。自从与他分别以后，起初因眼睛发炎，休息了几天，到了杭州后，写的第一篇访日散文《我们永远站在一起》已在《人民日报》发表，因报纸版面篇幅有限，给删了几句，恰好把提到与沙汀一起在飞机上“畅谈一月来访日见闻”的话删掉了。巴金在信中还将日本作家访华团就要来沪，自己准备赶回上海的消息告诉沙汀，说自己正在继续写访日散文，同时也看到在报上发表的冰心的文章《日本归来》和叶圣陶的《樱花精神》，希望沙汀也写篇访日散文，表示欢迎龟井等日本作家访华。巴金还在信中说：“我初来杭州，天气还不错。这两天忽然大热，前天和昨天真热得可怕。今天稍好些。你们最好在春秋佳日来玩玩。的确有值得留恋之处。”

在“热得可怕”的两天，方令孺因年龄比巴金大，已不大能经常从家里出来陪同巴金游览了，但巴金在晚饭后还是照常出来散步，有时还和他同住在花港招待所的另一个作家一起，走到京剧艺人盖叫天自己预置的墓地，才折回住处。那时天色已晚，行人很少，却有月光如水，透过树丛，照得沿路都是柳姿、竹影，常使巴金记起年轻时代与丽尼、陆蠡等带着于粮在这里有说有笑，甚至计划分译屠格涅夫几部长篇小说的情景。现在这些友人，有的

已经去世，有的也已远离上海，想起来不免感到寂寞。当然，晚上散步，有时也有巧遇，就在那个白天比较炎热的傍晚，夕阳西下，气候稍稍转凉，巴金和往常一样，散步到墓地，登上台阶，却见老人盖叫天正坐在墓前的石凳上，望着他自己设计的红字墓碑，看坡前的景色。在石牌坊上的那副对联：“英名盖世三岔口，杰作惊天十字坡”，虽在黄昏，仍的然可见。巴金看过盖叫天的戏，对他的武松戏也有较深的印象，在北京和上海也曾几次在会上相见，这次意外奇遇，更使两人感到高兴。大家谈戏，也谈景；谈上海，也谈杭州；谈过去旧事，也谈眼前现状；但更多的是谈京剧发展前途，他们都对未来充满信心。谁知这竟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交谈，以后他们虽偶然在会上见到，但都来不及招呼，五年就过去了。一九六六年七月底，巴金到西湖参加亚非作家“湖上大联欢”，却已听到盖叫天在靠边受批斗的消息，巴金这时也胆战心惊，自顾不暇，对盖叫天的事不但不敢问，也不敢闻，他不知道将会发生些什么情况。

一九六一年六月下旬，巴金一回到上海，就被几个大小会议困住。先是参加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分会改选，他的老友金仲华被选为主席，他和周谷城被选为副主席。然后是接待以江口涣为团长的日本作家访华团，从欢迎到欢送，他都参加了；到七月中旬，以龟井胜一郎为团长的日本文学代表团才到上海。巴金在上海龙华机扬迎接他，当他一下飞机，巴金就紧紧握住他的手，向他问好，这时巴金的脑子立刻出现了富士山雪白的峰顶，好像他与龟井先生的旅行还不曾结束，要继续这友谊的旅行。当天晚上，巴金又和上海一些作家设宴招待了由龟井先生带队的代表团全体成员，还和他们在上海大世界杂技场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夏夜，巴金为看到客人们的笑容而感到高兴。

第二天，巴金又在自己家里接待了龟井胜一郎和井上靖。当时巴金还不曾到过龟井先生的家（第二年他再访日本时，才有机会看到了龟井幽静古雅的客厅了），却曾在井上靖先生美丽的积雪庭院逗留过几个小时；现在他们两人的回访，无疑给双方本来就存在的良好友谊，增添了美丽的色彩。巴金不但请他们在自己的客厅中喝茶吃点心，自由谈笑，共叙离情；还让他们到自己的院子里散步，虽然樱花开花季节已经过去，但篱边的两株樱花树有满树美丽的绿叶，象征着中日人民的友谊常青。客人在巴金家中畅叙两小时后离去，那一支在东京听到过的《东京——北京》歌曲，却似乎在巴金耳边重又响了起来。

在巴金到机场把日本朋友送别后不久，巴金就经杭州来到黄山，住在半山腰的紫云楼里，把上月在杭州开始写的小说写完，并将它们与去年冬天在成都写的《军长的心》、《李大海》、《再见》等几个短篇一起编成一个短篇小说集《李大海》，内容都是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有关的。巴金在把它们编成集子时，有一种“重温旧梦”的感觉，虽然写的是别人和别人的事情，可是他觉得他自己也在小说里生活。因而他在这本集子《后记》中说自己“好像回到九年前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见到了许多勇敢而热情的友人。”又说：“我多么想绘出他们的崇高的精神面貌，写尽我的尊敬和热爱的感情。然而我的愿望和努力到了我的秃笔下都变成这些无力的文字了。”

这次巴金来黄山时，和他结伴同行的，有他的好友金仲华，与上海的另外两个作家。其中一个杜宣。大家都住在紫云楼上，各人都有一些写作任务，但金仲华住了两个星期就回去了。虽然时间是盛夏，但到山上还是要穿

棉大衣，在紫云楼则比较凉快，穿夹衣就可以了。巴金的夫人萧珊则在巴金来到前一个星期，就带着两个孩子来到黄山，因为早在五月间她就答应孩子们来这里住一个短时期。现在暑期到了，正是孩子们扩大视野过一个愉快假期的时候。对孩子们来说，这是第一次来黄山，特别是男孩子小棠，爬山看日出，对他幼小的心灵是何等的诱惑！巴金让他们在山上住了三天，看云雾怎样在山腰绕缭，松树怎样张开臂膀在迎接游人！巴金为此在给他的故乡老友沙汀写信时说：“孩子们还是第一次登山，小棠很感兴趣。黄山的确不错，我们在这里也过得好，可惜你们一家没有来；不然我们可以重温北戴河的旧梦了。”从黄山回来，已经是秋天了。在这一年秋冬季节，巴金除了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如纪念鲁迅诞辰八十周年、逝世二十五周年；迎送一些国际友人等事情之外，他仍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写作上。他先把在杭州和成都就开始动笔写的中篇小说《三同志》写完，接着，他就写《谈自己的创作》。这组文章原为回答读者来信而写的，这些读者也包括海内外一些巴金作品的研究者，因为他们经常提些问题要求巴金答复。文章共有十篇，早在一九五六年他就开始写了，最早完成的是谈《家》的一篇，原为英译本《家》写的《后记》，后来进行了改写。其后又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写了《谈〈灭亡〉》、《谈〈春〉》、《谈〈秋〉》、《谈我的短篇小说》与《谈我的散文》。这次他写的是《谈〈第四病室〉》、《谈〈憩园〉》、《谈〈寒夜〉》和《谈〈新生〉和其他》四篇。他从十月下旬开始执笔，到第二个月下旬就完成了，四篇文章计五万多字，不过花了一个月时间，是写得很快的，也很顺利的；同时又因为一九六一年不像一九五八年那样刚经过反右，许多事情都要担心人家上纲上线；现在心里的话可以坦率地说出来了。细心的读者读了巴金谈《第四病室》、《憩园》、《寒夜》和《新生》的文章，是能够发觉这四篇文章比巴金一九五八年写的几篇相当拘谨地谈自己创作的文章，要痛快得多了。

当然，到了一九六二年，就比一九六一年更加使人心境舒畅，虽然那时国家经济困难还不曾完全过去，但“眼前物资供应紧张，在精神世界里就让大家宽松一些吧”这样的传说，本身就使人们从心底感到高兴。一九六二年一开始，中央就有个“七千人大会”，在会上，刘少奇总结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这几年的主要缺点错误，认为除了经验不足之外，另一个原因是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毛泽东还作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的，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朱德在小组会上发言说：“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这次会议，畅所欲言，上下通气，我很满意。”邓小平也就党的工作问题讲了话，强调要把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过来。周恩来则分析了经济形势，布置了一九六二年继续贯彻八字方针、克服严重经济困难的各项工作。陈云也认为“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因而他以为“这次会议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低估了。”

这样祥和的政治气氛不能不影响知识界。巴金在这前后，首先听到的消息是他的几个老友萧乾、黄裳等在“反右”后头上戴的帽子摘掉了；其次是接待外宾，似乎清规戒律少了一些，他与日本友人交往，再也不用过去接待法国作家萨特时那样提心吊胆，唯恐讲错话了。不久前，他在家请继龟井胜一郎而来上海的日本作家三岛一先生吃了晚饭，还送了他一个从成都带回来的竹器笔筒，以表示心意；使这个在东京时曾经热情指挥中日作家合唱《东

京——北京》这首歌曲的历史学者，在临行时激动得几乎哭了起来。巴金自己也从这个满头白发的老人身上，看到了国际友人对新中国前景的期望和向往。

从这个时期开始，巴金似乎已逐渐消除了五十年代中后期几次运动施加在他身上的压力，国内外友人对他的真诚友谊，似乎又使他对自己祖国的理想，以及他自己在创作事业上的追求，重又燃起了希望之火；同时，他的善良和真诚，又不断驱使他给朋友和同志们，给与热情的期望与帮助，这也就使他日日夜夜忙于写作，又忙于生活，也忙于与友人交谊。一九六二年初，他已把《谈自己的创作》书稿继描写朝鲜战场的短篇小说集《李大海》之后交给了出版社出版，现在正是他结束前一阶段的创作题材，开步走向另一个创作进程的时候。乘着这个间歇时间，他与方令孺结伴去了海南岛。他们乘的是一部旅游车，从椰树成林的海口市出发，到过美丽的侨乡文昌，也到过著名的咖啡生产地兴隆，更游览了我国最南方的三亚市，在那边“鹿回头”的神话增添了作家们对椰林和大海的联想。他们还在“天涯海角”，看到了祖国边疆的南端。后来他们还到过苏东坡被贬之地儋县，以及海瑞的墓地。当时巴金当然不会预想到这个明代大臣海瑞，几年之后他的故事在我们新中国竟然会被利用掀起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但是巴金对历代许多人夸大“青天”的作用，确是一直存在着疑虑，他想：如果我们自己不争气，凡事都靠一二个“青天”老爷，这真能解决问题吗？

至于宋代朝廷对苏东坡的贬谪，让苏东坡在此“垦地结荒”，远离自己的故乡和工作过的地方，这样的生活情景，巴金是能够想象的。因为他的不少朋友都经历了这种遭遇。这次来广州，巴金碰到了久别的老友陈洪有。这个一直献身教育工作的教师，他在一九三三年当广东省新会县西乡村师范教师的时候，曾陪同巴金去过闽南泉州，后来又陪他去过广东作一个月的旅行，曾使巴金对当时的南方社会增深认识，开拓了眼界。抗战期间，陈洪有还陪同巴金和萧珊从广州到武汉，去会见了当时在武汉主持文协工作的老舍、王鲁彦等作家。现在陈洪有仍在学校里工作，他在巴金从海南岛回广州后，特地来到宾馆看巴金。当时巴金正把刚从上海带着孩子来广州过春节的萧珊接到宾馆，看见老友陈洪有，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但是刚谈上几句话，洪有却给巴金带来了一个不幸消息：巴金在广东的另一个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友叶非英死了，而且死在下放劳动的场所。早在一九三三年秋天，巴金就与叶非英认识了。解放后，大家都忙于工作，巴金只知道叶非英、陈洪有仍在当教师，还参加了民主党派，却不料这次消息传来，叶非英在“反右”运动中，被戴上帽子，下放劳动。在国家经济困难期间，这个一生不曾建立过家庭的数学教师，就在劳教场中，大家以猪食充饥的年头，发病吐泻，得不到及时医治而离开了人世。

巴金听到洪有谈的这个消息，想起叶非英早年宣传过无政府主义，翻印过巴金年轻时候写的小册子，也许自己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几部著作对他有过影响，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想为他写一篇纪念文章，却害怕会累及自己。眼前虽是一片阳光，到处听到“发扬民主，加强团结”的话，但为求平安，觉得还是不写算了。

萧珊是应一个朋友之约，带着两个孩子来广州过春节，眼前春节已到，方令孺约大家去看了花市。广州羊城的花市确实美丽又热闹，任何人都不免为之沉醉。方令孺当然比叶非英幸运得多，但作为知识分子，她的经历也十

分坎坷，巴金还是这几天才了解到的。那天她与巴金他们五六个人在海口市招待所等待回广州湛江的飞机，等了两天，还不曾有飞机来，大家闲得发慌，就用聊天来打发时间，在谈笑中问起方大姐为什么只是一个人。大姐这就讲起了自己的身世。原来她在年轻时代曾经历过一段厌弃富家少奶奶醉生梦死的生活，冲出封建旧礼教的樊笼，追求自由的斗争。她在离开了家以后，就努力学习知识，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环境，新世界，她有女儿，却不住在一起，她一直自食其力，独立生活，不依赖任何人，人家以为她孤独、清高，实际上她非常热爱生活，热爱人民。与她在一起，久了就会觉得她是个正直诚实的人。她一点也不孤独，在大学教书时，许多大学生都与她接近；到了浙江，大概她刚到不久，人家不太理解她，所以有时她感到寂寞。她与萧珊非常亲近，什么话都讲，相互之间毫无阻隔，节前还和巴金全家一起共同愉快地生活住了两天。巴金的两个孩子，也都欢喜她。这一年农历除夕，在广州宾馆，巴金全家与方令孺一同到冰心房间欢聚，冰心看见他们，像看见一批亲人，大家谈得非常融洽。同在这一时刻谈心的，还有准备与冰心一起出国到开罗去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的叶君健与杜宣。这次代表团的正副团长是茅盾、夏衍，他们几天后就要来广州，与大家一起出发，届时巴金将为他们送行。这夜他们谈话谈到午夜十二点钟，才各自回房休息。

## 第七节心声、掌声和雷声

巴金和萧珊带着孩子们回到上海家中，在大门口刚按了一下电铃，就听见那只日本种小狗在里边闻声欢跳。接着，巴金的两个妹妹就出来开门，她们见巴金、萧珊和孩子们都面色红腴，脸露笑容，知道他们在南方过得很好，也就十分高兴。毛色黄白相间的小狗在大家脚边摇头摆尾，跳来跳去，欢天喜地，九姑李琼如就告诉巴金，说小狗在他们出门期间，每天早晨跑到楼上，等候在他们紧闭的房门外，巴望着他们能起身开门出来。现在发现一个月在外旅行的主人们回来，小狗那股高兴劲真是难以形容。它先是摇着尾巴嗅大家的脚，然后迈开大步，在院子里急急地绕着圈子奔跑。这使原来就生气蓬勃的巴金家庭，这时更加热闹，大家还来不及安顿好行李，就连声唤呼：“包弟，包弟！”特别是小棠，禁不住把它叫到身边，搂在怀里。

那只小狗，本是住在淮海中路上方花园里的一个瑞典人豢养的。它的名字叫“斯包弟”。后来瑞典人回国，就把它让给住进那幢房子里去的作家唐弢。唐弢三年前调北京工作，他想到巴金家有院子，有草坪，比上方花园的条件更好，就在临行前几天，征得巴金、萧珊同意，将“斯包弟”赠给巴金。巴金一家都很欢喜这只小狗，为了叫唤它时更顺口，他们把它改称“包弟”。萧珊与小棠对它更有兴趣，也十分关心它的生活。但它来的不是时候，正碰到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人尚且“有啥吃啥”，狗的饲料也就更难尽如人意了，幸而当时巴金能每月凭十几张票证带着萧珊进政协文化俱乐部进餐，萧珊也就有机会在餐桌上随便收拾一些残余带回家去喂包弟，或者干脆向服务员打个招呼，讨几根肉骨头带回去让包弟啃。包弟也真能讨新的主人欢喜，它每晚在院子里主动值班，凡篱笆外面有点脚步声，它就叫了起来，路人一过，它就停歇，从不无故惊扰屋里当家的。白天在客人面前，它常把旧主人教会它的那套直立作揖的本领露出来，博取满堂哄笑。有时日本朋友来，就更为主人添话题，因为包弟原是日本种，日本客人看到它，特别感到亲热，有些隔了一二年没见面的日本朋友，重见巴金时，还会问起：“你家的小狗怎样了？”巴金总是说：“很好，它还是这么可爱。”

在上海住了还不过一个月，到这一年三月底，巴金又到北京开会，这次主要是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他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听取了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对巴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它强调了“要进一步发扬民主”，并明确地指出的几句话：“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错误的。”隔了二十天，即四月十八日，周恩来又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作《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新发展》的讲话，说“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更多可以动员的因素，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扩大我们的民主生活。”到了四月底，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了中宣部的《文艺八条》，交由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党组下发各地文艺单位，进一步贯彻执行双百方针。

在这些日子里，巴金在北京还听了周扬等人传达周恩来与陈毅在广州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上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在这个报告里批评了一九五七年以后出现的“左”的倾向，重申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的观点，对待知识分子：一、要信任他们；二、要帮助他们；三、要改善关系；四、要解决问题；五、一定要承认我们过去有错误，应对



过去批评错了的、多了的、过了的，向同志们道歉；六、承认错误，还要改。陈毅则在会上说知识分子“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应该对他们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对你们行‘脱帽礼’。”

巴金在北京与作家中的许多老朋友如茅盾、周扬、夏衍、老舍、曹禺、沙汀、刘白羽、陈荒煤、何其芳、严文井、邵荃麟等都有较多时间的会晤，更到过叶圣陶、冰心及沈从文三个老友家中欢聚。这是他历次赴京叙旧最畅的一次。特别是在沈从文家里，他看到沈从文已完全恢复过去那种对事对人乐观、豁达、宽厚的神情，巴金更为高兴。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似乎兴趣越来越高，他对历代瓷品、民间工艺和古代服饰的发展过程都有研究。他在向巴金叙述时，讲得头头是道，使巴金反而感到自己乏善可陈，心里有点空虚。巴金想，从文是这样踏实能干，而自己虽下决心要深入生活，却始终深不下去。现在浮在上面，经常参加各种活动，结果总是抓不到切实的东西。现在，领导上又安排从文参加政协，也让他在报刊上发表些诗文了，看来飘浮在他头上的乌云似乎已经散去了，阳光也已照到这个忠厚的老友身上，巴金得到安慰。

巴金乘着心头这股东风，从北京回到上海。当时上海已在积极准备召开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还要孔罗荪动员巴金在上海的第二次文代会发言。后来石西民还带了他的夫人到武康路巴金家里访问了巴金，鼓励他畅所欲言。这时巴金真感到四周一片阳光，心境十分舒畅。

就在这一年五月八日上午，上海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友谊电影院开幕了，这是上海文学艺术界经过多次折腾，又终于恢复五十年代初期那种充满着祥和气氛的聚会。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的《上海文学》，已开始积极贯彻双百方针，组织、刊登些题材、风格多样化的作品。各报副刊也开始改版，重新振作精神，想在贯彻“双百”方针中，扩大组稿范围，让更多作家、艺术家来写稿。在会场上，人们面露笑容，相互寒暄，有不少人在反胡风、反右和反右倾运动中曾遭受过拂逆，现在又回到队伍里面来，老友重逢，不免悲喜交加，当然主要还是“喜”字领头。在这个时刻，最明显的，则是在一些女演员身上可以看出来，这就是在她们的头发上出现了蝴蝶结，穿花衬衫的人多起来了，而流行在这个季节里的淡黄色薄绒线衫，穿在她们身上，更叫人看出向农村下放大批干部让他们以穿破衣为荣的“跃进”时期已经过去。

巴金主持了这个大会，在开幕式上，宣读了经过作协党组看过并送市委宣传部审阅了的开幕词：《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红旗》。虽然，从这个开幕词所运用的形容词，诸如“极其辉煌”“无比丰富”等字眼里，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头脑里，还没有完全痛快地把这几年来说“大话”的习惯丢掉，但是从总的精神来看，大会要求文艺界写出和演出反映当前现实的作品，态度是恳切的。而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工作报告，则是叶以群、孔罗荪在北京参加了中宣部的会议后，根据这个时期党对文艺工作的方针政策精神写成的。他们事先曾经与中宣部负责人周扬交谈，听取中央领导对上海文学界的期望。

引起会场上轰动的，是第二天大会上的发言。虽然这些发言人都是以个人身份发表意见，但是看了他们的名字，谁都会想到那是各人代表了一个方面，即文学界的巴金，美术界的丰子恺，戏剧界的黄佐临，电影界的瞿白音。

人们都知道巴金平时除了主持大会宣读预先拟好了的开幕词，或在国际性会议上宣读讲稿之外，一般在大会上发言是很少的。就大家记忆，好像他在一九四九年夏天上海刚解放时，在逸园饭店举行的一次欢送全国文代会代表北上大会上，曾跟着冯雪峰、陈望道、熊佛西等人急匆匆地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讲了几句话。此外，就只有反胡风、反右运动中的被迫表态和一九六三年第三次全国文代大会上那次奉命发言《文学要跑在时代前头》了。这次上海第二次文代会，真是他生平第一次出自心声的正式公开发言。他的发言，一开头就声明，那是他个人心里的话，他说自己这些年来“讲得多，写得少，而且写得很差。”因此，他有时也为此着急，坐立不安。但有时却又因为“留下的东西不多，反而有一种放心的感觉。”他常责备自己缺乏勇气，责任心不强，但有时又替自己辩解，“因为像我这样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人并不太少。”然后，他又觉得这样下去不行，作为作家，应该有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

巴金在大会上，袒露了自己的缺点，说自己“害怕‘言多必失’，招来麻烦。”他说：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新社会里也有这样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欢喜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说那一位作者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好像我们伟大的祖国只属于他们极少数的人，没有他们的点头，谁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们有一个时期非常轻视文学作品的作用，公开说“托尔斯泰没得用”；另一个时期又把文学作品抬得很高，要作家对读者们的一切行为负责。巴金说这些话是有根据的。在三年前，姚文元他们在北京几个刊物上对巴金作品进行攻击时，巴金接到过上海一个大学生给他的一封信，说他犯了错误，是因为他读了巴金的一本书，所以这个读者除了自己检讨，还要巴金也一起检讨。对这样的无理要求，巴金并没有理会，因为巴金认为让一本小说来负责一个读者世界观的改变，是不公平的。因此，他在会上说：“要一个作家负担过多的责任，使人感到不写文章反而两肩轻松，不发表作品叫别人抓不到辫子，倒可以安安静静地过日子，这决不是好办法。”说这样的话，巴金也有事实根据。他记得就在最近《上海文学》发表了他的朋友欧阳山一篇以一个百货店女售货员为题材的小说，因为写法上与当前流行的写法有些不同，没有重复别人常说的套话，编辑部就接到批评信。

因此，巴金说，现在许多人只好小心翼翼，不论说话作文，都不敢稍露锋芒，宁愿多说别人说过若干遍的话，而且尽可能说得全面，即使谈一个小问题，也要加上大段的头尾，要面面俱到，叫人抓不到辫子，不管文章有没有作用，只求平平安安地过关。

在大会发言中，巴金还提到他有个外国朋友，这个外国朋友曾在广州、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访问，他后来对人说起他在每一个城市都受到热

情接待，“但是他奇怪的是在不同的宴会上，他从不同的主人口里听到的差不多相同的谈话。”因而巴金说：“为什么我们文学艺术的百花园中还不见红花似海、百鸟朝凤？为什么我们的报刊上许多人喜欢重复用着同样的词汇和字句？……显然，我们前进的道路还有障碍，障碍不止一种，我刚才讲过的那种不知从哪里来的框框和棍子，和那些但求无过的怕挨整的顾虑，是最大的障碍。”

接着，巴金很坦率地说，虽然他知道今天我们国家需要的是坚持真理、热爱祖国的文艺战士，但当浮夸风盛行的时候，许多人也明知是非，却不敢出来讲话，包括他自己，因为怕乱棍打在自己身上。“我自己就应当接受批评，因为我也写文章替‘浮夸’宣传。”所以，巴金认为，今后作家一定要有勇气，“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他的发言，还向一些专门看风向、摸“行情”的“批评家”提了个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好的批评家应该是作家的朋友，而不是作家的上级。

巴金讲这些话的时候，会场上有不少坐在前面的人向后面找一个熟面孔；坐在后面的人，又抬起头朝前边去找那个熟面孔。人人都知道那个熟面孔：圆圆的脸，瞪着的大眼睛，和一张方而阔的大嘴，那不是别人，就是张春桥的得宠者：姚文元。在场了解内情的人都记得，不久前从北京开会回来的孔罗荪，还曾向石西民汇报，中宣部、文化部负责人也说姚文元文章简单粗暴，强词夺理，叫人看了生气。而这时姚文元正坐在中间，瞪着双眼，嘟起嘴，皱着眉头，不知在想着什么。

在巴金把他的发言最后的一句话“我们一定要使上海文学艺术的百花园中出现的一个无限美好的春天”讲完后，全场响起上海历次文艺界大会上所少有的响亮的掌声。许多人都说巴金这次话讲得好，讲到我们许多人心里。巴金自己也觉得有一种很少有过的舒畅感觉通过全身透发出来。他禁不住为自己说出了心里话而感到喜悦。

下午发言的是丰子恺、黄佐临和瞿白音。子恺比巴金年长六岁，当时已六十五岁，但他鹤发童颜，富有幽默感。他与巴金是君子之交，很早就相互知道，互相尊重，但并没有很多交往。巴金在一九二八年从法国回来后，与索非住在一起，就经常听索非谈起丰子恺，因为丰是钱君匋的老师，而君匋则是《灭亡》封面的设计人。索非在开明书店工作，他对子恺十分了解，巴金喜欢子恺漫画，也喜欢他写的字，和他写的散文随笔。一九三一年巴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封面就是丰子恺题写的字。抗战时期，巴金在重庆开明书店见到子恺，后来还到沙坪坝子恺新居去看他。解放后，相互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但一般总在会议上，特别是在政协的学习会上。在这种场合上，子恺发言不多，和巴金有点相似。今天的文代大会上，出乎意料地，这个银须飘拂的老人，在话筒面前，讲话时间虽不太长，但滔滔如流，讲得又干脆，又富有幽默感。看来他在事先也有领导人向他作过思想动员，鼓励他“畅所欲言”。他讲得有条有理，显然有些准备。他表示非常拥护双百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的想法，十分符合自己的心意，他以为要百花园繁花似锦，必须按照每种花树的特征和个性，顺着自然规律让它们发展，不能把各种花树与冬青同等看待，把它们剪得一样齐。但是现在有人却像拿着一把大剪刀，把文学艺术搞得千篇一律。他的话立刻引起了会场上一阵热烈掌声。

和巴金、丰子恺一样，瞿白音、黄佐临也从心里说出了类似的话，他们都热切期望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文艺百花园树木繁茂，花朵盛开。黄佐临恳求

人们“不要对作家、艺术家随便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挖根子，甩袖子”，要相信作家、艺术家的真诚，他们是爱国、爱党、爱人民的；瞿白音甚至掏出心来，说“希望毛主席发一块免斗牌，让大家想什么就说什么”，他同意巴金的发言，要鼓励作家、艺术家有勇气，也有责任心，那是会使社会主义祖国的百花盛开，而不会使它们枯萎的。这四位具有中国知识分子良心的文学艺术界代表，他们恳切的发言，不仅使会场上一千多个作家、艺术家欢欣鼓舞，认为他们的发言确实表达了大家共同的心意；而且也使坐在台上的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由衷感动，他站起来说：“听了大家的发言，我很赞同，特别是巴金同志的发言，我听了后，连眼泪都掉下来了，我现在代表党，感谢大家。希望大会发扬民主，开得好，让所有作家艺术家都畅所欲言！”一阵春风，把上海第二次文代会民主的大门打开，第二天的文学、电影、戏剧、戏曲、美术、音乐、舞蹈各小组讨论，广泛地展开起来了。大家各就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一九五七年反右后“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和极“左”的思想作风对文学艺术工作的影响，作了诉述，人们所举的事例大都是真实的，提出的意见也是恳切的，看来大会的收获也是很大的。

但是会议刚刚结束，环绕在上海文学艺术界上空的气氛又突然转变，犹如晴空中响起一阵闷雷。首先是闭幕后当天下午的全体摄影，一千多代表等着市委领导人柯庆施、石西民、张春桥来参加，这是上午说好了的，但后来都不来了，只剩下一个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和大家坐在一起合影。

隔了一些日子，传说美联社播发了巴金等人在上海文代会上的发言内容，香港报纸有文章说丰子恺不但在文代会上发言反对文艺百花“一刀齐”，而且他的漫画也“画外有意”。

又传说，市委内部开会非常紧张，隐隐约约听说陈其五犯错误了！

接着是《上海文学》所刊登的巴金《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丰子恺的《阿咪》等许多文章，都成了有问题的作品。

当时有人说，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巴金、丰子恺等人的发言，无异给海外的人们提供了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炮弹。但后来事实证明，恰恰相反，正是在大陆的张春桥之流的“左”派，把海外的言论作为“凭据”用来否定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的肯定，重弹一九五八年旧调，导致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和干部进一步无辜遭殃。

## 第四章 凄怆人间

## 第一节再访东京

一九六二年五月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所出现的文艺界活跃气氛，虽然是当年一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七千人大会”精神贯彻的结果，也是这年三月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讲话的很自然反响；但是在上海，仍有一部分人不免为之震惊。人们知道，在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召开时，张春桥曾亲临过一次会场，但他只在主席台上坐了片刻，不久即悻悻然离去。

当然，张春桥没有参加会议的全过程，并不等于他不想了解每个代表的发言内容。恰恰相反，据“文革”中材料透露，当时每个晚上，他都查看白天的会议记录。他不但读了巴金的发言《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而且知道全国文联代表阳翰笙讲了哪些话，来配合石西民的报告，肯定上海文艺界的业绩。他更了解：瞿白音在会上曾这样说：“听了巴金同志的发言，我非常激动，这是一个几十年来追求真理、追求光明，解放后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辛勤从事创作劳动的老作家的心声。近年来，真话是极可贵的。有个著名的导演，他是党员，有一次酒后讲了句话，说他很想见毛主席，请求老人家发一块免斗牌，让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可见许多人想说真话，而又害怕说了真话挨斗。”

张春桥也同样知道：黄佐临在这次会上曾说剧作家写不出剧本，主要原因是心存十怕：怕犯错误，怕出题作文，怕写人民内部矛盾，怕歪曲正面人物形象，怕集体创作，怕领导意见不一致而又不置可否，怕群众七嘴八舌，怕讲究技巧被人指为搞资产阶级玩意儿，怕长年累月辛勤劳动的成果被一旦否决，怕写了剧本被人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挖根子……张春桥也知道：丰子恺在大会上发言，要求能让百花自己生长，自然开放，不要把它们用绳子捆绑起来。他说矫揉造作，是很难看的。用一把大剪刀，把冬青树剪得一刀齐，冬青树如果能说话，也会提抗议的。

张春桥不仅了解大会发言内容，还知道小组会上每个代表在说些什么。他知道：华东师大教授钱谷融很不满意有些批评家动辄扣帽子，打棍子。他也知道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东润说过，眼前有些人站在群众之上，专门整人。但你几次抓辫子，大家就学乖了，头发剪短，甚至剃光头，什么都不讲，你根本就抓不着什么了。老作家魏金枝说：“有些领导人没有什么话也要讲几句，讲了又不负责，政策一变，他也变，你按着他的指示写稿发稿，也还是免不了挨他的批评。”翻译家罗稷南说：“不合理的事情一定不会长久，歪风就会过去，今天可以相信。作家协会开了四十九天批判十九世纪文学的会，动员大家对资产阶级文化决裂，当时我就不同意这样说法，因为一切文化只有两个根源，一是本国本民族的，一是世界上已达到的成就。人不可能无祖无宗，文化历史也不可能割断。决裂的说法，无论如何是不对的。”

这些随着巴金《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发言而引起起来的上海文学艺术界人士的发言，在当时曾使友谊大厦各个会议室里春风满座。但是这个场面却使张春桥内心十分不快。这个乘着一九五七年后期左旋风高升而闻名京沪的政治野心家，自从在《解放》杂志上提出“资产阶级法权思想”问题而受到最高领导赏识后，现在他已不仅能把持上海文艺界的实权，而且已能把自己对上海情况的看法通天，从而左右全国视听；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甚至可以与当时的中宣部、文化部领导唱对台戏，因为他比他们更懂得怎样迎合

最高领导的口味。

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的热闹场面，在张春桥向不久前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刚从北京开会回来的柯庆施汇报了情况后，就草草终场了。文艺界总的印象是开了会，等于没有开。细心的人甚至还能发现，文艺界反而没有开会前那样思想活跃了，人们逐渐地听到一些传闻，说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代表们的呼吁，成了外国新闻记者抢新闻的材料，巴金的发言《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被美联社转发，丰子恺的发言在香港报纸上被人引用，并联系他的漫画加以阐发，这就给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带来好机会，他们在党内会议上把这些都当作批评上海文代会的好材料。

巴金并不了解内情的全部，但他对外国通讯社转发他的发言，感到不安。恰好这一年七月，他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赴日出席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禁止核战争世界大会，临行前住在北京饭店，有一次，他有事外出，晚上回来，有人告诉他同住在这里的柯庆施来过电话，要找他谈话。他去了后，发现柯庆施不在房间里。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陈丕显却在，他对巴金说：“柯老找你为什么不，只是在新华社‘大参考’里看到美联社转播了你在上海文代会上的发言，想了解一下这个发言怎么会传播出去的。”巴金正想答话，陈丕显接着又说：“这件事现在已了解了，我们打了电话去上海市委宣传部询问，陈其五告诉我们，文章在《上海文学》发表的。本来你不想发，陈其五说是他动员你发表的。我看这也不要紧，有什么问题我们负责。”正是由于这一件事，张春桥和他的爪牙们，在“文革”中还批判陈丕显包庇了巴金。

巴金对张春桥这些人是有戒心的，他怕得罪了他们，日子就不好过，一九五八年前后他所遭遇的困难，至今并不曾忘记。但是张春桥这些人为了整他，还要乘机打击别人，这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巴金作为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禁止核战争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乘飞机离开北京，经广州、香港赴东京参加八月一日举行的世界大会预备会议。在会上，他指出核战争的威胁来自帝国主义。他愿代表中国人民，向站在反对使用核武器、阻止核战争最前线的日本人民表示由衷的敬意。这次世界大会的正式会议开了三天，目的在于团结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使用原子弹氢弹、阻止核战争的发生。巴金来日本参加这次大会，在内心里还想有机会能到广岛看一下，因为广岛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受灾区。现在这里的人民生活怎样？他们对战争灾害有哪些切肤之痛？他很想实地考察一下。但是出乎意料，会议只安排了部分代表去参观，极大部分代表，特别是他作为代表团团长，仍只好留在东京参加会议。而参加这次大会，竟也有一些使他意想不到的惊人场面，出现在他的眼前。

那是发生在八月六日下午三时台东体育场开的那次闭幕大会上。一万多群众参加了这个大会，巴金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到会场时，会场已经十分热闹，有人正在唱歌，也有人在讲台上下发传单，也有少数人在台口狂嚷，群众则在台下大声叫喊：“暴力团滚出去！”原来有人想破坏大会，反对通过《东京宣言》和《建议书》。一群挺着胸膛相互挽着胳膊的日本青年，站在中国代表团面前，保卫着他们。这时大会的总主席和执行主席正在后台被人拉住，强要他们修改宣言内容，而总主席和执行主席都不同意，僵局竟继续了五个半钟头，于是那些打手便在台前吵闹，还威胁外国代表退出会场，这使本来并不完全一致的几十个外国代表，倒反而团结起来了。这也就更鼓

舞了极大多数的日本代表的斗争意志。在五个半钟头里，尽管会场内高温达三十摄氏度，但来自各地区的日本代表，歌声此起彼落，一阵又一阵。这些歌声，有的表达了坚强的斗争意志；有的要求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呼吁和平；也有唱的是具有抒情味的民歌和民谣。他们唱了几个小时，感动得各国代表也纷纷上台唱歌。他们站在麦克风面前，用歌声表示了对日本人民的感谢。后来某些不善于唱歌的外国代表，也被群众一个个地喊着自己国家的名字，而笑容满面地登台唱歌。这样，原来吵吵闹闹的杂乱场面，气氛一时变得十分祥和，非常团结。这时，巴金禁不住眼泪盈眶，和中国代表团全体团员应声而起，一齐走上台来，抱着对大会胜利的信心，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的歌。那是在解放前的旧中国，一支经常在群众斗争的场合被人们所引唱的歌。巴金虽从未上合唱过歌，这次也终于破例，充满着激情把歌词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出来。这时美国代表团团长柯尔比老太太也情不自禁，她来到后台，流着眼泪对那些少数称霸的人说：“你们瞧，对这样好的群众，你们还不让他们开会，你们太不对了！你们不让人在大会宣读《东京宣言》，我来宣读！”年迈的澳大利亚代表莫洛先生也进来说：“你们不让念文件，我不怕，我来念。”那些原想阻拦念文件的人，这时也只好哑口无言，和大家走到前台来。大会终于又开始了。

这天的大会执行主席不是别人，正是巴金所认识的热情的中岛健藏先生，他过去曾挨日本反动分子的打，但他不怕，他知道这些打手，此刻正在台下等待着台上某些人的示意，他们会冲上台来施虐。不料文件还不曾宣读，台下却已等不及台上某些人示意，竟在别人读外国元首的贺电时，就纷纷跳了起来准备动武。巴金看见台上某些人正做着手势，劝打手们不要急，暂停行动，这样空气也就缓和下来了。当台上工作人员把外国元首的贺电读完，由大会总主席安井郁先生宣读大会文件时，台上坐着的一个人立刻把手上的折扇打开，向台下悄悄地挥舞了一下，台下那些“暴力团”的人便迅即行动起来，他们一边叫嚷，一边就冲上台，占领了讲坛，还推翻了桌子，弄坏了话筒，夺取了主席团的座位，并把安井郁和中岛健藏包围起来，准备把捏在他们手里的文件抢走。这时原来进场时曾保卫过中国代表团的那些年轻朋友，就又来到巴金和他的伙伴们旁边，不让这些企图用武力来破坏民主秩序的人，对中国代表有所侵犯。而曾经在去年到过巴金家中访问的电波新闻记者藤井先生，这时却一点也不慌乱地在继续从事他的电影录像工作，把那些动手捣乱会场的场面都一一摄入镜头，甚至动手打人的实况也一点不漏地拍了下来。最后，做保卫工作的菊地升出来向他们进行干涉，并把这些打手赶下台去，虽然他自己也被踢伤。这时会场群众都高声喊了起来：“滚出去，暴徒们！”那些不讲理的捣乱分子，就一个个地咕哝着退出会场。

巴金和群众一起拍起手来。大家庆贺斗争胜利，同时又发出欢呼，并重新唱起了激动人心的歌。接着主席台上响起一阵用榔头钉木板修理桌椅的声音，被损坏的讲台和座位很快修好了。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禁止核战争世界大会的闭幕大会在群众欢笑声中，终于又恢复举行。《东京宣言》和《关于国际共有行动的建议书》两个文件在宣读后，得到会场一万多人的欢迎。中国代表团里的每个人，都和场内所有群众一样，拼命鼓掌，巴金的掌心发红发热，但仍觉得还没有把自己兴奋的心情表达出来。他觉得五个半钟头的等待，并没有浪费他的时间，他觉得能看到现场这样激动人心，各国人民这样团结一致，心向和平的场景，太值得了！



时间已经到了晚上十点钟，但是人们还不感到疲劳，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施加璋，她来到麦克风前，向人们宣读了中国七个人民团体写给日本原子弹受害者的慰问信，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核战争的态度，和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决心。我们同情那些在核战争中的无辜受害者，既反对当年人侵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也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和氢弹。同时，我们对站在反对核战争前线的日本人民表示深深的敬意。日本代表对中国七个人民团体的主张，表示赞同；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也深为理解。后来，施如璋大姐的每一句话，都得到他们一阵掌声，在她宣读到慰问信最后一句话“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时，全场掌声雷动。连台上那个原来曾支持暴力分子的人，现在也拍起手来。接着是全场《东京——北京》的万人合唱，这支歌巴金十分熟悉，他曾在上次到日本访问时，在几次会上唱过，也曾在日本友人欢送中国代表团回国的机场上唱过，现在又听到了，而且参加歌唱的人数比上次更多，歌声也更响，他唱着，虽然不成调，也记不清歌词，但他觉得自己在唱，那是从心底发出来的，禁不住两眼噙着泪珠，看见日本友人也无不眼睛发亮，脸上带笑。

歌声之后，又是掌声。一封慰问信，一支友谊歌，这就是第八届禁止原子弹氢弹、禁止核战争世界大会胜利闭幕的象征。巴金高举花束，和其他的外国代表一起从不准使用原子弹的歌声里走下台来，日本代表们站在两旁，欢送着外国代表在他们的身边走过，巴金不断地和朋友们握手，朋友们也不断地握着巴金的手，手被握得感到疼痛，但仍被大家紧紧地握着，甚至当朋友们把中国代表团成员一个个地送上大轿车，车子开动了，巴金还感觉到他的手被日本友人握着。过了几天，有个晚上，天气还十分炎热，十点多钟了，大家都还不曾睡眠，日本著名的小说家堀田善卫到旅馆来看巴金。巴金请他坐在冷气箱旁边的沙发上，他们谈了一个多钟头的话。大家相互了解了各人的创作情况，以及今后的打算。他们谈得非常愉快，有说有笑。堀田先生忽然说：“看来你这次回去不能像上次那样，尽为我们说好话了。”巴金一时还不及理解，堀田先生又说：“你去年访问，回国以后写了不少文章讲日本良好的一面；这一回你看到了别的，你应当讲讲坏的一面了。”巴金听了，立刻理解过来，他知道堀田是在指闭幕那一天，一些人捣乱会场的那件事。巴金禁不住笑了，他安详又从容地回答客人说：“不，我还是要写好的，因为即使在那一天，我看到的，也还是好的一面比坏的一面多得多。”

是的，巴金的世界非常宽广。这次他来东京，终于见到广津和郎先生了。广津是日本作家中间的一位老前辈，他曾在他的晚年，奋力写成了一部五十多万字的长篇《松川裁判》，为一件轰动整个世界的冤案平反。这件冤案是由于一列火车在松川车站附近出轨翻车，死了一个司机和两个司机的帮手。为此，日本警署对一个嫌疑犯在刑讯中进行了拷打逼供，然后又根据这些口供中的不实之辞，把二十个工人（其中有工会干部）拘捕，交给法庭关进监狱，并作了判决。这些被告有的被判死刑，有的被判无期徒刑，有的被判了有期徒刑，无一幸免。这场冤案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七十多岁的广津先生曾深入现场进行了长期的细致的调查，并担任了松川事件对策协议会会长的职务。他的《松川裁判》真实地记录了冤案发生的全过程，成为日本出版界这一年发行量最大的一本畅销书。广津先生则把这本书的二分之一版税，用来支援冤案受害者家属，作他们的生活费用。

巴金在前年访问日本时，从镰仓去箱根，途经热海，就想见到这位敢于

为受冤者打抱不平的广津先生，但由于听说广津夫人正在病中，因而未去打搅广津先生。但回国后，巴金却在安徽黄山旅游途中，一天晚上听电台新闻广播时，得知松川案件全体被告无罪开释。巴金高兴得为之通宵不眠。他在二十多岁留学法国时，也曾为一桩震惊世界的冤案而日夜担心，

当时两个被关禁在美国波士顿监狱里的意大利工人所面临的命运曾成为全世界善良的人们一个时期热烈关注的问题。年轻的巴金还以他满腔炽烈的感情，给这两个关在狱中的工人写信，给他们以无限同情，并祝愿他们平安。但是现实却给予巴金年轻的心以残酷的打击：虽然全世界正义力量的奋力营救，而这两个意大利工人仍被美国司法当局送上了断头台。现在几十年时间过去了，这样的世界性冤案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但是依赖坚持斗争的日本人民，包括巴金这些热心的日本人民的朋友，特别是这位广津先生，这二十个饱尝铁窗风味的日本铁路工人终于得救，这无异给人间添加了温暖，帮助巴金增强了信心。

就在这个胜利消息来到后不久，巴金有机会看到日本影片《松川事件》，那是和广津先生同样齐名的一位日本进步文化工作者山本萨夫导演的。影片虽与广津先生五十万字的大作《松川裁判》内容不尽相同，但它同样真实地反映了日本人民在这一事件中进行斗争的生动场面。影片里的一切在巴金眼里显得十分熟悉，他认识那些人，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曾给他以友情的温暖。据说这部影片是由广大工人和农民每人出一百日元预购一张入场券才凑成一笔摄制费拍摄完成的。这一事实，无疑是日本人民在斗争中团结的象征。

现在，巴金终于见到了广津先生。那是禁止使用原子弹氢弹、禁止核战争的世界大会闭幕后的第三天下午。这个曾在松川事件对策协议会上大声疾呼的民主战士，此刻来到巴金住的旅馆，坐在巴金对面的沙发上，他的笑容竟是如此亲切，如此谦和；而在谈话时，他又如此推心置腹，对我们中国代表是这样信赖，这样友好。他毫不掩饰眼前所遭遇到的困难，禁不住又流露出心头的一点焦虑。他诚恳地告诉巴金松川事件冤案虽经平反，而反复无常的日本法庭，竟又在利用调动裁判官的机会，企图重新审理此案。和他同来的，还有工会干部，新闻记者，以及曾在这一事件中作过“被告”因而被长期关押、面容憔悴的两个工人。其中一位还曾被判处“死刑”。巴金无例外地，都把他们作为亲近的友人；并把广津老人比作前一世纪的法国作家左拉，因为左拉曾在“德列非斯案件”中与反动派作不懈斗争，他费尽心血，揭示真相，终于把无辜的受害者从冤狱中救了出来。而广津先生却谦逊地笑着，说“那是许多人团结斗争的结果。现在困难还在前头，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在会见广津前一天，巴金还与杨朔到过龟井胜一郎家里。龟井先生是巴金的老朋友了，巴金上次访问，他曾陪同去游湖看富士山，并到公园观赏樱花。不久前龟井先生还到过巴金家中。现在巴金终于来到龟井家里，看到他那院子里茂盛的小树，和古老的石灯。大家坐在龟井幽雅的客厅里，无拘无束地谈着，主客双方感到格外亲切。主人拿出他的新著赠送给两位客人。巴金和杨朔虽都不十分精通日文，但他们对主人的新著还是看得懂，书名叫《中国之旅》，是龟井先生访华回来写的，这本书有几幅类似速写的引人入胜的插图，是作者自己画的，巴金这才发觉龟井先生原来还是个业余画家。

当天晚上，龟井先生的夫人还提着烛光摇曳的石灯，把两个中国客人和龟井先生送出大门外，然后让龟井先生陪同这两个客人到“食道横町”的“秋田家”菜馆进餐。他们一到那边，登上楼，只见在一个小房间里，巴金的另

外两个日本友人中岛健藏与白土吾夫已经等候在那边。他们看到巴金和杨朔，也忙站起来迎接。这次是中岛和龟井作东，白土作陪，巴金、杨朔则是客人。大家就座后喝酒并不分彼此，相互祝酒敬菜，不但开怀畅饮，而且无话不谈。酒浓，友情更浓。巴金曾以这个晚上，作为他在国际访问中的一个难忘的友谊之夜。

中国代表团离开东京前一天，在金刚饭店举行了一个告别酒会。酒会很热闹，许多日本朋友都来到了。会场并不大，因为人多，屋子显得格外挤。但是大家都在人堆里来往着，举着酒杯，互相祝贺友谊，祝贺胜利，同时还相互关心各人的工作、生活和健康。心与心交流，像个大家庭，许多人心中由此感到温暖。

酒会开得很成功，客人们个个带着笑脸走了，巴金为在日本再一次获得友谊而感到欣慰。他与客人一一握别，把他们送走后，自己坐在楼下休息室的一张沙发上，静静地回想着这些日本友人在各种场合上所表示的对我国代表的感情；他在心中深为感谢，禁不住在心中一个一个地念着他们的名字，忽然他若有所失。

“秋田先生！”他唤着这个名字，似乎也就在这时，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身材瘦小的老人，他的头上戴着一顶便帽，却掩盖不住他的两鬓白发；鼻子上架着一副玳瑁边的圆形眼镜，从那里流露出两道和善的眼光。这就是世界著名的日本前辈作家秋田雨雀。一九二七年，巴金住在法国巴黎附近沙多——吉里小城里，曾在黄昏的地摊上买到过他的剧作《骷髅的跳舞》世界语译本，回到上海后又把这个剧本，连同秋田的另外两个短剧《国境之夜》和《首陀罗人的喷泉》一起译成中文。巴金曾在秋田雨雀作品里看到光明，看到希望，汲取力量。去年四月，巴金访问日本，在离日返国时，中国代表团也曾在东京举行告别酒会，但地点不在金刚饭店，而是在椿山庄，当时秋田先生曾前来参加，他微笑着和巴金热烈握手，并表露了他对去中国访问的愿望。他说：“只要我的健康有所好转，我一定要争取去中国。”巴金很想告诉他二十年代曾在法国塞纳河畔旧书摊上买到《骷髅的跳舞》时自己喜悦的心情，但在匆促交谈中，竟没有来得及回溯往事。而在今年五月，当他还不曾接到要去东京参加这次禁止原子弹氢弹、禁止核战争世界大会的任务时，秋田雨雀先生逝世的消息，却传到了他的耳朵里。现在他再也看不到他了，再也不能在这样的酒会上与他谈话了，他感到惆怅。但是巴金一想到秋田先生作品中所显露的希望之光，和他虽然年迈，仍坚持斗争，并说过“不管怎样苦，还是要活下去，不能都白白地死掉”那句话，巴金就感到浑身发热，觉得眼前真好像有一群秋田先生所形容的“不死之鸟”在空中飞翔。

这次巴金在日本访问，前后不过半个月，但是这段时间给他后来完成散文集《倾吐不尽的感情》的写作，还是提供了不少生活依据。

## 第二节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甘苦

巴金在一九六二年八月第二次访日回国后，继一九六一年访日写的几篇抒发中日人民友谊的文章，又写了几篇作品，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出版了他的一本新的散文集《倾吐不尽的感情》。

这本装帧精致的小书，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文笔流利，感情真挚，很少有当时曾流行着的各种假话和谎言；即有“豪言壮语”，也不多。这是因为在与日本作家的交往中，有一些共同的思想感情基础，或者说，是诚实的友情支撑了这些文章的内容。但这本小书究竟产生在过分强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这样一个气候里，作品所描写的艺术形象，仍不可能完全摆脱现实政治的影响。即使作者在主观上说的全是真话，作品也还是要随政治形势的发展而受历史的检验。幸运的是六十年代初期，正是中日两国外交关系趋向正常化的过程中，发展的形势使作品有更多的机缘继续保持生命，《倾吐不尽的感情》正是一本碰着了一段这样好运的集子。

不同的例子是：过了一年，即一九六三年六月，巴金有机会到另一个国家访问，这就是被称为“抗美前线”的越南。巴金接受任务，仍本着“听党的话”这样一个精神，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争取在斗争中去“改造自己”，当时党内已开过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口号已经喊了出来。上海市市长柯庆施早把上海第二次文代会发扬艺术民主这样一个精神加以否定，另外提出所谓“大写十三年”的要求。毛泽东则在中宣部文艺处编的一份材料上作了批示，认为许多文艺部门社会主义改造“收效甚微”，“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批评“许多共产党人”“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在这种形势下，巴金早已意识到自己在《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中所说的话是又犯了“错误”，而一九五六年曾经打算写出《激流》的第四部《群》这样一个愿望，这时早已烟消云散。现在，他唯一的应付办法，就是跟着大家去积极参加政治斗争，诸如在庆祝我军击落U—2飞机的两千五百人大会上致词，与周信芳、贺绿汀、丰子恺、沈浮等文艺界代表到报社递交支持古巴人民抗美斗争的声援信等等；除此之外，还不时到郊区农村去体验生活，与农民同吃同住，甚至同劳动。

到了越南，他像五十年代在朝鲜战场那样，事先听报告、学习了一阵后，去“深入生活”。他在靠近越南南方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交界线上的一个叫“永灵”的地方住了下来，当他站在贤良江畔，看到平静的江水，和桥这一面、那一面两种不同的景象，想起一个国家被分成两块，许多家庭被拆散，甚至丈夫在这一面，妻子在另一面；父母在这一方，儿女又在另一方，两岸相望，不能团聚，禁不住对越南人民的不幸遭遇寄予同情。他在永灵住了三天，满脑子装的都是这些妻离子散的悲惨故事。有个锯木厂工人，还向巴金讲述了他每逢假日就到江边来等候对岸亲人时的心情。

巴金在河内和海防访问，曾同一个越南作家在河内西湖林荫道上一起散步。那个作家指着路旁正在盛开着红花的凤凰树，对他说：“这些树常常引起我对学生时代回想。那时花开的季节，总在我们准备学期考试的时候。花开了，我们的考试也开始了；但凤凰树开花时间较长，往往考试完毕，学期结束，学校放假了，花还在开着。我们总是在花树下相互握别，然后回家去度假期。”这个越南作家显然对少年时代非常怀念，但是他又说：“当然，当年的学校生活，怎么能与今天年轻人的生活相比呢？”

这时，巴金也就不免想起廿三年前——一九四一年抗战时期，他从这里过路时的情景。当时太平洋战争还不曾发生，但“孤岛”上海已经风声鹤唳，一片惊慌，到处传说日本军队就要冲进租界。他应开明书店之约，从桂林赶回上海，把长篇小说《秋》赶写完成，为防日军进占租界，就又急匆匆赶回内地。当时他只是孤单单一个人，而在赶到昆明前，必须经过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的越南，那时情景与今天完全不同。当年与他结伴同行的两个中国旅客，在过海关时，一个被拿走了新衬衫，一个被扣留了热水瓶。还有个中国学生，因为验护照时不曾把帽子脱下，就挨了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打。现在，巴金作为中国客人前来这里访问，犹如生活在友谊的海洋里，到处受到热情接待。越南人民对中国作家的友好态度，是难以与旧时代在海防与河内过海关时情景相提并论了。

巴金在二十三年前看到的海防与河内，天阴沉，云灰黯，没有欢笑，没有生气，两座城市犹如两个病人膏肓的老人，生命垂危，奄奄一息；而现在，时隔二十三年，他重来河内，再过海防，巴金说他自己“头发白了，脚步缓慢了，心反而年轻了”。因为这两座城市在他的眼前，“十分美丽，非常干净”。当然，巴金在越南看到的方面很多，主要还不是以上这些，而且他是按照当时的观点看问题的。

他在越南大概逗留了半个月，回来后，写了一本与《倾吐不尽的感情》相仿的小册子，书名叫做《贤良江畔》，让作家出版社出版。但它的命运与《倾吐不尽的感情》并不相同。虽然巴金几乎以同样的热情歌颂了被访问的国家，但由于后来中越关系的变化，这本小书也就几乎成了废品。这也许就是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悲剧吧。

巴金从越南回国，在上海已是炎炎夏天。七月里的上海天气奇热，热得他生了满身痱子；但仍不得不放下手里的活，和上海的几个作家、记者一起搞集体创作，写上海第六人民医院“断手再植”的通讯特写。虽然自己后来不曾动笔，却还是同意了叶以群的要求，在另外五个作家、记者合写的文章前，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这篇特写是《上海文学》编辑部的特约稿。《上海文学》自从在一九六二年文代会后发表了巴金的《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王西彦的《湖上》、魏金枝的《宋濂寓言》以及丰子恺的《阿咪》等文章以后，受了批评，挂着“主编”名义的巴金像对这个刊物欠了一笔债似的，唯恐缺少一个报答它的机会；负实际责任的副主编、老作家魏金枝也一直日夜不安，怕在工作上再出差错，现在几乎又像回到“大跃进”时期那样，只要上面一声喊，就不管对也不对，咱二话不说，立刻照办。当时的一些通讯特写，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到了十一月，巴金又奉命率领作家代表团去日本作第三次访问。这次去的，还有老友冰心、严文井与马烽等。这次他们除了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藏原惟人之外，还去瞻仰过奈良唐招提寺鉴真大师的雕像。鉴真大师六次航海东渡，经十三年东渡成功，这个故事留在巴金印象中，长期未曾消退。他们还到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家里访问，这个后来曾到中国来回访并曾到四川成都参观过巴金老家的热情友好使者，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当时曾与巴金兴奋热烈地讨论过中日佛教历史，并愉快地谈了南宗开创者、禅宗六祖慧能的故事。巴金一行这次访问结束，在离开东京前夕，为答谢接待工作人员，与他们进行了联欢。在会场上，大家谈起这半个月的和谐相处，与愉

快的活动，都为中日人民友谊前途的发展而充满信心。几位年轻的日本朋友激动得淌出了眼泪；巴金与冰心也禁不住为之感动，他们也噙着泪花，同意日本朋友们的看法，认为两国人民一定能世代友好下去。两个老人曾在刻着诗人芭蕉俳句的石碑前停留，仿佛听到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心在跳动。巴金还在东京出版的《日本文化交流》上发表了他歌颂中日人民友谊的文章：《人生最美的事情》。从日本回国，还是忙于送往迎来，出席各种大小会议，参加一些突发性的国际斗争，写些表态文章，在什么集会上作些发言，甚至还要到街头去游行示威，虽然已是一九六四年新年，但这样的生活几乎已经成为他当时的日常例行公事，别人以为他应该这样，他自己虽疲于奔命，也无法改变。有时为了躲避过多的集会活动，觉得还是多到基层去看看实际，比在上面被人抓住去空喊口号好一些，这样就曾到新安江水电站去住了几天，的确也增加了一些见识；并在顺便过杭州时去探望了在养伤中的方令孺。过了半月，又与金仲华、陈同生等老友一起去上海郊区宝山、上海、青浦等县的人民公社参观访问，同样增加了一些感性认识。这样，在市政协开会学习时，也有些谈话的资料。

这时，巴金家庭的气氛也有些变化。萧珊在《上海文学》编辑部工作，她当义务编辑，不拿工资，每天上半天班，既看些来稿，也做点组稿工作。她认识的作家多，不论在上海，还是在北京或其他省市，她都有熟人，因此，她的组稿面很广，很为《上海文学》作者队伍的扩大，贡献了力量。但萧珊“下生活”的要求比巴金还迫切，她多次去农村人民公社参观，也不只一次去新安江水电站。她虽然青年时代就离开家庭自立，但她总认为自己出身资产阶级家庭，要加强自我改造，所以常常表示要多到工厂农村去接近工农。一九六四年暑期，巴金一家像往常一样，打算乘孩子们假期机会，到哪里去开扩一下眼界。小棠去年小学毕业进初中，现在他比过去更懂事了，他不曾忘记一九六一年跟着爸爸妈妈去黄山，长了不少见识，去年暑期因为爸爸去越南，全家不曾出游，今年一定要选个更理想的地方。但是到什么地方去呢？恰好这时山西省文联主席李束为来约请巴金与萧珊去山西访问，两人想到这一时期人们都在讲大寨好，巴金在今年四月还在《儿童时代》月刊发表过一篇赞扬大寨劳动模范“老石匠”贾进才的特写，连小棠都读过了，现在带他一起去山西看看大寨和其他各处，看看山西人在怎样学习大寨，也许这对自己和孩子都有好处。这样，他们在当年七月底，就和小林、小棠一起到了山西太原。

几天以后，小林因为要回学校，就离晋返沪。巴金和萧珊带小棠由山西作家西戎陪同去大寨。巴金在火车上、汽车上一直想着大寨的面貌。他这半年来一直听人们谈大寨把深沟变良田，但是怎样变法，他心里无数。但是他相信这是真的，更相信这里有许多勇敢勤劳和真诚老实的庄稼汉。西戎到过大寨两次，对大寨深有感情，所以一路上给他介绍了老党员贾进才怎样让贤，把大队支部书记的职位让给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陈永贵。他一边讲，一边露出亲切的笑。他也和巴金一样，相信这都是真的，别人讲的一定不错，贾进才、陈永贵是勇敢勤劳、真诚老实的庄稼汉。同样，他还能一口气讲出二三十个人的名字，同时背出这几代人的事迹，好像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和他很熟悉，而实际上他也不过来了两趟。

西戎欢喜谈牛海贵，这是个十四岁的孩子，据说他的“阶级观点非常明确”。今年春天，解放军某部一个连队来访问大寨，战士们分散到社员家作

客，其中有个战士来到富农家里，被牛海贵看到，便把他叫了出来，对他说：“同志，你进去做什么？这是富农家呢！”这以后牛海贵就受到称赞，并把这件事看作大寨大队阶级斗争观点强的事例来举。在去昔阳的路上，巴金听说陈永贵已在昨天去晋南开会，一时不能回家，这次错过了与他见面的机会，心里有些惋惜。但是他想到大寨人那么多，和大家聊聊，也是一样的。他坐的嘎斯车正在往山坡上跑，忽然看见有一辆卡车，载着一批包着白头巾的农民向县城开去，接着一辆又一辆，共计九辆。这时旁人对巴金说：“这是别的公社来的参观团，他们到这里来看庄稼。每天都有几百人来参观学习。”巴金听了，不觉有些疑惑：“一个小小的生产大队，怎样负担得起每天有几百人来参观学习？他们能有这样多的时间、人力和物力接待吗？……”他这样想了一想，也不知什么缘故，又不继续想下去了。

在天色渐暗的傍晚，巴金一家三口由西戎带着来到了大寨大队。一下车，夜幕便逐渐下降到村子上。他们来到新建的一幢瓦房前，主人把巴金安顿在一间宽大的屋子中，这里有几张木板床和两张方桌，西戎便约巴金趁晚上社员在家去串门子。他们在夜色中沿着上路往上走，只见一个挑担的年轻人从前面走过，西戎回过头来对巴金说：“这就是陈永贵的儿子陈明珠。”巴金听了，忙掉头去看，那人早在昏暗中不见了。巴金早就在今天来时的路上，听到过关于陈永贵教育儿子陈明珠的故事，现在陈明珠已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做了陈永贵的接班人。

到了陈永贵住的窑洞口，巴金看见一个身材细长、面容瘦削的中年女人在迎候他们，知道那便是永贵的老伴虎妞了。对于她，巴金也从别人提供的资料里知道一些。她十岁就没娘，十一岁就跟着父亲逃荒到大寨，父亲讨饭养不活她，只好把她许给陈永贵。对陈永贵，巴金知道得更多，许多人报道过他自己的谈话，说他七岁时就让当长工的父亲担到大寨，八岁就放牛，九岁放羊，十一岁当小长工。

此刻，巴金在陈永贵住的窑洞里，他虽然没有看到陈永贵，但他看到墙上挂的照片和奖状，这些他早在报刊上看到过。后来西戎建议巴金与萧珊及小棠到陈永贵的儿子明珠屋里去看看，他们便走出窑洞，来到窑洞旁边的一间瓦房里。那房间布置得比窑洞漂亮多了，有红漆描花的大衣柜，和其他一些新家具，看来是明珠结婚时添置的。墙上也挂了些照片和奖状，桌上还放了一些书，当然少不了《毛泽东选集》，另外还有一架手风琴，原来陈明珠还是本地剧团的首席乐师。

巴金来不及等候陈明珠回来，就抓紧时间去别的社员家访问。他们看到了劳动能手梁便良，和他谈了话；同时还到大寨展览馆参观，了解了模范饲养员赵启福、治安委员赵大和、妇女主任宋立英等人的事迹。他们每个人都有个生动的故事。后来老书记贾进才、大队长贾承让和大队支部副书记贾来恒来到了巴金的住处，巴金就和他们一起到公社一个办公室谈话，大家喝茶抽烟，一直谈到晚上十一点钟。

第二天早上，贾承让又和贾来恒来到巴金房间谈话，这次他们向巴金着重介绍了大队会计赵素恒的事迹，内容也还是十分动听，当然主要还是宣扬了陈永贵和大队的几个领导人把舵掌得好。巴金认真地做着记录，萧珊更学着巴金积极地做笔记，小棠在旁边也听得出神。

这时，天已经放晴了，他就又与萧珊、小棠一起跟着西戎上山去看大寨的庄稼。爬山翻沟，一路上上下下，走的全是松软的黄土路，看到一大片一

大片绿油油的玉米苗，庄稼长得果然好。抬起头，只见一格一格的梯田，十分整齐。巴金还看到一块长得不差的棉花田，虽然地不大，但听说这是陈永贵种的试验田。他们先到康家岭，然后到合作沟。合作沟原名叫白驼沟，这里本是荒地，靠了集体力量，动员千百个劳动力，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垒石筑坝，才把山沟变成一块一块可耕田，所以后来改称合作沟。还有个“教育沟”，是在“合作沟”下面，人们把它的荒芜样子保存下来，用以对比经修治后的“合作沟”梯田来教育青年学生，所以称它为“教育沟”。“合作沟”上面还有个狼窝掌，西戎劝巴金不要爬上去，他知道这里坝高坡陡路滑，很难走。但是巴金还是爬了上去，因为大寨人三战狼窝掌的故事他听说过，他觉得只有亲临此地，才能体会到当年大寨人的艰苦。

他们来回走了两个钟头，看到整齐的梯田，也看到茁壮的庄稼，但就是没有看到自留地。据说大寨人与自然作斗争，寸土不让；对自留地，却不愿多花时间，但是“任土地闲着对集体也没有好处，结果还是交给集体种，集体收。”

当时巴金非常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他确是在这里看到了不少具体现象。他在大寨访问的日子里，非常尊敬大寨人，他真诚地认为他们都是自己学习的榜样。对当地接待他的人，总是再三叮嘱他们不要对他有什么特殊待遇。西戎作为山西省作家，也觉得像巴金这样德高望重，而又生活朴素、热情诚恳、平易近人的人，是很少见的。巴金从大寨回到县城，又去访问了一些工厂和矿井，还顺便在山西游览了五台山佛地、大同云冈石窟和上下华严寺，以及杏花村汾酒厂等，同时也去看了晋祠与刘胡兰纪念馆。这些活动，也为巴金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在山西生活了一个月，到九月初，巴金才回到上海。但他一到上海，就又被一连串会议和一些送往迎来的外事活动困住。到十月下旬，他才腾出时间，把一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大寨行》写了出来。这篇文章刊登在《收获》杂志上，确是花了相当的心力。可说材料丰富，内容扎实，文字也很朴素，空话废话不多，即有豪言壮语，比起“大跃进”时期他自己写的“赞歌”，还是要少得多。虽偶然也有一些违心的描写，如他看到一辆辆汽车载着前来参观学习的群众离开大寨时，说他们“显然是看得十分满意”，那是巴金写文章时即兴之笔，虽有点夸张，究竟不是存心讲的假话。同时，这样的题材显然也很适应当时文坛的需要，尤其符合柯庆施“大写十三年”的要求，因而它称得上“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作品。不幸的是政治形势要变化，经过十年“文革”，劳动模范变成篡党夺权时期的国务院副总理，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变为“四人帮”弄虚作假的黑样板。这篇《大寨行》在今天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让人们去思索它怎么会有这样可悲的命运？或者如巴金自己所说：“让它向读者说明我走过什么样的道路。”



### 第三节不安定的心

巴金从山西回来，文艺界形势已经一天比一天紧张。虽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场还在两年以后，但长达五十多天的京剧现代剧观摩演出大会已在北京举行过，不久前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国防部长林彪，他所创造的“红宝书”已在会场出现，“京剧演不演出革命现代戏，是意识形态上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说法也已写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上；插手会演的江青，更在座谈会上，公开“枪毙”了长篇小说《红旗谱》与《朝阳沟》；同时还断然声称：“戏曲舞台，全是牛鬼蛇神。”使人震惊的是，京剧观摩演出，问题还涉及到电影；这次“偶尔露峥嵘”的女皇，与康生一起在总结大会上，除了把京剧《谢瑶环》和昆曲《李慧娘》彻底否定外，还一口气把《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北国江南》、《逆风千里》等几部电影也都打成“大毒草”。

饱经“批判”忧患的巴金，原是戏剧与戏曲的爱好者，他从小跟着父亲看京戏与川剧，哪怕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他还写文章，称赞过川剧演员廖静秋演出的《杜十娘》。但北京的京剧现代剧观摩演出大会放出来的空气，对他来说也还不是十分出乎意外的事。他早在一九六三年底到一九六四年初，在华东地区戏剧观摩演出会上，听到过柯庆施的讲话，当时柯庆施说：“我们的戏剧工作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还很不相适应……十五年来成绩寥寥，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西，大演‘死人’、鬼戏……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的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有一次，巴金还亲自听到过一场有趣的谈话。当时还健在的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熊佛西，请柯庆施去看话剧，柯庆施问：“是不是写十三年的？写十三年的，我就去看。”熊佛西屈指一算，这个剧本写的故事，恰好发生在十三年前二三个月，就只好小声小气地从实说了。柯庆施说：“既然不是写十三年的，那我不看。”

巴金在上海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然他对北京京剧现代剧观摩大会上的奇闻，也不甚以为奇了。好在戏剧电影界的事情与他很少直接关系，他目前应付自己的事情还应付不了，转眼一九六五年新的一年又开始，可仍一会儿送往迎来，一会儿游行示威，忙个不了。偏又在这个节骨眼里，在北京参加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时摔了一跤，左肩关节脱臼，就医后半月回到上海，还是动一动就痛起来，而第二个月中旬作为人民代表，又不得不花两个星期时间去郊区看人们在怎样搞“四清”运动，幸而三人一组，组里的另外两位都是熟人，金仲华和蔼可亲，赵超构爱说笑话，这十五天内既长了见识，又不太寂寞。到了四月间，仍像过去一样，不免又偕同萧珊去杭州迎接春天，并到白乐桥畔访方令孺。一年难得有这样几天清闲的日子，转眼一个星期又过去了。回到上海，仍是大会小会，游行示威，这年头人们就是忙这些。但日子也并不就能这样混过去，忽然有一天叶以群来访，他虽然脸上笑着，却分明有一种为难的尴尬神色。

“你知道电影批判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群吞吞吐吐他说道。

当然，这一点巴金早就知道。眼前，电影界正在江青、康生的把持下，批判所谓“夏（衍）陈（荒煤）路线”。《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逆风千里》已经批判过了，现在已开始批《林家铺子》、《不

夜城》、《红日》和《聂耳》。他记得今年年初在北京开会，“四条汉子”中唯一还不曾靠边的周扬，曾在民族饭店邀请参加全国人代会和全国政协会议的文艺界人士吃饭，在饭前周扬作了一次讲话，提到按照中央指示要批判《李慧娘》，然后婉转他说：“另外还有一件事，这与柯灵同志有点关系，那就是有可能要对《不夜城》进行批评。”平时比较沉着的柯灵，这时不免激动起来，因为这件事对他说来太出乎意料之外了。不等周扬把话讲完，他就接了周扬的话头，大声说：“《不夜城》剧本，是统战部与文化部作为任务交给我写作的。”当时，善良的巴金刚好坐在柯灵身边，他唯恐柯灵闯祸，连忙把手按到柯灵的手上，示意他不要激动，柯灵这才没有再发作。

那天的情景还在印象中，今天叶以群来说“电影批判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看样子也许与《不夜城》有关吧？巴金正这样想着，果然，叶以群又开口了，他说上面把任务交了下来，看样子上海不交出一二篇批判《不夜城》的文章过不了关。

“我对电影是外行，请别人写不行吗？”巴金迟疑着说。

“罗苏要写，你也要写，需要有你署名的批判文章。”叶以群摊了牌，他与巴金也是老朋友了。

巴金听了他的话，心里忐忑不安，不知如何是好。他知道《不夜城》拍摄过程，知道不是上面交下任务，柯灵是不会写这个剧本的。剧本写好后，也不是没给领导反复看过，而且还不是电影局领导，是统战部、文化部领导。哪里知道“领导”也会犯错误，也会靠边，领导上面还有领导！他心里想不通，但也只好不想，再想下去，会使人发疯的。他把这事拖了一些日子，然后打电话给以群，说自己实在写不出。哪知叶以群还是不肯放，他不得不进一步摊牌，颤颤栗栗地告诉巴金是市委宣传部交下来的任务。这时上海的柯庆施已经在两个月前去世，石西民也调到北京去当文化部副部长了，张春桥已提升为市委书记处书记，他的地位更高，权力更大了，他管文艺早就与北京江青、康生通成一气，在上海，他的话四通八达，没有人敢说个“不”字。

没办法，巴金只好硬着头皮写了一篇，但与以群说好文章中不点编剧人柯灵的名字。恰好这时中国作协书记刘白羽打了电话来，他和巴金也是三十年代的老朋友了，巴金有几次出国都与他结伴同行，这次他来电话也是好意，认为这个时候江青、康生抓文艺，谁也不知道他们的葫芦里在卖的什么药，还不如出国去走走看看，写点文章。巴金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与上海的杜宣一起搭班机赴北京，和魏巍他们一起走，任务是去越南，住上两个月。

批判《不夜城》的文章虽然已交了出去，但还来不及看到文章发表，而明天就要上飞机了。当晚，巴金就与萧珊去柯灵家，巴金见了柯灵，不知说什么好。说实在，他有点狼狈，结果只说了一句自己写了一篇批评《不夜城》的文章，没有点作者的名字，其他什么都没有讲。他讲不出道歉的话，但心里实在觉得歉意。柯灵的夫人陈国容是解放初期务本女子中学校长，李小林就是在这个学校毕业的，萧珊平时尊称她为陈校长。陈校长为人坦率，心直口快，与萧珊的性格很相近，两人一见面总是有话说不尽。“大跃进”后国家经济困难，买什么都要凭票凭证，为了减少生活上的这类麻烦，有时两家还相互照顾。柯灵过去在报社工作，抗战时期编文艺副刊《世纪风》，解放战争时编《读者的话》和《周报》，都得到过巴金的支持；两人之间的友谊，本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柯灵夫妇在面临《不夜城》的危难时刻，看见巴金夫妇来到，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听巴金说自己写了一篇批判文章，柯灵忽然

想起几个月前在北京周扬找大家开会，说将对《不夜城》进行批判时，他激动得从嘴里冲出话来，巴金在一边按住他的手，示意他不要随便发表意见的情景。现在他联系今天巴金夫妇深夜赶到他家中来说了这么一句话，竟有无限感激之情。一切他都十分明白。他不得不从心底掏出这样的一句话来回答：

“批判文章由你来写，那太好了！因为你对我是了解的。让不了解我的人来批评，还不如让了解我的人来进行帮助。”

巴金听了，觉得这些话比自己肺腑里掏出来的还恳切，心中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三个多月后，他从越南回来，形势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不但他的批判文章早已在报上发表，而且《不夜城》在京沪报纸上受到连续批判，也跟着《林家铺子》等一起变成了“大毒草”。

自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参加政协的文艺界人士一直有个学习组，每星期六下午开一次会。有个时期，大家确曾在这里无拘无束，谈天说地，曾被人称作“神仙会”。但是后来随着文艺界形势的紧张，学习会空气逐渐严肃起来，到一九六五年十月巴金从越南回来，发现这个学习组已经完全不是什么“神仙会”，而是大家扭扭作态的演戏场了。参加的人数也扩大，许多不是政协委员的也参加了，开会地方也改在文艺会堂。最后连一向不在这些场合出现的姚文元也忽然来到，说是来听取大家对他的大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意见。

巴金被邀参加出席这样的学习会，起初有点莫名其妙。为什么姚文元这么一篇文章要叫大家都学习呢？好在学习组里人多，大家抢着发言，用不到他去插嘴。两三次会议开下来，他知道了：原来大家都在一个网里。但他还是心存侥幸，也许未必一网打尽，能找机会溜掉就好。这时又私心庆幸在一九六二年初，虽曾到过海南岛海口市去看过海瑞墓，却不曾写文章，也不曾发过什么议论，否则就会跟今天的吴晗、周信芳一样，处在十分被动地位。开会时，他只见到姚文元眉飞色舞地摆出一副架势，张开他的大嘴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巴金看到这个学习会的空气一次比一次严肃，发觉罩在他四周的网越来越小，越来越紧，估计灾难即将来临，自己坐立不安，但又不得不在外表上装得非常镇静。回到家中，也想着不该写那么多作品，让人家随手可抓把柄，现在为时已晚，这些文章564都早已落在人家眼里，不要说自身难保，说不定还会连累家里的人。想到一九五七年反右刚开始时，他的一个朋友曾在要紧关头，非常及时作自我检讨，得到最高领导肯定；巴金终于在文艺会堂的学习会上，主动检查了一九六二年在上海文代大会上发言的错误。同时他听说郭沫若最近在北京曾公开表示要把自己的著作全部烧掉，这时巴金也就在会上说自己愿意烧掉他的全部作品。这样讲过之后，他觉得自己稍稍安心，以为自己承认了错误，或者可以取得别人谅解。

就在这个时候，即一九六五年年底，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了上海。他为斯特朗八十岁生日举行了一次宴会，巴金也应邀参加。宴会结束，周恩来与几个歌唱家谈话时，请他们再唱一遍《长征组歌》，他说：“我很喜欢听这组歌。”后来他又问：“你们知道歌词中‘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句话的意义吗？”他就讲了当时毛泽东怎样神鬼莫测地用各种办法对付敌人，终于取得革命的胜利。然后周恩来又和歌唱家们一起唱起这支歌来，他还和乐队指挥司徒汉一起作着手势。也在这次宴会上，周恩来与许多人碰了杯，在走到巴金面前时，陪同周恩来一起走来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特地指着巴金说：“他刚从越南回来。”周恩来立刻回答说：“我知道。他比我先走了一

步。”显然他非常了解巴金。巴金对周恩来微笑着给他的鼓励，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迷迷糊糊地似乎以为周恩来会帮他过关，但他哪里知道周恩来也不可能。周恩来对“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句歌词确有比常人更深的了解，但他也并不真能彻底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讨论。周恩来甚至连他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掌握，他怎么有可能来决定巴金的命运呢？周恩来这时的心情，也许并不比巴金更为安宁？几天之前，即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也就在上海，他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经历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任意罗织“篡军反党”罪名搞垮了！谁能料到呢？周恩来究竟不是“神”啊！

老百姓当然更难猜测政治风云。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仰起头看看天，天上有乌云，就感觉到可能要有一场倾盆大雨，这样就想办法找个地方躲一躲，能躲过去就好。巴金看到他的那些同行、熟人和老朋友邵荃麟、廖沫沙、邓拓、夏衍、田汉、阳翰笙、吴晗、周信芳……一个一个地都成了问题人物，他不能不想到自己。特别是在这个时刻，青云直上的不是别人，正是一直叮住他不放的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左”派英雄。他唯有举双手投降，相信“天王圣明”，自己罪孽深重，没有把毛泽东著作学好，才有这样的坐卧不安。因而从这个时候起，他说话加倍谨慎小心，就连与朋友通信，甚至写信给几十年的老朋友沙汀，也战战兢兢，一再强调要思想改造，劝沙汀到群众中去多交朋友，深入生活。

这个时期的巴金家里，政治学习气氛也随着加强。萧珊不但为女儿小林当大学生后去参加“四清”运动而兴高采烈，她自己在作协也一再争取下生活。当她争取到一家铜厂搞“四清”时，兴奋得一夜都没睡好，以后每天总是搞得精疲力尽，很晚才从厂里返回家来。但她毫无怨言。巴金也为此感到高兴，认真地写信给沙汀说：“萧珊这次下去是很好的机会，她需要锻炼，她搞完这一期‘四清’，一定会有大的进步。”巴金的弟弟李济生这时也早下乡去搞“四清”，他所在的出版社把他当作“运动员”，认为他正在中年，身体又好，人又随和，好说话，所以凡有上面布置下乡任务，总让他去干。这时他已搞了不止一期“四清”了。

从一九六一年开始，巴金每年春天都与萧珊到杭州西湖边住几天，同时也去看看老友方令孺。唯有这一年，萧珊在搞“四清”，没有去杭州。“九姑”方令孺却来上海，过她的七十寿辰。巴金、萧珊热情地接待了她，方大姐与孩子们也相处得很好。这本该是一次愉快的团聚，无奈这时节正逢乌云满天，天不作美，使开朗的方令孺也不免心上有不解的疙瘩。巴金告诉她每逢星期六下午文艺会堂有文艺界学习会，还问方令孺是否想趁此机会去看看那些老朋友。方令孺高兴地去了，她想她是浙江省文联主席，看看上海怎样在开展学习，也好给浙江作一个参考。到了学习会上，她虽看到了不少朋友，但是觉得学习空气紧张，熟人罗稷南正在受人围攻，“新生力量”姚文元却眉飞色舞，唾沫四溅地在耀武扬威，使方令孺感到满肚子不快，结果悻悻然离开了。

不久，方令孺去北京，回来又在上海招待所住了几天，然后巴金送方令孺回杭州。在火车站上，巴金说：“将来你八十岁，我们在西湖边举行庆祝。”方令孺听了，笑着上了车厢，她像长姐一样向他招手。她后来虽然活到八十，但在“文革”受难中，巴金已无法与她相聚，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

最后一次见面了。

#### 第四节在网里做的梦

这时北京已成立了由陈伯达担任组长，江青、张春桥担任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他们还在上海发表了姚文元的又一篇惊人之作《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把邓拓、吴晗、廖沫沙都说成反党分子。形势如此紧张，出人意料之外，正在巴金感到绝望的时候，忽然他又得到通知，要他去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这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已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底，会议将在六月下旬召开，但得在当月初就赶到北京，因这次我们是东道主，要早作准备。而且叫巴金担任中国作家代表团副团长。临离上海的时候，巴金对萧珊说：“看来眼前我还不致有什么事情，你放心吧。”萧珊正在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姜彬的带领下，在铜厂搞“四清”，既认真学习文件，又认真做工作，十分繁忙，这次巴金赴北京开会，她也来不及像往常那样亲自动手为巴金整理行装，听了巴金说这句话，似乎感到十分欣慰，便笑着反过来安慰巴金说：“我们本没有什么事情，你放心去吧，家里有我呢。”

巴金到了北京，住在京西宾馆。宾馆虽在西郊，离市区较远，但信息并不隔绝。就在巴金住进京西宾馆的那天，一篇杀气腾腾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人民日报》发表，并即由全国各报转载了。这使巴金胆战心惊，在临离上海时的一场幻梦又破灭了。他知道“一网打尽”的形势已经形成，同时听说连周扬都已经靠边了！当然，巴金的所谓“网”，其实还不过是一个文艺界的“网”，他还不知道实际还有个更大的网，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彭真都在这个网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都在这个网里，甚至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在这个网里！难怪一切爱国爱党的人都要成为这场文化革命的敌人了！

临离上海时，与萧珊相互安慰的情景还在眼前，此刻巴金忽又堕入忐忑不安的心态里。他觉得自己犹如古代希腊神话中的达摩克里斯一样，坐在一把用马鬃悬挂起来的宝剑下，随时有被杀害的危险。他很想找个地方让自己安静一下，偏偏这里人来人往，亚非各国作家代表陆续前来报到，他们也住在这个宾馆里，这些代表大多兴高采烈，都想在大会召开前在北京风景区作一次游览；而巴金自己却尽想着目前的“大批判”形势会发展得怎样？他的那些朋友们大都落在这个网里，现在正在受难，不知道今后他们怎样活下去？自己心里实在没个底。

恰在这时，日本作家中岛健藏和他的夫人京子也来北京参加亚非作家会议，他们都是巴金的老朋友了，特别是中岛先生，不但巴金几次访日都曾经他热情接待，还到过他家里作客。中岛健藏这几年也多次来过中国，巴金每次都与他见面，还请他到自己家中喝酒。他们两人的友谊，几乎已达到无话不谈的地步。中国国内开始“文化大革命”，许多人出了事，中岛健藏夫妇很为巴金担心，这次他们来以前，已在东京听到传说，说郭沫若和巴金的书，已被全部烧毁了。他们在北京机场，从飞机下来发现迎接的中国作家中有巴金，而且他还担任着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中岛夫妇非常高兴，他们与巴金热烈握手。一到宾馆，安排好住宿，京子夫人向巴金表示感谢，并悄悄地对巴金说：“看见了你，我们就放心了。”巴金也只好若无其事地对这两位善良的外国朋友微笑，表示感谢。

隔了几天，大概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十日，北京市在人民大会堂开了一个

支援越南人民斗争的大会，主持会议的是中国国务院正副总理周恩来和陈毅，主席台上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的也有不少人，甚至有郭沫若，也有巴金和老舍，以及日本朋友中岛健藏。中岛健藏发现巴金之外，还有老舍，他特别显得高兴，特地跑过来与大家打招呼。巴金一年没有见到老舍了，这次到北京后也一直没有听到人提起老舍的名字，他以为老舍也可能出了什么事，此刻他一到会场，却发现老舍正在与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谈话，巴金心中悬着的吊桶放了下来，感到非常欣慰。老舍是巴金在抗战前就认识的老友，抗战时期在重庆更时相往来。老舍曾写专文谈巴金的为人和他的作品，称颂巴金是个极为善良的好人。解放后巴金每次到北京开会，总要到老舍家里聊天，在聊到适当时候老舍总是站起来说：“怎么样？我们去吃个小馆吧！”然后老舍夫妇就带巴金（有一次还偕同萧珊）去王府井东安市场一家他们十分熟悉的饭店畅叙，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谈戏，谈文，谈上海，谈北京，谈全国各地见闻，也谈各人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而现在，因为这样的形势，一年不见面了，也一年不通讯问了，大家都处在类似的境遇中，只有在心中互祝平安。此刻又在意外中见面，出乎寻常地在这样一个场合里扮演着相同的角色——大会主席团的成员！但多么紧张的心态，多么焦急不安的心情！而表面上又似乎若无其事！老舍坐在巴金的前排，但仍称得上是坐在他的身旁。老舍对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

这句话使巴金多么高兴！他似乎从老舍的这句话里也意识到自己的命运：“我没有问题，请告诉朋友们！”这是多么好的信息！这时他又看见中岛健藏先生跑过来，与老舍握手，亲切地相互寒暄。看中岛先生这个善良的外国朋友，他为中国作家的平安无事，脸上露出了多么兴奋欢愉的神情！啊，友谊，无私的友谊，你是多么可贵，多么使人感到欣慰啊！

就在这个时刻，巴金又从大会主席台上两个主持人的脸上得到喜兆。他看到陈毅在大会上准备讲话，因为拿错讲稿，被周恩来发现，连忙把它调换过来。这一刹那间，周恩来侧过脸，向后排情不自禁地露出友好的笑容。巴金和老舍都为坐在前排的这两个领导人亲切的动作和表情而觉得安慰。他们都用敬重和友爱的眼光看着这两个领导人的背影，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两个人身上。他们相信只要有这两个人在，一切都将会按常规发展。

大会散了，巴金看见周恩来、陈毅和大家一起缓缓地退场，也看见老舍随着这些领导人从容地离开，接着巴金也跟着从会场出来，他的心这时比刚来的时候要安宁一些，因为他看到了周恩来、陈毅愉快的笑容，也看到了老友老舍一如往常平静的笑容。但巴金哪里知道他将从此再也看不到他所敬重的周恩来总理了，也永远再看不到他所敬重的陈毅副总理了，同时也将永远看不到与他相交几十年的老朋友老舍了！这是巴金和这三个人最后的一次见面。这三位都在十年动乱中去世。特别是老舍，不过一个多月后，他就在红卫兵棍棒下被逼投湖自杀了！

巴金与一些亚非国家作家代表开完会，就离开北京到武汉，然后在武汉参加了毛泽东接见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代表的活动。为了准备赴杭州筹备亚非作家的“湖上大联欢”，巴金没有再跟随其他国家代表分三路到别处旅行，他只是在临别时，在武昌机场为中岛健藏夫妇送行，看到他们乘上民航飞机，中岛先生不断向他招手，眼中噙着惜别的泪珠。巴金也向他们不断挥手，想这次也许是最最后一次会面了，再也没有机会与他谈心叙谊了，禁不住两眼模糊。而这一时期满腔难以诉说的痛苦，也竟在此刻一起涌上心头，脸上顿时

珠泪纷纷。

到了杭州，他为了带动一批工作人员，按计划把亚非作家在湖上“大联欢”的准备工作做好，以迎接分三路去各地旅行的亚非作家的陆续到来，准备与方令孺联系，哪知浙江文联和作协竟一个熟人都看不到。老友方令孺是浙江省文联主席，按理她更该到场，而现在却踪影全无。问那些面孔陌生的接待者，说这些作家都有问题，都不能出来与大家一起张罗工作。巴金听了，禁不住出了一身冷汗，什么话都不敢进一步提出来问，唯恐有更不好的消息钻进自己的耳朵里。亚非作家“湖上大联欢”像一阵风似的，在人们强颜欢笑中过去了，留在巴金印象中只有一个菲律宾诗人，在西湖泛舟时，对他提问：“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看不到一个作家和诗人？”这句话把巴金问得哑口无言。浙江是鲁迅的故乡，它不但风景美丽如画，而且还有许多作家和诗人的后代。风景地区一到冬天不免草枯叶落，作家诗人在风雪严寒中也只能一言不发。不是他们欢喜沉默，而是凛冽的西北风把他们吹得噤若寒蝉。但是我们怎样向这个菲律宾诗人作解释呢？他终年生活在三十摄氏度的燠热气候里，他懂得冬天吗？

巴金回到了上海家里。不过一个多月时间，上海已经有了不少变化。萧珊在铜厂搞的“四清”已经接近尾声，据说“四清”走的是“资产阶级路线”，要搞就得搞“文化大革命”。她和工作队的人都已从厂里撤出来，回到作协参加运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已经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在巴金下飞机时，前来迎接的是除了亚非作家会议的有关人员，还有上海作协“文革领导小组”的人，他们还向巴金“汇报”了工作，说除了叶以群、孔罗荪靠边外，还批判了王西彦、魏金枝和师陀三个老作家。同时还有一些大字报，“谈到你巴老一九六二年那篇《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巴金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工作还在进行，送往迎来工作仍得照做不误。八月初，亚非作家常设局秘书长森纳那亚克夫妇到上海，巴金还是要和许广平、曹禺、金仲华等人一起去机场迎接。当晚又得去参加欢迎各国代表的酒会，和第二天的群众大会。隔天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工作结束，巴金送郭沫若、曹禺等人回北京，在机场大家的心境黯然，竟不知今后是否再有机会见面。特别是巴金和曹禺，几十年的友情，想不到竟有这么难过的日子：谁也保证不了谁的安全，谁也不知道哪一天自己被作为“犯人”受审，甚至家破人亡。飞机从机场起飞，郭沫若、曹禺离开了上海，他们走了，巴金木然在地面上站着，忽然感到十分孤独，觉得自己离大家十分遥远，独个儿竟无路可走，不知如何是好。别人提醒他一起去搭车返市区，他“嗯”了一声就跟他们离开机场，外表十分镇静，内心竟如一盆滚烫的水，沸腾得满脑子都浮起一个个问号，对这个自己曾爱过的人世的问号，对这个深不可测的运动的问号。

等不到巴金想得更多，上海作家协会就来催促他回到单位参加运动。他是作协上海分会主席，但作协上海分会的领导权却属于别人。他们叫他向东，他无法向西；他们叫他向西，他也无法向东。现在他们把他安排在创作组里学习，他当然二话不说，跟着大家读起“红宝书”来。组里有的人以前非常尊敬巴金，现在却非常冷淡，看来他们已与巴金“划清界线”了，这使巴金心里更加紧张。他是在八月七日去报到的。到了以后，只见大厅上挂满了一张张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好像阎罗王对犯人的判决书，不但杀气腾腾，而且尖酸刻薄。写大字报的人，平时写作品不见得在刊物编辑面前能够顺利过关，现在不知怎样，忽然融会贯通，才气横溢，既能把张三的事套在李四头上，



又能把芝麻变成西瓜，它们满纸烟云，使人看了心惊肉跳。内容大部分针对叶以群和孔罗荪，也有一部分是批判王西彦、魏金枝、师陀他们的，当然也有几张与自己直接有关。巴金匆忙地看着，也不敢多看、细看，怕多看了这些厉害的大字报，会叫人发狂。他意识到原来自己在网里做梦，现在梦破灭了。

## 第五节 “我们要坚持下去”

作协大厅里传达“文革十六条”的那天大会上，萧珊也在场。这个在学生时代就热情爱国，解放后十分虔诚地自觉要求改造思想，对社会主义祖国充满信心的翻译工作者，她本来完全可以不必看到这样一个使她痛心的场面：作协机关内部贴巴金的大字报竟有那么多，而且有的还写得那么出人意外地“上纲上线”。

虽然她和巴金一样，看到叶以群、孔罗荪靠边，王西彦等人被批判，知道巴金也必在劫难逃，但冥冥之中总还存在一点幻想，以为巴金平时小心谨慎，比较注意自己的言行，解放后积极响应各种号召，下部队，下农村，从不落在人后；即使发表《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这样的言论，也是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多次动员，归根结蒂，还是响应当时“上面”希望大家畅所欲言的号召，他怎么可能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呢其实，上海作协大厅里的这一些戏，不过是上海当时出现的“造反”狂潮的一个小小泡沫，或者说是一出小小丑剧，整个上海这时已早被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的“中央文革”小组搞得天翻地覆。原来整洁的南京路，现在通过红卫兵的“破四旧”，已经变得像一个被市井无赖蹂躏过的少女，显得衣衫凌乱，形容憔悴，一夜之间，青春全部销蚀，满街都是混乱不堪的大字报。原来五彩缤纷的商店玻璃橱窗，现在全代之以语录牌与领袖像。饭馆、饮食店服务员全部“退居二线”，端茶取菜送饭，全由顾客自己动手，弄得每张桌子都杯盘狼藉，羹汤四溅。百货店经过检查，绝大部分服装已搬回仓库里去，因为它们都被认为是“奇装异服”。现在陈列的服装大大小小全是人民装，颜色一律蓝色，或者黑色。马路上处处都是为“破四旧”、拿着剪刀准备剪妇女裤脚筒的造反派。公共汽车上挤满了从外地来进行串连的红卫兵，他们唱着“造反有理”的歌，不买票，也不打招呼。公共汽车站头，人山人海，纸屑、果壳、桔子皮、香烟蒂、旧报纸，连同鼻涕、浓痰，撒得满地。高音喇叭在高楼大厦上厉声怪叫，不论是唱歌，还是放乐曲，或者有什么人讲话，都带着哭声，而且非常凄厉，像一支长剑，一直刺进过路人的耳朵里。天色阴沉沉，雨濛濛……

全市几乎每一个平方米的土地都在出现空前未曾有过的怪事，老子向儿子请罪，四五十岁的老师对小学生们行鞠躬礼，机关里的干部变成牧师，“红宝书”成了圣经，革命老干部大多数被指为特务叛徒走资派或修正主义分子，弄堂口好吃懒做的小泼皮却忽然都成为群众领袖。

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每个知识分子和干部家庭，不是哪个亲戚被抄家，就是哪个朋友被逼上吊，有的甚至忽然失踪，被绑架还是被捕，被暗害呢还是被枪毙，谁都拿不准。

隔了两天，下午一点半，巴金与萧珊实在因为心里慌乱而两腿发软，不得不雇了一辆三轮车去作协“上班”，到了那边，却得到通知在大厅开全体大会，批判叶以群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叶以群是上海作协的副主席，兼《上海文学》副主编，具体负责文学研究所工作，这几年培养了不少大学生成为文学理论工作者，似乎很出了一些人才。这几年来，宣传部和文化部以及上海市委宣传部交给上海作协和《上海文学》的任务，多半是通过他和罗荪下达的。今天的大会主要以他作为对象进行批判。巴金进入会场，也不敢四处张望，看看叶以群是否在座。但奇怪，会一开始，并不曾叫叶以群

站出来答话，似乎他并不在场，那么他到哪里去了呢？巴金专心听着揭发人的发言，越听越觉得蹊跷，觉得发言者虽然一开头便破口大骂，但讲的话没头没脑，甚至说以群“自绝于人民”，怎么就不见了？他不敢多想，抬起头只见孔罗荪低着头坐在不远处，脸色苍白，眼膛发黑，身子摇晃，差点没倒下去。巴金想他必和自己一样，吓得魂不附体。刚想到这里，忽听见大家举起拳头，高呼“打倒叶以群！”十分慷慨激昂。他也就急忙举起手高呼“打倒叶以群！”忽然又有人高喊：“叶以群自绝人民，人民决不饶恕他！”他也就随着应声，装出一种毫不紧张的样子，来掩盖内心的慌乱。他希望人们不要注意他，更不要让人们发觉叶以群原是自己的老朋友。

巴金环顾四周，发觉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揭发批判以群“罪行”的，有些正是以群这几年来努力花工夫培养的一些青年，叶以群一直把他（她）们当作自己的马列主义接班人，而现在批判他的也恰恰就是这些青年。当然，巴金并不奇怪。这年头愈是与自己亲密的人出来与自己划清界线，愈显得思想立场坚定，马列主义水平高。那天批判会开过后，又开小组会，内容大同小异，也是表态，也是人人都说以群罪孽深重，与他划清界线、小组会散后出来时，在门外，有个女作家对巴金悄悄地说：“以群的消息不要讲出去。”巴金听了禁不住打了个寒噤，出了一身冷汗，证实以群确实已经自杀！因为那个女作家是党员，最近又一直在上海，她的消息知道得多。后来果然证实，叶以群是在一个星期以前的一个早晨，在自己住的那幢公寓大楼跳下来死的。

回到家里，巴金与萧珊都为以群的下场感到震惊与伤心，家中电话这时虽还不曾拆掉，但也不敢与罗荪通气，不过巴金萧珊仍记得以群这几年来有时还是能够相互推心置腹商谈身边的的工作，他奉命来动员巴金写批判《不夜城》的文章，并商量可以不点柯灵的名便是一例。

现在他感到很孤独，但为了安全，在当天写日记时仍这样写：“一点半同萧珊雇三轮车去作协。两点在大厅开全体大会批判叶以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四点后休息。分小组开会，对叶以群最后的叛党行为，一致表示极大愤慨。五点半散会。”他目前唯求自己过关，自己的事尚且想不通，只好不想；别人的事更不敢多想了。

不久，他被通知要天天上班，到作协参加运动。不过当时他还不曾被当作“专政对象”过完全靠边的“牛棚”生活。他被分派在作协二楼资料室，但是周围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忽然有一天听说住在他家附近的党员老干部陈同生，也伏在煤气灶上自杀了。陈同生也是他的老友，这些年来一直与他在政协里一起开会学习，有时还与他和金仲华一同去农村参观访问。萧珊有机会到铜厂搞“四清”，也得到他的帮助与支持。不久前，他还来巴金家中，送过他一个陶瓷灯架，灯架上有一个精致的雕刻：喜鹊在梅枝上鸣春。那个灯架还在巴金案头上使用，而陈同生已经离开了这个难以使人理解的人世。

这时上海社会真是兵荒马乱，似乎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一向热闹的巴金家庭愁云阵阵，冷冷清清，许多朋友大都自顾不暇，不来串门了。巴金连理发都发生问题，萧珊怕他一上街就被南来北往的哪家造反派绑架去。幸亏萧珊的挚友、小林、小棠的“好姐姐”萧荀，还是照常来家看望，萧珊就请她领着沈庾香的孩子去紫罗兰理发店理发，让巴金同去，由她暗中保护着巴金的安全。巴金在紫罗兰理好发回家，萧荀才领着孩子跟在后面走回来。一

到晚上，墙门外的野孩子们唱的造反歌声音越来越响亮，有时还有人越过篱笆向巴金家中丢石子，高喊“打倒走资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口号，小狗包弟不懂主人正忧心忡忡，它一听见篱笆外面的人声就叫了起来，这使屋内空气更加紧张。同时屋外的卡车驶过的声音也比往常多了，大批红卫兵正向四邻敲门，进行抄家。有时还隐隐约约，听见造反派的吆喝声，和被抄人家的孩子和妇女哭声。这些声音越到深夜，越听得清，这不能不使人联想起几十年前巴金在成都老家，看到过的军阀统率下的一群哗变的士兵，挨家挨户勒索钱财时的景象。

面对这样一个异乎寻常的局面，巴金与萧珊只得与九姑李琼如商量，把一部分信件和书籍烧毁，以免引起无谓的纠纷。当时被烧毁的有保存了四十多年的大哥李尧枚给巴金与三哥尧林的一百多封家信，和保存了三十五年的大哥临死前写的绝命书抄本。被毁的书籍中还有《金瓶梅词话》等不适宜青年阅读的书。他们把这些信和书放在厨房灶头里烧毁后，心头好像去掉了一件重物，感到轻松。而偏在这时，与巴金家的院子只隔一道篱笆的邻居被抄家了，那边住的是一个老年人，他过去曾是一家工厂的资方，来他家“破四旧”的人不少，一边叱骂，一边抢拿，人来人往，叫叫嚷嚷，还摔坛坛罐罐，情景非常可怕，而附近小孩又不时来巴金家敲大门，说要来把狗捉去，使巴金和萧珊一夜不曾睡好。全家老小本来都很喜欢包弟，这时不论哪个都认为小狗经常对门外狂吠，说不定会引一群人进来抄家，留着无用，还是送人，但这个时候谁还敢收留小狗呢？有人出主意，把它送到医院作科研用。巴金心有不忍，把这件事拖了几天。包弟不懂人事，它看到巴金，还是照常站起身来打躬作揖，摇尾巴，讨东西吃；巴金只好对它流泪。隔了几天，空气更加紧张，包弟晚上因为外面人声嘈杂，它的叫声也就不断，巴金只得请九姑把它送往医院去了。送去之后，巴金心里还是不能平静，他不但看到包弟向他打躬作揖要东西吃，还看到它被医师送上手术台割开肚皮，作解剖用。他醒来，只感到自己无地自容。也在这个时期，他在作协资料室过半靠边生活的阶段也结束了。造反派一纸“勒令”，把他和白危也并入了“牛鬼”队，和孔罗荪、王西彦、吴强、师陀、魏金枝等一起接受批斗。

巴金的幻梦全部破灭。张春桥、姚文元设在丁香花园的御用写作班，直接写了揭发巴金的大字报张贴在作协的中央大厅里，并给巴金加了个“黑老K”的头衔，意思是巴金在文艺界影响之大等于扑克牌里仅次于“A”的“老K”。写作班的作用非同小可，它是直通中央文革的！这样，打倒黑老K巴金就在上海作家协会内掀起了一个高潮。上海作家协会内的楼梯口，从三楼顶端挂下了长达十几米长的直幅标语，一直拖到地面上，上面写着：“彻底打倒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巴金，批倒邪书十四卷《巴金文集》。”接着，作协“文革领导小组”就有人来通知巴金，说他“态度不老实”，革命群众要对他采取行动，当即派了机关红卫兵到巴金家中进行抄检。他们从上午抄到下午，连中饭也从作协食堂送到现场来吃，足足经历了六七个小时，才把书橱都贴上封条，把他们认为可以“追查”的东西都拿走，逼着萧珊交代银行存款存单的下落，以便追缴，临走时还贴了一张揭发巴金“罪行”的大字报在他家门廊的入口处，对巴金威胁说：“你再不老实交代，我们就把大字报贴到大门口，看你以后怎样过日子！”意思是如果把大字报贴到大门口，过路人都是可以进来胡作非为。因此，后来有人还解释，这还是一次“保护性抄家”。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样结束，这次抄家只是个开始。接着就是无数次迫害接踵而来：不是在“牛棚”被提审，就是让造反派带到别的单位去揪斗；另外，是不断被“勒令”写思想汇报，承认人家对自己的批判十分正确，击中自己的要害，然后感谢“文化大革命”对自己的挽救，称道“造反派”是自己的救星。而这种迫害，一天比一天厉害，最初是低头认罪，后来是九十度弯腰，更后来索性“坐喷气式飞机”，……一到晚上，总是精疲力尽，深夜回家，还得防备南来北往的红卫兵亲临家中进行突袭。他们有的三三两两，有的成群结队，有的翻墙进来，有的公开敲门闯入，只要臂上缠着“红卫兵”或“造反派”臂章，都可以叫你全家乖乖的听他大声吆喝。他们可以在你家中要拿什么就拿什么，没有人会来打抱不平，也没有公安人员敢来这里维持治安，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上海社会。

巴金家几次领教了这样的“小将”光临，他家的半导体被抄去，望远镜被拿走，至于各种各样的书，只要哪个“小将”说要拿去批判，他就得没二话可说让他们拿去批判。一个晚上，几个中学生翻墙头进来，为头的只不过十四五岁，是从北京来的干部子弟，他们都是经过天安门城楼检阅过的红卫兵，以陈伯达、江青、张春桥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为他们壮过胆的“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小将”。他们蜂拥进入中门，一声吆喝，叫全家的人都站出来。萧珊看他们深夜闯入，来势汹汹，怕巴金被他们揪走，就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报告情况，要求民警出来干预。谁知派出所只有一个人在值班，迫于眼前情势，不敢出来管。而那个为头的红卫兵发觉了萧珊的行动，跟着赶到派出所，竟然当着民警的面，用铜头皮带对萧珊狠狠地抽了一下，并把她押了回来，同巴金和他的两个妹妹以及还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的二十一岁的女儿小林一起关在厕所里。然后，他们在楼上楼下各个房间跑遍，顺手牵羊，吃的吃，拿的拿，呼啸而去。吓得巴金一家在他们离开半个小时了还不敢出来，厕所门虽然让他们关着，但并未上锁，他们却不知道该不该出来。这年头就是有一批人可以胡作非为，什么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事都敢做；而一般群众，普通的老百姓，包括最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连做个安分守己的人都不可能。他们只能在坏人的棍棒下忍气吞声，什么都得相信“天王圣明”，按着明明不合理的歪理去办。

巴金天天晚上吞几片安眠药，才能入睡。他的满脑子都是“想不通”！这多年来他哪桩事不按“上面”的指示办？作为作家，他按“上面”指引的方向下部队，下农村，也去工厂，去老区；又照着“上面”；布置下来的任务，去开会，去写稿，去送往迎来，忙忙碌碌，把自己本来准备动笔写的创作计划放弃，为的都是响应号召，去赶当前中心任务。但是现在他怎样呢？却得到这样的结果！他虽然想不通，但又怀疑自己真有罪，思想改造不彻底。……现在他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受苦，来净化心灵。你们斗他，他低头认罪，你们高举双手高喊：“打倒巴金！”他也高举双手，高喊：“打倒巴金！”

这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似乎一切都完了，一切都结束了，只有萧珊还在身边。她与他经常痛苦地相对着无言，但经过长时间沉默，终于萧珊说话了，她悄悄地对他说：“我们要坚持下去，要坚持。坚持下去就好。”

巴金从萧珊对他的同情中，汲取了力量。他觉得自己应该活下去。

## 第六节 受难的灵魂

可怕的是这样的形势还在发展。“一月革命”开始，“中央文革”发动并支持造反派夺权，各基层换了一批更“革命”的“左”派人物上台。上海作协没有例外。新的造反派领导班子建立，首先是把巴金等几个老作家从资料室赶出来，让新的一批刚靠边的人聚在那边反省；另在楼下西厅后面五平方米宽的煤气灶间，开辟了一个环境更糟的“牛棚”，给他们从早上八点钟到晚上八点在一起学习“红宝书”，写思想汇报；并随时听从监督组命令，出去应付外单位点名批斗。当然，他们每天还要按时打扫厕所，或参加其他劳动。

“一月革命”在上海的另一标志，是张春桥、姚文元沐猴而冠，成为“上海公社”的第一、二把手。“上海公社”不久又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他们就成为“市革会”主任和副主任。不论称“公社”还是称“市革会”，反正上海更趋向混乱。到处夺权，到处打砸抢，到处是大字报，到处开批斗大会，到处下跪和喷气式，到处有虐待狂。只有愚昧、自私和野心勃勃；没有真理，没有正义，没有怜悯和同情。一句话，只有兽性，没有人性。

不少原来看似和善的人，一下都变成残忍的杀手。过去与自己曾友好的人，现在也来拆你的墙脚；过去自己曾尽心扶植的人，现在都来投石。至于本来与你为敌的人，现在更千方百计想趁此时机，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而那些即使与自己原无任何关系的人，这时也想从你身上捞取一点好处：有的想从批判你的过程中显露一下自己的才能；有的想通过打击你来打击别人；有的则纯粹出于想发泄一下自己原始的兽性，便在揪斗你的时候，用尽心力虐待你。

“牛棚”里的作家，大都变得又老又瘪。本来头发花白的巴金，现在全白。而且头发被强迫“自动”剪成平顶。任何人都可以到这里来把他叫出去示众，进行责骂。有时萧珊也被叫来“陪斗”。她的性情变得忧郁起来。人也瘦了，再也看不到过去那种高高兴兴的样子，笑容在她的脸上完全消失。她从不曾在尔虞我诈的旧社会混迹过，很少应付复杂的人事关系的经验。她一直争取有机会在实际工作中锻炼自己，改造思想。甚至在“四清”运动开始时，她还到铜厂参加运动，每天从早到夜，和大家同样工作。“文革”一开始，人家却把她这个义务编辑当作正式编制人员作为审查对象，并诬蔑她是巴金在作家协会的“坐探”。

突然而来的“文革”形势，对巴金十分陌生；对萧珊来说，更是完全出于意外。她不知道如何是好。在起初，她听到北京、上海许多熟人靠边，还庆幸巴金还在接待亚非国家的外宾，暗暗祈求命运之神能让巴金顺利过关；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巴金落到那个深不可测的网里，但萧珊还是幻想“上面”对巴金有些特殊照顾，因为她最了解巴金，他这十几年来一直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即使对某些党员思想作风有些意见，但从没有反对过共产党，更没有对社会主义制度有过抵触情绪，两人总是抱着改造思想的决心，“向共产主义理想迈进”。“文革”既是毛主席发动、毛主席领导，怎么有可能让巴金受难吃苦？北京来的红卫兵深夜闯入，任意搜抄书物，她溜出门外，向对门的派出所报告，也无非是信任毛主席、共产党，相信他们能保护一直与毛主席、共产党站在一起的作家起码的人身安全。但是结果派出所不敢出来保护他们，并为此她反给红卫兵当场抽了一下铜头皮带，以致左眼内出血，

眼圈四周发黑，伤痕很长时期没有消退。她想不通，但还是安慰巴金：“我们要坚持下去，精神不要垮掉，真理总在的。”

就在这个时期，电影院在放映根据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影片《英雄儿女》，萧珊悄悄地跑到电影院去看了一遍，看到银幕上还有“根据巴金原作改编”的字样，她很高兴。到了晚上，萧珊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巴金，巴金心头露出一线希望。但不过两三天时间，作协造反派的一个战斗队就赶到电影院和电影发行公司造反，说放映《英雄儿女》的片头上竟然还出现老反革命巴金的名字，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还把大字报贴在电影院门口，巴金头上的“反革命”帽子就在马路上传开了。萧珊的脸更加显得凄清了。

每天一早上班，萧珊总把巴金送到公共汽车站头上，车厢人挤，巴金年迈挤不上，又怕时间错过，勉强上车，挤在门口，车门关不上，萧珊就在车外用手使劲推巴金的背，让他挤进去，直到车子开了，萧珊才离开车站回来，又是一整天惦记着他的安全，不知会不会碰到什么恶运。到了晚上，巴金能按时回来就好；有时却让萧珊等到八点钟、九点钟，甚至十一点、十二点才回。这时她就在黑暗中，偷偷把大门打开，跑到路口去守候他，直至看到巴金在昏暗中，迈着蹒跚的步子一步步走来，这才舒口气。这时她还给他弄泡饭吃。“日子难过啊！”巴金叹了一口气。于是萧珊也就忧郁地应声说：“日子难过啊！”但又接着鼓起勇气劝他：“要坚持下去，不要灰心啊！”有时还说自己了解他，别人对他误会，她对他决不会误会；别人诬陷责骂他，她劝他都不要计较。“坚持下去就好。”她总是这样说。她相信一切道理总有一天会弄清楚。她在巴金面前，再也不像过去那样耍小孩子脾气了。她显得老练成熟起来。

巴金因为有萧珊对他的信赖与安慰，而不致在这样的时刻感到完全绝望。

但是萧珊心里苦。因为形势越来越严酷。一九六七年五月，北京一家大报首先发表文章，点巴金的名字，题目是《大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权威》，说巴金“是最典型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写的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据说张春桥、姚文元接见上海作协造反派头头时，张春桥曾说：“巴金完全应该批，特别是他的思想影响很大，应该好好的批！”他还说：“你们要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高度来考虑问题！”接着，姚文元也说：“说批巴金要中央点头，没有这回事！”于是上海作协造反派的头头们，就在批巴金的大旗下，几派联合起来，加紧批斗巴金。这样，第二个月，就有上海两家大报批巴金《灭亡》中无政府主义的文章。

隔了两个月，“中央文革”进一步迫害彭德怀将军，将一九五九年八届八中全会上公布过的《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忽然又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发表，这更使巴金觉得自己的问题火上加油，因为他在朝鲜战场上曾访问过彭德怀，还写过一篇《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的文章，当时起过很大影响。果然不久，上海作家协会造反派又出版了《文学风雷》期刊，连续发表大量文章，对巴金进行批判。上海报上也出现了一篇批判文章，题目叫《评彭德怀和巴金的一次反革命勾结》。复旦大学“巴金专案组”的红卫兵为此来到作家协会揪斗巴金，不让巴金回家，强迫他住在作协三楼走廊上，住了两个星期，还把巴金的日记本作为猎物抄去。巴金在“牛棚”从一九六七年七月开始写日记，当时除了接受批斗，他每天工作是清扫厕所，在花园里掏阴沟、拔野草，在厨房里拣菜、洗碗、揩桌子，所以所写的日记实

际是劳动日记,当然还有一些自我批评和思想汇报,无非是表示“真心悔改”,争取“坦白从宽”。这样的日记,起初每天让监督组拿去挂在走廊上,但挂出去,就让人拿走了,也不知是造反派拿去作“批判”材料,还是有人偷走作“作家墨迹”保存。这样,巴金就不再每天把日记交出去审查;虽然这样,他还是知道有一天仍难免要被迫交出去,所以他写这些日记,总把它当作坐在造反派面前写的东西,一丝不苟地写些认罪的话。果然,两个月以后,复旦大学红卫兵一到,就先抄“牛棚”里的抽屉,把巴金这一时期日记全都抄去。他们在作协审查巴金,审了两个星期还嫌不够;后来索性把巴金揪到江湾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宿舍关了起来,让他们把他当作拳击师的练球标,谁都可以对他进行批斗,即所谓进行“大批判”,以壮各派声势。等这些青年人对他虐待够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他才被释放回来。接着是一九六八年开始的各种“游斗”。巴金和吴强等都无一例外地经常应各处的“勒令”而不得不去作“反面教员”。场面最大的一次,是全市批斗市委书记陈丕显与宣传部长石西民。巴金与上海文艺界其他知名人士赵丹、白杨、吴强、贺绿汀、丰子恺等都被揪去一起陪斗,地点在上海杂技场里。大家都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走资派”弯腰屈膝,造反派耀武扬威,震天响的口号一阵又一阵,看来“运动”已经达到了最高潮。

但是过多的批斗场面,反而使群众的情绪逐渐下降。“杂技场”的这样演出,并没有超越杂技场演出杂技的规律:杂技这玩意儿,一次看过,第二次看就没有味道了。相反,群众经历了够多的批斗会,逐渐发觉批斗的内在真相。犹如看魔术,看多了就识别了戏法的虚假。复旦大学红卫兵把巴金批斗了一个月,有的人反而因读了巴金作品而成为巴金作品的热情读者和研究者,转而觉得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写得实在勉强,实在蛮不讲理。而巴金呢,他也因为参加了过多的批斗会,在这时开始逐渐认识了造反派,原来他们也在做戏。“他们要整我,我大拍马屁也没有用处。”他把“文革”的真相一步一步地看穿了。

最痛苦的还是萧珊。看到巴金的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揪他去批斗的地方越来越多,造反派对他的态度一天比一天更恶劣,她的心里也就一天比一天沉重。有一天,她上街买小菜,看到淮海路上作协造反派的大字报,不但把她和巴金名字写在一起批判,还把巴金全家的姓名都上了榜,加了各种罪名。她觉得日子难过,健康情况也越来越坏。自从不要她按日去作协上班后,作协造反派却通知里委对她进行监督,要她每天早上清扫马路。萧珊不得不每天天还没有亮,就戴着口罩上马路扫地。有一次,她到作协学习,傍晚与巴金一起回家,那天总算造反派没有留难,他们六点左右就到家了。萧珊比较高兴,一到家便到厨房准备晚餐。巴金像往常一样,在走廊里的饭桌旁坐了下来,他随手拿起报纸,忽然看到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心里顿时大吃一惊,还不及细读,就忙把报纸藏了起来,怕萧珊看到,影响她的情绪。萧珊果然面露笑容,端着饭菜出来了,巴金只好故作镇静,陪同萧珊匆匆把饭吃好,但心里却忐忑不安,不知说什么好。只见萧珊放下碗筷,就找报纸看。巴金想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的地方,但一转眼,她还是想到要看报,终于把报纸找到了。她看着,看着,忽然一声不响,笑容没有了,就走到房间里去,这一夜就再也不讲一句话。巴金的心,像被谁割了一刀那样,他看到萧珊躺在床上,脸朝里面,小声地哭着……

一到夏天,巴金又让造反派揪去参加上海文化系统召开的斗争巴金的电



视大会。作协造反派还以“上海作家协会造反兵团”与“上海工人革命文艺创作队”名义出了两本《彻底打倒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专刊，反映这次批斗大会的内容。与此同时，上海两家大报又各以《斗倒批臭文学界反动权威巴金》和《清算反共老手巴金的滔天罪行》为通栏标题，发表整版文章对巴金进行批判。第二天，又分别以类似的通栏标题发表消息，报道文化系统举行电视斗争大会的内容。这一时期报纸本来已经像中了邪一样，题目越用越大，文字字体也从五号字放大到四号字，唯恐吓不倒人家。现在所有“大批判”文章都处理得这样突出，这次也不例外。

巴金面对这样的遭遇，一如但丁在《神曲》中描写的炼狱中受罪那样，他唯一祈求的是净化自己的心灵。他承受一切冤屈，承受一切罪过，承受一切魔鬼对他的各种迫害。然而到了秋天，他又不得不离开萧珊去郊县松江辰山公社参加“三秋”劳动。这时，工宣队与军宣队已经“占领上层建筑”，这次下乡，统由工宣队员带领。这些工宣队员为了表示自己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对巴金和他的难友们大都要求很严厉。因此，在劳动中，巴金和他的难友们又不免被派去干最重的活，吃难以下咽的“忆苦饭”，并听取造反派的任意造谣和无端训斥，如说他“每月领取上海作家协会一百元的房租津贴”等等。这类精神折磨，大半是在“田头批斗会”上进行。每当大家流着汗努力挑泥挖土的时候，忽然一阵笛声，大家便放下铁镢，集中起来，在男女社员们的围观中，听贫下中农对旧社会的控诉，然后就由造反派或工宣队员出来向“牛鬼”训话，不是指那个人干活不够积极，就说这个人跑路精神不佳，最后就随便拉出个“罪孽深重”的人来作重点批判，要他低头认罪。在这种场合，最合适的常常是巴金。因为他的名气最响，谁都知道他出身地主家庭，又写过“大毒草”《家》。而且在革命群众批判他的时候，加给他的罪名，一般他都能接受，因此批斗会也最容易获得“巨大成果”。

后来回到上海，形势似乎有些缓和，巴金、王西彦、魏金枝等似乎都得到“宽大”的处理，可以允许与革命群众一起参加学习了；工宣队员看到他们，也开始露出了笑脸。萧珊也因为身体不好，得到里委允许，可以不再每天一早上街打扫马路，而由巴金的妹妹代劳。但是也就在这个时期，社会上忽然又掀起一个“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高潮，巴金和萧珊不得不流着眼泪把刚从初中毕业的十七岁的儿子小棠，送到安徽省嘉山县农村插队落户。风雨飘摇的时代，从不幸的家庭成长起来的子女，饱尝了时代的艰辛，也看够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共同承担了社会对他们不公平的待遇。当时巴金的女儿小林已在不久前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了，学校被既残忍又愚昧的造反派所控制和占领，毕业生的去向谁也无法作主，年轻的毕业生都像失群的蚂蚁，到处乱碰。小林得到同学祝鸿生的照应，在患难中结成良伴。这使病中的萧珊，在巴金下乡和小棠务农的时期，总算有了半个依靠。

但是不久，巴金他们从“三秋”劳动回来后所受到的“宽大”待遇。又很快改变了。据说是工宣队准备先把他们几个人“解放”的打算，受到张春桥的批评，理由是：“上海作家协会没有一个人好人，不存在解放人的问题！”于是第二年他们又被“下放”到松江去劳动，边劳动边“斗、批、改”。虽然，他们通过去年“三秋”劳动，对割稻打谷之类的农活已经比过去熟练，但这没有用，他们仍是“牛鬼”，造反派依然对他和他的难友们保持着敌对的眼光，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依然经常进行无理的挑剔、刁难，在他们的

名字上仍然打上红色的大××；巴金也依然是“黑老K”和“死敌”。这就使巴金逐渐意识到，所谓“在认真劳动中争取宽大处理”原来是一句假话。看来一批知识分子在封建统治压迫下天生成的奴隶命运已成定局。

偏在这时林彪的“一号通令”下来，说是形势紧张，全国进行战备，在乡下劳动的人，谁也不准回来，这样他们就又留在松江辰山。巴金只好写信给萧珊，打算在农村过冬。一到冬天，不像“三秋”那样忙碌了，于是又加紧“斗、批、改”。有的造反派为了立功，仍想在“牛鬼”身上找岔子，他们甚至在巴金一九三一年写的一篇题目叫《给一个中学青年》的文章中，发现了“腹地”两字，就硬说这是鼓动人们去苏区搞破坏。这篇文章曾收编在一九六一年出版的《巴金文集》第十一卷里。它的内容是：“九·一八”沈阳事变后，一个中学生写信问巴金：“怎么办？”巴金回答说：“第一，我们没有理由悲观；第二，年轻人还有读书的权利，倘使不得不离开学校，应该去的地方是中国的腹地，是人民中间。”原文这样说：“我们的工作到民间去，到中国的腹地去，尤其是被洪水蹂躏了的十六省的农村。”这本来用的用意是很清楚的，所谓“腹地”，就是内地，一九三七年出版的《辞海》也有这样的解释：“腹地，犹云内地。”但是造反派硬说那是指苏区，要巴金承认这篇文章旨在反共。虽然他几次辩解，都没有用，在班组会上受到围攻，有些人存心要诬陷巴金，有些人虽知道冤屈，但在这样的场合也不敢不随声附和造反派，因为怕自己受牵累；有的人则是为了表示自己“革命”，要与巴金斗争到底。

巴金被纠缠得头昏脑胀，但造反派仍不放过他。班组学习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造反派就召开整个连队的批判会。会前，两个“革命左派”找他谈话，要他老实交代，承认反党，并对他进行威胁。巴金已经看透了这些人用美丽辞藻装饰起来的谎言和恶毒用心，他忽然感到恶心，终于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坚持“腹地”是“内地”的解释。批判会召开了，一个一个人的厉声“揭发”，一个一个人的厉声“批判”，使巴金感到十分气忿，也十分厌烦，然后又听一个人连声问他：“腹地是不是心腹之患的地区？”接着又有不少人连声追着催：“说，说，说！回答，回答，回答！”巴金忽然感到十分厌倦，他真想躺下来，离开这个烦嚣的令人无限厌倦的世界，他像驱赶一群鼓噪的麻雀，或者嗡嗡地叫着的苍蝇离开自己的身边一样，对他们说：“是，是，是！”对方又追着问：“你以前为什么不承认？”巴金迟疑了一下，然后回答说：“以前我害怕。”对方听了，非常得意：他们这些人似乎全都非常得意。因为巴金放弃了争论，他们打了胜仗。

但是真正胜利的，并不是那些不讲理的造反派。恰恰相反，巴金这次终于发觉原来这些人都在演戏，而不是在追求真理，也不是在为“正确路线”斗争，他们是在装模作样地骗人，他们都不过是一群骗子！真理并不属于他们！因而，他现在开始有了这样一个疑问：“我们的日子真会这样过下去吗？难道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真会让这些骗子们长期欺骗下去，长期横行不法下去吗？”

可怕的六十年代过去。一九七一年的春节就要来到，大家回上海休假，各人都巴望有个喜讯传到自己身边。哪知工宣队传言下来：“上面”统一布置，全市文化系统要在奉贤办“五七”干校，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接到通知，编为文化系统“五七”干校第四连，大家回去要作好长期在“五七”干校改造的思想准备。

萧珊在上海，身体愈来愈坏。巴金看着她消瘦的脸，无可奈何地把准备赴干校的实情告诉她。“你的问题什么时候能解决呢？”萧珊优郁地问他。他也只好叹息，但怕伤她的心，便说现正在写检查，看来不久可以告一段落。“总不能这样下去吧？”他像自问，又像回答萧珊。同时告诉她，他已与“革命群众”一起学习，几个人不再蹲“牛棚”了。萧珊听了，似乎心放宽了一些，就帮着他整理行装，为他缝被头，补衣服，当时家里的楼上房间早被查封，全家都挤在楼下两个房间里生活。巴金在走廊上整理旧书，却意外地发现了解放前在上海海格路旧书摊买到的一本居·堪皮的汇注本《神曲》的《地狱篇》，不觉顺手翻阅了一下，读到几段文字，好像发现了一件宝贝，便誊抄了第一曲在一个小簿子上，因为原书太厚，带着太显眼，好在现在已不像过去两年那样，除了“红宝书”之外什么都不准看了，在地里劳动感到疲乏时，或者在批斗以后，默诵一下但丁的诗句，可以鼓鼓自己的勇气。他相信但丁所描写的灵魂在地狱中受苦的情景，对照着现实，可以使自己心灵得到净化。

## 第七节 诀别

巴金和他的难友们在上海送别了六十年代后期寒冷的冬天，来到奉贤文化系统“五七”干校。面临的七十年代初春，仍是一片凄厉的灰濛濛的景象。干校地处东海之滨，奉贤县东南叫作“塘外”的海堤之外，那是一块未曾开垦过的荒凉的盐碱地，漫无边际。他们住的是新建芦苇棚，棚顶盖稻草。海边风大，吹得棚子整夜格格响。泥地潮湿，逢到下雨天，路上泥泞没膝，室内更加潮湿，床铺棉被全还潮，真是苦不堪言。对巴金他们来说，这样的艰苦生活还能顶住；最使人不能忍受的是，周围工宣队和“造反派”的脸色，比海边阴沉的天色还要难看。

干校的主要任务是劳动。巴金上了年纪，原来就笨手笨脚，一听到造反派厉声吆喝，更加胆战心惊，劳动时不免经常摔跤，有一次身子滑到沟里，连眼镜都找不到；这样的肉体与精神折磨，使他越来越瘦，也越来越老了。但他还是认认真真地劳动。这里有坚忍，有宽容；有悲凉，也有失望。有时他还与别人一起包干一块菜地浇水。别人有情绪，不肯多干；他就只好把别人应做不曾做的，自己来做。他往往做得精疲力尽，一到晚上就不免常做恶梦。几乎每夜做梦。他的床边，让一批恶人贴满了诬蔑他的标语，他不敢、也不想把它们撕掉。他在半夜里发出怪叫，因为他看到魔鬼伸出双手来捉弄他，有时甚至惊恐得从床上滚下地来，虽没有摔伤，却把别人惊醒。工宣队头头说他夜里睡不好，是因为他心里有鬼。巴金想，他自己心里倒没有鬼，鬼是在某些心怀叵测打着幌子篡位夺权的阴谋家心里。

他还经常被人押回上海去游斗，不是去哪个工厂，就是到哪个学校，因为他的名气最响，人家对他的兴趣也就最浓。工宣队和造反派头头们都说，巴金写的书最多，读者也最多，因此群众受他的“毒害”也最深，特别要对他批深批透。巴金有时几天不来干校，因为他被押到市区，就被市区的人留了下来。人们经常看到，巴金一回到干校，就立刻放下背包，头上戴起草帽，颈上围好毛巾，赶到田里参加劳动。他受到侮辱，受到责骂，习惯了，也从不反抗，他在内心已逐渐明白：“文化大革命”原是这么一回事：不要知识，不要文化，好让一批骗子在台上永远当家作主。

他不相信骗子能永远骗下去，他等待骗子们垮台。他不再祈求这些骗子来“解放”自己。春来秋去，一年又一年，到了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那天早晨，天气非常寒冷，地处海边的干校，更是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巴金忽然从芦苇棚边的广播喇叭中听到陈毅副总理追悼会实况录音，他这才知道陈毅已经去世了！他怎么也想象不出这个一向精神抖擞，身体壮健，生龙活虎似的前上海市市长竟会离开世界。这使他想到不久前，在康生、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指使下，那些造反派把“老右派”“黑大炮”等恶毒字眼加在陈毅身上的事情。这多年来，他曾经与陈毅有多少次相聚，一九六六年六七月间，在北京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中，他还看见过陈毅与周恩来在一起谈笑自若，坐在主席台上；到晚上，还摇着葵扇、冒着炎暑来旅馆看大家。哪料到这么个钢铁汉竟给这些恶人逼死！

干校的冬天，寒风凛冽，广播喇叭里播放出来的消息，比寒风还要刺人心骨。谁知当他休假回上海，新的灾难又向他袭来：他发现萧珊的健康越来越不行了。这两年来，巴金长期不在家中，她承担了社会上对巴金家庭的一切迫害。她面呈灰色，越来越瘦，情绪低落，精神萎靡。她经常躺在床上，

肠胃不适，曾去求医，医院因为她是巴金的妻子，不给她作深入细致的检查。巴金只好一再托人去医院“开后门”，虽然照了一次直肠镜，却没有查出她的肠癌（后来才知道她的癌变部位在结肠处，但那时已经迟了）。这样，春节假期一过，巴金只得嘱咐萧珊自己注意身体，又踏着蹒跚的步伐回到干校去。同在干校劳动的王西彦，这时看到巴金，发觉他困难以忍受精神上的煎熬，脸色显著变暗，劝他要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巴金也知道王西彦的遭遇并不比自己好一些，这时也就说：“你也保重吧。”但他实在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和精神替朋友们担心了，也只得说了那么一句话表达心意。只有面临难友们遇到具体困难时，他有时仍不自禁地跑过去把人家搀扶一把。有一次，王西彦因脊椎炎请假在家，还不曾痊愈，造反派就限时催他回干校，西彦只得抱病搭乘长途公共汽车赶来。巴金远远看到他的影子，就跑过去把他手上拎着的包袱接过来。

过了一些日子，萧珊的病情加重，她的肠癌实际已经扩散，但她自己和她家里的人还不知道。多亏萧珊的挚友萧荀还经常来看她，常陪同她去医院看病，但是医院离家较远，交通有困难，有时由女婿小祝用自行车推着她去求诊，有时雇到三轮卡由萧荀陪着她去，回来时雇不到车，只好乘公共汽车，但下了车仍有一段路要走，走走停停，最后即使搀扶着也走不动了，萧荀只好先跑回来，请萧珊的表侄把她背回家来。在这难捱的日子里，小棠插队到安徽农村，巴金又在干校，工宣队不让他请假回家，萧珊心里惦记着亲人，他们的前途都茫茫然，自己的身体不知是否好得了，连患的什么病，到现在还不知道。眼前看来又快到盛夏季节，尽管院子里的花树早已无人管理，但草木生机未绝，青青的叶子仍在杂乱中挣出头来，远远望过去，还是有一片绿意。小祝和萧荀以及九姑都说是否拍个电报去，让巴金请假回来陪萧珊。萧珊没有同意，她说他正在写检查，让他过了关，获得“解放”后再说。好不容易巴金休假回来，她看到他十分疲劳，同时也十分消瘦，不免回过头去，自己暗中掉泪。这次她又问他：“你的问题什么时候解决呢？”巴金含糊着也不知自己讲些什么。萧珊轻轻地说：“我恐怕等不及了！”巴金见萧珊病得这样，已经不能起床，觉得自己再也不能离开她。他一天四次为她量体温，一发觉体温高到三十九度，就忙与家人一起送她去看急诊，配药吊盐水，但还是无法住院进一步检查，只好拖着。萧珊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巴金到了假期满时，就又申请续假两次，总共还不到一个月，单位工宣队头头来催，逼他第二天就回干校去。萧珊问他：“领导上说些什么？”巴金隐瞒不了，只好实说他们要自己回干校。萧珊在床上低声说：“你就去吧。”说完话，就把头转向里面，不让巴金看到她的泪痕。这时小林和小祝听说工宣队不让巴金继续留上海，便径自跑到作协找那个工宣队“头头”，提出请求。那头头说：“他又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又说：“他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竟断然拒绝。小林和小祝闷着一肚子气回到家中，也不敢对巴金直说，怕他在忧虑中再加上一肚子不愉快。这样，巴金只好又回到干校。恰在这时，小棠接到家信从安徽农村赶回上海，他听说妈妈患病，就星夜赶来，但做梦也不曾想到离开这么些日子，妈妈竟病成这样。

巴金到了干校，心中说不出的凄楚，当天晚上他再也咽不下饭。萧珊含着眼泪的病痛一直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几乎整夜都在做梦，似乎萧珊对他讲点什么，又似乎四面八方来了各种各样的魔鬼，要把他和萧珊捆绑到什么地方去，他大声喊叫着，却看不到有什么人过来进行帮助……一到白天，他仍

跟着大家一起参加劳动，但又似乎仍在家中，看到萧珊在问他：“你的问题什么时候解决呢？”他的心神恍惚，自己也觉得只几天工夫，变老了许多……五天过去了，造反派忽然来通知：全体回市区参加大会！真像做梦一样，忽然又真的回到家中。

萧珊看到他回来，出乎意外，感到安慰，但她身体实在疲惫，一点力气也没有，一时竟讲不出话来。过后又忽然轻轻叹了口气，说：“看不到了。”巴金问她看不到什么，她才说：“看不到你解放了。”巴金听了，一句话也答不上来，抬头看看坐在旁边的儿子小棠，见他的精神也不好，垂着头，似乎力竭气沮，十分疲劳，好像身上也有一点热度，似乎患了感冒。他只有十几岁，但从他的眼睛看得出，他对这个世界已经看透。这时萧珊忽然指着小棠，忧郁地对巴金说：“他怎么办呢？”他怎么办呢？巴金也不知道。想起这几年来，为了自己头上这顶帽子，让孩子们抬不起头来，吃了多少亏，受了多少累！小棠本来在家中最受妈妈宠爱，从小高高兴兴，跳跳蹦蹦，但现在变得沉默少言，郁郁寡欢，性格十分内向，似乎比几十年前在成都老家时的巴金还要忧郁，甚至更加绝望。巴金想起两年前在痛苦难熬时萧珊曾对他说：“孩子们说爸爸做了坏事，害了我们大家。”巴金感到像一万把刀子在他心中戳着，他把满眶泪水向自己肚子里吞。这时萧珊似乎睡了一会，又醒过来，她问巴金：“你明天还去不去呢？”巴金这才想起当天那个工宣队头头曾把他叫去，通知他不用再去干校，可以留在市区。当时那“头头”问巴金：“你知道萧珊患的什么病吗？”巴金回答说：“我知道。”其实巴金并不知道。不过，他从这个“头头”的问话口气里，探测到萧珊的病已经不是一般的肠胃病。萧珊的肠癌这时已发展到肝癌了。家中对他也不再隐瞒，把实况告诉了他。

而萧珊本人还是不知道。她经朋友的帮忙，终于得到中山医院的准许，可以住进肝癌病房治疗。她很高兴，似乎有了希望，说：“我到底住院了。”巴金也只得装着有了希望一样，安慰她说：“你安心治疗吧。”这时，萧珊父亲闻讯，也来探望女儿。人们还记得四十多年前，在上海十六铺码头，他曾送萧珊上船去香港转昆明读大学；现在老人家已双目失明、什么都看不见了，但还来送女儿进医院，似乎是在向她送别。第二天早上，萧荀和小林、小祝把萧珊送进医院。临行，萧珊抬起头向屋子细细地看了个够，她大概在想着十多年前是她首先来看这幢房子，她曾为它的装饰布置花了不少心血，也在屋外的草地上亲手植过花树。这里凝聚着她和她的“李先生”共同的感情；现在她要与它分别，不知是否还能够回来。

虽然大家都知道萧珊病重，但谁也不曾料到她在医院只住了二十天，就与世长辞了。巴金在这二十天里，每天去看她，总在她的身边坐上大半日。虽每天只能听到她短短的几句话，但巴金感觉到这段日子是他自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来，既痛苦又幸福的时期。他很久不曾有这样一个与她平静地生活在一起的机会了。这几年来，他们不是分离，就是一起受到一群魔鬼的欺凌和侮辱。现在他守在她的身边，没有人来干预，没有人来纠缠。医生说：“她体弱，恐经不住手术，只要肠子不堵塞，还可以拖延一个时期。”但是半个月以后，她越来越不行，一天比一天衰弱，肚子却一天比一天大。医生说只有开刀了。开刀虽不能保证没有危险，但不开刀更不行。巴金征求萧珊同意，萧珊没有意见，但说了一句：“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她那大而亮的眼睛里全是泪水。巴金也只好呜咽着说：“不会的……”站在旁边的护士长徐月

英，这是个难得的热情的医护人员，她与萧荀、与二十年前为萧珊接过生的中德医院助产士沈庚香，都是好朋友。这时她以十分同情的声音，安慰萧珊说：“由我陪你，你放心吧。”萧珊也就说：“你陪我，那好。”这时，手术室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萧珊的表侄就把萧珊睡的车子推到手术室去。

巴金与小林、小棠、小祝都等候在走廊上。六七个钟头后，手术室的门开了，小棠就把他妈妈睡着的车子推了出来，回到了病房。看来萧珊的生命在手术台上还是平安地度过了。不过她的身体十分虚弱，鼻子里还是整天插着管子，每天都输血，接氧气，输液。当她醒过来后，发现儿子小棠站在她的身边，便回过头来问他：“你累了吗？”看到巴金，她更禁不住一次次对他说：“你辛苦了！”她没有想到小棠两天以后也病倒了，他长时期在安徽农村，因为缺少营养染上了肝炎。在这样的时刻，发生这样的不幸，巴金不免心急如焚，幸而热心的护士长徐月英不嫌这样一个额外的负担，她叫巴金专心照料萧珊，自己陪同小棠看病、验血，并为他找到瑞金医院的隔离病房，让他住进去，得到及时的护理和治疗。

萧珊在重病中知道小棠患肝炎进医院，心里还是放不下。她以后只活了三天，但三天里，几次向巴金发问：“棠棠怎样了？”棠棠在隔离病房里也在日夜惦记着他母亲的健康，他哪里知道在他住院后第三天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但人们没有让他知道。为了让他早日康复，他必须心情保持安宁与愉快。可怜的是巴金，一切担心、不安、痛苦、悲伤，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了。当他深夜回到家中，他在房间里，原与他住在一起的萧珊、小棠都离开了他，环顾四周，觉得房内特别静，特别空空荡荡，他真想抱着头痛哭一场：多么寂寞的世界，多么深不可测的社会！

萧珊终于离开了她曾经十分热爱过的人间，终于离开了她曾经日夜关心的爱人“李先生”。她临死时恰恰碰到卫生防疫站来通知巴金回家中去做肝炎病家消毒工作，代他在医院陪病人的是萧珊的表妹。这一天上午，表妹只听见躺在床上的萧珊轻微地对她说：“请医生来，”又像是说：“请李先生来。”当医生来过后，也并未发觉她有什么动向，只以为她正睡着；而当护士要为她打针时，才发觉她已悄悄地与人世诀别。当巴金在家中接到里弄传呼电话，他和小林、小祝急忙赶到医院时，萧珊已让人用白布床单包着，放在担架上，进了太平间。

三天以后，龙华人葬场一个小厅里，灵堂上，横挂着一块

写着“妈妈，安息吧”五个大字的白布条，形容憔悴、白发萧然的巴金，站在已经变了形的萧珊遗体旁，哭泣着。告别仪式，没有悼词，没有吊客，只有家属和几个亲友，这里有正在患心脏病的萧荀，以及与萧珊生前有过来往的医护人员沈庚香、夏毓华、徐君钰。还有那个在人情如纸薄的年代，却有副侠义心肠的护士长徐月英。小棠还在隔离病房里，他不曾知道最爱他的妈妈已经离开了人间。只有小林和她的两三个同学来帮助料理丧事。场内一片哀哀哭声。从远道来奔丧的北京钢铁公司技术人员马绍弥，他是巴金老友马宗融的儿子，解放前夕马宗融在上海逝世时，巴金夫妇曾把他当作自己儿子一样收养在自己家里，现在他听到萧珊去世，即使世道再衰微，人间再无情，他也要赶回来向他那个慈母样的萧珊妈妈遗容告别：也要向他那个慈父般的李伯伯说一二句安慰他老人家的话。当初他们是怎样对待“我”的，对，从北京启程来沪时，他爱人对他说：“你去吧，你不去一趟，你的心永远安

宁不了。”马绍弥是钢铁事业的从业人员，可马绍弥的心，不是钢铁做的啊！

这一年九月，天气还是十分炎热，人们还是穿着单衣上班。一天早晨，有人走过淮海中路，在甘六路电车站上看到巴金，说巴金似乎老了十岁，人瘦得像个稻草人。



## 第五章劫后重逢

## 第一节 患难见真情

萧珊逝世，对巴金是个巨大的打击，他精神沮丧，身体也比过去差多了。作协工宣队这次天良出现，不再让他去干校服苦役，但仍规定他到巨鹿路作协机关劳动、学习。恰巧这时清长假在上海家中的王西彦，因病情有好转，工宣队叫他也到作协机关上班。这样，巴金便有与王西彦在一起相叙的机云。

那时林彪反革命集团已在一年前覆灭，一家三人在温都尔汗粉身碎骨。林彪集团与江青、张春桥一伙的争权夺利，不过是一场狗咬狗的斗争，他们的丑恶面目通过“九·一三事件”已在全国人民面前渐渐露馅，写在党章上的被称作“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一转眼忽然变成叛逃出国的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头脑最简单的人也要想一想究竟“文化大革命”是在搞什么勾当，究竟要把党和人民带到哪里去这样一个问题。经过一场家庭变故的巴金，更加醒悟到自己受到愚弄，他再不像前几年那样，觉得“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对自己的“思想改造”了。

“我们有时也不可以太老实。”有一次，在作协西厅，王西彦看见四周无人，就悄悄对巴金说。

“是的，有时我们也不可以太老实。”巴金随着应声说道。

这是巴金这几年以来，几乎是第一次在家门外公开向人亮出自己的思想。说实在，他再也忍耐不住了！

这一年十月底，巴金大哥李尧枚的儿子李致给巴金来了信，给巴金带来了成都老家对萧珊去世后巴金处境的关心。在一年以前，李致就曾从北京返回设在河南的干校时，悄悄地绕道上海来武康路看过巴金。当时他与巴金同睡在一张床铺上，曾给他转述过一些老朋友对巴金的怀念。但由于受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虽同睡在一张床上也不敢深谈。在这次来信之前，李致就有信给小林，那时萧珊住院动了手术，小林曾把李致来信的事告诉她，但萧珊已不能说话了，她只点了点头，就闭上眼睛休息。这次李致来信，是萧珊去世后给巴金的第一封信。它给巴金带来安慰。

李致在成都出生的时候，巴金已离开成都去上海。他是一九四二年巴金回成都时，才有对他这个“四爸”的印象。当时住在双眼井的大家庭早已分家，他们的家已迁到成都北门荣华寺街的一条小巷里。巷子两边各有一家独院，正中的院子住着五六户人家，他们租住了两间房子。李致记得当时他和巴金睡在一张大床上，每天晚上“四爸”总是熬夜写作，等巴金写毕上床时，他早已睡熟了。四爸那时还给李致题写过自己糊制的纪念册，用毛笔写了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要做好人。”他贴在床上当着座右铭。现在这些事情，仍留在自己印象中，未曾淡褪。

现在巴金虽还不曾得到完全“解放”，但李致还是摆脱顾虑给他写信，而且以后不曾中断过，还不时给他寄些四川土产。他在当地出版社工作，虽然眼睛不太好，常在医治，却依然努力读书，经常要求巴金给他找书，帮助指点。巴金家中大部分藏书还不曾启封，而巴金总是尽可能把他要的书找到，给他寄去。其中如《太平洋战史》、《生物学丛书》、《康熙字典》等都是当时市上无法买到的。有的如雨果的《九三年》，则还是巴金早年从成都旧居带来的书，书页上还盖有巴金大哥即李致父亲李尧枚的印章。当然，这时巴金也常要求李致给他寄书。

萧珊离世后，巴金还接到了一些老朋友的来信。虽说许多朋友在“文革”中都自顾不暇，但一听说萧珊去世，有的人还是来信慰问，他们忘不了萧珊生前待人热情，也想象得到巴金这个时候该是多么悲枪。最早来信的是杨苡。她在“文革”开始不久，就写过信给巴金夫妇，但没有得到回信，因为当时巴金已经靠边，红卫兵的铜头皮带已让萧珊尝过“文革”的滋味，杨苡的信他们只好不复了。但是杨苡在自己经受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批判、围攻，过了几年失魂落魄、六神无主的生活，在一九七二年四月被宣布“解放”之后，便四处打听巴金夫妇的下落。她听说巴金夫妇已被赶出武康路旧居，也就只好暂时按兵不动，看看有没有机会打听到他们确切的讯息。到了那年十月，忽然听说原作协上海分会秘书长孔罗荪还在奉贤干校劳动，她便写信去问罗有，附了一封给巴金夫妇的信托他代转。罗苏当时自己还没有“解放”，看到杨苡的信，不免提心吊胆，但终于还是鼓起勇气给她复了信，说：“十月八日来信已收到。得悉近况甚慰。附信未能代转，因有所不便，想当能见谅。李己于八月初即离干校返沪，当时因陈蕴珍患病甚重，由他去照顾，而陈因所患癌症，已于八月中旬不幸去世。故李即留在上边，未再下来。他仍住武康路原址，问题尚未解决，此信是否要发，请你考虑。如写信去，也不要提到曾要我转信一事。陈去世一事也不要提是谁讲到，免得麻烦。原信附奉。小林已结婚，也住在他家，小棠在农村。我仍在干校，因问题尚未最后解决，通信多所不便，请不要再来信，容俟解决，当再奉告，以谢关怀。余不一一。祝好，荪。十月十四日。”罗有的信，很写出了他当时战战兢兢的心情，但也流露了他对巴金一家的真诚友谊。杨苡得到他的信，了解了巴金一家近况，对萧珊的去世感到很大的悲痛，对巴金的境遇也非常同情。同时她也完全理解罗苏目前的处境困难，她没有直接写信给巴金，却写了一封信给李小林，她以自己老友的感情，表达了她在知道了萧珊去世后自己对她的哀思以及对他们全家的慰问，并劝巴金不要过分悲痛，影响自己的身体。巴金就在这一年十一月四日，用“李尧棠”的名字回复了杨苡一封信，信是这么写的：“静如：看到你给小林的信，很感谢你的关心。我还记得文化大革命初期你寄过一封信来，我当时已靠边，无法回信。这些年我和蕴珍也常常惦记你们一家，可是一直无法知道你们的情况。我想总有一天会得到你们的消息，蕴珍也是这样想，但是她等不及，病故了。我身体较好，也比较想得开，受到的冲击也不算太大、在于校住了两年半，因照料蕴珍的病，回到上海，就留在上面，仍在靠边，每天到单位学习（自学）半天，开始在认真读书，学习马列主义。我的情况还算不错，你用不着为我的健康担心。小棠在安徽插队落户，今年七月回沪探母病，带来急性肝炎，不几天就进了隔离医院，现在在家养病，还得住两三个月。我两个妹妹都在家里（瑞珏去年退休了）。我们仍住原处，只是楼上房间加了封，大家都住在楼下。以上是我们一家的近况。别的话将来再谈。瑞蒸还好吧。问候他。”

第二年五月，杨苡借了个名义向学校请了几天假，从南京来到上海看巴金。先一日，她给巴金的妹妹瑞珏去了封信，告诉她乘的火车班次。所以当天中午，李瑞珏就与小林到北站去接她。在车站，杨苡见到多年不见面的小林，觉得她的体态、动作、声调越发像萧珊了，但为了避免触动双方的感情，大家只问了眼前的一些生活情况，一句话也不提到萧珊。她们在车站附近一家点心铺各吃了一碗汤面后，便乘公共汽车换电车到高安路，然后三人又默不作声地步行着，经湖南路转到武康路家门前。那扇油漆剥落的大木门已摇

摇欲坠，但它对杨苡是多么熟悉。出来开门的是巴金的九妹李琼如，她看到阔别多年的杨苡，很自然地想起曾与杨苡十分亲近的萧珊，禁不住两眼出现泪花。她告诉杨苡：“四哥听说你来，到菜场找老母鸡去了。”

九姑妈的话，使杨苡的心头浮起三十多年前的旧景：那是在战时重庆，她与她的诗人丈夫赵瑞蔚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来看巴金夫妇，晚上她与萧珊睡在同一张床上，两人谈悄悄话谈到半夜，早上起来就迟了；而巴金却在办公室写稿，写个通宵，一早还为他们安排早餐，又上街买了几个咸鸭蛋来招待客人，但是想不到有个鸭蛋有股臭味，萧珊就笑着嚷起来：“好啊，李先生用臭蛋招待客人！”惹得文化生活出版社经理田一文他们也与客人一起哄堂大笑。巴金也只好笑着埋怨萧珊：“你看，你看，真是，真是，你们讲了一个晚上话，早上起不了床睡懒觉，还嫌我招待不好……真是，真是……”这三十年前的往事还在眼前，而现在却再也看不到当年穿着矮领子花旗袍的那个爱热闹的萧珊了。

此刻，只见巴金手里提着一只老母鸡进门来，哎，他的头发已全白了，还不到七十岁啊！杨苡强忍着泪水从眼里掉下来，问他这几年好，只见巴金掉转头，也不正眼看一下客人，尽说着在于校劳动如何苦中作乐，还不断反复说：“我还好，我还好！没有像老舍那样挨打，这里还好，还好！”他把眼镜不时取下来，还用左手擦着眼角溢出来的水珠，说是眼睛不好，牙齿也不行。楼上房间还贴着封条，他们的谈话也有相当一部分贴着无形的封条。双方还是一句话也不提到萧珊，虽然实际上萧珊的身影在大家脑子里仍留着，从来一刻也不曾离开过他们，但是巴金还是说干校怎样劳动。九姑说：“四哥锻炼得能干了，他在自己家草地上种了蚕豆，你来得及，看明天我们请你吃新鲜蚕豆。”当晚杨苡就在巴金家住下来，她和九姑、十二姑住在一个房里。巴金还提醒她说：“你是作为李瑞珏的朋友来看她的，免得发生误会。”杨苡懂得巴金的意思，知道他还不曾“解放”，怕会给她招惹来意想不到的麻烦。

到了深夜，杨苡才从瑞珏和琼如嘴里听到有关萧珊这几年来情况。九姑还从墙边的箱子里拿出一叠照片，其中有几张是在龙华人墓场为萧珊举行丧仪的那天照的。杨苡看到放在停尸床上的萧珊遗体，紧闭着两眼，头发梳向头顶，静静地躺着，好像正在睡眠中。巴金站在旁边，控制着自己的感情，痛苦地注视着已经停止了呼吸的萧珊。小林则坐在灵堂的一个角落皇哀地哭着，杨苡似乎听到她正在喊着她的“姆妈”。杨苡一张一张地看着这些照片，其中不少还是萧珊生前的照片，有许多镜头中的生活，是杨苡十分熟悉的。这个晚上她无法入眠，她想象不出她的朋友这几年来过的是怎样痛苦的生活。无数的往事在她的眼前重现，而现在，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她禁不住自己的眼泪，掉落在这个尚未脱离苦海的家庭为她准备的棉被上。

和杨政一样，在听到萧珊去世后即来信向巴金问候的有老友叶圣陶、茅盾，也有黄源。黄源是上海解放后第三天就来巴金家中访问的中国共产党人，而在一九五七年，就给戴上了“右派”帽子。“文革”中他在浙江的艰难处境是可以想象的。当他知道了萧珊离世，想这将对巴金是一个怎样巨大的打击。抗战前他和巴金在上海一起办刊物时，就隐约听说过巴金在爱国女中有一个对象，似乎也曾见到过萧珊一次，那时她还是年轻的姑娘，而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上海解放时，他看到了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美满的小家庭。他知道巴金与萧珊的感情非比寻常，在“文革”这样一个天昏地暗的动乱期间，

巴金在各方面所受的打击已经够重了，还要遭受这样一个不幸，他经受得住吗？所以就在当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他自己刚刚得到“解放”的时刻，便迫不及待地写了信给巴金，表达自己对巴金处境的同情。同时还给他寄去自己一张照片，希望能给久不见面的巴金一点安慰。巴金接到这封信，对几十年的老友的感情，从心底感动。他给黄源写了封回信，表示自己的高兴，他说：“看到你的照相，就像看见你本人一样。”然后，巴金又向他陈述自己的近况：“我很好，身体虽然比前两年差一些，但是血压不高，也没有什么大病，现在每天到机关上班半天，其实并没有什么事，就在西厅自学，看看书。我们这里靠边的人还有十多个，都在等候结论。我下午在家念点书，或者做点家务劳动（不多，或买点菜），书倒是读了些。我还是住在原处，不过现在搬到楼下（楼上和那里的书都封起来了）。个人生活也不算坏。”最后，巴金终于提到萧珊，他对黄源说：“蕴珍比我年轻十几岁，倒想不到她会离开我，她的逝世对我是个大的打击。但我还是应当好好地活下去，还想在问题解决以后回家选一两部比较有用的西方名著慢慢地翻译。”

巴金当时向黄源表示“想在问题解决以后回家选一两部比较有用的西方名著慢慢地翻译”的这个理想，在半年以后才总算勉强实现。那是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当时“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牌子早已“砸烂”，原作协单位已被并入“文化四连”，有一天上午，工宣队员、“四连”党支部书记把他叫到东厅，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笔记本，向他宣布了“市委领导”决定，说根据“上海市委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常委冯国柱、金祖敏六人的联名签署，巴金的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分子帽子，发给生活费”。这几句“四人帮”的语言，所谓“不戴帽子”实际上是一顶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显然存在的帽子。当时巴金只好闷声不响。他无法提出抗议，也无法提出质询，只在支部书记问他有什么打算时，他就说了一句：“我可以自己做点翻译工作吧。”因为他想到在“文革”前自己曾开始改译屠格涅夫的《处女地》，而且已经开了头。当时支部书记不曾回答，但过了两天后在学习会上向大家宣布关于巴金的处理“决定”时，就在“决定”的最后加了一句“做好翻译工作”。以后，巴金一有空便躲到楼上小屋拿出那本《处女地》进行翻译。但译完了，也并没有人来过问。接着，他就准备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这本书内容非常丰富，从各方面反映了十九世纪上半叶俄罗斯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景象，从历史画面上刻画了高官显贵、大小知识分子以及奴婢、农奴的形象，以生动的语言鞭挞了以镇压十二月党人起家的尼古拉一世的黑暗恐怖统治，指出沙皇君主制度和农奴制度的罪恶和它必然走向灭亡。巴金从这本书中看到“四人帮”的影子，他译这本书正是想把这个影子在中国读者面前显露出来。他每天翻译几百字，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他相信这些人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虽然他们到现在还不曾放松对他的监督，但他已经不像“文革”初期那样喝了迷魂汤似的被“天王圣明”迷住了。

这时恰好黄源派自己的儿子到上海来看巴金，并给他送去杭州龙井新茶，巴金就把自己被宣布“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及从事翻译工作的情况写信告诉了黄源。以后黄源来信更勤了，两人各从对方的信中汲取了友情的温暖。第二年即一九七四年春天，黄源还与楼适夷到上海两次来问候巴金，可惜这个时期又搞什么“批林批孔”，巴金又得每天去参加学习，并不得不跟

着大家写些大字报，因此适夷来他家中看他，竟然没有碰到。到了这一年五月，巴金的女婿祝鸿生由上海戏剧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杭州市文化局工作，巴金叫他抽个空去拜访黄源。黄源看到小祝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地对待，还请他在自己家里吃饭。

这时期小林已在上海生了个女孩，名字叫做祝云立，就是后来巴金《随想录》中写到过的“端端”。端端出生的时候，正碰上林彪反党集团垮台，其后“四人帮”又千方百计地想夺周恩来、邓小平的权，他们一时腾不出更多的时间来继续勒紧知识分子的脖子，使知识分子得以在这个当口稍稍喘口气。但巴金虽被宣布“发给生活费”，实际不过是获准可以在每月到银行提取自己被冻结的存款三百元，其中还包括房租一百四十五元。在这样的情况下，巴金还维持着萧珊父亲每个月的生活费五十元，所以他的日子仍旧过得十分拮据。当时小林还不曾分配工作，小棠在安徽农村插队，个人的生活都有困难，外孙女的出生，又不得不临时找个照料产妇的阿姨。就在这个时候，李健吾的大女儿维音来上海出差，晚上到巴金家，给他带来人民币五百元，说是汝龙送的款子；而汝龙后来在信上却说是李健吾出的主意。隔不多久，健吾的二女儿也出差来上海，她也给巴金带来赠款三百元。虽然汝龙与健吾给巴金捎来这些钱，都出于对巴金过去恩情的报答，但是巴金从心底感激这两位老友的雪中生炭。

小林刚进医院临产的时候，沈从文忽然到上海来看巴金。巴金见到多年不见的老友，一时竟不知话该从何说起。他还记得三年前在奉贤“五七干校”学习劳动，有一次被揪回上海接受批判，批判后第二天一早到巨鹿路作协学习，刚在一间被指定的屋子里坐好，一个年轻姑娘走过来问他是不是巴金，说她是音乐学院附中学生，沈从文的亲戚，从文很想知道巴金是否仍住原处。巴金听说从文一家平安，心里很高兴，但他不敢与她多谈话，怕别人说他搞“串连”，所以只回答了一句“仍在原处”，就让她走了。过了几天，巴金又从上海回奉贤干校，却又见到这个姑娘，原来她们单位也在那边，姑娘说沈从文把巴金的地址遗失了，要他写一个交给她转去。巴金心中顾虑很多，考虑了几天，才终于把地址交给她。沈从文知道了巴金的地址，很快写了封满满五张信纸的长信来，讲了不少朋友的近况，最后说：“熟人统在念中，便中也希望告知你们生活种种，我们都十分想知道。”当时萧珊还活着，但已经病倒在床上，她比巴金先看到这封信，她拿着这五张信纸反复地看呀看，禁不住噙着热泪说道：“还有人记得我们啊！”巴金心里也很感激从文在这个时候还像三十年代那样关心他，但现在他正在水深火热中，“四人帮”放在上海的看家狗还把眼光紧紧地盯着他，而萧珊又病得这样，因此他未曾给沈从文捎去片言只语，甚至在不到两个月后萧珊去世时，他也不曾写信告诉从文，因为当时自己还是个审查对象，没有通信自由。现在从文还是让女儿陪着他来上海看他了，虽然他已患有心脏病，但还是像过去那样脸上露笑，像是没有经过这场昏天黑地的运动那样。巴金不禁为他的坦荡情绪感染，两人把藤椅搬到走廊上，毫无拘束地谈了个痛快，对巴金来说，他好久不曾在这样的气氛中谈话了。

这一年旧历十月十九日，琼如、瑞珏、济生和萧荀他们，又开始为多年不过生日的巴金做寿，给长期在凄怆的生活中过日子的巴金带来了一点安慰。以后，巴金还接到沙汀从成都给他寄来辣椒面和花椒面，礼轻心意重，友情可贵。这时，巴金又收到诗人杜运燮的来信。杜运燮是福建古田人，出

生在马来亚，曾在一九三九年与萧珊在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同学，毕业后担任过香港《大公报》和《新晚报》编辑，还在上海《文艺复兴》等刊物发表过诗作，一九五一年回大陆在北京新华通讯社工作，“文革”中也受过审查。他听说萧珊去世，就写信来向巴金慰问，巴金知道他欢喜诗，萧珊在世时看到上海偶有《唐诗三百首》出版，知道这对长期生活在沙漠样日子的诗人是个多大的喜悦，也就买了一本给他寄去；萧珊去世后，巴金还为杜运燮陆续寄去新出的《陆游诗选》和《杜甫诗选》，他给杜运燮复信说：“蕴珍病中也常常想到给您寄书，但当时实在找不到中国诗集，后来找到一本就寄一本。”他还告诉杜运燮，萧珊在世时寄出的那本《唐诗三百首》也是巴金代她封寄的。杜运燮在知道了巴金的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后一年，他也来信告诉巴金有关自己的“好消息”，即他已结束了农村锻炼的生活，领导已宣布他“复职”，去临汾山西师范学院外语系任教。巴金写信去向他祝贺，祝他一切顺利。

又过了一年，到了一九七五年。当时巴金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已译了十多万字，黄源曾请他到杭州去相叙，因为巴金自从一九六六年陪亚非客人去杭州以后至今还不曾离开过上海一步，但是巴金还是鼓不起勇气。后来黄源自己来上海，他住在他的女儿家，一到上海就来看巴金，巴金也作了回访。老朋友劫后重逢，回首前尘，不胜感慨系之！黄源回去后，巴金还是很想去杭州一次，看看浙江的山水和一些老朋友。特别是方令孺，他曾请小祝去看过她，告诉她关于他的近况。她快八十岁了，虽然仍然住在原来的地方，但是一半住房被占，她的女婿死了，女儿身体不好，很少理她，曾给巴金写信，说自己晚景很寂寞。但巴金由于自己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终于没有应黄源之邀去杭州顺便去看方大姐。幸而后来李小林也被分配到杭州《浙江文艺》杂志工作，她有时也与小祝一起去白乐桥看方家的“九姑妈”，给她带去一点温暖和安慰。小林还记得几年前，自己也曾与同学到过外地串连，经过杭州，在方家九姑妈那边住过一个晚上，虽然九姑那时已经靠边，她仍热情接待她，还借给她零用钱。可惜的是现在小林夫妇来杭州工作后，十分忙碌，到方家的次数不多。

到了这一年秋天，有一个上午，巴金到巨鹿路“文化四连”学习。像两年前向他宣布“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样，那个支部书记又在门口把他叫住，让他跟着到东厅，这次不但仍没有什么文件根据，连笔记本也不曾拿出来，只是口头上向巴金宣布把他“分配”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工作，叫他自己去报到。巴金在作协原不曾领过工资，并无“工作”的义务和负担，而且现在已经七十二岁了，即有工作也该退休了，而他们仍“分配”他到出版社“工作”。巴金虽没有反对，但他要求单位写封介绍信说明自己年老多病。第二天，他拿着信到人民出版社组织科报到。他们看到巴金，似乎已作好准备，一开口就叫他到编译室工作，而作协其他分配去的人都留在文艺编辑室。巴金想，看来自己已经被规定不让搞创作，赶出文艺界了。这次他回到家里，躺在藤椅上左思右想，不免有点悲愤。这几年来他看够了“军代表”“工宣队”和造反派的表现，“文革”开始时他对偶像的迷信和崇拜，已逐渐幻灭。他现在除了害怕，再也不相信他们所宣扬的东西了。他回想这些年自己的形象，放弃了人的尊严和做人的权利，低头哈腰甘受侮辱，把接连不断的抄家都当作自己应受的惩罚，甚至想通过苦行来改造自己。他越想越后悔，越瞧不起自己，下决心不再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别人。到了编译室，他声言自

己身体虚弱，不能工作，只能一个星期来两天参加学习（确实，这个时期他的眼睛也不太好，也许泪流得太多了。医生说他的泪管阻塞，需要通。影响了他的视力。）接待他的是管业务的负责人，同意了巴金的要求。后来巴金参加编译室的学习，发现这里的空气比“文化四连”好多了，人们在这里虽然有时也不免要照着报纸社论表表态，但他不再有一开口就受人围攻的危险。同时他在这里也从个别人身上看到一点正气。也有人经常在学习会上发言，不甘心讲假话，以致引人注目。而巴金为了怕麻烦，仍与大家很疏远。

有一次，有机会参加大会听报告。在会场上，巴金还是十分孤独，虽然有些熟人，但差不多每个人的心境都围了一道墙，很不容易相通。恰在这时碰到赵超构，巴金与他已有好久不见面了，他现在分配在辞书出版社工作，还重又当上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他走过来和巴金打招呼，约他散会后一起出去。后来他们一同到会场附近的红房子餐馆吃饭，谈得很亲切，虽然由于巴金头上还有那顶“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无形帽，林放思想上的“紧箍咒”当时也还不曾全部放松，两人谈话笑声不多，却还是谈到了他们在“文革”前共同的朋友金仲华与陈同生。虽然这两个朋友都已含冤去世，而这样一次谈话，却使巴金感到在寒冷中的温暖。

在编译室，只有满涛是巴金的老相识，虽然与他无深交，但在一九四四年，他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主管编辑工作时，曾由李健吾介绍审编过满涛译作，即契河夫的四幕剧《樱桃园》。解放后，在政协学习会上，或在什么演出场合，两人也有点头招呼的机会。现在巴金从“文化四连”带着“创伤”被“分配”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来被“控制使用”，在这里人地生疏，满涛一看到他，却满脸笑容，跑到他身边来表示欢迎。他有说有笑还学着用四川话和巴金对话，使长期在单位受冷遇的巴金感到十分亲切。谁知道一年以后，即一九七六年夏天，工宣队根据他们的上级指示，竟把这个工作踏实、为人善良的翻译家满涛无端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甚至在毛泽东去世的时候，大家到文化广场吊唁，也不让他参加，叫他留在单位里，不许他“乱说乱动”。而当他说自己“不是反革命分子，不会乱说乱动”时，工宣队又给他硬扣了一顶“翻案”的帽子，动员大家对他进行“批判”。巴金为此，感到非常悲愤，但又无可奈何。

也就在这个时候，巴金的女儿小林和女婿小祝从杭州回到上海来过国庆，说九姑方令孺已患肺炎住在医院里，他们去看过她，她已经认不出他们。而实际上，正当小林向巴金陈述方大姐病状时，她已经撒手西去了！

世界上令人遗憾的事情是不不少的。上苍无情，竟然不让方令孺这样的好人看到使全中国人都笑逐颜开的那幕大喜剧——“四人帮”的灭亡！



## 第二节 乾坤扭转诉衷肠

惊天动地的一九七六年，给国家带来了巨变，也给每个家庭带来了变化。先是一月九日早晨，巴金从床上打开收音机，忽然被一阵哀乐声音愣住，还不曾意识到这是怎么一回事，只听见和他同睡在一间房里的小棠惊呼：“总理！”果然周恩来总理去世了！一时这两代人都说不出话来。当然，这对巴金是更大的打击。周恩来一直是他期望的人。他认为只要周恩来活着，一切就有希望。眼前昏天黑地的现象，终将由周恩来把它收拾干净。正因为他对周恩来有绝对的信任，所以他一直听他的话，加紧自己的思想改造。即使现在已经看清了那些“革命造反派”的真面目，他还不曾绝望，他把希望寄托在周恩来身上。虽然他在报上看到周总理的脸一天比一天消瘦，他还是期望有一天能见到这位令他从心里感激和信任的人，让他知道自己这十年来的情况，向他诉说自己的真诚，和自己对他的想念。在长期动乱中，巴金曾经在一张小报上看到张春桥对造反派的谈话记录，张春桥说上海文艺界有不少通天的人，一有动向，他们就向北京通气，现在他已经与周总理打过招呼，不让周总理来管上海的事。这使巴金更加想念总理。他知道周恩来与江青、张春桥有斗争，而且斗争很隐蔽，很复杂，周总理心里一定十分痛苦，但又无可奈何。如果没有周恩来，“文革”中被整挨斗受冤屈死的人肯定还要多。巴金总在心里暗暗祝愿周恩来身体健康。

而现在周恩来去世了，什么都完了！巴金感到绝望。他料想以后江青、张春桥这些人将更加猖狂，但不知道他们在上海的那些看家狗们将跟着他们的上级又将在老百姓面前翻什么新花样。好在这时小棠已有可能从农村调回上海，因为自从去年小林分配到杭州在《浙江文艺》工作后，上海家中只剩下三个老人和一个婴孩，这就是巴金和他的两个妹妹以及新生的外孙女端端。这样，小棠就要求从安徽嘉山县农村调回上海，照顾家中老小。后来，小棠几经交涉，终于在这一年夏天把户口转回上海，在街道团委青少年教育组帮了一段时间的忙，最后被分配到益民食品三厂罐头车间当工人，每天的工作是把罐头推到蒸气室去消毒。小棠在农村吃过苦，他对现在的工作还满意，因为现在他每天还有时间可以自修法文和英文。

巴金除了按日译几百字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之外，还把自己的感情寄托在与一些亲友写信上。这时李致常有信来，他有时还代沙汀和巴金传递口信，互通问候。巴金在给李致信中，也偶然有一些地方透露自己的内心感情。在这一年七月，朱德去世后，巴金就在给李致的信中谈起这件事，他说：“朱总逝世，我感到悲痛，他虽然九十了，可是看起来还很健康，想不到一下子就离开了我们。二十年前在柏林中国大使馆里我和他同桌吃过饭，后来在人大小组会场上谈过话，他的四川口音比较重。他的确是个伟大的革命战士。”萧珊生前的同学杜运燮、查良铮，都成了巴金通讯的对象。他总是把小林、小棠的工作、生活境遇告诉他们，因为他知道萧珊的同学怀念萧珊，把孩子们的情况告诉他们，是会使他们得到安慰的。当唐山发生大地震波及天津时，巴金也很关心查良铮的安全，曾写信去询问，因为这个曾用“穆旦”笔名写诗的人，在天津工作。从北方到上海避震的朋友来看巴金，告诉巴金他们在北京瞻仰周恩来遗容，发现周十分消瘦时，巴金与客人都禁不住低下头来，互相不让对方看到各人脸上的眼泪，大家心里明白，周恩来总理为扭转“文革”黑暗局面，曾付出多大的代价。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

文这些人却不让大家戴黑纱，不许大家开追悼会，人们只能冒着严寒站在长安街上等候灵车，呼唤“总理”，表示哀悼。巴金听了北方朋友讲的话，他到了晚上自己也就做起梦来，跟着瞻仰遗容的群众走向周恩来总理遗体告别。他似乎也看见了总理消瘦的脸。巴金在床上醒来，禁不住咬着自己的嘴唇，用手搔自己的胸膛，似乎有一团火在自己的心里燃烧。他怀着深仇大恨诅咒这一伙无恶不作的黑帮早些灭亡。这些日子来，他一直回忆着逝去的岁月，想起与周恩来总理在一起的日子，和他对自己说的那些话。而现在，一切全都过去了。

但是人间许多事情都难以预料。这年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忽然天翻地覆，乾坤扭转的时刻来到了！那是一个静静的中午，巴金正坐在藤椅上闭眼小歇，老友王辛笛忽然匆匆赶来，显出几十年来从来不曾有过的兴奋神情，跑近巴金身边，压低声音，对巴金说道：“外边的大字报看到吗？”

巴金三十年代初期在北京编《文学季刊》时认识王辛笛，当时王辛笛在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以后又到英国去留学，回来后就一直住在上海，在光华、暨南等大学教书，后来从事金融工作，建国前转入轻工业部门，但仍与巴金有交往。他的诗熔古典诗歌与外国现代派诗风于一炉，思想感情真挚，表现手法多样，很受巴金赏识。“文革”一开始，人家都把他当作“资本家”来整，最后将他下放到益民食品厂当图书馆管理员。恰好是李小棠后来进的那个工厂。他对巴金的友谊难忘，一直想来看他却又始终不敢上门，后来在厂里从小棠那里知道巴金有了“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才偷偷地来看过他几次。这次他在淮海中路看到不知什么人贴的“四人帮”垮台“快讯”，激动兴奋得心跳步快，终于放胆来向老友报喜。巴金和辛笛一样做梦也不曾想到就这么干脆“一举粉碎‘四人帮’！”午晌困意顷刻丢到九霄云外了。

“真有其事，太好了！”两个人的脸上都露出笑意，好像阴沉的天空忽然透露出明亮的阳光来。啊，这真叫人高兴啊！

辛笛走后，巴金耐不住等候小棠从厂里回来，自己出门去看淮海路上的热闹，当他走到襄阳公园附近，只见人山人海，许多人在看各种各样的招贴。有标语、有漫画，也有抗议书，更多的是揭露性的报道。在公园的转角处，他看到一张高高贴产墙上的大字报，就抬起头看起来。也就在这时，忽然觉得背后有人拍他的肩肿，回过头去一看，是黄裳。黄裳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文革”开始，就不曾与巴金联系过，只在两年前为了陪一个北京的画家来看巴金，他才有过一次到巴金家中的机会，当时七年不见，黄裳不但发现巴金已经把客厅、卧室和书房并在一个房间里，而且他的头发全白了。他们这次来看他，事先还办过手续，当然见了面也无法谈心。只两枝烟工夫，互道“保重”，就离开了。现在形势已与两年前不同，但长期压在心头上的无形禁令，仍把他们隔离着。“你好！”“你好！”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对话。但是虽然这样，两人的心境是同样的，“四人帮”的覆灭给大家带来心头的阳光，有希望的日子开始了，一场压抑人性、灭绝人性的运动终将结束，罪人终将受到惩罚。

就在这一九七六年冬天，巴金禁不住心头的喜悦，写信给他的侄子和几个朋友谈“四人帮”垮台给他带来的无限兴奋和无限信心。他对李致说：“砸烂‘四人帮’，为民除害，大快人心。人民去高兴。上海是‘四人帮’经营了十年的黑据点，爪牙不少，问题也多……‘四人帮’垮台，我晚上睡觉比较放心了。”他对杜运燮说：“‘四人帮’揪出来，除了四害，于国于民都

是大好事。对我来说，他们是压在我头上的一块大石头，过去我担心他们总有一天会压死我，但是我并不怕，我只是小心避免刺激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完蛋了，真是像俗话说：‘时候到了，一切都报。’他们太坏了，也太臭了！上海是他们经营多年的黑据点，爪牙太多，搞起来花费时间，但总得彻底搞，搞清楚，现在当然先抓工交、财贸方面，文化出版等系统运动还得慢慢搞。群众起来了，领导动不了，因为上面还有爪牙在。这次搞运动是有领导的，为了把运动搞好，群众也沉得住气。报刊上已经发表了不少好文章，会逐渐澄清让‘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巴金还在当年十一月四日，对他的老友黄源说：“‘四人帮’揪出，大快人心，真是为民除害，你去年讲的那个‘小道’，现在成了大道了。真是‘特大喜讯’。”他又对在《光明日报》工作的老友福建泉州人黎丁说：“我一家都好。‘四人帮’揪出后，我也感觉到头上的大石搬掉了，连睡觉也安稳得多。我的问题也有彻底解决的时候了。罗荪、柯灵、王西彦他们也是这样。”巴金的胞弟李采臣远在宁夏银川，出于手足之情，这几年也曾几次将当地特产枸杞寄给他。以求对他的四哥双目保健有所补益。在这一年十月二十八日，巴金也就给他写了信，像报喜讯似的，他给采臣报告好消息：“砸烂‘四人帮’，除了四害，大快人心。人民无不高兴。党中央已经派了三位领导同志到上海领导工作，工作组到了各组办，‘四人帮’的黑爪牙这次可以肃清了。”他又在那年十二月，给在北京的翻译家老朋友汝龙写信，他说：“我还每周按时到单位参加学习，最近揭发声讨‘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行，开会的时间多一些。揪出‘四人帮’，全国欢庆，人心大快。你也想得到，他们压在我头上，像一块大石头，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但现在他们完蛋了，真是永世不得翻身了。我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不过总会解决的，希望有了。国家和人民前途十分光明，个人的问题也容易解决。我仍在译书，但进行得很慢。”就在同一个时候，巴金的另一个朋友徐成时写信给他，要他写申述信，找有关人谈谈情况，以求问题彻底解决，巴金回信说：“我考虑了一阵，觉得还是静候为好，我自己不想讲什么，更不想申述。但我估计会有人来清查的（清查‘四人帮’干的坏事）。我不讲，也可能别的人会讲，因为旧作协还有几个人也是吊着没有彻底解决，而且吴强至今还在靠边。倘使大家都不讲，也没有人来过问，那么就让历史来裁判吧。这一点我倒有充分的自信。反正‘四人帮’已垮台，他们（特别是张春桥、姚文元两个坏蛋）再也害不到我了。除了四害，国家前途很光明，充满了希望，我能够安静地活下去，就非常满意了。”

巴金对时局的估计没有错，一九七七年一开始，窃踞在文化新闻出版系统做头头的“四人帮”爪牙陆续被撤换掉了，到了四月中旬，有个晚上，市委有关部门新的领导人洪泽、马飞海来到了巴金家中，向他正式宣布“四人帮”对巴金的“结论”应该撤销，同时又吩咐工作人员来把他长期被封的房间和书橱都打开，并通知出版局要旧作协清理组将巴金过去被抄去的东西一一归还。当时柯灵和工西彦被封房间也已启封。柯灵是由于电影局领导向作协清理组交涉后才把房间启封的。王西彦则出于义愤，毅然把被“四人帮”无理查封的房间主动打开。这时只有倒霉的吴强还没有得到“解放”。

过了一个月，即这一年五月中旬，《文汇报》的文艺副刊编辑，就是二十年前巴金访问成都老家回沪后曾向他说过“我总觉得拍了一个作家头衔，而写不出一部像样的作品，是愧对人民的”这样一句话的那个记者，这次又来到巴金家中，他希望巴金能在停笔十年后，重拿起笔来写文章。巴金表示

犹豫，他一时竟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似乎也不想在这个时候在上海报纸上写文章。但是这个编辑和他同来的一个正在报社从事清查工作的老报人也是巴金的熟人，一再要求巴金动笔，并告诉巴金报社人事已有变动，以及读者对他的迫切期望。“读者多少年不曾读到你的文章了，你就用写信的形式来和大家谈谈心吧。”巴金终于接受了这个编辑对他的要求，开始结束了他十年的沉默。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五日《文汇报》副刊终于发表了巴金在“四人帮”粉碎后的第一篇文章《一封信》。这封信约五千字，一开头就诉述了自己在“四害”横行中的遭遇，他说：“过去我只能在书中读到的或者听见人讲过的一些事，现在我都亲身经历了；有些事则是过去我不相信会有，而现在我的朋友终于遇到了的，如杀人灭口、借刀杀人之类。十年中间我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只写了无数的“思想汇报”，稍微讲了一两句真话，就说你翻案。连在日记本上写了几句简单的记事，也感到十分困难。我常常改了又改，改了再改，而终于扯去，因为害怕连累别人。我知道我只有隐姓埋名地过日子，让人们忘记，才可以躲开黑帮们的大砍刀。他们用种种的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对付我，处心积虑要使我以后永远不能再拿笔。”

巴金还在信中谈起“四人帮”最后只许他搞点翻译，以示“宽大”，而他想起四十一年前，曾经告诉鲁迅先生自己准备全译赫尔岑的一百几十万字的回忆录，这样就开始译《往事与随想》，现在他“越译下去，越觉得‘四人帮’和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尼古拉一世相似”，因此他每天翻译几百字，他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他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因为他们作恶多端，已经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了。

人们应该想象得到，《一封信》发表的时候，粉碎“四人帮”才几个月，当时“四人帮”在政治上虽然垮台了，但对他们的批判还不曾开始，他们长期进行法西斯统治的思想影响还存在，特别在文坛上，还是一片沉寂。巴金的这篇文章充满了他那长期受压抑的对“四人帮”的愤怒之情，一如山洪暴发，猛烈地冲击着敌人在十年“大批判”中为读者设下的各种阻碍思想前进的破烂防御。这是全国作家、艺术家对“四人帮”的第一声血泪控诉。巴金在反击敌人中的无畏精神，顷刻之间震动了天地，一时成千上万的读者来信拥向编辑部，单是请编辑部转交的直接写给巴金的信，几天之内就有一百五十多封，至于写给编辑部的，那就更难以计算。这些决不是平时一般的读者反应，也不是一般的慰问信，而是千万读者出于至诚的倾心之谈。这些信有的情文并茂，长达万言，向他倾诉了十年中自己的痛苦经历；有的出自巴金作品的忠实读者，他们字字血泪，告诉他由于读他的小说，几年来被整得家破人亡；有的情辞恳切，知道巴金正在从事翻译赫尔岑著作，说自己也懂得几种语言，今后愿多方面提供资料，做他翻译工作的助手；当然更多的来信，是重新读到巴金作品，知道他还健在，而禁不住额手相庆，欢天喜地，表示自己由衷的高兴，并期望他继续为千万读者写作，听到他发自内心的最强音。

《一封信》的反应热烈，其接触到的广度与深度是那个文艺编辑几十年从事文学副刊编辑工作所不曾遇到过的。按理是完全应该在第二天报纸版面上有所反映。但是很显然，由于报社编辑部领导思想发展也有个过程，这样一个十分重要的、反映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心声的现象，竟然不曾在报纸的版面上表现出来。

巴金对读者来信，一向是十分重视的。过去他总是亲自动手，认真答复。这次数量惊人，对他说来，也是空前的。除了报纸编辑部转给他的一大批信件之外，还有作家协会转给他的和直接寄到他家里的。所以这些信虽然他都仔细看了，但即使他每天不睡觉、不吃饭、不工作，也无法一一处理答复，更何况他当时已开始有些社交活动，来看他的朋友和客人，逐渐多起来了，也有了一些接待外宾的任务。可是他对这些信还是选择重点，一封一封地答复了。那时巴金不过七十三岁，他对那个记者说：“我的身体还不差，没有慢性病，写到八十岁，我是有把握的。”

巴金的《一封信》激起广大读者的心波，同时也赢得他许多老友的同情。他的许多朋友也和他一样，在“文革”中受“四人帮”的各种迫害难以一一诉述。当“四人帮”被粉碎时他们无不欢欣鼓舞，但他们长期被压，头上的大石一旦移掉，许多人一时都还不曾想到应该怎样制止可怕的历史重复。当他们看到巴金的文章，有的如重见老友，心里得到很多安慰；有的听说巴金已经被“四人帮”整死，原以为再也读不到他的作品了，现在看到文章，欢愉之情，真难以形容。所以这一时期，给巴金写来信的老友连续不断，不仅有何其芳、胡愈之等一批国内知己，还有远在英国的女作家凌叔华等。何其芳说自己看了巴金的文章，受到鼓舞，同时非常高兴，他下决心要多学一种外文从事译诗工作，并请巴金为他找寻一本外文书。胡愈之也来信说：“今天从《文汇报》读到你的《一封信》，喜跃欲狂。尽管受到‘四人帮’十多年的迫害，从你的文字看来，你还是那样的清新刚健，你老友感到无比的快慰。先写这封信表示衷心的祝贺。中国人民重新得一次大解放。你也解放了！这不该祝贺吗？”叶圣陶不但几次写信，还从北京寄赠巴金一首诗，辞意恳切，纸短情长：

诵君文，莫计篇，交不浅，五十年。  
平时未必常晤叙，十年契阔心怅然。  
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  
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蛋于君何有焉。  
杜云古稀今日壮，伫看新作涌如泉。

叶圣陶对巴金的赞颂，使巴金感到温暖，他想：“我似乎又回到了五十年前了。这样的友情！这样的信任！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应当高兴，我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老师！”他在那一年十一月七日给叶圣陶写信说：“收到您给我写的字，十分感谢。看到您的工整的手迹，仿佛见到您本人；读到您的诗，想起五十年中得到您不止一次的鼓励，感到温暖。我珍惜您的片纸只字，也牢记您的一言一语，这些都是对我的鞭策。我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我要学到老，改造到老，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还在信中谈起十月初曾参加上海代表团去过一次北京，为的是被上海有关方面派去瞻仰毛泽东遗容，曾在西苑旅社住了一夜，因为时间匆促，来不及去看望他表示抱歉。巴金还问起叶老的眼病是否已经痊愈，同时他还听说，老人的听力有些衰退，巴金希望老人对自己的身体多加保重。

继《一封信》发表以后，巴金又在同年六月十一日《文汇报》新闻版上发表了—篇题目叫《第二次解放》的文章，这是他参加当时上海为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五周年而召开的一次上海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稿。他在这篇发言稿中说：“个人的遭遇毕竟是小事。大家更关心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命运……大家坚

定地相信已经站起来了的八亿中国人民绝不再低头，绝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打倒‘四人帮’，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在会议期间我又一次学习了毛泽东主席光辉的讲话，我增强了信心。不管我的笔多么无力，我的声音多么微弱，我也要为这个伟大的时代和英雄的人民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让这样一滴水落到奔腾的汪洋大海里面。”

上海的这次座谈会开了一个星期，当然由于当时的各种条件限制，思想解放还只是开了个头，但是毕竟压在大家心上的那块“四人帮”石头挪掉了，各人的心境还是舒畅的。在会前巴金不仅写了文章，还准备了这个发言。他因为好久不曾写文章，起初竟不知从何处写起。但是写完了，他感到痛快，因为他讲出了心里话。会后，他还写信给老友杨苡，说自己讲了真话，“四人帮”专讲假话，那么讲真话也是同他们对着干吧。

座谈会在友谊电影院开，有一天在门口碰到画家俞云阶，巴金看见他便跑过去高兴地和他握手；还想起一九五五年十月，曾由赖少其介绍俞云阶到他武康路新居来为他画像，两年以后，这位画家就被戴上“右派”帽子不再露面了，现在却似乎胖了些，巴金忙告诉他：“你二十二年前给我画的像，现在还在我家里，好好的一点也没有损坏！”事实是这样：经过十年浩劫，巴金连保存了四十年的大哥的一百多封信和一封绝命书抄本都毁了，这幅画像竟然不曾被造反派发现抄走，真是奇迹。俞云阶听了很高兴，就接口说：“我给你再画一次，好不好？”座谈会结束以后不久，他就来到巴金家中，说他当时年轻，现在成熟了些，而巴金也经受了一次磨难，“让我再给你画一幅像，作个纪念。”他希望巴金到他的家里去，“这里干扰太多，到我那里，只要花半天时间就可以了。”他还说：“你还是穿这件蓝布上衣，连胡子也不要刮。”巴金按着他的计划到了他家中，在他家只坐了一个半小时，就得到他的同意，离开画家的家。一个星期之后，俞云阶和他的夫人果然把他的新作带了来，他对巴金说：“这是你在五·二三座谈会上控诉‘四人帮’罪行！”巴金把它挂在自己家中的墙壁上，朋友们看了，都说不上像，脸长了些，人瘦了些，巴金却很喜欢它，觉得它表现了自己的精神状态，当时他是在会上作了愤怒的控诉，他对篡党夺权的“四人帮”确实充满了深仇大恨。

在这次座谈会期间，与他久别重逢的熟人是很多的，俞云阶不过其中之一人。另外还有个奇遇，这就是在《一封信》发表的那天，即五月二十五日，当时正是座谈会召开后的第三天，巴金开了一整天的会，傍晚回家，感到有些疲劳。这时却有一位陌生的中年人来找他，说是从北京出差来上海，住的招待所恰好在巴金家的附近，因为读了当天报上发表的巴金文章，就禁不住走来找他，诉说他们知道的“四人帮”对周恩来总理的迫害。因为他谈到巴金文章中所说的有关敬爱周总理的话，他非常有同感，所以冒着小雨来和他谈谈。巴金也像对待自己的兄弟和朋友那样接待他，两人素不相识，却都推心置腹，互诉衷肠，共同的话题，共同的感情，把他们的距离缩短了。当巴金把他送出门口，才想起还没有问这个朴实的北方干部的尊姓大名。

这时巴金真正感到解放的愉快，和“解放”两个字的意义。他想起去年“四人帮”还骑在人们的头上，老友唐张从北京避震南下，因为知道他的地址，才主动摸上门来，但当时见了面还只能说些“请多多保重”的话，不敢披肝沥胆；两年前，甚至叶圣陶到上海想来看巴金和丰子悄，“四人帮”还横加阻挠，终致叶圣陶佛然而返。四年前，九十多岁的日本友人土歧善歧来中国也提出过要求见到巴金。“四人帮”在上海的看家狗也予以拒绝。而现

在，只有把这些灭绝人性的“四人帮”及其爪牙抓了起来，人民才得以自由来往，即使陌生人，只要意愿相同，感情相投，也可以互剖心腹，谈自己要说的话，从中得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

自由，真是可贵！解放，真使人感到幸福！

### 第三节醒来随想

这时巴金的家庭又热闹起来。不但他的弟弟李济生早已从吉林结束三整年的“慰问团”生活回到上海，现在又能三天两头来看他的四哥；连在宁夏定居二十多年的胞弟李采臣也特地赶到上海来与“靠边”十年的巴金团聚一个月。最使巴金感到安慰的是二十七岁的小棠，考进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小林夫妇刚从浙江调回上海工作，这样，他那年仅四岁的外孙女端端就再也用不到上海的三个老人为她日夜操心了。

楼上被封的房间也已经启封，书橱还都保持原来模样，损失不多。这样，巴金也迁回楼上居住，又能在晚上伏案工作。同时，客厅也恢复原样，可以接待来客。在平时来这里谈心的，是住在附近的那些老友王辛笛、孔罗荪、柯灵、王西彦和在作协最后被宣布“解放”的吴强。特别使巴金欣慰的是，在一九五七年就被打成右派的老友黄源、萧乾和黄裳，得到彻底平反。他感到意料不到的愉快。巴金还为此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忙中偷闲，到久别的浙江杭州去了一次，在幽静的葛岭看望了一次黄源。黄裳则在平反后又成为巴金家的常客，二十年的间隔，使他们的友情不是淡化而是增强。

对于萧乾的关心，巴金真是情同兄弟。这个时期他给许多朋友写了许多信，但给萧乾的信最为贴心。当他在一九七七年十月接到萧乾的信后，就复信说：“看见你的字，仿佛见到你本人。我想起许多事情，也想起你过去所走的道路。以前的事不提了。我们大家都忘了。虽然前面的日子不太多，但还是应当向前看。我希望你：（一）保重身体；（二）译两部世界文学名著；（三）写一部作品，小说或回忆录都行。我们都得走到火化场，不要紧。你有点才能，就不应该把它浪费掉。出书不出书无关系，写出来总会对后代有贡献。”

以后，他们又通了多次信，到了一九七八年九月，巴金又在信中与他谈起写作的事。他说：“你写小说我赞成，而且你能写，也应当写。但是写小说，要写得深些，要反映现实。为了宣传，还不如写报告文学。我希望你写点能流传久远的作品。不然，翻译几本能流传下去的书也好。倘使为工作写些报道，也是需要的。但业余时间搞点东西，总得搞点更有意义的东西。我也想写一两部长篇，但我想写的是我真正看到、感受到的东西。我想反映真实的生活，不过如何反映，得好好考虑。我决不写表面的东西。我没有几年可以工作了。因此我不想浪费时间。我忙，但是我常常在考虑这个问题：怎样写一两部长篇来结束我的写作生活。”到了一九七九年三月，他连续收到萧乾给他的两封信，他又回复道：“你和黄源错划问题得到改正，这是我很高兴的事。正义终于伸张了。以后有限的、珍贵的时光，要好好地合理地使用，不要再浪费，做你最擅长做的事情，做你最想做的事情，有计划地搞点东西出来。不要随便听指挥，随便按照‘长官意志’办事，弄得一事无成。”

巴金在这些日子里给萧乾写的两封信，很明显的一点，是他比在一九七七年所写的三篇文章《一封信》、《第二次解放》和《除恶务尽》（在《人民日报》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都有了更多的思考。人们知道，一九七八年五月在京沪各报所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中国人民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这篇由胡耀邦审定、得到邓小平支持的文章，发表以后，曾被当时某些人在许多场合指名谴责，并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还批评首先发表这篇文章的《光明日报》领导人缺乏党性。六月二日，



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批评了那种把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说成是“犯了弥天大罪”的奇谈怪论。他说，这种现象反映了林彪、“四人帮”把党和军的思想搞乱到什么程度，把革命学风败坏到什么程度。“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也就在这时，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而又受林彪、“四人帮”长期迫害，深感“四人帮”搞的一套蛮横无理的作家巴金，他对过去的创作经历开始进行了反思。

就从这个时期开始，巴金想写自己“真正看到、感受到的东西”；“决不写表面的东西”。同时，劝萧乾“不要随便听指挥，随便按照‘长官意志’办事，弄得一事无成。”

当然，和许多人一样，巴金的思想发展也有一个过程。他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虽深受“四人帮”迫害，吃的苦最多，对“四人帮”也恨得最深，但历史的灰尘仍在他身上留下痕迹；现在，虽然“四人帮”粉碎了，一开始写的文章仍不免偶然出现当时的“豪言壮语”，特别是当时有些历史的真相还不曾公开，有些迷雾还把人们的眼睛掩盖着。有些套话，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写文章也无法避免。当然，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当时巴金在文坛上比谁都一马当先，勇于控诉“四人帮”，揭露“四人帮”，是十分难得的，没有一种无畏精神，是不可能的。这一年的四月，他让李致为他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他在“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本书《巴金近作》第一集。

如果按照历史规律，实事求是来看问题，那么从一九七八年九月巴金给萧乾写的信中所说的话，就可以看到巴金写《随想录》的思想准备，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他说的“我想反映真实的生活，不过如何反映，得好好考虑”。

时代把巴金推向前面。就在他开始写《随想录》的前几天，巴金写了一篇《燭火集》序，对自己一年前写的《家》重印本后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通过“文革”，他才懂得“我们过去的确只有封建传统，没有民主传统。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封建流毒很深、很广，家长作风还占优势。据我看，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大反封建。去年八月我写了《家》的重印《后记》，我说这部小说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我并不是在说假话，当时我实在不理解。但是今天我知道自己错了。明明到处都有高老太爷的鬼魂出现，我却视而不见，我不能不承认自己的无知。”

巴金的思想飞跃，给中国文坛带来了福音，这就是《随想录》的诞生。前面的三篇文章，正是它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写成的。这就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他的《看〈望乡〉》、《再谈〈望乡〉》和《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三篇共同的主题是促进人们思想解放的。它通过赞扬日立电影《望乡》，对我国多年来对外国影片采取封闭政策提出了批评；同时对“四人帮”把西方文学名著一概打倒的愚民政策也进行了鞭挞。他要求文学艺术向人民群众开门。而恰恰就在这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高度评价了有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的思想的严重束缚，使人们在思想上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与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这恰好反映了巴金开始写《随想录》时的思想要求：“据我看，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大反封建。”

巴金不但在一九七七年春天的文坛首先冲开无边的黑暗，来打破无底的沉默；而且他还通过他自己的实践经历，在一九七八年冬季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起觉醒到怎样才能把周围的寒气消除，来迎接面临的春天。

一九七九年十月，秋高气爽的北京，迎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千一百八十七位文学艺术界代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这是一支相当于三十年前第一次文代会代表人数五倍的队伍。他们经历了解放后十七年曲折的道路和“文革”的十年磨难，汇集到这里。其中不少人曾经吃尽“左”的苦头，在十年动乱中死里逃生，好不容易活下来。许多人久别重逢，悲喜交集。大家在言谈中，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深为痛恨。当然，“四人帮”粉碎到这时已经三年了，巴金已不再像一九七六年十月刚听到“四人帮”垮台消息时那样兴奋，一味兴冲冲从喜字上想了。在他的一生中，曾经有过四次社会变革的经历：第一次是辛亥革命胜利，他那时虽还幼小，实际情况是看到的：他父亲兴高采烈，私塾里的老师也笑逐颜开，剪纸裁布，自做新旗，挂到屋门口去；但是一阵风，皇帝虽然下台，人们的日子还是照旧的过；第二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他在重庆，大家点灯笼放爆竹，高兴得连马路上不相识的人都手拉手跳起舞来，但是有个共产党朋友对他说：“不要高兴得太早，今后的斗争恐怕更复杂了。”后来果然，国民党大员迷着打内战，把老百姓八年抗战中受的苦都丢在脑后了；第三次是全国解放，新中国建立，当初他站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上，看着人们向毛主席喊万岁，连喊了六个钟头，一片狂欢景象，使他自己也感到“莫大的幸福”，不料在十七年后，可怕的个人崇拜和封建特权，却给大家带来“文化大革命”，使全国人民遭受了一场大灾难，同时也把国家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现在是第四次的经历了，粉碎“四人帮”哪个不兴高采烈？哪家不欢腾若狂？但是会不会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谁能保证不再发生刚刚被阻止的那场“文革”动乱？“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稳，不会在梦中挥着双手滚下床来呢？”特别是使他感到不安的，“四人帮”虽然粉碎，它们的爪牙还在阴暗角落里时出时没，使人痛心的是那些与自己一样在“文革”中吃过苦、受过难的有些朋友，他们怎么还不回过头来接受一点教训，而仍迷恋于足以使“四人帮”复活的“左”的观点呢？特别是这一年来他已看到了这样的迹象。例如不久以前，河北省的刊物发表过一篇叫《歌德与缺德》的文章，公开坚持文学艺术继续走对现实歌功颂德的道路，引起全国舆论哗然，巴金也在《随想录》中愤然发表意见：“《歌德与缺德》用意无非是拿起棍子打人。难道作者真以为‘社会主义’就是靠吹牛吹出来的吗？不会吧。‘四人帮’吹牛整整吹了十年，把中国国民经济吹到了崩溃的边缘，难道那位作者就看不见，就不明白？”

全国文代会三千多个代表分住在北京东西南北各个招待所里，最集中的是在西郊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作为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陈沂共同担任上海代表团团长巴金，他也与代表们住在一个楼里。招待所的服务质量不差，但是环绕在他脑海里的这些忧虑仍使他感到不安。他已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三十篇左右的《随想录》，谈到了不少有关“文革”的问题。还提到萧珊、以群、丽尼、冯雪峰等人的死，他们都是“文革”的受害者，这样具体的例证难道还不够吗？多少年来我们自己不动脑筋，不真正从自己的生活感受和思想实际出发，一直按照“长官意志”写文章，结果是张春桥升官，叶以群跳楼！“四人帮”最初提倡“大写十三年”，后来又提出什么“三突出”“三陪衬”创作方法，结果是在自己的周围设置了种种障碍，把搞创作的人捆死。为什么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现了文艺活跃的局面，鲁迅、郭沫若、茅盾的许多作品相继问世，而在“四害”横行

的时期，文艺园中却只有一“花”独放，一片空白，绝大多数作家艺术家或者撙笔改行，或则被摧残致死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巴金回想自己从小就爱读小说，第一部是《说岳全传》，然后读的是《施公案》和《彭公案》，按说他就要大中其毒了，但是他后来又读了其他的书并不曾由此中毒，可见塑造灵魂也好，腐蚀灵魂也好，都不是一本书能简单地办到的。一个人实在用不到躲在温室里过日子。而他正是读多了小说，才开始写小说。而自己作品中的感情，自己的爱憎，则是从自己实际生活中来。他认为生活的确是艺术创作的源泉，作品则是作者对生活理解的反映。“尽管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分析有对有错，但是离开了生活总不会有好作品。”所以作家应该写他最熟悉的生活。他自己就因为解放后想写新的人而又不熟悉新的人的生活，也就写不出多少作品，更谈不上好作品问世了。他在一个会上发言，曾与许多人一样，说过“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的话，他认为作家下生活，是极其寻常的事，但他认为必须让作家自己去选择生活基地，这样就有利于作家去熟悉生活。

第四次文代会开幕的第一天下午，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表对大会的祝词。这个祝词全文五千字，驳斥了林彪、“四人帮”诬蔑“文革”前十七年文艺界被“黑线专政”的谬论：对文艺界许多人在与“四人帮”斗争中做出了令人钦佩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同时他还回顾了粉碎“四人帮”后三年中的文艺界工作，认为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他要求文艺工作者通过自己的创作，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继续同林彪、“四人帮”的恶劣影响进行坚决斗争，团结起来抵制、谴责和反对来自“左”的和右的各种错误倾向。他说：“人民需要艺术，艺术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他还要求文艺工作者不畏艰难，勤学苦练，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他要求“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文艺家与读者之间，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党员作家应当以自己的创作成就起模范作用。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他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邓小平的讲话，在会场上不断爆发出如雷的掌声，经久不息。

第二天，三千多代表分组讨论。上海市的文学组代表四十七人，他们在西郊国务院第一招待所开会。陈沂和巴金是团长，他两人都参加了文学组讨论。招待所八楼那个开会的房间虽然不算太小，但四十多人坐在一起竟挤得水泄不通。虽然这样，并不影响大家的情绪。房间里的人虽都来自上海，却也难得有机会聚集得这样齐全，使人感到这多年来各人的一本帐都是实实在在的，要忘却过去，一时也很困难，但总算有个共同的议题了，这就是邓小平的讲话，他希望“文艺队伍更加团结壮大”，文艺工作者“都要更好地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当然，要达到这样的境界，首先应该明辨是非。

文学小组会上的讨论很热烈。主持小组会的是钟望阳，他本是上海音乐学院院长，现在调来主持上海作家协会工作。发言的人很多，除了表示十分拥护邓小平讲话精神外，各人还就各人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巴金的发

言是在蒋孔阳、王元化、王若望、李俊民、吴强等人发表了意见后才讲的。蒋孔阳说：“邓小平同志的报告讲得很好。他的讲话获得的掌声最多的时候，也就是讲话内容最能反映大家心声的地方。文艺能不能搞好，要看党领导得好不好。要党领导得好，一定要像邓小平讲的那样，帮助文艺工作者打破林彪、‘四人帮’给我们的思想枷锁。不能再继续刮冷风。”王元化说：“文艺是千秋大业，要做促进派，第一就是解放思想。我承认自己是在邓小平同志读报告读到第十页时候鼓掌长达一分多钟的代表之一，因为这一段就是讲出了大家的愿望，这便是必须强调艺术民主与艺术规律。文艺是复杂的劳动，要充分发挥个人的创作才能，不能横加干涉。我们要吸取教训，‘四人帮’正是利用我们在领导方法上的缺点与错误进行篡党夺权。今后如有人仍要把‘四人帮’过去的一套当作党的领导方法，那无异是搞破坏。”李俊民说：“这个报告是通过实践检验真理以后得出来的结论，最重要的问题是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但是怎样才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这问题看法就各有各的一套了。‘四人帮’的看法就是只有几个样板戏才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古典的、外国的文艺就都是破烂货。我以为对为为人民服务，不妨看得广一些，眼光放得远一些，甚至《三笑》、包公戏都应该算作可以为人民服务的东西。我的老爱人看《三笑》，看一次不够，还看两次、三次，我看她越看越对生活有劲；包公戏也是这样，也不能随便给它戴上低级趣味的帽子。有些古典东西有精华，有糟粕，但是往往把糟粕扫除，精华也没有了。文学艺术就是一种复杂的东西，不能简单化对待。”

这时吴强说话了，他是上海作家中最后被宣布“解放”的一位，但也已恢复工作一年多了，他沉痛地说：“‘四人帮’虽然已垮台，但流毒很厉害，邓小平同志主张继续揭批‘四人帮’，这很必要。叶剑英副主席前一时期有个讲话，说‘文革’前十七年存在错误和缺点，特别存在领导干部中，这一点自我批评很好，过去我们这些在文艺岗位上负责的，包括我自己，工作是有缺点、简单化，以致‘四人帮’有机可乘……”陈沂插话说：“不是有缺点，是有错误。”这时巴金也补充了一句：“是整了人同时也被人整。”吴强接下去说：“对，这是我们与‘四人帮’有本质不同，已在慢慢地改；有的同志还没有注意这一点，甚至看到了问题还不承认，还不想解决问题。我们当然不想算细帐，但文艺领导上的思想作风，如衙门化、机构体制重叠，不适应开展文艺创作的各种旧思想，都应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报告精神改进。领导文艺工作的同志有的不懂就不懂，不要装懂，随便干涉别人业务，要多作自我检查，允许自己批评，也允许别人批评自己。至于作家艺术家，‘四人帮’已垮台了，再也不会有人来随便整我们，不要心有余悸，更不要预悸。人家还不曾批评你，你就先心悸在前头，这能怪谁？这只能怪自己，要胆大一些！”

巴金听了吴强的发言，对着吴强微笑着亲切地说道：“我看你也不见得胆大。说实在，昨天这样的全国文艺界三千人的大会；团结起来共商文艺界大事，从来不曾有过。听了邓小平副主席的报告我是赞同的。它讲的内容我表示拥护，没有不同意见。但三十年来我确实听了不少好的报告，也读了不少好的文件，根据我的经验，这些也还是要等着看。邓的报告精神很好，但究竟能不能成为事实，我还是有些疑虑的。三十年的教训太多了，也太深刻了。为了过关，不得不保护自己；有些人要保护自己，有时就不得不牺牲别人。所以大家既挨整，也整人。旧帐不要算，但是非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

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这个不清楚，这样文艺怎么能繁荣？不但心里疙瘩永远解决不了，而且今后还会跟着风向走。今天刮这个风，就说这个对，明天刮那个风，就说这个不对，那个对。最近上海出版了一本《重放的鲜花》，似乎现在又觉得这些作品对了。大家记得当时反右批评这些文章，哪个敢说它们不是大毒草？什么时候大家都能不跟着风走，照着真理说真话就好了。现在确实形势大好，我看希望还是在青年身上，他们身上没有负担，敢说话，作品也有深度；而有一些成名作家，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地位，讲话有顾虑，往往缺乏坚持自己主张的勇气。”

巴金发言的时候，房间里很静，没有人走动，也没有人窃窃私语。他的话讲完后，许多人落入沉思之中。片刻之后，才有王西彦等人继续发言。

下午的小组会，巴金没有来参加，他乘着这个间歇时间，看望住在北京的几个老朋友去了。他们有的是“中直系统”的代表，有的是北京市的代表，当然也有既不是“中直系统”，又不是北京市的代表，而是代表团以外的作家，这就是在三十年前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时就不曾被邀请，而这次依然遭受“向隅”命运的沈从文。这次“向隅”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说实在，他改行已经三十年了。

#### 第四节 友谊增强自信

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以前，巴金曾有过法国之行。

这是一九七九年四月间的事，就在这个月初旬的最后一天，他偕同女儿李小林来到北京。那时孔罗荪已经从上海调到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因为还不曾找到房屋，暂时寄居在北京东城金鱼胡同和平宾馆里。巴金因为联系方便，也就住在这个宾馆里了。他们将于下旬去巴黎。巴金是主要被邀请对象。一月间，法国就有个出版机构请巴金带女儿去作客，恰好法国还有几个友好组织也有这个打算，这样，除了巴金父女外，还有孔罗荪、徐迟、高行健三人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便组成了。

巴金是这个代表团团长，为了看材料，作好访问的准备工作，并想乘机看看几个老朋友，所以他提早半个月来到北京。他在这半个月中，不但再一次见到了叶圣陶、冰心、萧乾、丁玲、艾青、刘白羽等人，还由小林陪同到北京医院去探望了另一个老友顾均正。他们来到一个设备简单的单人病房里，只见病人正侧着身子躺在床上痛苦呻吟，他的夫人、忠厚热情的国华嫂正在一旁照料，看见他们进来，忙站起来让座。巴金坐到他的床边，抚慰着这个与他长期维持着深厚友谊的挚友，想起住在上海同一条弄堂的往事，差点抑制不住激动的眼泪。顾均正看到巴金，勉强露出笑容，病魔已把这个品性纯正的老人折磨得无法再向巴金流露自己的友爱。他的痛苦表情，使巴金感到痛苦。当时巴金还不知道他的骨髓里究竟有没有癌细胞。他只有祈求现代医术能把这个朴实善良的友人生命抢救出来。但是几年以后，他在上海还是听到了老友逝世的噩耗。病魔折磨了老友很长一段时间，最后终于把他的生命夺走了。

这次巴金来北京，还接触了在“文革”中离世的另外两个老友家属。他曾由罗苏陪同到丰富胡同去看了老舍夫人胡絮青。他见她正在整理老舍的遗作。他向她讨了三幅画，准备作为赠送法国朋友的礼品，他知道许多法国朋友怀念老舍，也喜爱老舍夫人的画。他很想了解老舍死的真相，但又怕她伤心，不敢问她。巴金无法忘记老友老舍对他长期的友情，他更无法在心中甩掉有关老舍死因的疑问：“到今天我还没有弄明白，老舍同志的结局是自杀还是被杀，是含恨投湖还是受迫害致死？”他常想起老舍剧本《茶馆》中常四爷那句话：“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他真想有一天能再见到老舍，对他说：“我们都爱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你要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活下去的呀！”巴金还在这个时期接待过冯雪峰的女儿。雪峰的女儿沉静、质朴，她告诉他不久将为雪峰开追悼会。巴金知道雪峰死后不久，他的夫人也去世了，只剩下他们姐弟三人，现在正坚强地生活着，巴金向她表示他准备写纪念文章，他不能忘记这个在鲁迅活着的时候就与他建立起友情的人。

以巴金为首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在四月二十八日晚上八点钟飞离北京，他们在漫漫的长夜里飞过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各人看着自己手上的表，从当晚八点钟，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九点、十点、十一点，天却还不曾亮，到了十二点钟，才看到机窗外晨光熹微，曙色来临，到了下午二点钟，完成了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航程，飞机降到地面，机场大钟正指向七点，才发现那是巴黎的早晨。巴黎与北京时差七个小时。大家把自己的手表从午后二点拨回到早上七点钟。他们在飞机上实际逗留了十八个小时。却被认作只乘了十一个钟头。巴金在前舱，其余四人坐在后舱，

整整一个长夜，孔罗荪怕七十五岁的巴金这样长时间坐在飞机上，会不会影响健康？下机时却见巴金精神抖擞，面色红腴，原来他睡得很好。这才想起，两年前巴金在他写的文章中曾说粉碎了“四人帮”睡觉安稳了的话，禁不住向他作了一个会心的微笑。

这时，只见法国外交部文化司已经派员前来迎接，法中友好协会主席贝热隆先生，秘书长季樵马夫人及不少法国朋友，也都过来与他们握手。我国驻法文化参赞和大使馆其他同志帮代表团成员办了入境手续，就分乘几辆汽车，高速度的穿过黎明的林荫大道，进入了繁荣昌盛的世界名城巴黎，他们住在特瑞莫亚旅社，法中友协的许多朋友也随着来到，他们中有精神矍烁的美髯公，也有英华风发的青壮年，更有仪态端庄的小姐和夫人；其中有巴金著作《家》、《憩园》的法文译者李治华，还有巴黎几个大学的汉学家。大家把巴金和徐迟、罗苏等四人分别送进各自的房间。

隔了一天，法国文化部长向巴金和他的代表团介绍了法国文化普及工作的情况，外交部的文化司长在巴黎西郊波隆涅林苑中的大瀑布饭店里，摆设了一个规模不小的森林宴会，让他们会见了法国文化界许多名流。宴会设在绿得发光的森林里，既幽静又热闹。国际笔会法国分会和法国作家同人公会分别在巴黎市内两处高贵华丽的大厅举行酒会欢迎他们，使中国作家有缘会见了法国几百个卓有才华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所有这些活动家对中国作家特别是对巴金都表示了极为友好、极为尊敬的态度，他们对巴金的作品尤其是对他的三部小说《家》、《寒夜》、《憩园》都十分推崇，甚至对最近发表的二十几篇《随想录》，也能熟记。这使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就在国内被“左”派无理批判，以致对自己早期作品几乎丧失信心的巴金得到鼓舞，也感到安慰。笔会的名誉主席乔治·爱玛·纽埃尔·克朗西埃在讲话中，还高度评价了巴金的著作和著作所显示的精神，说他是被压迫和被剥削人民的保卫者。克朗西埃对巴金受“四人帮”迫害表示无限同情，他认为中国作家经历了严寒，面临春天的来到，必将有助于国际性的文艺百花园繁荣昌盛。

巴黎的第三、第七、第八大学中文系学生对巴金的来临，表示了无限的热情。他们纷纷开欢迎会，希望巴金和中国的其他几个作家能对他们有所教益。关于这一点，中国作家代表团早在出国前原有所准备，他们准备了三个报告，其中一个巴金比较简短的讲话，一个是孔罗荪关于中国文学当前情况的汇报，还有一个是徐迟关于中国诗歌艺术的报告。这三个报告都译成法文，想在一定场合把它们散发给法国的青年朋友们。哪知我们国内经常举行的那种报告会，法国朋友并不太欢喜，他们欢迎的是一种“对话式”的问答会。他们让中国作家坐在台上，给每个人一个话筒，然后台下朋友随便发问，让台上人根据所提问题作出回答。

由于会场充满友好气氛，问题的提出都出自真诚、恳切、求助的心理，所以形式显得生动活泼，双方对话也尽量做到推心置腹。巴金在法国本来就有很多读者，他在年轻时候曾在巴黎留学，后来又在巴黎近郊居住过一个时期，并开始了文学创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灭亡》，在今天的法国读者中还有印象。而他的《家》、《寒夜》、《憩园》，在法国更有法译本流行。现在，巴金来到这些读者面前，白发萧然，他质朴真诚，大智若愚的仪态，使人们更加敬爱他。而且这次中国代表团来巴黎之前一个星期，法国《世界报》记者雷米就曾在北京访问过巴金。对想了解巴金情况的许多法国读者，

在雷米的访问记中，早已写到了。所以这些青年大学生对巴金在“文革”中的遭遇也知道一些，因为巴金在《世界报》记者雷米问他如何度过“文革”这段被压抑的日子时，巴金回答说：“虽然他们没有殴打我。但我受了不少精神上的折磨。他们逼我承认一些罪状，要我责备自己。最初几次我像所有的其他人一样，承认了错误。也许我是受了左派的影响。坦白地说，我那时真的认为自己所写的东西是很坏的……他们封了我银行的全部存款，每个月只让我取一笔仅仅够生活的费用。跟着他们下乡达两年半，我在乡下种菜！不过在这期间，我的身体还好。我的妻子才是这种种迫害的牺牲者，她因为缺乏适当的治疗而死于癌症，只因为我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这些法国朋友非常同情中国作家的不幸遭遇，对巴金更是十分敬仰，在巴黎第三大学中文系师生的欢迎会上，由两位法国同学分别用中国话和法国话，朗诵了巴金《随想录》的第十篇文章《把心交给读者》中关于他在巴黎开始写小说的那一大段。法国同学当着巴金的面朗诵巴金的文章，心里可能有些紧张，但他们的态度十分友好，巴金对他们朗诵的每句话都所得很清晰，他心中对他们很为感谢。他没有想到在巴黎也有《随想录》的读者！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警告，也是一种要求，他必须更加勤奋，为读者写出像样的作品，才不会辜负广大读者对自己的期望！

巴金想起一九二七年初来法国的时候，他住在巴黎拉丁区图尔纳福街，当时他几乎每天从这里出发经过先贤祠去卢森堡公园看书和散步。他曾在《灭亡》中，写他当时的生活情景：“多少个细雨的黄昏，我站在卢梭像前，向这位为正义而斗争的法国作家倾诉一个外国年轻人的痛苦。每天晚上，听着从巴黎圣母院传来的沉重钟声，我不能入睡，就拿起笔来倾吐我的感情和爱憎。”现在，他又来到这里，却发现当年他朝夕瞻仰的卢梭铜像已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侵略者纳粹党徒毁了，现在换上的石像，是法国人民在战后重新塑造的。这里的环境也变了，不再是四周空旷的草地，而是一个车辆拥挤的停车场。石像被数不清的汽车包围着。他通过车与车之间的空隙来到石像前，想到五十二年前自己曾天天晚上来到这里，向这个“日内瓦公民”诉述一个中国学生独处异国的寂寞和痛苦。他从卢梭的《忏悔录》得到安慰，站在这位哲人铜像前得到鼓励，并得到说真话、诉真情的勇气。他这次来法国，从他个人来说，也正是为了要向法国老师表示感谢。他在国际笔会法国分会的招待会上也说过类似这样的话，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的事物。正是他从法国老师受到的教育。

这次他还重来到巴黎的近郊沙多-吉里，这个离巴黎一百公里的小城，当时年轻的巴金曾在这里住过将近一年两个月。他因为身体不好，移居到这里补习法文，还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灭亡》。现在他访问了他那以著名诗人、寓言作家拉封丹命名的母校拉封丹中学，这是他多年前居住过的地方。在女校长的陪同下，他重访了校园，也到了他居住的地方：大饭厅楼上的一间学生宿舍。一九二八年前他曾在这里与两个同学一起度过暑假，饭厅的外形没有变，但设备更新了。他还记得他在这里的厨房用切面包的小刀，切别的东西时伤了自己左手的小指，伤痕至今还在，而人事全非。他好像看见当年的两个同学仍在和他一起谈话，一起到厨房去找和善的古然夫人，她每天早上招待他们到她的门房里去进早餐，然后他们又一起出去到河畔散步。他曾在这里收到过大哥从四川成都寄来的信，还曾在这里把写好的《灭亡》原稿寄给上海开明书店编辑索非，准备自费出书，却不曾想到索非竟会把小说



稿转给《小说月报》的代理编辑叶圣陶。

今天好客的法国朋友十分了解巴金的过去，因为他们读过巴金的作品，知道这个小城对巴金一生的意义。巴金只希望能让他在这个地方逗留二三十分钟，看看这里校园里的苦栗树依然枝叶茂盛；殷勤的主人却把这个访问作为一个日程来安排，并由这个小城蒂埃里堡市的市长安德烈·罗西特举行招待会，在金碧辉煌的市政厅里，在一座圣洁的雕塑像前，把一枚作为荣誉市民的市徽和一枚诗人拉封丹（他在这里出生）的像章授给曾在这里留下足迹的中国大作家巴金。

在巴黎的日子，中国作家代表团所有成员是在热情友爱和欢畅的祝酒中度过的。接着，他们又在热情的法中友协主席贝热隆先生和《家》的法译者李治华先生陪同下，访问了尼斯、马赛和里昂三个名城。

尼斯是靠海的一个城市，碧蓝的海水和明媚的阳光，把这个城市照耀得分外秀丽，到处是沙滩、浴场和游艇码头。据说一到夏天，巴黎的游客便拥到这里来避暑，全欧洲、全世界的旅游者也都到这里来过天堂一样的生活。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客人在这里没有住旅馆，热情好客的尼斯友协分会的主人把他们分两批住在两个法国朋友家里。巴金父女、徐迟、高行健住在一个已故华侨车医生家里，孔罗荪和中国驻法大使馆两个工作人员住在另一家，在靠地中海的一个烟波深处。车医生去世多年，遗下他的法国夫人端庄美丽，还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他们对来自车医生故国的同胞招待得非常周到，巴金觉得他们好像是在接待远方的亲戚。徐迟也觉得车夫人对他们充满敬意和热情，还看到她满面笑容但仍遏制不住一种微弱的感伤。有时眼角润湿，不免流露出对已故丈夫的思念之情。她的真诚使四个客人都为之感动。据说车医生生前是以西方医学行医，但他又深谙中国针灸技术，中西医结合，使法国病家深受其益。车家客厅陈设的红木家具都是中国式的桌凳，壁上挂的也都是中国字画，却又与室内有些现代化设备十分调和。这个家庭本来十分幸福美满，唯一的缺憾是消逝了的父爱。来访的中国客人被当作车医生的老朋友那样受到欢迎，因为他们为这个家庭赶走了寂寞，带来了热闹，带来了友谊和安慰。

中国客人还为此家庭带来了更多的客人：在这几天里，许多人来看他们，他们大都是当地的法中友协成员。有个晚上，连韩素音也专程从瑞士飞来参加聚会，而且帮助车夫人和她的未来媳妇下厨房做膳。这使欢乐的晚宴继续到午夜。因此上了年纪的巴金不得不取得主人的额外宽容，让他早些退席休息。但是在退席前，还是有两个年轻的妇女，拿着《寒夜》与《患园》来请巴金签名，并同他谈起那里面的两个主人公，说她们了解她们，这两个主人公对她们并不陌生。她们都是好人。而这时又有一个女读者进来找他说话。旁边有人说这样巴金忙不过来了。而巴金却笑着回答说：“女读者找我谈话，我不会紧张。因为在我的作品里，很少把妇女写成坏人。”巴金说这句话有他的根据，后来他在另一个座谈会上也谈过类似的问题，他认为在旧中国，妇女确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她们首先在经济上就不能独立，因此常受欺凌，受利用。女主人车夫人也是巴金作品的读者，她虽然是法国人，但她读过法译本《寒夜》。她感谢中国作家为妇女说话，为妇女控诉。一到早晨，中国作家出访，她亲自为他们开车。两天以后，中国作家代表团从尼斯坐火车去马赛，车夫人一家和友协负责人一起送客人上火车。在车厢里车夫人频频揩抹潮湿的眼角，巴金很为感动，同时他发现坐在旁边的小林这时

也正在掉泪。

在离尼斯前一天，巴金还到过赫尔岑墓前拜谒。这个伟大的俄国作家，他的《往事与随想》，巴金已经译完五分之一。第一册已经出版。在来尼斯之前，巴金曾在巴黎与赫尔岑的曾外孙诺艾尔·利斯特会面，利斯特在巴斯德学院工作，他在当地报纸上看到巴金抵达巴黎的新闻，就到旅社来看巴金，他们一见如故，因为两个人有对赫尔岑事业的共同兴趣，大家谈得十分融洽。利斯特不但向巴金提供了有关的资料和书签，还介绍了《往事与随想》的法文译者达利雅·奥立维叶与他见面。当利斯特知道巴金将去尼斯为赫尔岑扫墓，便打电话给赫尔岑的另一个曾外孙安·昂孚医师，让他在公墓门口等候巴金。现在，巴金由安·昂孚医师陪同，找到了赫尔岑夫妇墓地。巴金说：“我带来一颗心，向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致敬。”昂孚医师对中国作家从遥远的东方带来的对自己先辈的友爱和敬意感到高兴，并表示非凡的谢意。

离开尼斯到马赛，他们不坐飞机而乘火车，主要是为了能让大家看到沿海岸的风光。风光确实很美，大自然结合建筑师和艺术家的合作，使这里变成一个在任何地方都无与伦比的乐园。但巴金想看的还是他在五十一年前离开法国时曾因海员罢工而不得不在这里逗留过十多天的马赛码头。那时他住在美景旅馆五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常在每天夜晚，靠着窗口，看马赛的海景。有时还在海滨散步。在那十几天时间里，他还看了几部左拉的小说和几部影片。现在一切都过去了，美景旅馆却没变，只是两旁新造的楼房似乎要把它压得透不过气来。巴金已想象不出当年是怎样在五楼窗口眺望海景的。值得庆幸的是，这次有机会去伊夫堡。这是当年他听一个朋友谈起过的一个传奇性的地方，人间地狱，而当时却没有机会去观光，现在却与罗荪、徐迟等几位一起坐了一只小船前往游览。巴金走进了古堡，到了过去囚禁政治犯的一间间囚室，看到了许多被囚禁者的名字。他禁不住想起这些政治犯当年的生活和作家大仲马《基度山伯爵》所描写的基度山被囚的场景，使他很自然地想起但丁的一句诗：“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他站在底层的囚室里看了看四周：“那么厚的墙，那么高的小窗，那么阴冷的囚房，又在孤零零的海中小岛上！”他看看这些，想起我们所经历的苦难，觉得又算什么呢？法国人并未把它封闭，连对外国人都开放，让他们参观，无非作为历史教训，免得悲剧重演。古人也懂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而今天却有人在我们耳边说：“忘记，忘记！”难道他们真的不想吸取教训吗？

走出古堡，他又看见了阳光，又看见了大海，他感到呼吸自由，心里感到痛快。法国朋友让他坐在一块大石旁照相，石头上有人用法文写了“祖国万岁”几个字。巴金望着前面的大海，他也想起自己的祖国，禁不住在中心也想喊：“祖国万岁！”在里昂，中国作家代表团只活动了一天。他们参观了中法大学的旧址，这个大学当年曾接受过中国学生来勤工俭学；他们还参观了十九世纪的大教堂和古罗马剧场的废墟。后来他们又去看了丝织博物馆和丝织工人居住的地方，了解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里昂工人曾有过一次光荣的起义。他们在自己的旗帜上写过这样的口号：“不能劳动而生，毋宁战斗而死！”晚间，里昂朋友在接待中国客人时，曾与大家一起唱了一支《丝织工人之歌》：“大教主，我们为你织丝绸，穷织工却连衬衣也没有。我们是丝织工人，我们却身无一缕……”法国朋友为客人领唱这样的歌，同样也是为了向中国客人表示友谊。

第二天晚上七点钟，代表团就从里昂飞回巴黎。下午，大家在贝热隆先生主持的凤凰书店访问，碰到许多年轻的中国人拿着书来请巴金和他的几个同行签名，这些年轻人态度友好，心地单纯，使巴金想起去尼斯前一天在巴黎新江饭店和当地好几十位华侨会见。他们有的要他在他写的小说书上签名，有的拿出纪念册请他题字，有的提出一些问题来请他回答，目的都只是因为关心作家，爱护作家，同时更关心祖国，爱护祖国，迫切需要了解祖国的真实情况，他们说：“看见你们，好像看见我们朝思暮想的祖国。”看到这些长期远离祖国，远离同胞，像关心老母亲一样关心祖国的人，使巴金和他的同行非常感动。巴金明白他自己这次访问法国，不仅在友谊的海洋里汲取友情，而且还是在广大的读者中旅行，了解这些读者的心，了解这些海外游子对祖国的关心、向往和热爱。他知道这些读者出于真心实意提出许多问题，即使某些问题使我们一时难以回答，也并非他们出于恶意，故意为难我们，而是有些问题比较复杂，他们一时很难理解；有些问题则确实值得我们自己思考。使巴金感激的，还有《家》的法文译者李治华先生，他几乎天天和中国作家代表团在一起，自愿担任繁忙艰难的口译工作，替来访的中国作家服务。他是个长期远离祖国的人，在大学教书，最近用他流畅的法文译完了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在同他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巴金感觉到这个离开祖国已经三十多年的翻译家，他的心却还是和祖国这么贴近，他和许多华侨一样，十分关心着祖国母亲的健康。

在法国的最后一个晚上，是在画家赵无极家里过的。这个早期曾受印象派影响的画家，与徐迟一九四三年在重庆就相识。一九四七年夏天，徐迟父女还在杭州葛岭山下与他相会，当时画家曾以油画《父与女》赠送徐迟。三十年不见，画家已经超越四十年代的印象派时期，和五十年代的象形派时期，进入画面上只有形态和彩色的时期，成为举世闻名的艺术巨匠。巴金和他的代表团成员在赵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他们从赵无极的画里，看到这个华裔画家将中国传统与外域技法的美妙结合。这晚，诗人罗亚夫妇和一个法国学者也来了，当高行健向赵无极问应该怎样来理解他的作品时，赵无极含笑请那个法国学者回答，学者笑着把问题转给诗人，诗人又把问题推给徐迟，徐迟又含笑请赵的夫人富朗梭亚丝回答。她笑出声来，说：“还是让画家自己回答吧。”赵无极愉快地对巴金和他的同行作了详细的解释，他的意见是：描绘外在的形象并不是绘画的唯一内容，表现内在的情感才是绘画的主要任务。他的画，正是通过形态、色彩、线条、光泽、隐秀、想象与神思，来表现出自己的感情。

晚上十一点钟了，巴金提出来要向主人告别，画家却说照他们的习惯可以欢聚到午夜，但是明天代表团一清早就要搭机回国，主人的深情只能心领。这样他们就从赵家出来了。

## 第五节总结与沉思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全国文联所属各协会同时也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是在十一月四日开幕，至十一月十日闭幕的。第一天大会由巴金主持，刘白羽致开幕词，李季作了关于作协恢复活动以来的工作报告。以后就开始大会发言。国务院第一招待所的会场恰好容纳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六百多个作家代表。这些代表出于对社会主义祖国未来文学事业的关注，在这七天中，无不争先恐后在大会或小组里发了言，表达了各人对当前文学问题的看法，和对未来工作的期望和要求。

会场上不断出现热烈的鼓掌与生动的场面。当时，这种感人的情况，甚至十多年以后，还留在人们印象之中。当代表们以赞许的掌声与兴奋的情绪听了白桦的发言后，一个须发如雪的老者由人搀扶着走上讲台，这就是被隔离十几年以后，以八十三岁高龄出席大会的萧三。他在代表们如雷的掌声中登场，激动的感情使他泪如雨下，呜咽着说：“文艺的春天来了！愿作青山不老松，和同辈人以及青年朋友站在一起，为祖国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接着是王蒙发言，他自从五十年代以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获罪，在西北大草原上放逐二十年，最近才得到平反，安排了工作。现在他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青年作家，站在台上向他的同行们诉述了自己的由衷之言，他说他当时“初生牛犊不畏虎，可能有些幼稚，甚至有些荒唐，但说实在我们绝无二心，没有市侩气，不懂得阿谀奉承和投其所好，在党组织和领导同志面前，我们从不设防。我们在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和准备的情况下，就拥到了反映现实、干预生活的前沿阵地去了。我们该责备的是，当时我们还不懂得一枝笔的分量，不知道为了说真话要经受怎样的考验，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要具备怎样的钢铁一般的意志和水晶一般的品质。我们是被党的乳汁哺育成长的一代人，而搞极左的人，想竭力割断我们与党的血肉联系，说我们‘反党’，把我们驱逐出党，但我们与党的血肉联系是割不断的，即使在痛苦的日子里，我们的心依旧向着党。而党一旦重新允许我们拿起笔来，我们发出的第一声欢呼和呐喊，仍然充满了对党的热爱、信念和忠诚，我们所仇恨、所批判的正是党的敌人，是危害党的病毒和细菌。难道我们对这样的敌人、病毒和细菌也要来‘歌德’吗？那是痴心妄想！……”

辽宁省作家韶华与思基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不可能不流露作者的政治态度。但建国三十年来，在文艺和政治关系上，普遍存在着一种文艺等于政治、文艺图解政治的倾向。他们分析了过去一个时期的文艺现象是：一是把中心任务当作创作的题材和主题；二是许多作者为了配合政治任务常以工作过程、生产过程、政策贯彻过程、问题解决过程、人物成长过程，代替了自己的艺术构思；三是由于把政治与艺术划等号，往往把人物身份、职务与阶级典型等同起来。写党委书记必是党的化身，谁写了书记犯错误，谁就是反党。贫下中农和工人必是正面人物，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因为受过资产阶级学校教育，这样命中注定是反面人物；四是把典型环境理解得简单化，好像典型环境就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所以没有缺点错误，没有阴暗面，谁写了缺点错误或阴暗面，有人就会反问：“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他们两人的发言有例证，有分析，说服力强，同样受到代表们的欢迎。

诗人柯岩像诗一样充满感情的发言，也得到长时间热烈的鼓掌。她说：

“我原想到会场来大哭一场的。我要扑在我们那些饱受沧桑的文艺前辈的怀里哭；要抚摸着我的同辈的早生的苍苍白发哭，要拉着来自基层，为了他们根本扯不上的‘文艺黑线’而受尽非人折磨和凌辱的兄弟姐妹的断肢残臂哭……”但是她到了会场，不想哭了，因为她听见了进军的号角，她看到了那么多的同志都还活着，而且活得坚定，活得顽强，因而她不但为自己已穿过“四人帮”制造的血腥的漫漫长夜而高兴，还将满怀信心在明媚的春天里歌唱。她说诗歌虽被“四人帮”糟蹋得不成样子，但另一方面诗歌又是这样深入人心，这样广泛，多少人为天安门诗歌传抄，为天安门诗歌流泪、背诵，而现在又有多少人在为张志新烈士举办诗歌朗诵会，在念《为真理而斗争》。现在“四人帮”被粉碎了，在这次会上邓小平说“文艺工作者这支队伍是好的，他们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和尊敬”，她说自己是含着沉思的热泪聆听的，她说：“我已不再年轻了，经过三十年的风风雨雨，经过十年血与泪的浩劫，我不但懂得了这句话的份量，而且我在思考：为什么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也要花费我们党和人民这么漫长的岁月，这么多的鲜血呢？”最后她又向文艺界领导“进一言”。她的第一句话是“希望积极领导而不是消极防范”。第二句话是“希望领导同志爱你们的兵”。她说：“领导要深入群众，了解下情，不要偏听偏信，想当然，瞎指挥。特别是要爱队伍中的劳动者，而不要爱那些谄媚者，告密者，和挥舞棍棒者。”她又说：“历史的经历值得注意，那种一个人勤勤恳恳二十年写一本书，而一个人只用两个小时写一封告密信，就把劳动者打倒的历史，决不能再重现了！人民不允许！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棍棒是打不出百花来的。文学艺术的繁荣只能靠党的正确领导，靠艺术民主的实行，靠‘双百’方针的贯彻，以及文艺队伍为人民，为党努力工作的高度自觉性，而领导是关键。”

在几天的大会发言里，带着一颗火热的心到台上来表达自己意见的，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十几位老作家和中青年作家，他们都是大家所熟知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其中有刚刚发表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得到很大反响的徐迟，有在这隆冬季节仍习惯于穿短裤的香港诗人何达，也有以短篇小说《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受广大读者瞩目的刘心武、蒋子龙和被怀念着的与读者久违了的老作家萧军、蹇先艾、丁玲、秦兆阳和魏巍。此外，还有几个很有才华的作家，他们发言的精辟，也是使人难忘的。

这次作家代表大会闭幕的当天下午，大会秘书处宣布了选举结果，茅盾当选为主席，巴金当选为第一副主席，然后由巴金致了闭幕词。

这个闭幕词只有两千字，但非常鲜明地表达了巴金当时的真实思想。这是一篇说真话的闭幕词。他说，现在文艺界形势很好，三年来各省市的刊物发表了不少好作品，也出现了不少很有才华的作家，还有一批被迫撂笔十年、二十年的作家，又拿起笔来写出了不少激动人心的作品。这些新作家和重新出现的作家，都是经受过磨练的闯将。他又说：

“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百花争艳、满园春色的前景。只要能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只要没有人对作品横加干涉，对作家乱打棍子，那么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三五年内就会出现社会主义文学大繁荣的局面。关于这一点，我非常乐观……”可能有人要问：春天到来之前会不会刮冷风，出现霜冻呢？我想起两件事情：第一件，最近有个旅美华侨作家访问我，她说向好些人采访过，请他们谈在‘四害’横行时的遭遇，最后问他们还会出现像‘四人帮’那样的人物。据说所有的人都回答说会。我不知道她访问的是

些什么人。我的回答不同，我说很有可能再出现，也可能不出现，这就要看我们是不是愿意再受迫害。要是我们的民主和法制不健全，不完备，那就很难说了。但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愿意再让人把笔夺走！敢不敢捏住手里的笔不放！

“第二件，前不久我读到一本书《重放的鲜花》，收的全是一九五七年被打成毒草的作品……多数作者不仅给剥夺了写作的权利，而且一下子变成罪犯，有的甚至弄得家破人亡。这种对部分作家的不合理、不公道的惩罚，我们就是点头默认过，或者举手赞成过的。我们当时不想弄清是非，不敢弄清是非。我说不出来这是不是遵守了明哲保身的古训，可是作为正直的作家，是于心有愧的。我们自己终于也受到了惩罚，而且正是受到这样的惩罚，今天我们怀着无比信心向前看的时候，不能不想念背后无数才华横溢的屈死的作家，连他们也在呼喊：‘历史的悲剧决不允许重演！’我们不当再‘心有余悸’了。为什么还要害怕呢？……”

巴金在作协全会上的闭幕词，与他在文代大会上海小组上的发言思想是一致的。即我们的社会会不会再出现“文革”悲剧？第一要看我们的民主与法制健全不健全；第二，要看我们作家、艺术家自己醒悟不醒悟？在“四人帮”式人物再出现的时候，是坚持真理？还是像过去那样让人把自己的笔夺去？

在中国作家代表大会闭幕之后，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继续召开，到十六日下午才正式闭幕，选出的文联名誉主席是茅盾，主席是周扬；副主席是巴金、夏衍、傅钟、阳翰笙、谢冰心、贺绿汀、吴作人、林默涵、俞振飞、陶钝、康巴尔罕。这次大会致闭幕词的是夏衍。他在闭幕词中也一开头就谈到关于思想解放问题。他说，在邓小平同志、胡耀邦同志、茅盾同志、周扬同志的报告中都讲了这个问题，而且讲得很好。而在文联和各协会的会议上，虽然没有一个人公开反对文艺界必须解放思想，但是，对解放思想持有疑虑、害怕乃至反对的人，还是有的。这正是文艺界去年以来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进行得不够深入的缘故，也是对林彪、江青炮制的那个《纪要》没有认真批判的缘故。他还说，“不久之前文艺界曾经吹过一阵‘冷风’，有人把思想解放，文艺民主与‘四个坚持’对立起来，有的人甚至把社会上一些小撮坏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所造成的社会不安也归罪于思想解放过了头。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极端有害的。”

第四次文代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结束。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千多位代表带着从大会所给的发奋团结力量，纷纷离开北京，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有一部分作家把离京日期延迟了一天，为的是参加在八宝山举行的冯雪峰追悼会。追悼会气氛庄严肃穆，出席的人不少，再也不是三年前那次由姚文元批文“不得在追悼会上致悼词”的“追悼会”那种凄凉光景了。但是想起这位鲁迅在世时就从事党的工作，这多年一直处在被压抑、被迫害环境中，临死还听不到自己恢复党籍通知，在忧愤中去世的革命作家，许多人站在他的遗像前，不免唏嘘叹息。特别是巴金回忆起与雪峰四十多年长期推心置腹的交往，在“文革”中虽断断续续地听到他的一点消息，从听说他在干校种菜，到几年后调到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又听说他患肺癌进医院，巴金以自顾不暇，始终不曾去一封信，虽然心里一直惦记着他，不曾忘记雪峰在五十年代初期就想把他推荐到北京工作，因巴金不曾同意，结果只好自己应召去北京，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想不到不过四年左右，他就给揪了下来，从此

二十年冤沉海底，到眼前才给彻底平反。而前些时候，竟然还有刊物把他在“文革”中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当作他的遗作发表，使巴金读了十分难过。他认为再没有比这更不尊重作者了！

巴金回到上海，已经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这次他在北京虽然重逢了不少久别的老友，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冰心、沈从文、曹禺、李健吾等人先后相聚，给他带来不少安慰；但是牵挂在他心上还有一些他再也见不到了的熟人阴影。他无法把他们忘怀。比如在北京时，他听南京来的朋友谈起当年的青年作家方之，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开始前曾与陆文夫一起去看巴金，当时巴金刚读过方之的《在泉边》与陆文夫的《小巷深处》，觉得这两篇短篇小说都写得不错，它们的作者显然是两个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们在他面前谈起要组织一个叫“探求者”的业余作者团体，想约几个志同道合的业余作者共同切磋研究各人的作品，以求在创作上能有提高和创新。巴金理解他们的这样一个愿望，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也曾有个这样的打算，他觉得这两个来访的年轻人有追求、有理想、有抱负，本来应该受到社会的鼓励，但他又觉得他们想得简单，因为他已经感到气候在变化，就劝他们不要搞“探求者”，不要办“同人杂志”，要他们放弃这样的打算。但是他们没有听懂他的话，或者由于他没有把话讲得十分直率，十分清楚，以致他们没有能理解他的意思。不久他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人代会第四次会议，就知道反右斗争开始了，许多人受到批判，回到上海，终于听到“探求者”们被戴上帽子的消息，以后就不再听到方之的名字，几年后却在《文艺报》上看到茅盾评论陆文夫新作的文章，说他“摘帽”后写的几篇小说写得不错，但是后来又听到另一种说法，说陆文夫的表现不好，于是又给打了下去，一直经过十年动乱，随着许多名字重新出现的时候，才又看到这两个已变成半老的当年的青年作家，在刊物上又发表了新作。巴金读到方之的新作《阁楼上》，也听到别人谈起方之的另一篇新作《内奸》，他为方之新的成就感到高兴。这时巴金还接到方之给他的一份电报，说他已回到南京，正在筹办一个叫《青春》的刊物，请他写稿。巴金正忙得不可开交，又在病中，但想起二十年前这个青年朋友的热诚，仍抽空给他写了封回信，告诉他自己正在生病，写不出文章，希望得到他的谅解。巴金期望着能在这次文代大会上与他重新见面，但是没有想到江苏代表团代表这次比别的省市来大会报到迟了一天，为的是参加在南京开的方之追悼会。方之靠边二十年，在“文革”中受尽折磨，在一九七八年回南京时身体已经被折磨得无法再继续工作，但是他仍订了个五年计划，说自己准备“再做五年苦工”，不料只一年工夫，就与这个对他不太宽容的世界告别了！

巴金在北京还记得老舍夫人胡絮青曾向他回忆老舍死时的情景，她说：“我永远忘不了我自己怎样在深夜用棉花蘸着清水一点一点替自己的亲人洗清头上、身上的斑斑血迹，不明白是哪出了问题，不明白为什么会闹成这个样子……”他听了她的话，仿佛看见满头血污包着一块白绸子的老舍一声不响躺在太平湖的西岸。他在四次文代大会会场上没有看到老舍的影子，他感到十分寂寞。多少年来他在北京开会，总与这个老友坐在一起。每次他到北京他总去看老舍，老舍总是说：“我们出去吃个小馆吧。”而现在他的声音好像还在耳边，却永远看不到他穿得整整齐齐，有时还拿着手杖的形象了，在面前显现的模模糊糊的影子，则是躺在地上流着血的一个精神十分疲倦的老人……有个好心人对巴金说：“不要纠缠在过去吧，要向前看，往前跑啊！”

巴金听了他的话，很想接受他的劝告，但是却又无法把过去的事情完全摆脱掉，他在他的《随想录》中说：“我没有办法使自己赶快变成《未来世界》中的‘三百型机器人’，那种机器除了朝前走外，什么都看不见。很可惜，‘四人帮’开动了他们的全部机器，改造我十年，却始终不曾把我改造成机器人。过去的事我偏偏记得牢。…”

这些天他还接到在广州的三十年代老友叶非英家属给他的信，和曾在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飞机狂轰滥炸下，与他一起避难昆明的卢芒芬夫人来信，她们都要求巴金为她们死去的亲人和丈夫帮助申请伸冤平反。想起这些在“左”毒中无辜牺牲的老友，巴金有时竟无法入眠。他在“四人帮”刚垮台时，曾说自己从此可以安稳睡觉了，没有想到“四人帮”虽然垮台，“左”毒在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作的孽，却仍在日夜折磨着他。他想到叶非英把一生献给教育事业，最后却只能以猪食充饥，累死在劳动场所，卢主芬在当年曾是开明书店的工作人员，为出版事业作出过贡献，后来竟死在北大荒，临终“想喝上一碗大米稀粥而不得”。巴金为这两个友人在受冤过程中一直保持着沉默而感到不安。这些年来，“为了保全自己，我掩盖了身上的伤痕。”他在四次文代会后不久写的《创作回忆录》中谈到《还魂草》时，终于把自己的这种心情表达出来。

在文代会期间，他还听人谈起画家韩美林的经历，说他住在一个城市里，邻居养了一只小狗，他经常逗着它玩，并给它吃东西，小狗对他很有感情。“文革”开始，他受批斗，“专政队”把他绑起来游街，要他承认“里通外国”，他不承认，就拳打脚踢，把他打得头破血流，最后打断他的一条腿。正在这时，邻居的那只小狗从人丛中钻进来，到他身边为他舔伤痕，并用脚抚摸他的身体，亲热地向他摇着尾巴，还向打他的人发出吠声，似乎在向他们提出抗议。那些恶人用棍棒打这只小狗，小狗不肯跑开，他们就把它的前腿打断，地上增加了血迹。画家终于给关了起来，作“隔离审查”，几年以后放出来，他一回家就打听小狗下落，才知道小狗就在他游街被打那天开始，哀叫了三个日夜，死了。

巴金听了这个传说，很自然地想起“文革”中自己家中被迫送去医院作解剖用的小狗包弟。他觉得对不起包弟，为了想保全自己，把它牺牲在手术台上，他感到惭愧。

当然使他更加怀念并感到不安的，是他的夫人萧珊。她经常陪同他在院子里散步，有时还弯着身子，在草地上拔除杂草，同时还在午后逗着包弟玩，而现在只有她的一只骨灰箱放在他的枕边。他立下誓言，愿在自己永远闭上眼睛时，让自己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因为她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在她的骨灰里有自己的泪和血。

也就在一九八一年春天，巴金还收到一封姓杨的女同志的来信，向他诉述了萧珊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的一个同学王树藏的经历。这个同学曾经是巴金当年写《火》第三部时一个主角朱素贞的原型。她原是巴金一个老友的妻子，年纪比萧珊大一些，诚实、朴素、大方，容貌端正，但后来不知怎样，遭到丈夫的遗弃，巴金为此批评过老友，希望他能控制自己感情，不要见一个爱一个，那个老友虽然没有接受他的批评，但结果新的恋爱也没有成功。而萧珊的同学终于给她丈夫以自由，自己另找了对象，结婚后入了党，建国后在一个单位当了领导。“文革”中曾有人从东北来向萧珊了解王树藏在昆明时的情况，萧珊去世后，又有外调的人来向巴金了解，说要给她落实政策，



准备恢复她的工作。巴金在四次文代会结束后回到上海写关于《火》的创作回忆录时，提到这件事，并曾祝她安好。哪知文章发表才一个月，一个姓杨的女同志就来信告诉他：当年那位曾与萧珊在昆明一起学习、一起生活，五十年代还曾出差来上海，看望过巴金、萧珊夫妇，萧珊还曾陪着她上街买东西，请她在外面吃饭的女同学，现在“已成了个活着的死人，只有两条腿不停地移来移去，不停地挫着牙齿，有时发出压抑的怪声音，眼睛发直，上身不会动，不会说话，不会吃喝，下身垫着尿布、塑料布，只能穿两只套腿的棉裤，被子掩盖着，不然会给她踢掉……”

巴金拿着这封信禁不住发愣，想起在抗战时期他到昆明去看萧珊，曾看到王树藏与她的几个同学都住在一个楼上，和萧珊一起过着十分融洽的同窗生活，她们年轻、勤奋、快乐，充满朝气，对未来都有美好的理想，哪知这可怕的十年“文革”竟给她们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萧珊郁郁而死，而那个当年品貌端正，思想进步，为同学们爱戴，把她当作大姐姐的王树藏竟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他还有什么话说呢？

就在这样的实际感受中，巴金在上海武康路自己的书室里连续写了四篇谈“探索”的短文，寄给香港《大公报》作为“随想录”专栏的文章发表。他说他非常欣赏《大公报》上一个作者说的那句话：“要是真正搞出一些尖端性的或有创新意义的东西来，非得让人家探索不可。”但是有人警告他说：“你要探索，要创新，就是不满现状，‘不满现状’可要当心啊！”而巴金却知道自己从小不安于现状，连写文章也正是由于不满现状而开始的。只是在“牛棚”里才做了地地道道的机器人。残酷的现实，证明过去确有人用“地狱”来惩罚不安于现状的人。现在已是自己做总结的时候了，人不应该做机器人，“我还是要探索下去。”虽然一九五七年南京的“探求者”曾因为“探求”吃了苦头，几乎送了命，”但是自古以来人类就在探索、探求、追求而且创新，从未停止。”他以为文学的路，就是探索的路。但现在还有人认为只要掩住伤痕不讲，伤痕便可不医自愈，他们不满意《伤痕》一类的小说，说是这类揭自己疮疤的作品，损害了国家的名誉。其实，“未治好的伤痕比所谓伤痕文学更厉害，更可怕。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不能讳疾忌医。”他说，他现在“大梦已醒，我不再向往在传达室里度过幸福的晚年了。我还是要写作，而且要更勤奋地写作。”

写完了这四篇谈“探索”的短文，第二个月，巴金精神奋发地来到北京。因为他接到访问日本的任务，必须在北京逗留一个时期，作些准备。在北京，他住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把赴日访问演讲稿《我的文学生活五十年》定了稿，又看了一些有关日本近年来文学界情况的资料，然后他又与已调北京工作将近两年的孔罗荪一起到茅盾家里访问病中的茅盾。自从粉碎“四人帮”后，巴金每次到北京，看到茅盾，不是在会场上，就在茅盾家里。茅盾虽然已年过八十，但还是精神抖擞，十分健谈。巴金像尊重叶圣陶一样，把他当作前辈，当作师友。他在三十年代上海认识他时，就称茅盾为“沈先生”。以后曾有不少机会从他的工作中，得到教益。“文革”中，虽无机会见面，但萧珊去世后，茅盾就有信吊唁，巴金也曾有信给他，有时还通过别人相互了解关心，互致问候。一九七七年春天，茅盾在报上读到巴金的文章，非常高兴，曾在复罗荪的信中提到巴金，要他向巴金问好。罗荪把信转给巴金看，巴金看了想起过去同茅盾聚谈的日子，就写信给茅盾，对他关心自己表示感谢，并告诉他“四人帮”垮台，我头上那块石头也搬走了，关了十年的房间

和书橱也启封了，同时还请他留些手迹写几行字作为纪念。不久，茅盾回信来了，附来他写给巴金的一张字，内容是他填的一首词。后来巴金还曾要小林去北京看过他。这次，巴金与罗荪来，茅盾在自己后院宽广整洁的书房里接待他们。他虽在不久前在自己卧室里摔了一跤，但还是十分健谈，从过去的事情谈到最近摔跤时的情景，他都谈得很仔细，但仍不免在巴金与罗荪的印象中留下这个老人孤寂的影子。他们没有想到一年以后，老人就去世了。

巴金在访日前，还在北京为他的老友沈从文、汝龙以及丽尼夫人的住房奔走，他希望有关方面能注意到作家和作家遗属的生活条件。沈从文在一九八一年还与他夫人合用一张小书桌，连一间工作室都没有，为此他感到焦急。而翻译了几百万字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家汝龙，在重病中还在为自己的住房操心，后来总算得到解决，而汝龙也终以严重的肺气肿病而无法工作。散文家丽尼一生坎坷，死后家属生活困难，居住条件极差，自己的原住房未能收回，这些虽都是“四人帮”在“文革”中给大家留下的后果，但至今未能改善，使巴金感到心中不安。

一九八一年九月，巴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再一次访问日本，和他同行的有冰心、林林等人。对中国作家来说，这次与日本朋友相见，也是劫后重逢了。但是从巴金来看，这次访日除了与日本作家建立起更好的友谊之外，他还与老友冰心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早在一九三三年夏天，巴金就与冰心相识，那时冰心正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靳以陪同巴金来为《文学季刊》组稿，冰心对巴金的印象是人很忠厚，不太会讲话，见了生人比较拘谨。一九四一年，他们曾都生活在重庆，当时正值抗战中期，书市不太景气，巴金看到书店里没有冰心的书，就为她编了一本作品集，让开明书店出版，自己并为它写了一篇序。他希望冰心能写出新的作品。当冰心用“男士”笔名写了一本《关于女人》的书稿，交天地出版社后，这个出版社明知冰心当时经济困难，却压低稿费，巴金知道了，便帮助她把书稿取回，转给上海开明书店印行。冰心对巴金在别人困难的时候采取热情帮助的态度，一直有深刻的印象。六十年代初，他们曾与沙汀等人一起参加中国作家访日代表团，有过愉快的旅行；但现在又是二十年过去了，他们各自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文革”岁月，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这次他们两人还各带了自己的女儿小林与吴青作为旅伴，使他们相处的日子更热闹，更和谐。有时晚上没有活动安排，他们谈心就有更充裕的时间。冰心对巴金过去的印象是沉默寡言，见人腼腆，性情有点忧郁。这次却发觉巴金是这样开朗，这样乐观，这样健谈，以致他们谈到午夜十二点还不觉得疲倦。她这才知道巴金心里的火，和存在他作品中字里行间的热情，在他那讷讷不善于言的嘴里不是不能倾吐出来的，问题是要他感受到友情的温暖。

## 第六章 战士风霜

## 第一节 “希望在中青年作家身上”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和全国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的会议精神，随着八十年代春天的来到，很快在文学艺术界遍地开花。两年以后，巴金不仅自己已写了七十多篇“随想录”，给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增加了力量；还为冻僵了十多年的中国文艺创作圈送来了暖气，消融了冰块，促使新一代迅速成长。这些年轻的作家中不少人有相当深厚的生活积累，对所写的人物和社会生活都很熟悉；作品的艺术概括能力也比较强，因此表现的思想、生活都很真实，又有深度；在写法上也都不落俗套，力求创新。

巴金在非常繁忙中坚持自己的写作，又坚持阅读了大量新作家的作品。在他读了湛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后，还撰写了自己对这部作品的读后感。他说：“半年多来我听见不少的人谈论这部小说，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起初还听说有一份省的文艺刊物要批判它，以后越来越多的读者出来讲话，越来越多的读者在小说中看见了自己的面影。的确到处都有陆大夫，她（他）们就在我们的四周。她（他）们工作、受苦、奋斗、前进，或者作出成绩，或者惟悴死去……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当时虽然读了这部作品的许多人都深受感动，却仍有人说作者不应该把陆大夫的遭遇写得这样凄惨，也不应该在“外流”的姜亚芬医生的身上倾注大多的同情；甚至还有人责备作者“给生活蒙一层阴影”，提出质问：“难道我们新社会就这样对待知识分子吗？”或者这样提问：“难道‘外流’的人会有爱国心吗？”

面对这样的现象，巴金十分恳切，又十分坚决地说道：“我们已经吃够了谎言的亏，现在到了多讲真话的时候了。我们的生活里究竟有没有阴影，大家都知道，吹牛解决不了问题。我喜欢这本小说。我有这么一个习惯，读了好的作品，我会感到心灵充实，我会充满对生活的热爱；我有一种愿望，想使自己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人到中年》写了我们社会的缺点，但作者塑造的人物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感情，这种感情不是空洞的，虚假的，而是深沉的，用行动表示出来的。我接触到她（他）们的心，我更想到我那位遍体伤痕的母亲，我深深感觉到我和祖国血肉相连的关系。……她有伤，所有她的儿女都应该献出自己的一切给她治疗。陆大夫就是这样的人。在中国她（他）们何止千千万万！同她（他）们一起为社会主义祖国尽力，我感到自豪，我充满信心……”

出于对文学事业发展的热情关切，巴金努力为青年作家的优秀作品排除外来的无理干扰；同时他也非常同情因写作而遭受拂逆的作家的处境，曾竭尽心力，为他们解除烦忧。他赞赏王蒙、陆文夫等人复出后的写作上有新的成就，也体谅有的作家写出了有缺点的作品后处境困难，认为写作“缺点有时难免，可以批评，但不能采取打棍子的办法。”早在一九七九年春天，巴金在上海家中接待北京三联书店编辑董玉时，他就说过“希望在青年身上”，他说近年来出现的一些新作品，“是一些年轻的初学者写出来的，如《伤痕》《于无声处》等。这些作品，作家不一定写得出来，不是不能写，不是没有感受，主要是作家还是有框框，有束缚。”现在，通过文代会，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又是两年过去了，作家们的思想也逐渐解放，“文学界仿佛展开了一场热烈的竞赛。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作品一部接着一部问世，为广大读者热爱的优秀作家一个接着一个

出现，不少作家刚写了一部好作品，接着又有更好的新作发表。这都是过去数十年所不多见的现象。”这是巴金一九八一年五月在全国优秀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选发奖大会上所作的书面发言《文学的激流永远奔腾》的一段话。当时他刚读了一批中篇小说，除了《人到中年》，还有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王蒙的《蝴蝶》、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汪浙成、温小钰的《土壤》、冯骥才的《啊》、宗璞的《三生石》、蒋子龙的《开拓者》等。

在读这些作品时，他在病中，除了患气管炎，还患结膜炎，家里人正一日三次为他滴眼药水，但是他还是把这些篇幅很长的一部部作品细细读了，当《文艺报》记者从北京赶来访问他时，他都一一对它们作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称赞这些作者不但熟悉生活，而且很有写作才能，驾驭文字各有自己的本领。其中有的作家知识丰富，根基深厚，将来有可能成为大艺术家。这个现象给人们带来喜讯，那就是：我们的文学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它证实我们的前途大有希望，我们并由此增强信心。

“我在阅读这些作品中的一个比较深的感受是：许多优秀作品都很生动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崇高的心灵。许多作品中的人物虽然都是平凡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普通干部，但是他们都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生活、工作、劳动、斗争。固然有些作品揭露了我们社会的某些阴暗面，描写了我们的一些缺点，但是作者更着重地写出了主人公对待困难、同缺点作斗争的态度，那种任劳任怨、大公无私的精神境界，那种鞠躬尽瘁、坚定不移的决心。我可以这样说：许多作品都写了中国人民的心灵美。陆文婷、李铜钟、盘老五、秋文、陶慧韵，还有许多别的人，他们都有美好的心灵。而且这些作品还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中国文学界创作上的丰收，使当时已七十七岁的巴金感到十分喜悦，他对记者兴奋的谈话，后来都写在发奖会上的书面讲话里。这次评奖他虽因病没有参加，但他对中国文学界前途的深厚期望，和为评奖工作超逾寻常的辛勤劳动，不仅获奖的作家们为之精神振奋，还给大会带来了很大的鼓舞力量。

在这次评奖活动中，巴金还说过这次得奖者绝大多数都是中青年作家，是一个很自然的正常的现象。由此他还想到自己青年时代所走过的坎坷不平的道路，“深深感到我们更有责任去爱护他们，关怀他们。”他说他自己就曾受到鲁迅、叶圣陶、郑振铎、茅盾各位前辈对他的爱护、关怀和帮助。因此，他说：“从事文学艺术活动的人很少有一帆风顺的，在漫长的艺术实践、生活实践道路上，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曲折，因此更需要同志式的友爱和鼓励，诚恳温暖的关怀和帮助。粗暴简单的办法，轻蔑指责的态度，不仅会伤害这些正在成长中的中青年作家，也会直接损害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足够的令人难忘的教训的。”

人们知道，巴金说这话的时候，离茅盾去世才不过两个月。茅盾是中国的伟大作家，巴金认识他，与认识鲁迅几乎是同一个时期。从三十年代开始，巴金像尊称鲁迅为“周先生”一样，一直尊称茅盾为“沈先生”，直到去年赴日本访问临行时向茅盾告别，他依然称茅盾为“沈先生”，因为他始终把茅盾当作者师。茅盾早年所写的文学论文与翻译的文学作品，曾是巴金十几岁走人文学大门时的经常读物，抗战初期与他一起编辑刊物时，茅盾一丝不苟地看校样的情景，至今仍留在巴金印象中。他总把茅盾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茅盾在“文革”前曾为培养青年作家花了不少心血，他不但经常阅读他

们的作品，还写文章评价他们的优秀之作，在他的关怀下，曾有过几位有才华的作家出现。茅盾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是第一副主席，理所当然地，他被全国作家认作是茅盾的接班人。巴金并不曾辜负大家对他的期望，人们知道他早在几十年前就是一个辛勤的园丁，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担任总编辑时，丽尼、何其芳、芦焚、刘白羽、陆蠡等大批作家的第一本书都是在他手头编发的。现在他虽然不从事具体编辑工作了，但他还在《收获》杂志上挂着“主编”的名义，仍关心着这个杂志的组稿工作，为那些虽名不见经传，却有非凡才华的青年作家开路。说实在，稍稍知道内情的人，都了解这几年来发表在《收获》上的青年作家们的作品，事先经巴金看过的，是不少的。

对巴金如此关怀他们的成长，不少青年作家都把巴金当作者师。他们都愿把自己的遭遇向他诉说。写《沉重的翅膀》和《方舟》的作家张洁，无疑是个极有才，能的作家，但是在封建主义幽灵尚在我们周围徘徊不去的社会，作家一出名就会遭遇不少意外的打击，特别是女作家，当她的作品引起全国重视，有关她的流言蜚语就多起来了，她的处境一个时期曾使她感到困扰，她曾想找巴金讲述自己的烦恼。巴金碰到过类似这样作家的同样讲述，她们用痛苦的语调提出这些问题：“你过去做作家是不是也遇到这样多的阻力，这样多的困难？”巴金知道问题比自己想象的也许更严重些，但他一时也想不出用什么办法帮助解决所提问题，便简单地安慰她们说：“不要紧，我挨了一辈子的骂，还是活到现在。”张洁通过小林想找巴金谈话，巴金与她约定了时间，但她一来，巴金房间里又来了许多客人，结果张洁一句话也插不上。后来他才知道她真是在四面楚歌中。她想从巴金那里得到一点鼓励和支持，而他却把她随便打发掉了，他感到不安。他觉得自己没有帮助应该帮助的人，应该受到责备。特别是在后来听到张洁带着沉重的精神负担离开北方，最后病倒在南方休养地，他更觉得事情的严重。为此写了一篇“随想”，祝愿张洁早日恢复健康，鼓起更大勇气，使自己更加坚强。

到了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在中国作协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上，巴金被正式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虽然在选举的会场上，他自己举手弃权，但大家还是一致选他，他只好担当起这个职务。他说：“说实话，作家协会主席这个职务对我很不合适。我只希望自己能做一个普通的会员，一个普通的作家，紧紧捏着自己的笔，度过我最后的三五年，今年十月，在苏黎世城，一个汉学家向我提了二十几个问题，其中一个‘你对做作家协会的代主席有什么意见？’我说这个职务对我不适当，我同意担任这个职务，不过是表示我对作家协会工作的支持。今天仍然是这样。”这是那天他在被正式选为主席之后讲的话。说实在，他对当时我国的文学创作界，确实充满了信心，他不只是在这次会上称赞我们的文学事业有极大的发展，优秀的作家成批出现，好的作品大量产生；而且他说他还在半年多前，和一个美籍华人作家代表团讲过中国现在文学事业的情况，当时他对这些客人说：“最近，我读了不少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我感到，我们现在的作家和作品已超过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

巴金这样高度评价八十年代最初两年的文学创作成绩，当然是从实际出发，反映了当时冰雪消融后中国文艺界百花开绽的初春景象；但这显然也表达了巴金对文艺事业一向的主张，这就是：“多鼓励，少干涉。”许多中青年作家在他的精神感召下，作出新的努力。当初曾以短篇小说《班主任》震惊复苏中国文坛的刘心武，三年时间里已经出版了一部《刘心武短篇小说

选》，他给巴金的赠书，写了那么一句贴心话：“前辈巴金同志，我要像您一样，一辈子说真话。”上海的一个青年作家赵丽宏也给巴金赠送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生命草》，他在书页上写了这样一句话：“敬爱的巴金老师，您使我懂得了——真，是为人为文的生命，没有真就没有一切。”巴金对这个比新中国还年轻两岁的作家，破例给他在回赠的《序跋集》扉页上题了几个字：“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了解巴金的人，知道这是巴金经过几十年不寻常的艰苦创作历程之后总结出来的两句话，对作家来说，它的重量超过任何宝贵的东西。

这个时期，巴金还亲自动手，陆续编成《巴金选集》十卷，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巴金对自己创作的一次重要总结。所以在出版前，他一再对出版社表示“我唯一的要求是少错字”。出版社果真答应竭尽全力去达到这一要求。这也是他们应尽的责任。

那料巴金却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为整理书籍在房间里转身取书时，摔断了左腿。他在医院病房里住了半年，在病床上受“牵引架”的牵制，整整两个月不能翻身，不能行动。而茅盾文学奖首届授奖大会，恰好在他跌伤后一个月在北京举行，他虽然不能去参加，但他还是用口述的办法，让人用书面记下他的“祝贺与希望”，要求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事业，“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他提出文学评奖应该“选得严一点，精一点”，以求“鼓励作家写得好一点，更好一点，多拿出一些好的精神产品，满足人民的需要。”同时又提醒作家们多在“新”和“深”两个方面下功夫，特别希望我们的长篇小说在主题、人物、题材的角度上，给人“耳目一新”；作家对作品人物的生活和思想，开掘得更深一点。在一九八三年三月举行全国四项文学评奖大会时，他在医院里，虽然拆除了“牵引架”，医生还不让他出院，但他仍用书面发言方式、以《文学创作的道路永无止境》为题，去表达了自己对青年一代的期望。他对获奖的作家们说：“文学创作的道路漫长崎岖，永无止境。写出一二部好作品决不能成为包袱，以致影响更大步的前进。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目前文学发展的水平，比之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学艺术，比之时代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我们必须更加扎扎实实、持之以恒地去努力……我们应该在内容的深度上下功夫，要熟悉生活、积累生活，用正确的思想去认识、提炼生活；同时，还得认真学习、吸取营养，不断丰富自己各方面的知识。”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另一个年头的春天即将来临，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了。这已是离开一九七九年冬天举行的四次文代会和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整整五个年头。在这五年里，全国文学界，像全国各条战线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一样，也出现了姹紫嫣红的繁荣局面。全国作家代表几乎以比上一次代表大会增加了一倍的人数——八百十五人来参加这次大会，反映了五年来作家队伍的空前壮大。巴金在大会上的开幕词《我们的文学应该站在世界的前列》，指出当前文学界“刊物之多，创作之繁荣，理论之活跃，作家队伍之壮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五年前，有的同志不无‘青黄不接’的忧虑，现在这忧虑完全消除了。这五年中，老中青几代作家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且不能否认，中青年作家已经成为我国文学界最活跃的因素。他们勤奋写作，作品数量多，反映的生活面广，特别富有生气。他们在思想上、艺术上勇于思考，敢于探索，能够较好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他们中间有的人虽然才刚刚起步，就表现出一股巨大的锐气和潜力。希

望在他们的身上。”而张光年所作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报告中，列举的创作成果，提到的许多众所共知的动人名篇，恰好为巴金的开幕词提供了实证。但巴金在开幕词中又说：“我们虽然已经取得了大的成就，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新人新作，但是与我们这个处于巨大历史性变化的时代还是不相称的。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优秀作品，我们更需要史诗般的杰作，需要无愧于我们时代的艺术瑰宝，需要与我们民族灿烂的文化、与人类最优秀的文学名著可以媲美的精品。我们曾经梦寐以求，渴望早日出现当代的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出现中国的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这历史的重任就落在我们中国作家、特别是年轻一代作家的肩上。体育、音乐可以在世界上夺取冠军，我们的文学又有什么理由不应该站在世界文学的前列呢？我深深地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虽然，这一次大会巴金因病没有能出席，但他那热情的开幕词，经王蒙宣读后，在场的作家们好像看到了巴金火一样的燃烧着的心。晚上京西宾馆灯火通明，大家都结合着他的开幕词，讨论了中央领导人的报告，大家都觉得好像回到了一九七九年冬天讨论邓小平报告时那个晚上的情景。没有干扰，也没有顾虑，大家把心聚在一起，只有对文学创作事业前途的理想和希望。不少作家写信给巴金，谈自己对他的开幕词所表达对青年一代的期望，表示感谢，并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当然，许多作家还联合签名，对曾经长期从事过全国文艺领导工作的周扬表示慰问，因为他当时正在重病中。而另一个曾经长期领导过中国文艺事业的前辈作家夏衍，则在这次大会发表了一篇祝词，他说经受了十年浩劫，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被打垮，数以千计的青年作家，写出了难以统计的，有不同特色、不同风格的作品，他们勇于探索，善于独立思考，相信八十年代的作家会“青出于蓝”，胜过三十年代、五十年代。他说我们老年、中年和青年，在“文革”中都受过苦难。“心有余悸”是不难理解的，“加上中国的无产阶级文艺诞生于三十年代初的左倾路线时期，在革命和战争中成长，片面把文艺看作是教育和宣传的工具，这也已经有了半个世纪的历史，可以说左的教条主义思想影响和习惯势力，是根深蒂固的。”今天，我们文艺工作者本身正面临着一个紧迫而严峻的学习任务，这就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得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创作有中国特色的，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就得学一点中国历史，要适应当前这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得有一点科学知识。”最后他又说：“我们正沐浴着改革的春风，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数千年的文学传统，有数以千计的老中青三辈作家，我相信，中国文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创造出无愧于这伟大时代的作品的日子，是不会太久的。”

新当选的作协副主席王蒙，他的闭幕词，无疑代表中青年作家对党中央和巴金、夏衍、张光年这些前辈作家对他们的勉励表示了感谢和继续努力的决心。他说：“现在，情况明朗多了，我们自己也长进了。还等什么呢？还要什么呢？在中国历史上，又几度出现过像现在经济发展，政治安定，百废俱兴，勇敢改革，政策走上轨道，而人们迫切地要求着精神食粮的丰富与提高，作家们有这样多的积累，这样高的热情，这样好的条件呢？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欠我们拿出好作品来了……”

中国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正是在巴金、夏衍这些老一辈作家精神感召下，在中青年作家们怀着“拿出好作品来”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中，落下帷幕的。



一九八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正是农历春节期间，中国作协书记处和机关全体同志接到巴金在病中亲笔写的一封关于春节贺电的回信，信中说：

同志们：

我虽然是个衰老的病人，在我心里却燃着永不熄灭的火。只要心不死，火就不灭，我也不会搁笔。然而我毕竟老了，我不可能同你们一起大踏步前进，我没有那样多的精力。我只能跟在你们后面呐喊助成。我们文学事业的主要力量应当是中青年作家，中青年的文学工作者。你们说得好：“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全国，团结广大作家，贯彻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精神，为开创中国文学的新局面而努力工作，以利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出世。”但贯彻“作协四大”精神，谈何容易。让我们向着这个伟大目标奋勇前进吧。只要我们时时刻刻牢记全国人民对我们殷切期望，我们一定会有大的成就。

伟大的作品一定会产生在我们伟大的民族中间，我坚信。

祝

好

巴金

八五年二月廿七日

## 第二节时代的良心：《随想录》

迎着八十年代曙光开始写的《随想录》，从第三十一篇到第九十篇，确如它的书名《探索集》和《真话集》所标示的那样，作者思想集中在“探索”与“说真话”问题上。

巴金先在香港《大公报》上看到一篇题为《异样也是常态》的文章，里面有一句话，给他的印象很深：“要是想真正搞出一些尖端性的或有创新意义的东西来，非得让人家探索不可。”可是他又立刻听到人们这样的警告：“你要探索，要创新，就是不满现状，‘不满现状’可要当心啊！”因而引起他的深思：自己从小就不安于现状，总是想改变现状，不肯走家里人给自己安排的路，后来才没有落到像自己写的小说《寒夜》中那个小知识分子的那种结局！人们为什么那么害怕别人“不满现状”呢？而且现状，确实有许多问题值得人们不满啊！比如有人认为各人自己动手，为自己服务，是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好办法。因而每天早晨要自己去取牛奶，领取几块、十几块稿费也要自己到邮局排队，一个几本书的邮包也要自己去拿，什么事都要自己花劳力，花时间，但是一个人为自己服务的时间越多，他为人民服务的时间越少。知识分子为自己花体力劳动的时间多了，他的脑力劳动为别人服务的时间也就少了。诸如此类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不值得人家想想，研究研究吗？他并由此想到瞿白音为写了一篇《创新独白》受尽地狱般的折磨；而自己在一九六二年上海第二次文代大会上发的一次言，后来就成为“反党罪行”，在“文革”中给一次次揪出来示众。所有这些，“现在到了给总结的时候了！”因此，他说他还是要“探索”下去，决心不做机器人。

巴金写“随想”谈探索，一次谈了又谈了一次，二次，三次还不够，终于谈了四次，写了四篇《谈探索》。第二次他谈的是他从事文学创作，也是为了探索，以及文学创作对别人的影响问题。他说自己写小说，只是在找寻一条救人、救世、救自己的道路。说实在，是有感情要倾吐，有爱憎要宣泄，归根结蒂，是为了探索。五十多年来他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但是他从来不曾离开文学，因此他有时也就走上人云亦云的道路，“没有写作的渴望，只有写作的任务观念，写出来的大都是只感动自己不感动别人的‘豪言壮语’。”今天他又拿起笔，继续探索。但是“任何时期总有些人不高兴，不愿意看见别人探索，也有些人不敢探索，然而人类总是在探索而前进。”巴金认为自己在多数作品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要求大家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要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但是文学创作又不可能向读者说教，牵着读者鼻子走的。而事实上哪怕艺术性至高无上的作品，也很难牵着读者鼻子走。“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会随便读到一部作品就全盘接受……但这种人是很少有的。”作品对读者的影响，一般总是“潜移默化”，像食品一样，经过读者咀嚼以后消化了才会被接受，而每个读者不可能只读一本书，他总是通过读许多书，同时又经过各种现实生活的影响，并经过思考，才把它消化掉。所以“把一切罪名推到一部作品身上，未免有点不公平。”巴金还谈起杨振宁教授到他家中访问，谈起《伤痕》一类小说，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上存在的缺点，为此担心，意思是“有病就得医治，治好了便能恢复健康。”巴金自己说得更直截了当，他认为：“未治好的伤痕比所谓伤痕文学更厉害，更可怕。我们必须面对现实，不能讳疾忌医。但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只要掩住伤痕不

讲，伤痕便可不医自愈，因此不怪自己生疮，却怪别人乱说乱讲。”因此，他说：“对我说来，文学的路，就是探索的路。我还要探索下去。五十几年的探索告诉我：路是人走出来的。”

巴金谈探索的第三篇文章，主要谈作家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问题。他说“我的探索和一般文学家的探索不同，我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的问题。我想来想去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生活得更好，或者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怎样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他写文章坚持一个原则，这就是：不说假话。把心交给读者。“我不追求技巧。如果说我在生活中的探索之外，在写作中也有所探索的话，那么几十年来我所追求的也就是：更明白地、更朴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回忆三十年代他在北平和老友沈从文曾有过一场小小的争论，沈说文学作品或者文章能够流传下去主要是靠技巧，谁会关心几百年前人们的生活！巴金则认为“读者关心的是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和主人公的命运，技巧是为内容服务的。”他甚至说“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实，是自然，是无技巧。”现在四十几年过去了，沈从文改了行，在古代服饰研究上取得了成绩；巴金自己呢？虽然他说：“我的收获却不大，因为我有一个时期停止了探索，让时光白白地飞逝，我想抓这个抓那个，却什么也不曾抓住。今天坐在书桌前算了算帐，除了惭愧外再也讲不出什么。”但是他又说：“失去的时间是找不回来的。但是未来还不曾从我的手中飞走，我要抓紧它，我要好好地利用它。我要继续进行我生活中的探索，一直到搁笔的时候。”事实上，巴金的收获并不比沈从文差。他的《随想录》给予人们的影响，应该说比沈从文的服饰研究成就更大。当年他们两人的争论，实际是一场政治与艺术关系问题的讨论，或者说是内容与形式关系的争议。两人的不同经历，对艺术的不同看法，将永远成为人们研究历史、研究人物、研究政治和艺术的生动话题。

巴金坚持自己的这个信念，即“要做一个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的人”，因此他觉得必须总结自己几十年写作的经验，探索为什么有个时期“让时光白白地飞逝”，使自己感到惭愧？回想到五十年代自己的一次经历，觉得还应该再写一篇“谈探索”，来谈谈这个问题。他说当时有一份杂志的编辑来向自己约稿，要他写一篇报道一位劳动模范事迹的文章，采访由编辑陪同前往，材料也现成供给，他写了后自己看看觉得毫无可取之处，但又不得不寄去，结果那家杂志的编者不好意思退稿，把它转给一家日报发表了。现在回想起来，巴金觉得当时那个编辑意思并不错，错在自己为什么要按照别人的意志写作？当年他总以为自己“过去所作所为全是个人奋斗，为自己，现在能照刊物的需要办事，就是开始为人民服务。这种想法，我今天觉得很古怪，可是当时我的确这样想，这样做。”现在“大梦已醒”，他说“我要讲我心里的话，表达我自己的意志。”

巴金对自己经历的连续探索，使他在八十年代的创作生涯精神焕发，思考了当前中国社会的许多重大问题，显然这些问题大都从他的亲身经历出发，不少是文学艺术界的事情，触及的却是面临整个世纪的现实问题。在写了四篇谈探索的文章以后，他又连续五次、六次谈到说真话、写真话，在是不是真正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提出了看法。

还是从回忆过去的事情开始。巴金说这多年来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每次运动过后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别人谈心里话了。他自己也把心藏得很深，只想到怎样保全自己。十年浩劫

中，人们说谎的艺术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谎言变成了真理，说真话倒犯了大罪。而自己怕连累家人，也只好人云亦云。“别人‘高举’，我就‘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也就低首膜拜。”巴金说“自己也有责任”，“正因为有我这样的人，谎言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

在再论说真话时，他说他过去到处看到一些永远正确的人。“他们时而指东，时而指西，让人不断犯错误，他们自己永远当裁判官。……本人说话不算数，别人讲了一句半句就会记在帐上，到时候整个没完没了，自己一点也不脸红”。接着，他讲自己也有惨痛的教训。一九五八年大刮浮夸风时他相信别人的“豪言壮语”，同时也跟着别人讲“豪言壮语”。一九五六年他也写文章鼓励人家“独立思考”，一看到几个熟人跌倒，他自己也只好认错，开始人家说什么，自己也说什么是了。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他的脑子里好像只有一堆乱麻，已无法独立思考，只知道自己有罪，而且罪名越来越大，自己已无可救药，唯有受难，受苦，受刑，只是为了开脱，挽救妻子、儿女。“那时我信神拜神，也迷信各种符咒。”在谎言中过的日子，听假话，说假话，把假话当作真理。但是终于逐渐认出了虚假，从“改造”自己，转为保全自己。“十年中间我逐渐看清楚十座阎王殿的图像，一切都是虚假！”他终于醒过来了，回过头看清了自己这些年来是怎样走过来的，脚下原来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起来的谎言！现在，他知道即使给铺上更多的鲜花，谎言总是谎言，谎言不会变成真理！“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这是他花费了多高的代价，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在再一次谈真话的时候，巴金谈到多年来自己参加的大会小会，从整人到被整，起初听见别人讲假话，自己还不大满意，不肯跟着表态，后来一个会接一个会开下去，终于摔掉“独立思考”这个包袱，人家要他表态就表态，空话，大话，假话，就

习以为常了。经历运动越多，大家也就逐渐找到规律了：“运动总是从学习与批判开始的。运动的规模越大，学习会上越是杀气腾腾。”起初十分使人害怕，但是说的空话、假话太多了，反而不怎么可怕了。“我听见的全是空话和假话，我的胆子自然而然地大了起来，我明白连讲话的人也不相信他们自己的话，何况听众？以后我也不害怕了。”因此，巴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用开会的形式推广空话、假话，不可能把什么人搞臭，只是扩大空话、假话的市场，鼓励人们互相欺骗。”他认为说空话、说假话的时代应该过去了，说空话、说假话的人们应该收场了，那么怎样收场呢？“就由自己做起吧！”这是巴金对大家的鞭策，也是巴金对自己的行动作了注脚。

怎样才能使人讲真话呢？假话又是在哪一种情况下产生的呢？巴金在另一篇“随想”中作了思考。他先给自己历来所说的“真话”作了一番解释：“我所谓真话不是指真理，不是指正确的话。自己想什么就讲什么；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讲——这就是说真话。”实际上，就是指平时大家所说的“心里话”。它的对立面就是假话、谎话，或者违心之论。

巴金说自己在父母面前很少讲假话，因为父母对他十分亲切，关心，同时也很信任他，所以他对父母无所畏惧，他从来不曾想到要在父母面前说假话，或隐瞒什么。只记得有一次，他和几个堂兄弟一起要求私塾老师提早两天放春节假，父亲从老师处知道了这件事，对母亲讲了，母亲说：“老四不会在里头。”这时巴金恰好走进房间里，听到这句话，了解到母亲是这样信任自己，而自己该怎样对待母亲，对待生活呢？这使自己终生难忘。他认为

这是母亲对他最好的教育。这件事对他影响很大。而私塾里的老师却不是这样，他们经常用板子打学生，同时他们又只爱听他们爱听的话，这样孩子们就经常编假话给他们听，免得挨打。巴金认为“假话就是从板子下面出来的。”他在童年时看父亲审案，偶见“犯人”受刑，杀猪似的喊着“冤枉”，终致屈打成招，印象中对体刑总感到十分厌恶。但这多年来，“有些人总喜欢相信压力，甚至迷信压力会产生真言，甚至不断地用压力去寻求真话。”他说：“十年浩劫中遇到的造反派，大部分都是这样。他们的办法比清朝官僚高明多了。所以回顾我这一生，在这十年中我讲的假话最多。……封建官僚还只是用压力，用体刑求真言；而他们却是用压力，用体刑推广假话。”但是“四人帮”终于垮掉了，巴金说他们垮得这样快，他没有想到，但由此他得到一个教训，这就是“沙上建筑的楼台不会牢固，建筑在谎言上面的权势也不会长久。爱听假话和爱说假话的人都受到了惩罚。”在这一点上，巴金甚至说自己“也没有逃掉”。

巴金谈真话问题的最后一篇“随想”，是讲他与一个来访客人的两种不同看法。客人主张把不愉快的过去忘掉，多谈谈未来，甚至不妨仍讲些豪言壮语，至少可以鼓舞士气。巴金不认为这样。他说：“看见人们受苦，就会感到助人为乐。生活的安排不合理，就要改变它。看够了人间的苦难，我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光明。从伤痕滴下来的血一直是给我点燃希望的火种。通过我长期的生活经验和创作实践，我认为即使不写满园春色的美景，也能鼓舞人心；反过来说，纵然成天大做一切都好的美梦，也产生不了良好的效果。”因此，他下的结论是：“据我看，最好的是讲真话。有病治病；无病就不要吃药。”

关于客人所说“多讲些豪言壮语有什么不好？至少可以鼓舞士气嘛”。巴金却以为根据自己的经历，那么多人讲那么多豪言壮语，绘了那么多的美丽图画，却迎来了十年的浩劫，一夜之间那么多人由人变成兽，抓住自己的同胞“食肉寝皮”。“不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不把它的来路堵死，……谁也保证不了已经发生过的事不再发生。”因此，他说：“不忘记浩劫，不是为了折磨人，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我们的下一代。……保护自己并非所谓明哲保身，见风转舵。保护自己应当是严格要求自己，面对现实，认真思考。不要把真话藏起来，随风向变来变去。”

巴金与客人的争论，实质的焦点在于：究竟认真不认真，彻底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巴金的一系列有关探索问题的文章，有关讲真话问题的“随想”，归根结蒂也是在于向现实发问：“你究竟彻底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几乎对每个人，对每一桩事的决定，都是个考验。

巴金在一百五十篇“随想”中，极大部分篇章都直接或间接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或提出了与这个问题有密切关系的疑虑。在谈“骗子”的时候，他问：“有了封建特权，怎么能要求不产生骗子？”在谈“人言可畏”的时候，他说：“文明社会应当爱惜它的人才，应该爱护它的作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必须跟一切封建性的东西划清界限。”在谈“紧箍咒”的时候，他说：“我总觉得什么地方有一双猛兽的眼睛在草丛中偷偷地望着我们；什么地方有一个响亮的声音在说：‘人啊，你们要警惕！’”甚至在第四本“随想录”《病中集》，连续五篇写自己的“病中”生活时，他也记载了在医院中听到几个老朋友去世讯息时的心情，说“黄金般的心是不会从人间消失的，他呼唤友爱，呼唤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呼唤在黑夜中不灭

的灯光！他毫不留情地要大家注意有人用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

他以他正直的灵魂和真挚的感情，抒写了一万字的长文《怀念胡风》之后，结束了第五本“随想录”即《无题集》的写作，也就结束了全部《随想录》的写作。这一百五十篇作品，很快受到八十年代中期知识界、文化界的普遍重视和尊敬。“在完全失去理智的时代，个人的反抗命定要失败。敢于首先起来冲开无边的黑暗，打破无底的沉默的人，需要最大的勇气，因此也应该受到特别的尊敬。”（柯灵：《巴金〈随想录〉的随想》）。许多人认为《随想录》是一部完整的著作。一部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是十年文学中的具有文献价值、思想价值、艺术价值的重要著作。“这是一本反映了时代声音的大书，而不是五本小书。这一百五十多篇文字从众多侧面反映了我们时代和历史发展的一个清晰面貌，里面包括了作者对于社会生活、思想生活、精神文明和道德情操的富有启迪意义的思想光辉。我很同意这种看法：这部巨著在现代文学史上，可与鲁迅先生晚年的杂文相并比。”（冯牧：《这是一本大书》）。人们特别强调，认为这部作品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对作者自己思想历程的真诚解剖，都感人至深。“不论鲁迅的讽刺和巴金的激情在文学的风格上存在着多少悬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有着分明的是非和强烈的爱憎。”（王元化：《座谈发言》）。《随想录》不仅高度真实、真诚，而且有高度的历史感。“它语重心长，真是力透纸背，热透纸背。他在很多篇章里，毫无保留地深刻解剖自己的灵魂。边读边想，我们的灵魂也在受到剖析。实际上，他是在剖析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我们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当代的中外读者和后代子孙，要想知道十年浩劫之后，新中国历史的转换关头，我国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代表，中国作家的领袖人物在想些什么，日夜揪心地在思索什么，可以在这些文章里得到领悟。我们珍视这些文章，因为这是巴金同志全人格的体现，是巴金晚年最可贵的贡献。”（张光年：《语重心长》）。

《随想录》在文学散文领域里，也被作为里程碑式的作品，它是继鲁迅杂文后在我国现代散文史上又一个高峰。它的出现，为新时期散文树立了说真话的榜样，扫除了长时期在文坛上存在的夸饰现象，为现实主义传统找到了转机。“巴金同志反复强调，应该给‘文化大革命’做总结，《随想录》就是这样的历史性记录。它的重要意义，应该得到充分的估价。‘文革’是十亿人空前的大灾难，五千年古老民族空前的大悲剧，……给‘文革’做总结，明确的目的是不让这种灾难重来，不让这种悲剧重演。‘充分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这是赫尔岑的话。”（柯灵：《巴金·〈随想录〉的随想》）。因此，如何用文学形式写“文革”，曾成为八十年代作家考虑的中心议题，大家知道袂发病端正是为了医疗。巴金的这些文章，决不仅仅是揭疮疤的，“它是一种最诚恳的呼号，呼吁请求，就是要我们都用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对待我们自己，对待我们的国家。”（王蒙：《最诚恳的呼号》）。而回顾近十年的文学，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如此引起国内外读者瞩目的水平，其“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许多作品从不同角度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那十年残酷的现实，‘伤痕文学’也罢，‘反思文学’也罢，‘知青文学’也罢，‘大墙文学’也罢，在突破多年来思想观念以至创作方法上的禁锢、樊篱方面，都起了决定性的开拓和推动作用。今天，我们不是更应该用积极的行动回答巴金同志的呼吁，以他为榜样，继续挥笔，从更广阔的视野，更

宏大的规模和更深邃的揭示来反思和表现这一段历史吗？（袁鹰：《〈随想录〉的启示》）

《随想录》在海外影响也很大。目前在国际上已经有英、法、日、德、俄五种语言的译本。其中以日译本发行最早。译者是日本的新闻界前辈石上韶。他早年曾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系，长期担任共同通讯社记者，曾于五十年代中期访问过中国。在一九八一年春季，巴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访日时，石上韶曾到朝日讲堂去听过巴金《文学生活五十年》的演讲，随后他就连续翻译了《随想录》的五本分册，使早已熟读了巴金《激流》三部曲和《寒夜》的日本作家和广大读者，又很快阅读到巴金在晚年的这部杰作。后来井上靖、水上勉、宫川寅雄、西园寺公一等在访问中国时，在谈话中都曾把《随想录》作为他们近年来所读书中最受感动的书之一。日本著名的戏剧家木下顺二，有一次在与巴金谈话时，还带来他在书页上加了许多批注的《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日译本，对巴金说：“我知道你对自己的尖锐批评和自我解剖，是很痛苦的。但这也由此可见，你对未来，对现在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你在《春蚕》一文中说‘我是春蚕，吃了桑叶就要吐丝，哪怕放在锅里煮，死了丝还不断，为了给人间添一点温暖。’这对我是一种批评，也是一种鼓励，因为我本想退休隐居了。”

日本的作家和文化界人士坂井洋史、代田智明、山口守、藤井省三等四人，还在一九八四年六月，日本平凡出版社出版的由《新青年》读书会编辑的《猫头鹰》期刊“巴金文学专辑”上，发表他们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和巴金《随想录》座谈会记录。在谈到《随想录》的自我批评时，山口说：“巴金确实不断深刻地剖析自己，在《随想录》中就有他的自我反省。……巴金似乎正处在三十年代鲁迅的位置。”藤井说：“确实如此，别的作家在经历了‘文革’复出之后，都说自己是受害者，而巴金却说自己也曾是害人者，这样的文学家非常少。”山口说：“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从这种意义上讲，我认为他是位非常优秀的作家，很好的文学家。”代田说：“是的，他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还要重新修正建立自己的文学，这真不简单，确有类似鲁迅的性格……”

在联邦德国，也由科隆的迪纳尔希出版社出版了德译本《随想录》。有一位名叫赫尔姆特·马丁的作家，他“为独持己见的作家巴金诞辰八十周年而作”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说不折不扣的实话》，发表在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版的联邦德国《时代》杂志上。他说：“巴金的《随想录》清楚地阐述了‘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指出它在知识分子心理上造成的损害。……由于诚恳的自我剖析和毫不妥协的态度，人民中国的青年一代热爱他，年轻的作家崇敬他，而在他们身上，正肩负着思考过去的悲剧，评判有改革愿望的今天的责任。”

在法国，在香港，都出现过“巴金热”。特别是在一九八四年十月，巴金为接受香港中文大学颁授的荣誉博士学位莅临香港的时候，不论在机场，还是在颁授学位典礼现场，他都受到记者和读者群众的包围。在这期间，香港许多书店的巴金著作，从《家》《春》《秋》到《寒夜》《憩园》，特别是新出的《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和《病中集》，都成了读者争购的对象。香港各报刊都以显著地位大量报道巴金在香港半个多月的活动。

巴金在接受记者访问时，他在谈话中，强调作家必须独立思考，要按照自己对于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来进行创作。作家要充分运用文学作品潜移默化

的作用，把心交给读者。他说他自己在创作上，要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有记者问他如果一个人有第二次生命，让他回到年轻时代，他是不是仍愿意从事创作。巴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愿意继续写作。巴金在与记者谈话时，谈到新时期中国的文坛，他说年轻一代人才辈出，“希望在中青年作家身上”，如果按目前的情况发展，中国文坛产生震惊世界的作品，看来很有指望。



### 第三节孩子、爷爷和外公

巴金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不仅在文学艺术圈里是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他对青少年的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一九八五年初夏，他收到江苏省无锡县钱桥中心小学“十个寻找理想的孩子”来信，信里说，他们是十个五年级学生，平均年龄还不到十一周岁，在学校里都曾获得“三好”和“品学兼优”的奖励。但是近年来，他们被一些社会现象迷惑了，许多人常以钞票赚得多为荣，爸爸妈妈们谈话也总离不开钱。大家都以金钱、新衣、旅游来鼓励孩子取得好成绩。有个同学数学考了94分，伤心得流泪，原来她的爸爸妈妈答应她考95分就可以得到五元奖金。所以同学们一谈到将来，都以工资高，收入多作为奋斗目标。因此，这十个孩子写信给巴金，说他们在理想问题上，都成了“迷途的羔羊”。现在他们正在开展一个“寻找理想”的活动，他们问巴金：“你伏案写作的时候，您想的是什么？您写了那么多的书，您追求的是什么？”他们要求巴金以“最快的速度”给他们指点。

收到了他们的信，巴金很有感触，他想，理想是存在的。但各人有各人的目标，对理想当然也有不同的理解。听广播，看报纸，仿佛人们随时随地都在谈论“理想”，仿佛理想在前面等待人，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把它抓住。那么这些孩子们为什么还那样着急地向他“呼救”呢？他们不是都有了理想吗？他们在“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中感觉到窒息，不正是说明他们有自己的理想吗？他们称自己是“迷途的羔羊”，其实按照他看来，他们并不曾“迷途”，“迷途”的倒是生活在他们周围的那些人啊！

巴金这样想着，他很想立刻给他们去信，但是他身体很不好，作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他不得不去北京参加了一次大会，回来后却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一点力气也没有，连写字手指也不听指挥，所以竟一时无法给他们回答，因为这样的问题他得花很多时间才能写出一封长信答复他们，但怕这些孩子们失望，他先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他们看了信他很感动，但眼前自己身体不好，拿起笔来很困难。“倘使我能够把回信写出来，我会寄给你们。请你们耐心等待吧。”

孩子们收到短信，又是高兴，又是忧虑：巴金爷爷病了，用什么办法去问候呢？他们真聪明，想起了诗神，让她给大家带去孩子们对他的思念！“我珍藏了一本书，你知道这是谁的书？我淌着泪水读着一本书，你知道这是谁的书？这是一本什么书呀，这就是巴金爷爷的《家》！虽然我现在还只看到这一本，但它已经给了我许多，许多！”诗神让巴金看到孩子们明亮的金子般的心，他更加忘不了他的诺言，要给这些孩子“以最快速度”回答他们的信。但是他确实上了年纪了，他已经八十一岁了，而且他继股骨折断后，又患“帕金森氏症”，他写字确实累啊，而且要写的是长信，他该作怎样艰辛的努力呢？终于他提起笔来，一个字，一个字的，经过三个多星期，断断续续的写成了三千多字的复信，在这一年的六月二十五日寄出了。

一开头，巴金就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孩子们，由于自己的衰老和疾病，他只能跟在他们的背后慢慢地前进，“即使远远落在后面”，他还是要“努力追赶。但要带着你们朝前飞奔，不是我不愿意，而是力不能及了”。然后，巴金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以为“寻求理想”，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不必这样急。特别是在“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中，孩子感到窒息，“不正是说明你们的理想起了作用吗？”巴金告诉孩子们，他们其实并不曾“迷途”，问题

在于怎样看待现实，怎样看待理想与金钱的斗争。他说：“在任何社会里都存在着是与非、光明与阴暗的斗争。最后的胜利当然属于正义、属于光明。但是在某一个时期甚至在较长的一个时期，是也会败于非，光明也会被阴暗掩盖，支流也会超过主流，在这里斗争双方力量的强弱会起大的作用。”因此，巴金要孩子们在这一场理想与金钱的斗争中不要做旁观者，因为“斗争的胜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他很坦率地对孩子们说：“对着眼前五光十色的景象，就连我有时也感到迷惑不解了。”

接着，巴金就启发孩子们，想一想这样的问题：“理想究竟是什么东西？难道它是虚无缥缈的东西？难道它是没有具体内容的空话？这几十年来我们哪一天中断过关于理想的宣传？那么传播黄金疫的病毒究竟来自何处、哪方？”然后他直截了当地对孩子们说：“今天到处在揭发有人贩卖霉烂的毒品，推销冒牌的假货，办无聊小报，印盗版书，做各种空头生意。为了带头致富，不惜损公肥私，祸国害人。这些人，他们也谈理想，也讲豪言壮语，他们说一套，做另外一套。对他们，理想不过是招牌，是装饰，是工具。他们口里越是讲得天花乱坠，做的事情越是见不得人。‘向前看’一下就变为‘向钱看’。”

在信中，巴金说自己正是在这种“是非难分，真假难辨”的时候，看到理想在他前面闪光。理想是海洋，自己好比一小滴水；它是大山，而自己不过是一粒泥沙。不管自己多么渺小，从理想里可以吸取无穷不尽的力量。“拜金主义的‘洪流’无论如何泛滥，如何冲击，始终毁灭不了我的理想。问题我们要顶得住。我们要为自己的理想献身。”他说他在过去年代很早就说过，要把个人的生命联系在群体的生命上面，要把自己的同情，爱，欢乐和眼泪，分给别人。他在信中对孩子们明确回答说：“你们问我伏案写作的时候想的是什么？我追求什么？我可以坦率地回答：我想的就是上面那些话。我追求集体的幸福和繁荣。”

虽然几十年来他走了不少弯路，但理想从未在他的眼前隐去。尽管有时它离他很远，有时又似乎近在眼前，要抓住它却又两手空空，而它总像一团火，一盏灯，给他指路。巴金说自己工作时间剩下不多，但即使写一篇短短的“随想”，“字里行间也流露出我对人生无限的留恋。我不需要从生活里捞取什么，也不想用空话打扮自己，趁现在还能勉强动笔，我再一次向读者，向你们掏出我的心：光辉的理想像明净的水一样洗去我心灵上的尘垢，我的心里又燃起了热爱生活、热爱光明的火。火不灭，我也不会感到内部干枯……”他再一次表示对孩子们的羡慕，他说：

“我多么羡慕你们。青春是无限地美丽，青年是人类的希望，也是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希望，这样一个信念贯穿着我的全部作品。理想就在你们面前，未来属于你们。千万要珍惜你们宝贵的时间。只要你们把个人的命运同集体的命运连在一起，把人民和国家的位置放在个人之上，你们就永远不会‘迷途’。理想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只要不停止追求，你们会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不用害怕，不要看轻自己，你们绝不会是孤独的！昂起头来，风再大，浪再高，只要你们站得稳，顶得住，就不会被黄金潮冲倒。这就是一个八十一岁老人的来迟了的回答。”

巴金和十个“寻找理想”的孩子的相互通信，这件事让《解放日报》两位记者知道了，他们从巴金家里拿到了孩子们的信，又从孩子们那边把巴金给他们的信拿来看，他们发觉这封长信真是巴金从病中一个字一个字亲笔写

成的。但是当巴金的信寄到无锡钱桥小学时，那十个孩子已经毕业了，这封信使他们重又兴奋而又快活地聚集在一起。他们把头凑在一起，一个字一个字念着这封长信，巴金爷爷的话，他们有的不太懂，但主要意思他们领会了，这就是：个人的利益，要与集体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一个人不要只想到自己，要多关心他人，多同情他人，要爱人民，爱祖国。在这样的基础上，树立自己的理想，理想一定会成为力量，带着自己前进，它将成为一盏灯，一团火，永远鼓励自己成为一个善良的人，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献身的人。一切黑暗、腐败的势力所吓不倒的人。

十个孩子拍了个电报给巴金，告诉他：他们要派四个代表来上海看巴金爷爷。巴金知道了，担心报纸上报道了这件事，会引起孩子们搞出一些形式主义的事情来。但是孩子们还是来了，一个女孩向他献上一束花，不但代表十个“找寻理想”的孩子，还代表无锡全市的小朋友们向他问好。另一个孩子给巴金爷爷的脖子系上了红领巾，还有两位也带了另外的两件礼品来：一个赠给爷爷的是一幅丝绒画，一个送的是一尊很有意思的惠山泥人：老寿星。

从这个活动中，可以看到孩子们事先曾经经过细心的考虑，他们对这次出访是非常重视的。在把红领巾系到巴金爷爷的脖子上，又把老寿星送到他的怀里以后，他们就向老人汇报了在学校里当初怎样搞“主题班会”，及写这封信的经过；同时他们又谈了各人最近都考入中学的情况。

“那么过了暑假，你们都是中学生了！”巴金爷爷高兴地说道。然后，老人就接着孩子们的话头，谈起了自己对这次通信活动的看法：

“你们的信，对我也是很大的教育。你们这一代人是很有希望的。但我还想告诉你们，那就是希望你们踏实地学习，踏实地工作。多做一点，少说一点，照着自己的理想去做。要言行一致，说得到，也要能做得得到。见人会说好话、空话，那没什么了不起，因为漂亮话人人会讲。问题是能否做得得到。我现在已八十一岁了。我努力用自己的行动证实自己是否在说真话，是否靠得住，是否有用处。表面上的、形式主义的东西我不喜欢。”

巴金爷爷真诚朴实的谈话，孩子们都牢记在心里。他们决心做个言行一致的人。谈话时间已经超过半个钟头了，为了不影响老人休息，大家就想站起来辞行，这时巴金爷爷就请他家里人把书房里一只江西景德镇特制的陶瓷水牛，拿来赠送给孩子们。他说：“这是一个朋友的孩子从江西带来送给我的。我很喜欢它。牛一生勤勤恳恳工作，但它默默无闻。我把它转送给你们，也希望你们像牛一样地学习和工作。”

孩子们没有想到爷爷会给他们赠送这样一件有意义的礼物，高兴极了，就情不自禁地为爷爷唱了一支题目叫《小草》的歌：“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河流啊山川，你抚育了我；大地啊母亲，叫我紧紧拥抱……”巴金爷爷听了这样动听的歌，禁不住为孩子们拍手鼓励，并让孩子们簇拥到花园里合影留念。临别时，巴金又给孩子们每人赠送了一本自己写的书《童年的回忆》，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同时对他们说：“我不会忘记你们。”这使孩子们感到无限幸福。他们回到无锡，把牛的形象和老师的工作联系起来，就把这头瓷牛转赠给母校钱桥中心小学，让有理想的正在辛勤从事祖国建设的老师们知道孩子们是多么感激他们！

当然，老师们的辛苦，值得全社会注意；同时对老师们的工作方法，和孩子们究竟在受怎样的教育，巴金也十分关心。在这一点上，巴金生活中也不缺乏生动的事例。许多人都知道巴金有个外孙女，她在端午节出生，所以

大家叫她“端端”。巴金通过端端的生活，了解今天的中小学生在受怎样的教育。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日，在春节即将到来，而孩子们正在紧张地准备学期考试时，巴金写了一篇《小端端》的随想。因为他发觉端端正如她自己所说“比外公更辛苦”，虽然她是全家八口人中年龄最幼小的人，只是一个小学的二年级生，但是每天上学离家最早，下午四点钟放学回家，就摆起小书桌做功课，写写念念，常常做到吃晚饭的时候，才放下笔和课本；为了应付考试，有时吃了晚饭，还要继续温课，而考试成绩，却不一定使她自己和别人感到满意。巴金还听到过端端的妈妈在陪孩子复习功课时，大声呵斥孩子“头脑迟钝”的声音。他觉得不论学校或家庭，对孩子用灌输和责骂的办法，总不免使人为孩子担心。他想起自己在高中读书时，有一次考化学只得到30分，为了过关，第二次考试，他临时大开夜车，死记硬背，终于得到100分。但考试过后，这些死记硬背的“知识”，也就忘得一干二净。这种旧式教育方法，他以为在今天再也不能运用了。他希望新时代对学生的教育，应该采取启发和引导的方式，首先要减轻孩子们的精神负担，让孩子们的生活过得生动些，活泼些，轻松些。让他们自己开动脑筋，不要让他们按照大人的话照抄照搬，特别是不要让他们说诸如“深深地体会”之类的套话，大话和空话。

三年以后，端端升到五年级。她不再是家庭中最小的一个成员了，因为这时外公已有了一岁的小孙女；但是端端仍然是全家最忙的一个，每天回家做功课要做到晚上八九点钟，而且人大了，做功课不再摆自己的小书桌，而是借用了外公的写字台，她每天伏案时间比作为作家的外公每天写稿的时间还要长。巴金看到这情况，觉得一个小学生原该在院子里跳跳蹦蹦，现在端端比外公在封建社会中做穿长袍马褂的孩子时还要“循规蹈矩”，禁不住有点奇怪；有一次，他还听到端端在自言自语发牢骚，说“活下去真没劲！”这使巴金大吃一惊。巴金知道孩子的随便说话，原不必太顶真，她当然不会因为功课重而真的就此“看破红尘”，但是使十一岁的孩子感觉到现实生活引不起她的兴趣，这样的小学教育确实值得认真考虑。他想起自己三年前提出的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得到改善，这真使他感到难过。于是他又写了一篇有关中小学生学习问题的随想，题目叫《再说端端》，他不但对学校使用“填鸭式”教育提了意见，而且似乎在这里也向他的女儿不客气地提出了批评，他说：“说也奇怪，我女儿思想很开放，但是要她抓孩子的功课，或者她发现了孩子的毛病，就缺乏耐心，不由分说，迎头来一阵倾盆大雨，有时甚至上纲上线，吓得孩子无话可说。我不同意这种教育方法，我心里想：她不开窍，你帮助她开窍嘛。可是我女儿女婿都在为自己的‘事业’忙碌着，抽不出时间来照顾孩子的学习。我在旁边冷静地观察，也看得出来，孩子挨骂的时候，起初有些紧张，后来挨骂的次数多了，她也就不大在乎了。所以发生过的事情又继续不断地发生。做母亲的却从未想过：为什么孩子会有‘活下去真没劲’的思想。她大概以为‘不要紧，大家都是这样地教育成长的’。”巴金反对用“填鸭式”教育孩子，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引导和启发他们自己思考问题，使他们“真正懂得什么是伟大，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好，什么是美，他们才有可能向伟大、崇高、好和美的方面追求。听话的孩子不一定是好学生，肯动脑筋的孩子总比不动脑筋的好。”巴金在想到端端的时候，也想到自己。在他书橱里，到现在还放着他的二三十册笔记本，这些笔记本曾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后来落实政策时退还给他的。那里面全是自己像

小学生那样战战兢兢地记下来的“老师”们的教诲，强迫自己背诵、死记，顺着别人的思路想事情，作为“精饲料”吞在肚里，结果却常常换来迎头的倾盆大雨。因此，他既同情端端，也怜悯过去的自己。而端端有时也的确使他感到温暖。他摔伤后从医院回来，生活不能自理。每天早上，端端就在六点钟起身，帮外公穿袜子，然后说了声“再见”，就一个人下楼读书去了。晚上，端端又为外公铺床，笑着说你穿袜铺床的事“我就承包下来”了。

到了一九八六年夏天，端端小学毕业了，面临的是考中学问题。家里人都期望端端能考进重点中学，但是考试成绩公布后，孩子哭着回家，挨了她妈妈一顿骂，好像一家人都泄了气。外公却不这么扫兴，他想：“进不了重点学校，做一个普通人也好。”他认为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别的国家，普通人总是占多数。而一个国家要建设好，也只有把多数的普通人教育好了，才有可能实现这样的愿望。如果单靠“重点”人的发号施令，而没有普通人的实干，国家是不可能建设好的。“全国人民要是只靠一个人动脑筋，一定想不出好主意。”他还是主张认真办好普及教育，也就是主张大面积提高普通中学的教育质量。在他的《三谈端端》发表后第二年，国家教委曾下达了“加强初中，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的指示。

巴金在“三谈端端”以后，就不再在文章中提起端端，但是在一九八七年十月中旬，当他回到了久别的故乡成都，曾在十分忙碌中，抽空给他的小外孙女写了一封不太短的信，信中开头说：“端端，你好，外公很想你，也想念小孙女。在这里比在家里忙，看见不少的人，不过我很高兴，我回到了久别的故乡，闻到了家乡的泥土味，听了那么熟悉的声音。这感情你不会理解，因为你还小。你面前有那么宽广的世界，你应当朝前看，你也只会朝前看，你不会像我那样常常回顾过去。但将来有一天你也会想到你妈妈丢开你去杭州工作的那些日子。不过那是将来的事情，目前你还是做一个好学生吧。勤奋学习最重要，但还需要适当的休息，也少不了跳跳蹦蹦的玩耍，年轻的孩子嘛，应当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和快乐的少年时代……”信中又说：“你看，我又在发议论，写文章了。……其他的话以后再谈，现在我只告诉你，我在成都，在这里过得愉快，过得很好。我想你妈妈会告诉你我们在这里怎样生活。万一没有时间写长信，她回上海后也一定要讲个滔滔不绝！……”这封信的最后，署着“老外公”三个字。

#### 第四节 奉献

用引导和启发的办法，而不是用干涉的办法，让孩子自然地成长，是巴金一贯的主张。他对外孙女是这样，对外孙女的上一代，也是这样。许多人都还记得，巴金虽然四十岁才结婚，但他一有了孩子，就能让孩子在一个文化和道德素质都非常高的家庭中成长。巴金自幼就厌弃等级观念，“怎能搭主人架子？主人是人，佣人也是人，大家都是一样的。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他母亲的话至今还在他的心里。巴金在家中从不声色俱厉，不论在霞飞坊，还是在武康路，人们从来不曾看到巴金有过“家长”的架子。在他的家庭中，长辈晚辈，主人佣人，在人格上都一律平等。只要稍稍留心看一下，就会发现在他的家庭里，没有一个人性格拘泥、行动瞻前顾后、讲话谨小慎微的人。显然在这里每个人都受到尊重，每个人都自由。巴金和萧珊曾希望女儿小林成为一个音乐家，在她还不到十岁的时候，就曾请人给她教钢琴，但是小林长大以后，她更多的爱好在文学和戏剧艺术，他们就不勉强她从事音乐工作。

对于小棠，巴金更从来不曾期望他成为一个作家。在孩子青少年时代，刚刚碰到乌烟瘴气的十年动乱，巴金更难想象指望孩子步自己的后尘，却不料孩子从童年开始，耳濡目染，会和巴金一样，从不想成为一个作家，只是因为经过一段尝遍甜酸苦辣的生活以后，有话要讲，有感情要抒发，而又有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到来，恰又生活在这样一个与文学结了不解缘的家庭环境中，很自然地拿起了笔，写成几篇小说，成为八十年代的一个“文学新人”，这使巴金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但是他尊重每个人的才能发展，他并没有进行阻挠。小林是个文学编辑，当她从她的弟弟手里接到他的处女作《机关轶事》，看了后禁不住发笑，因为那里面有不少“黑色幽默”。如果是别人的作品，无疑她会把它发表在她负责的《收获》杂志上，但是它的作者是她弟弟，她不能不避嫌疑。她一边将稿子交小棠修改，一边找《上海文学》的编辑彭新琪，告诉她李小棠写了篇小说，有些基础，现在正在修改，等修改好了想让她看看，用不用，由她决定。彭新琪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她认识李小棠，一直把他当作小弟弟，却没有想到他会写小说；但这件事对她说来也不是十分意外，因为她是老编辑，“舟子夜眠觉潮生”，她知道现在正是出新人新作的时代。果然，《机关轶事》拿到手看了后，她非常高兴，觉得作品不但幽默风趣，而且很有意思，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写作基础很好。她就对李小棠说要把它发表出去，同时谢谢她能把这样的作品让给《上海文学》刊用。小林却关照她按平时发稿惯例写发稿单，千万别说是李小棠的作品，按稿子上写的“李晓”笔名发表。彭新琪明白了：巴金的儿子不愿意靠父亲的声誉登上文坛，巴金的女儿也不愿意让人误会用手中的权发表自己弟弟的处女作。而她彭新琪在这样的情况下，有责任义不容辞地应该把这样一个新人新作推荐给读者。因而她照办不误，在发稿单上写了自己的审读、推荐意见，稿子很快通过了。谁也不知《机关轶事》的作者是巴金的儿子。刊物出版后，北京的《小说选刊》要把这篇小说转载，打长途电话给《上海文学》编辑部，问作者的简历，彭新琪只告诉他们李晓一九五一年出生，在安徽农村插队六年，后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在一个机关里工作，并没有告诉他们李晓是巴金的儿子李小棠。后来也许为了汇寄稿费，他们来要作者地址，这才把真情传开了。以后，彭新琪又约李晓写第二篇作品。他

没有辜负她的鼓励，交给她一篇题目叫《继续操练》的小说，依然是一篇带有作者特有的机智幽默之作，后来得到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巴金对小棠在文学创作上出其不意的成绩出现，感到高兴。巴金从来不勉强自己的子女继承父业，从他们出生那天开始，他就无意培养子女成为作家，但也不像有些做文字工作的人，因为尝尽本行业的辛酸滋味，几乎是深恶痛绝，说什么也不许子女再在自己的本行中吃两遍苦。巴金不是这样。他唯一的期望，是让子女学到本领，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当他理解到子女已经成才，这是他晚年最大的安慰。因为他觉得把孩子培育成才，这也是个对社会有益的奉献。有一次，一个客人到巴金家中，恰逢巴金感冒不适，躺在床上，客人上楼，只见吴强正坐在他床边，与他谈话，不知怎样谈到在《收获》上发表的李晓新写的小说《关于行规的闲话》，客人说它风趣幽默，富有内涵，与巴金的短篇有迥然不同的风格。这时巴金很自然地露出慈祥的父亲的笑容来，他说：“是的，像这样的作品，我也还写不出。”显然，他对小棠的努力，感到欣慰。

“人应该靠自己劳动来养活自己。”巴金在他青年时代就这样说过。他一向认为做长辈不应该把太多的财产留给后代。六七十年前，他的祖父在听到他最宠爱的儿子（巴金的五叔）在外面寻欢作乐、腐化堕落时，他感到非常意外，不仅心里非常痛苦，同时也感到非常孤独，终致精神失常。巴金那时就说过：“祖父让子孙过寄生虫生活，害了子孙，也害了自己，这是十分愚蠢的事情。”几十年后，他在谈到对外孙女端端的教育问题时，又说：“不论是人，不论是社会，都不可能照一个模式世代代不变地传下去。依赖父母的子女是没有出息的。下一代不会让我们牵着鼻子走，他们一定会把我们抛在后面……”

讲怎样的话，就做怎样的事。人们知道巴金曾把十五万元存款和以后出版书的稿费陆续捐献给现代文学馆。最近又把所得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奖金五百万日元捐赠现代文学馆和正在筹建的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同时，巴金还有一个比捐存款、捐稿费更为难能可贵的实际行动，值得人们永远感谢他，这就是捐赠几万册藏书。不少人都了解巴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买书藏书。他从法国读书时开始，几十年如一日，每到一个地方，总走遍书店、书铺、书摊，千方百计购买自己心爱的书。他收藏的书，不仅限于文学艺术门类，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人文、历史、地理以至于医学各部门。过去他的大部分稿费都用在买书上。这里有他无限的心血。现在他把它们分门别类，按内容性质，分批陆续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福建泉州黎明大学，和成都慧园。这并不是说这些书他家里都不要了；相反，巴金家庭里的成员，都是知识分子，不用说他的儿子、女儿、侄女、媳妇、女婿都是作家、编辑和教师，就连他的两个年迈的妹妹也都知书识理，连《红楼梦》里的诗词，到如今都能背诵如流。所以说，书对他们都有用。巴金没有把全部藏书留给自己的亲属，这是因为他觉得他的大部分藏书，对他所捐赠单位来说更需要。而这些书，他的子女辈目前却并不急于要用。他以八十多岁高龄的衰病之躯，弯着腰，拄着手杖，亲自动手，把这些书整理出来，这是他爱书爱到极点的表现，也是他爱人民爱国家感情的自然流露。

在家里，他总是和颜悦色。只有大家把他的书桌或书架弄乱，找不到自己要用的书时，他才可能眉皱脸红。在平时，对家务琐事，他非常随和。他

在家庭中，从来不“一个人说了算”，萧珊在世时如此，萧珊去世后更不必说。有时连他自己一个人的事，如穿衣、吃喝、出行、接待客人等等日常事务，也总听家中安排。至于涉及大伙儿的事，那更发扬民主。比如晚上看电视，听了新闻广播后，客厅上的两把长沙发、四把单人沙发，照例家人满座，有时还有三天两头来家的弟弟李济生，和刚把厨房收拾得干净的两个保姆，以及临时请来为巴金行路搀扶的同乡人小罗小吴，大家都无例外地坐在沙发上。巴金则仍独个儿坐在木椅上。“今天看啥呢？”符合大众的普遍兴趣，一般总以看故事连续剧的时候多。偶然看的片子放映时间有矛盾了，究竟看《鹰冠庄园》还是看别的什么？这时巴金便笑着，不表示态度，听大家的决定。在看戏看电影这一点上，巴金与鲁迅在世时经常看《罗宾汉》、《人猿泰山》之类的影片一样，兴趣比较广泛，所以有时家里人要去看《石人圈》或者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之类胡编乱造的节目，他也听妹妹们安排，照看不误。小林在这些方面就不大随和，她一看到这样的电视片，就扭转头上楼去了。巴金对孩子们择食，也各听自便，从不干涉。小棠和他一样，有个时期看武侠小说入迷；他看电视，有时为了看一场世界足球比赛，深更半夜两点钟都会从床上爬起来的。巴金第二天早上知道，也把这当作一桩新闻听，哈哈一笑了事。

这当然是小事一桩。至于儿女婚姻大事，巴金也从不过问，听他们自己作主。李小林与祝鸿生在“文革”中结成患难夫妻，历来受到巴金称赞。一九八三年七月，小棠与他的同学、复旦大学青年教师陈晓明结婚。这也是一对理想的伴侣，他们结婚一年后就有了个女孩，给巴金除了外孙女之外又添了个孙女。像欢喜端端一样，巴金也十分欢喜咄咄，但到了五岁，她就让去美国进修的妈妈带到波士顿去了，一年后她就会讲英语，照了个“西方化”形象的娃娃照寄给老爷爷，爷爷给她去了一封回信，信中说：“我的小咄咄：你好！收到你的信，好像见到你本人。我跟你分别一年了。老爷爷那么想念你！这一年来我什么地方都没有去，因为腿痛，行动不便，除了华东医院外，什么地方也去不了。这样一个大上海这几年变化很大，可是老爷爷一点也没看见，一点也不知道，你看老爷爷多可怜。咄咄可以到处跑，老爷爷只好坐在小桌前面。老爷爷真想念咄咄。照片看到，可是不像老爷爷看惯了的小宝贝了。这个美丽的‘西方化’小姑娘，老爷爷还不熟悉，你得让我多见见你，看看你的笑容。你在信上说你会说英文，老爷爷很高兴。可是我下次同你见面时，希望你不要忘记说中国话。老爷爷爱你，我的好咄咄，我相信还可以见到你，我给你留着两件礼物：一，来回飞机票一张；二，我的《全集》一部，希望你有机会读它。……”八十六岁白发萧然的老爷爷给六岁天真的小女孩写信，只有童话世界里才有的故事，在巴金的家庭生活中却是非常真实地发生着。这是因为这里有一颗慈蔼诚实的心在跳动着，有一片对人间充满着无限热爱的真挚的感情在荡漾。

他爱上海，知道上海这几年变化很大，但因为腿痛，行动不便，他什么地方都去不了，他是多么痛苦，多么寂寞！小孙女能讲英语，这使老爷爷高兴；但老爷爷还要她不忘记说中国话，要她回来让老爷爷看看，相信他还可以看到她。他是这样坚强，他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

他所倡议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现在已经初具规模。在八十年代初期，他就曾对一个朋友说过：“我年纪大了，没有别的任何想法，只想切切实实做几件于人民有益的事情。如果我能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建立起来，



这将是晚年的最大幸福。”他甚至连做梦都发觉自己站在文学馆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他认为我们再也无法像十年动乱中那样把文学资料都当作“四旧”来烧毁了。当时他还写信给《人民日报》从事编辑工作的姜德明，谈起现代文学馆的筹建，说：“我认为由作协来办最好，房子向政府要，资料由大家捐献，经费也可以由作家和文学出版社捐赠，过一两年便可以自足自给。我愿意为它的创办出点力，而且相信肯出力的人一定不少。”后来这件事得到孔罗荪、曹禹、李健吾等几个老友的支持，并由罗荪访问了茅盾，茅盾极为赞成，愿把自己的全部创作资料包括《子夜》的原稿提供给现代文学馆。叶圣陶、冰心、夏衍等闻讯也热情表示赞同，还为此提供了资料线索。巴金知道了这个情况，更增强了信心，写信给罗荪说：“这样的资料馆什么时候也需要。它只是一个资料中心，对哪一派都无妨碍。而且有了它，对旅游也有好处，还可以吸引外国的研究者。”罗荪、臧克家、曹禹、唐弢还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响应这件事的创办。由周扬、夏衍、丁玲、冯至、艾青、刘白羽、沙汀、张光年、陈荒煤、贺敬之等人参加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大家都热烈赞同建立现代文学馆，巴金还表示准备献出稿费十五万元，作为建馆的基金，并愿捐出自己的全部手稿和有关资料。这样，以孔罗荪为主开始了筹备工作。巴金向党中央领导人写了信，要求帮助解决现代文学馆的房子问题，经过种种努力，在各方面的协助下，终于找到了北京西郊万寿寺西院作为馆址，在一九八二年十月举行了成立典礼，胡乔木代表党中央应邀出席，为文学馆挂上了叶圣陶手写的长匾。当然，万寿寺西院是明清时代建筑，房屋是砖木结构，在不久前还曾有过一场大火、三座大殿被焚的经历；如果作为永久之计，现代文学馆的珍贵资料仍需要有一座有现代化设备的钢筋混凝土大楼来保证它的安全，以防潮湿，以免火烧，以防虫蛀等等。

但是就眼前情况来看，作家们捐赠资料的热情，是十分使人感动的。在巴金以一次十五万元捐款，和分七批捐书七千四百三十四册以后，他的老友冰心就立即响应，说“凡是我所有的书，全部交给文学馆”；周扬家属也按照周扬的志愿，把一万五千多册的藏书捐献；茅盾的儿子韦韬也将茅盾的遗物一批批整理出来，陆续运送到文学馆，在重病中的孔罗荪以一套至今已无第二套的《抗战文艺》杂志，亲手交结文学馆新的负责人。全国各地作家为充实文学馆的库存，纷纷以自己珍藏的作家书简、手稿和出版的著作捐献了出来，各种生动的事迹，环绕着文学馆的一些工作人员，千方百计地搜求各种珍贵资料的艰辛努力，为新时代谱写了一曲品位极高的精神文明之歌。

巴金捐书，以衰病之年，花费了巨大的劳动。他对这些书分门别类，加以整理。除了把各个时期各种版本的自己著作，以及现代文学类的书刊（包括作家赠书），捐赠现代文学馆之外，他还把大批珍藏多年的外文书送给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也和现代文学馆一样，收到每批赠书，即十分郑重地以精装烫金封面写出“第×批巴金先生赠书目录”字样，把赠书目录编印成册，以备查考。这些外文书，英、法、俄、日、德文都有，有许多是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珍贵史料，不少书是海内外孤本。另外，巴金还有几千册书赠给上海图书馆，不少是旧版的文学著作，主要是俄文书，其中大部分是革命家传记和他们的著作，还有一部俄文百科全书。巴金的另外两个赠书对象，一个是东南大学附属高中，即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附中，给他们的一批书主要是鲁迅著作；另一个对象是福建泉州黎明大学，这所学校的前身黎明中学，

三十年代巴金曾去住过，至今还设有巴金文学研究所。巴金在将书捐赠给这些单位时，都花了不少心思。他保藏的有些解放前期刊，因各种原因，有所短缺，如《文学季刊》《文季月刊》《文学》《中流》《文丛》等等，或则缺了一期，或则少了两本，他为了能完整地捐赠给对方，特地记下期号，要子女去旧书店购求凑齐，有些丛书，也是这样，他总尽可能把它们凑满成套，争取整齐无缺。

巴金这样执著地爱书，爱孩子，爱青年，归根结蒂，是爱祖国，爱人类。虽然他年迈体衰，家里人为了维护他的健康，千方百计做工作，劝导人们不要多去惊动他，以免影响他的休息。但是仍有许多人情不自禁地给他写信，向他诉述对他的崇敬与感激。有许多是部队的战士，也有许多是学生与工人，更多的是孩子，还有不少是残疾人，他们都是巴金著作的热情读者。巴金当然无法一一作复，曾有个时期，他的侄女李国焯曾根据他的嘱咐，为他代笔，处理了不少这样的信。但是巴金有时仍不管自己年迈体衰，依然振作精神，亲自作复，甚至到一九九一年五月，他还写过一封回信，给来自他故乡成都东城根街小学的四十个小朋友，这些小朋友每人写了一封给巴金的信，说：“要像巴金爷爷那样爱祖国，爱家乡。”巴金面对这四十封跳动着孩子的心信，也以孩子样的真实的心，给他们写了回信，他说：

“不要把我当作什么杰出人物，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表达我的这种感情。我今年八十七岁了，今天回顾过去说不到失败，也谈不到成功，我只是老老实实、平平凡凡地走了这一生。我思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不在于享受。”

## 第五节 荣誉不失赤子情

当然，巴金对人民最大的奉献，还是他的著作，他的《家》《春风》《秋》，他的《寒夜》《憩园》，和他的《随想录》。

他受到全世界的尊重。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五日，意大利驻华大使塔马尼专程来到上海，会见中国文学大师巴金，向他宣布意大利政府的决定，将一九八二年但丁国际荣誉奖授予巴金。同时还由意大利但丁·亚利基里学会会员费尔南多代表学会赠送了一九七五年为纪念但丁诞生七百周年专门印刻的四巨册《神曲》的精装本。巴金说：“这是很珍贵的礼物，我很欢喜但丁的作品，在困难的时候，但丁作品增加了我的勇气。”这个一年一度的国际荣誉奖，在此之前，曾经先后授给过三位对但丁的名著《神曲》作出过贡献的外国学者和作家，巴金这次是第四位了。但丁在十四世纪初，为维护共和国独立，曾遭到放逐，而他认为这是一种光荣。在放逐期间，他意识到自己担负着揭露现实，唤醒人心，给意大利指出政治上、道德上复兴的使命，他中断了《论俗语》和《飨宴》的写作，开始另起炉灶，创作《神曲》，想在新旧交替时代，通过迷惘、错误、苦难、考验的历程，探索真理和至善的境界。意大利政府以十四世纪但丁的荣誉，赞扬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巴金在“文革”的地狱中对《神曲》的热情期许并取得重大力量。巴金以谦虚的态度，来对待这次殊荣，当他接到由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转来精制有但丁浮雕像和巴金自己名字的荣誉奖章时，他说：“由于意大利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才使我获得但丁国际奖。我沾了祖国和人民的光。”

一九八三年五月七日傍晚，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来到上海，他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为巴金举行了授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仪式，他的讲话全文是：

大师：

我很荣幸地以法国政府的名义授予您荣誉军团的勋章。

我的国家在此推崇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家》、《寒夜》、《憩园》的不朽作品的作者，著述不倦的创作者。他的自由、开放与宏博的思想，已使其成为本世纪伟大的见证人之一。

您有一天曾经亲笔写过：“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诚如一个‘从生活的洞口……’的‘批评家’所说，我‘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所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然而您却用自己对于人们及其脆弱命运的巨大同情，用这种面对压迫最贫贱者的非正义所抱的反抗之情，用这种——正如您的一位最引人注目的人物绝妙言之的‘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使您的著作富有力量与世界性意义的敏锐力与清醒感，在注视着生活。

今天法国同样给一位朋友带来荣誉。他越过空间与时间，给在五十年前发现巴黎，对我国革命的伟人们与我国人民的生活充满激情的遥远的四川年轻大学生，给忠心耿耿，始终不渝的人，带来她的友爱之情。

对于昔日有幸目睹过您崭露年轻才华的法国人，对于多年之后在您率领第一个中国“笔会”代表团重返我国时，再度欢迎您的人，尤其是对于今天被您的著作日益增多的译本吸引而至，同时转而发掘这些奇妙篇章的无数读者来说，您就是中国的形象本身，一个经受过若干世纪的考验所锤炼的，并

且不断从自身产生复兴动力的、兄弟般的中国的形象本身。

今天，在您的身后，在中国的文学界里，新一代正在崛起。他们从您的形象之中看到了自己，并且将希望寄托在对您这位老人的效法之中，对您这位老人来说，“青春的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我的鼓舞的泉源。”这一代人正在准备，并且业已开始，循着您的脚印，由自己向世界表明，——表明一个现代的、开放的、富有多样性的中国正决心全力为人类伟大的文化运动做出贡献。大师，法国通过您，谨向这一代人致以敬意。

当时巴金正住在华东医院养病，为了接待法国总统，接受这个荣誉，他应邀去参加了这个仪式。在受勋时，他说：“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的作品被译成法文，受到读者的喜爱，这就是对我的很大荣誉了。我的第一部作品是在法国写成的，从此我走了文学的道路。五十几年过去了，今天总统阁下光临上海，在我病中给我授勋，我认为，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成就，这是总统阁下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尊重，对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的尊重，这是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象征。我怀着愉快的、感谢的心情，接受这个荣誉。今后，我将为我们两国人民友谊的发展和文化交流，作出更大的努力。”巴金在受勋后，向密特朗总统赠送了新版十卷本《巴金选集》。密特朗又在人们纷纷围着巴金向他道贺时，对巴金说：“巴金先生，你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知道得很多，我知道你曾经用文艺形式写过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你对这些确有非常深刻的了解。我很高兴能够认识您。作为法国代表，我有机会为您授勋，我感到高兴。这也是法国的荣誉，因为您是当代世界伟大作家之一，您的作品在法国读者中有很多影响。”

在苏联，巴金的作品也有广大的群众。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苏联对外友好和文化协会，与苏中友协在莫斯科的“友谊之家”联合举行晚会，为巴金提早庆祝他的八十寿辰，在会上，由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利季亚·尼科利斯卡娅作了关于巴金的生平与创作的报告。几年以后，当巴金八十五岁生辰来到时，苏联驻沪总领事斯特罗科和他的伙伴们还来到巴金寓所，向巴金转达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驻沪领事馆、以及苏联广大读者对巴金的问候，并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巴金的“人民友谊勋章”转交给巴金，对他对“中苏

两国文化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人们知道巴金不仅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高尔基的《草原故事》等名著的译者，而且在他主持出版社工作时，还有计划有规模地向中国读者介绍过旧俄和苏联作家更多的有国际影响的巨著，包括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的作品。巴金说：“感谢苏联人民授予我荣誉勋章，这使我想起五十年代多次访问苏联的往事。发展人民之间的友谊是我一生奋斗的目标。我始终记得列夫·托尔斯泰那句话‘把人民团结起来就是美的善的’。直到今天，托尔斯泰仍是我尊敬的老师。我在十四五岁的时候，俄罗斯文学和它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曾唤醒我作为一个中国青年的年轻的灵魂，使我懂得热爱文学、追求人民友谊，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保持艺术家的良心。”苏联总领事告诉巴金，由于巴金勤奋写作，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追求真理，找寻光明，他的主要作品如《家》、《春》、《秋》等早已植根在苏联读者心中，成为苏联文学界的一种精神食粮。总领事还拿出他随身带来的巴金新作《随想录》，请巴金在这部书的封套上签名。巴金一边签名，一边微笑说：“是读者养活作家。”总领事听了，笑着回答说：“正如你作为作家常说的：

文学足以净化人们的心灵。”

日本人民对中国作家的友谊，更使巴金难忘。六十年代他曾三次去日本，以文会友，结识了不少日本作家。八十年代他两次访日，他因病住在华东医院时，承日本作家的热情关切，井上靖在一年中三次来医院问候，并邀请他参加即将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另一位日本作家水上勉在写了《成都游记》、《在巴金故居旧址》之后，又与他的四个同行，到巴金家中访问，也发出过再次赴日的邀请。一九八四年秋天，巴金终于在病后应邀到东京出席国际笔会四十七届大会，发表了《我们为什么写作》的讲稿；并去扫了在“文革”期间曾殷切关怀过巴金安全的老友中岛健藏墓地。现在连井上靖都去世了，但是日本人民对中国作家的感情始终留在巴金心中。日本文化界也没有忘记这位对中日人民友谊作过贡献的中国作家，当第一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决定颁发给五位世界名人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巴金。巴金虽然（包括三十年代）去过日本六次，到过横滨、东京、广岛、京都、奈良、德岛、长崎等地，而福冈却不曾到过，但是他对它存有印象：银白色的关门大桥，碧波上如絮的浮云，他在书本上获得过关于它的知识，包括它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巴金曾对中国新闻社一个记者表示过对福冈的向往，他说：“早在日本的奈良、平安朝时代，日本留学生到中国留学都是从福冈附近的博多出发的。博多自古以来，在中日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方面都起过重要作用。”他认为在这样一个美丽的与中国有深远关系的地方去接受文化奖，是很有意思的，可惜的是他在病中无法亲去领奖，他让他的儿子李小棠代他去参加这次盛典，并宣读了自己的讲话稿《我和日本》。同时获奖的另外四个人是：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泰国文学家、评论家克立·巴莫，英国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著名学者李约瑟，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矢野畅。

“我是一个作家，总想为发展中国的文学事业多做一点贡献。”这是巴金把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全部奖金捐献给有关单位时讲的话。其实，他对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希望自己多吃一些工作，多年来身体力行，不仅表现在捐书，捐手稿，捐资料，捐奖金，捐稿费上；更主要的还是在思想上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作了先导。荣誉不失赤子心。尽管受到海内外高度崇敬和表扬，他还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探索与求真之心不变。特别是在八十年代，这个十年是中国文坛的春天。春天是孕育人们理想与希望的季节，它显然曾给巴金带来过许多美好的理想，和十分的信心。在面临一九八七年新年到来的时刻，他给当时在北京开幕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在这封信里，他一开头就回忆了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时，曾出现过一批有才华、有见识、有朝气的青年作家，但是不幸，过激的运动给他们带来恶运，他们中间一部分人刚刚显露才华，就受到社会对他们的不公平待遇，不但剥夺了他们写作的权利，而且还由此受苦受难二十年。因此，巴金在信上对新一代青年作家说：“你们比他们幸运，你们虽然也经历了风风雨雨，可是你们创作刚刚起步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比较宽松、和谐的环境，这种安定团结的气氛是人们渴望了很久的。老一辈作家期待了多年的创作自由终于在你们眼前露面了。”

巴金认为近十年来，作家队伍有了很大发展，这是生活培养作家的结果。但是这并不是说生活会自然而然地造就出作家，主要还是由于作家能在自己熟悉的生活中进行深入的思考，“说自己想说的话，写自己真实的感受。”他特别强调“不要人云亦云，违背自己的良心，说自己不愿说的假话。”他

说自己在两年前就曾提到我们文学界百花争妍的景象，当前创作繁荣，理论活跃，队伍壮大，现在他还是这样看法，“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前途，我还是十分乐观。”他说：“我希望你们不要管自己写的是不是伟大的杰作，不要考虑某些人是不是欢喜你们的作品，只要看你们是不是使出了全部的精力，是不是写出了你们对生活的真实的感受。”

人们知道巴金在不久前还说过“我们的文学没有理由不站在世界文学的前列。”现在他经过反复思考，他说“我更明白中国作家首先是为中国的读者写作。倘使我们的作品不能打动中国读者的心，不能帮助中国读者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不能支持他们对真理的追求，……中国文学怎么能站在世界文学的前列呢？……所谓划时代的巨著也不是靠个人的聪明才智编选出来的，它是作家和人民心贴心之后用作家的心血写成的。我认为作家的目的，应该是高尔基那句话：‘使人变得更好。’要做一个好作家，首先要做一个真诚的人。文品和人品是分不开的。”

一九八七年十月三日，巴金在完成了五本《随想录》的写作后，曾有重返故乡成都之行。在这以前一年，即一九八六年十月三日，他曾有信回复他在四川的侄子李致，对他说：“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旅游局搞什么花园，我不发表意见，那是做生意，可能不会白花钱。但是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只有极少数几本作品还可以流传一段时期，我的作品存在，我心里的火就不会熄灭。这就够了。”虽然他坚决不同意重建他的故居，但他对自己故乡的怀念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他曾在他的《随想录》中的一篇题目叫《愿化泥土》的文章中说：“我多么想再见到童年时期的足迹！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摸一摸我念念不忘的马房和泥土。”

这次是他在十九岁离开成都后的第五次回乡了。除了一九四一、四二和六 年那三次曾在家乡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外，以后都来去匆匆，不曾有很多时间探亲访友。现在离一九六 年第四次回乡的时间，也已有二十六七年了，这次他与有关部门约定：不参加任何会议和座谈，也不接受记者采访。他想把这段时间，都用在探亲访友与休养上。果然，他如愿以偿：在回到成都后，他与他久违了的几个当地老友分别见了面，这里有曾经在一九六 年接待过他的当时的四川省副省长张秀熟，也有作家沙汀、艾芜与马识途。过了几天，中秋节到了，他们就陪同巴金父女一起去新都县桂湖欣赏桂花，当时张秀熟已经九十三岁了，巴金、沙汀、艾芜也都有八十三岁，但老友重聚，精神仍都很好，兴趣也很高，大家说：“再过七年，张老一百岁，其他三人也要到九十岁了，连马识途也将八十岁，那时再相见，那该多么好啊！”隔一天，他们又去看了共同的亡友李劫人的故居“菱窠”。在那边，马识途一进门就在签名册上写了几句话：“一九八七年十月，巴金老回川，月之十三日重访劫老故居。同访者有张秀熟及沙汀等。签名留念。”然后，几个人就一一签了名。巴金签了名后，继又犹豫了一下，慢慢地从自己衣袋中掏出笔，回过头来把签名册翻到新的一页，颤巍巍地写了这么句话：“一九八七年十月三日，巴金来看望劫人老兄，我来迟了！”然后他与大家一起坐到客厅中，想起自己过去曾与李劫老多次共坐在这条长藤椅上谈心，并与自己一起进餐，当时也有张老、沙老、艾老作陪，而现在他已离开大家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显然，巴金对这位在三十年代曾与自己一起用长篇小说三部曲形式（《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描写成都社会变迁的作家，有不少共同

的感情。巴金热爱四川故乡，曾为它作出贡献，现在虽然年迈，但对它仍然有无限依恋。但他谢绝当地部门的好意，他认为为他重建自己早已毁废了的家园，将增加国家与当地政府的负担，这将使他

感到不安。他的愿望绝不是要求人们纪念他，他只是要求在《随想录》中所提出的：“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泥土，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木、禾苗一同生长。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一九八八年冬天，一个静静的日午，有个常来的客人又一次来武康路家中访问巴金。也许是由于当时文学界繁花似锦的景象，为主人和客人很自然地安排了这样一个舒畅的谈话环境；也许是由于这次谈话，事先作了预约，谈话时没有人来插话，也没有不速之客的打扰，他们谈得非常愉快。先是谈了一些几十年前巴金老家的旧事，还接触到对一些历史人物的看法，然后逐渐谈到创作问题，谈到创作界现状。客人说：

“研究作家的生平，看他们创作进程的顺逆与时代脉搏的起伏，是很有意思的。这里既可以看到作家的崛起与成熟，也可以看到作家的挫折与衰退，以及重振与复苏；同时更不难由此窥测时代风云的变幻。当然，从这里还可以看到作家之间既有相似的境遇，又有个性、才能、素质的差异。研究您的写作史，首先使我惊奇的是您一开始就出现排山倒海似的创作流量。显然，那是‘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人们带来了自由创作的环境；但是您的写作才能，从文学基础上来讲，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巴金回答说自己在童年时代就读了不少中国旧小说，少年时代还读过很多从欧美翻译过来的外国小说，包括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一部分外国小说读的还是英文版。他说：“我读小说不过是为了消遣，当时并不曾想到要做作家。如果对我写作有影响，应该说，鲁迅的《呐喊》与《彷徨》以及他翻译的那些短篇，都是我的启蒙先生；我的外国老师则是狄更斯、屠格涅夫、高尔基、罗曼·罗兰、卢梭、雨果和左拉。”至于中国古典文学对他在文字驾驭上的帮助，那也不能否认，巴金认为自己看的书比较杂，缺乏鲁迅、茅盾那样有系统的修养。至于古文，四书五经、《古文观止》之类，在私塾是必读书，有的文章不但能背，而且背得烂熟。“这也许在写作上也有点帮助。”巴金说：“但后来主要还是看小说。此外，在信仰无政府主义时，也通过翻译《伦理学》，读了一些有关政治、经济的书。我喜欢读革命家的传记及回忆录。”

这样，他们就谈起无政府主义问题。在客人谈起了关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传播情况及对巴金的思想影响时，巴金说：“这也很难说。思想随着现实的考验，总有变化，有发展。我的思想不但几十年在不断变化，即使最近十年来，在我写《随想录》开始时，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到目前也有不同了。所以，我总劝别人读《随想录》，最好能作为整体来看。我对自己的思想，一时也难用几句话来说清楚。我为自己思想做总结，也只能根据自己的认识，一点一滴来做。做一点，是一点。我总希望能把思想挖得深一些，看得深一些。比如我对国家的认识，就有错误，有改正，有发展，有变化，也有进步。我希望能把我们的社会建设好。但到现在，我对有些问题的看法是否成熟，是否已完全正确，那也难说。无政府主义我信仰过，但在认识过程中，一接触实际，就逐渐发觉它不能解决问题，所以常常有苦闷，有矛盾，有烦恼。这样，我才从事文学创作。要是我的信仰能解决我的思想问题，那我的心头

就没有苦闷，没有矛盾，没有烦恼，我早就去参加实际工作，去参加革命了。”

关于临解放时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巴金说：“当时确实有很多人劝过我离开大陆，我也有许多朋友离开了大陆，但我看到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我想我应该与人民在一起，我不能离开人民，这就留了下来。我说，我要改造自己，从头学起。”

这时，客人向巴金谈起青年评论家陈思和在《上海文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这篇文章认为知识分子在革命政权成立以后，看到人民生活安定，自己又受到社会各方面尊重，得到“莫大的幸福”，因而“潜藏了一种危机，作家不再作为一名浮士德式永不满足的个体探索者”，并由此“歌颂性的文学也自然而然地取代了批判性暴露性的文学，而一种自‘五四’始就在知识分子中间养成的，以个性为基点的现实战斗精神悄悄地衰弱了”。文章又说知识分子的探索精神，在客观上“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鼓励和保护，相反，它的积极性却因各种缘故而一再受挫”。客人说他自己由此想起一个问题，这就是：“在解放以后的十七年中，我们的许多作家，特别是许多在解放前就成名，并有很高成就的作家，如茅盾、叶圣陶、冰心、沈从文、曹禹、夏衍、老舍、钱钟书等，也包括你自己，为什么在创作上进入了一个低潮？不但许多人搁笔不写了，就是继续从事创作的，从数量到质量，都大不如前，这是为什么？”

巴金回答说：“现在看来，‘你出主意，我写作’，这样的方式从事创作，总是要失败的。解放初期，我不过四十出头，正当壮年，总想写出点东西来，但总是写不好。可以说，我在十七年中，没有写出一篇使自己满意的作品，我写不好自己不熟习的生活。茅盾在解放后不是没有从事过创作，他也尝试过，甚至写电影剧本，但没有成功。曹禹写《明朗的天》，效果也不好，大家都知道的。刚去世的师陀，解放初期写作劲头很大，但他的长篇连载被一家报纸腰斩；另外一篇小说题目叫《写信》，是他下生活写的，我看了还不错，但别人对他不满，说描写农村青年给志愿军写信时态度不严肃。看来写作总是以写自己熟悉的题材为好，写不熟悉的生活总没有办法写好。”

客人说自己曾在一九三三年上海出版的《社会与教育》上看到徐懋庸写的《巴金在台州》一文，当时徐懋庸批评巴金“作品的结局过分阴暗，使读者找不到出路”，建议巴金去农村找一点新的题材。当时巴金说“这自然很好，但并非必要”，他认为“艺术与题材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艺术的使命是普遍表现人类的感情和思想。伟大的艺术作品，不拘其题材如何，其给予读者的效果是同样的”。因此，客人以为巴金在那个时候就已对“题材决定论”进行了批判。虽然他并不否定作家“下生活”的意义，即在建国前也曾多次到农村、到矿井，与群众生活在一起，以扩大视野。当然徐懋庸那次动员他去农村，他并没有去。因为像徐懋庸那样为了使作品向读者指出路而到农村去找新的题材，巴金认为是“并非必要的”。

听到客人谈起三十年代这件往事，巴金禁不住有点感叹，他说：“是的，我原是同意胡风‘到处有生活’的说法，但是解放后我就不敢说了。这正是我在《随想录》中所说的，说明我在解放后‘觉新性格’的存在吧。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生活，他怎么写得出作品？怎么会成为真正的作家？有了生活，才有作品，才做作家。生活培养作家，不是职称培养作家。作家靠读者养活，不是靠领导养活。这本来是很浅显的道理。可是我们这么多年放弃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勉强去写不熟悉的题材，甚至要作家的作品去解释政策，而政策



有时又不免有变化，这样要创作丰收，是很难的。作家应该写他最熟悉的生活，写最使他感动的东西。这是我几十年经历所得到的教训。当然我并不反对作家到处去看看，对世界有更多的了解。”

这次他们的谈话，还谈到了其他一些问题，不久即以对话的形式发表在一九八九年第一期《文汇月刊》上。后来，巴金又把它作为附录，收编在《巴金全集》十四卷里。这确是巴金晚年关于文学创作方面一次带有总结性的重要谈话。这也是他长期进行探索与求真的一次历史记录。

## 第六节 二十世纪的良心

日子过得快，转眼两年过去了。到了一九九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又到闷热的夏天。这天上午，在巴金家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作协四川省分会派了两个同志来看巴金，巴金刚从华东医院出来不久，他听取了这两个同志的汇报，知道中国作家协会与四川省社科院、四川大学、中国作协四川分会、四川省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文化局、成都市文联、成都市百花潭公园、慧园等单位，根据一九八九年巴金八十五岁寿诞之际、在上海召开的首届巴金学术讨论会上，与会的中外学者一致要求一九九一年在巴金的故乡四川召开一次国际性学术讨论会的提议，为此，他们决定在今年九月十二日至十六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巴金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中心内容是：巴金对中西文化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以及巴金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及世界文学。会议还将参观根据巴金名著《家》修建的林园——慧园。

巴金对来访的客人们说：

“我有病，不能出席讨论会，非常抱歉。我长期患帕金森氏症，靠药物延续生命，但是有一个毛病还在发展，那就是语言障碍，我常常听不懂自己讲些什么。脑子还管用，嘴却不听指挥。只好请笔来帮忙。

“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懂艺术。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写作六七十年，我并无大的成就，可以说是愧对读者。

“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所以我说：‘把心交给读者。’读者是最好的评判员，也可以说没有读者就没有我。

“因为病，我的确服老了，现在我行动更不便，写字很吃力，体力都不断地衰退，以后我很难发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后还是要用行动来证明我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句话，我要用行为来补写我用笔没有写出来的一切。

“请相信我。谢谢。”

巴金把这些话用书面交给四川来的代表，请他把这个发言稿在九月中旬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代为宣读。最后他又对客人们说：

“我病得很久，希望能在这一二年中把病养好。如果我的健康能够有所好转，争取在我九十岁的时候，能再到四川去一次，和故乡父老乡亲们朋友们见见面，谈谈心，同时看一看成都市的建设。”

巴金微笑着表达了他美好的愿望，这无疑将给四川故乡人民带去最大的欢欣与安慰。

这一年的九月十二日至十六日，在成都召开的第二次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虽然中心议题是巴金对中、西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借鉴，巴金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但是，人们在大会发言中，在小组座谈会上，在与与会者平时的接触谈话里，还是把话题扯得更广泛，更深入。

曾经在四十年前与巴金共同在朝鲜战场上生活过的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葛洛，他代表作协致辞，要求人们：学习巴金一贯的追求光明追求时代同步前进的革命战士风格；学习巴金的创作态度，和他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历史使命感；学习巴金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

话得到大家赞同，但是在会场上，人们更多的还是谈到巴金在《随想录》中所显示的思想发展和人格觉醒。大家感谢他在八十年代中给予我国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并难忘他给青年学生和中青年作家的有力支持，人们还记得不久前他谈过“中国的希望在他们身上”的话。大家领会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巴金写给大会的信中所说的：“我要用行为来补写我用笔没有写出来的一切”这句话的深层意义。早在三年前他就给李致写信说过：“真正了解我的人并不多，可能有些未见过面的读者看到了我的心。我并不希望替自己树碑立传，空话我已经说得太多，剩下的最后两三年里我应当默默地用‘行为’偿还过去的债。”

就在这次研讨会召开后三个月，李致又接到巴金的一封信。像上次谢绝四川有关部门要为他重建成都旧居那样，巴金这次又婉谢有关出版社要为他翻印日记，他说“关于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外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可能对少数研究我作品的人提供一点线索），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我最近刚看过这些日记，里面还有些违心之论，你也主张删去，难道还要翻印出来，使自己看了不痛快，别人也不高兴？……只有把我当成‘名人’，才肯出版这样东西，我要证明自己不愿做‘名人’，我就得把紧这个关，做到言行一致。对读者我也有责任。……几十年前我曾责备自己拿作品应酬人，因此大发牢骚，今天我在搁笔的时候，我不能再勉强自己了。”

尽管巴金到了九十年代，他“因为病，我的确服老了”，很难写文章；但他和少数老友仍保持着通信联系。特别是他与冰心老人，不仅因为一九八一年他们曾有一次共同访日的机会，增强了相互之间的友谊，从这个时期开始，他们的通信没有中断过；更主要的还由于他们通过各人的生活实践，看清了不少世态，两人对许多人和事，有着相似的看法。本来他们可以有许许多多次见面相叙的机会，不幸一九八一年访日回国，当年九月冰心就因患脑血栓摔伤了右腿，只能让巴金到北京开会时来问候她了；但又不幸巴金自己也在两年后跌跤折骨，从此也少有机会上北京看她。在这十年中，他们曾计划与夏衍老人一起在杭州“中国作协之家”有一次共度假期的机会，也曾希望各从京沪出发到深圳相聚，但都因冰心健康关系不适宜远行未得到医师批准而作罢。

这样，两位老人的书信来往，成了他们友谊的象征，也由此透露了这两个文化老人晚年思想的飞跃与发展。他们相互了解，又相互支持，并相互鼓励，为我们的时代保持了希望的曙光。特别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交替时期，当人们再一次为现实感到困惑，并由此觉得苦闷的时候，将在这两个老人的信中看到不熄的火在燃烧。在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巴金给冰心信中说：“近一年来我常常想到您，我因为有您这样一位大姊感到骄傲，因为您给中国知识分子争了光，我也觉得有了光彩。近九十岁的人了，您还写出叫人感到‘烫手’的文章，使人尝到‘辣味’的作品，您为什么？还不是为了我们国家的繁荣昌盛……还不是替受苦受难的人争取较公平的待遇……还不是……总之，谢谢您，我要听您的话争取长寿，多写点东西，多讲几句真话……”

但是，连“讲真话”这三个字也有人接连不断地对它进行批判了！真是想不到啊！

巴金在一九八九年七月廿七日给冰心的信中说：“好久没有给您写信，

只是因为病痛，……以后怕给您添麻烦，连几句口述也不便寄出。……我天天做梦，而且多做怪梦。……我们不能见面，有话也无法畅谈，幸而我们能做梦，……我已到医院住了五个月，……我还想，能做梦就能写书，要是你我各写一本小书，那有多好！”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巴金又给冰心写信，他说：“本来我想得很好：不能动笔就索性搁笔，平静地度过这最后的日子，‘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力了’。但没有料到，躺在病床上，每天总有四五小时不能闭眼，我忘不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更忘不了我们那么多忠厚勤劳的人民。怎么办呢？我还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呢？我始终丢不开他们。……我多么盼望看见远方的亮光。而屋子却是一片灰暗。我们的光明在什么地方？我不断地问自己。朋友们都在摇头叹息。但是我不能失去信心，我没有失去信心。我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痛苦地思索的时候，我反复地背诵我们前辈留下的文化遗产，它们会在暗夜里闪光，它们会给我帮助和支持。我常常想着屠格涅夫的名句，……”

九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到了，冰心来了信，也来了电话，她很怀念巴金，也关心他的健康，这时巴金已经出院，冰心告诉他说，她从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希望，这句话一年前巴金也曾经公开对人说过，他同意她的看法，并接受她对他的鼓励。巴金再一次给她回信，他说：“我读了信，想来想去，你有道理。”

我相信您。我心安了。但是让自己振作起来也并不是容易的事。我仍然把您看作一盏不灭的灯，灯亮着，我走夜路也不会感到孤独。”这次他还告诉她，他将给她寄去一套《巴金译文选集》，这是香港三联书店最近出版的。全套共十册，都是巴金的译作。这次出版前，曾经巴金在病中重新校阅了一遍。

大概是由于信中有“让自己振作起来也并不是太容易的事”这一句话，冰心认为巴金有点悲观情绪，就再一次去信，劝他不要悲观。巴金就复信告诉她，“您对我的‘悲观’有误解。”巴金认为自己的“悲观”，在于感到“有病不能工作，写字动不了笔”，而且“计划做的事大半成为空话，想写的文章写不出来”。他只是对自己的病痛而觉得苦闷。显然他对祖国和人民的前途从来不曾悲观过。他相信“存在就是力量”，“活下去便是战斗”。至于他对青年的看法，他说：“一方面相信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另一方面我也尊重鲁迅先生的意见，不以年龄来判断是非。”

这一年五月十六日，当已达九十高龄的冰心收到巴金给她寄去的《巴金译文选集》后，第二天她就兴奋地给他写了一封长信：

亲爱的老弟巴金：

昨天收到了您寄来的《巴金译文选集》，真是欢喜万分！有些是我看过的，但还要重看一遍！您真是著作等身，而且一辈子自食其力，这是我们这一辈人里，没有一个人做到的！从这两件事来说，使我不但爱你这个老弟，而且敬你这位老弟了。同时我收到五月间的《良友》，上面有“八五寿辰访巴金”，里面相片真多，我看见了我去过和没见过的你家里人。知你不喝酒，但喜饮茶和咖啡，在这点上又与我相同。什么时候我们能一起喝点咖啡，谈一谈，多好！可惜我们行动不便了，近来常常觉得心烦，……家里还是都好。吴青是天天巴金舅舅不离口，总说“你和巴金舅舅在深圳有一次聚聚多好，我和小林也去”。我何尝不想呢？但我近来身体实在越来越不行——

前几天我又收拾了一些有上下款的书和画，送到现代文学馆，还有一大

盆“寿星桃”，这是宋庆龄基金委员会送我的，八个人抬上楼来，花开得灿烂极了，现在不但有密叶，而且结了小桃，我客厅小，容纳不下，屋里得不到太多的阳光，我便也请舒乙派人来拉了去，让它在你的文学馆院里，得到充足的阳光和空气。明年再开花时，我让陈钢给你寄相片去。不写了，今早刚退烧，纸已尽，愿你多多保重，一家人都好！

冰心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七日

冰心千方百计地想使巴金在闷热的夏天中感到一点凉快，在忧虑中得到一点快乐，这在她的信里可以看得到的。巴金十分感谢她的好意，同时确也得到一点鼓励。当然，关心巴金健康，希望巴金生活得愉快，不仅是冰心的愿望，也是他的家庭，他所有的亲友，以及他的千万读者的祈求。每年十一月廿五日，他的生日来临，海内外的读者贺电、贺信、贺卡总是不断飞来，各式祝寿花篮总是从客厅摆到庭院，来祝寿的人也总是川流不息，其中包括领导同志的登门拜访。

但是，这也是事实：各种与巴金《随想录》思想针锋相对的言论，这两年在有的角落里也的确未曾间断过。批评提倡说真话的文章就是一例。

巴金并不曾就此软倒。他重新拿起笔来，在自己主编的《收获》杂志一九九二年第一期上发表了他在一九九一年九月八日写的《向老托尔斯泰学习》。他说：

“……活到八十七岁，我的确感到精疲力竭，但是今天和从前一样，我还得老实地活下去。我的原则仍然是讲真话，掏出自己的心。其实这不过老调重弹。我并非自吹自擂独家贩卖真货，或者我在传播真理，我唯一的宗旨是不欺骗读者，自己想说什么就写什么，不停地探索，不断地追求，倘使发现错误，就承认错误，绝不坚持错误。读者是我真正的‘评委’，我并不要他们跟着我走。有话要讲，我才拿笔。我的手不听指挥，我又把笔放下。我需要安静。我也希望得到安静。但是我会得到安静么？”

“……当然到最后一刻我也会撒手而去，可能还有不少套话、大话、废话、空话、假话……把我送上西天，但是我留下的每张稿纸上都有这样三个字：讲真话。

“俄罗斯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被称为十九世纪世界的良心，他标榜‘心口一致’，追求‘言行一致’，为了讲真话，他以八十高龄离家出走，中途病死在火车站上。

“向老托尔斯泰学习，我也提倡‘讲真话’。我说得明明白白：安徒生童话里的小孩分明看见皇帝陛下‘什么衣服也没有穿’，他就老老实实地讲了出来。我说的‘讲真话’就是这么简单，这里并没有高深的学问。”

说是“搁笔”，了解内情的人知道巴金其实从来不曾真正搁笔过。他带着病在这两年内把他的二十六卷《巴金全集》亲自一一校订完毕，这不只是单纯的校阅了七八百万个铅字的劳动；更主要的是对他精神的煎熬。这里有一部分过去从未收进过集子里去的“佚文”。这些佚文过去没有把它们收入进集子，有各种不同的历史原因。这些历史原因，一回顾就使他感到痛苦。早在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他编《巴金六十年文选》时，他曾给他的胞弟李济生写信（李济生和李小林是这本书的编者，这封信也就是这本书的代跋）说：

“……说心里话，我不愿意现在出版这样一本书，过去我说空话太多，

后来又说了很多假话，要重印这些文章，就应该对读者说明哪些是真话，哪些话是空话、假话，可是我没有精力做这种事。对我，最好的办法是沉默，让读者忘记，这是上策。然而你受了出版社的委托，编好文选，送了目录来，我不好意思当头泼一瓢冷水，我不能辜负你们的好意，我便同意了。为了这个，我准备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接受读者严肃的批判。我相信有一天终于会弄清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到底说了多少假话。这是痛苦的事。但我也无法避免。”

这次编《巴金全集》要比编《巴金六十年文选》更为艰辛，不仅篇幅多几十倍，而且要把所有的“佚文”都收集进去。有这样勇敢的作家，古今中外都是十分少的。特别是经历过像巴金这样漫长、复杂、曲折的创作道路的人，把自己笔下的东西一点不剩的亮给全世界看，要有多么坦荡的心境！说实在，这些“佚文”数量也的确惊人。也由此可以想象得到经过人格觉醒的巴金在这两年中整理这些佚文时的精神痛苦。

“……回顾七十年的创作道路，我承认自己是在大批判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一九九二年七月九日，他在他的《全集》十九卷中给这部《全集》的编者王仰晨写信（代跋）时说：“我创作力量最旺盛的时期也就是我挨骂最多的时期。有时四周静了下来，我感到寂寞，我的声音哑了。于是出现无声的文章。这种文章十八卷有，十九卷也有，内容并不一样，但都是靠别人脑子思考写成的。今天读者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浪费。几十年的长时间，那么多的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还有数不清的冠冕堂皇的标题，加上没完没了的、从不兑现的豪言壮语，我能对读者说这是‘繁荣’，不是‘浪费’吗？不，倘使完全由我自己安排，我很有可能将它们一笔勾掉，仿佛我并未写过这种文章，事情就变得十分简单。这些年人人都这么做，大家都习惯了。因此提倡讲真话反倒使人大惊小怪。我常常想不通，为什么讲真话会遭到围攻。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不赖帐。……”

客人们每次按电铃把巴金家的大门推开，穿过院子和走廊，来到他的客厅，总看见老人自个儿坐在角落里的书橱旁，拿着笔愣在那边思索着什么。“我常常想不通，为什么讲真话会遭到围攻。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不赖帐。”这就是老人苦苦思索着的问题吧？这就是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二十世纪的良心吧！

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九二年的春夏之交，巴金与他的老友夏衍在杭州有一次难得的聚会。夏衍九十二岁了，他与冰心同龄，比巴金大四岁。西子湖畔，老友相逢，春风杨柳，顿消胸中尘烟。谈起正在各处传达的邓小平南巡谈话。夏衍说：“南巡讲话谈到了解放思想，特别是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是主要是防‘左’。这对文艺界也是非常重要和及时的。前不久李瑞环同志在内蒙的讲话也提到，文艺作品只要不违背现行法律，就不要横加干涉。这表明文艺上仍存在‘左’的问题。一些人动辄把自己看不惯的作品，用‘资产阶级自由化’或‘和平演变’等帽子往上套，这对文艺繁荣发展十分有害。”

恰好这时，《中国作家》杂志来向巴金约稿，要他和夏衍、冰心等作家，对眼前的曙光发表一点意见。巴金就以《新的希望》为题，写了这么几句话：

“我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时期的文学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作家们的劳动，应该得到鼓励、尊重和保护。现在改革开放的新势头，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我相信我们的文学创作一定能突破‘左’的禁锢，进一步活跃起来，繁荣起来。”

很多读者从《中国作家》杂志读到了这段文字，都不免想起不久前出版的《巴金谈人生》（李存光选编）一书中，巴金写在前面的一篇短文。这篇短文的最后几句话是：

“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我不断地自问：我的生命什么时候开花？那么就让我再活一次，再活一次，再活一次！”

啊，二十世纪的良心，您的生命之花已经开放在千万个读者心上；我们多么希望您能再活一个世纪，再活一个世纪，再活一个世纪！

1993年4月修改定稿在上海荧荧楼后 记（一）

为巴金同志写传，是我的愿望。我愿尽我的力量，来完成这项工作。但不论从思想，还是从写作才能来看，我都难以挑起这副担子。使我敢于一试的，是由于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同志的鼓励和帮助，特别是有李济生同志的助一臂之力。他在我写作过程中，提过很多很多的意见，订正了原稿上的一些事实出入，还陪同我去他的故乡四川成都访问，使我有机会得与了解巴金同志生平的人进行详谈。比如巴金同志的堂弟李西舫老人，老友卢剑波教授等。他们都八十多岁了，由于他们的热情谈话，使我有机会收集到书本以外的材料。所以应该说，李济生同志既是我的责任编辑，也是我的顾问，按理说应该与作者共同署名的。

至于巴金同志，在我写作过程中，曾接受过我多次的访问。他日常工作十分繁忙，已进入高龄，健康情况也不太好，我非常感谢他给我每次提问的一一答复。而当这部传记的上卷在1988年《小说界》双月刊连载完毕后，1989年5月他在医院卧病期间，又由他的女儿李小林同志把全文读给他听，并对事实细节提出了十几处补正，使我有足够依据对这本传记进行了修改，做到比原来的更为翔实。巴金对我在文学创作上的关心和教导，以及小林同志对我的有力帮助，都使我难以忘怀。

此外，解放前曾与巴金同志夫妇先后有过交往的卢剑波、钱君匋、朱雯、冰心、赵家璧、师陀、王辛笛、柯灵、唐 駉、王西彦、黄裳、杨苡、王蘅文、肖荀、马云等同志，以及一些虽不认识巴金，但对当年时代背景十分了解的老人，如曾在三十年代初期《时报》担任本市新闻版编辑的顾芷庵等新闻界前辈，都曾为《巴金传》的写作，接受过我的访问，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材料。巴金作品的研究者李存光、陈丹晨、陈思和、李辉、贾植芳、唐金海、张晓云等同志所编写的书，也给了我不少有益的启发。至于传记在《小说界》连载时，责任编辑左泥同志以及江曾培、孙颢、郑宗培等同志的关心和支持，那就更不必说了。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990年7月28日

## 后 记 (二)

《巴金传》已经出版，它的续卷也已在《小说界》双月刊连载完毕。终于定稿出书了。

完成了这部五十万字的长篇，我心中感到轻松，却又觉得沉重。

回想四年前，上海文艺出版社四位编辑同志来我家约我写这本书时，我就有这样类似的心情。因为这是出版社作为重点工程来叫我挑这副担子的，我感到荣幸；却又觉得自己的才力有限，难免辜负广大读者的期望。而且，在这以前，我已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与一个同志合作写《陶行知传》，并已开始采集资料。但是几经考虑，我还是接受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给我的任务，那是由于有李济生同志的支持，并告诉我已征得巴金同志的同意，这才使我有勇气挑起这副担子。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屠岸、季涤尘同志的大度，他们在接到我的道歉信后，不但不责怪我另有所择，相反，出于对整个出版事业的热诚，他们竭力支持我写、希望能早日看到的《巴金传》。他们这种宽容态度和良好作风，在《巴金传》出版的时候，特别使我难以摆脱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说实在，对我个人来说，这两家出版社过去都出版过我的书，两个编辑部都给过我热情的鼓励和帮助，我都铭感在心，愿为它们尽心尽力，继续做点工作。我放弃《陶行知传》的写作计划，而从事《巴金传》的写作，是由于我个人觉得巴金、陶行知虽都是我的前辈和老师，但我对巴金生平的了解，要比对陶行知的了解为多。特别是巴金同志还健在，他的许多朋友和熟人就生活在我们的周围，我有什么事情不清楚，可以向他们随时提出咨询。同时，我还认为对当前读者需要来说，也许《巴金传》比《陶行知传》更为迫切。

这样，我就终于行动起来。不但动手翻阅资料，还搬动两条腿，不间断地登门拜访巴老，同时又访问了他的一些朋友和熟人。当然，首先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给我创造了条件，让我由李济生同志陪同到他的故乡成都访问。在与巴金的众多家属包括他的堂弟李西舫、侄子李致等人的聚谈中，使我有机会了解到巴金大家庭的百年变迁。济生同志还陪我去四川大学，会见了巴金二三十年老友卢剑波教授。这位须发全白，已达八十五高龄的老人，他向我提供了二十年代巴金与他的那些年轻朋友一起办刊物的情况，加深了我对五四运动前后四川社会的印象与认识。隔了一个时期，济生同志又陪我到北京，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招待所里，与现代文学馆刘麟等同志交流了有关巴金资料研究的成果；并到北京图书馆去参观了在那边展出的巴金文学创作生涯六十年展览会。这个展览会，是由北京图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馆联合举办的。它增强了我写《巴金传》的总体观念。

在这以前，我还在北京访问过冰心。冰心前辈谈起抗战时期重庆书市买不到她的书而巴金为此感到焦急的情景：他向她约稿，并为她编作品集，并替她的书写序，给她丰厚的稿酬，却不计较他自己的利益。“他真是善良到极点的人。”冰心的话很使我感动。当《巴金传》开始在《小说界》连载后，我又在北京乘全国散文杂文评奖委员会开会时机，与唐弢同志作了一次长谈。唐弢向我谈了他在抗战时期和抗战胜利后与巴金交往的情景，然后又谈到一九五六年秋天他自己入党后，根据上级有关同志的嘱咐，去巴金家中动员巴金写申请入党报告。当时唐弢用朋友问随便谈话的形式向巴金说：“老巴，我看你也该向党打报告，提出入党要求了！”巴金却笑了起来，很快回



答说：“这多年来，我自由散漫惯了，组织观念不强，看来还要努力。我想我还是留在党外的好。”唐弢的这一段回忆，也帮助我进一步认识巴金怕受拘束的性格。

在我向巴金的朋友们访问中，钱君匋关于巴金二十年代末期在上海时情景的叙述，黄源、赵家璧关于巴金与鲁迅的关系，以及与靳以一起编办刊物时的回忆，朱雯关于巴金在三十年代初到苏州去看他时的一段往事谈话，王辛笛关于解放初与巴金一起到北平参加第一次文代会时情况的陈述，师陀关于他在抗战前刚从北平来沪第一次见到巴金时情景的追叙，柯灵关于在“文革”开始前文艺界情况的介绍，王西彦关于他在“文革”中与巴金同在一个“牛棚”里生活时情景的描绘，黄裳关于巴金在霞飞坊生活时的往事叙述，马云关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事务的忆旧，所有这些都为我写的《巴金传》充实了内容。而南京大学教授杨苡、上海科学院细胞生物学专家王蘅文、文艺出版社干部萧荀、卢湾区产科医院高级助产士沈瘦香等对我的谈话，则更多有关巴金夫人萧珊的事迹，当然这也相应丰富了巴金每个时期的生活内容。

此外，还有一些虽然与巴金不相认识，却非常了解当年时代环境的老人，出于对上海文艺出版社事业的关心，和对《巴金传》写作的热情期望，他们或则接受我的采访，无私提供我大量素材；或则主动写信来，向我补充资料，有时还纠正我在《小说界》发表的初稿中的讹误。其中曾在三十年代《时报》担任过本市新闻版编辑的顾芷庵先生，向我详述了当年他的同事吴灵缘经手编发巴金长篇小说《激流》（出书后改称《家》）在《时报》上连载时的经过。另一在卢湾区老年大学工作的秦驾彭老人，还主动写信给我，告诉我当年为巴金介绍《激流》给《时报》刊用的文化人火雪明是川沙人，而不是宁波人。市立第二中学王镫令老师还介绍他的同事林老师与我相识，为的是林老师曾经做过巴金外孙女端端的班主任。他的目的是希望我在《巴金传》中把巴金的家庭生活和端端的学校生活联系起来，使巴金的教育思想（对当前教育改革的想法）在作品中写得更鲜明。至于续卷写作过程中，则得益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巴金全集》责任编辑王仰晨，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刘麟，以及巴金先生在四川老家亲属李致同志提供的材料甚多。

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对《巴金传》出版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群众也包括巴金的朋友们对这本书的热情关注，都使我日夜处在紧张不安的状态中。但是相反，巴老对我的写作，却十分放手，他从不向我表示应该怎样写或者写什么。他像尊重一切作者写书一样，从不对我干预。虽然我每写好一章，总把原稿交给他，希望他看一下；但他有时几乎一字不看就转给李济生同志了。因此，有时文章在《小说界》登出后，他才发现问题。比如我把他的三叔和《家》中的四叔等同起来，以致写成与祖父的姨太太经常勾结在一起制造事端的坏人。这使他感到不安。他对我说：“其实，三叔不过脾气不好，起初与我们兄弟相处得也还是不错的。”在出书前，他请他的女儿李小林同志把全文一字一句的念了一遍给他听，并向我提供了一些补充修正的意见。

巴老对我工作的支持，是我的幸运。我虽然访问了許多人，由此得到不少写作素材，但有些往事究竟相隔久远，有时别人转述，不免以讹传讹，甚至文字记载也不免失实，这就需要我向巴老核对，加以鉴别。比如一九三五年冬天，巴金在北平帮助靳以结束《文学季刊》后，在该刊写的停刊词《告别的话》，和一九三六年在上海为《文季月刊》写的创刊词，赵家璧同志在

一九八八年《新文学史料》上写的回忆靳以的文章中，都把它们当作靳以写的，家璧同志还把他的文章清样寄我供我参考，我读了后找《告别的话》和《文季月刊》创刊词来看，发觉不大像靳以所写，倒很像巴金的文字。经我向巴老提出询问，果然，他说都是他所写，并且说，这两个刊物凡是不署名的文章，都是他执笔的。后来我又向家璧同志核对，他说确是他记错了。

由此，我知道：即使当年的同时代人，年代过久，有时也不免记忆出错。这还使我想起另一件事，是有关钱君匋同志的回忆。我几次带着录音带去他家里，听他的长时间谈话。因为就目前讲来，在上海能谈巴金在二十年代住在宝山路宝光里生活时情景的，只有他一个人了。年逾八十，仍精力充沛能作长谈的钱先生，他的热情叙述增长了我不少见识，同时也使我非常感动，但究竟年代过久，有些事情不免有所出入，如有关他当年给朋友帮助的事，后来据我了解，此事与巴金并无关系。

看来，写人物传记，有利的条件，莫过于传主的健在。我写《巴金传》，最大的幸运是随时可以请教巴金，并有他的家属李济生、李小林等人的帮助。上海文艺出版社找准题目，找定作者，而又能很好地创造条件，帮作者把工作做好，这是它的大本领。所以我说，我的幸福是巴金给的，也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给的。《巴金传》出版后，得到各报刊和电台、电视台的推荐，并被上海列入1991年度红旗读书运动推荐节目，这是出于人民群众对巴老的爱戴，也是由于出版社（包括《小说界》编辑部）有关领导和责任编辑认真工作的结果。他们在约稿中，总编亲率精旅，浩荡前来，势在必得，这样的气魄，这样的决心，这样的工作精神，永远是我的楷模。

另外，我也深知没有前人的耕耘，就没有成熟的泥土足以培植新的果树成长。任何事业的建树，都依赖承前启后，众志成城；而不可能白手起家，无祖无宗的。对巴金的学术研究也是这样。所以我感谢一切先我研究巴金的学者，如陈丹晨、李存光、谭兴国、唐金海、张晓云、陈思和、李辉等，我从他们的著作中得到营养，他们永远值得我尊敬。但也无可否认，我的书究竟是巴金的第一本文学传记，它既需要评介他的作品，更需要全面反映他的经历，他的生活。作家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在世界上存在的，他的作品固然是他生活中的一个主体，但作品决不是他生活的全部。在滔滔不绝的历史长河里，作家的生活之船既有顺水而下的时候，也有逆水行舟的日子，甚至更有翻船覆船的时刻！在错综复杂的时代环境里，古今中外作家的作品，有时可以代表他的思想，有时却也难以抒发他的感情，有时甚至还被迫长期搁笔。作家的一生很多时候是离开他的笔而存在的。有时即使他有笔如椽，挥舞自如，生活也总是他的作品的主宰。所以作家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他的传记总要把他的作品放在他的生活之下，而不会把它游离在生活之外。生活总是作家传记的中心。我曾就这个问题请教巴老，巴老说，“作家传记应该是以作家在实际生活中的为人，来对照他的作品所反映的思想，看看两者是否符合。”这样的说法是令人信服的。我正是想按照这样一个准则，来反映巴金的一生。当然，反映得是否正确，那要看我的水平了。而此刻我所以在轻松中感到不安，感到沉重，正是因为我在这一点上唯恐做得不够。

从上海文艺出版社来看，我是它的一个忠实读者，也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作者。但从我个人来看，上海文艺出版社和我的关系却很深，影响也很大。我永远记得一九五六年八月，它曾为我出版过一本特写集《芝巷村的人们》，这本小书是我解放后的第一本作品集，它给了我重新从事文学写作的勇气；

我也永远记得一九八五年六月，它为我出版的一本散文集《鲜花与美酒》，使我在文学创作的前进道路上，又有一次检视自己习作的机会。而在一九八七年开始的《巴金传》写作，没有上海文艺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同志（特别是责任编辑李济生、左泥两位）的热情鼓励与积极帮助，这部五十万字的传记是不可能四年中完成的。

十年前，巴金前辈在《随想录八十八》中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三十周年纪念写了文章，他说：“庆祝三十岁生日，总结三十年的工作经验，不用说是为了增加信心，做好工作。……对编辑同志，对那些默默无闻、辛勤工作的人，除了表示极大的敬意外，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现在，又是十年过去了，面对又把十年的时间花费在默默无闻、辛勤的编辑工作上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同志们，我们今天又有什么话好说呢？我除了再一次表示极大的敬意之外，只有像巴金前辈那样，到了耄耋之年，仍以不歇的劳动来酬答我们那么好的一批热情无比的读者，那么好的一批勇于牺牲自己、乐于帮助别人的从事编辑工作的同志们。至于在我的家庭中，我妻刘秀梅和我的四个子女为这本书所付出的直接和间接的劳动，那也不是一句话能说明白的了，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1993年5月26日在荧荧楼改定

